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二　部

第　一　部



第一章

根本不是癌

癌症楼又名十三号楼。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迷信思想。但是，当他看到住院许可证上写着“十三号楼”的时候，心毕竟往下一沉。为什么不把假肢科或肠道科编为十三号呢？他们太不体贴病人的心情了！

然而，除了这所医院，目前整个共和国没有别的地方能治他的病。

“可我又不是生癌，您说是不是，大夫？我不是生癌吧？”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希望问道，同时轻轻地摸了摸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那玩意儿简直一天比一天大，不过外面还包着洁白完好的皮肤。

“不是，当然不是，”女医生董佐娃对他说这样的安慰话已经有十来遍，一面用粗大醒目的字体在病史上写了一页又一页。她写字时戴上一副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就摘下。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也不好，显得很疲倦的样子。这还是几天以前门诊时的情形。病人只要被指定到癌症楼，哪怕只是去就门诊，夜里就睡不着觉。可是董佐娃一下子就要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住院，而且愈快愈好。

这病来得突然，出人意料，在两星期内简直象雪崩一样临到一个本来无忧无虑、幸福顺遂的人头上。但是还有一件事现在使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的程度不下于疾病本身，那就是：他只能作为一般病员住进医院。治病不享受特殊待遇——他已记不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为此他曾打电话给叶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盛佳平，给乌尔马斯巴斯巴耶夫，问这所医院里有没有专家，能不能布置一个小房间权充特别病房。可是，这里实在挤得厉害，毫无办法。

还是走了整个医疗中心总院长的门路，才答应给予唯一的一点照顾：免去排队等床位、进公共浴室洗澡更衣这套手续。

现在，尤拉把他们家那辆浅蓝色的“莫斯科人”牌轿车载着父亲和母亲一直开到十三号楼的台阶前。

外面相当冷，但是在那毫无遮蔽的水泥台阶上，却有两个身穿颇不整洁的绒布晨袍的女人双手抱肩，缩紧脖子站在那里。

从看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晨袍开始，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对此地的一切都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被蹭得露出了砖头；门上的把儿给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地板上的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嵌壁板看起来脏得够呛，板条钉就的一些大长凳坐不下，人们就干脆坐在地上；远道而来的病人有穿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系着白色头巾的

乌兹别克老太婆，年轻些的女人头巾多半是紫色或红红绿绿的，脚上都是皮靴和橡胶套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解开衣襟的大氅拖到地上，人瘦得可怕，肚子却鼓得老高，他不住口地在叫疼。他的号叫惹得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耳聋心烦，仿佛小伙子不是在诉说自己的痛楚，而是在诉说卢萨诺夫的痛楚。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脸上顿时失色，连嘴唇都变白了。他停下来悄悄地对妻子说：

"卡芭！我会死在这里的。算了。咱们回去吧。"

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说：

"巴申卡！你要咱们回哪儿去？……以后又怎么办？"

"也许还能跟莫斯科方面疏通成功……"

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把整个宽阔的、衬着一头浓密的古铜色短发显得更宽的脸盘向着丈夫，说：

"巴申卡！莫斯科方面也许再过两个星期还没法疏通。光等着怎么行？那个东西每天都在扩大！"

妻子牢牢地扼住他的手腕子壮他的胆。在社会上和公务方面，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有坚定不移的主见，因而觉得在家庭事务中随时仰仗妻子心里就分外愉快、踏实。凡是重大的事情，她都能迅速而正确地作出决断。

可是长凳上的小伙子折腾个没完，一个劲儿地号叫着！

"医生说不定能同意出诊……咱们自己掏钱……"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话虽如此说，但自知没有把握。

"巴西克！"妻子继续规劝，心里跟丈夫一样痛苦。"你

也知道，我自己一向最积极地主张掏几个钱请医生出诊。可是咱们已经打听明白：这里的医生不出诊，不收钱。而且他们要用仪器设备。办不到……”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明知办不到。他不过这样说说罢了。

他们同肿瘤医院的院长说好，下午两点由护士长在这里的楼梯脚下等候他们。此刻有一个病人拄着拐棍正从楼梯上下来，而护士长自然不在那里，楼梯底下她的一间小室也锁着。

“跟任何人事先说好都没有用！”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发火了，“这些人拿了工资是干什么的？”

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肩上仍然裹着用两张玄狐皮做成的老大一条领子，从写着“禁止穿外衣入内”的走廊里往前走去。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仍站在穿堂里。他把头略略侧向右边，提心吊胆地碰了一下锁骨与下颌之间的肿瘤。他得到的印象是：从刚才他在家里对镜围上围脖时看了最后一眼到现在，半小时内肿瘤好象又大了些。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一阵虚软，想要坐下。可是长凳看来是那么脏，而且还得要求一个系着头巾、脚边放着一只油腻腻的口袋的娘们挪动一下她的身子。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嗅觉特别灵敏，他好象老远就闻到了那只口袋发出的臭味。

唉，我们的居民几时才能学会带着整洁的手提箱出门？（不过，现在有了这个肿瘤，这已经不在话下。

卢萨诺夫给那小伙子的叫喊以及眼睛所见、鼻子所闻的一切折磨得实在受不了，只得略略靠在墙上一处凸出的地方。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乡下人，端着一只容量为半公升的玻璃罐，上面贴有标签，里边几乎盛满黄色的液体。他并不把罐子掩盖起来，反而当作排队买来的一杯啤酒那样引以为荣地举着。乡下人走到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面前站住，几乎把玻璃罐伸到他鼻子底下，打算向他问讯；但对他头上的海狗皮帽一看，又转身向前，去问拄拐棍的那个病人：

"劳驾，这该往哪儿送，啊？"

断腿的病人指了指化验室的门。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只觉得恶心想吐。

外面的门又被打开，进来一个穿白罩衫、头上什么也不戴的护士，模样实在不俊，脸太长。她一下子就注意到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并料到是谁，所以走到他跟前。

"对不起，"她气喘吁吁地说，脸红得同搽了口红的嘴唇差不多，可见匆忙之一斑。"请原谅！您等我很久了吧？刚才有一批药送到，我在签收。"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想用尖刻的答话刺她一下，但忍住了没说。等待总算结束，他已经够高兴的了。尤拉拿着一只手提箱和一袋子食品走过来，跟开车时一样只穿一套西服，不戴帽子；他神态自若，一绺额发晃动不已。

"跟我来！"护士长向楼梯底下她的小房间里走去。"我知道，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跟我讲过，您不穿医院的病

人服，并且带来了自备的睡衣。不过，必须是还没有穿过的，是不是？”

“刚从店里买来。”

“一定得这样，否则必须经过消毒，懂吗？您就在此地换衣服。”

她打开一扇胶合板的门，把灯拧亮。这间斜顶小室没有窗子，却挂着好几幅彩色铅笔画。

尤拉默默地把箱子放到里边去以后退出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进去更衣。护士长利用这段时间还急于赶到别处去办事，但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正好回来。她问道：

“姑娘，您这样急急忙忙做什么？”

“我——我有点儿……”

“您叫什么名字？”

“米塔。”

“多奇怪的名字。您不是俄罗斯人？”

“我是日耳曼人……”

“您让我们久等了。”

“请原谅。我正在那边签收……”

“听我说，米塔。我希望您知道，我丈夫是个有贡献的、非常宝贵的干部。他叫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好，我记住。”

“您要知道，他素来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而现在又病得这么厉害。能不能派一名护士经常服侍他？”

米塔心事重重的脸上现出更加焦虑的神色。她摇摇头说：

“我们这里除了手术病人，白天三个护士护理六十个病人。夜里两个人值班。”

“瞧，我早就说过！在这里即使人快要死了，也叫不到人来。”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我们对所有的人都给予适当的照料。”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可不同于‘所有的人’。再说，你们的护士要换班。”

“是的，十二小时换一班。”

“这种大锅饭式的治疗太可怕了！……我宁可跟女儿轮流在这里侍候！我愿意自费雇一名特别看护。可是我听说，这也办不到，是吗？……”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何况病房里连一把椅子也放不下。”

“我的老天爷，这病房该是怎么个样子啊！！还得去看看！那里有几张床？”

“九张。能一下子住进病房还是好的呢。我们这里新来的都躺在楼梯上、走廊里。”

“姑娘，我还是得提出请求，您熟悉这里的人，事情比较好办。您去跟哪一个护士或女工友说说，让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得到不同于一般的护理……”她已经喀嚓一声打开一只黑色大提包，从里边取出三张五十卢布的钞票。

站在一旁不做声的儿子把脸扭过去，一绺淡黄色的额发纹丝儿没有晃动。

米塔把两手放到背后。

“不，不！没这等事……”

“我又不是给您！”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把三张分开的钞票硬往她怀里塞。“既然按合法手续办不到……我付工资就是啦！我只请您转达一下我的心意！”

“不不，”护士长吓得心都凉了。“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

小室门呀的一声响，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身穿墨绿和茶褐双色的新睡衣，趿着暖和的毛皮镶边拖鞋走出来。他那几乎光秃秃的头上戴一顶簇新的深红色绣花小圆帽。现在，解去了皮领和围脖，他颈子一侧那个拳头大的肿瘤看起来格外吓人。他的头已经不是居中昂着，而是稍稍偏向一边。

儿子把父亲脱下的衣物全部放进手提箱。妻子把钱藏在包里，紧张地望着丈夫，问道：

“你不会冻坏吧？……刚才你应该带一件厚的晨袍。我一定去拿来。对了，这里有一条小围巾，”她把围巾从他衣兜里抽出来。“把它缠在脖子上，免得着凉！”她裹着玄狐皮领和皮裘，显得有她丈夫三倍那么大。“现在你到病房里去安顿起来。把吃的东西放好，看一看，想一想，还要些什么，我在这里坐等。回头你下楼来告诉我，晚上我都给你送来。”

她并不慌乱，她总是把什么都想得很周到，不愧为丈夫的终身伴侣。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感激而又痛心地看了看她，又看看儿子。

“尤拉，这么说，你是要动身了？”

“傍晚坐火车走，爸爸，”尤拉走过来说。他对待父亲的态度是尊敬的，但是照例毫无激情，目前与独自留在医院里的父亲离别也缺乏激情。一切在尤拉身上引起的反应都是不冷不热的。

“那就走吧，孩子。这可是你头一回出差办正经事。你得一开始就把调子定准。不能优柔寡断！要时刻记住，你不是尤拉·卢萨诺夫，不是以私人身份行事；你是法律的代表，明白不？”

尤拉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反正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此刻找不到更确切的言语。米塔在一旁等得心焦，急着想走。

“我还要跟妈妈一起在这儿等你，”尤拉微微一笑。“你先不忙告别，去了再来，爸爸。”

“您自己能走到不？”米塔问。

“我的天，人家站也站不稳，您难道不能扶他到病床前吗？把袋子带去！”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象个孤儿似地望着自己的家属，拒绝了米塔的搀扶，牢牢地扶住栏杆，开始上楼。他的心扑腾扑腾直跳，而且还没有登高即已开始。他拾级而上，就象被押上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象讲台一样在上

面砍头的高台。

护士长拿着他的一袋食品抢前跑上楼去，向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喊了几句什么话；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没走完第一段楼梯，米塔已经从楼梯的另一边跑下来冲出十三号楼，以此向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表示，这里等待着她的丈夫的是何等无微不至的关怀。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慢慢腾腾地爬上楼梯转弯处的一块平台；这样又宽又深的平台只有在古老的建筑物里才能看到。在楼梯中央的这块平台上，放着两张有病人的床，旁边也有小柜，居然完全不妨碍交通。其中一个病人情况不妙，心力衰竭，正在输氧。

卢萨诺夫竭力不看他大势已去的面孔，掉过头去仰望上面继续登楼。但在第二段楼梯顶上等待着他的也不是令人振奋的景象。那个名叫玛丽亚的护士站在那里，她那黝黑的神像式的脸上既看不到笑意，又无问候的意思。她长得又高又瘦，体态扁平，象个士兵在那里等他；接着立即通过楼上的穿堂向前带路。这里共有好几扇门，凡是不致堵住门的地方，都有病人躺在床上。在没有窗子的转角上，一盏经常开着的台灯照亮了护士的一张小小写字桌，此外另有她的配药桌。旁边墙上安着一口有毛玻璃和红十字的挂橱。他们从桌子旁边经过，再从一张病床前经过，然后玛丽亚伸出一只枯瘦的长胳臂向前一指，说：

“从窗子那边数起第二张床。”

说完就急忙走开——这是普通医院一大通病：从不站

一会，从不聊几句。

病房的门扉经常开得笔直，然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进门时，还是感到一股潮湿、窒闷的味儿，其中掺和着一部分药品的气息，对他那样嗅觉灵敏的人来说是相当难受的。

床位一头靠墙横放，排得很挤，狭窄的通道只有一只小柜的宽度；房间中央的通道也仅能容两个人擦肩而过。

在这条中间通道里站着一个穿淡红色条纹睡衣的矮壮病人。他的整个颈部用纱布包扎得既厚且紧，高到几乎触及耳垂。绷带外面的白色套环不让他自由扭动直撅撅的、棕色头发蓬蓬松松的脑袋。

这位病人正在用沙哑的嗓门讲什么故事，别的病人在床上听着。卢萨诺夫进来时，那人整个身躯——包括僵硬地和它连在一起的头部——转过去，以不带同情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番，说：

"怎么，又来了一位癌兄？"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没有必要回答这句冒失的问话。他感到整个病房现在都看着他，但他不屑反过来打量这些偶然与他同室的人，甚至不屑招呼他们。他只是在空中摆一摆手，示意那位棕色头发的病人让开。后者让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走过去后，又把整个身躯连同不能动弹的脑袋跟着转过去。

"喂，老兄，你生的是什么癌？"他问，声音相当含糊。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已经走到自己床前，听到他这

样问，简直象滑了一交。他举目望着那个无礼的家伙，竭力不让自己发作（但他的肩膀还是牵动了一下），傲慢地说：

“什么也不是。我生的根本不是癌。”

棕色头发的病人鼻子里哼了一声，让全室都听见他发表的一种观点：

“真是个傻瓜！如果不是癌，难道会住到这里来？”

第 二 章

读书不能增添智慧

进入病房的第一天晚上，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几小时内已经感到毛骨竦然。

一个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对谁也没有好处的坚硬肿瘤，象钩子拖鱼似地把他拖到此地，扔在这张狭小、蹩脚、弹簧叽叽嘎嘎、垫子薄得可怜的铁床上。在楼梯底下换好衣服，告别亲人，上楼走进这间病房——以前整个目的明确、有条不紊的生活立刻砰然关上大门，而展现在这里的生活却是那么鄙陋，甚至比肿瘤本身更令人不寒而栗。要看，再也不可能选择悦目赏心的景物，只能看那八个现在似乎跟他平起平坐的可怜虫——八个身穿褪色、破旧、不合身的淡红色睡衣的病人。要听，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能听这些非知识分子的无聊谈话，内容与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毫不相干，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很想喝令他们闭嘴，尤其是那个棕色头发、颈脖上缠着绷带、脑袋被夹住的讨厌家伙——大家都不客气地管他叫叶甫列姆，其实他年纪已不轻了。①

① 按俄国人习惯，这是不够尊敬的表示。对于年岁较大的人，一般应以本名连父名相称，如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意思是：尼古拉之子巴威尔）。——英译者注

但是叶甫列姆怎么也安定不下来。他既不躺在床上，又不离开病房，却老是在房间中央的通道里心神不宁地来回走着。有时他皱紧眉头，象被打了一针似地扭歪着脸，捧住脑袋，然后又继续走。他这样走一阵后，偏偏在卢萨诺夫的床边站住，隔着床架子把整个不能弯曲的上体凑到他面前，撅出一张宽阔、阴郁的麻脸，用开导的口吻说：

"这下可完啦，教授。回不了家啦，懂吗？"

病房里很暖。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睡衣、戴着小圆帽躺在被子上面。他整一整金边眼镜，以擅长的严厉眼神看了看叶甫列姆，答道：

"同志，我不明白您要我怎么样？您为什么要吓唬我？我可没有向您提过问题。"

叶甫列姆只是恶狠狠地从鼻子里嗤了一声，(不知有没有鼻涕溅到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被子上？)说：

"你提也罢，不提也罢，反正回不了家。眼镜可以送回去。还有新睡衣。"

说完这番很不礼貌的话，他挺起直撅撅的身子，重又在通道里走来走去，简直让鬼给迷住了！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当然可以抢白他一顿，但要这样做他缺少平素具有的意志力，而听了这个缠着绷带的混蛋这番话，他更泄气了。目前需要有人支持，可是人家却把他往坑里推。仅仅几个小时，卢萨诺夫似乎失去了自己的全部地位、功绩和对未来的设想，变成七十公斤不知明天会怎样的肉体——热乎乎的白净肉体。

大概忧思在他脸上有所反映，因为叶甫列姆在随后的往返巡行中有一次走到他对面停下，改用谋求和解的口吻说：

“即使能回家，也住不长久。以后还得到这儿来。螯虾对人很有感情。它要是把什么人钳住了，就对他至死不渝。”①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精力反驳，于是叶甫列姆又继续走。房间里有谁能制止他呢？大家都嗒然若丧地躺着，有几个不象俄罗斯人。靠另一面墙，因为有火炉架往外突出，只放四张床。其中隔着通道与卢萨诺夫脚对脚的一张，是叶甫列姆的床，其余三张床上的病人都还很年轻：火炉近旁是个皮肤浅黑、傻里傻气的小伙子；另一个年轻的乌兹别克人走路拄一根拐棍；靠窗一个瘦得象条绦虫的青年，面色蜡黄，蜷缩在自己床上呻吟。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这一排，左边躺着两个少数民族病人；门口是个剪平头的俄罗斯少年，长得相当高大，正坐在那儿看书；靠窗最后一张床上那个好象也是俄罗斯人，但你看见这样一位邻居不会感到高兴，因为他长着一副强盗的嘴脸。他给人这样的印象大概因为有一道疤（从嘴角开始，沿着左颊下缘几乎伸到颈部）；可能由于不加梳理的黑头发朝天直竖或向旁边翘起；也可能是表情粗暴凶横的缘故。那强盗也倾向于吸取文化——他快要把一本书读完了。

天花板下两盏光度很强的电灯已经点亮。窗外天黑了。病人们在等待开晚饭。

① “螯虾”和“癌”在俄文里是同音词。——中译者注

“楼下有一个老头儿，”叶甫列姆还在唠叨，“明天要动手术。还在四二年，他就被切除一只小鳌虾；当时对他讲：‘没关系，放心过好日子吧。’懂吗？”叶甫列姆说的时候似乎劲头十足，可是听声音仿佛他自己躺在手术台上。“十三年过去了，他把这个医院也给忘了，照样喝伏特加，搞女人——这老头儿是个浪荡鬼。可现在他那只鳌虾长得那么大，”叶甫列姆甚至得意地咂咂嘴唇，“恐怕要从手术台直接送太平间。”

“得了，别老是作这些可怕的预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一甩手转过脸去。他简直不相信是自己在说话：他的声音变得那么可怜巴巴，一点也不威严。

大家都不做声。还有，对面一排靠窗那个老是在翻身的瘦弱青年，也令人心烦。他坐又不是，躺又不是，蜷着腿把膝盖抵住胸口，怎么也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姿势；脑袋已经离开枕头搁到床架子上。他低声哼唧不已，从扭歪的面部表情和抽搐的动作可以看出他疼得厉害。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转脸不再看他，把脚伸进拖鞋，开始毫无意义地察看自己床头的小柜，忽而把摆满食品的底柜的小门开了又关，忽而把放着梳洗用品和电剃刀的抽斗拉出推进。

而叶甫列姆还在来回地走，两手合成一团放在胸前，间或体内象有针在扎一般会使他突然打一个寒颤，口中念念有词，仿佛在超度亡魂：

“反正咱们的事儿是糟定了……糟得不能再糟……”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背后响起轻轻的啪哒一声。他小心翼翼地转过头去，因为脖子的每一次扭动都会引起疼痛。他看到原来是那个长着强盗相貌的邻居看完了书，在封面上拍了一下，把书拿在一双非知识分子的粗糙大手中转来转去。深蓝色封面和同色的书脊上斜印着烫金已暗淡无光的作者签名。那是谁的签名，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看不清楚；而向这样一个家伙动问又不愿意。他心中给这位邻居起了一个外号：食骨者——啃骨头不害臊的无赖。倒是挺贴切。

食骨者用一双阴郁的大眼睛瞪着那本书，肆无忌惮地向整个病房大声宣布：

"要不是焦姆卡从橱里挑来了这本书，很难相信它不是故意塞给我们看的。"

"焦姆卡怎么啦？什么书？"近门床上的少年听见提到他的名字，接口问道；他也在看书。

"即使把全城搜遍，恐怕也找不到这样一本书。"食骨者望着叶甫列姆宽而扁的脑勺子（他因为不方便而很久未理的头发粘在绷带上），又看看他紧张的脸。"叶甫列姆！别嘟哝了。把这本书拿去读一下。"

叶甫列姆象头公牛被挡住去路骤然停下，抬起一双模糊的眼睛望着对方。

"还读书干什么？不久大伙都得完蛋，还读书干什么？"

食骨者的疤痕牵动了一下，他说：

"正因为不久都得完蛋，所以我劝你赶紧读。拿去，拿

去。”

他把书向叶甫列姆递过去，可是叶甫列姆没有跨前一步来接，他说：

“太费劲。我不想读。”

“你难道不识字？”食骨者并不十分苦劝。

“我识的字、懂的事情可多哩。在对我有用的方面，我是很在行的。”

食骨者在窗台上摸索了一阵，摸到一枝铅笔，翻开书的末尾一页，选择几篇在旁边做上记号。①

“别害怕，”他喃喃地说，“这里都是些小故事。这几篇你试试看。你这样嘟嘟哝哝把人烦死了。拿去读吧。”

“我叶甫列姆什么也不怕！”他接过书往自己床上一扔。

年轻的乌兹别克人阿赫马章拄着拐棍（其实几乎并不靠它帮忙）从门口走过来。他是全室性格最开朗的人。他宣布说：

“拿起匙子准备战斗！”

炉旁那个皮肤浅黑的小伙子也活跃起来了：

“弟兄们，晚饭送来了！”

穿白罩衫的一个送饭女人把盘子托得高过肩头走进病房。进门后，她把盘子端在面前，依次走到一张张床位旁边。除了靠窗那个疼痛难熬的小伙子外，所有的人都起来搬盆子。病房里每个人都有一只床头小柜，只有少年焦姆卡同骨骼宽阔的哈萨克人合用一只；那个哈萨克人的人中

① 苏联出版的图书通常把目次放在书末。——中译者注

上隆起一个深褐色的痂，没有包扎起来，怪难看的。

这时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根本不想吃东西，甚至自己家里带来的东西也不想吃。撇开这点不谈，单是这餐晚饭的样子——象胶皮一样的麦糁方糕，浇着黄色的果汁——加上不干净的、柄拧坏过两次的灰色铝匙，又一次使他痛切地想起：自己竟落到了这么个地方，他同意进这所医院也许犯了个大错误。

其时，除了呻吟的小伙子，大家都开始进食。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拿起饭盆，而是用指甲敲敲盆子的边缘，看看把它给谁好。有几个人侧着身子，有几个人背对他坐着，而近门那个小伙子正好看见他在犹疑。

“你叫什么名字？”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问。他没有使劲发声，认为对方应该自己听到。

匙子叮当作声，但小伙子明白是在对他说话，所以回答得挺利索：

“普罗什卡……也就是……普罗科菲·谢苗内奇。”

“拿去。”

“那好吧，可以……”普罗什卡走过来把盆子拿走。“谢谢。”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摸了摸颌下那一团硬块，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算是轻病人。全室九个人中只有叶甫列姆一个用绷带包扎起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可能要开刀的地方正好也是那个部位。只有一个人疼得厉害。只有那个和他隔一张床的结实的哈萨克人长着深褐色的痂。

年轻的乌兹别克人虽然拄一根拐棍，但他只是稍微借它一点力。其余的人外表根本看不出任何肿瘤，也没有任何畸形之处，样子跟健康的人差不多。尤其是普罗什卡：他面色红润，象在休养所，而不是在医院里；现在正津津有味地舔着盆子。食骨者虽然脸色灰不溜丢，可是行动灵活自如，说话大大咧咧，吃方糕时狼吞虎咽，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脑中曾闪过一个念头：他会不会是在装病，乘机吃国家的白食？反正在我国病人吃饭不花钱。

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瘀血却在压迫头部，妨碍脖子扭动，每小时都在膨胀。可是这里的医生根本不在乎几个小时：从午饭到晚饭这一段时间内，谁也没来看过卢萨诺夫，任何治疗手段也没有采用。要知道，董佐娃医生正是用紧急治疗把他引诱到此地来的。如此说来，她根本不负责任、死人不管。卢萨诺夫竟相信了她，在这又挤又闷、不干不净的病房里白白浪费黄金般宝贵的时间，其实应当和莫斯科方面通电话，坐飞机到那里去。

想到自己走错了一步，冤枉耽误了治疗——这种意识加上肿瘤造成的悲观情绪，使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心酸难忍，以致听不得任何声音（从匙子碰在盆上的叮当声起），看不得这些铁床、粗布被子、墙壁、电灯和人。他觉得自己中了圈套，在明天早晨以前不可能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

他憋着一肚子怨气躺下来，用家里带来的自备毛巾遮在眼睛上挡住灯光和其他一切景象。为了消愁解闷，他开始想象自己的家和亲人，想象他们这时可能在干什么。尤拉已

经上了火车。这是他第一次作实地视察。好好亮个相是很重要的。但尤拉不够泼辣，有点儿稀里糊涂，但愿他别出洋相。阿薇叶塔在莫斯科度假。稍微松散松散，跑跑戏园子，而主要的是抱着切实的目的观察一下各方面的情形，也许得拉拉关系；本来嘛，大学五年级了，应该正确判断生活中的风向。阿薇叶塔气魄大，目光远，她是个地地道道的记者，极其能干，她当然应该去莫斯科谋发展，这里的天地对她说来太小。她的聪明和才华，家里谁也比不上。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无限高兴的是，女儿远远胜过他自己。她经验虽然不足，可是具有惊人的悟性。拉甫利克有点儿吊儿郎当，读书的成绩不怎么样，可是在体育运动方面简直是个天才。他已经去过里加参加比赛，象大人一样住在那边的旅馆里。他汽车也会开了。目前在支援陆海空军志愿协会举办的短训班学习驾驶技术，以便取得执照。期中考试有两门功课得了两分，现在得抓一下。玛依卡上午上学，这时候在家里，想必在弹钢琴(以前家里没有人会弹琴)。朱尔巴尔斯大概躺在走廊里一块小方毯上。最近一年，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养成了一种癖好：每天早晨带狗上街散步。这对身体也有好处。往后将由拉甫利克带它出去。他喜欢唆使朱尔巴尔斯吓唬行人，然后对人家说：不用怕，我拉着它！

但是，卢萨诺夫夫妇和两个大孩子、两个小孩子这样融洽的模范家庭，他们的一整套有条不紊的生活，还有陈设富丽、无可挑剔的住宅——所有这一切在几天之内就与他遽

然分离，被肿瘤隔在世界的另一边。不管父亲吉凶如何，他们还将生活下去。无论他们现在如何焦急不安，眼泪汪汪，肿瘤还是象一堵墙把他同他们隔开，留在墙这一边的只有他一个人。

想家排遣不了愁闷，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于是努力考虑国家大事，以期达到散心的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将于星期六开幕。好象没有重大的事件可期待的，无非是通过一下预算。在意大利、法国和西德的议会中正进行着反对屈辱的巴黎协定的斗争。台湾海峡在打炮……对了，今天他离家到医院来之前，电台开始广播一篇关于重工业的长篇报告。这儿病房里连一架收音机也没有，走廊里也没有广播喇叭，怎么搞的！那就至少得天天看《真理报》。今天是关于重工业的，昨天是关于增加畜产品生产的决议。是啊！经济生活发展很快，一些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搞巨大的改革势在必行。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已开始设想，在共和国和州的范围内可能具体进行哪些改组。这类改组历来会引起震动，在一个时期内打乱老一套的工作成规；负责干部打电话互通消息，碰头时商量办法。不管改组朝着什么方向进行，有时甚至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从来没有任何人降职，照例总是提升，包括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内。

但是，甚至这些念头也没能使他忘愁和振奋。只要颈脖下面感到一阵刺痛，那个麻木不仁的肿瘤便乘虚而入，把整个世界遮住。结果又是：预算和巴黎协定、重工业和畜

牧业统统都被隔在肿瘤这堵墙的另一边。而这一边只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一个人。

病房里响起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虽然今天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觉得什么都是不愉快的，但这个声音实在太动人了：

“测体温啦！”她仿佛在宣布要发糖果。卢萨诺夫揭去蒙在脸上的毛巾，微微抬起身子，戴上眼镜。多么幸运啊！她不象玛丽亚那样哭丧着脸、黑不溜秋，而是结实茁壮、精神饱满；也不系着三角头巾，而是象女医生那样在金色的头发上戴一顶小帽。

“阿卓夫金！喂，阿卓夫金！”她站在靠窗那个小伙子的床前爽朗地叫他。小伙子躺着的姿势比先前更加奇怪：身体与床成斜交，头朝下，枕头压在肚子底下，下巴抵着床垫，象狗搁脑袋的样子，眼睛望着床栏，结果就跟在兽槛里差不多。他那皮包骨的脸上掠过一阵阵发自体内的痛楚的阴影。一只手垂下来碰到地上。

“来，拿点儿精神出来，”护士用打趣的口吻责备他。“您又不是没有力气。体温表自己拿。”

小伙子象从井里吊一桶水那样从地上举起手来，接过体温表。他虚弱和疼痛得实在厉害，简直无法相信他只有十七岁——决不会更大。

“卓娅！”他呻吟着央求道。“给我一只热水袋。”

“您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卓娅严厉地说。“给了您热水袋，可是您不放在打针的地方，偏要放在肚子底下。”

"这样能减轻一些我的疼痛，"他痛苦地坚持着。

"您这样会使肿瘤扩大，已经跟您讲过了。肿瘤医院按理根本不应该用热水袋，还是特地为您弄来的。"

"那我就不让你们给我打针。"

但卓娅已不听他说。她用一个指头在食骨者的空床上敲了敲，问：

"科斯托格洛托夫哪儿去了？"

（居然有这等事！竟被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一语中的！他的真姓同卢萨诺夫给他起的外号会如此相似！）①

"抽烟去了，"焦姆卡从门口应道。他一直在看书。

"总有一天我叫他抽烟抽出报应来！"卓娅咕哝着。

世上有些姑娘就是讨人喜欢！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欣然看着她扎束得丰满结实的线条和稍稍凸出的眼睛；他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在加以鉴赏，并且感觉到自己的气在平下去。卓娅微笑着递给他一支体温表。她正好站在卢萨诺夫长着肿瘤的那一边，但她丝毫没有显示出大吃一惊或从未见过这种东西的样子，连眉毛也没有抬动一下。

"对我没有规定什么治疗办法吗？"卢萨诺夫问。

"暂时还没有，"她通过微笑表示歉意。

"为什么，医生呢？"

"他们已经下班了。"

对卓娅是不应该生气的，但不给卢萨诺夫治病总是某

---

① "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姓氏包含着俄文"骨头"和"吞噬"两个词根。——中译者注

人的过失！必须行动起来！卢萨诺夫最瞧不起逆来顺受和窝窝囊囊的性格。当卓娅来收体温表的时候，他问道：

"你们这里的外线电话在什么地方？我该怎么走？"

归根到底，毕竟可以马上下决心跟奥斯塔边柯联系上！打电话这个简单的主意使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回到了他习惯的那个世界，使他重新获得勇气。他又感到自己是个斗士。

"三十七度，"卓娅笑盈盈地说着，往挂在他床架上的一张新体温卡上标下第一个示意点。"电话在挂号处。不过您现在走不到那儿去。那得从另一座大门进去。"

"这是什么话，姑娘？"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抬起身子，沉下脸来。"医院里怎么能没有电话？万一现在出了什么事，怎么办？比方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会跑去打电话，"卓娅并不害怕。

"万一在刮暴风雪，下倾盆大雨？"

卓娅已经走到邻床一个乌兹别克老头前面，继续标他的体温曲线。

"白天可以直接走过去，现在那里的门已经关上。"

她旁的都挺好，就是不讲道理。她没听完别人的话，已经转向哈萨克人。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情不自禁地提高嗓门，冲着她的背影喊道：

"那就应该有另一架电话！总不会没有的！"

"有是有的，"卓娅回答说；她已经到了哈萨克人床边。"但是在院长办公室里。"

“那又怎么样?”

“焦姆卡……三十六度八……。办公室锁着。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不喜欢……”

说到这里，她走了。

这话有点道理。当然，你不在的时候别人到你办公室里去确实叫人不愉快。但医院里总得想个办法……

一瞬间闪现的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希望又断了线。抵在颌下的拳头大一个肿瘤重又把他与整个世界隔开。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拿出一面小镜子来照了一下。我的妈呀，它大得可真够瞧的！旁人看着已经很可怕，何况自己！不，这简直不可能！周围谁也不象他那样！是啊，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活到四十五岁，还没见过谁长出这样的丑东西！……

他的心沉到了底……。他已经不去判断那玩意儿是不是又扩大了些，就把小镜子藏起来，拿了些东西吃。

最讨厌的两个人——叶甫列姆和食骨者——不在病房里，出去了。靠窗的阿卓夫金又翻身换了个新的姿势，但是不哼哼了。其余的人都挺安分，可以听到翻动书页的声音，有几个躺下睡了。卢萨诺夫也只得睡觉。好歹捱过一宿，什么也不想，明天早晨把医生教训一顿。

于是他脱去衣服，躺到被窝里，用家里带来的厚毛巾把头蒙起来，试图睡着。

可是有人不知在哪儿说悄悄话，寂静中听得特别清楚，也特别令人恼火——简直象凑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耳

边一个样。他忍不住掀去脸上的毛巾，尽力避免碰疼脖子，抬起身来，发现悄声说话的原来是他的邻居乌兹别克人——那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儿，他的皮肤几乎呈茶褐色，蓄着稀稀拉拉的黑山羊胡须，头戴一顶也是茶褐色的破旧小圆帽。

他两手枕在脑后仰卧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这老傻瓜是不是在做祷告？

“哎！阿克萨卡尔[1]！”卢萨诺夫举起一个指头对他扬了扬。“住口！你妨碍别人，知道不知道？”

阿克萨卡尔不做声了。卢萨诺夫重又躺下，用毛巾盖在头上。但他还是睡不着。现在他明白了，是天花板下两盏电灯刺目的光线妨碍他安睡。那不是磨砂灯泡，灯罩又不遮光。甚至隔着毛巾也能感到灯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从喉咙里咯了一声，脑袋离开枕头再次撑起身子来，同时注意避免引起肿瘤的刺痛。

普罗什卡站在自己床边靠近开关的地方，开始脱衣服。

“年轻人！把灯关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吩咐道。

“这个……药还没发来……”普罗什卡支支吾吾地说，但还是把手伸向电灯开关。

“谁说‘把灯关掉’？”食骨者从卢萨诺夫背后吼叫起来。“将就点儿，这里不是您一个人住。”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摆好坐的架势，戴上眼镜，保护着肿瘤，弄得钢丝床的弹簧叽叽嘎嘎直响。他转过脸去，说：

---

[1] 对中亚细亚突厥语系各民族老头儿的称呼。——中译者注

“您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儿？”

那个无礼的家伙扮了个鬼脸，用低沉的声音回敬：

“不要把话扯到别处去，您可不是我的上司。”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向他威风凛凛地瞪了一眼，但这对食骨者丝毫不起作用。

“好，那末开着灯做什么？”卢萨诺夫开始采取讲究策略的谈判方式。

“掏屁股眼儿，”科斯托格洛托夫故意用粗话顶他。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顿时感到呼吸困难，虽然他对病房里的空气似乎已经习惯了。必须在二十分钟内强制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出院去上班！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具体办法可以施加影响。（不要忘记同医院领导谈一谈这个人的事。）

“如果需要看书或做其他事情，可以到走廊里去，”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公正地指出。“您凭什么自作主张代表所有的人？这里的病人情况各不相同，应当区别对待。”

“会区别对待的，”对方反唇相讥。“您将来要登讣告，某某年入党，等等；可我们死了，脚朝前抬走了事。”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未遇到过、也不记得有这样桀骜不驯、肆无忌惮的人。他甚至不知如何对付。总不见得向那个丫头诉苦去。暂时只得尽可能保持尊严结束谈话。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摘去眼镜，小心翼翼地躺下，用毛巾蒙住脑袋。

他简直给气炸了，后悔自己一时动摇，住进了这所医

院。但是明天就出院还来得及。他的表上才过八点。有什么办法呢，他现在已决定忍受一切。他们迟早总要安静下来的。

可是屋里又开始有人走动，床与床之间又开始受到振荡——那当然是叶甫列姆回来了。房间的旧地板对他的脚步起落有明显的反应，并通过床和枕头把震动的感觉传递给卢萨诺夫。但是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决定不去指责他，决定忍耐。

我们的居民还有多少劣根性有待于铲除呵！背着这样的包袱怎么能把他们带进一个崭新的社会？

晚上的时间无穷尽地延续着。护士开始不断走进走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给这个拿来药水，给另一个拿来药粉，给第三个、第四个打针。阿卓夫金打针时喊叫着，再次央求给他热水袋消肿。叶甫列姆继续来回走着，安定不下来。阿赫马章跟普罗什卡在各自床上隔得老远互相交谈。他们好象这时才真正来劲，好象压根儿没什么心事，也不需要治病。甚至焦姆卡也不睡，他走过来坐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床上；两个人几乎就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耳边喋喋不休。

“趁现在有时间，”焦姆卡说，“我争取多看些书。我想考大学。”

“这很好。不过要注意：读书不能增添智慧。”

（食骨者在用什么道理教育孩子?!）

“怎么不能？”

“就是不能。”

“那末什么能增添智慧呢？”

“生活。”

焦姆卡沉默片时，然后问：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们部队里有个政委，叫巴什金，他老是说：读书不能增添智慧，也不能提升军衔。有的人给加了一颗星，就以为他的智慧也增多了。没有的事。”

“照这样说来，就不必读书了？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必？你尽管去读。不过自己心里要记住：智慧不在其中。”

“那么智慧在哪里呢？”

“智慧在哪里？你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不要相信耳朵。你打算考什么系？”

“还没决定。既想考历史系，又想考文学系。”

“理工科呢？”

“不。”

“奇怪。以前在我们的时代才是那样。现今孩子们都喜欢搞技术。你不喜欢？”

“我……我对社会生活兴趣很浓。”

“社会生活……哦，焦姆卡，学会技术过日子比较安稳。我劝你还是去学装配收音机。”

“我可不求安稳！……要是在这儿住上两个月，我就得赶上九年级下学期的课程。”

“教科书呢？”

“我这儿有两本。立体几何难得很。”

“立体几何?!拿来瞧瞧!”

可以听到少年走过去以后又回来。

“对，对，对……基谢列夫编的立体几何，老本子了……还是那一本。直线和平面相平行……。如果一条直线与平面上的某一条直线平行，那也就与平面本身平行……。咳，这才是一本象样的书，焦姆卡！大家都这样写书就好了！薄薄的好象一点儿也不神气，是吗？可是里边包含着多少内容啊！”

“这本书要教一年半。”

“我当初也是照这个本子学的。那时把它背得烂熟！”

“什么时候？”

“我来告诉你。我也是从九年级下学期开始学的……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和三八年。如今又把这本书捧在手里，可以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过去我最喜欢平面几何。”

“后来呢？”

“什么后来？”

“中学毕业以后？”

“中学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大学，那是一门出色的专业——地球物理学。”

“在哪儿？”

“也在列宁格勒。”

“后来呢？”

“念完了一年级，到三九年九月颁布法令，征召十九周岁的青年服兵役，我就被抓走了。”

“后来呢？”

“后来就在部队服役。”

“后来呢？”

“后来你还不知道？战争爆发了。”

“您当上了军官？”

“不，只是个军士。”

“为什么？”

“因为，要是所有的人都当将军，就没人打赢战争了……。如果平面通过与另一平面平行的直线，并与该平面相交，则交叉线……。我说，焦姆卡！我每天教你立体几何，你看怎么样？保你进步得很快！要不要？”

“要。”

（那还得了？耳边就甭想清净了。）

“我要给你布置作业。”

“你布置吧。”

“否则时间都浪费掉了。咱们说干就干。先来分析这两条公理。记住，这两条公理看起来挺简单，但以后将隐约包含在每一条定理内，你应当看出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一条：如果一条直线的两个点属于一个平面，那末这条直线的每一个点都属于该平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假定这本书是平面，铅笔是直线，懂吗？现在你试着把它们……”

于是就唠叨开了。关于公理和演绎的结果，他们还絮

聒了很久。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决心忍耐，只是示威地背向他们翻了个身。后来，他们总算沉默下来，两人分开了。阿卓夫金服下双倍的安眠药以后，也睡着了，不再哼哼。这时，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转身面对的那个阿克萨卡尔却咳起嗽来。灯也熄了，可是这该死的老头儿不断地咳着，而且咳得那么讨厌，时间又长，还带着咝咝声，简直马上要噎死似的。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背朝他又转过身去。他揭去蒙在头上的毛巾，但真正的黑暗还是没有出现：走廊里有灯光照进来，那里可以听到喧哗声、走动声以及痰盂和水桶的乒乓声。

睡不着。肿瘤压迫着他。好端端的生活，设想周到而且有益身心，如今眼看着即将崩裂。他对自己深表惋惜。只差一点小小的推动力，眼泪就要夺眶而出。

叶甫列姆没有放过机会提供这点推动力。他在黑暗中也不安分，正在向邻床的阿赫马章讲一个荒唐透顶的故事：

"人何必要活一百年？没有必要。当初事情是这样的：真主分派寿命，给所有的动物各派五十年，够了。可是人最后才到，真主只剩下二十五年还没分掉。"

"还剩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是吗？"阿赫马章问。

"对。人表示不乐意：太少！真主说：'够了。'可是人坚持说：'太少！'于是真主说：'那你自己去问，也许有谁觉得太多，愿意让给你。'人便去打听，他遇到了马，对它说：'喂，马啊，我的寿命太少。你让一点给我。''好吧，你就拿二十

五年去。'人继续往前走，只见狗迎面走来。'喂，狗啊，让点儿寿命给我！''拿二十五年去吧。'人又往前走，碰见了猴子，向它也讨了二十五年。他回到真主那儿。真主说：'随你的便，是你自己要这样。最初的二十五年你可以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二十五年你将象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二十五年你将象狗那样汪汪乱叫。还有二十五年，你将象猴子一样被人取笑'……"

第 三 章

小 蜜 蜂

卓娅虽然头脑灵活，动作敏捷，在二楼她所管的病区非常迅速地从桌旁走到床前，又从床前回到桌旁；但她明白，到下班前还是来不及做完所有的工作。于是她赶紧草草收场，把男病房和小间女病房的灯熄掉。另一间女病房大得很，放着三十多张床位，那里的病人反正不会及时平静下来，你给她们熄不熄灯都一样。那里许多人在医院里住腻了，睡不好觉。由于空气不好，老是为了要不要让阳台门开着发生争执。还有几个女病人偏偏喜欢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跟人家说三道四。她们会直到午夜十二点甚至到一点钟老是在那里谈论物价、食品、家具、孩子、丈夫、邻居，连最不知羞耻的话也说得出来。

今天工友奈丽亚还在那里洗地板，她是个大屁股、粗嗓门、浓眉毛、厚嘴唇的姑娘。她已擦洗了很久，可是只顾跟人家搭碴儿，怎么也结束不了。这时，床放在男病房门外穿堂里的西布加托夫却等着要坐浴。由于每晚需要坐浴，加上对自己背部的恶臭感到不好意思，西布加托夫自愿留在穿堂里，虽然他住在这里的资格比谁都老——简直不象个

病人，而是象在长期值勤。卓娅很快地在女病房里走过去，说了奈丽亚两句；可是奈丽亚只知顶嘴，活还是干不快。她年龄并不比卓娅小，觉得要听这样一个丫头指挥太气人。卓娅今天兴高采烈来上班，而工友这种强头倔脑的态度却使她恼火。卓娅认为，任何人都有权松散松散，来上班也不一定非累得精疲力尽不可，但总得讲究个分寸，何况还当着病人的面。

最后，卓娅把药都发了，该做的事都做了；奈丽亚也总算把地板擦好。女病房和楼上穿堂里的灯也熄了。已经过了十一点，奈丽亚这才到楼下去用温水调好一种溶液，盛在西布加托夫常备的盆里拿给他。

“喔，累死我啦！”她大声打了个哈欠。“我要去打一个三百分钟的小盹儿。喂，病人，你反正要坐上整整一个小时，我可等不及。回头你自己把盆儿拿下去倒掉水，啊？”

这栋结构坚固、穿堂宽敞的老房子楼上没有自来水。

沙拉夫·西布加托夫过去是怎么个人，现在已没法猜测，也无从判断。他的苦头吃得太长久，过去的生活简直连影子也没有了。但是，三年来经过疾病不断的折磨，这个年轻的鞑靼人成了全院最温顺、最有礼貌的人。他经常不好意思地微微含笑，似乎为长期给人添麻烦表示歉意。通过第一次四个月、第二次六个月两次住院，他对此地的医生、护士、工友熟悉得象自己家里的人一样，他们也都知道他。可是奈丽亚是新来的，上工才几个星期。

“我拿不动呀，”西布加托夫低声辩解道。“要是能分在

别的家伙里，我可以分几趟去倒掉。”

但是卓娅的桌子就在近旁，她听见后蹦了起来，冲着奈丽亚喝道：

“你怎么不害臊？他的背脊不能弯曲，难道你要他自己把盆儿拿走？”

这话她虽然象是怒冲冲地喊出来的，但声音却近乎耳语，除了他们三个，谁也听不见。而奈丽亚只是随口顶了一句，却能使整个二楼都听见：

“有什么可害臊的？我也累得象条死狗似的。”

“你是在值班。这里给你钱的！”卓娅愤怒地说，声音比刚才更轻。

“嘍！给钱！这点钱有什么稀罕？我到纺织厂去挣的钱还不止这些呢。”

“嘘！你不能小点儿声吗？”

“哎！”臀部宽阔的奈丽亚发出一声半是呻吟的长叹，在整个穿堂里激起回响。“亲爱的枕头妈妈！真想睡觉——啊……昨天跟司机们玩儿了一夜……算了，病人，回头你就把盆儿塞在床底下，明儿早晨我去倒掉。”

她拉长调子又打了个哈欠，也不用手掩口，在哈欠的末尾对卓娅说：

“我到会议室沙发上去躺一会。”

说罢，也不等同意，自顾向一扇角门走去——那里是讨论医务工作和开碰头会的一间屋子，里边有弹簧家具。

她还撂下许多工作没有做完：痰盂没倒，穿堂的地板也

该洗一洗。但卓娅看看她宽阔的背影，忍住了没说什么。她自己工作的年资也不长，但已开始懂得这样一条气人的原则：你不干，倒也奈何你不得；你要是肯干，就得一个顶俩。明天早上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来接班，除了干份内的活，还得由她代替奈丽亚洗刷打扫。

现在，西布加托夫身旁没有人了，他就袒露背后的骶骨，浸到放在床边地上的一只盆里，保持这种别扭的姿势不声不响地坐着。任何动作一不小心就会引起骨头疼痛，但要是触及损伤的部位，更会引起一种灼热的痛楚，即使内衣的经常摩擦也受不了，所以他尽量避免仰卧。他背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从来没看见过，只偶尔用手指摸一下。前年他被人用担架送进医院，自己不能起来，也不能走路。当时好多位医生给他看过，但一直由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负责治疗。四个月以后，疼痛消失，他可以自由走动、弯腰，一点也不觉得困难。出院时他吻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手，她只告诫他说："沙拉夫，要多加小心。不要跳，不要撞！"但他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只得仍然去当发货员。发货员总免不了要从车上跳到地上。起初太平无事，直到有一次从汽车上滚下一只桶来，正好撞在沙拉夫的要害部位。受伤的地方创口发生溃烂，老是不能愈合。从那时起，西布加托夫就象被锁链拴住在癌症楼里了。

卓娅憋着一肚子气坐下来，再一次检查是不是把规定的针药都发了，用漶化的墨水笔在质量低劣的纸上写完几行已经变得模糊的记录。向领导反映情况没有用处。卓娅

也不喜欢来这一套。得自己设法对付，可她就是对付不了奈丽亚。睡一觉又没什么大不了。跟好的工友搭班，卓娅自己也会睡它半夜。可是现在得坐着。她看看自己做的记录，但这时听到有个男人走过来到她身旁立定。卓娅抬头一看。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那里，个子大而无当，漆黑的头发没有梳光，病人服上衣两旁的小口袋几乎插不下他的一双大手。

“早就该睡了，”卓娅用规劝的口气说。“还到处走来走去干什么？”

“晚上好，卓英卡，”科斯托格洛托夫尽量柔和地、甚至拉长了调子说。

“祝您安睡，”她作了一个瞬息即逝的微笑。“我给你们测体温的时候说‘晚上好’才合适。”

“那时您在工作，请别见怪。现在我是来作客的。”

“哦？”她扬起睫毛，睁大眼睛（这在她是很自然的，自己并不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您认为我可以接待客人？”

“因为您值夜班的时候一直在用功，今天我没看见教科书。想必考试完毕了。”

“您的观察力很强。是考完了。”

“得了几分？不过，这并不重要。”

“只得了个四分。为什么您认为并不重要？”

“我想，您也许得了三分，提起来不愉快。现在放假了？”

她带着轻松愉快的表情眨眨眼睛。眨过以后，也就想通了：是啊，她不必烦恼。放两个星期假，多舒服！除了医院，哪儿也不用去！有那么多空暇！值班时还可以看书消

遣，也可以象这样聊聊天。

“这么说，我来作客是对的喽？”

“坐下吧。”

“可是，卓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过去寒假是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的。”

“秋天我们摘棉花去了。每年如此。”①

“您还得学习几年？”

“一年半。”

“您可能分配到什么地方？”

她耸了耸圆鼓鼓的肩膀。

“祖国辽阔广大。”

她的眼睛即使在心平气和的时候也凸出来，仿佛眼皮底下容纳不了，一个劲儿地往外撑。

“会不会把您留在此地？”

“当然不会。”

“您撇下家庭怎么办？”

“我有什么家庭？只有一个奶奶。将来我把奶奶带走。”

“爸爸妈妈呢？”

卓娅叹一口气。

“我妈妈去世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看看她，不再问父亲的情况。

---

① 在中亚细亚摘棉花缺少人手。每年秋天大学生下乡支农，因而学年开始得比科斯托格洛托夫读书的列宁格勒晚，假期也相应推迟。——英译者注

"您是本地人吗?"

"不，老家在斯摩棱斯克。"

"原来如此！来这儿多久了?"

"疏散的时候搬来的，还能在什么时候?"

"当时您才……九岁?"

"嗯。在那里刚念完小学二年级……后来就和奶奶在这里卡住了。"

卓娅伸手到放在靠墙地板上的桔黄色大手提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摘下护士帽，把被帽子夹紧的头发稍稍抖松一点儿，梳出稀朗朗一道略呈弧形的金色短刘海。

金发的微光也反照到科斯托格洛托夫粗犷的脸上。他的心情趋于平和，眼睛欣然注视着她。

"那末，您的奶奶在什么地方?"卓娅照罢镜子，用开玩笑的口气问。

"我的奶奶，"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态度倒是挺认真的，"和我的妈妈（他的相貌同这一声"妈妈"实在协调不起来）……都是在围困中死去的。"

"列宁格勒?"

"嗯。妹妹也被炮弹打死了。她是个护士，跟您一样。比您更孩子气。"

"是啊，"卓娅感慨地说，"围困中遇难的人不知有多少！该死的希特勒！"

科斯托格洛托夫淡然一笑：

"希特勒该死，这一点不需要反复证明。但是列宁格勒

被围困这笔账，我认为不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

“这话怎么讲？为什么？”

“您问这话怎么讲？希特勒是来消灭我们的。难道能指望他把小门打开一点点，向被围的人说：‘你们一个一个出来，别结成一群一群？’他是在打仗，他是敌人。而围困的事应该由别人负责。”

“究竟是谁？”大吃一惊的卓娅轻轻问道。她从来没有听见过类似的话，连想也没想到过。

科斯托格洛托夫两道黑色的眉毛皱拢来，打了个结。

“比方说那个人或那些人，他们应该准备好即使在英国、法国和美国跟希特勒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也要打仗。他们拿了几十年工资，却看不到列宁格勒孤立的地理形势必然影响到它的防御。他们没有估计到未来轰炸的猛烈程度，没有考虑到把粮食仓库隐蔽在地下。正是他们和希特勒一起困死了我的母亲。”

这道理很简单，但好象太新鲜了。

西布加托夫静静地在他们后面角落里坐浴。

“可是，照您这样说来……不是应该审判他们吗？”卓娅悄悄地问。

“我不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把本来就有点撅起的嘴唇一撇。“我不知道。”

卓娅没再戴上帽子。她的罩衫的第一颗扣子没扣，露出里边金灰色连衫裙的领子。

“卓英卡。我找您还有件事情。”

"啊，原来如此！"她的睫毛跳动了一下。"那末请在日班时谈吧。现在去睡觉！您刚才不是说来作客的吗？"

"我也是来作客的。但在您还没有变坏，还没有最终成为医生之前，请向我伸出您的人道之手。"

"医生就不伸手吗？"

"嗯，他们的手不一样……甚至根本不伸手。卓英卡，我一生的特点就是不喜欢给人做试验品。我在这里治病，可是什么也不向我解释。这样我受不了。我看到过您有一本书——《病理解剖学》。可不是吗？"

"是的。"

"那是关于肿瘤的？是吗？"

"是的。"

"那就请您发扬一下人道精神——把那本书带给我！我得把它翻一下，考虑考虑。为自己。"

卓娅把嘴嘟成一个圆圈，摇摇头。

"病人看医学书籍是犯忌的。即使象我们作为学生学到某种病症的时候，也老是觉得……"

"对别人也许是犯忌的，对我决不犯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大手掌在桌上一拍。"我在生活中被吓唬得够了，已经不懂得什么叫害怕。州属医院里一个朝鲜族外科医生去年年底给我作诊断的时候，也不愿对我讲明白。我对他说：'您讲嘛。'他说：'我们规定不讲的。'我说：'您讲嘛，我负责！我家里的事也好安排一下！'于是他冲着我说：'您还能活三个星期，其他我不敢担保。'"

“他怎么能这样!……”

“好样的!那才是真正的人!我跟他握了手。我应该知道!既然在这以前我活活受了半年的罪;最后一个月已经弄得躺不得、坐不得、站不得,怎么都疼;一天一夜只能睡几分钟——那末,我当然已经把一些问题仔细想过了!去年秋天我通过切身体验认识到,人可以在肉体还没有死亡的状态中跨过死亡这条界线。体内尽管还在进行血液循环或食物消化的过程,可是心理上已经作好死亡的一切准备,甚至已经尝到死的滋味。周围的一切仿佛已经是从棺材里看到的,看着也无动于衷。虽然你不把自己算作基督徒,有时甚至相反,可是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原谅了所有亏待过你的人,对迫害过你的人已不记仇。任何事、任何人在你心目中都已无所谓,你什么也不想去纠正,对什么也不觉得遗憾。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十分平衡的状态,十分自然,就跟树木、石头一样。现在我被拉出了这种状态,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高兴。种种欲望都将死灰复燃,包括好的和坏的。”

“别装腔作势了!为什么不值得高兴?您进院的时候……那是几天以前?………”

“十二天。”

“当时您在这儿穿堂里的沙发上,身体扭过来、转过去,瞧着叫人害怕;脸色跟死人一个样,什么也不吃,体温三十八度,早晨晚上都不退。可现在——您居然来作客了……。一个人在十二天内起死回生——这是奇迹!我们这里难得

有这种事。”

的确，当时他由于长期的紧张，脸上有许多又深又密的灰色皱纹，象是用凿子斫出的。现在皱纹已少得多，也不那么灰溜溜了。

“我运气好，关键在于我能够很好地适应爱克斯光。”

“这是很难得的！真是走运！”卓娅热心地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淡淡地一笑：

“我一生走运的事实在太少了，所以这次照爱克斯光走运也是应该的。我现在又开始做梦了，都是些迷离恍惚的好梦。我想这是恢复健康的征兆。”

“完全可能。”

“因此我更需要明白，更需要弄弄清楚！我要弄明白疗法的实质，前景如何，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恶化。我已经感到好多了，也许应当停止治疗。这需要弄弄明白。可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好，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也好，都什么也不跟我解释，光是把我当作一只猴子那样治病。把那本书带给我吧，卓娅，我请求您！我不会出卖您的。我不让任何人看到那本书，您放心！”

他说得那样恳切，表情也变得生动活泼了。

卓娅踌躇了一下，伸手去拉桌子的抽屉。

“书在这儿？”科斯托格洛托夫猜到了。“卓英卡，给我！”说着，他已把手伸了过去。“您下一次什么时候值班？”

“星期日白天。”

“我到时候还给您！行了！一言为定！”

这个梳着金色刘海、一双小眼睛凸出的姑娘真好，平易近人。

只是他没看到自己的头发在枕头上压得蓬蓬松松，横七竖八地朝着所有的方向翘起，从领子没有扣好的上衣里边露出病人的白市布衬衫的一只角——医院里通常是比较随便的。

“对，对，”他翻开书看看目次。“很好。我可以从里头找到需要的一切。谢谢您。要不然，鬼知道会不会把我治疗得过了头。他们反正只管完成指标。我说不定还要想办法逃出去。好药良医也会缩短你的寿命。”

“瞧您这个人！”卓娅两手一拍。“书刚给您，就说出这种话来！还给我！”

她用一只手去拉那本书，后来用两只手拉。但他并不费力地把书控制在自己手里。

“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这样会撕破的。还给我！”

她的一对圆鼓鼓的肩膀和一双圆鼓鼓的小手臂给罩衫绷得紧紧的。颈脖不瘦不肥、不短不长，非常匀称。

两个人在你拉我扯的同时互相挨近，科斯托格洛托夫直盯着她瞧。他那五官并不端正的脸绽开了笑容。那一道疤也不怎么可怕了。这道疤的颜色已经日久变淡。科斯托格洛托夫用另一只手温和地把她的手从书上扳开，一边悄声劝说：

“卓英卡。我相信您是反对愚昧无知，主张受教育的。怎么能妨碍人家提高知识水平呢？我不过是说说笑话，我

逃不了。”

她用坚决的语调低声回答：

“您也太自暴自弃了——单凭这一点，您就不配读这书。为什么您不早点儿来？为什么要弄到象个死人一样才来？”

“咳！”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一口气，声音提高了些。“没有交通工具啊。”

“那是在什么地方，会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坐飞机嘛！为什么偏要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什么不早一点转到比较文明的地方去？你们那儿总有个把医生或医士吧？”

她松开手不再同他争书。

“医生倒有，是妇科医生。有两个呢……”

“两个妇科医生?!”卓娅很觉惊讶。“难道你们那儿全是女人不成？”

“相反，女人不够。妇科医生有两个，其他的医生一个也没有。化验室也没有。验血也不能验。我的血球沉降率竟达六十毫米，可是谁也不知道。”

“太可怕了！可是您现在又动摇了：治还是不治？您如果不怜惜自己，至少也该怜惜您的亲人、孩子！”

“孩子？”科斯托格洛托夫仿佛醒了过来，仿佛这场争书的游戏只是一场梦，而现在他又回到面目粗犷、说话慢慢腾腾的状态。“我没有孩子。”

“妻子呢，不是人吗？”

他的语调益发缓慢。

“妻子也没有。”

“男人们老是说没有妻子。那您有什么家里的事需要安排呢？您对那个朝鲜族医生是怎么说的？”

“我对他撒了个谎。”

“现在也许是在对我撒谎喽？”

“不，真的，不撒谎。”科斯托格洛托夫脸上的表情愈来愈严肃。“我这个人很讲究区别对待。”

“我估计，您的性格她受不了，是吗？”卓娅同情地点点头表示理解。

科斯托格洛托夫极其缓慢地摇摇头。

“我从来没有过妻子。”

卓娅困惑地估量着：他究竟多大年纪？她翕动了一下嘴唇，但忍住了没问。嘴唇又翕动了一下，可是又忍住了。

卓娅背朝西布加托夫坐着，而科斯托格洛托夫面朝着他，所以看得见西布加托夫万分小心地从坐浴的盆里蹲起来，两手按在腰部待干。看他的神情大概吃了太多的苦头：对于极度的悲哀他已经麻木，而高兴的理由一条也没有。

科斯托格洛托夫吸一口气，又呼出一口气，仿佛把呼吸当作一项工作。

“哦，真想抽烟！这儿绝对不行吗？”

“绝对不行。再说，抽烟对您就意味着死亡。”

“无论如何不行？”

“无论如何不行。特别在我值班的时候。”

但她又露出笑容。

“只抽一支，怎么样？”

“病人都睡了，怎么可以？”

他还是掏出一支手工做的、两截拆装式的长烟嘴，衔在口中空吸。

“您知道，俗话说：年轻时结婚太早，老了又太晚。”他把两只胳膊肘支在她桌子上，手拿着烟嘴插进头发。“战后我几几乎结了婚，虽然我在上大学，她也在上大学。我们本来还是会结婚的，可事情全给打乱了。”

卓娅端详着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太和善，但坚毅刚强的脸。肩胛骨隆起，手臂……但这是疾病造成的。

“合不拢？”

“她……这该怎么说呢？……她给毁了。”他闭上一只眼睛扮了个鬼脸，单用另一只看着她。“她给毁了，不过还活着。去年我还跟她通过几封信。”

他睁开眼睛，看见手里夹着烟嘴，便把它放回到一只小口袋里去。

“看到这几封信上的一些话，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初她是不是真的象我心目中那样十全十美？也许不是这样？……当时我们才二十五岁，懂得什么？……”他睁大了一双深褐色的眼睛直盯着卓娅。“就拿您来说吧。您现在对男人懂得什么？屁也不懂！”

卓娅笑了起来，说：

“也可能我恰恰懂得不少。”

“这绝对不可能，”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容反驳地说。“您

以为懂得的事情，其实并不懂得。要是就此嫁人——一定后悔。”

“您真会煞风景！”卓娅晃了晃脑袋，接着从那只桔黄色的大提包里取出一件绣花活儿，把它打开：那是绷在绷子上的一小块料，上面已经绣好一只绿色的鹤，狐狸和深壶还只描着轮廓。①

科斯托格洛托夫象看什么奇迹似地问：

“您在绣花?!”

“您为什么这样惊奇？”

“我没想到，现今连医学院的女学生也做女红。”

“您没看见过姑娘们绣花？”

“也许除了很小的时候，在二十年代。那也要算是资产阶级思想。冲着这一点，就得在共青团会上把你狠狠地整一整。”

“现在这是很时兴的事情。您没看到吗？”

他摇摇头。

“您不赞成？”

“哪儿的话，我干嘛不赞成？这活儿挺可爱，瞧着舒服。我很欣赏。”

她刺了一针又一针，让他欣赏。她看着活儿，他看着她。在黄色的灯光下，她的睫毛微微泛出一层金色。她的

---

① 这幅图案取材于法国作家拉封丹(1621-95)写的一则寓言《仙鹤和狐狸》：仙鹤为了教训狐狸，把食品放在小口深壶里，叫它吃不到。——中译者注

连衫裙露出的一角也微泛着金色。

“您是一只垂着刘海的小蜜蜂，”他悄悄地说。

“什么？”她耸起前额把眉毛一掀，头并不抬起来。

他重复了一遍。

“是吗？”本来卓娅好象预料可以听到更热烈的恭维。“在您住的地方，要是没有人刺绣，也许容易买到穆里内①？”

“什么？”

“穆一里一内。就是这种丝线——绿的、蓝的、红的、黄的。我们这里很难买到。”

“穆里内。我记住了去问问。要是有卖，一定寄来。要是我们那儿穆里内敞开供应，您干脆搬到我们那儿去，不是更方便吗？”

“你们那儿究竟是什么地方？”

“可以说是生荒地。”

“这么说，您是在生荒地？您是开荒的？”

“我到那儿去的时候，谁也不认为是生荒地。现在弄清楚了——是生荒地，有开荒的人到我们那儿去。等您毕业分配的时候，您可以要求上我们那儿去！一定不会不同意。要求上我们那儿——一定批准。”

“你们那儿就坏成这样？”

“一点也不。只不过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概念被颠倒了。住在五层楼的笼子里，别人在你上头敲钉、走

① 法文moulinet(丝线)的译音。——中译者注

路，四面八方都是广播喇叭——这被认为运气好。而住在草原边上的土房子里，跟勤劳的庄稼人在一起——就被认为倒霉透顶。"

他一点儿也不是开玩笑的样子，而是用一种疲惫的语调说着，但是坚信不疑，甚至不愿提高声音来加强说服力。

"那是荒原还是沙漠？"

"荒原。没有沙丘。不过还是有这样那样的草。那儿长着一种名叫冉塔赫的草，又叫骆驼刺，您可知道？这是一种带刺的植物，但是七月里会开出粉红色的花，香味还挺幽雅。哈萨克人有上百种药都是用它做的。"

"那是在哈萨克斯坦？"

"嗯。"

"叫什么地名？"

"乌什-铁列克。"

"那是个敖尔①？"

"叫它敖尔也可以，叫它区中心也可以。那里有一所医院。可是医生缺乏。到我们那里去吧。"

他眯缝着眼睛。

"旁的什么也长不出来？"

"不，谁说长不出来？那里有灌溉农业。种甜菜、玉米。自留地上种什么都行。只要肯花力气。市集上总是有希腊

① 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村镇。——中译者注

人卖牛奶，库尔德人卖羊肉，日耳曼人卖猪肉。①赶集的时候可好看哩，您应当去看看！人们都穿着民族服装，骑着骆驼去赶集。”

“您是农艺师？”

“不。土地测量员。”

“您究竟为什么要住到那里去？”

科斯托格洛托夫挠挠鼻子，说：

“我很喜欢那里的气候。”

“而且没有交通工具？”

“为什么没有？有汽车，要多少有多少。”

“那末，我上那儿究竟干什么去？”

她把眼睛瞟向科斯托格洛托夫。他们闲扯了这么些工夫，他的相貌显得和善了些。

“您？”只见他前额的皮肤往上一抬，好象准备祝酒似的。“卓英卡，您又怎么知道：您在地球的哪一个点上将得到幸福，而在哪一个点上会变得不幸？在这个问题上，谁能说自己心中有数？”

① 希腊人、库尔德人和日耳曼人都属于战后立即被放逐到哈萨克荒原去的苏联少数民族。——英译者注

第 四 章

病 人 的 焦 虑

手术病人，即应予手术切除肿瘤的病人，由于楼下病房里床位不够，也有一部分住在楼上，同放射科病人，即规定用深度爱克斯光等放射线疗法或化学疗法的病人混在一起。因此，楼上的病房每天上午要巡诊两次：一次是放射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另一次是外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

但二月四日，星期五，是动手术的日子，外科医生不到病房巡诊。而治疗放射科病人的医生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甘加尔特，开完碰头会以后，也没有即刻开始巡诊，只是走到男病房门口张望了一下。

甘加尔特医生个儿不高，但很苗条——之所以给人十分苗条的感觉，是因为腰身特别纤细。她在脑后盘成一个老式髻子的头发，略淡于黑色，比褐色又深一点；也就是有人建议我们用一个洋名词儿称之为“沙坦”① 的那一种颜色，其实可以称做黑褐色——介于黑色与褐色之间。

阿赫马章看见了她，高兴地向她点头招呼。科斯托格洛托夫正在读一本大书，这时也抬起头来，远远地向她行

① 法文châtain（栗色）的译音。——中译者注

礼。她向他们俩一一微笑致意，并举起一个指头，象告诫小孩子似地，要他们在她离开后乖乖地坐着。接着，她从门洞那儿一闪身，走了。

今天她应当和放射科主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董佐娃一起，而不是一个人到各病房巡诊。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被院长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叫去后还没有回来。

只有逢到自己巡诊的日子，董佐娃才舍得放下爱克斯光诊断工作。平日，上午一开始最宝贵的两个钟头，也是眼力最好、头脑最清楚的时候，她总是和当值的住院医师一起坐在荧光屏前。她认为这是自己的工作中最复杂的一部分；积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她懂得代价高昂的错误正是出在诊断上。放射科内她手下有三个医生，都是女的，年纪还轻。为了使她们每一个人的经验不致偏废，不让其中任何一人缺乏临床实践，董佐娃要她们轮番在门诊部、爱克斯光诊断室各待三个月，并在住院部当三个月负责医师，如此周而复始。

甘加尔特医生现在正处在这第三个阶段。这里最主要、最危险而又研究得最不够的是掌握恰当的照射剂量。没有一条公式可据以计算出哪一种照射的强度和剂量对某一种具体的肿瘤有最大的杀伤力，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害处最小。公式是没有的，只能凭某些经验、某种直觉并参酌病人情况行事。这也是一项手术，不过是在黑暗中用光做的，时间拖得比较长。不伤害、不破坏正常的细胞是不可能的。

负责医师的其他职责只要求按部就班即可：按时指定化验，检查化验结果，记好三十份病史。任何医生都不喜欢填写表格，但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愿意忍受，因为这三个月她有自己的病人。那不是屏幕上淡淡的明暗组合，而是活生生的人，她自己的经常性病人。他们信任她，等待着她给人打气的话语和给人希望的目光。当她必须移交负责医师职责的时候，她总是舍不得离开她还没有治好的那些病人。

值班护士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是个上了年纪、头发斑白、体态端庄的女人，看起来比某些医生还神气。她通知各病房，叫放射科病人不要走开。但是女病房大间里仿佛就是在等这个通知——穿着同样的灰色晨袍的女人们立即一个又一个到楼下去：有的去看看卖酸奶油的老大爷来了没有，卖牛奶的老大娘来了没有；有的从医院台阶上向手术室的窗子里边张望（窗子下半部涂了白漆，但透过上半部可以看见外科医生和护士的帽子以及高悬着的很亮的灯）；有的在水槽旁洗洗衣服；有的去探望一下熟人；不一而足。

不光是她们要挨手术刀的命运，还有这些灰溜溜的、绒都磨光了的晨袍（即使在十分干净的时候看起来也是乌糟糟的），使这些女人同女人的本份和女人的魅力绝了缘。这些晨袍完全谈不上款式，每一件都宽大到尽可以把任何胖女人裹起来，衣袖只是直溜溜的大筒子。还是男病人淡红色的条纹上衣象样得多。女病人不发连衫裙，只发这种没

有钮襻和扣子的晨袍。大家一律束着绒布腰带，免得露出睡衣，还一律用手攥住胸前的衣襟。受到疾病折磨的女人，穿着这样寒碜的晨袍，任何人瞧着都不舒服；她们自己也明白。

而男病房里除卢萨诺夫以外，大家都安静地等候医生来巡诊，很少走动。

那个乌兹别克老头儿、集体农庄的看门人穆尔萨里莫夫，跟往常一样挺直身子仰卧在铺好的被褥上面，戴着他那顶破旧不堪的小圆帽。这时咳嗽不在折腾他，他大概已经很高兴了。他把两只手叠起来搁在喘吁吁的胸口上，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他的古铜色皮肤包着的几乎是骷髅：看得出鼻骨、颧骨以及山羊胡子后面尖尖的下巴骨。他的耳朵薄得只剩两片扁平的软骨。他只消再干缩和变黑一点，就是一具木乃伊了。

他旁边的中年哈萨克牧民叶根贝尔吉耶夫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盘腿坐着，象坐在家里地毡上那样。一双有力的大手扳住大而圆的膝盖。他那结实的身体大有岿然不动之态，即便在静坐时偶尔略有些摇晃，也只是象工厂的烟囱或水塔那样微震而已。淡红色的上衣紧绷在他的肩背上，肌肉发达的臂腕几乎要把袖口撑破。他进院时嘴唇上有一处不大的溃疡，在这里的射线管下变成一个暗红色的大痂，封住了他的口，吃喝都受到阻碍。但他不发脾气，既不奔跑，也不吵闹，总是慢慢地把盘子里的饭食吃光，可以一连几个钟头安静地这样打坐，眼睛不看任何地方。

再过去，近门的一张床上，十六岁的焦姆卡伸直一条有病的腿，不断用手掌轻轻地抚摸、按摩小腿上如同有什么东西在咬的地方。他象一只小猫似地曲着另一条腿在看书，旁的什么都不在意：除了睡觉和接受治疗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在看书。化验室里有一口书橱，焦姆卡得到女化验师的特许，可以自己进去换书，不必等整个病房都轮遍了才换。现在他看的是一本蓝幽幽封面的杂志①。杂志已被翻得很旧，封面给晒褪了色，不是新出版的——化验师的橱里没有新出版的。

而普罗什卡把自己的床铺得十分熨贴，没有一道皱痕，没有一个小坑；他把腿垂到地上，规规矩矩地耐心坐着，象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他也确实完全健康——在病房里什么也不抱怨，外表看不出任何疾患，健康的面色黑里透红，额发梳得光滑齐整。小伙子模样儿俊得很，尽可以去参加舞会。

他旁边的阿赫马章，因为找不到对手，就把棋盘斜放在被上，自己跟自己下跳棋。

叶甫列姆缠着甲壳似的绷带，脑袋不能转动；他不在通道上走来走去惹人心烦，而是用两只枕头把背后垫得高高地全神贯注在昨天科斯托格洛托夫硬塞给他的那本书上。不过，他简直不大翻书页，别人也许以为他捧着书在打瞌睡。

---

① 指著名的"自由派"月刊《新世界》，本书作者的作品通常在该刊发表。作者故意不点出杂志的名称，但一般有文化的俄国人无疑都知道是指该刊。——英译者注

阿卓夫金还同昨天一样活受罪。他也许压根儿没合眼。窗台上和小柜上散扔着他的东西，被褥零乱不堪。他的额上和两鬓沁出了汗珠，蜡黄的脸上不时反映出体内的阵阵疼痛。他两手捧住腹部，身体弯成两截。他在室内已有好多天不答话，也不说自己的任何事情。他只有在央求护士和医生多给点药时才开口。如果有家属来看他，他就要他们另外去买在这里看到的那种药。

窗外是阴沉沉的天，说不上有什么色彩，也没有风。科斯托格洛托夫早晨照过爱克斯光回来，也不征求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同意，便打开自己上方的一扇气窗。一股灰濛濛的、尽管并不寒冷的气流从外面吹进来。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生怕肿瘤受凉，就把脖子裹起来，坐到墙边。都是些麻木不仁、听天由命的木头！除了阿卓夫金，这里看来谁也没有真正的病痛，也不配恢复健康。好象是高尔基说过，只有每天为自由而战斗的人，才配享有自由。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上午已经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挂号处一开门，他就给家里打电话，把夜里的决定告诉妻子：通过一切渠道设法转到莫斯科去，不能在这里冒风险坑害自己。卡芭走门路的本领很大，想必她已经行动起来。当然，给一个肿瘤吓得住到这里来是一种懦怯的表现。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从昨天下午三点到现在，甚至没有一个人来摸一摸，看看他的肿瘤是否在扩大。也没有人给药。“白衣杀人犯！”——这话说得太贴切了！① 给你挂一张体温卡，这只能骗骗傻瓜。连工友也不来给他铺床——得自

己动手！不行，我们的医疗机构的水平还有待于大大提高！

医生总算露了面，但还是没有走进病房，却在门外西布加托夫床边站了很久。西布加托夫撩起衣服露出背脊让医生瞧。（其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书藏到褥垫底下。）

后来她们走进病房——董佐娃医生、甘加尔特医生和一位体态端庄、头发斑白的护士，她手执记事本，臂肘上搭着一条毛巾。几件白大衣一齐进来，照例会掀起一阵紧张、惊恐和希望的浪潮。来者的大衣和帽子愈洁白，表情愈严肃，病人的那三种感受就愈强烈。其中神情最严肃、最庄重的是护士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对她说来，病房巡诊等于教堂助祭祈神。她是这样一个护士：在她心目中，医生高于普通人；她认为医生什么都懂，从来不犯错误，嘱咐无不恰当。任何医嘱她都怀着近乎幸福的感觉记在记事本里；现在的年轻护士已不象她那样了。

然而，甚至进了病房，医生也不急于走到卢萨诺夫床前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个浓眉大眼的高个儿女人，头发已呈灰色，但修剪齐整，微微卷曲——不太响亮地对大家说了声“你们好”，就在第一张床前焦姆卡身边站住，凝神注视着他。

“你在看什么书，焦姆卡？”

（难道就找不到更适当的话了吗？在工作时间！）

---

① 这是对 1953 年“医生阴谋事件”中的被告的标准提法。这次事件是斯大林搞的最后一次大清洗。——英译者注（中译者按：当时一批苏联医生——其中不少是犹太人——被指控阴谋杀害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该案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即被推翻。）

按照许多人的习惯，焦姆卡没有说在看什么，而是把褪成浅蓝色的杂志封面翻过来给她瞧。董佐娃眯缝起眼睛瞥了一下。

“哦，是本旧杂志，还是前年的。看它干什么？”

“这里有一篇文章挺有意思，”焦姆卡煞有介事地说。

“讲什么？”

“讲真诚！”他更加一本正经地回答。“讲到文学缺乏真诚……”

他把一条坏腿放到地上，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立刻阻止他：

“不用！把裤腿卷起来就可以了。”

他卷起一条裤腿，医生在他床沿上坐下，离得远远地用几个指头小心触摸那条腿。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扶住床架站在她后面，隔着她的肩膀轻轻地说：

“照了十五次，三千拉德①。”

“这里疼不疼？”

“疼。”

“这里呢？”

“再往下也疼。”

“那你为什么不说？逞英雄？告诉我，从哪儿疼起？”

她慢慢地触碰患处的边缘。

“不碰它疼不疼？夜里？”

① 拉德——辐射剂量单位。——中译者注

焦姆卡光光的脸上没有一根胡子。但是经常的紧张表情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

“白天黑夜都在咬。”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与甘加尔特交换了一个眼色。

“那末，你觉得这个时期以来咬得更凶了，还是轻了些？”

“不知道。也许稍微减轻了些。也可能只是错觉。”

“血液情况，”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要化验的数据，甘加尔特把病史递给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翻阅后，又看看少年。

“胃口怎么样？”

“我有生以来胃口一直很好，”焦姆卡庄重地答道。

“我们已给他增加了营养，”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用保姆的口吻拖长声调亲切地插进来说，并向焦姆卡笑了笑。他也向她笑笑。“要不要输血？”甘加尔特随即很快地低声问董佐娃，一边接过病史。

“要。焦姆卡，你看怎么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又凝神注视着他。“继续照爱克斯光，好吗？”

“当然继续下去！”少年笑逐颜开。

他用感激的目光望着她。

他的理解是这样可以代替手术。他觉得董佐娃也是这样理解的。（其实，董佐娃的理解是：在手术切除骨瘤之前，必须用爱克斯光控制它的活动，防止转移。）

叶根贝尔吉耶夫早已作好准备，集中注意，等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刚从邻床上站起来，他立刻在通道上挺胸立正，象个士兵站在她面前。

董佐娃向他微微一笑，凑到他嘴唇前察看那个大痂。甘加尔特把一些数据低声念给她听。

"嗯！很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鼓励他几句；声音比必要的还大，跟不同语言的人说话往往如此。"一切都很顺利，叶根贝尔吉耶夫！你不久就可以回去！"

阿赫马章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立刻把她的话译成乌兹别克语。（他和叶根贝尔吉耶夫说话互相听得懂，尽管两人都觉得对方把他们的语言歪曲了。）①

叶根贝尔吉耶夫满怀希望和信任、甚至是钦佩地定睛看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是普通老百姓对真正有学问和真正有用的人所表示的钦佩。但他还是在自己的痂旁边摸了摸，问道：

"是不是在扩大？胀得更高？"阿赫马章代他翻译。

"将来都会脱落的！这是正常的！"董佐娃对他说得特别响。"都会脱落的！在家里休息三个月，再到此地来！"

她转向穆尔萨里莫夫老汉。他已经垂下两条腿坐着，并试图站起来迎接她，但医生把他按住，在一旁坐下。这个古铜色皮肤的干瘪老头望着她，对于她的无所不能同样信心十足。董佐娃通过阿赫马章问他咳嗽怎样了，接着叫他

① 阿赫马章是乌兹别克人，叶根贝尔吉耶夫是哈萨克人。他们讲的是突厥语的不同方言。——英译者注

把衬衫卷起来，在他胸前作痛的部位按了几下，用一只手在另一只手上敲敲，同时听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报告照光的次数、验血的结果和使用的针剂，并且自己接过病史默默地看着。从前，这个健全的躯体里一切都是有用的，而且各得其所；可是现在，一切都是多余的，并且一个劲儿地往外撑。都是些结节、棱角……

董佐娃又给他开了些针剂，并要他把吞服的药片从小柜里拿出来看看。

穆尔萨里莫夫拿出一只多种维生素的空瓶子。

“什么时候买的？”董佐娃问。

阿赫马章翻译了他的回答：

“前天。”

“药片呢？”

“吃掉了。”

“怎么吃掉了？？”董佐娃大为惊讶。“一下子全吃光了？”

“不，是分两次吃的，”阿赫马章把他的话译成俄语。

医生、护士、俄罗斯族的病人和阿赫马章一齐放声大笑。穆尔萨里莫夫自己微张着嘴，还莫名其妙。

只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被他们这种无聊透顶、不合时宜、迹近犯罪的笑声气得义愤填膺。他决定马上叫他们清醒清醒！他在考虑以什么姿态迎接医生最合适；结果选定曲腿斜倚这种姿势，想必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

“没关系，没关系！”董佐娃安慰着穆尔萨里莫夫。她又给他开了些维生素C，在护士恭恭敬敬递过来的毛巾上擦

了擦手，带着不安的表情转向下一张床位。现在面朝窗户，离窗又近，她本人的脸色显得灰不溜丢地不大健康，不光是倦容毕露，简直是病容毕露。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秃头上戴着小圆帽和眼镜，绷着脸坐在床上，样子有点儿象个教师，还不是普通的教员，而是桃李满天下的功勋教育家。他等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到他床脚边，便把眼镜在鼻梁上架一架好，正色道：

"董佐娃同志。我不得不把这所医院的状况向卫生部反映。我还要打电话给奥斯塔边柯同志。"

她没有发抖，没有惊慌失色，也许脸色更暗淡了些。她的两个肩头同时做了一个奇特的动作——各画了一个圆圈，仿佛肩膀因为拉纤累坏了，又没法从纤绳中解脱出来。

"如果您在卫生部有熟人，"她当即表示同意，"甚至有办法给奥斯塔边柯同志通电话，我可以给您补充一些材料，要不要？"

"还需要补充什么？象你们此地这样对人漠不关心，简直令人发指！我到了这里十八个小时！可是谁也不对我进行治疗！老实说，我做的可不是普通工作，不该这样躺着！"

房间内所有的人都不作声，看着他。如果有谁受到了打击，那不是董佐娃，而是甘加尔特——她紧闭嘴唇，皱眉蹙额，好象看到了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情而又无法加以制止。

而董佐娃居高临下站在坐着的卢萨诺夫面前，甚至不让自己面露愠色，只是再次以画圆圈的方式耸耸肩膀，抱着

息事宁人的态度低声说：

"现在我就是来对您进行治疗的。"

"不，现在已经晚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断然说。"我看够了这里的混乱现象，我要离开此地。任何人对我都不闻不问，任何人都不给我作出诊断！"

他的声音发了颤，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事情实在太气人了。

"诊断已经给您作出，"董佐娃双手扶住他的床架，用平稳的语调说。"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种病在我们共和国内别处不会给您治的。"

"您不是说过——我得的不是癌吗?！那末请您把诊断意见告诉我！"

"一般说来，我们没有义务向病人说出他们的病症。但如果您觉得这样放心些，那好吧：您患的是淋巴肉芽肿病。"

"这么说，不是癌?！"

"当然不是。"她的脸色和声音甚至没有流露出恼火的痕迹——按说争吵引起恼火也是很自然的。她又不是没看到他颌下那个拳头大的肿瘤。该向谁发脾气呢？向肿瘤吗？"没有任何人强迫您住到我们医院里来。您要马上出院也可以。但要记住……"她犹豫了一下，相当温和地向他提出警告："不是只有癌能置人于死地。"

"怎么？您想恫吓我?！"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叫了起来。"您为什么要吓我？这不是治病救人的办法！"他更加声势汹汹，但是一听到"死"这个字，心中顿时冰凉。接着，

他改用比较缓和的语调问:“您是不是认为，我的病就那么危险?”

“如果您不断地换医院，这样下去当然危险。把围巾解开。请站起来。”

他解去小围巾，站在地上。董佐娃开始小心地触摸他的肿瘤，再摸摸脖子的另一侧进行比较。她要他把头尽可能后仰(它不能仰得很后，一下子就被肿瘤牵制住了)，然后尽可能前倾，再左右转动。

嗄！原来他的头几乎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活动，已经失去我们不知不觉中拥有的那种惊人的灵活性。

“请把上衣脱下来。”

他那墨绿和茶褐双色的睡衣衫子是用大钮扣扣起来的，腰身也不窄，似乎不难脱卸。但是手臂的伸缩影响到脖子，所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断地哼哼。哦，事情竟糟到这个地步！体态端庄的花头发护士帮他从袖子里解脱了出来。

“您觉得胳肢窝里疼不疼?”董佐娃问。“是不是感到有些不大方便?”

“怎么?那里也会出毛病?”卢萨诺夫的嗓门完全变哑了，现在比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声音更轻。

“手臂向两旁举起来!”她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地在他腋下扪诊。

“用什么方式治疗?”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我对您说过了:打针。”

“往哪儿打？直接打在肿瘤上？”

“不，静脉注射。”

“要打多少次？”

“一星期三次。把衣服穿起来。”

“手术治疗不可能吗？”

（他问的是“不可能吗？”，其实恰恰最怕躺到手术台上去。跟一切病人一样，他宁可接受任何其他费时的疗法。）

“手术治疗将是毫无意义的！”她在护士递给她的毛巾上擦了擦手。

毫无意义就好！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寻思。还是得跟卡芭商量一下。到处奔走也不是件容易事。他实际拥有的影响并不象他希望拥有的那么大，尽管刚才曾摆出那副架势。给奥斯塔边柯同志挂电话也决不是那么简单。

“好吧，我考虑一下。那末，明天决定，好不好？”

“不，”董佐娃毫不通融地说。“必须今天决定。明天我们不能打针，明天是星期六。”

又是制度！规章制度可以订，难道就不可以打破吗！

“为什么星期六又不行了呢？”

“因为对您的反应必须进行周密的观察，包括注射的当天和下一天。而星期日这是做不到的。”

“这样说来，那针剂的反应很厉害喽？”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没有回答。她已经转向科斯托格洛托夫。

“那末，等到星期一行不行？……”

“卢萨诺夫同志！您指责说：十八个小时没有对您进行治疗。那末耽搁七十二个小时您怎么反倒愿意呢？”（她已经取得胜利，已经在把他当落水狗打，而他毫无回手之力！……）“您要末接受我们的治疗，要末不接受。如果接受的话，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就给您打第一针。否则请您签字表明拒绝我们的治疗，我今天就让您出院。至于空等三天，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在我结束对这间病房的巡诊之前，您考虑好以后告诉我。”

卢萨诺夫双手掩面。

喉咙以下几乎全被白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甘加尔特无声地打他身旁走过。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则象一艘船那样驶过。

董佐娃经过这番争执感到疲乏，希望在下一张床边高兴高兴。

“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觉得怎么样？”

科斯托格洛托夫掠一下翘起的头发，用健康人的声音响亮而又充满信心地回答：

“非常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好极了！”

两位医生互相看看。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的嘴唇只是微露笑意，可是一双眼睛简直在纵情欢笑。

“不过，”董佐娃在他床沿上坐下，“您还是用言语描述一番——您觉得怎么样？这段时间以来有些什么变化？”

“可以！”科斯托格洛托夫欣然从命。“第二次照光后，我的疼痛减轻了。第四次以后，疼痛完全消失。热度也退

了。现在我睡得非常好，任何姿势都能睡十个小时，也不疼。过去我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姿势。吃的东西看也不想看。而现在我每一餐饭都吃得精光，还要添。也不疼。”

“不疼？”甘加尔特终于笑出声来。

“给不给添？”董佐娃也笑着问。

“有时候给添的。总而言之——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世界观起了变化。我来的时候等于一具尸体，现在我是个活人。”

“恶心的感觉还有没有？”

“没有。”

董佐娃和甘加尔特望着科斯托格洛托夫，两人都喜形于色，正象老师看着拔尖的优秀生一样：与其说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引为光荣，毋宁说为他的出色的回答感到骄傲。这样的学生当然为老师所喜欢。

“肿瘤还感觉得到不？”

“它现在已经不碍事。”

“但是不是感觉得到？”

“躺下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沉重，甚至好象在滚动。但并不碍事！”科斯托格洛托夫坚持说。

“那末，您躺下来。”

最近一个月以来，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肿瘤在好几所医院里被许多医生、甚至实习生摸过，还叫邻近诊室里的医生来摸，大家都很惊讶。因此他以习惯的动作把腿搁到床上，屈起两膝，不用枕头仰面躺下，把腹部袒露。他立即感到，

腹内伴随了他一生的那只蛤蟆在里边很深的地方伏下，压迫着他。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坐在旁边，用轻柔的动作从外围逐步触近肿瘤。

“肌肉放松，不要紧张，”她提醒他，尽管他自己也知道，但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准备自卫，从而妨碍扪诊。后来，她终于使他信任地放松腹部的肌肉，在胃后深处清楚地碰到他的肿瘤的边缘，接下来就顺着整个外缘开始测试，起初动作相当轻软，第二次重了些，第三次更重。

甘加尔特从她肩后进行观察。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甘加尔特。她非常令人喜爱。她想显得严厉些，但是严厉不起来，而且很快就跟病人搞熟。她想显得老成些，也毫无结果。她身上总有一股女孩子的气质。

“跟过去一样，可以清楚地摸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说。“肿块比以前扁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变软了些。但是边缘几乎还是那样。您要不要看一下？”

“不，我每天都看，应该有些间隔。血沉——二十五，白血球——五千八百，分段……您自己瞧吧……”

卢萨诺夫昂起双手捂着的脸，问护士：

“打针很疼吧？”

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在打听：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还得照多少次？”

“现在还没法确定。”

“大概需要几次？您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出院？”

“什么???”她本来在看病史，突然抬起头来。“刚才您问我什么来着？”

“我问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出院？”科斯托格洛托夫满不在乎地重复了一遍。

他双手抱膝，一副自以为是的神气。

董佐娃眼神中欣赏得意门生的喜悦已荡然无存。她看到的是一个难弄的病人，脸上带着根深蒂固的倔强表情。

“我对您的治疗刚开始呢！”她决定让他清醒一下。“明天才正式开始。迄今为止只是在试探阶段。”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屈服：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想稍微解释一下。我明白，我的病还没有治好，但我并不强求完全治好。”

这些病人真是活宝！一个比一个古怪。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皱紧眉头，这下她真的生了气！

“您到底在说些什么？您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不慌不忙地摊开一只大手，“如果要讨论现代人的正常性和反常性，那会把我们的话题扯得很远……。您把我弄到这种愉快的状态，我对您由衷地表示感谢。现在我希望在这种状态下过一些好日子。进一步治疗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在他说这番话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下唇由于不耐烦和气愤而逐步往外翻。甘加尔特的眉毛开始牵动，视线从对话的一方移到另一方，心想插进去劝解。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倨傲地望着那个反叛

者。“总之一句话，我不愿现在就付出太大的代价换取将来过日子的希望。我愿意依靠身体的抵抗力……”

“当初您依靠身体的抵抗力，结果是爬着到我们医院里来的！”董佐娃厉声说着，从他床上站起来。“您甚至不明白自己在拿什么当儿戏！我不想再跟您谈下去！”

她把手一甩（颇有男人的气派），掉头转向阿卓夫金。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从被子上屈起两膝，样子象一只黑狗，不妥协地望着她，说：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请求您跟我谈一次！您也许对于这项试验的结果感兴趣，而我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哪怕一年也行。别无他求。”

“好，”董佐娃略略偏过头去说，“会有人来叫您的。”

她愤激地看着阿卓夫金，还完全没有作好换一种语调、换一副面孔的准备。

阿卓夫金不站起来。他捧住腹部坐着，只迎着医生抬起头来。他的两片嘴唇没有合成一张嘴，而是上下唇反映着各自的痛楚。除了向聋子求助那样的哀告以外，他的眼睛没有任何表情。

“怎么样，郭里亚？怎么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搂着他的肩膀问。

“不——好，”他光翕动嘴唇，声音极轻地回答，尽量避免通过胸腔呼气，因为肺部的任何震动立刻影响到腹部的肿瘤。

半年前，他扛着铁锹走在共青团星期日义务劳动队伍

的前列，一路引吭高歌。而现在，他甚至无法用比耳语略高的声音诉说自己的疼痛。

“来，郭里亚，咱们一起来想想办法，”董佐娃同样低声说。“也许，治疗使你感到疲劳？也许，你对医院的环境感到厌倦？是不是厌倦了？”

“是的……”

“你是本地人。要不要回家休养一个时期？要不要？……我们可以让你回家去住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好吗？”

“可是以后……还收不收？”

“当然收。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打了这么多针，你该休息休息。不打针，你可以到药房里买一点药，每天三次含在舌头底下。”

“人造雌酚？……”

“对。”

董佐娃和甘加尔特不知道：在这几个月内，除了规定给他的针药以外，阿卓夫金总是苦苦哀求每一个接班的护士和每一个夜班医生另外给他一点安眠、止痛的药粉、药片。阿卓夫金储存这些药物塞满了一只小布袋，就是准备在医生对他绝望的这一天，为自己留下一条解脱之路。

“你需要休息，郭里亚……休息……”

病房里非常静，因此可以格外清楚地听到，卢萨诺夫喟叹一声之后，放下遮住面孔的双手，抬头宣称：

“我让步，大夫。打针吧！”

第 五 章

医 生 的 焦 虑

当我们的心灵受到压抑的时候，该称做什么呢？懊丧？愁闷？一团看不见的、但是浓密而沉重的迷雾进入胸膛，把那里的一切紧紧裹起来，向正中挤压。我们只感到这股挤压的力量和这一团迷雾，甚至一时闹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这就是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巡诊结束后跟董佐娃一起下楼梯时的心情。她觉得非常不舒畅。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分析一下所有这些感受从何而起。然后采取对策。

可是她连分析一下都来不及。

其实，她是在为妈妈担忧。（放射科的三个住院医师在私下提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时管她叫"妈妈"。）按年龄她可以做她们的妈妈：她们都还不满三十岁，而她已年近半百。再者，凭她在工作上拚命培养她们的那份热心，也当之无愧。她自己一丝不苟到近乎求全责备，并希望三个"女儿"也都象她一样一丝不苟和求全责备。她是兼顾爱克斯光诊断和深度爱克斯光治疗两方面的仅存的硕果之一，

四

2

并不顾时代的趋向和知识的分化，要求她手下的住院医师也兼顾这两方面。当薇拉·甘加尔特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比她思想更活跃、感觉更敏锐的时候，“妈妈”只会高兴。从医学院毕业到现在，薇拉在她指导下已工作了八年。她觉得自己现在拥有的全部力量——把哀告求救的人从死神怀抱里拉出来的力量，无不来自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

那个卢萨诺夫可能给“妈妈”招来极大的麻烦。事情总是弄糟容易弄好难哪！

如果光只卢萨诺夫一个人还不打紧。任何怀恨在心的病人都可能这样做。要知道，猎狗经人嗾呼便蹲不住，直往前奔。这不是水上的波纹，而是留在记忆中的犁沟。也许以后可以用沙子把它填平，但只要别人再喊一声，哪怕是醉醺醺的胡话：“打医生！”或者“打工程师！”——那时棍子就随时都会抡将起来。

笼罩在白衣人头上的黑沉沉的疑云正在飘散，但这里那里还留下片片残云。就在不久以前，姆格勃①有一名司机因胃部出现肿瘤住在他们医院里。他是外科病人，本来，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跟他毫不相干；但有一次她值夜班晚间巡诊时，这个病人抱怨睡不好觉。她给他开了溴异戊酰脲，可是从护士那里了解到，这药目前只有小包，于是就

---

① 现在一般所说的“克格勃”(КГБ，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苏联历史上还先后用过“恩克维德”(НКВД，内务人民委员部)、“格别乌”(ГПУ，国家政治保卫局)、“姆格勃”(МГБ，国家安全部)、“姆维德”(МВД，内务部)等名称。——中译者注

说："给他两包一次喝下去！"病人收下了药，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甚至没有注意到他异样的眼神。这事她本来可能根本不会知道，但医院的一个女化验员跟这个司机是街坊，曾到病房里去探望他。她神情紧张地跑来告诉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司机没有把药粉喝下去（为什么一下子开两包?）。他一宿没睡，还向化验员盘问："为什么她姓甘加尔特①？你把她的情况详细介绍一下。她想毒死我。对这个女人要研究研究。"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等了好几个星期，准备接受研究。在这几个星期内，她必须毫不懈怠、准确无误、甚至精神抖擞地作出诊断，毫厘不差地规定剂量，用眼神和微笑鼓励落进这个素负恶名的癌症圈子的病人，随时担心他们向她投来怀疑的目光："你是不是下毒的凶手?"

而今天到病房巡诊还有一件事尤其使她不快：科斯托格洛托夫是进展最顺利的一个病人，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不知为什么对他特别亲切；可偏偏是这个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怀疑"妈妈"存心不良，拿他当作试验品。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离开病房的时候也闷闷不乐，她也想起跟一个最爱闹事的女人波利娜·扎沃奇科娃发生的一桩不愉快的事情。害病的不是扎沃奇科娃本人，而是她的儿子；她陪儿子住在医院里。儿子被切除了一个体内肿瘤，她在走廊里缠住主刀医师，要求把儿子的肿瘤给她一小块。设若她碰上的不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也许

① 这不是俄国人的姓氏。——中译者注

真的会给她弄到手。她接下来的打算是，把这块东西送到别的医院去，检验这里的诊断是否正确。万一与董佐娃作出的最初诊断不符，她就向法院提出控告进行报复。

这样的事在他们每一个人记忆中都不止一件。

现在，巡诊结束以后，她们便去把当着病人的面不便说的话说完，并作出决定。

十三号楼的房子不够用，没有另外给放射科的医生一间小房间。她们既不能待在“伽马炮”器械室，也不能待在十二万和二十万伏特的长焦距爱克斯光器械室。爱克斯光诊断室里虽有地方，但那里经常黑洞洞的。因此，她们把处理日常事务、写病史的桌子放在短焦距爱克斯光器械室，——好象她们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与令人恶心的爱克斯光空气及其异味、异热接触得还不够似的。

她们来到这里，在这张没有抽斗、刨工很粗糙的大桌子旁并排坐下。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在翻阅住院病人的病历——包括女的和男的，把自己能处理的和需要一起商量决定的分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郁悒地望着面前的桌子，下唇稍稍撅出，用一支短铅笔轻轻敲着桌面。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同情地看了看她，但不敢谈卢萨诺夫、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事，也不敢谈医生的一般遭遇；因为明明白白的事情无须多说，而要说的话又可能说得不够中肯、婉转，弄得不好非但不能给人安慰，反而会触到痛处。

还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先说：

“最气人的是我们毫无办法，可不是吗?!”(这可以指今天看过的许多病人。)她又用铅笔敲了几下。“事实上哪儿也没有出错。”(这可能是指阿卓夫金、穆尔萨里莫夫。)“我们一度在诊断上有过动摇，但治疗是对头的。我们也不能使用更小的剂量。那只桶使我们前功尽弃!”

原来她想的是西布加托夫!确有这样忘恩负义的病：你把三倍的创造性倾注进去，可就是救不了病人。当第一次西布加托夫被放在担架上抬来的时候，爱克斯光照片显示出几乎整个骶骨遭到彻底破坏。动摇是这样发生的：起初，甚至经过向一位教授请教，认为是骨瘤，后来才逐步弄清楚是巨细胞肿瘤，骨头里有液化现象，整个骶骨已被一种胶冻样组织所代替。然而，治疗却是对头的。

骶骨不能抽去，不能锯掉——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只能用爱克斯光照射，而且必须用大剂量照射——剂量小了不起作用。西布加托夫果然好起来了!骶骨巩固了。他的病虽痊愈，但由于射线剂量大，周围的组织变得极度敏感，容易形成新的恶性肿瘤。被桶撞倒以后，他身上出现营养性溃疡。现在，他的血液和组织都已不能接受爱克斯光照射，新的肿瘤来势凶猛，又没有办法把它消灭，只能加以抑制。

对于医生来讲，这时便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意识到治疗方法太不完善；而心中的感受则是惋惜，最普通的惋惜之情：一个温顺、有礼、忧郁的鞑靼人西布加托夫，受到了恩惠是那么念念不忘，可是为他所能做的却只是延长他的

苦痛。

今天早晨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曾专为此事把董佐娃叫去：为了加快床位周转速度，凡是没有显著好转希望的病人，就让他们出院。董佐娃对此表示同意，因为楼下穿堂里经常有人坐在那里等候床位，甚至一连等上几昼夜，而各区的肿瘤防治站也不断要求允许他们把病人转来。她在原则上表示同意，而这条原则最明显不过地适用于西布加托夫，可是叫他出院她做不到。当初为了这一个人的骶骨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现在实在不忍向一种从理智出发的简单推论让步，甚至不忍放弃无效措施的简单重复，尽管只是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希望失算的是死神，而不是医生。为了西布加托夫，董佐娃甚至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仅仅出于救西布加托夫的强烈愿望，她刻苦攻读骨科病理学。可能在候诊室里坐等的病人更需要治疗，可是她不能把西布加托夫打发走，即使要在院长面前千方百计要花招，也在所不惜。

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还竭力主张不要让绝望的病人久留。应当尽可能让他们死在院外——这也能提高床位周转率，对留下的人可以减少情绪上的影响，统计数字也将显得好看一些，因为他们不是由于死亡，而只是由于"病情恶化"而出院的。

今天让阿卓夫金出院就属于这一类。几个月来，他的病史已经有厚厚的一本，那一页页粘在一起的粗劣的土色纸张嵌着暗白色的成块木质纤维，经常挂住笔尖，里边包含无

数行数据和文字，有紫色的，有蓝色的。透过这一厚本粘起来的病史，两位医生都看到这个疼得汗涔涔的城市少年弯腰曲背坐在床上的样子；但是，柔和的声音念出来的数字比法庭上雷霆万钧的判决书更加无情，谁也无权上诉。这里记载着给他先后共照光二万六千拉德，其中最近一个疗程就有一万二千拉德；人造雌酚五十针；七次输血总计一千二百三十毫升；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三千四，红血球……。癌细胞的转移象坦克摧毁着防线，它们已波及纵隔、锁骨上淋巴结和肺部，而机体却不能作出阻止转移的反应。

两位医生把另置的卡片反复看遍，又写了几行，而一名护士——她是爱克斯光技术员——就在那里继续给门诊病人进行照光治疗。她把一个穿蓝色连衫裙的四岁的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带了进来。小女孩脸上有一些红色的血管瘤，目前还很小，还不是恶性的，但决定进行照射，防止它们转化。小女孩自己并不怎么着急，殊不知自己小小的嘴唇上也许已经被死神打上可怕的烙印。她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已经不觉得害怕，老是象小鸟儿唧唧喳喳，喜欢伸手去摸摸仪器上镀镍的零件，对那个闪闪发光的世界很感兴趣。给她照光的时间一次总共只有三分钟，可是这三分钟她怎么也不肯老老实实地坐在对准患处的狭长射线管下面。她不断地扭过来、转过去，爱克斯光技术员烦躁地关掉电源，一再把管子重新向她对准。母亲拿着一件玩具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并答应还要给她其他好东西，只要她乖乖地坐着。接着进来一个脸色阴沉的老妇人，她慢慢腾腾地解下头巾，

脱去上衣。随后是从住院部来的一个穿灰色晨袍的女人，她足底长着一个球状有色肿瘤——只不过是被鞋钉戳破引起的。她同护士有说有笑，压根儿没有料到，这个直径只有一毫米的区区小球——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医生们就是不肯给她切除——其实正是恶性肿瘤之王——恶性黑色素瘤。

两位医生不免也要为这些病人分心，看看她们的病情，给护士出出点子。已经过了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该去给卢萨诺夫注射恩比兴① 的时候，于是她把最后一张、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卡放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面前。这是她故意压下来的。

“进院时处于被严重耽误的状态，居然取得这样出色的开端，”她说。“只不过这人脾气太固执。但愿他不至于真的拒绝继续治疗。”

“他敢?!”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轻轻敲了一下桌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跟阿卓夫金一样，但是疗效显示了大有希望的前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竟想拒绝治疗！他敢?!

“对您他也许不敢，”甘加尔特立即表示同意。“可是我没有把握拗得过他。要不要叫他来跟您谈一谈?”她从指甲缝里剔去粘在那里的一颗尘垢。“我跟他的关系搞得相当别扭……总是没法用严厉的口气对他说话。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① 治疗肿瘤的氯乙胺族化合物。——中译者注

他们之间的别扭还是从初次见面的时候开始的。

在一月份阴暗的一天，雨下得很大。甘加尔特刚接班，这天她是医院的夜间值班医生。晚上九点钟左右，楼下一个肥胖而健壮的女工友来向她诉苦：

“医生，那里有个病人在撒野。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要是不采取措施的话，简直要骑到咱们头上来啦。”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走出去，见大楼梯底下上了锁的护士长小室旁边，一个瘦高个儿的男子直挺挺躺在地上，足登靴子，身穿泛出棕红色的士兵大衣，一顶可以罩住耳朵的皮帽——不是军帽——显得太小，但还是绷在头上。他把一只行李袋枕在头下，摆出一副准备过夜的架势。甘加尔特两腿纤细，穿一双高跟鞋（她在衣着上从来不马虎），走到他跟前。她正色看着这个男子，指望通过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自动站起来。可是，他虽然看见了她，照样满不在乎，动也不动，甚至好象微微合上了眼睛。

“您是什么人？”她问。

“一——个——人，”他声音不高、神情淡漠地回答。

“有住院许可证吗？”

“有。”

“什么时候拿到的？”

“今天。”

从他两侧地上的水迹看来，他的军大衣全湿透了，其实靴子、行李袋也一样。

“但是躺在这里不行。我们……这里不容许。再说，这

也……不妥当……”

“妥——当，”他懒洋洋地应道。“我在自己的祖国，还怕不好意思见谁？”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没了主意。她感觉到不能向他叱喝，不能命令他起来，他也不听你的。

她朝穿堂那边回头看了一下。那里白天总是挤满探望和候诊的人，三张长椅是供家属会见病人坐的；夜里医院关门以后，外地来的重病号如果没地方住，就留在那里。现在穿堂里只放着两张长椅，一张上已躺着一个老太婆，另一张上被一个系着花头巾的乌兹别克少妇放着一个孩子，少妇自己坐在旁边。

她可以让那人到穿堂里去躺在地上，但是那里的地板给践踏得很脏。

而这里是无菌地带，必须穿病人服或白大衣才能进来。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又看了看这个粗野的病人，他那瘦削的脸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

“您在城里没有熟人吗？”

“没有。”

“您为什么不到旅馆去试试？”

“试过了，”他已经懒得回答。

“此地有五家旅馆。”

“他们连听也不愿意听，”他闭上眼睛，仿佛向对方示意谈话到此结束。

“要是早一点就好了！”甘加尔特说。“我们有些工友家

里可以让病人过夜。收费不贵。”

他闭上眼睛躺着。

“他说打算在这里躺一个星期！”值班的女工友气冲冲地诉说。“躺在当道！说是直到给他床位为止！哼，没见过这样耍无赖的人！快起来，别胡闹！这地板是消毒过的！”女工友向他逼近。

“为什么只有两张长椅？”甘加尔特感到奇怪。“本来好象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给搬走了，”女工友向玻璃门外指了一下。

对，对，一张长椅给搬到那扇门外器械室走廊里去了，好让白天来接受门诊照光的病人等候时坐。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叫女工友把走廊门打开，对病人说：

“我重新把您安置得妥当些，起来。”

他向她瞧瞧，一时不太相信。然后忍着苦楚从地上爬起来，身体频频因疼痛而抽动。显然，他做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转动躯干都很困难。站起来的时候，他没有把行李袋拿在手里，而现在弯腰去取又觉得疼。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轻巧地俯下身去，用白净的手把他的淋得湿透而又不大干净的行李袋拿起来递给他。

“谢谢，”他现出一丝苦笑。“我竟落到这般田地……”

他躺过的地上留下长长的一汪水迹。

“您淋了雨？”她愈来愈同情地注视着他。“那边走廊里暖和，把大衣脱了。您是不是在发冷？有热度没有？”他的

那顶拉得很低、垂着两只毛皮耳朵的蹩脚黑帽子遮住了整个前额，所以她的手指没有碰到他额上，而只是贴在面颊上。

一摸就可以明白他有热度。

“您平时吃什么药？”

他开始换一种神态看她，不再那样极度地冷淡。

“安乃近。”

“您有吗？”

“嗯。”

“要不要给您安眠药？”

“如果可以的话。”

“对了！”她忽然想起。“您把住院许可证拿出来！”

不知他是在冷笑呢，还是疼得不由自主地牵动着嘴唇。

“没有许可证——就得淋雨？”

他松开军大衣的扣子，从露出来的军服上衣口袋里取出住院许可证，果然是当天上午门诊部开的。她看了以后，发现这原来是放射科的病人，应归她治疗。她拿着许可证转身去取安眠药。

“我马上给您拿来。去躺下吧。”

“慢着，慢着！”他一下子警惕起来。“许可证可要还给我！我懂得你们这套把戏！”

“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她感到委屈地回头问道。“难道您不相信我？”

他踌躇了一下，没好气地说：

"我凭什么必须相信您？我跟您并没有合用一只盆子喝过菜汤……"

说完就去躺在走廊里。

她生了气，自己没再到他那里去，让女工友把安眠药和许可证送去，在许可证上端写上 cito① 字样，再划一道杠，加一个惊叹号。

直到夜里她才打他旁边经过。他睡着了。长椅弯曲的椅背与同样弯曲的坐位相接，形成一道浅槽，睡在上面不会摔下来。淋湿的军大衣已经脱下，但他还是把它盖在身上：一侧衣襟盖两条腿，另一侧盖肩膀。从长椅一端垂下的靴子无一处完好，用黑的和红的皮革边料补了又补。靴底前部和后跟都钉着铁掌。

第二天一早，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跟护士长说了一下，护士长就把他安置在二楼的扶梯平台上。

诚然，从那天以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再顶撞她。他用一般城里人的语言有礼貌地同她交谈，总是主动向她招呼，甚至现出友好的微笑。但总使人感到，他会做出奇怪的举动来。

果然，前天她叫他来做血型试验，准备好一支空的注射器，打算从他静脉中抽血。科斯托格洛托夫把已经卷起的袖子又放下来，坚决表示：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我很遗憾，请您另想别法，这试验不做也罢。"

① 拉丁文：特急。——中译者注

“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

“我的血已经被喝掉不少，我不愿再给。谁的血多，就让谁给吧。”

“您怎么不害臊的？男子汉，大丈夫！”她带着自古以来属于女人天赋的那种嘲笑意味看了他一眼，这种表情男人是顶不住的。“我只从您身上抽三西西……”

“要三西西！三立方厘米？这是干什么？”

“确定您的血型，做交叉配合试验。如果血型符合，给您输二百五十西西。”

“给我？输血？得了吧！我要别人的血干吗？别人的血我不要，自己的血我一滴也不给。血型您可以记下，在前线验过，我知道。”

薇拉好说歹说，他始终不肯，而且不断举出新的、意想不到的理由来拒绝。他坚信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后来她气得发了急，说：

“您使我处于一种愚蠢可笑的地位。我最后一次向您请求。”

当然，忍受这样的屈辱是她的失策，——何必去求他呢？

但他马上袒露胳臂，向她伸过去，说：

“看在您的份上，拿三西西去，请吧。”

由于她在他面前总是不知所措，有一次还发生过一个可笑的插曲。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您不象日耳曼人。您大概是用丈夫的姓吧？”

“是的，”她的回答脱口而出。

为什么她这样回答？在那一瞬间，她觉得不这样说似乎脸上下不来。

他没有再问什么。其实，甘加尔特是她父亲、祖父的姓。他们是俄罗斯化了的日耳曼人。

应该怎么回答呢？“我没有丈夫”？“我从来没结过婚”？

不可能。

第 六 章

切片分析的始末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首先把科斯托格洛托夫带进器械室，一个女病人刚接受一次照光后走了出去。这里从上午八时开始，用钢丝吊钩吊在天花板下的一支十八万伏特的大型爱克斯射线管就不间断地工作，而气窗关着，所以空气里充满着一股甜腻腻的、不大好受的爱克斯光辐射热。

病人接受五六次、十来次照射以后，肺部感受到这种热(其实还不单单是热)，就会觉得恶心。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之已经习惯，要说喜欢则并不。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当初射线管根本没有什么防护罩(她还差点儿被高压电线触死)，董佐娃每天呼吸爱克斯光室的空气，坐在那里进行诊断的时间大大超过容许的限度。尽管有防护屏和手套，她自身接受的射线量恐怕比耐力最强的重病人还多，不过没有人统计这些拉德罢了。

她动作匆忙，不仅是为了快些出去，还因为不能让爱克斯光装置多耽搁。她示意科斯托格洛托夫躺在管下一张硬榻上，袒露腹部。她用一支使人发痒的凉丝丝的毛笔在他

皮肤上刷着、画着，好象在写阿拉伯数字。

接着，她向担任爱克斯光技术员的护士说明象限示意图，告诉她怎样把射线管凑近每一象限。然后她叫科斯托格洛托夫翻身俯卧，又在他背上刷了一阵，并通知他：

"照完以后到我那儿去一趟。"

说完就走了。护士又叫他仰卧，用被单覆盖第一象限，然后去搬来一些沉甸甸的灌铅橡皮小方毯，把它们盖在目前不应受到爱克斯光直接照射的一切邻近部位。有弹性的橡皮小方毯压在身上有一种既沉重、又舒适的感觉。

护士也走出去，把门关上，现在只通过厚厚的墙壁上一扇小窗看见他。机器响起轻微的嗡嗡声，辅助灯亮了，主要的管子已经烧热。

强烈的爱克斯光，人的头脑无法想象的、颤动着的电磁场向量，或者用比较易懂的说法叫做量子炮弹（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撕裂、打穿），开始倾泻下来，透过暴露的腹部皮肤组织，再透过病人自己也叫不出名儿的间层和器官，透过肿瘤蛤蟆的躯干，透过胃或肠，透过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透过淋巴，透过细胞，透过脊柱和小骨，又透过间层、血管和背上的皮肤，然后透过硬榻的木板、四公分厚的地板，透过搁栅，透过填料，继续深入石基或地下。

这种重量子的野蛮轰击是在被照射组织不知不觉中无声无息地进行的。照了十二次以后，科斯托格洛托夫重新获得了生的意愿和生的乐趣，重新有了胃口，甚至恢复了愉快的心情。接受两三次射击以后，他摆脱了使他失去一切

生趣的疼痛，于是便一心想了解和弄懂，这些穿透力极强的小炮弹怎么能轰击肿瘤而不损伤其余的肉体。科斯托格洛托夫不能无保留地接受治疗，除非他弄明白这种疗法的原理并相信它是对的。

他试图向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甘加尔特打听爱克斯光疗法的原理。从他们在楼梯脚下初次见面时起，这个挺可爱的女人就打破了他的成见和戒心；当时他曾横下一条心，哪怕请消防队员和民警来把他拖走也不在乎，反正他决不自愿离开。

“您别怕，给我解释解释，”他极力使她宽心。“我好比一名自觉的战士，必须明确理解战斗任务，否则无法作战。怎么可能让爱克斯光破坏肿瘤而不损害其他组织?”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所有的感受还未流露在眼神里，总是先反映在她的嘴唇上。她的轻如鸿毛的嘴唇不知怎的特别敏感。内心的犹豫也在上面反映出来：现在她的嘴唇就举棋不定地翕动着。

（关于这种不分敌我盲目轰击的炮火，她又能向他讲些什么呢?）

“哦，那是不行的……好吧，我简单讲一讲。爱克斯光的破坏力当然对什么都一样。不过正常的组织恢复得快，肿瘤组织就恢复不了。”

她说的是真话也罢，假话也罢，但科斯托格洛托夫表示满意。

“哦，按这样的条件我愿意干。谢谢。现在我一定能好

起来！”

他果然在好起来。他欣然躺到爱克斯光下面，在接受照射的时候还特别晓示肿瘤细胞：你们正面临着崩溃的命运，即将彻底完蛋。

有时他在爱克斯光下面想入非非，甚至打瞌睡。

例如此刻他看到室内挂着许多皮管和电线，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为什么要这许多东西；如果这里有冷却装置，那末是水冷还是油冷。但他的思想没有在这上面停留，也没有找到任何解释。

其实，他是在想薇拉·甘加尔特。他寻思着，象这样可爱的女人永远不会出现在他们的乌什-铁列克。这样的女人一定都有丈夫。不过，他一方面把这位丈夫放在括号内记在心上，另一方面却撇开她的丈夫想这位女医生。他在想，要是能和她聊聊，不是三言两语，而是聊上很多很多时间，或者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散步，那该多么愉快！有时用带刺的话吓唬她一下，她茫然失措的神态怪有趣的。每当她在走廊里迎面走来，或者走进病房的时候，她的微笑总是象太阳暖人心怀。她的善良不是职业性的，而是心地善良。她的笑容和蔼可亲，这也是她的嘴唇本身使然。那好象是两片有生命的、独立的嘴唇，眼看着将要从脸上飞起来，象云雀朝着碧天翱翔。一切嘴唇都注定要接吻，她的嘴唇也不例外；然而，这两片嘴唇还另有职责——如潺潺流水曼声低吟光明的歌。

射线管嗡嗡地发出轻微的振荡。

他在想薇拉·甘加尔特，但也在想卓娅。事实上，昨晚给他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她的一对并排耸峙的乳房（这印象从早晨起又浮现了），它们就象一座几乎成水平面的搁架。昨晚闲谈时，他们旁边的桌上放着一把画表格用的相当重的大尺，不是胶合板直尺，是用木料刨就的。整个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心里痒痒的，一直想拿起那把尺子放在她的乳房搁架上，试试会不会滑下来。他觉得不会滑下来。

但他怕卓娅会生气。

他还怀着感激的心情想到放在他腹下的那块沉重的灌铅小方毯。这小毯压着他，并且欢快地安慰他："我能保护你，别害怕！"

但也许保不住？也许它不够厚？也许它放的位置不太妥当？

不过，这十二天来，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光是重新获得了生命——恢复了食欲、活动能力和愉快的心情。这十二天以来，他还重新获得了对生活中最美的东西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最近几个月的痛苦中本已完全丧失。由此可见，铅毯守住了防线！

尽管如此，趁现在还来得及，还是得从医院里跳出去。

他没有发觉嗡嗡声已经停止，淡红色的灯丝已开始冷却。护士进来拿去他身上的护板和被单。他把腿从榻上放下来，这时才清楚地看到自己腹部有一些紫色的方格和数字。

"洗澡怎么办？"他问护士。

“一定要医生许可。”

“好哇！这么说，已经为我做了一个月的安排？”

他去找董佐娃。她坐在短焦距器械室里，戴上了圆角方框眼镜，在对着光看几张大的爱克斯光底片。两台机器都停着，两扇气窗都开着，其他一个人也没有。

“坐下，”董佐娃冷淡地说。

他坐了下来。

她还继续对比两张爱克斯光片子。

虽然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她有争执，但他只是想抵制医嘱中过多的纯医学成分。至于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本人他是信任的，不仅因为她具有男人的魄力，黑暗中在护板旁发布命令时条理清楚，年龄也比较大，对待工作无疑怀着一片赤忱；但最主要是因为她从第一天起就很有把握地摸到肿瘤的轮廓，准确地判断它的部位。本身也有所感觉的肿瘤向他表明扪诊是正确的。医生通过手指是否对肿瘤的情况了然于胸，这只有病人能评定。

她把爱克斯光片子放到一边，摘下眼镜，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您的病史缺少一项极其重要的资料。我们需要确定您的原发性肿瘤的性质。”

每当董佐娃改用医学语言时，她说话的速度就大大加快：长句和术语总是一气呵成。

“您所说前年动过手术的事和目前转移的情况，与我们的诊断相符。但还是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而这一点会给治疗造成困难。现在从您的转移部分取样试验是不可能的，

这您也明白。”

“谢天谢地。要取我也不给。”

“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拿不到原发灶标本的玻璃片。您本人是否完全肯定做过组织分析？”

“肯定做过。”

“既然做过，为什么不向您宣布分析结果？”她象连珠炮似地说得极快，完全是谈正经的务实作风。有些字眼来不及听清楚，是猜出来的。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失去赶时间的习惯。

“分析结果？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当时我们那里发生的事件惊心动魄，形势是那么紧张，说老实话……根本不好意思去问我的活组织检查报告。”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医生谈话时喜欢使用他们的术语。

“您当然不懂。但你们的医生应当懂得这不是闹着玩儿的。”

“医生？”

他看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既不掩盖、也不染色的斑白头发，又看看她颧骨比较高的脸上严肃认真的表情。

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现象：他面前坐着一个与他同祖国、同时代的好人，他们有共同的俄罗斯祖国语言，可是他居然无法向她讲清楚极普通的道理。也许，这话说来太长。也许，把原来的话头打断还太早。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医生毫无办法。第一个

外科医生——一个乌克兰人——决定给我施行手术，并为我做好了术前的准备。不料在动手术的前夜被放逐了。”

“什么？”

“没什么。他被押走了。”

“可是，我想事先总该通知他的。他应当……”

科斯托格洛托夫纵声大笑。他实在觉得可乐。

“放逐犯人从不事先通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就是要出其不意把人拔掉。”

董佐娃宽阔的前额上眉头打结。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话她听来莫名其妙。

“但是他有病人要动手术怎么办？……”

“咳！送到那里的病人还有比我更严重的呢。一个立陶宛人吞下了一把铝匙子，喝汤用的匙子。”

“这怎么可能？”

“是故意吞下的。为了离开单人囚室。他又不知道医生要被押走。”

“那末……后来怎样？您的肿瘤不是发展得很快吗？”

“是啊，简直晚上跟上午就不一样，真的……后来，过了五天，从另一个集中营调来另一个外科医生，是日耳曼人，名叫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他到新地方先看了一下，又过一天才给我动手术。可是谁也没有对我说过‘恶性肿瘤’、‘转移’之类的话。我也不懂。”

“但是活检他送去做了没有？”

“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不懂什么叫活检。手术后我躺

在那里，身上压着沙袋。过了一星期，我开始学着一只脚下床，锻炼站立；这时，营里又在抽一批人准备放逐，一共七百名，都是'捣乱分子'。我那位依头顺脑的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也在内。他是从宿舍被带走的，没让他给病人作最后一次巡诊。"

"太荒唐了！"

"这还不算荒唐。"科斯托格洛托夫显得异常亢奋。"我的一个朋友跑来悄悄地告诉我，说我也在这份名单上，是卫生处长杜宾斯卡娅夫人点头的。她明明知道我不能走路，我的缝线还没有拆去，可是她点了头，这个混账女人！……对不起……我心想：刀口带着缝线挤在牛棚车里，一定溃烂化脓，必死无疑。于是我拿定主意，等他们来押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就在这里开枪吧，把我打死在床上，我哪儿也不去。'我横下了一条心！可是他们没来带我。倒不是因为杜宾斯卡娅夫人发了善心，她还对我没有被押走感到奇怪呢。问题在于登记分配处里的人一查，发现我的刑期已剩下不到一年。我把话扯远了……。当时我走到窗前一看：医院的木栅外面排着一列长队，离我大约有二十米，收拾好东西的已被赶到那里集中，准备解走。卡尔·费奥多罗维奇看见我在窗口，就喊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把小窗打开！'看守骂他：'你嚷什么，混蛋！'可他还是喊道：'科斯托格洛托夫！记住！这非常重要！您的肿瘤切片我已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教研室做组织分析去了，要记住！'他们就这样被……押走了。在您之前给我治病的几位医生的遭

遇便是如此。怎么能怪他们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靠到椅背上，心情十分激动。他又感到了那所医院(不是这里的医院)的气氛。

董佐娃剔除枝蔓(病人的叙述总是比较噜苏)，抓住要点，继续问道:

"那末，鄂木斯克方面是怎样答复的?答复了没有?有没有向您宣布?"

科斯托格洛托夫耸耸嶙峋的肩膀。

"谁也没宣布什么。我也不明白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为什么向我贼这番话。直到去年秋天，我在流放地病情恶化，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位妇科老医生，他竭力劝我去问。我向自己营里写了一封信。没有回音。于是我写信到营部告状。过了两个月，才回信这样说:'经仔细查阅您的档案材料，无法确定分析结果。'我已被肿瘤闹得恶心难忍，本来不想再到处写信，但由于监督处①不放我出去治疗，我就抱着碰运气的态度写信到鄂木斯克的病理解剖教研室。很快，才几天工夫，那里就回了信——那已经是在一月份，我被批准到这里来之前。"

"对，对!那封回信在哪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当时我正要动身到这里来，我……已经什么都无所谓。再说，那上面又没有盖章，不过是教研室一名化验员写来的信。她很热情地写着，在我说明的那个日期，从那个地点确曾有标本送去，分析也做

① 监督流放者的警察机构。——英译者注

了，结果证实那正是……您所怀疑的那种类型的肿瘤。当时已经把分析报告寄给要求鉴定的医院，也就是我们营的医院。按照我们那里的一套做法，事情很有可能象她说的那样。我完全相信：分析报告寄到那里，反正谁也不需要，杜宾斯卡娅夫人于是就……”

不，董佐娃对这种逻辑怎么也不理解！她交叉着两条胳膊，手掌不耐烦地轻轻拍着上臂。

“根据这样的分析结果，不是必须立刻给您进行爱克斯光治疗吗？”

“给谁？”科斯托格洛托夫开玩笑地眯缝着眼睛看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爱克斯光治疗？”

真没办法！他向她谈了有一刻钟，而且谈得这样坦率。她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他感慨地说。“看来那里的情况是想象不出来的……。关于那个世界，外界连一点概念都没有！什么爱克斯光治疗！我动手术的部位疼痛还没有消失，就象现在阿赫马章那样，可已经跟大伙一样在干活，浇混凝土了。我甚至没有想过可以有所不满。您知道两个人合抬一只盛着混凝土浆的深箱子有多重？”

她垂下了头。好象是她自已派他去干这样的活。

看来，这段病史要弄清楚比较困难。

“就算如此。可是后来病理解剖教研室的复信为什么不盖公章？为什么由私人出面？”

“私人回了信已经谢天谢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总算遇到那位化验员是个好心人。我发现，女人中间心地善良的毕竟比男人多……。至于信由私人出面——那得怨我们该死的保密制度！她在信上还写着：‘不过，肿瘤标本寄给我们的时候没有写明病人的姓名。因此，我们不能给您正式的答复，也不能把标本玻片给您寄去。’”科斯托格洛托夫愈说愈恼。恼火的表情在他脸上反映得比什么都快。“有什么了不起的国家机密！真是些白痴！生怕被那边的什么教研室知道某某营里关着一名囚犯科斯托格洛托夫。把我当成法王路易的孪生兄弟！直到现在，我的切片始终作为无名氏的标本保存在那里，而您却为治我的病伤透脑筋。不过保密算是做到了！”

董佐娃的目光坚定而明亮。她没有偏离自己的立场。

“那末，这封信我也必须收入病史。”

“好。等我回到敖尔，马上给您寄来。”

“不，要快一点。您的那位妇科医生能不能找到，把它寄来？”

“找是找得到的……可是我自己什么时候回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皱眉望着对方。

“在我认为您的治疗必须告一段落时，您可以回去，”董佐娃一字一顿十分郑重地说。“但也只是去一个时期，还得再来。”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谈话中一直等候着这一刹那！可不能白白放过！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建议不要用大人跟

小孩说话这种调子，应该象大人跟大人说话。认认真真地谈。今天在病房里我向您……”

“今天在病房里您向我作了一次丢脸的表演，”董佐娃把她的宽脸盘儿一沉。“您想干什么？把病人的思想搞乱？您在往他们的头脑里灌什么东西？”

“我想干什么？”他说时并不发火，同样毫不含糊，并且在椅子上坐得稳稳的，脊背靠着椅背。“我只想提醒您，我有权支配自己的生命。一个人可以支配他自己的生命，难道不是？您是否承认我有这样的权利？”

董佐娃望着他脸上那道弯曲的无色疤痕，默不作声。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

“您的立论一开始就不正确，您以为：既然病人来到你们这里，接下来就由你们代他作主。由你们的指示、碰头会、方针、计划以及你们医院的名誉代他作主。我又成了一粒沙子，同在营里一样；我又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医院在手术前要取得病人的书面同意，”董佐娃提醒他。

（她提起手术做什么？……如果要给他动手术，他说什么也不答应！）

“谢谢！对此我表示感谢。尽管这样做是为医院本身的安全着想。但是除了动手术，你们什么也不征求病人的意见，什么也不向他解释，可不是吗？别的不说，单是爱克斯光就够可怕的！”

“关于爱克斯光的谣言，您是哪儿听来的？是不是从拉

宾诺维奇那儿听来的？"董佐娃问。

"我不认识什么拉宾诺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煞有介事地摇摇头。"我谈的是原则。"

（是的，他正是从拉宾诺维奇那儿听到了关于爱克斯光后果的这些可怕的故事，但保证不出卖他。拉宾诺维奇是个门诊病人，已经照过两百多次爱克斯光，怎么也适应不了；每照十来次，他总觉得不是愈来愈接近康复，而是愈来愈接近死亡。在他住的地方，跟他同一套住宅、同一栋楼、同一街区的人，谁也不理解他的心情。他们无病无痛，一天到晚奔波忙碌，老是在想一些如意的和不如意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都至关重要。甚至他自己的家属也对他厌烦了。只有在这里——癌症楼的台阶上，病人们会一连几个小时听他诉说，并表示同情。他们能理解，当椎弓的活动三角出现硬化，照光部位的辐射瘢痕增厚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

天哪！他居然谈起原则来了！……要是董佐娃和她手下的住院医师整天跟病人讨论治疗原则，那还得了？还有什么工夫治病？

但是，象此人这样固执地好刨根究底，或者象拉宾诺维奇那样老是缠住她了解病情进程，大概五十个中间会有那么一个，有时不得不硬着头皮跟他们解释一通。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例从医学角度看也是不寻常的：奇就奇在她接手以前有人对他采取了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好象在密谋暗算他，以致他竟被推到死亡的边缘；奇又奇在他接受爱克

斯光照射后开始的好转快得不得了，简直是起死回生。

“科斯托格洛托夫！十二次爱克斯光照射把您从一具尸体变成了活人；而您竟敢倒打一耙？您抱怨在劳动营和流放地没有给您治疗，把您的病置于不顾；可是您又抱怨这里给您治疗、对您关心。这是什么逻辑？”

“说起来是不合逻辑，”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一头蓬蓬松松的黑发一抖。“但事情也许本来就不必合乎逻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您说对不？要知道，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为什么硬要用逻辑学或者经济学、生理学加以解释呢？是的，我来到此地的时候等于是一具尸体，躺在楼梯下面，要求你们把我收下。于是你们就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我到这里来只求活命，不惜任何代价。要我不惜任何代价我可不愿意！！世上没有我愿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的东西！”他愈说愈快，尽管不喜欢这样，但是董佐娃好象要打断他的话，而他要说的还有许多。“我来到此地是为了减轻痛苦！我说：我疼得厉害，帮帮忙吧！你们的确帮了忙！现在我不疼了。谢谢！谢谢！我是感你们恩的债务人。不过现在，请放我走吧！让我象一条狗那样回到自己窝里去躺下好好休息休息，舔舔自己的毛。”

“等到您又疼得受不了，您再爬到我们这里来？”

“也许会。也许又会爬来。”

“我们又得把您收下？”

“是的！！我认为这就是你们的慈悲心肠！您有什么可担心的？担心影响治愈率？担心不好交差？因为医学科学

院认为不应少于六十次，而你们做了十五次就放我走，担心没法交代？”

她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胡说八道。从交差的角度考虑，现在以“明显好转”的理由让他出院恰恰最有利；而做了五十次以后反而没法这样写。

可是他坚持自己的主张：

“你们把肿瘤打退了、抑制住了，我已经很满意。现在肿瘤处于守势。我也做好了防御工事。好得很。士兵在防守中日子最好过。而要‘彻底根治’你们反正做不到，因为治癌是没有底的。而且自然界一切过程都在无症状地趋于饱和，过了头就会事倍功半。起初我的肿瘤被破坏得很快，以后这个过程将缓慢下来，所以请放我走吧，趁我还留着这点血液。”

“我倒要问您，这些知识您是从哪儿得来的？”董佐娃眯缝着眼睛问。

“我从小就喜欢读医书。”

“但是我们的治疗究竟哪一点使您担心？”

“哪一点使我担心？——我不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不是医生。您也许知道，可是不愿向我讲明。比方说，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要给我注射葡萄糖……”

“这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我不要。”

“为什么？”

“首先，这是不自然的。如果我非常需要葡萄糖，那就

让我口服！二十世纪想出的办法真要命：为什么每一种药都要打针？自然界哪里见过这样干的？动物是这样的吗？再过一百年，后人将把我们当作野蛮人嘲笑。再说，针又是怎么打的？有的护士一下子就打准了，可是有的护士会把那个那个……肘弯整个儿戳遍。我不干！另外，我知道你们在设法给我输血……”

“您应该感到高兴！别人把自己的血献给您！这是健康，这是生命！”

“可是我不要！我曾亲眼看到给一个切禅人[1]输血，后来他在床上折腾了三个小时，据说因为血型‘不完全相容’。有人输血没输入静脉，结果手臂上隆起一个疱子，又是热敷，又是蒸气浴，整整搞了一个月。我不要。”

“可是不输血就不能多照爱克斯光。”

“那就别照了！！为什么你们认为自己有权利代替别人作主？要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权利，难得有好结果。要小心啊！即使医生也没有这个权利！”

“正是医生有这个权利！首先是医生！”董佐娃提高嗓门斩钉截铁地说，她已经勃然大怒。“要是没有这个权利，也就没有任何医学可言！”

“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您不久要做一篇关于放射病的报告，是不是？”

“您怎么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感到奇怪。

“这不难设想……”

---

[1] 主要居住在北高加索的苏联少数民族之一。——中译者注

(其实很简单：桌上放着一个文件夹，里边有厚厚一叠打字纸。文件夹上的题目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眼里是颠倒的，但在谈话过程中他看清楚了，也考虑过了。)

"……不难料到。因为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儿——放射病，那就得做报告。事实上，二十年前您也给某一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过光。当时他竭力拒绝，说是害怕这种治疗；可是您劝他放心，认为没有问题。因为当时您还不知道有放射病。我现在也是这样：我还不知道自己该怕什么，反正我要求放我走！我要凭自己的力量恢复健康。说不定我会好起来的，您说呢？"

医生有一条金科玉律：对病人不应当吓唬，应当鼓励。但是，对于象科斯托格洛托夫这样的病人则相反，必须让他吓一大跳。

"好起来？不可能！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她象用蝇拍子拍苍蝇似地四个指头在桌上拍了一下，"不可能！您，"她还在斟酌打击的份量，"必死无疑！"

她准备看他发抖。但他只是缄口不语。

"您将遭到与阿卓夫金同样的命运。难道您没看见？您跟他得的是同一种病，耽误的程度也几乎一样。我们认为阿赫马章还有救，因为他在手术后马上开始照光。而您失去了两年时间，这一点您要加以考虑！本来应当立即动第二次手术——切除下一个最容易波及的淋巴结；可是没有给您切除，请注意！于是就发生了转移！您的肿瘤属于癌症中最危险的类型！危险就在于它是迅速扩散和严重恶性

的，也就是转移力非常活跃。它的死亡率据最近的统计达到百分之九十。现在您满意了吧？我可以拿给您瞧……”

她从一堆文件夹中抽出一本，开始在里边翻查。

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做声。后来他开始说话，但声音很轻，完全不象刚才那样自信：

“坦白说，我对生活并不十分留恋。在我前头没有生活，在我后面也没有生活。现在能捞到机会过半年太平日子，就过它半年再说。至于十年二十年的计划，我不想制订。多治疗多吃苦头，将来会出现放射性恶心、呕吐——又何必呢？……”

“找到了！瞧！这是我们所作的统计。”她把一页双连的练习本纸递给他。横贯展开的全页通栏写着他的肿瘤的名称；左边半页是“已死亡”，右边半页是“尚未死亡”。一共写着三栏男人的姓名——因为是不同时间写上去的，有铅笔字，有钢笔字。左边半页没有涂改，而右边半页一再被划掉、划掉、划掉…… “出院时我们把每个人的姓名都写在右边，以后陆续移到左边……但毕竟有几个幸运儿至今还留在右边，看见没有？”

她把这张表给他再看一会，再想一想。

“您自以为病已经好了！”她继续发动强有力的攻势。“其实您的病依然故我。您来到此地的时候怎样，现在还是怎样。唯一弄清楚的是：跟您的肿瘤可以进行斗争！还不是毫无希望。可是在这个当儿您声称要走？可以，您走吧！走！哪怕今天出院也行！我立刻关照给您办手续……然后

我把您登记在这张表上。填在'尚未死亡'一边。"

他不言语。

"怎么样？决定了吧？"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让步。"如果需要在合理的程度上再做若干次的话，比方说，五次，十次……"

"不是五次十次！要末一次也不做！要末做满必要的次数！就从今天开始，每天做两次，而不是一次。包括一切必要的治疗方式！而且不准抽烟！还有一条必须做到：接受治疗不仅要有信心，还要高高兴兴！只有这样，您的病才治得了！"

他低下了头。在一定程度上，他今天是存心准备讨价还价的。他担心要给他动手术，现在总算没有提出来。至于照光还可以，问题不大。科斯托格洛托夫备有一种秘密药物——伊塞克库尔[1]的曼德拉草根。他打算回到偏僻的密林中去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而是想用草根治病。事实上，正因为有了草根，他才到这个肿瘤医院来尝试一下。

可是董佐娃医生看到自己胜利了，就宽宏大量地说：

"好吧，葡萄糖就不挂了。给您换一种肌内注射的针剂。"

科斯托格洛托夫笑了笑，说：

"不是您向我，而是我向您让步。"

"还有：请您尽快把鄂木斯克的回信转来。"

---

[1] 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大湖名，也是州名。——中译者注

他从她那里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好象走在两大永恒的范畴之间：一边是“尚未死亡”的名单，不过迟早要被划掉；另一边是永久流放，象星辰一样，象银河一样永久的流放。

第 七 章

治病的权利

其实，他要是来一个打破沙锅璺到底：这是什么针剂？有什么作用？是不是确实需要？在道义上说应该不应该用？万一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得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说明这种新疗法的功能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他很可能彻底踢翻牌桌。

然而，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把过硬的论据全部抛完以后，投降了。

她却故意掉了一个枪花，只是当作无足轻重的细节一言带过，因为她对于这种解释已经感到腻烦，然而她认定：正是在目前，单纯爱克斯光的效验在病人身上已得到证实，向肿瘤发动一次新的突击的时机到了，这是当代一些权威著作十分推荐对该种类型的癌采取的措施。看到在治疗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过程中取得如此非同寻常的成功，她岂能迁就他的顽固态度而放弃对他采用她所相信的各种方法。诚然，原发灶标本的玻璃片不在这里，但她的直觉、目力和记忆无不向她提示，他的肿瘤正是那种类型，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董佐娃医生正在写一篇副博士论文，恰恰是关于这种类型并且会发生这种转移运动的肿瘤的。她并不一直在写，而是以前开了一个头，以后时辍时续。她的老师奥列宪科夫医生和朋友们鼓励她，要她相信一定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但她被各种各样的情况挤得转不过身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已经不指望将来进行答辩。倒不是因为她缺乏经验或材料，而是因为两者都太丰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时而到荧光屏前，时而到化验室，时而到病床边；想把好多爱克斯光照片加以精选、描述，把自己的见解形诸文字并使之系统化，还有，答辩前先得通过及格考试——这一切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按理可以请半年假从事学术研究，但医院里从来没有病人毋需医生操心的时候，也不可能从某一天开始停止给三位年轻的住院医师进行答疑，自己离开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听别人说，列夫·托尔斯泰曾经如此评论他的一个兄弟：他具备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造就作家的缺点。大概她也缺少能使人成为副博士的那些缺点。总的说来，她不需要听人家在她后面窃窃私议："她不是普通医生，她是医学副博士董佐娃。"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前面加上排成小号字体、可是颇有分量的头衔（她已发表过十多篇论文，不是大文章，但都言之有物）。诚然，钱多一点决不会是多余的。但要是得不到，也就算了。

即使不写学位论文，被称做科学社会工作的事情也够她忙的。在他们的医院里，经常举行临床解剖学术讨论会，

分析诊断和治疗的错误，提出关于新方法的报告。这些活动必须出席并且必须积极参加（尽管放射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本来也每天在共同商讨，分析错误，采用新方法，但学术讨论会还是照样举行）。市里还有一个爱克斯光学会，定期举行报告会、展出爱克斯光照片。前不久，肿瘤学会也成立了。董佐娃不仅是那里的会员，还担任秘书；同一切草创期的工作一样，那里的忙乱可真够瞧的。还有医师进修学院。还要同爱克斯光学报、肿瘤学报、医学科学院、情报中心通信。结果，虽然大学问似乎都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做，他们只须在此地给人治病；但事实上没有一天完全用于治病而无需为科学忙碌。

今天也是这样。她得给爱克斯光学会主席打电话，谈一谈她不久要做的报告。还得马上看两篇杂志上的短文，给莫斯科复一封信。另外还得答复某偏僻地区肿瘤防治站要求答疑的来信。

再过一会，一位外科女医生做完一天的手术后，将按约定的时间请董佐娃给她的一名妇科女病人会诊。而在门诊结束之前，还得带自己的一名住院医师去看一下另一个从塔沙乌兹来的可能是患小肠肿瘤的病人。

她自己还定于今日同爱克斯光技术员们研究如何提高设备利用率，以便给更多的病人照射。给卢萨诺夫注射恩比兴的事也别忘了，得上去看看；这类病人他们此地还是不久前刚开始自己治疗，过去是转莫斯科处理的。

可是她却在跟顽固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抬杠上头浪费时

间！这种工作方法简直是开玩笑。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负责给伽马射线机安装附属设备的技工已两次从门外探头进来。他们要向董佐娃证明，必须实行一些没有编入预算的施工方案，希望她给他们签发施工单并说服院长同意。他们正拉着她一起到院长室去，但在走廊里护士递给她一份电报。电报是安娜·扎齐尔柯从新切尔卡斯克打来的。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和通信，但这是她要好的一位老朋友，一九二四年，还在进医学院之前，她们就是萨拉托夫一所助产学校的同学。安娜来电说，她的儿子瓦吉姆今天或明天将从地质勘探队转到她医院里来，她要求老朋友对他多多关照，并把他的病情据实告诉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激动起来，撇下技工，先去要护士长把阿卓夫金的床位保留一天，准备给瓦吉姆·扎齐尔柯。护士长米塔照例在医院里到处跑，找她不是很容易的。后来总算找到了，她答应把床位留给瓦吉姆，接着却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了个难题：市工会要放射科最好的护士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去参加工会司库学习班学习十天，这十天工夫得找一个人顶她的工作。这件事情实在岂有此理，董佐娃当即和米塔一起踏着坚定的脚步，穿过好几间屋子到挂号处去给区工会委员会打电话回绝他们。但电话先是这里有人打，接着又是那边占线。后来对方把这事推开，叫她们打电话到州工会委员会，而州里对她们如此缺乏政治责任心表示惊讶，难道她们认为工会的财务工作可以听之任之？看来，州里的、区里的那些人，本人和家属都没有

患过肿瘤，而且他们以为将来也不会得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顺便给爱克斯光学会挂了个电话，然后急忙去找院长求援。可是院长正在跟一些陌生人商量精打细算地按拟定的计划修葺他们那栋楼的一排侧屋。暂时一切都不得要领，于是她穿过今天她不在那里工作的爱克斯光诊断室回到器械室去。那里正是间歇时刻，护士在红灯下记录结果，见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回来，立刻向她报告：经过盘点，底片存货按目前的消耗量顶多只够用三个星期。这就是说，工作势必要停顿，因为定购底片至少一个月以后才能交货。由此董佐娃认识到，今天或明天一定得把药剂师找去见院长（这不是件容易事），要他们发出定单。

接下来，伽马装置的技工在半道上把她拦住，她在施工单上签了字。顺道就到爱克斯光技术员那里去了一下。她坐下来，跟技术员们一起计算。根据历来的技术规程：器械在工作一小时后应当休息半小时，但这一条早已无人遵守，所有的爱克斯光器械都是连续九小时工作，也就是放射科一班半的工作时间。尽管机器的负荷这样重，尽管熟练的技术员在机器下面更换病人的速度也很快，但还是来不及做需要的那么多次数。应当让门诊病人每天照一次，住院病人每天两次（就象从今天起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规定的那样），以便加强对肿瘤的冲击，也可以加快病床周转。为此，他们瞒着技术监督把电流从十毫安改成二十毫安。这样，速度提高了一倍，但是射线管的寿命显然也要缩短。即使如此还是周转不过来。所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

天来到这里准备在名单上做记号，同意对哪些病人作若干次不用保护皮肤的一毫米厚铜滤器的照射（这也能把每次照光的时间缩短一半），对哪些病人则用半毫米厚的。

随后她登上二楼，去看看卢萨诺夫打针以后情况如何。接着又回到已在继续给病人照光的短焦距器械室，正要着手整理自己的文章和信件，这时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很有礼貌地来敲门求见。

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只不过是放射科的一名清洁女工，然而谁也不好意思对她称“你”、丽扎，或象年轻医生对老年工友那样称呼“丽扎阿姨”。她是个很有教养的女人，值夜班有空的时候往往坐着看法文书籍，可是不知何故却在肿瘤医院当清洁工，而且工作也很认真负责。诚然，她在此地领一个半定额的工资，有时这里还发百分之五十的津贴，补偿爱克斯光对健康的危害，不过给工友的津贴只有百分之十五。尽管如此，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却始终留在此地。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她说时微微弯腰表示歉意，就象特别注重礼数的人那样。“我很不好意思为一点点小事来打搅您，可我实在没有办法！要知道，抹布没有了，全用光了！拿什么来抹桌椅呢？”

是啊，这倒是够伤脑筋的！部里规定给肿瘤医院提供镭针、伽马炮、稳压设备、新式输血仪器、最新的合成药品；可是这样堂皇的单子上不可能包括普通的抹布和普通的刷子。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回答说：“既然部里没有规

定，难道要我自己掏钱给你们买？”有一个时期把旧衬衣撕掉做抹布，可是总务部门发觉了下令禁止，怀疑有人从中贪污新的内衣。现在破旧的衬衣必须送交指定地点，由权威验收人员注销以后再撕掉。

“我想，”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说，“假如要求我们放射科的全体工作人员每人从家里带一块抹布来克服困难，您看行不行？”

“也只能如此，”董佐娃喟然兴叹，“恐怕没有别的办法。我同意。请您把这个建议跟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说一下……”

对了！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本人还需要设法留住呢。他们把一个最有经验的护士抽出去脱产学习十天——这简直荒唐！

于是她去打电话。还是没有结果。接下来马上去看从塔沙乌兹来的病人。她先坐在黑暗中让眼睛适应一下。后来她看了病人小肠里的钡粥，自己一会儿站着，一会儿把防护板放低当桌子，让病人朝一边侧卧，又朝另一边侧卧，以便拍片。她戴着橡皮手套揉压病人的腹部，根据他叫疼的部位察看模糊的斑点和阴影。然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把照片转到诊断室。

就在为这一连串事情忙碌的过程中，她的午饭休息时间已经过去，只是她从来不觉得。即使在夏天，也看不见她拿着夹肉面包到花园里去休息一会。

她马上被请到换药室去会诊。外科医生先向柳德米

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介绍病史，然后把女病人叫来看了一下。董佐娃得出结论：只有一个办法可能救她——摘除子宫。才四十来岁的病人哭了起来："这样一来，生活不是完了吗?!……丈夫非把我抛弃不可……"医生让她哭了几分钟。

"您别告诉丈夫动了什么手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给她出主意。"他怎么会知道呢？他永远不会知道。您可以把事情瞒起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使命是救人的性命，这是毫不含糊的，因为病人到了他们医院里事情几乎总是性命攸关的；她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能救人性命，任何残缺都是划得来的。

可是今天，她在医院里东奔西走，总觉得她的信心、勇气和魄力整天受到牵制。

这是不是她自己胃部明显感到疼痛的缘故？有几天她不觉得疼，有几天比较缓和，今天比较厉害。如果她不是肿瘤专家，她不会把这点疼痛当作一回事，或者相反——毫无顾虑地去检查。但她对这根线太熟悉了，不会轻易地把它绕上第一圈——告诉家里，告诉同事。她本人暗暗抱着俄国人的侥幸心理：也许问题不大？也许只是神经性的感觉？

不，整天妨碍着她、使她感到象扎上刺似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另有原因。这种感觉相当模糊，但很顽固。直到现在，她回到自己角落里的桌子旁边，碰着了被目光锐利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放射病》原稿，她才明白，同他就治

病的权利展开的争论不仅整天使她激动，而且刺痛了她的心。

她还听见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二十年前您也给某一个科斯托格洛托夫照过光。当时他恳求您不要照，可是您还不知道有放射病！"

她确实不久要在爱克斯光学会做一篇题为《关于迟发放射性病变》的报告。几乎正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指责她的那一点。

还在不久以前，不过一两年，她和其他爱克斯光专家（包括这里的、莫斯科和巴库的）曾遇到这样一些起初不能理解的病例。开始只是有所怀疑。后来明白了。他们开始就这个问题互相通信、交谈——暂时还不在报告中讨论，而是在报告会的休息时间交换意见。这时有人从一本美国杂志上读到一篇学术论文，以后又读到一篇。美国人那儿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例渐见增多，病人陆续前来诉苦；忽然，这一切得到了一个名称："迟发放射性病变"。于是就到了从讲台上讨论这类病例并采取措施的时候。

这个名称指的是：有些病人十年、十五年前经过大剂量照射爱克斯光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辉煌的疗效，可是现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现坏死和畸形。

如果很久以前照射的对象属于恶性肿瘤，那也无可惋惜，至少是划得来的。即使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当时采用了唯一的方法拯救病人免于必死的厄运，而且必须用大剂量，因为小剂量不起作用。带着残疾前来的

病人应当明白，这点残疾是为他已经额外度过来的岁月以及还余下可活的几年付出的代价。

然而在还没有“放射病”这个名称的当时，即十年、十五年、十八年前，爱克斯光照射被看作是现代医学技术不容置疑、绝对可靠的了不起的成就，如果给劳动者治病不采用这种技术或者另找平行或绕行的方法，就被认为思想跟不上，简直是消极怠工。当时只担心严重的早期组织损伤和骨头损伤，但当时就懂得了如何避免这种损伤。于是就照哇！劲头十足地照哇！甚至对良性肿瘤也照。甚至小孩子也照。

而现在这些小孩子已长大成为男女青年，有的结了婚，却带着无法挽回的残疾来求医，患处正好是当初照得不亦乐乎的那些部位。

去年秋天来了这样一个病人，不是到癌症楼，而是到外科楼。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知道了，也去看了一下。那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他一边的手和脚在发育上比另一边差，甚至颅骨也是如此，因而他从下到上有点呈弧形，跟漫画里一样奇形怪状。经对照病史档案，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确定他就是当年由母亲带到医院里来的一个两岁半的男孩，骨头有多处病因不明的损伤，但性质完全不属于肿瘤，代谢功能遭到严重破坏。当时外科医生就把他转到董佐娃那里碰碰运气，说不定爱克斯光对之有效。董佐娃给他照了爱克斯光，果然有效！而且效果极好；母亲高兴得哭了，说永远忘不了她的救命之恩。

现在他是一个人来的——母亲已经去世，现在谁也没

有办法能帮助他，谁也不能从他的骨头里抽回过去照的光。

最近，已经是一月底，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来诉说没有奶水。她不是直接到此地来的，而是由一座楼转到另一座楼，最后才转到肿瘤医院。董佐娃记不起她是谁，但由于他们医院里的病历卡是永久保存的，便到堆放档案的小仓库里去翻了一通，找到她一九四一年的病历卡，从中得到证实，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经来过，很听话地躺到爱克斯射线管下照一个现在谁也不会用这种手段来治疗的良性肿瘤。

董佐娃只能在老卡上继续写上：软组织萎缩，根据各种迹象看来是迟发放射性病变。

当然，谁也不会向这个畸形的少年和不幸的年轻母亲说明，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治疗不对头。这样说明对个人无益，对公家也不利——不利于向人民作卫生宣传。

但这些病例在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本人思想上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她痛心地感到一种无法赎偿和不可挽回的罪愆——而今天恰恰被科斯托格洛托夫击中要害。

她交叉着胳膊抱住两肩，在房间里两台已经关掉的机器之间一条狭窄的通道上，从门口走到窗前，从窗前走到门口。

但是，可以不可以提出医生给人治病的权利？如果老是提心吊胆，怀疑每一种今天在科学上得到认可的疗法，担心它将来会不会被否定或推翻，——如果这样的话，鬼知道会搞成什么样子！要知道，甚至阿司匹灵造成死亡的例子

也有记载：有人吃了生平第一片阿司匹灵，就死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根本没法治病！根本没法从事日常工作为人造福。

这条规律大概具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做事的人做出的结果总是一分为二的——既有益处，也有害处。只不过有的益处多些，有的害处多些。

但是，无论她怎样安慰自己，无论她怎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幸的病例连同诊断错误、措施不当或为时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在她所做的工作中也许还占不到百分之二，而被她治好的、救活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正在田间、草地和沥青路上走，在空中飞，在摘棉花，爬电杆，扫马路，站柜台，坐在办公室或茶馆里，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人数成千上万，其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也不是所有的人会把她忘掉的；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更可能把他们忘记，忘记自己治得最好的一些病例，忘记得来最不易的胜利；——无论怎样，她却至死忘不了那少数几个中头彩的苦命人。

这是她的记忆的特点。

不，她今天已不可能准备那篇报告，而且时间也快下班了。（要不要带回家去？十之八九是徒劳的，过去她也这样带去带来过几百回。）

只有一件事还来得及做——那就是把《医疗放射学》上的几篇文章读完，复信给塔赫塔库佩尔的那位医士，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阴暗的窗外透进来的光线愈来愈不行，她开了台灯坐下来。一个已经脱去白大衣的住院医师走进房间，问道：

“您还不走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

薇拉·甘加尔特也进来问：

“您还不走？”

“卢萨诺夫怎么样？”

“睡着了。没有呕吐。热度有一点。”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脱去不开襟的白大衣，露出里边一件灰绿色塔夫绸连衫裙——工作时穿似乎太好了些。

“经常穿您倒舍得？”董佐娃朝她身上点点头问。

“为什么舍不得？藏着干什么？……”甘加尔特想作一个微笑，但结果却有点可怜巴巴。

“好吧，薇洛琦卡，既然如此，下一次就给他全剂量，十毫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很快地说完，又继续给医士复信。逢到言语只会浪费时间的情况，她照例这样处理问题。

“那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呢？”甘加尔特已经到了门口，又轻声问道。

“我们打了一仗，但他吃了败仗，屈服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微微一笑，忽然又觉得胃部一阵抽痛。她甚至想立即把薇拉作为第一个对象向她诉说，但在幽暗的房间深处看到薇拉穿着漂亮的连衫裙，足登高跟鞋，象准备出去看戏似的。

于是她决定到下一次再说。

大家都走了，她还坐着。在这儿间每天受到照射的屋子里多待上半个小时，对她来说毫无好处，但事情总是摆手不开。每年度假时，她老是面色灰白，白血球整整一年连续下降，跌到了两千——如果把一个病人弄到这般地步，简直是犯罪。一个放射科医生按规定只能看三只胃，而她一天要看十只，战时甚至看到二十五只。每到度假前她自己就需要输血。度一次假也恢复不了一年损失的健康。

但是，欲罢不能的工作轻易不肯放她走。每天下班时，她总是遗憾地看到，工作又没来得及做完。现在，她在考虑别的事情中间再次为西布加托夫的厄运陷入深思，并记下了在学会见到奥列宪科夫医生时向他请教哪些问题。如同她带领这三名住院医师走上独立工作的道路一般，战前，奥列宪科夫医生也是那样把着手儿小心翼翼地向她传授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他一再告诫："柳多琦卡，千万不要搞专业化过了头，变成一条鱼干！即使全世界都搞专业化，您也要顶住，坚持一手抓爱克斯光诊断，一手抓深度爱克斯光治疗。哪怕全世界只剩下一个这样的医生，您就做最后的一个！"他至今还健在，就住在本市。

她已经关了灯，又从门口回来记下明天要做的事。她穿好了蓝色的新大衣，还折向院长室——但是门已上锁。

最后，她下了夹在白杨树中间的台阶，沿着医疗中心的小径走去，但思想还惦念着工作，她甚至不设法也不愿意从中摆脱出来。天气说不上是什么个样儿——她根本没注意。还没有到黄昏时分。在医疗中心的园径上遇到好多陌

生面孔，一个女人这时通常会表现出很自然的好奇心——看看什么人身上穿什么，头上戴什么，脚上登什么。然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无心于此。她一路眉头皱紧，以锐利的目光注视所有这些人，似乎在给这些人身上今天还感觉不到、但明天可能出现的肿瘤定位。

她这样走着，经过设在医疗中心内的茶馆，还从一个乌兹别克男孩身旁经过（他常在此地卖用报纸包成漏斗状的一包包巴旦杏仁），来到大门口。

看门的是个警觉而又爱吵架的胖女人，她只放健康的人出大门，病人到这里都被她大声叱喝赶回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出这座大门，应当从工作环境转向家庭生活。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她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不是平均分配的。除了睡眠以外，她把精神最好的那一部分时间花在医疗中心，而出了大门以后和早晨进门之前很久，有关工作的种种想法还象蜜蜂一样盘旋在她的头脑周围。

她把寄往塔赫塔库佩尔的信投入邮筒。然后穿过马路走到电车终点站。她要乘的那路电车当当地掉过头来。人们从前门和后门纷纷上车。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急忙去占一个坐位——这是离开医院以后的第一个念头，她由此开始从主宰病人命运的医生变成被别人挤来挤去的普通电车乘客。

电车沿着年代已久的单线轨道轰隆隆驶过，在交岔站停靠很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视而不见地望着窗

外，这时，她头脑里还在思考穆尔萨里莫夫肺部出现的转移，思考打针对卢萨诺夫可能发生的影响。今天他在病房里发表那一通宏论的训人腔调和威胁性口吻，从上午起被其他事情淹没了，现在下班以后又显现出不快的沉淀，够她晚上和夜里消受的。

电车上许多女人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样，不带小巧的女式提包，而是带着塞得进一头活猪仔或四只大面包的大拎包。电车每过一站，窗外每掠过一家商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就愈来愈被有关家务的念头所控制。家里的事都由她承担，也只有她承担，因为男人们什么也干不了。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这样。有一次她去莫斯科开会，他们一个星期连碗盆也没洗过；倒不是故意留着等她来洗，而是认为这种周而复始的老一套工作没有意思。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还有一个女儿——尽管已经出嫁，并且有了一个小孩，可是跟没有丈夫差不多，因为正在闹离婚。一天来现在第一次想起自己的女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并不感到高兴。

今天是星期五。这个星期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定要大规模洗一次衣物。积下的实在太多了。那就是说，下星期前半期的菜无论如何要在星期六晚上做好(她每星期做两次菜)。今天晚上就得把要洗的东西浸湿，不管什么时候上床。现在，也只有现在，还得上中心市场去一次；虽然时间已晚，不过那里即使到了晚上也有摊子。

她在需要换乘另一路电车的地方下了车，但她向邻近

的食品店橱窗里张望了一下，决定进去瞧瞧。肉食柜空空如也，营业员也走了。鱼类柜没什么可买，只有鲱鱼、鲽比目鱼、罐头。她从色彩缤纷的一排排瓶酒和简直跟香肠同样呈褐色的一颗颗圆头干酪旁边走过去，打算在杂品柜买两瓶葵花子油（在这以前只有棉籽油）和一袋压缩大麦片。于是她穿过气氛平和的店堂，在收款处付了钱，回到杂品柜取货。

但是正当她站在两个人后面等拿东西的时候，店内掀起了一片喧闹声，人们从街上蜂拥而至，纷纷在熟食柜和收款处排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打了个哆嗦，不等杂品柜把东西给她，急忙三脚两步也去排队，在售货处和收款处各占好一个位置。在弯曲的有机玻璃柜台里边还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挤挤插插的妇女都说将有火腿碎肉香肠出售，每人可买一公斤。

她的运气好极了！稍晚一点再排第二次队也许还来得及。

第　八　章

人靠什么过活？

若非颈部被瘤肿包围，叶甫列姆·波杜耶夫还是个年富力强的汉子。他还未满五十岁，肩膀结实，两腿有力，头脑健全。与其说他象一匹拉大车的马，不如说更象一匹骆驼，干完八小时以后还能同前一班一样再干八个小时。年轻时，他在卡马河上惯于搬运百把公斤重的货包；当年的那份力气至今并未大减。现在，逢到需要跟工人们一起把混凝土搅拌机推上高台时，他也不退缩。他到过许多地方，干过无数行当，包括敲砸挖掘、物资供应、建筑施工；面值小于十卢布的钞票不屑点数，半升伏特加下肚脚步不晃，超过一升也就适可而止。他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形成的观念是：叶甫列姆·波杜耶夫面前没有尽头，没有界限，他将永远如此。虽然力气这么大，他却没有上过前线（他作为专业建筑工人免服军役），没有尝过负伤和住医院的滋味。他也从未生过大病，流感、时疫碰不着他，连牙疼也没有过。直到前年才第一次患病，谁知一下子就得了这玩意儿——癌。

现在他一开口就是“癌”，而当初有很长一个时期他始终强自镇静，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还

熬得住，就一直拖着，不去找医生。等到去找医生了，他从一个科被转到另一个科，转来转去，转到了肿瘤科；然而这个科对所有的病人都说，他们害的不是癌。叶甫列姆不愿弄明白他害的是什么病，不相信自己的理智，而相信自己的愿望：他生的不是癌，会好的。

而叶甫列姆最初发病的地方是舌头——灵活的、好端端的、不引人注目的、自己的眼睛从来不能直接看到而在生活中又如此有用的舌头。将近五十年来，他这条舌头可谓训练有素。他凭这条舌头为自己争到本来挣不到的工资。既用来跟领导吵闹，也用来向工人咆哮。他骂起娘来刁钻促狭，总是对准被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要害大做文章，象夜莺一样陶醉于自己的美妙花腔。他讲的笑话相当粗鄙，但绝不涉及政治。他会唱伏尔加河流域的歌谣。他向遍布各地的好多娘儿们撒过谎，说自己没有老婆孩子，说一个星期以后就回来盖房子。“啊，愿上帝罚你烂掉舌头！”——他的某一个短期丈母娘曾这样诅咒他。但叶甫列姆的舌头只有在他酩酊大醉的时候才不听使唤。

忽然，这条舌头开始膨胀起来，老是跟牙齿互相磕磕碰碰，以致柔软滋润的咽头容它不下。

而叶甫列姆还是满不在乎，在伙伴们面前龇牙咧嘴地说：

“波杜耶夫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他们也说：

“是啊，波杜耶夫的意志过得硬。”

其实这并不是意志过得硬，而是超等的恐惧。他不是靠意志，而是出于恐惧赖着继续工作，尽可能推迟做手术。波杜耶夫一辈子所作的准备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死去。这种过渡他是受不了的，他不认识这种过渡的途径，便一再排除这个念头，反正没有病倒，天天照常上班，听别人夸他意志坚强。

给他动手术他不肯，开始的时候先用针疗：象在地狱里对有罪的鬼那样往他舌头里扎针，几天几夜不得动弹。叶甫列姆心想，吃了这番苦头可以没事了吧，所以抱着很大的希望。然而不是这样，舌头愈胀愈大。叶甫列姆从自己身上再也找不到那种坚强的意志，只得把倔强的大脑袋伏在铺着白布的门诊桌上，同意开刀。手术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做的，做得非常出色。同事前说明的一样，舌头截短了，变窄了。他很快就开始重新习惯于伸缩转动，重新学会跟过去一样说话，不过口齿也许不象过去那样清楚。他又被扎了一些针，放回去后又叫来，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

"你过三个月再来，我们还要给你动一次手术——在颈部。这次是小手术。"

但是脖子上的这种"小手术"波杜耶夫在这里看够了，所以到时候没有去。医院一再发信通知他，他理也不理。他习惯于不在一个地方久居，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远走高飞，哪怕到科累马河上去，到哈卡斯去都行。① 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财产、房子和家室之累，他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

活和身边口袋里的钞票。不过，他还是忍住了没走。医院的来信说：如果再不去，要通过民警把他押去。瞧，肿瘤医院甚至对于根本没有生癌的人也有偌大的权力。

他去了。当然，他还可以不同意开刀，但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摸了摸他的颈部，狠狠地骂他耽误了病情。他的脖子左右两侧都动了手术，象挨了流氓的刀子似的。他缠着绷带在医院里躺了很久，让他出院时医生们都连连摇头……

他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劲头儿不再象过去那样大，工作、玩乐、喝酒、抽烟都感到意兴索然。他脖子上的玩意儿不是趋于柔软，而是愈来愈硬，愈来愈重，老是象针在扎，甚至象有无数小箭射向头部。肿瘤沿着脖子往上爬，几乎碰到耳朵。一个月以前，他又回到这栋用灰色砖头砌得挺结实、砖缝光洁齐整的老房子前，登上夹在白杨树中间、被无数双脚磨得滑溜溜的台阶。外科医生们象接待亲人似地立即把他留住不放，于是他又穿上条纹病人服，还是在手术室附近窗子抵着后院围墙的那间病房里等待给倒霉的脖子做第二次（总计起来则是第三次）手术。叶甫列姆·波杜耶夫不能再自欺欺人。他承认自己生了癌。

现在，为了争取平等，他向同室所有的病人断言，他们也都得了癌症。谁也甭想逃出这个地方。即使出了院也要

---

① 科累马河在苏联亚洲部分东北部，注入东西伯利亚海；哈卡斯是一个民族自治州，属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靠近蒙古西北边境。——中译者注

回到这里来。倒不是他有践踏别人、听骨头折裂声的癖好，而是要别人面对现实，不要自欺欺人。

后来给他做了第三次手术，比过去的更疼、更深。但手术后进行包扎时，医生们似乎没有愉快的表情，而是用外国话没好气地互相交谈，用纱布给他愈缠愈紧，愈缠愈高，使脑袋和身体牢固地连在一起。他头部的射痛更厉害、更频繁了，几乎接连不断。

何必装腔作势呢？生了癌就得作好癌以后的准备，也就是正视两年来他一直眯缝起眼睛、掉过头去只做没看见的事实：是叶甫列姆倒毙的时候了。抱着对自己幸灾乐祸的心情反而轻松些：不是死，而是象一条狗那样倒毙。

但这话说说容易，头脑却不能想象，心灵也无法体验：他叶甫列姆怎么可能倒毙？这怎么会发生？该怎么办？

他用干活作掩护，挤在人们中间尽量规避这一事实，现在事实终于跟他狭路相逢，通过绷带掐住了他的脖子。

从其他病人那里，包括楼上、楼下、病房里、走廊上的，他不可能听到什么金玉良言。所有的话都说过许多遍，一概不是味儿。

于是他开始象钟摆似地从窗前摆到门口，又从门口摆到窗前，一天走五六个小时。他这是寻求解脱的办法。

叶甫列姆一生只有几个大城市没去过，边陲地区他都走遍了。他和其余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一个人要末掌握很好的专业技能，要末掌握在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本领。这两者都是生财之道。人们互相结

识的时候，道过姓名以后紧接着就要问：在哪儿工作？挣多少钱？如果一个人挣钱不多，那末不是傻瓜蛋就是倒霉蛋，反正不怎么样。

波杜耶夫这些年在沃尔库塔、叶尼塞河、远东、中亚看到的始终是这样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人们挣的钱很多，然后就把钱花掉——有的人每逢星期六出去花钱，有的人在度假时一下子花光。

这样的生活可以过得挺好，直到得了癌症或其他致命的病为止。一旦得了这种病，那末，他们的专业技能、钻营本领、职务、工资统统变得一文不值；无论是他们束手无策的精神状态，还是死不承认自己生癌的鸵鸟作风，都说明他们是脓包，把人生的一件大事忽视了。

那末究竟忽视了什么呢？

叶甫列姆从少年时代起就听人家说，而且自己也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年纪虽小，却胜过他们的老子。他们的老子一辈子连城里也不敢去，而叶甫列姆十三岁就能骑马打枪，近五十岁时整个国家象个娘儿们似地被他全摸遍了。可是现在，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回想他们家乡卡马河一带的那些老人是怎样死的。他们——不管是俄罗斯人、鞑靼人，还是沃蒂亚克人——都不逞英雄，不说大话，不吹嘘他们不会死掉。他们都是老老实实迎接死亡的。他们不但不拖欠债务，而是悄悄地做好准备，预先指定把母马给谁，马驹给谁，呢上衣给谁，靴子给谁。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没有精神负担，仿佛只是搬到另一所房子里去住。癌吓唬不了他们

中间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得过癌症。

而在此地医院里，人已经在吸氧气袋，眼珠子都快转不动了，可嘴巴还要硬说：我不会死！我没有生癌！

简直跟一群鸡差不多。事实上每一只都得在喉管上挨一刀，可是它们还咯咯地自言自语，到处觅食。一只被抓去宰了，其余的照旧刨土觅食。

波杜耶夫日复一日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把旧地板踩得颤个不停，但在究竟该如何迎接死亡这个问题上，他心中丝毫也没有亮堂起来。这事儿不能凭空瞎想，又没人告诉他。至于能在哪一本书里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更不存幻想。

当年他念过四年小学，后来也在建筑工人训练班学习过，但自己没有阅读的愿望，因为不看报反正有广播，而书在他心目中完全是多余的东西。他在那些荒凉的边远地区混了大半辈子(因为那里工资高)，也没见过太多爱读书的人。波杜耶夫只读非读不可的东西——交流经验的小册子、起重机械的说明书、操作规程、公告命令，《简明教程》只读到第三章①。花钱买书或者跑图书馆去借，他认为简直可笑。在远行的旅途中或等候什么的时候，要是碰巧拿到一本书，顶多看上二三十页就撂下了，因为从中找不到任何指导人们过日子的诀窍。

医院里的床边小柜和窗台上也摆着书，他从来不去碰

① 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包含较多的哲学理论，其中第二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译者注

一碰。这本烫着金字的蓝封面的书他本来也不会去读它，但科斯托格洛托夫正好在最无聊的一个晚上塞给他这本书。叶甫列姆把两只枕头垫在背后，开始翻阅。如果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他也不想看下去。但这是一本小故事的集子，每一篇的情节只用五六页就交代清楚，有的甚至只有一页。目次上篇名多如牛毛。波杜耶夫开始读各篇的标题，他一下子就感觉到里边似乎言之有物。«劳动、死亡和疾病»。«主要的法则»。«源泉»。«漏过了火种就扑不灭»。«三个老者»。«趁有光的时候走在亮处»。

叶甫列姆打开较短的一篇，把它读完了。他想思考一下。他思考了。想把这篇小故事重读一遍。重读了。又想思考一下。又思考了。

第二篇看过后也是这样。

这时灯熄了。为了不让书被别人捞去，早晨又不需要找，叶甫列姆把它塞在自己褥垫底下。黑暗中他还向阿赫马章讲真主分配寿命的古老寓言，说人得到了好多无用的寿命（不过，他自己不信这话，无论怎样的寿命他都不认为是无用的，只要身体健康）。入睡之前他还在思考看过的几篇小故事。

可是头部的射痛实在受不了，并且妨碍思索。星期五的早晨天空阴沉沉的，同医院里任何一个早晨一样令人发愁。在这间病房里，每一个早晨都从叶甫列姆不祥的话开始。要是有谁说出一个希望或心愿，叶甫列姆立刻给他泼冷水，煞风景。但今天他死也不愿意开口，一早就摆好姿

势读这本使人心平气和的书。洗脸对他来说几乎是多余的，因为连他的腮帮子都缠着绷带。早饭可以在床上吃，反正手术病人今天没有医生来巡诊。叶甫列姆慢慢地翻着这本书粗糙厚实的纸张，默默地读着、思索着。对放射科病人的巡诊结束了，那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家伙先把医生熊了一通，后来胆怯了，给打了针；右边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坐立不安，出去了一段时间才回来；阿卓夫金今天出院，跟大家告别后，弯着腰捧住肚子走了；其他病人有的被叫去照爱克斯光，有的去输血。可是波杜耶夫始终没有下床来徘徊于床位之间的通道两端，他一声不吭地在看书。这本与众不同的书在与他进行饶有兴味的谈话。

他活了一辈子，这样真正值得一读的书还没有看到过。

当然，要不是这个脖子射向头部的疼痛感迫使他躺在这张病床上，他未必会去读它。这些小故事不大可能打动一个健康的人。

叶甫列姆昨天就注意到这样一个题目：《人们靠什么活着?》。这个标题是那么言简意赅，仿佛是叶甫列姆自己拟就。最近几个星期，他在践踏医院地板的时候，虽然没有说出来，事实上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人们靠什么活着?

这篇故事不算太短，但从一开头就柔软而亲切地贴在你心上，读起来毫不费力。

一个鞋匠带着老婆孩子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既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地，全靠干皮匠活维持一家的生计。面

包很贵，活儿不值钱，挣来的钱都吃掉了。鞋匠跟老婆两人只有一件皮袄，而且已经穿得破破烂烂。

这些都很明白，接下去也很容易懂：谢米昂自己身量细长，帮手米海拉也瘦瘦的，可是老爷——

……象是另一个世界的人：面孔红彤彤、胖乎乎，颈项象牛脖子，全身犹如生铁铸成……。过着这样的日子自然会面团团心广体胖。这座铁塔大概连死神也奈何他不得……

叶甫列姆见到过不少这样的人：煤炭托拉斯的经理卡拉修克就是这样，安东诺夫也是，还有切切夫、库赫季科夫……叶甫列姆自己不是也开始有点儿象这类人物了吗？

波杜耶夫慢慢地、逐字逐句读完了这篇故事。

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叶甫列姆既不想走路，也不想说话。好象有什么东西进入他的身体把一切都倒了个过儿。原来有眼睛的地方，现在眼睛没有了。原来是嘴的地方，现在嘴没有了。

医院反正已从叶甫列姆身上刨下了第一层粗木花。现在尽管刨吧。

叶甫列姆还是那样，枕头垫得高高的，曲着两腿，合拢的书搁在膝旁，眼睛望着空无一物的白色墙壁。外面天空中阴云密布。

叶甫列姆对面床上那个白脸盘疗养客打针以后一直睡着。因为他冷得直打颤，就给他盖得厚一些。

旁边床上，阿赫马章在跟西布加托夫下跳棋。他们各自的语言不大一样，所以互相用俄语交谈。西布加托夫坐的姿势要使背上患处不歪不曲。他年纪还轻，可是颅顶的头发已稀稀落落。

而叶甫列姆的头发却一根都没有脱落，还是蓬蓬勃勃的一片棕色密林——进去了出不来。至今他还保存着对付娘儿们的全部精力。然而好象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叶甫列姆究竟搞过多少娘儿们，简直难以想象。起初他还记个数，另一本账则记有过几个老婆。后来懒得记了。他的第一个妻子阿米娜是耶拉布加的一个鞑靼姑娘，雪白的脸蛋嫩得不得了：她脸上的皮肤只要指甲稍微碰一下，立刻出血。但她性情倔强，是她主动带着一个小女孩子离开了他。从此叶甫列姆不甘心再丢这个脸，总是自己主动把娘儿们抛弃。他过的是候鸟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今天应某处招工，明天同某处订合同。要是拖着一个家，多么不方便。他在任何新地方都能给自己找到主妇。至于随便搭上的女人，自愿的也罢，不自愿的也罢，他有时连个名儿也不问，只按定约付钱。现在她们各人的面貌、习性和有关的经过在他记忆中都混淆在一起，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否则没法一一记住。比方说，他记得的有工程师的妻子叶芙多什卡：战时，有一次在阿拉木图车站的月台上，她站在他坐的车厢窗下，扭摆着臀部，意欲同行。当时他们全班人马前

往伊犁开辟新矿区，托拉斯派了好多人给他们送行。叶芙多什卡的窝囊丈夫也站在不远处同某人争论什么事情。火车头已拉了第一声汽笛。

“嗨！”叶甫列姆喊着，伸出一双手。“要是喜欢，就上来，咱们一起走！”她果然抓住不放，当着托拉斯里的人和丈夫的面爬进车窗，跟他一起去住了两个星期。他怎样把叶芙多什卡拖进车厢——这样的事他记得。

总的说来，叶甫列姆根据一生接触的娘儿们得出结论：她们都是粘手的。把一个娘儿们搞上手很容易，甩掉可就难了。尽管到处都讲“平等”，叶甫列姆也不反对，可是他内心从来不把女人当作完全的人——除了第一个妻子阿米娜以外。如果别的男人认真指责他对待娘儿们不好，他会感到奇怪。

可是照这本奇妙的书说来，叶甫列姆简直错尽错绝。

灯比平时开得早一些。

那个有洁癖的牢骚袋醒了，从被窝里伸出秃脑袋，赶紧戴上那副教授眼镜。他立刻向大家宣布好消息：这一针打下去他不觉得什么，本来以为反应要更严重些。接着就打开小柜吃鸡。

叶甫列姆注意到，这些娇弱的贵人非鸡肉不吃。即使给他们羊羔肉，他们也说：“不消化。”叶甫列姆想看看别人，但这就需要把整个身躯转过去。朝正面看，他只能看到这个喜欢训人的家伙在啃鸡骨头。

波杜耶夫呼哧着小心地转向右边。

“这儿有一篇小说，”他大声说。“叫做《人们靠什么活着？》。”他淡然一笑。“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人们靠什么活着？”

正在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和阿赫马章抬起头来。阿赫马章——他的病正在好转——兴冲冲地回答：

“靠给养。伙食和被服。”

参军前他一直住在家乡敖尔里，只会讲乌兹别克语。所有的俄罗斯词儿和概念、纪律性和散漫性都是他从部队里学来的。

“谁再回答？”波杜耶夫用嘶哑的声音问。书上出的这个谜题对他说来相当突兀，对大家说来也不容易猜破。“谁再回答？人们靠什么活着？”

穆尔萨里莫夫老头不懂俄语，其实他可能比这里所有的人回答得更好。但正好一名男护士图尔贡——医学院的实习生——来给他打针，他回答说：

“靠工资呗！”

黝黑的普罗什卡从角落里象看商店橱窗似地留神注意着，甚至嘴巴也张开一半，但什么也没说。

“再来，再来！”叶甫列姆敦促着。

焦姆卡把自己在看的一本书放下，眯缝着眼睛考虑这个问题。叶甫列姆看的那本书也是焦姆卡拿到病房里来的，但他没有去看：那本书的内容完全不对他的胃口，犹如一个无声的谈心对象答非所问。它使人情绪松懈，思想混乱，而他需要的是行动的忠告。因此他没有读《人们靠什么活

着?»，不知道叶甫列姆所期望得到的答案。他在考虑自己的答案。

“来，小伙子！”叶甫列姆鼓励他回答。

“我认为，”焦姆卡象站在黑板前回答老师提问似地说得很慢，字斟句酌，唯恐答错，“首先靠空气。其次靠水。再其次靠食物。”

过去，要是有人问叶甫列姆，他也会这样回答。只是还会加上一件——伏特加。但这本书谈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咂咂嘴唇。

“还有谁能回答?”

普罗什卡决定试一试：

“靠技术。”

这话也对，叶甫列姆一辈子都是这样想的。

而西布加托夫叹一口气，不好意思地说：

“靠故乡。”

“这话怎么讲?”叶甫列姆感到奇怪。

“只要能住在自己的家乡……自己出生的地方。”

“啊……这倒不必。我年轻时就离开卡马河，有它没它对我说来都无所谓。反正就是一条河，有什么两样?”

“在自己的家乡，”西布加托夫低声坚持他的看法，“病缠不到身上来。在自己的家乡什么都好办。”

“得了。谁再说说?”

“说什么?说什么?”精神振作了些的卢萨诺夫插进来

问。"究竟是什么问题?"

叶甫列姆呼哧着向左边转过身去。靠窗的床都空着，只剩下这位疗养客。他用手捏住一条鸡腿的两端在啃着。

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好象是魔鬼故意安排的。叶甫列姆把眼睛眯起来。

"是这样的，教授：人们靠什么活着?"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假思索地回答，几乎连鸡腿也没有放下：

"这根本不存在疑问。记住：人们的生活动力是思想信仰和社会利益。"

说完，就把关节处最好吃的那段脆骨咬了下来。在这以后，除了爪子旁边的硬皮和垂着的筋，骨头上什么也没有了。于是他把剩下的放在小柜上的一张纸上。

叶甫列姆没有应声。这位娇弱的贵人回答得这样利索使他很不高兴。只要一提思想信仰，那就只好闭口不谈。

他打开书本，又专心读起来。他自己也想弄弄明白，究竟怎样才是正确的回答。

"那是本什么书?讲些什么?"西布加托夫放下棋子问。

"听着……"波杜耶夫念了开头的几行。"'一个鞋匠带着老婆孩子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既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地……'"

但朗诵起来比较费劲，时间太长，于是他靠在枕头上，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向西布加托夫复述，同时努力在头脑里把故事重新理一遍：

“总之，鞋匠开始借酒解愁。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把快要冻僵的米海拉带回去。老婆骂他，说自己日子也难过，怎么还带个白吃饭的回家。可是米海拉整天埋头干活，学会了绱鞋，而且比鞋匠手艺更好。有一回，那是在冬天里，老爷坐车到他们那儿，带来一张很贵的皮革，要定制一双穿上不走样、不脱线的靴子。倘使鞋匠把皮剪坏了，要他赔偿。米海拉奇怪地微笑着，他在老爷背后的角落里看到了什么。老爷刚走，米海拉就开始用这张皮裁靴子，结果剪坏了：统和面连成一整块的镶革条直拔式靴子已经做不成，只能做一双平底便鞋。鞋匠急得直跺脚，说：‘你是怎么搞的，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可是米海拉说：‘人总是为自己留着一年的储备，其实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活到晚上。’果然，老爷没到家，路上就死了。太太打发小厮来告诉鞋匠，说：靴子不要做了，快做一双便鞋给死人穿。”

“见鬼，完全是胡说八道！”卢萨诺夫咬牙切齿地说。“难道没有别的话题可谈吗？这是在宣扬什么思想？它的臭气一公里外都闻得到，肯定不是我们的道德观念！那里边究竟怎么说的：人们靠什么活着？”

叶甫列姆中断了复述，把一双血红的眼睛转向秃顶。他本来就很不高兴，因为秃顶差点儿把答案猜对了。书里写着，人们不是靠关心自己，而是靠对别人的爱活着。娇弱的贵人说的是“社会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两者是一致的。

“靠什么活着？”这话简直有点说不出口。听起来不大体面。“书上说是靠爱……”

“爱?!不，这不是我们的道德观念!”金丝边眼镜显得得意洋洋。“喂，这书是谁写的?”

“什么?”波杜耶夫的声音象牛叫。他的话头被引到另一个方向，离开了本题。

“我问这书是谁写的?作者是谁?……你看看第一页上面的姓名。”

问姓名干什么?它跟本题，跟他们的病有什么关系?跟他们的生死问题有什么相干?叶甫列姆看书没有看作者姓名的习惯。即使看了，也随即忘记。

现在他还是把书翻到第一页，念出声来：

“托尔……斯泰。”

“不可能!”卢萨诺夫立刻提出抗议。“托尔斯泰?请注意：托尔斯泰只写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作品，否则他的书就不会出版。《粮食》、《彼得大帝》。告诉你们吧：他是三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这不是那个托尔斯泰①!”焦姆卡从角落里插话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列夫·托尔斯泰。”

“啊，不是那个?”卢萨诺夫拖长了声调说，部分是感到问题解决了，部分是表示轻蔑。“啊，原来是另一个……。是不是那个俄国革命的镜子、糯米丸子?②……你们那个托尔

---

① 卢萨诺夫以为作者是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1945）。——英译者注

② 列宁在评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及其素食主义时的用语。——英译者注

斯泰太软弱了！他在不少问题上，在好多好多问题上缺乏认识。对恶必须抵抗，小伙子，同恶必须斗争！”

“我也这样想，”焦姆卡声音低沉地应道。

第 九 章

Tumor cordis

外科医生照例都目光坚定，额上有刚毅的皱纹，上下颌啮合时显示出钢铁般的意志，整个面貌智慧洋溢。可是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几乎不具备其中任何一项特征。这位外科主治医师年纪虽过半百，如果她把头发全部塞进医生的小帽，看到她背影的人常常招呼道：“姑娘，请问……”她就象俗话所说的那样：背影象个少先队，正面足有六十岁。她的下眼皮垂得很低，眼睛好象呈浮肿状，老是倦容满面。她经常涂鲜艳的口红来冲淡这种印象，但口红每天须涂好几次，因为老是被烟卷抹掉。

只要不在手术室、换药室和病房里，她每一分钟都抽烟。有时她还找机会从那里跑出来狠狠地抽上一支，简直要把烟卷吃下去。她到病房巡诊，有时会举起食指和中指按在嘴唇上；难怪有人怀疑在巡诊时她是不是也抽烟。

这个老态毕露的瘦长女人同外科主任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他确实象个外科医生：身材高大，胳膊很长），凡是他们这所医院承接的一切手术都做——截肢，切开气管把导管插进喉壁，切除胃，手伸到肠子的任何部分，在骨盆区为

所欲为；到手术日将结束时，她往往还要切除一两例发生癌肿的乳腺——这种不算复杂的工作做起来已经是轻车熟路。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没有一个星期二或星期五不给女人切除乳房。有一次，她一边用松垂的嘴唇抽烟，一边对打扫手术室的女工友说：要是把她所切除的乳房统统堆在一起，可以堆成一座小山。

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一生只当外科医生，从不越出外科学的范围，不过她还是记得、也懂得托尔斯泰笔下的哥萨克叶罗什卡评论欧洲医生时说的话："他们只会开刀。实在都是傻瓜。山里的大夫才真有学问。知道用草药治病。"

如果明天放射疗法、化学疗法、草药疗法或者什么光疗、色疗、心灵感应疗法能够不用手术刀救治她的病人，如果外科学将遭到从人类实践中消失的命运，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一天也不会为她的本行辩护。这也许不是一个信念问题，而是因为她一辈子老是开刀，开刀，一辈子接触的都是血和肉，已经腻了。

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乃是人们不可能在生命的中途通过大幅度改行来刷新自己的面貌。

病房巡诊他们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她和住院医师。但是，几天前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到莫斯科去参加胸腔外科讨论会了。不知为什么，本星期六到楼上男病房去的只有她一个人，不带负责医师，也不带护士。

她甚至不是走进来的，而是悄悄地站到门口，身体向门框上一靠。这是女孩子的动作。只有妙龄少女才会这样倚门斜立，知道这样姿态优美，比昂首挺腰、两肩相齐站着更好看。

她站在那里，凝神望着焦姆卡做游戏。焦姆卡伸直一条坏腿搁在床上，一条好腿拳曲着，一本书放在上面，权且把它当作小桌子；他两手拿着四支长铅笔，参照书本在画什么图形。他端详着这个图形，也许会看上很久，但这时听见有人叫他。他抬起头来，收去象桠枝般叉开的铅笔。

"焦姆卡，你在画什么？"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带着一点哀愁问道。

"证明定理！"他爽朗地回答，声音似乎没有必要这样大。

他们话是这样说，但互相注视着对方，心里明白，双方所关心的事不在于此。

"否则时间就白白过去了，"焦姆卡解释道，但语调已不那么爽朗，声音也不那么大。

她点点头。

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沉默片时，身体斜倚在门框上——不，不是作女儿态，而是因为疲劳。

"让我给你看一下。"

素来稳重的焦姆卡却一反常态，激动地提出异议：

"昨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看过了！她说还要继续照光！"

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点点头。她的神态流露出一种幽雅的哀愁。

“那好吧，不过我还是得看一下。”

焦姆卡皱皱眉头。他把立体几何放下，在床上挪动身子，腾出地方，把坏腿袒到齐膝处。

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在旁边坐下。她一抖手就把白大衣和连衫裙的袖子捋到几乎露出肘子。她的一双纤细而灵活的手象两只动物开始在焦姆卡腿上爬行。

“疼吗？疼吗？”她一再问。

“有点儿。有点儿，”他说，同时眉头愈皱愈紧。

“夜里觉不觉得？”

“觉得……可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

叶甫根尼娅又会意地点点头，并拍拍他的肩膀。

“好，小老弟。照吧。”

他们再次四目对视。

病房里悄无声息，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听得清。

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站起来转过身去。炉子旁边应该是普罗什卡的床位，可是昨天晚上换到窗前去了（虽然不大吉利，因为原来睡在那张床上的人是出院去等死的）。炉旁的床位现在由个儿不高、性格沉静、淡黄头发的弗里德里希·菲德劳占用；他对于病房里的人说来不完全陌生，因为他已经在楼梯上躺了三天。现在他站起来，手指贴着裤缝立正，殷勤而尊敬地望着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他的身量不及她高。

他完全健康！他没有任何病痛！第一次手术完全把他治好了。他又来到癌症楼不是诉说疾患，而是严格遵循医嘱，因为通知上写着：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到院检查。他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交通很不方便，换了好几次车；先是穿着皮袄和毡靴坐在卡车上，从他们那里最近的火车站到此地则穿浅帮皮鞋和夹大衣。他到达的日子既不是一月三十一日，也不是二月二日，准确的程度堪与出现月食的时间相媲美。

他的脸也象月亮蒙上了黑影，因为不知何故要他住院。他很希望今天能放他走。瘦长、干瘪、眼睛暗淡无神的玛丽亚拿来了毛巾。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擦擦手，袖子还是捋到肘部，举起手来，在一片寂静中用指头在菲德劳的脖子上做了半天推拿动作；然后命他解开上衣，进而在锁骨附近的凹窝和夹肢窝里扪触。

最后她说：

"一切都很好，菲德劳。您的情况很好。"

他象获了奖似地眉开眼笑。

"一切都很好，"她亲切地曼声说着，又在他颌下推拿。"再做一次小手术就没事了。"

"什么？"菲德劳顿时泄了气。"既然一切都很好，为什么还要做手术，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

"为了使情况更好，"她淡然一笑。

"在这里？"他用手掌做了一个斜切脖子的动作。他柔软的脸部现出恳求的表情。他的淡黄眉毛颜色近乎苍白。

“对。您放心，您完全没有耽误病情。那就在下星期二吧。”（玛丽亚记了下来。）“到二月底您可以回家，争取以后不再到我们这儿来。”

“还需要‘检查’吗？”非德劳试图露出笑容，但没有成功。

“对，除非是检查，”她作了一个表示歉意的微笑。除了疲倦的微笑，她又能用什么去鼓励他呢？

她在病房里继续往前走，让菲德劳站在那里、随后又坐下来寻思。打阿赫马章旁边经过时，她还向他笑了笑（三星期前她给他的腹股沟开过刀），然后在叶甫列姆床前站住。

他已经把蓝色封面的书扔在一旁等候她。叶甫列姆的脑袋挺大，缠着绷带的脖子粗得不成样子，肩膀又阔，现在盘腿坐在床上，就象童话中的矮脚神仙。他皱眉蹙额望着她，准备承受打击。

她用胳膊肘支在他的床架上，两个指头按在嘴边，样子象在抽烟。

“情绪怎么样，波杜耶夫？”

除了问问情绪，再也想不出别的花样！她只要扯上几句，就可以一走了事！

“开刀已经把我开腻了，”叶甫列姆说。

她扬起一道眉毛，似乎对于开刀可以叫人腻烦表示惊讶。

她什么也没说。

他要说的也都说了。

两人默默无语，好象双方都在赌气，又象分离在即。

“当然又是老地方喽？”叶甫列姆甚至不是提问，而是自言自语。

（他本想提出诘问：你们以前是怎么开的刀？你们早先在想些什么？他对任何领导从来不讲客气，当面什么都讲，可他对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还是留了点儿情。让她自己去考虑吧。）

“在旁边一点儿，”她回答说。

（苦命的人哪，跟你讲又有什么用呢？舌癌不比下唇癌。拿去了颌下淋巴结，不料发现深处的淋巴道也有转移。当初这是不能切除的。）

叶甫列姆象拉着力不能胜的重载似地大声呼哧。

“不要。什么也不要。”

她也不进行劝说。

“我不要开刀。我什么也不要了。”

她望着他，并不做声。

“让我出院！”

她望着他的一双棕红色的眼珠，它们经过了太多的恐惧，反而无所畏惧了。她也在想：何苦呢？既然手术刀追不上转移，又何苦再折磨他？

“波杜耶夫，星期一把纱布解开瞧瞧。好吗？”

（他虽要求出院，但暗暗还希望她说：“你发疯啦，波杜耶夫？怎么能出院？我们还要给你治病呢！我们一定能把你治好！……”）

可是她没有反对。

那就是说：他已经死定了。

他用整个身躯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动作。单点头他办不到。

于是她向普罗什卡那边走去。普罗什卡起来笑嘻嘻地迎接她。她完全不对他作任何诊视，只是问：

“您自己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普罗什卡进一步绽开笑脸。“那些药片对我很有好处。”

他指指一只盛着多种维生素的小瓶子。他简直不知道怎样讨她的好，才能说服她不要考虑给他开刀。

她看着药片点点头，然后伸手到他胸膛的左边，问：

“这儿怎么样？疼不疼？”

“稍稍有一点儿。”

她又点点头，说：

“今天就让您出院。”

普罗什卡多么高兴啊！两道漆黑的眉毛简直飞扬起来。

“真的吗？手术不做啦？”

她摇摇头，淡然一笑。

整整一星期，医生给他施行扣诊，四次把他关进爱克斯光室，忽而叫他坐下，忽而叫他躺下，忽而又叫他起来，还把他带去给一些穿白大衣的老头们瞧。他满以为自己的病不得了，可是突然——不动手术就放他出院！

“这么说，我的病好了？”

“不完全是。”

“那些药片好处老大老大，是吗？”他的漆黑的眼睛闪着会意和感激的光芒。他见自己得到平安无事的结果给她也带来欢乐，因而更加高兴。

“那些药片您可以自己到药房去买。我这里再给您开一种药，您也把它喝下去。”她掉头对护士说：“抗坏血酸。”

玛丽亚严肃地低下头去记在本子上。

“不过您要注意保重！”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叮嘱他。“您不能走得太快。不能举重物。弯腰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普罗什卡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得意，因为她毕竟不是世上的事样样都知道。

“不举重物怎么行？我是拖拉机手。”

“暂时您不要工作。”

“怎么？开病假？”

“不。我们给您开残废证明书。”

“残废？”普罗什卡困惑地看着她。“难道我真的残废了吗？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还年轻，我要干活！”

他伸出一双粗壮有力、要求干活的大手。

但这不能说服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

“过半个钟点您到楼下换药室去。证明会给您开好，我再跟您解释。”

她走了出去，瘦瘦的玛丽亚直撅撅地跟在她后面。病

房里一下子好儿条嗓子一齐开腔。普罗什卡说，为什么要给残废证明书，这事儿得跟小伙子们商量商量。但其余的人都在谈菲德劳。大家都莫名其妙：洁白光滑的脖子，又不疼，可是要开刀！

波杜耶夫在床上用手撑着转动盘起两条腿的身体（就象无脚人转身那样），气冲冲地嚷着，甚至脸都涨红了：

"不要答应，弗里德里希！别上当！要是给他们开了刀，等于被他们宰了，就象我一样。"

但是阿赫马章也有不同的看法：

"菲德劳应当开刀！他们不会凭空瞎说。"

"既然不疼，干吗要开刀？"焦姆卡大为不平。

"老弟，把好端端的脖子开刀，这不是发疯吗？"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低音插进来说。

卢萨诺夫被这些叫嚷声闹得直皱眉头，但他不向任何人提出批评。昨天打了一针，没有引起不良反应，一度心情很愉快。但整整一夜和一个早晨，脖子底下的肿瘤还是同过去一样妨碍着他头部的动作，今天他从一清早起就觉得自己非常不幸，因为肿瘤没有缩小。

诚然，甘加尔特医生来过一次。她详详细细地问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昨天晚上、夜间以及今天的每一种自我感觉，问他感到虚弱的程度，并向他解释，肿瘤不一定第一针就能打退，一时打不退——这是完全正常的。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安下了心来。卢萨诺夫仔细看了看她——脸长得不赖（只是姓氏比较可疑）。归根到底，这所医院里的

医生还不是最蹩脚的，他们有一些经验，只要善于向他们提出要求。

但他安心的状态没有维持很久。医生走后，肿瘤在颌下往外撑，压迫着他，病人们则议论纷纷，说好端端的颈子偏要人家开刀，而卢萨诺夫这么大一个瘤子反倒不开，也不要人家开。问题难道真的那么严重？

前天刚进病房的时候，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可能想象，自己会这样快地感到跟这些人有着共同之处。

大家谈论的是脖子。他们三个人脖子都有问题。

弗里德里希·雅各勃维奇非常懊丧。他听着给他出的点子，无所适从地微笑着。大家都很自信地劝他如何对付，不过他对自己的事情看法很模糊。（其实他们对各自的事情看法也很模糊。）开刀有危险，不开也有危险。上一次在这个医院里他已经看够了，也打听得够了，当时用爱克斯光给他治疗下唇，就象现在叶根贝尔吉耶夫一样。从那以后，嘴唇上的痂先是膨胀，后来干缩、脱落了，但他明白为什么要给他切除颈腺：防止癌细胞扩散。

然而，波杜耶夫开了两刀，有没有用呢？会不会癌并不打算爬到任何地方去？说不定已经没有了？不管怎样，得跟妻子商量一下，尤其需要跟女儿亨丽埃塔商量，他们一家数她最有学问、最果断。可是他占着这里的床位，医院不可能等候信件往返（从火车站到他们那里的草原腹地一星期只送两班邮件，还得在道路干燥的时候）。出院回家去商量又非常困难，比医生和那么轻飘飘地给他出点子的病人想

象的困难得多。为此，必须到本市的监督处去在刚刚好不容易弄来的外出证明上盖印，把临时居留登记注销；先坐火车到一个小站，在那里穿上交给不相识的好人保管的皮袄和毡靴（因为那里的气候同这里不一样，那里还是狂风肆虐的严冬），坐一百五十公里汽车（也许还不是在驾驶室，而是在货舱里）颠簸到他们的拖拉机站；到了家里马上打报告向州里的监督处再次申请外出，等批准得花两三个、三四个星期；然后再向本单位请假，而那时候正好开始化雪，道路泥泞，汽车停驶；在那个每昼夜只有两班火车停靠（每次一分钟）的小站，还得求爷爷、告奶奶请列车员帮个忙让你上车；到了这里，又得上本市的监督处去登记临时居留，然后又得在医院里待上几天等候床位。

其时大家又在议论普罗什卡的事情。以后再也不要相信什么不吉利的征兆！他不是刚换了一张不吉利的床位吗？大家纷纷向他祝贺，劝他接受残废证明书。“他们给——你就拿！既然给你，那就是需要的。现在不要，将来就要不到了。”但普罗什卡还是说，他要干活。旁人劝他：你这个傻瓜，日子长着呢，将来活够你干的！

于是普罗什卡去办出院手续。病房里静了下来。

叶甫列姆重又把书打开，可是一行行读下去，却不懂书里写些什么。他很快就发现这一点。

他看不懂里边写些什么，因为他坐卧不宁，心神不定，不住看房间里和走廊里在干什么。要读懂书上的文字，他必须清醒地看到：他自己已经什么也来不及了，什么也改变

不了，谁也说服不了，他已经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对自己作一番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读懂这本书。书虽然用普通的黑字印在普通的白纸上，但要读懂它，光认得字还不够。

普罗什卡办完了手续，兴冲冲地上楼来，在二楼的穿堂里遇见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就给他看好多份证明：

“一张张都打上圆圆的图章，瞧！”

一张证明是要求火车站让刚动过手术的病人不排队买票。（如果不写明动过手术，车站当局照样要病人排队，也许两三天也走不成。）

另一张证明是给居住地点的医疗单位的，上面写着：Tumor cordis casus inoperabilis。

“我不懂！”普罗什卡指着那几个洋文字。“上面写的什么，啊？”

“让我想一想，”科斯托格洛托夫不悦地眯着眼睛。“你先拿去，我再想想。”

普罗什卡拿着珍贵的证明，收拾东西去了。

而科斯托格洛托夫靠在栏杆上，面对楼梯井孔垂下一绺额发。

他并不真正懂得拉丁文，也不通晓任何一种外语，可以说哪一门学问都没学全，除了测绘——那也只是军事测绘，多不过军士训练班的课程内容。他虽然随时随地尖刻地嘲笑知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却从不放过一鳞半爪的见闻，以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他在一九三八年读过一年地球物理

学，四六至四七年读过不到一年的大地测量学，中间是当兵和打仗，当然缺乏学问上求深造的良好条件。不过，科斯托格洛托夫始终记住他亲爱的爷爷常说的一句老话：“傻瓜好为人师，聪明人甘当学生。”他甚至在部队里那几年也经常吸收一切有益的知识，留心倾听言之成理的话语，不管说话的是其他团的军官，还是自己排里的士兵。当然，他听的时候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以免损害自尊心，其实象海绵吸水一般全都记着。但在与人结识的时候，科斯托格洛托夫从不急于炫耀自己，而是先摸对方的底，了解对方是何许样人，什么出身，来自何方。这大大有助于他增长见闻。要说在什么地方学到的东西最多，那要算战后在布蒂尔卡人满为患的囚牢里。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教授、副博士以及其他有学问的人讲演——关于原子物理、西方建筑、遗传学、伦理学、养蜂等等，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总是这些讲演最热心的听众。此外，在红色普列斯尼亚①的板床下，在棚车内木头未经刨光的铺位上，在押解途中席地休息时，在劳动营的队列里，——他到处按照爷爷那句话努力补上在大学课堂里没能学到的东西。

在劳动营里，他曾经就教于一位医务统计员。那是一个上了年纪、有点怕羞的人，他在卫生处抄抄写写，有时也被差去打开水。此人原来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古代语言文学教师。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到可以跟他学拉丁文。为此他们

① 红色普列斯尼亚（一译勃列斯尼亚）是莫斯科的一个区。此处指设在该区的监狱。——中译者注

只得冒着严寒在监禁区内来回地走，而且铅笔、纸张都没有。这位医务统计员有时脱去手套，用手指在雪地上写字。（他教课完全不取报酬，无非为了在短时间内又能感到自己是个人。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付不出什么代价。但他们差点儿在看守长那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把他们个别叫去审问，怀疑他们准备逃跑，在雪地上画地形图。他怎么也不信他们在写拉丁文。以后授课便告中断。）

科斯托格洛托夫根据学到的几课还记得，casus 是“事例”、“病例”的意思；in 是否定性前缀；cor 和 cordis 他也是从那里知道的（即使不知道，也不难猜到，因为“心电图”就是从同一词根派生出来的）。至于 tumor 这个词，他在向卓娅借来的《病理解剖学》一书的每一页上都能看到。

因此，他没有花费很多力气就明白了对普罗什卡所下的诊断是：

“心脏肿瘤，不能手术治疗”。

不仅不能手术治疗，任何疗法都不能用，所以医生给他开抗坏血酸。

科斯托格洛托夫俯视着楼梯井孔，头脑里思考的不是翻译拉丁文，而是昨天他自己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提出的一条原则——应当让病人了解全部情况。

但那条原则只适用于象他这样曾经沧海的人。

对普罗什卡是否适用呢？

普罗什卡手里几乎不拿什么行李，他的东西不多。送

他的是西布加托夫、焦姆卡和阿赫马章。三个人都小心谨慎地走着：一个留神背脊，另一个注意坏腿，第三个毕竟拄着拐棍。而普罗什卡脚步轻快，咧着嘴，露出一口洁白光亮的牙齿。

这很象过去在营里偶尔也有送人走向自由时的情景。

那末，该不该告诉他：一出大门他又将被逮捕？

"想出来了没有？那上面写的什么？"普罗什卡一边走，一边不经意地问。

"鬼知道写些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把嘴一撇，他的疤痕也随之扭歪。"医生变得非常狡猾，叫人没法看懂。"

"好吧，愿你们早日恢复健康！愿大家都恢复健康，朋友们！一个个都回家去！跟亲人团聚！"普罗什卡同大家一一握手，从楼梯上还高兴地回过头来向大家挥手。

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

去迎接死亡。

第 十 章

孩 子

她只用手指摸了一下焦姆卡的肿瘤，轻轻抱住他的肩膀，之后便走到别处去。但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焦姆卡已经感觉到，他的希望的嫩枝被砍断了。

他不是一下子就感觉到的，因为病房里先是议论普罗什卡的事并送他出院，接着，焦姆卡打算搬到他的靠窗的床上去（现在已经是一张吉利的床位）：那里看书光线比较好，跟科斯托格洛托夫聊聊也方便些。正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新病人。

这是一个皮肤晒得黑黑的青年，漆黑齐整的头发略有些卷曲。他大约已有二十多岁。他左边胳肢窝里夹着三本书，右边胳肢窝里也夹着三本书。

“你们好，朋友们！”他进门就招呼，态度大方诚恳，焦姆卡一下子就对他产生好感。“我该睡哪儿？”

可是他又不看床位，却看着墙壁。

“您看书的时间多不多？”焦姆卡问。

“整天都看。”

焦姆卡考虑了一下。

“看业务书还是消遣书？”

“业务书。”

“那末就睡在靠窗吧。被褥马上会给您铺好。您的书是关于哪方面的？”

“地质学，老弟，”新来的病人说。

焦姆卡看到其中一本的书名是《地质化学探矿》。

“那就在靠窗睡吧。您哪儿疼？”

“腿上。”

“我也是腿上。”

是的，新来的病人有一条腿走起路来特别小心，可是身段简直可以跟冰上芭蕾舞演员媲美。

护士给新来的病人铺好了床，他好象是到医院里来读书的：一来就把五本书摆在窗台上，自己埋头看第六本。他看了一个小时，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讲。然后医生把他叫了去。

焦姆卡也在用功。先是读立体几何，一边用铅笔构造图形。可是定理映不进他的头脑。而各种图形——直线的截距、锯齿状的截面——无不向焦姆卡提醒和暗示着那件事。

于是他拿起一本比较轻松的书来看——是某一个柯热夫尼科夫写的小说《活命的水》，已经捞到了斯大林奖金。这一个是萨·柯热夫尼科夫，另外还有阿·柯热夫尼科夫和瓦·柯热夫尼科夫。作家那么多，焦姆卡简直有点害怕。上个世纪作家不过十来个，个个都是大文豪。而本世纪作

家成千上万，姓名只要换一个字母，马上又是另一个作家。有一个叫萨弗罗诺夫，另一个叫萨弗诺夫。姓萨弗诺夫的作家好象还不止一个。萨弗罗诺夫难道只有一个？谁也来不及把他们的书都读遍。读了一本——也跟没读过差不多。一些本来没没无闻的作家冒了出来，得到斯大林奖金，以后又永远沉没。去年差不多每一本比较厚的书都得了奖。每年发的奖金有四五十项。

作品的名目在焦姆卡头脑里也互相混淆。对影片《灿烂的生活》和《大家庭》①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据说其中一部是很有益的，一部则是很有害的，但焦姆卡怎么也记不住究竟哪部好、哪部坏，何况两部片子他都没有看过。头脑里的概念也搞糊涂了，而且焦姆卡愈看那些文章就愈糊涂。他刚刚掌握了一条：要客观地分析，就是要看到事物在生活中的本来面貌。可是随即读到有人骂女作家潘诺娃“陷入了站不住脚的、泥淖般的客观主义土壤”。

然而还是必须硬着头皮设法弄懂、记牢。

焦姆卡读着《活命的水》，总是闹不清楚：究竟是书写得沉闷呢，还是他自己心中烦闷。

他心中茫然若失的感觉在增强。他想找个人商量商量，或者诉诉苦衷。只要有人推心置腹地跟他谈几句，哪怕对他表示一点怜悯，也是好的。

---

① 《灿烂的生活》按原文字面直译为《大生活》，这部影片曾遭到严厉批判。《大家庭》是根据柯切托夫的小说《茹尔宾一家》改编的电影。——中译者注

当然，他从书上看到过，也听人家说过，怜悯是有损尊严的感情：既有损于怜悯者，也有损于被怜悯者。

然而他还是希望得到怜悯。

因为焦姆卡有生以来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怜悯。

在此地病房里，听别人谈谈或自己跟人家谈谈挺有意思，但那不是他现在想谈的内容和方式。跟男人们在一起，得拿出男子汉的气派来。

医院里女人很多，但焦姆卡不敢跨进她们那间喧闹的大病房。如果那里都是健康的女人，经过门口时顺便往里边瞧瞧倒是挺有趣的，也许能看到些什么。但在这么一大窝子女病人面前他不敢正视，生怕看到了什么。她们的病是一道比寻常的羞耻心更强的禁幕。焦姆卡有时在楼梯上、穿堂里遇见的女病人有几个颓丧得连晨袍的衣襟也不扣好，他甚至可以看到她们胸前或腰下的内衣。然而这种情形在他思想上引起的感觉不是喜悦，而是痛苦。

所以他在她们面前总是不敢抬头。在这里结识女人完全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斯皎法阿姨是自己先注意到他，向他问这问那，于是他跟她结识了。斯皎法阿姨已经有了孩子，孩子也有了孩子，脸上已经带着老奶奶的共同特征——皱纹和对弱点迁就的微笑。他有时跟斯皎法阿姨站在楼梯顶上附近的什么地方，两个人可以谈上好半天。别人从来不象她这样耐心、抱着这样的同情态度听焦姆卡述说，仿佛她自己再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他也愿意向她谈有关自己、甚至有关他

母亲的事，这些话对别人他决不会透露。

焦姆卡的父亲在战争中牺牲时，他才两岁。后来有了个继父，虽然谈不上亲热，却是个讲道理的人，跟他完全可以相处；但母亲成了一个婊子（焦姆卡没有向斯皎法说出这两个字，不过心中早已下了断语）。继父离开了她，他做得对。从此以后，母亲就把男人带到家里来。她和焦姆卡只有唯一的一间屋子，带了男人回来照例在一起酗酒（他们还硬要焦姆卡也喝，他不干）。男人在她家留宿的情形也不一样：有的到半夜，有的到早晨。屋子里没有任何间隔，又不暗，因为有路灯从街上照进来。焦姆卡对此实在讨厌透顶。跟他年龄相仿的人想起来会打颤的事情，他却感到恶心。

他这样念完了五年级和六年级，到七年级时，焦姆卡就住到学校里看门的老头儿那里去。学校每天管焦姆卡两顿饭。母亲也不要他回去，他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挺高兴。

焦姆卡谈起母亲来总是咬牙切齿，平静不下来。斯皎法阿姨听着，频频点头，可是得出的结论相当奇怪：

“大家都在人世间过日子。大家都只有一个人世间。”

去年，焦姆卡搬到了工厂宿舍去住。焦姆卡先是当艺徒，后来成为二级车工。他对这一行兴趣不是很大，但为了跟母亲的放荡生活对抗，赌气不喝伏特加，不直着嗓子唱歌，而是埋头用功。他以很好的成绩念完了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前半年。

他只偶尔跟同伴一起踢踢足球。就为了这点小小的乐趣，命运对他施加了惩罚：有人穿着足球鞋在争球的混乱中

并非故意地在焦姆卡小腿上踢了一脚。焦姆卡并不在意，走路瘸了一阵子，事情就过去了。可是从秋天开始，腿上愈来愈疼。他还熬了很久没给医生看，以后用热敷的办法，结果愈来愈糟。于是他按照逐级转诊的制度被转到州中心，接着又到了这里。

焦姆卡现在问斯皎法阿姨，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有些人一辈子一帆风顺，万事如意；而另一些人老是颠颠踬踬。据说，事在人为，命运取决于本人。看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命运取决于上帝，"斯皎法阿姨劝他听天由命。"上帝什么都看见。必须顺从，焦姆卡。"

"既然取决于上帝，既然上帝什么都看见，更没有理由让倒霉全集中在一个人头上。应当平均分配才对……"

但是，必须顺从——这是无可争辩的。如果不顺从，又有什么办法？

斯皎法阿姨是本地人，她的女儿、儿子和儿媳妇常来探望，给她送吃的东西来。这些东西在斯皎法阿姨那里留不长，她都拿来请其他女病人和女工友吃，有时也把焦姆卡从病房里叫出来，塞给他一只鸡蛋或一块馅饼。

焦姆卡老是吃不饱，他一辈子没饱过。由于经常神经过敏地想到吃，饥饿的感觉比事实上更甚。但老是吃斯皎法阿姨的白食他也不好意思。因此，要是收下了鸡蛋，馅饼便打算谢绝。

"拿去，孩子！"她连连摇手。"是肉馅儿的。趁现在是

可以吃荤腥的日子，就吃吧。”

“怎么，以后就不能吃啦？”

“当然，你难道不知道？”

“接下来是什么日子？”

“谢肉节呗！”

“那不是更好吗，斯皎法阿姨？谢肉节不是吃得更好吗?!”

“每一件事情都有人说好。好也罢，歹也罢，反正快不能吃肉了。”

“但愿谢肉节永不结束，你说会不会？”

“怎么不会结束?!一个星期就过去了。”

“以后又做什么呢？”焦姆卡兴致勃勃地问，一边已经在大啖香喷喷的自制馅饼，他家里从来不烤这种馅饼。

“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都不信上帝神明，什么都不懂。以后是大斋期。”

“为什么要搞大斋期？目的是什么？吃斋，还要吃大斋！”

“焦姆卡，因为肚子填得太饱只想赖在尘世，升不了天。必须有一些间歇。”

“要间歇做什么？”焦姆卡对此无法理解，因为他一辈子全是间歇。

“安排间歇是为了脱俗净心。空着肚子头脑比较清醒，难道你没注意到吗？”

“没有，斯皎法阿姨，我从来没有注意到。”

从一年级起，焦姆卡还不会念，不会写，可是已经被灌

输并且牢牢地记住、明确地懂得一个道理：宗教是麻醉剂，反动透顶的学说，只对骗子们有利。由于宗教的影响，某些地方的劳动者至今不能摆脱剥削。一旦把宗教这个障碍扫除，就可以拿起武器，就有自由。

斯皎法阿姨按照她的可笑的历法计算日子，每句话都离不开上帝，甚至在这所阴森的医院里也笑口常开，有时还请他吃馅儿饼。然而，即使这位斯皎法阿姨也是一个十足的反动人物。

尽管如此，现在——星期六午后，医生都走了，让每个病人去想各自的心事，阴沉的天色还多少有点亮光透进病房，而穿堂和走廊里已经开了灯，——焦姆卡微微瘸着一条腿走来走去，却偏偏到处寻找这位反动的斯皎法阿姨。其实，除了顺从，她不可能给焦姆卡提出什么切实的忠告。

但愿不要截肢。但愿不至于非截去不可。

同意截还是不同意截？截还是不截？

虽然比起这种噬性疼痛来，也许还是截去的好。

但是斯皎法阿姨不在几处老地方，不过焦姆卡却在楼下的走廊里看到一位姑娘。走廊变宽的地方形成一个小小的穿堂，算是医院里的阅览室，虽然那里也摆着楼下值班护士的一张桌子和一橱药品。焦姆卡在那里看到的简直还只是个女孩子，尽管也穿着洗得褪成灰色的晨袍，却象电影中的人物：那种黄头发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这一头黄发还梳成一种轻飘飘的款式。

焦姆卡昨天已经第一次瞥见过她，看到那蓬蓬松松的

一丛黄发甚至眨巴了一下眼睛。他觉得那姑娘太美了，简直不敢定睛看她，所以一扭头走了过去。虽然按年龄她在全院中与他最接近(还有被截去一条腿的莎尔罕)，但这样的姑娘他认为是高不可攀的。

今天早晨他又见到她一次背影。甚至病人的晨袍也掩盖不住她黄蜂般的细腰，一下子就认得出来。她的一束黄头发一耸一耸地抖动着。

焦姆卡现在肯定不是在找她，因为他没有勇气跟她认识;他知道他的嘴一定会象给面团粘住似的,一定会哼儿哈儿地说出些含糊不清而又非常愚蠢的话来。但他看见了她，心猛地往下一沉。他竭力不露出跛相，尽量平稳地拐进阅览室,开始翻阅共和国《真理报》的合订本,其中好多页被病人剪下来拿去包东西或作其他用途了。

那张铺着红布的桌子被斯大林的半身铜像占去了一半——它的头部和肩膀比一般人来得大。桌子另一端角上好象跟斯大林并排站着一个也很胖的阔嘴女工友。今天是星期六，有的是闲工夫，所以她在自己面前铺好一张报纸，把葵花籽儿抖在上面，嗑得津津有味，壳儿直接吐在报纸上,不用手帮忙。她也许打算一会儿就走,可是葵花籽儿把她拖住了。

墙上声音沙哑的广播喇叭在放送轻音乐。还有一张小桌上有两个病人在下跳棋。

焦姆卡用眼梢看到那姑娘坐在靠墙一把椅子上，什么也不做，但是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只手把晨袍的领子抻抻齐

整，因为上面的搭扣照例是没有的，除非病人自己给钉上。

那是一位娇滴滴的黄发安琪儿，简直一碰就要融化。要是能跟她谈谈多好哇！……比方谈谈他的腿。

焦姆卡一边翻阅报纸，一边生自己的气。他这时还猛想起，为了节约时间，他从来不梳任何款式的发型，老是剪成平头。此刻在她面前必定象个傻瓜蛋。

忽然，安琪儿主动开腔说：

"你怎么这样怕难为情？你从昨天起就看见我了，到现在连招呼也不打。"

焦姆卡全身一震，四顾张望。啊！是在跟他说话！不跟他还能跟谁说话？

那一丛花冠似的黄发在她头上摇晃。

"你怎么，害怕吗？拖一把椅子过来，咱们认识一下。"

"我不害怕。"但他喉咙里象有什么东西卡住了，妨碍他响亮地回答。

"那就过来坐下。"

他搬过一把椅子，加倍小心不要露出跛相，一只手把它挪到姑娘旁边，和她的椅子并排靠着墙壁。然后伸出一只手。

"我叫焦姆卡。"

"我叫阿霞，"她把自己的一只柔软的手放到他手中，随后就抽出来。

他坐了下来，那模样实在可笑：两个人象新郎新娘似地并排坐着。这样看她也不方便。他抬起身来，把椅子重新

移动一下，以免显得太拘束。

“你怎么，坐着什么事也不做？”焦姆卡问。

“为什么要做事？再说，我也在做。”

“你在做什么？”

“听音乐。在想象中跳舞。你恐怕不会吧？”

“在想象中跳舞?!”

“要真的跳也行！”

焦姆卡咂咂嘴表示谢绝。

“我一下子就看出你不是老手。否则咱们可以跳几支。”阿霞向周围看了一下，“可惜没有地方。再说，这种舞曲又算得什么？我不过听听罢了，因为沉默总是叫我闷得慌。”

“那末，什么舞才算好呢？”焦姆卡乐于跟她交谈。“探戈？”

阿霞叹一口气，说：

“什么探戈，那还是老奶奶当年跳的！现在真正的舞是摇摆舞。这里还没有人跳。莫斯科有人跳。但也只是少数行家。”

她的话焦姆卡并不十分注意去听，他就是喜欢跟她聊聊，就是喜欢这样直接瞧着她。她的眼睛比较特别——带一点绿颜色。眼睛是没法染的，都是本色。不过还是挺讨人喜欢。

“那种舞跳起来才够味儿！”阿霞说着打一个榧子。“可惜我不能给你示范，我自己没看到过。你的时间是怎么打发的？你会唱歌吗？”

“不。我不会唱歌。”

“为什么？我们在闷得慌的时候就唱歌。那你做什么呢？拉手风琴？”

“不……”焦姆卡感到惭愧。他实在配不上她。总不能冲着她回答说：他对社会生活兴趣很浓！……

阿霞大惑不解：他倒是个有意思的典型！

“你大概对体育感兴趣吧？我也搞一点五项运动。我的成绩是一米四十和十三米二十。”①

“我——不会……”焦姆卡痛切地意识到自己在她面前是多么无能。人家可以把日子过得多么轻松！

反正焦姆卡永远学不会这种本领……他只会踢踢足球……

偏偏踢出这样的结果来。

“那末，烟总抽的吧？酒喝不喝？”阿霞还抱着希望问。“还是只喝啤酒？”

“啤酒可以，”焦姆卡废然叹道。（其实他连啤酒也没有沾过唇，但总不能一点面子也不给自己留下。）

“喔——喔呵！”阿霞发出一声呻吟，象腰眼上挨了一拳似的。“我的天，怎么你们还都是爹妈的宝贝儿子?！真窝囊！我们学校里也大半是这样的男生。九月份我们被并到原来的男校②，校长给自己留下的都是被收拾得服服帖帖

① 女子五项全能运动包括跳高、铅球、200米、80米低栏和跳远。阿霞说的是跳高和铅球的成绩。——中译者注

② 1954年9月，苏联恢复男女同校教育制度。——英译者注

和功课特别好的男生。把所有最棒的小伙子都塞到原来的女校去。”

她并不想侮辱他，而是表示怜悯，然而“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说法毕竟伤了他的心。

“你在几年级？”他问。

“十年级。”

“谁允许你们梳这样的发式？”

“哪里会允许?！他们反对得可凶呢！……我们硬是跟他们斗！”

不，她说话很直爽。哪怕被她取笑，哪怕她用拳头揍焦姆卡，只要她的话匣子开着就好。

轻音乐结束了，播音员开始报告各国人民反对可耻的巴黎协定的斗争。这个协定对法国是危险的，因为它被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对于德国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被置于法国的统治之下。

“那末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阿霞还不肯罢休。

“我吗？我是个车工，”焦姆卡用一种漫不经心而又不失体面的口气说。

但阿霞并不感到惊奇。

“工资多少？”

焦姆卡非常珍视自己的工资，因为这是血汗换来的，而且他刚开始挣钱。但他感觉到自己说不出口拿多少工资。

“当然微不足道，”他好容易迸出这么一句。

“这完全是浪费时间！”阿霞很有把握地说。“你还是去

当运动员比较合适！你有条件。”

“这必须有本领……”

“什么本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运动员！只要下功夫苦练！运动员的待遇可好哩——坐车不花钱，三十卢布一天伙食，住高级旅馆！还有奖金！可以到许多城市观光。”

“你到过哪些地方？”

“到过列宁格勒、沃罗涅什……”

“列宁格勒好吗？”

“那还用说?！百货商场可大哩！样样都有专门的柜台——卖袜子的，卖手提包的！……”

焦姆卡对于这一切都不能想象，心里很羡慕。因为这姑娘如此大胆地谈到的一切也许确实是好的，而他的眼界也许确实太小。

女工友犹如一座雕像，始终站在桌旁向报纸上吐葵花籽的壳儿，头也不低。

“你是运动员，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不敢问她究竟病在哪里。也许人家不便回答。

“我只来住三天检查一下，”阿霞把手一甩。她另一只手不得不经常按住或抻平合不拢来的领子。“让人穿这种鬼玩意儿，真丢人！在这地方住上一个星期，不发疯才怪……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吗？……”焦姆卡咂咂嘴唇。他正是想谈谈自己的腿，但他惯于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不喜欢匆匆忙忙。“我的腿上……”

迄今为止，“我的腿上”这句开场白对他来说包含着重大而沉痛的意义。但面对着把什么都看得轻飘飘的阿霞，他已开始怀疑，这一切究竟是不是那么严重。于是他也象谈工资那样吞吞吐吐地谈了腿的情况。

“他们怎么说？”

“是这么回事……他们嘴上不说……可是在打算把它截去。”

说完，他脸上蒙着阴影，眼睛看着阿霞容光焕发的脸。

“你说什么?!”阿霞象对老朋友一样在他肩上一拍。“怎么能把一条腿截掉？他们发疯了不成？明明是不愿给治！千万别让他们这样干！宁可死，也比只有一条腿活着强。残废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人活着是为了幸福。”

当然，她又是对的！拄着拐棍儿过日子还有什么意思？比方说，现在他坐在她旁边，拐棍儿往哪儿摆？……他连椅子也不能自己搬，得由她替他搬。不，少了一条腿根本不能生活。

人活着是为了幸福。

“你来这里很久了吗？”

“我来了多久？”焦姆卡算了一下。“三个星期。”

“太可怕了！”阿霞耸耸肩膀。“能把人闷死！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手风琴！病房里整天在谈些什么——我不问可知！”

于是焦姆卡更不想告诉她，自己整天在用功学习。他所看重的一切都顶不住从阿霞嘴里很快地吹出来的气流。

现在他觉得这一切的价值被夸大了，结果一戳即破。

焦姆卡不屑地微微一笑（其实他心里并不认为可笑），说：

“比方说，有人就在讨论：人们靠什么活着？”

“这话怎么讲？”

“大概是指活着的目的。”

“喽！”阿霞对什么都能发表见解。“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也出过这样的作文题：《人为什么活着？》她还提供思考题：关于种棉花和挤牛奶的能手，关于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问你对保尔·柯察金的功勋怎么看，对马特洛索夫的功勋抱什么态度。”

“你抱什么态度呢？”

“什么态度？那就是问：你自己是不是也会这样做？这是不能回避的。我们都写上：我们也会这样做。都快毕业考试了，何必把关系搞坏？萨什卡·格罗莫夫问：‘是不是非这样写不可？能不能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写？’老师对他说：‘“照自己的想法写”？你敢！我要叫你尝尝棍子的滋味！……’①一个女生在作文上写的可滑稽哩，她说：‘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爱我的祖国。’老师立刻暴跳如雷：‘这思想太可怕！你怎么可以不爱祖国？’‘我也许爱它，可是我不知道。这需要得到证实。’‘什么也不用证实！你在吃母亲奶的时候应当把对祖国的爱也吸收到血液里！这篇作文得彻底重写，在下一堂课之前交卷！’我们都管那老师叫蛤蟆。

① “棍子”指五分制的最低分数——“1”分。——中译者注

她走进教室，从来没一丝笑意。这也不难理解：她是个老处女，个人生活不如意，尽在我们头上出气。她特别不喜欢长得俊的。”

阿霞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对每一张面孔的价值都拿得准。她看来没有经历过疾病、疼痛、折磨的任何一个阶段，没有尝过吃不下、睡不着的滋味，还没有失去娇艳的丰姿和红润的脸色，她只不过是从健身房、跳舞坪跑来作三天检查的。

“那末，好的老师有没有？”焦姆卡问，目的是要她继续讲，不要停，他可以一直望着她。

“没有！全都象绷着脸的火鸡！反正学校里就是那么一回事！……不提也罢！”

她那健康、乐观的风貌也感染了焦姆卡。他坐在那里，默默地感谢她滔滔不绝的扯淡，自己已不再感到拘束。他什么也不想同她争辩，愿意不顾自己的信念赞成她所有的看法。在腿的问题上他也可以扫除愁绪，同意她的说法，奈何噬性疼痛提醒着他：他让自己的腿陷入了泥潭，究竟能拔出多少来还不知道。也许得截去半条小腿？截到齐膝盖？还是半条大腿？为了这条腿，“人们靠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仍然是个大问题。因此他问道：

“那末你是怎么想的呢？人活着……究竟为什么？”

真不简单，这个小姑娘没有不清楚的事！她用一双带点儿绿颜色的眼睛向焦姆卡看了看，似乎疑心他在装蒜，不大相信他是认真提问。

“那还不清楚？当然是为了爱。”

为了爱！……托尔斯泰也说“为了爱”，那是什么意义上的爱？老师也要求他们回答“为了爱”，那又是什么意义上的爱？焦姆卡毕竟有刨根究底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可是，要知道……”他的声音变得有点嘶哑(虽然不再感到拘束，可是到底不便直说)，“爱情……爱情并不等于全部生活。这……是有时间性的。从一定的年龄开始，到一定的年龄……”

“从什么年龄开始？你说从什么年龄开始？”阿霞气冲冲地诘问，好象焦姆卡侮辱了她。“我们的年龄正是最美妙的时节，还等什么时候？除了爱情，生活中还有什么？”

她扬起两道眉毛，信心之足根本不容置疑，焦姆卡也不提出异议。反正他只要听，不想争辩。

她侧身面朝着他，上体前倾，虽然一只手也没有伸出来，却好象张开两臂穿过大地上所有的断垣残壁，说：

“这就是我们的永远！这就是我们的今天！至于别人的两片嘴皮子翻什么花样，你甭理他！爱情——这就是一切！”

她对他的态度是那样直爽，好象他们已经有一百个晚上在一起无话不谈……。如果没有那个嗑葵花籽儿的女工友、一名护士、两个棋手以及拖着脚步在走廊里经过的病人，她似乎准备在此时(他们最美妙的青春期)此地(这个角落里)当场帮助他理解人们靠什么活着这个问题。

焦姆卡忘记了腿上一刻不停地(包括睡梦中)、甚至刚

才还在折磨他的噬性疼痛，好象根本没有这么一条坏腿。他望着阿霞敞开的领子，他的嘴微微张开。以前母亲干的时候曾经引起他极度厌恶的事情，此刻在他心目中第一次显得无须愧对世上任何人，第一次显得纯洁无邪，傲然凌驾于人间的一切丑恶之上。

"你怎么啦？……"阿霞用近乎耳语的声音问，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但带着同情的意味。"你直到现在还没有？……傻孩子，你还没有？……"

焦姆卡感到耳朵、脑门、脸上热辣辣的一阵，仿佛在偷东西的时候被当场逮住。多少年来他坚信不移的一切，仅仅二十分钟就被这个小姑娘统统打垮。他感到喉咙干渴，简直象求饶似地问：

"你呢？……"

如同她的晨袍里边只有睡衣、胸膛和心房一样，她也不用言语向他隐瞒任何事情。她认为没有隐瞒的必要。

"我是从九年级开始的！……我们那儿有一个在八年级的时候就怀孕了！有一个在家里被逮住，她……收人家的钱，你懂吗？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储蓄存折！别人怎么知道的？她把存折夹在学生手册中忘记了，结果被老师发现。现在我们只有一半姑娘还没有！……愈早愈带劲！何必等到将来？如今是原子时代！……"

第十一章

桦树癌

星期六晚上那种看不见的轻松气氛还是可以感觉得到。癌症楼的病房里也是如此，尽管不知道为什么。事实上，病人在周末并不能摆脱自己的疾患，更不能把愁绪撇开。他们只能摆脱同医生的谈话，摆脱照光、打针等主要治疗方法，而人身上永远保持稚气的那根心弦所喜欢的显然正是这一点。

跟阿霞闲谈过后，焦姆卡步步留神地搬动愈来愈疼的腿，上楼走进自己的病房，发现那里热闹异常。不光是本室的人和西布加托夫都在，还有从楼下来的客人：其中有几个是熟人，例如从放射病室里放出来的倪姓朝鲜族老人（在给他舌头上插镭针期间，他被锁了起来，好象贵重物品藏在银行保管库里）；也有新来的。一个仪表堂堂的俄罗斯族新病人，灰色头发梳得高高的，他的患处是咽喉，只能象耳语一般说话，此时正坐在焦姆卡铺位上，占去了半张床。大家都在听，甚至不懂俄语的穆尔萨里莫夫和叶根贝尔吉耶夫也在听。

说话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他不坐在床上，而是高踞

在床边的窗台上，这一点也表明话题非比寻常。（比较严格的护士不让他坐在那里，但值班的男护士图尔贡是自己人，他懂得这不会使医学科学头脚颠倒过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穿着袜子的一只脚踩在自己床上，另一条腿象一把吉他搁在前一条的膝上，身子微微摇晃，激昂慷慨地向整个病房大发议论：

"从前有一位名叫笛卡儿的哲学家，他说过：'一切都可以怀疑'！"

"这不适用于我们的现实！"卢萨诺夫举起一个指头严肃地提醒他。

"那当然，"科斯托格洛托夫甚至对他的异议感到惊讶。"我只是想说，我们不应当象兔子一样听任医生摆布。瞧，我在读一本书，"他从窗台上拿起一本翻开的大开本书来。"阿布里科索夫和斯特鲁科夫为高等学校合编的教科书《病理解剖学》。这里谈到，肿瘤的演变同中枢神经活动的联系还远远没有研究到家。可是这种联系却非常奇妙！这里甚至明明白白地写着，"他找到了需要的一行字句，"'尽管很少，但是确有自行痊愈的例子'：你们注意到没有，上面写的不是'治愈'，而是'痊愈'！懂吗？"

病房里活跃了起来。仿佛从那本翻开的大书里飞出一只触摸得到的彩蝶——自行痊愈；每个人都伸出前额和面颊，希望蝴蝶大发慈悲用翅膀来碰一下。

"自行痊愈！"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书放下，挥动一双张开十个指头的手，一条腿仍象吉他似地搁在膝上。"这就是说，

肿瘤会莫名其妙地突然朝相反的方向缩回去！先是缩小，继而散开，最后消失！懂吗？"

大家都不作声，听得嘴也忘了合拢。但愿肿瘤，他的那个害人不浅、把他的生活彻底搅乱的肿瘤，会突然流去脓水，消退平复，化为乌有……

大家都不作声，等蝴蝶来吻自己的脸，只有波杜耶夫绷着脸把床摇得嘎吱嘎吱直响，眉头打着死结，用沙哑的嗓音说：

"这恐怕非要……良心干净不可。"

在场的人并非个个都明白，他的话是指正在谈论的事情呢，还是另有所指。

但是，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这一回不仅注意地、甚至怀着一定的好感在听邻床的食骨者发表宏论。他神经质地转过脸去申斥波杜耶夫：

"你这是唯心主义的谬论！这跟良心有什么相干？你应当感到惭愧，波杜耶夫同志！"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却抓住了那句话：

"说得好，叶甫列姆！说得好！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屁也不懂。比方说，战后我从一本杂志上（好象是《星》）读到过一篇极其有趣的东西……。据说人的脑袋口子上有一道血髓屏障，只要那些可以致人死命的物质或细菌被挡在障壁外面不能进入大脑，人就活着。那末，这究竟取决于什么呢？"

那位研究地质学的青年自从进入病房，始终手不释卷，

这时也捧着一本书坐在靠近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另一扇窗边的床上，间或抬头听人们的议论。这时他也抬起头来。客人们在听，本室的也在听。炉边的菲德劳侧身蜷卧，靠在枕头上听；他的脖子还是洁白的，但已经被灾厄所困。

"……原来在这道屏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钾盐与钠盐的比例。我记不得是其中哪一种盐，假定是钠盐吧，如果钠盐居上风，什么也奈何他不得，障壁不会被突破，人就死不了。相反，如果钾盐居上风，障壁便不起保护作用，人就会死掉。至于钠和钾的比例又取决于什么——这才是最有意思的问题！它们的比例取决于人的情绪！！懂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精神饱满，心情舒畅，障壁内的钠占优势，任何疾病都不能置他于死地！但只要他情绪低落，优势立刻转到钾一边去，那就可以准备后事了。"

地质学家带着安详的会意表情听着，象一个有经验的大学生，大致能料到黑板上下一行将写些什么。他以赞同的口吻说：

"乐观生理学。主意很好。非常好，"说完，他重又抓紧时间埋头看书。

对这一点，连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没有异议。食骨者讲来头头是道。

"再过一百年，"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如果发现我们的机体在问心无愧时还会分离出一种铯盐，而在问心有愧时则分离不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将不感到奇怪。细胞会不会形成肿瘤，或肿瘤能不能消退，将取决于这种

铯盐。”

叶甫列姆发出一声嘶哑的叹息。

“我糟蹋过好多娘们。生了孩子又把她们扔下。她们哭得很伤心……。我的肿瘤消不了。”

“这是说到哪里去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发作了。“这是赤裸裸的宗教迷信！波杜耶夫同志，您读了太多乱糟糟的东西，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不要再唠叨什么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之类的胡说八道。”

“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碍着您什么啦?”科斯托格洛托夫反唇相讥。“您干吗这般恼火?谈道德修养会刺痛什么人?只会刺痛道德败坏的人!”

“您……不要忘其所以!”只见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眼镜及其边框倏地一闪，此刻他的脑袋又直又正，根本不象有任何肿瘤从右边压迫他的下颌。“某些问题早有定论!您已经不可以再说三道四。”

“为什么不可以?”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双漆黑的大眼睛直盯着卢萨诺夫。

“算了，算了!”其他病人纷纷插进来劝解。

“喂，同志，”坐在焦姆卡床上那个发不出声音的人嗞嗞地说，“您刚才是从桦树菌说起的……”

可是卢萨诺夫和科斯托格洛托夫各不相让。他们过去素不相识，可是都恶狠狠地瞪着对方。

“既然想要发表意见，就该具备起码的常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咬牙切齿地吐着每一个字音，教训他的对手。

“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之流的道德自我修养问题，列宁的文章已经一劳永逸地下了结论！斯大林同志也写到过！高尔基也写过！”

“很可惜！”科斯托格洛托夫强抑怒气向对方伸出一只手答道。“世上任何人对任何事下的结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否则生活会停滞不前，世世代代的后来者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一时竟告语塞。他那灵敏的白耳朵的外缘开始涨红，面颊上有些地方泛起圆圆的红斑。

（现在该做的不是参与星期六的抬杠拌嘴，而是要查一查，这个家伙是何许样人，来自何方，背景如何，他那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有无危害。）

“关于社会科学，我并不认为自己在行，”科斯托格洛托夫急忙说，“我很少有机会学习。但我凭自己的头脑这样理解：列宁指责列夫·托尔斯泰不该在道德修养会使社会偏离反对暴政的斗争、偏离酝酿中的革命的时候提倡道德修养。难道不是吗？那您为什么不许人家开口？”他用两只大手指着波杜耶夫。“人家是在生死边缘上思索生命的意义。如果他在思索的过程中读托尔斯泰的著作，您为什么这样恼火？这又碍着谁啦？难道要把托尔斯泰的书烧掉？难道您认为政府的教务管理局干得还不彻底？”

（由于对社会科学缺乏研究，科斯托格洛托夫把“至圣的”搞错成“政府的”。）

现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两只耳朵全部涨得通

红。这已经是对政府机构的直接攻击（尽管他没有听清究竟是政府的哪个机构①），而且当着一群未经挑选的听众，这就使得局面更形严重，必须适可而止地结束辩论，以后一有机会就把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人查一查。于是，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暂时不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仅向波杜耶夫那边摆一摆头，说：

"还是让他读奥斯特洛夫斯基②的作品比较有益。"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不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这份情，他压根儿没有听见、也没有理会那句话，继续在没有分析能力的听众面前大放厥词。

"为什么要妨碍人家思考？我们的生活哲学归结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生活是多么美好！……我爱你，生活！活着是为了幸福！'多么深刻的感受！但是，用不着我们费心，任何动物——鸡、猫、狗——都会这样讲。"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预先发出警报；现在他不是在履行公民义务，不是作为历史的主体，而是作为客体说话。"不要谈论死亡！连提也不要提！"

"求我也没有用！"科斯托格洛托夫连连挥动一只铲子似的大手。"这里不谈死亡，到什么地方去谈？'啊，我们长命百岁！'"

---

① 托尔斯泰曾被帝俄时代的教务管理局（全称为"至圣的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开除教籍。由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说得准确，卢萨诺夫以为他在攻击当代的政府机构。——中译者注

② 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36）。——中译者注

“那末您打算怎样呢？”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简直在哀求。“难道老是谈论死亡，老是考虑死亡？让钾盐占上风？”

“不必老是谈，”科斯托格洛托夫自知陷入了矛盾，也就稍微冷静了些。“不必老是谈，但偶尔谈谈有好处。因为我们一辈子对人强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话固然不错，但这仅限于他活着的时候。一旦死亡的时刻来临，我们就不要他留在集体之中。他虽是成员之一，可是死的只是他一个人。肿瘤生在他一人身上，不是生在整个集体身上。您也是这样！您，您！”他很不客气地指向卢萨诺夫。“您说，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死！！您最怕谈的是什么？死！这叫什么？口是心非！”

“只要不越出理智的范围，这也是常情，”赚人好感的地质学家说得很轻，但大家都听到。“我们是那么害怕死亡，甚至竭力不去想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我们连坟墓也不去修葺。”

“这倒是事实，”卢萨诺夫表示同意。“英雄的纪念碑必须善加维修，这一点报上也谈到了。”

“不光是对英雄，对所有的人都应如此，”地质学家用他那仿佛拔不高的嗓音心平气和地说。他的身量也相当单薄，从肩膀看不出有多少膂力。“我们有好多公墓颓败得不成体统，我在阿尔泰和去新西伯里亚的路上都看到过。没有围墙，牛在那里吃草，猪在那里乱闯。这难道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不，我们对坟墓是尊重……”

“恭敬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提示他。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再听下去，他失去了同他们辩论的兴趣。他刚才出了神，一不小心让肿瘤牵动脖子和头部，疼得他再也没有那份雅兴去开导这班糊涂虫，澄清他们的胡思乱想。说到底，他进这所医院纯属偶然，在病情发展到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不应该同这些人待在一起。而主要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一点是：昨天打针以后，肿瘤丝毫未曾消退或软化。想到这里，他心都凉了。食骨者自然可以侈谈死亡，反正他自己正在复元。

坐在焦姆卡床上的客人——发不出声音的魁梧男子——支着疼痛的喉咙，几次想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打断这场不愉快的争论，但人家听不见他的咝咝声，而他又不能说得更响，只得把两个指头按在喉咙上减轻疼痛，帮助发声。因喉舌的疾患而丧失说话能力往往使我们分外苦闷，而整个面部就成了反映这种苦闷的一面镜子。刚才只见他双手乱摇试图阻止争吵，此时只有地质学家一个人在说话，声音又和婉，人家比较容易听到这位客人想发表意见，而且他已经走到病床间的通道里。

“同志们！同志们！”他声嘶力竭地说，使旁人也为他的喉咙感到难受。“不要提这些丧气的事情！我们的心境已经给病搞得够坏了！喂，您这位同志！”他从通道里走过去，几乎象哀告神明一般向头发蓬蓬松松、高踞在窗台上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按在喉部）。“关于桦树菌的故事您开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头。请您继续讲下去！”

“奥列格，讲白桦蘑菇！你刚才怎么起的头？”西布加托夫央求着。

古铜色皮肤的倪老头也费力地转动舌头，咿咿呀呀提出同样的要求；他的舌头一部分已在过去的治疗过程中脱落，余下的现在处于肿胀状态。

别人也纷纷要求他讲。

科斯托格洛托夫产生了一种反常的轻松感。多少年来，他一直惯于在自由人面前默不作声，手抄在背后，脑袋低垂；这种姿势象先天性伛偻那样成了他的天生特征，甚至经过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没有改过来。在这个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散步时，他的手至今以抄在背后为最自然。多少年来，自由人被禁止与他这样的人平等交谈，甚至不得把他们当作人与之认真商量事情，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收下他的一封信；这些不明真相的自由人现在坐在他前面，听他无拘无束地高踞在窗台上给他们讲课，等待着某种力量来支持他们的希望。奥列格此刻注意到，他也不象习惯的那样把自己同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和他们联合起来。

他尤其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发言，正象不习惯参加各种集会一样；可是现在一下子要他演讲，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难以想象，仿佛在做一场怪可笑的梦。然而，如同溜冰时起跑后刹不了车，只能顺势飞也似地滑过去再说；他就是这样，顺着自己始料不及、但看来确定无疑的痊愈趋势，兴冲冲往下讲。

"朋友们!"他一反平时的作风,话也多起来了。"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是听一个来接受定期检查的病人说的,当时我还在等待住进这所医院。我抱着反正不冒什么风险的心情寄了一张明信片去,回信地址写的是医院。不料回信今天已经来了!前后过了十二天,居然接到回信。马斯连尼科夫还为没有立刻答复向我表示歉意,因为他平均每天要复十封信。而每一封这样的信至少得写半个小时!这样,他一天单是写信的时间就要花五个钟头!而且这是完全没有报酬的!"

"相反,每天还得花四个卢布买邮票,"焦姆卡插了一句。

"是啊。一天四个卢布,一个月就是一百二十卢布!这不是他的职责,纯粹是他出于好心做的事。或者叫做……"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时想不起来,便转向卢萨诺夫问,"叫做……人道精神,是吗?"

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在读报上一篇预算报告的结尾部分,装做没有听见。

"他手下没有任何班子,既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这一切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他也得不到什么荣誉!老实说,在我们病人眼里,医生好比渡船的艄公;需要的时候来请教,过后便往脑后抛。他治好了人家的病,人家就把信扔掉。他在信尾抱怨某些病人,尤其是得到他帮助的那些人,不再跟他通信了。他们不把服用的剂量和效果写信告诉他。他还请求我按时给他写回信!其实我们应该一躬到地

向他致敬才对!”

科斯托格洛托夫打心底里承认，马斯连尼科夫的无私和勤勉使他感动，并愿意谈一谈、夸一夸这个人。可见他自己还没有完全堕落。然而已经堕落到不可能象马斯连尼科夫那样天天为别人出力。

“奥列格，你顺着次序讲!”西布加托夫面带希望的微笑提出要求。

他是多么希望病好啊! 多少个月、多少年折磨人的治疗显然已告无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自己的病有朝一日会霍然而愈! 他是多么希望背上的创口愈合，能够挺直腰板、步伐坚定地走路，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个男子汉! 希望能够向董佐娃大夫打招呼:“您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 我的病好啦!”

他们人人都想听他谈谈这位妙手回春的神医，谈谈此地的医生所不知道的那种药。他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相信某个地方有这样一位神医，这样一个草药郎中，或者这样一个老巫婆，只要打听到究竟在什么地方，弄到这种药，他们便能得救。

他们的生命难道就此完结了吗? 不! 不!

我们身强力壮、幸福顺遂的时候，对于各种奇迹往往付之一笑; 然而，倘若生活把我们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到了只有奇迹能够解救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这独一无二的奇迹!

科斯托格洛托夫也融合在所有他的聚精会神的听众强

烈的愿望之中，讲得有声有色，此刻他相信自己的话甚至超过读信时对信上的话的信任。

"沙拉夫，如果要从头讲起，事情是这样的。据那个来接受定期检查的病人告诉我，马斯连尼科夫大夫原是莫斯科附近亚历山德罗夫县地方自治会派任的医生。按照旧日的惯例，他在同一所医院里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他注意到，尽管医学书刊上关于癌的文章报道愈来愈多，可是他的农民病人中却没有人生癌。这是什么缘故？……"

（对啊，这是什么缘故？！我们小时候谁不害怕神怪？从严严实实、但又容易推开的墙壁后面，保不住什么时候会挤出某人的一侧肩膀或一条大腿来，我们一碰到那堵墙壁就会吓得发抖。今天科学昌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神怪异象的容身之地，但也难保神怪不会突然向我们现身，说："我来了！不要忘记！"）

"……于是他开始研究，于是他开始研究，"科斯托格洛托夫平时话不说两遍，可是现在却津津有味地重复着，"结果发现这样一件事：当地的庄稼人为了节省买茶叶的钱，平时都不煮茶，而是熬一种恰嘎——也就是桦树菌。"

"原来是鳞皮牛肝菌①，"波杜耶夫打断了他的话。最近几天他已经绝望认命，不声不响，现在连他也看到，这种普通的、不难弄到的药物也许是一线光明。

在场的大都是南方人，别说鳞皮牛肝菌，就是桦树本身某些人也从未见过，所以更加不能想象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① 长在桦树林里的一种顶上呈褐色的菌子。——中译者注

的是什么东西。

“不，叶甫列姆，不是鳞皮牛肝菌。总之，这甚至不是桦树菌，而是桦树癌。你如果记得的话，老桦树干上有这种……叫做木瘤的东西，那是一层脊状的赘生物，外面是黑的，里面是深褐色的。”

“那末，是引火菌？”叶甫列姆继续追问。“从前人们能在上面打出火来。”

“也许是。谢尔盖·尼基季奇·马斯连尼科夫想到：几百年来，俄国农民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靠这种恰嘎治好了癌。”

“您是说这种办法起了预防作用？”青年地质学家会意地问。今天晚上他没法读书，不过这席话值得听一听。

“可是光猜想还不够，懂吗？一切都必须经过检验。还必须对喝这种土茶和不喝这种土茶的人进行多年的观察。还得让身上出现肿瘤的人喝这种煎汁，而这就要承担不用其他手段对他们进行治疗的责任。并且需要摸准熬到什么温度、用多少剂量比较合适：是煮滚好，还是不煮滚好；一天喝几杯；有没有后遗症；对哪些肿瘤效果好，对哪些肿瘤效果差。在这些研究上花费了……”

“那末现在呢？现在怎样了？”西布加托夫焦急地问。

焦姆卡在想：难道对腿也有好处？难道能保住腿？

“现在？现在他回信了。他在信上告诉我，该怎样进行治疗。”

“您有他的地址吗？”那个无声的病人急切地问，他一只

手始终捂住嘶哑的喉咙，一只手已经从上衣口袋里摸出笔记本和自来水笔。"服法也写着吗？他是否写明，对喉头肿瘤有没有效？"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虽然很想争一口气，以彻底的蔑视来对他的邻居实行报复，但是这样的机会却不能放过，这样的故事不可不听。提交最高苏维埃会议审查的一九五五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意义和数字，他再也看不进去。他放下报纸，面孔逐渐向食骨者这边转过来，并不掩饰自己所抱的希望——希望这种普通的俄罗斯民间土方也能治好他——俄罗斯人民的儿子——的病。为了不惹食骨者恼怒，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完全没有敌意地问（不过还是令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那末，这种疗法是不是得到正式承认了？有没有在哪一级获得批准？"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窗台上居高临下冷冷地一笑，说：

"批准不批准我不知道。不过，这封信，"他扬了扬用绿墨水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小张有点发黄的纸，"讲的是具体方法：怎样捣碎、溶解。不过，我认为，如果这种疗法得到上级的批准，护士早已经发给我们喝这种煎汁了。楼梯上会放着一只桶。也就不必写信到亚历山德罗夫去。"

"亚历山德罗夫，"无声的病人已经把它记下。"哪个邮区？什么街？"他记得很快。

阿赫马章也听得很有兴趣，还给穆尔萨里莫夫和叶根贝尔吉耶夫翻译大意。阿赫马章自己不要这种菌子，因为

他正在康复中。但有一点他不明白：

“如果这种菌子是好东西，为什么医生不采用？为什么不收入药典？”

“说来话长，阿赫马章。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愿重新学习，所以多方阻挠；有些人为了推销自己的一套方法而从中作梗。我们也就无从选择。”

科斯托格洛托夫回答了卢萨诺夫，回答了阿赫马章，但没有回答无声的病人——没有把地址给他。他之所以不愿给，是因为这个无声的病人不大知趣，尽管看起来仪表堂堂，体态和头部象个银行行长，甚至说是某一个南美小国的政府总理，也充得过。而奥列格不忍叫马斯连尼科夫这样的忠厚长者牺牲过多的睡眠时间给素昧平生的人写回信，因为那个无声的病人肯定要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可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怜悯这条失去了人声的哑嗓子（我们能发声的时候却不知加以珍惜）。还有一层，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成了一个生病的专家，对自己的疾患研究到了家，病理解剖学也读了，有问题都从甘加尔特和董佐娃那里得到了解答，现在还收到马斯连尼科夫的回信。为什么竟要他这样一个多年被剥夺一切权利的人来教这些自由人如何在巨石压顶时闪身躲避？在他形成自己的性格的地方，所奉行的处世哲学是：“觅得宝贝莫做声，横财到手不露形”。要是大家纷纷给马斯连尼科夫写信，科斯托格洛托夫第二次就甭想再收到回信。

这一切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在他那带有疤痕

的下颌从卢萨诺夫一边越过无声的病人转向阿赫马章的一瞬间想到的。

"那末服法他写了没有?"地质学家问。铅笔和纸本来就在他面前,他看书时总是备着。

"服法我可以念给你们听,请大家拿好铅笔,"科斯托格洛托夫宣布说。

病房里起了一阵忙乱,大伙互相借铅笔、讨纸片。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什么也没有,(他把一支新式的鹦鹉嘴自来水笔留在家里了!)焦姆卡递给他一支铅笔。西布加托夫、菲德劳、叶甫列姆和倪老头都想记。等大伙准备停当,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慢慢地念信上的话,还附带说明,恰嘎不要晒得太干,怎样捣细,用什么水煎,怎样熬浓、滤清,喝多少。

人们在纸上记下了一行又一行,有的记得快,有的不太利落,就要求重复念;病房里的气氛变得格外温暖、和睦。想想有时候他们互相回答态度很不客气,何必呢?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死。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对,世上还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呢?

焦姆卡记完以后,用他惯常的那种与年龄不相称的粗嗓门慢腾腾地说:

"唔……可是桦树到哪儿去弄呢?……这儿又没有。"

只听得一片价长吁短叹。他们离开俄罗斯已经很久(有几个是自愿离开的),或者甚至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现在想象着这个随和、温厚、没有火辣辣的太阳的地方的景色,时

而笼罩在有利于蕈类生长的霏霏细雨之中，时而春水泛滥，泡烂了田间和林中的道路；在这个静谧的地方，普通的林木对人类却大有用处。住在那里的人对自己的家园并不都很了解。他们想望蔚蓝的大海和香蕉。其实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却是白桦树身上畸形的黑色赘生物、它的病、它的肿瘤。

只有穆尔萨里莫夫和叶根贝尔吉耶夫心里明白，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的草原和高山上一定也有，因为世上每一个地方样样都为人们安排好了，只要掌握知识和本领。

“得托人去采集了捎来，”地质学家对焦姆卡说。这种恰嘎似乎颇合他的心意。

发现并提供这个单方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本人，却没有人可帮他在俄罗斯寻找这种菌子。有的熟人死了；有的不知下落；有的他不好意思去求助；也有的是麦韭不分的城里人，他们连白桦树也不识，更谈不上去找桦树身上的恰嘎。现在他自己心目中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象一条狗去寻找神秘的救命草那样，到森林里去待上几个月，采集大量这种恰嘎，研细后在篝火上熬汁，喝下去把病治好。一连几个月在森林里漫游，除了养好身体，了无挂虑。

但是，他要到俄罗斯去是被禁止的。

而这里其他可以到那边去的人，却不懂得为了一个主要目标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不惜把一切都抛在脑后的人生哲学。他们看到的尽是不值得为之伤脑筋的障碍：怎样弄到证明或请假去寻找这样的宝贝？到哪儿去筹措这笔钱？作这样一次旅行该如何穿戴？带些什么东西？到哪一站下车？

接下来又该上哪儿去打听需要了解的情况？

最后，科斯托格洛托夫轻轻拍着那封信，还说：

“他在这里提到，有些所谓采购员，无非是一批生财有道的精明人，他们收集恰嘎，晒干后寄给委托代购的主顾。不过价钱很贵，一公斤要十五个卢布，而一个月一般需用六公斤。”

“他们凭什么这样做？”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义愤填膺，他摆出一副严厉的上司架势，管叫任何一个采购员看到他的面孔吓得屁滚尿流。“用不费代价取自大自然的东西牟取暴利，这帮家伙的天良何在？”

“别乱朗朗（嚷嚷）！”叶甫列姆向他叱喝（他往往把字音歪曲得特别难听——不知是故意的呢，还是口齿不清）。“你以为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吗？人家也得背着口袋、带着斧头在树林里走好多路。冬天还得踩上滑雪板。”

“但是一公斤总不该要十五个卢布，这帮该死的投机分子！”卢萨诺夫还是不罢休，他脸上又泛起了一个个红斑。

这是一个太大的原则问题。若干年来，卢萨诺夫愈来愈坚定不移地形成一种看法：凡是我国存在的短缺、亏欠、毛病、损失，根源都在于投机倒把，包括小商贩的生意经，例如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街上卖青葱、萝卜、鲜花，一些女人在市集上卖鸡蛋、牛奶，在车站上卖馅饼、苹果、毛线袜乃至炸鱼等等；以及大规模的非法活动，例如从国家仓库“开后门”把东西一卡车一卡车运出去。如果把这两种投机倒把连根铲除，我们所有的毛病很快都能纠正，我们的成就将

更加惊人。如果一个人靠国家的高工资和高额退休金巩固自己的物质地位，那没有什么不好（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也巴望将来能领到特种退休金）。在这种情况下，汽车、别墅、小洋房便都是劳动所得。

然而，倘若同样牌子的汽车、同样标准化设计的别墅是用投机所得买来的话，那就大不一样，因为它们包含着犯罪的因素。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盼望——的确是盼望——对投机商人实行处决示众的办法。公开处决可以迅速而彻底地健全我们的社会。

"好吧，"叶甫列姆也动了怒。"别朗朗，你自己到那里去组织收购。随便你用国家的名义还是合作社的名义。你嫌十五个卢布太贵，就不要买。"

卢萨诺夫知道这是要害所在。他痛恨投机商人，可是现在，如果指望这种新药得到医学科学院的正式核准，指望中俄各州的合作社组织起一整套畅通无阻的采购供应体系——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可等不及啊！

无声的新病人象某大报的一名记者，拿着笔记本爬到科斯托格洛托夫床上去，用嘶哑的嗓门继续追问：

"采购员的地址有没有？……信上是不是提到那些代办人的地址？"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准备把地址记下来。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不知为什么没有回答。不管信中是否有一个这样的地址，反正他没有回答，只是从窗台上下来，在床底下摸一双靴子。他不顾医院的种种禁例，还是藏着一双

靴子，以备出去散步时穿。

焦姆卡把单方藏进床畔小柜，别的什么也不问，十分谨慎地把腿搁到床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弄到那么多钱。

白桦树能治病，但不是人人都治得起。

卢萨诺夫则有点不好意思：刚才同食骨者发生冲突(三天来已不是第一次)，现在又对他讲的事情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兴趣，还向他要地址。也许是想讨好食骨者，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并非存心，而是无意间提到了把他们连结起来的共同的命运。他态度相当真诚地说：

“是啊！世上还有什么能比……(癌？但他生的不是癌！)……比肿瘤……比癌更糟的？”

但是，这个年龄比他大、地位比他高、经验比他足的人如此低首下心，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用绕在靴统上晾干的暗红色绑腿布把腿裹起来，把一只折曲处胡乱打着补丁的、可恶的橡胶布破靴子拔上腿，冲着卢萨诺夫说：

“比癌更糟的？麻风！”

这两个可怕的字象排炮一样在房间里激起强烈的回响。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沉住气皱眉道：

“这话怎么说呢？为什么更糟？麻风的病变没那么快。”

科斯托格洛托夫以阴沉沉、不友好的目光盯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浅色的镜片和浅色的眼珠。

“糟就糟在您还活着就被从世界上剔除，与亲人分离，

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您以为这比癌好受吗?"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同这个粗鲁无礼的人离得这样近,毫无遮蔽地处在他燃烧着阴郁之火的目光下,显得很不自在。

"我是说,所有那些可诅咒的疾病……"

任何一个懂礼貌的人这时都明白,应该顺势迎合对方希望和解的表示。但是食骨者完全不懂这一套。他不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这份情。他已经挺直瘦长的身躯站起来,穿上那件肥大的、几乎拖到靴子上的浊灰色绒布女式晨袍(他在外出散步时当它大衣穿),洋洋得意地抛出一句自以为颇有书卷气的隽语:

"一位哲学家说过:人倘使不生病,就会不知节制。"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有四指宽、搭扣是一颗五角星的军人皮带,用它束在女式晨袍外面,但留神不要把肿瘤部位勒得太紧。他把一支细长的蹩脚烟卷(这种烟卷没抽完就会自行熄灭)揉一揉匀,向门外走去。

嗓门嘶哑的采访者在病床之间的通道中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让路。尽管具有银行家和政府总理的外表,他那央求的神态却好象科斯托格洛托夫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肿瘤学权威,但即将永远离开这栋房子。他问道:

"请问,喉头肿瘤大约有百分之几是癌?"

嘲笑疾患和不幸固然缺德;但对付疾患和不幸也应该不致招人耻笑才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他脸上惶惑的表情,心想:这个人今天怪可笑地老是在病房里跟旁人纠缠不

清，可是在他的肿瘤出现之前八成是自以为无所求于人的。甚至说话时手指按着喉部患处那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姿势，在他身上不知怎的也显得挺滑稽。

“百分之三十四，”科斯托格洛托夫向他微微一笑，从他旁边侧身而过。

他自己今天是不是太饶舌了？有没有说溜了嘴，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可是那位不安分的采访者死缠住他不放，竟跟着奥列格匆匆下楼，还弯下肥硕的上体，在他肩后咝咝地絮叨着：

“同志，据您看来，如果我的肿瘤不疼，这是好转还是恶化？这说明什么？”

真是些可厌而又可怜的人。

“您是谁？”科斯托格洛托夫停下来问。

“讲师，”这个灰色头发梳得溜光的大耳朵病人象请教医生一般巴巴地望着科斯托格洛托夫。

“讲什么的？是哪门专业？”

“哲学，”银行行长答道，他忽然想到自己的身份，连忙摆好架子。今天他不得不皱皱眉头原谅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合时宜地援引过去的哲学家的话。他没有加以指责，但是他需要知道那些采购员的地址。

“当讲师的偏偏喉咙出了毛病！”科斯托格洛托夫连连摇头。他一点也不后悔没有在病房里宣布采购员的地址。按照他曾经象通过拉丝机一样在那里度过七年的环境中流行的概念，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要是大家都给那些采购员

写信，结果只会把价格抬高，而恰嘎却到不了手。但对个别好人他应当把地址告诉他们。例如那个地质学家，奥列格还没有跟他谈上两三句话，但已经决定告诉他，因为他的相貌以及他为公墓讲的几句话使奥列格很有好感。他也准备告诉焦姆卡，可是焦姆卡没有钱（奥列格自己也没有钱买恰嘎）。对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菲德劳、倪老头、西布加托夫[1]也可以给。但他们可以个别来要，不要就算了。可是这位哲学讲师在奥列格眼里却是个糊涂虫，他给人家上课还能讲出什么名堂来？恐怕只会把思想搞乱。他得了病就这样六神无主，他的那套哲学有个屁用？？？

不过，世上竟有这样不巧的事，偏偏是他的喉咙出了毛病！

"把采购员的地址记下来！"科斯托格洛托夫命令道。"只告诉您一个人！"

口述完毕，奥列格摆脱了他，趁大门还没有上锁，赶紧出去散步。

门外台阶上一个人也没有。

奥列格幸福地吸一口静止的湿冷空气，还没有荡涤尘怀，马上就点起一支烟卷，否则总觉得美中不足（不过，不光是董佐娃，甚至马斯连尼科夫在信中也提及必须戒烟）。

外面一点风也没有，天气不算太冷。借着从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可以看到附近一个水塘表面黑黑的，没有结

---

[1] 他们都属于集道民族，与科斯托格洛托夫同样是流放者。——英译者注

冰。还只有二月五日，可已经是春天了。一层算不上雾的薄霭悬浮在空气里，薄得掩不住远处路灯和窗户的光亮，只是把强光变得柔和了些。

奥列格左边有四棵美国白杨，象四个兄弟紧挨着，向上耸峙得比屋顶还高。另一边只有孤零零的一棵，可是枝杈伸得很开，跟那四棵一般高。它后面就是密密层层的其他树木，这里已是林苑的尽头。

十三号楼门前一座没有遮拦的石阶，由几级梯磴通向一条坡度缓坦、夹在灌木树篱中间的沥青路。现在树木都没有叶子，但还是颇有生气。

奥列格出来散步，沿着林苑中的路径每跨出一步，每一次舒展腿骨，都感到能够稳稳地行走、做一个活人、有一条好腿之可喜。从台阶上眺望的景色使他驻足，他便在这里把一支烟抽完。

对面几栋楼的路灯和窗户光线疏朗柔和。园径上几乎已经没有人走动。附近有一条铁路，当后面没有火车轰隆隆经过的时候，这里可以听到均匀的汩汩之声——那是一条湍急的山涧在那边楼房后的悬崖下面奔流、翻腾。

再往后，过了悬崖，过了山涧，是市里的一个公园。虽然在冬天，可是从那个公园里（或者是俱乐部开着的窗户里）传来管乐队演奏舞曲的乐声。今天是星期六，有交谊舞会……。一些人在跟另一些人跳舞……

奥列格因为别人听他讲了那么多话，还处于亢奋的精神状态。仅在两星期以前，他以为自己跟生活已经永远清

了账；现在，生活又突然回到他身边，这种感觉紧紧地包围着他。诚然，这生活并不向他许诺任何美好的前景或这座大城市里的人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它能提供另外一些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等口令自己在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行动的权利，看星星、看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里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中游泳的权利。是的，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权利。

其中包括同女人谈话的权利。

所有这些数不尽的美妙的权利之得以恢复，是因为他恢复了健康。

他站在台阶上抽烟，觉得津津有味。

音乐从公园里传来。奥列格听着，但听到的不是这音乐，而是发自他心中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他听到这部交响曲阢陧不安的开始部分，听到开始部分一支奇异的旋律。对这旋律奥列格有自己的解释（也许不应当这样理解）：主人公仿佛回到了生活中来，又仿佛本来是一个盲者，刚刚重见光明。他伸出手来抚摩过去熟悉的景物或亲爱的面庞；一边摸索，一边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这些景物并非虚无缥渺，不敢相信他的眼睛开始看得见了。

第十二章

种种欲望如死灰复燃

星期日早晨，卓娅匆匆穿衣上班的时候，想起科斯托格洛托夫曾请她下次值班时一定再穿那件金灰色的连衫裙——上一次在晚上隔着白罩衫他只看到一条领子，他想在日光下再看看仔细。满足某些通情达理的要求是件愉快的事情。今天她穿这件连衫裙挺合适，因为它也算节日服装，而卓娅打算白天能偷点儿闲，等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跟她聊聊。

于是她临时改变主意，换上了那件连衫裙，手掌捏几下橡皮球往上面喷了些香水，把头发梳了一下，但时间已很紧迫，所以一边出门，一边穿上大衣，奶奶几几乎来不及把早点塞进她的口袋。

这是一个灰濛濛、冷飕飕、但已完全不象寒冬的早晨。在俄罗斯，逢到这种天气出门要穿雨衣。在这里南方，人们对冷热的概念也不一样：大热天还穿毛料套服，大衣总是尽量早穿迟脱，谁要是有皮大衣，那就巴不得有几天大冷，可以出出风头。

过了拐角，卓娅就看到她要搭的那路电车，便跟在车后

跑了一条街，最后一个跳上了车，气喘吁吁、面孔通红地待在有风的后车台上。市内的电车都走得很慢，噪音又大，拐弯时轮子在铁轨上发出刺耳的尖叫，而且都没有自动启闭的车门。

在年轻人身上，甚至气急和心跳也是愉快的，因为一下子就会过去，过后将更加充分地感到体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欢畅。

医学院放假期间，光是到医院去值班——一个星期值三班半——对她说来非常轻松，简直是休息。当然，不值班就更轻松；不过卓娅已习惯于双重负担；她半工半读有一年多了。医院里得不到多少实习的机会，卓娅工作不是为了实习，而是为了钱：奶奶的退休金买面包也不够，卓娅的助学金又不经花，父亲从不寄一个子儿来，卓娅也不向他要。她不愿向这样的父亲伸手。

从上次值夜班以来，也就是学校开始放假的最初两天，卓娅没有睡懒觉，她自幼就不习惯于无所事事。首先，她坐下来给自己缝一件春天穿的绉纱短衫，料子还是十二月份领到工资时买的（奶奶经常说："夏天准备雪橇，冬天准备大车"；根据这句谚语的道理，商店里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买得到）。奶奶有一台从斯摩棱斯克搬来的"胜家"牌旧缝纫机，卓娅便在这台机器上缝纫。最初的缝工手法也是奶奶教的，但都已过时。于是卓娅就靠眼看心记向邻居、熟人中上过裁剪缝纫训练班的人学，因为她自己挤不出时间去上这样的课。这两天之内，她没有来得及把短衫完工，却

跑了好几家干洗商店，总算找到一家愿意洗她的一件旧的夏季大衣。她还到市场上去买土豆和蔬菜，使尽手段跟人家讨价还价，两只手提了沉甸甸的两只拎包回来(在商店里买东西通常由奶奶去排队，但是重的东西奶奶拿不动)。卓娅还上浴室去了一次。想躺下来看看书就没有时间了。昨天晚上，她跟同学丽塔上文化宫去参加舞会。

卓娅希望能有比一般俱乐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去处。但是除了俱乐部，没有这样的风气、场所、晚会，可以结识些年轻人。她班上和系里有很多俄罗斯姑娘，可是小伙子几乎没有。因此，医学院的晚会对她没有什么吸引力。

她和丽塔前往的那座文化宫，地方宽敞、整洁、暖和；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楼梯；有镶着青铜边框的落地大镜子——走路或跳舞的时候，老远就看得见你自己；有非常值钱的安乐椅(不过用套子罩了起来，不许在上面坐)。可是，从新年晚会以后，卓娅没有到那里去过，因为她曾在那里遭到很大的侮辱。当时举行的是假面舞会，还设有奖品——奖给最精采的服装。卓娅给自己缝了一件猴装，一条尾巴非常有趣。她的打扮都经过精心设计，包括头发的式样、薄薄的脂粉、色彩的对比，一切都非常滑稽而又美丽，几乎可以稳得第一名，尽管竞争者不少。可是就在发奖之前，几个无礼的小伙子竟用刀子把她的尾巴割下互相传递着藏了起来。卓娅哭了，倒不是因为这些小伙子太可恶，而是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了，认为这个玩笑开得有意思。割去了尾巴，这套服装便黯然失色，卓娅也灰溜溜地泄了气，结果什么奖也没有得到。

昨天，她走进文化宫时还在生它的气，还怀着被侮辱的感情。可是没有任何人或物提醒她猴子尾巴的事。到的人也比较整齐——都是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和厂里的工人。卓娅和丽塔一支舞也没有能一起跳，她们一下子就被分开，在管乐队伴奏下旋转、摇晃、跺脚，痛痛快快连续玩了三个小时。她的身体需要这样松弛一下，需要这样打旋、扭动，身体喜欢交谊舞中最主要的乐趣——公开的、允许的拥抱。而所有的男舞伴都很少说话，偶尔说几句笑话，按卓娅的口味标准则有些愚蠢。后来，一个名叫郭立亚的技术设计员出来送她。他们在路上谈论印度电影和游泳；如果谈什么正经的话题，一定会觉得可笑。到了她家大门口，他们在暗中接了吻，而最倒霉的是卓娅历来叫人神魂颠倒的双乳。它们被他搂得可紧哩！他还试图通过其他途径突破防线。这使卓娅得到一种快感，但同时也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星期日还得早起，——想到这里，一股凉意透入心胸。于是她把郭立亚打发走，自己踏着很老的扶梯飞快地跑上楼去。

在卓娅的女友、特别是医学院的女同学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必须抓紧时机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妙，愈多愈好。在这股思潮的背景前，要在一年级、二年级、直至三年级还保持某种类似老处女的状态，除了把理论背得烂熟以外一无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娅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数次经历过相互接近的各个阶段——先是逐步放宽限制，继而发生偷袭，最后占有；经历过心荡神怡的时刻，即使炸弹落到房子上也不能改变姿势；也经历过平静下

来以后四肢无力的时刻，把散扔的衣物从地板上和椅子上捡起来——本来他们的这些东西决不可能放在一起，这时双方却看到这些衣物在同一个地方，她当着他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起来，好象一点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确实是一种强烈的感受，卓娅到三年级时没有进入老处女的行列；然而，这毕竟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切缺少那种稳定的、有意识的连续性，缺少那种能提供牢固的生活基础、甚至提供生活本身的连续性。

卓娅今年二十三岁，可是她看到的、记住的已经够多了，其中包括从斯摩棱斯克疏散时那段漫长得能叫人发疯的路程，先是坐棚车，接着乘驳船，后来又坐棚车。不知什么缘故，她特别记得车上坐在她旁边的那个人用绳子量每人可在板铺上占多少地位，他证明卓娅多占了两公分。她也记得战时这里饥饿而又紧张的生活，那时人们整天谈的都是食品配给卡和黑市价格，而费佳舅舅常常从卓娅的床边小柜里偷走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面包。如今，她在医院里接触的大多是被癌症揪住后此生休矣的病人，看惯了恶疾带来的痛苦和眼泪，听惯了令人气馁的故事。

同这一切相比，偎依、拥抱等等只能算生活的咸海中的几滴甜水。靠这几滴水总是喝不痛快的。

这是否说明非嫁人不可？说明幸福在于嫁人？同她结识、跳舞、散步的年轻人，个个都表现出同样的意愿——从她那里得到温暖、满足，然后一走了事。他们男人之间在私下说："我本来想结婚，可是只消一两个晚上总能找到个把

朋友，那又何必结婚呢？"

是啊，女人既然如此轻易可得，他们又何必结婚呢？市集上到货集中，西红柿便没法卖高价，不卖则会烂掉；同样，当别人都肯迁就的时候，自然没法摆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

登记也不解决问题，同卓娅互相交接班的乌克兰族护士玛丽亚便有这样的经验：她相信登记，可是一星期后丈夫照样把她抛弃，从此杳无音信。七年来，她独力抚养孩子，还要被认为是个有夫之妇。

因此，在有酒喝的晚会上，如果她这几天身子不爽，卓娅就象工兵在地雷阵中那样步步留神。

卓娅还有比玛丽亚更近的榜样。卓娅看到过自己的父母过的那种颠三倒四的生活：他们一忽儿吵架，一忽儿和好；一忽儿各奔东西，一忽儿又聚在一起；就这样互相折磨了一辈子。重蹈母亲的覆辙对卓娅说来无异于喝硫酸。

这是任何登记手续都不解决问题的一个例子。

卓娅在自己身体内部，在它各部分的比例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整个生活观上，都感到平衡和谐。必须在这种和谐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扩展她的生活。

如果有谁在两手摸她身体的间歇中向她说一些愚蠢、庸俗的话，或者象昨天郭立亚那样基本上照搬电影上的那一套，他马上就会破坏这种和谐，不可能真正赢得她的好感。

卓娅在后车台上一路随车颠晃，听女售票员大声斥责

一个不买票的年轻人(他听着，可还是不买票)，就这样一直站到终点。电车开始绕圈子掉头，而在圈子的另一边已经挤着好多等车的人。被数落的年轻人没等车停就跳了下去。卓娅也跳下车，因为从这里走过去近些。

时间已是八点零一分，卓娅沿着医疗中心蜿蜒曲折的沥青小径撒腿飞奔。作为一个护士，她不应该奔跑；但作为一名大学生，则完全可以原谅。

跑到癌症楼之前，她先脱去大衣，穿上白罩衫，到楼上已是八点十分。要是她接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或玛丽亚的班，非挨骂不可。玛丽亚会绷着脸训她，就象她不是迟到十分钟，而是半班不见人影。不过，幸亏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医学院的学生、卡拉卡尔帕克族① 的图尔贡。他待人一向宽厚，特别是对她。他想在她屁股上拍一下作为惩罚，可是卓娅不让，两人都笑了，结果还是她把图尔贡从楼梯上推下去。

图尔贡虽然还在学习，可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已经被任命为一所乡村医院的院长，他只有最后几个月可以这样嘻嘻哈哈，不必故作正经。

图尔贡留给卓娅一本医嘱簿，另外还有护士长米塔特别交代的事情。星期日没有巡诊，治疗暂停，没有刚接受输血的病人。不过得额外操一份心：不要让家属未获值班医师许可闯入病房。除此以外，米塔照例把没完没了的统计工作自己来不及做的分一部分给星期日白天的值班护士。

① 居住在中亚细亚的一个突厥语系民族。——英译者注

今天要做的是整理去年(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份的厚厚一叠病案卡。卓娅将两片嘴唇嘟成一个圆圈，象要吹口哨似的，指头啪的一声在卡片角上划过，估计一下大概要花多少工夫，还有没有时间剩下来绣绣花，这时她感到旁边出现一个高大的影子。卓娅毫不奇怪地扭过头去（扭头的动作可以有多种多样），看见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过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照例显示他有着一段杀人越货的历史。

“早上好，卓娅，”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十足的绅士风度招呼她。

“早上好，”她摇摇头，似乎什么事情使她不大高兴或发生怀疑，其实并没有什么缘故。

他用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望着卓娅。

“我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请求做了？”

“什么请求？”卓娅皱起眉头表示惊讶(她这一招总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您不记得啦？我还在这件事上占了卦呢。”

“您借过我一本解剖学，这事我记得很牢。”

“我马上把书还给您。谢谢。”

“能懂吗？”

“我认为需要的都懂了。”

“我是不是害了您？”卓娅问，这次倒没有逗他的意思。“我有些后悔。”

“不，不，卓娅！”他急于表明这一点，几乎碰到了她的

手。“相反，这本书给我鼓了气。您做了一件大好事。不过……”他望着她的颈脖，“……请您把罩衫的第一颗钮扣解开。”

“干什么??”卓娅现出很惊讶的神情（她这一招也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不热！”

“您热得很，瞧您满脸通红的样子。”

“这倒是真的，”她爽朗地笑了，自己的确想卸去罩衫，因为刚才跑了一段急路，又跟图尔贡打闹了一通，还没有喘过气来。于是她把罩衫领子解开。

灰地金点的连衫裙一下子放出光彩……

科斯托格洛托夫睁大眼睛望着，几乎不出声地说：

“好极了。谢谢。待会儿可以多露出些吗?”

“那要看您占的是什么卦。”

“我可以告诉您，不过稍晚一点，行不行？今天我们就在一块儿，好吗?”

卓娅象个洋娃娃似地把两个眼珠子转得的溜圆。

“不过您得来帮我的忙。我冒汗发热就因为今天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针刺活人，我可帮不了忙。”

“要是搞些医务统计工作呢？这不是力气活。”

“我一向尊重统计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

“那末您吃过早饭后来，”卓娅向他嫣然一笑，算是预先酬谢他提供的帮助。

早饭已经在送往各个病室。

还在星期五早上下班的时候，给夜里一席谈话激起了好奇心的卓娅，曾到挂号处去看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员登记卡。

原来他叫奥列格·菲立蒙诺维奇（拗口的父名跟他别扭的姓氏倒可配对，不过本名多少缓和了这种印象）。他生于一九二〇年，尽管年已三十四足岁，却没有结过婚（这一点颇难想象）。他确实住在一个叫做乌什-铁列克的地方。他没有任何亲属（肿瘤医院照例要求病人把亲属的姓名也填上）。他本人的专业是地形测绘，现在的工作却是土地测量员。

这一切并不能使人看清他的面貌，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医嘱簿上看到，从星期五开始，每天要给他注射两西西人造雌酚，打肌肉针。

这应该由晚上的值班护士给他注射，不是她今天的份内事。但她把噘成一个圆圈的嘴唇象猪鼻子那样转了几下。

早饭后，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学教科书还来，准备帮她做事；可这时卓娅正在各病房进进出出忙于发放一天应服三次或四次的药。

后来，他们在她的小办公桌旁坐下。卓娅取出一大张纸作绘制表格的底稿。所有的情况都得用一道道杠杠标上去。她向他解释该怎么做（她自己也几乎忘了），一边用一把很重的大尺在纸上画线。

这些“帮手”——小伙子或单身汉（偶尔也有结过婚的）——究竟能帮多少忙，卓娅清楚得很：每次这样的帮忙

总是变成闲聊、说笑、调情，结果表格上错误百出。但卓娅准备忍受这些错误，因为即便是最缺乏创意的调情，总比最重要的表格更有意思。今天卓娅不反对把一场可供值班时间解闷的游戏继续下去。

因此她格外感到惊讶，因为科斯托格洛托夫一下子就停止对她横看竖瞧和用异样的声调说话，他很快就弄懂了该怎样做，甚至倒过来向她解释。他专心致志地整理卡片，读出需要统计的内容，由卓娅在大统计表的格子上做记号。"成神经细胞瘤，"他念着，"……肾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他有什么不懂的，一定问清楚。

需要统计的是在这段时间内每一种类型的肿瘤发生了多少起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各种不同年龄（以十岁为一类）分别有多少。还需要按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和剂量分类。每一类又得分列五种可能的结果：治愈、好转、无变化、恶化和死亡。卓娅的帮手对这五种结果特别注意。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完全治愈的几乎没有，不过死亡也不多。

"我看，这里不让人死在医院里，总是及时叫他们出院，"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有什么办法呢，奥列格？您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她称他奥列格作为工作的酬报。他注意到了，马上很快地瞥了她一眼。"如果看到一个病人已经不可救药，他只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可活，那又何必让他占去一张床位？有些可以治的病人正在排队等床位空出来。再说，incurable 的病

人……”

“in ……什么？”

“就是不治的病人……他们的模样和谈话对可以治疗的病人会产生很坏的影响。”

奥列格这次在护士桌旁坐下，似乎在社会地位和世界对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他——科斯托格洛托夫——已不在不可救药、不应占用床位的 incurable 病人之列。现在别人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谈话的口气，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是完全 curable（可治）的。这次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飞跃完全出乎意料，简直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想起一件事来，但他决定以后再仔细去想。

“是的，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昨天阿卓夫金出院的时候，医生写的是 casus inoperabilis（不能动手术），对他本人不作任何解释。当时我也在场，我总觉得自己好象参与了一场骗局。”

现在他坐的位置不是有疤的一侧对着卓娅，他的面相一点也不凶横。

他们继续在这样融洽的气氛中合作得很好，在午饭之前工作已全部结束。

其实，米塔还留下另一件工作：把化验结果抄在病人的体温记录上，这样可以减少病史的厚度，也便于粘贴。可是一个星期日要干那么多活未免太多了，所以卓娅说：

“谢谢您，非常感谢，奥列格·菲立蒙诺维奇。”

“可别这样称呼！还是跟起初一样叫我奥列格！”

“吃过午饭您得休息一会……”

“我从来不休息！”

“可您是病人哪。”

“说也奇怪，卓娅，您刚走上楼来值班，我的病就完全好了！”

他象欣赏一块金灿灿、红喷喷的大蛋糕那样瞧着她，而自己则一点不象个病人。

“好吧，”卓娅爽快地让了步（她心中愿意）。“这一回我在客厅里接待您。”

她向医生会议室的门那边摆一摆头。

午饭后，她又给病人发药，那间大的女病房里还有些急事要办。与充斥此地周围的疾患和病痛形成对照的是，卓娅意识到自己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胞都是干净而健全的。她特别高兴地感到自己的一对乳房既匀称、又结实；她在病床旁边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时候，只觉得它们沉甸甸的；走得快时，它们就颤个不停。

忙碌的高峰终于过去，卓娅吩咐女工友坐在桌旁，不要让探病的人进入病房，有事情就叫她。她把刺绣的绷子带走，奥列格跟在她后面走进医生会议室。

这是一间明亮的角房，有三个窗户。它的陈设并不是那种不拘一格的款式，因为会计和院长显然都插过手。两张笔直的沙发官气十足，不能调节角度的垂直靠背足以使脖子发生痉挛，嵌在上面的镜子除了长颈鹿谁也照不见自

己的影像。桌子也按令人沮丧的机关格局排列：一张巨大的主席写字台上覆着很厚的有机玻璃，另一张长长的会议桌照例与之垂直相交，一横一直排成T字形。这后一张桌子按照撒马尔罕风格铺着天蓝色的绒毯，使屋子里平添一种明朗的色调。还有几把舒适的小圈椅，因为会议桌旁放不下，在边上形成吊儿郎当的一小簇，这也给人一种较为活泼的印象。

除了十一月七日出版的一期《肿瘤学家》墙报，此地没有任何东西会提醒你这是一所医院。

卓娅和奥列格在房间最亮部分的两把舒服的圈椅上坐下，那里的架上摆着几盆龙舌兰，主要窗户的整块大玻璃外面，有一棵栎树的枝杈伸得比二楼还要高。

奥列格不光是坐着，他整个身体都感觉到这把椅子的舒适，感觉到靠背的弯度恰到好处，感觉到脖子和头部还可以进一步自由后仰。

“真阔气！”他说。“我大概有……十五年没坐过这样豪华的坐位了。”

（既然他那么喜欢坐圈椅，干吗不给自己买一把？）

“现在谈谈您占的什么卦吧？”卓娅问；她的头部的倾斜度和眼睛的表情对于这样的话题相当合适。

现在，他们来到这间没有第三者的屋子，在圈椅里坐下来，唯一的目的是交谈。这时，说一句话，开一声口，飞一个眼风，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谈话的性质将是旁敲侧击，还是单刀直入。卓娅对于前一种作好充分的准备，但她到这里

来的时候，预感到可能出现后一种情况。

奥列格没有使她失望。他把头靠在椅背上，向着她上方的窗子郑重其事地说：

“我占的卦是……一位额前有金色刘海的姑娘愿不愿意到……我们那边的生荒地去。”

他这才正眼看她。

卓娅顶住了他的目光。

“可是，那边等着这位姑娘的是什么呢？”

奥列格喟然长叹。

“我已经对您讲过。可喜的东西不多。没有自来水。熨斗是用木炭烧的。点的是煤油灯。雨天到处是泥浆，太阳一晒尘土扬。永远没有机会穿漂亮衣裳。”

他没有漏掉任何不利的细节，仿佛存心不让她表示愿意考虑！的确，如果永远穿不上好衣裳，生活还有什么意思？然而，尽管住在大城市里有很多方便，卓娅知道比这更重要的是：跟什么人生活在一起？她首先要了解的是那个人，而不是想象那个村镇。

“我不明白，是什么把您拖住在那个地方？”

奥列格笑了起来。

“内务部！岂有他哉?!”

他还是那样把头靠在椅背上享受这份安乐。

卓娅皱紧眉头。

“我也料到这一层。不过，您又不是切禅人，又不是卡尔梅克人，对不对？”

"我是百分之百的俄罗斯人！难道我不可以有黑头发吗？"

他掠了掠自己的头发。

卓娅耸耸肩膀。

"那末……为什么把您？……"

奥列格再次长叹一声，说：

"唉，如今的青年太不懂事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刑法当然毫无概念，也不知道里边有些什么条款，对它们可以作怎样广义的解释。可是你们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中心，居然连集遣移民同行政流犯之间的区别这样起码的知识都没有。"

"究竟有什么区别？"

"我是行政流犯。我被流放不是因为民族属性，而是个人问题①，因为我是奥列格·菲立蒙诺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懂吗？"他放声大笑，"跟'荣誉公民'差不多，只是不准和规规矩矩的公民住在一起。"

他的黑眼睛的目光向着卓娅刷地一闪。

但她并不害怕。不，害怕是有一点儿，但没有吓得魂飞魄散。

"那末，您被流放多久呢？"她轻轻地问道。

① 苏德战争期间及战后，苏联某些少数民族，如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高加索地区的切禅人、卡尔梅克人，曾因与纳粹合作的嫌疑被大批流放到中亚细亚，这些人通称"集遣移民"。"行政流犯"(如科斯托格洛托夫)一般是在劳动营中服刑期满的政治犯，他们仍只能居住在边远地区。——英译者注

“永久！”他象放爆竹似地吐出这两个字。

卓娅甚至被震得耳朵里嗡嗡直响。

“终身流放？”她又问了一遍，声音近乎耳语。

“不，是永久流放！”科斯托格洛托夫重申道。“文件上写的正是永久。如果是终身流放，那末至少死后可以把棺材运出来，而永久流放想必连棺材也运不出来。即使太阳熄灭也不得返回，因为永久比太阳的寿命更长。”

这时她的心才真正缩紧。怪不得他有这道疤痕，怪不得他有时会现出凶相。他也许是一个杀人犯，一个凶神恶煞，他只要一时性起，就可能把她掐死在这里，而她竟冒冒失失地和他一起避开旁人！……

卓娅心想把椅子挪动一下，便于在势头不妙时逃出去；但她还是沉住气没有这样做。她只是把绣花的绷子搁下（她连一针都没有刺过），勇敢地望着既不紧张、也不激动、依旧舒舒服服靠在圈椅里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问道：

“要是提起来会使您难过，您不必对我说。要是可以的话，请告诉我：您被判这样可怕的重刑，到底为什么？”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非但没有因自己犯了罪感到痛心，反而带着无忧无虑的笑容回答：

“卓娅，压根儿没有判决书。我是根据凭单被永久流放的。”

“根据……凭单？？……”

“是的，是这个名称。跟批发部通知仓库的发货单差不

多：什么商品若干包；什么东西多少桶……。所用包装材料……"

卓娅捧住脑袋打断他的话：

"难道对所有的人都这样？"

"不，不能说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纯属第十款的不流放，要是第十款加上第十一款[1]——就得流放。"

"第十一款是怎么回事？"

"第十一款吗？"科斯托格洛托夫考虑了一下。"卓娅，我对您说得太多了，以后您在这类题目上得多加小心，要不然自己也会倒霉的。加到我头上的主要罪名是第十款，判了七年。您可以相信我，凡是被判刑八年以下的完全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但还有第十一款，那是指集团性的活动。第十一款本身规定的刑期好象并不更长，但既然我们是一个集团，就得分别永久流放到天南地北，使我们再也不能在老地方重新聚集。现在该明白了吧？"

不，她还是什么都不明白。

"那末，这是不是……"她想找一个不太刺激的字眼，"是不是所谓的一个帮？"

科斯托格洛托夫发出响亮的笑声。但又突然住口，眉头打结。

"真是妙不可言。跟我的审问者一样，您也觉得'集团'

---

[1] 这里指的是1959年前颁行的苏联刑法典第五十八条。其中第十款是有关个人"反苏宣传"的，第十一款是有关"集团性"宣传的。——英译者注

这个词儿还不过瘾。他也喜欢管我们叫做一帮。我们的确是一帮——一帮一年级的男女大学生。”他目露凶光。“我知道这里不准抽烟，否则就是犯罪；但我还是想抽一支烟，可以吗？当时我们聚集在一起，跟姑娘们调调情，跳跳舞，小伙子们还谈谈政治。也谈论……他。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看不惯。我们并不是对一切都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中间有两个人上过战场，指望战后会有所改变。在五月份考试之前，我们全部被抓了起来，包括姑娘们在内。”

卓娅感到惶惑……。她又拿起绷子。从一方面看，他讲的危险的事情不仅不能向任何人重复，甚至听也不应该听，应该把耳朵捂起来。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没有把任何人骗到黑胡同里去暗杀，这使她如释重负。

她咽下一口唾液。

“我不明白……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

“这该怎么说呢？”他吸一口烟，喷出雾来。他是多么大，而烟卷又是多么小。“我已经对您讲了：我们是学生。助学金够花的时候也喝酒。参加晚会。结果姑娘们也和我们一起给抓去。她们每人被判五年。”他定睛注视着卓娅。“您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在期终考试前突然被捕，一下子关进班房。”

卓娅放下绷子。

她原先以为将从他那里听到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并不可怕，倒是有点象儿戏。

“那末你们这些男学生为什么要这样？”

“什么?”奥列格不懂她指的是什么。

“我是说……为什么要不满? ……为什么要期待改变? ……”

“啊,这的确是个问题! 不错,这的确是个问题!”奥列格无可奈何地笑出声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您又跟我的审问者不谋而合,卓娅。他也说过同样的话。这椅子实在棒! 在病床上不可能这样坐着。”

奥列格又舒舒坦坦地靠到椅背上,一边抽烟,一边眯着眼睛透过大窗子的整块玻璃向外凝望。

虽然已近黄昏,可是本来就灰濛濛的天色却不在暗下去,反而在亮起来。西天的云层在不断地拉开、变薄,而这间屋子的一角正好是朝西的。

卓娅这才认真拿起绷子来绣花。她刺了一针又一针,觉得挺愉快。两人都不做声。奥列格没有象上一回那样夸赞她的手艺。

“那末……您爱的姑娘呢? 她也在里边?”卓娅问,一边继续低头绣花。

“是……是的……”奥列格拖长了语调说,他大概在想什么别的事情。

“现在她在哪儿?”

“现在? 在叶尼塞河一带。”

卓娅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您难道不能想办法跟她待在一起?”

“我没有这个打算,”他淡漠地说。

卓娅望着他，他望着窗外。那末，他为什么不在现今的工作地点结婚？

“是不是要待在一起很难办到？”她总算想出这么句话来问。

“对于没有正式登记过的几乎不可能，”他心不在焉地说。“不过问题不在于此，而是没有必要。”

“您有她的相片没有？”

“相片？”他感到奇怪。“囚犯不准有相片。发现了要撕毁。”

“那末，她是怎么个模样？”

奥列格淡然一笑，眼睛微眯。

“头发垂到肩上，可是末端忽然又往上翘。您的眼睛老是带有几分嘲意，而她的眼睛总是带着几分忧郁。恐怕人就是这样预感到自己命运的吧？”

“你们在营里是不是在一起？”

“不。”

“那末，您是什么时候和她分手的？”

“在我被捕之前五分钟……。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五月份，我们在她家的小花园里坐了很久。直到夜里一点多钟，我才跟她分手后出来。走过一条马路，我就被捕了。汽车就停在拐角上。”

“她呢？”

“第二天夜里也被捕了。”

“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还见过一次面。在对质的时候。我已经被剃去头发。他们指望我们互相揭发。我们没有这样做。"

他把烟蒂捏个不停，不知道往哪儿搁。

"搁那儿，"她指着主席座位前面桌子上一只干净、锃亮的烟灰缸。

西天的浮云愈拉愈长，几乎把嫩黄色的夕阳罩了起来。甚至奥列格顽固不化的面貌也被抹上一层柔和的色彩。

"可是您现在为什么不想去找她呢?"卓娅同情地问。

"卓娅!"奥列格断然说，但略略考虑了一下。"您能不能想象，一个姑娘如果长得俊，她在劳动营里会遭到什么命运?在押解途中，刑事犯首先会在统舱式的车厢里强奸她(到了营里他们也会这样干的)；即使逃过了这一关，营里那些吃闲饭的寄生虫、派工的淫棍、发口粮的色鬼在第一天晚上就会安排她洗澡，让人把她光着身子带进澡堂时从他们面前经过……。当场决定她归谁所有。第二天早晨，他们便向她提出建议：你跟某某人一块儿住，可以在干净、暖和的地方劳动。她要是拒绝的话，他们会千方百计给她吃苦头，非逼得她自己爬着来求饶不可。"说到这里，他闭上眼睛。"她没有死，她活着，顺利服满了刑期。我不责怪她，我能够理解。但是……仅此而已。她也理解。"

两人沉默片时。太阳穿过云层，放出全部光辉，整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欢快而明亮。园里的树木显现清晰的黑色轮廓，而这间屋子里的天蓝色台毯和卓娅的金发也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我们有一个女同学自杀了……。还有一个活着……。三个男同学已经没了……。两个下落不明……"

他身体向一边倾斜，踮起椅子的两条腿，开始摇晃，口中念道：

经过一场风暴荡涤……
我们的人所剩无几……
叙旧点名大半缺席……①

他坐在那里，从椅子里探出上体，眼睛看着地板。他颅顶的头发朝着所有的方向撅出、扭曲。他的头发每天得濡湿、压平两次，干了就往上翘。

他沉默不语，但卓娅想听的一切都听到了。他已把最主要的部分解释清楚：他被禁锢在流放地，但不是因为杀了人；他没有结过婚，但不是因为品质恶劣；事隔这么多年，他谈到过去的未婚妻还是一往情深，看来这个人能够有真正的感情。

他不说话，她也不开口，眼睛时而看着手里的刺绣活，时而看着他。他没有什么称得上美的地方，但眼下卓娅也找不出什么特别丑的地方来。

奶奶说过："你需要的不是美男子，而是一个好人。"经历过这样的遭遇以后还这样刚毅、坚强——这是卓娅从他

---

① 此处以及第232页所引的诗系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所作，他也许是本世纪最著名的俄国诗人。——英译者注

身上得到的主要印象。她清楚地感觉到一种经过考验的力量，而这是她从所结识的男青年那里没有遇到过的。

她一针针地绣着，忽然感觉到他专注的目光。

她举目相迎，但并不抬起头来。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同时以富于表现力的语调开始念：

> 我该召唤谁来共享……
> 这掺有悲哀的欢畅，
> 因为我还活在世上？

"你们不是已经共享了吗？"卓娅悄悄地说，眼睛和嘴唇在向他微笑。

她的嘴唇并不象玫瑰，但也不象搽了口红。那是一种介于朱红与橙黄之间不太炽烈的火焰的颜色。

淡黄柔和的夕阳把他瘦削的脸上的病容也抹去不少。在温暖的残照里，看来他死不了，他能活下去。

奥列格把脑袋使劲一抖，象弹吉他的歌手在一支哀伤的曲调之后开始唱一首快乐的歌：

"嗳，卓娅，您就让我痛痛快快过一个节日吧！我看腻了这些白罩衫。我希望看到的不是护士，而是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我在乌什-铁列克是看不到城里姑娘的。"

"叫我上哪儿给您去找一个漂亮的姑娘啊？"卓娅居然也装起蒜来。

"您只要把罩衫脱掉一会儿，再……走几步就可以了！"

他把圈椅挪后一些，示意她可以在什么地方行走。

"可是我在上班哪，"她还没有依允。"我不能……"

不知是阴暗的事谈得太多了呢，还是房间里一片夕照无限美好，总之卓娅感到那么一股冲动，觉得这是可以做的，而且可以做得不坏。

她放下绷子，象个顽皮的小女孩从椅子上跳下来，上身微微前倾，开始解去钮扣；看她急匆匆的动作，好象她不是准备走几步路，而是打算跑上几圈。

"您拉呀！"她把一只手臂扔给他，仿佛这不是她自己的手臂。

他一拉——一只袖子脱下来了。

"还有一只！"卓娅做了个舞蹈动作，背朝他转过身去，他把另一只袖子也脱下来，罩衫就落在他膝上。卓娅开始在房间里行走。她象个时装模特儿，无论弯腰挺胸都适度有致，两只手时而摆动，时而稍微举起。

她这样走了几步，然后转过头来，向旁边伸出双手站住不动。

奥列格把卓娅脱下的罩衫抱在胸前，眼睛睁得大大地直盯着她瞧。

"妙极了！"他的粗嗓音在室内激起回声。"呱呱叫！"

甚至这块在夕阳下蓝得如此鲜艳的台毯也触发他心中响起昨天出现的旋律——重新认识、重新发现生活的旋律。种种荒唐、纷乱、流俗的欲望正在回到他身上。经过了比一

千年还长的颠沛流离，被剥夺了一切而始终不低头，这柔软的家具、舒适的房间又给他带来了欣悦。他看着卓娅，不光是纯客观地欣赏她，而且有所图，这就给他带来了加倍的欣悦。要知道，半个月以前他是一个垂死的病人！

卓娅胜利地翕动火焰色的嘴唇，带着一种似乎还知道什么重要秘密的调皮神情，朝相反的方向走同样的那几步路，直到窗前。她再一次向他转过身来站住不动。

他没有站起来，还是坐着，但他小扫帚似的一头黑发却自下而上向她凑近。

从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迹象感觉得到，卓娅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力——不是搬柜子时需要的那种力，而是另一种力，它要求对方以同样的力相报。奥列格很高兴，因为他大概能接受挑战，大概可以跟她较量一番。

"卓——娅！"奥列格抑扬有节地说。"卓——娅！您对自己的名字怎么理解？"

"卓娅就是生命！"她的回答口齿清楚，象念一条口号。她喜欢作这样的解释。她站在那里，两手按在背后的窗台上，身子微微倾斜，把重心转到一条腿上。

"跟'卓'① 有没有关系？您有时候是否感到自己跟动物祖先比较近似？"

她用同样的口吻笑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动物祖先有点相似。我们要觅食，哺育后代。这有什么不好？"

---

① 欧洲语言中表示"动物"的构词成分zoo-（俄文зоо-）。——中译者注

她实在应该到此为止！然而奥列格以赞赏的目光全神贯注地望着她，这是在每星期六的舞会上满不在乎地搂抱姑娘的那些城里小伙子所没有的；在这样的目光激励下，她竟进一步伸出两条胳臂，左右开弓打响榧子，并开始全身扭动，唱起了一支流行的印度电影插曲：

"到一处一流一浪！到一处一流一浪！"

但是奥列格忽然正色道：

"别唱！别唱这支歌，卓娅。"

她一转眼就摆出十分规矩的样子，好象刚才压根儿没有唱过、扭过。

"这是电影《流浪者》里的，"她说。"您没看过？"

"看过。"

"是部很好的片子。我看了两遍！"其实她看了四遍，但不知为什么有点说不出口。"您不喜欢吗？流浪者的遭遇不是跟您差不多吗？"

"一点也不象，"奥列格皱眉道。

他没有恢复先前那种开朗的表情，黄昏的残阳已不再为他抹上温和的色彩，可以看出他毕竟是一个病人。

"但他不也是从监狱里回来的吗？他的全部生活同样遭到了破坏。"

"那都是骗人的。他是个典型的'顺手捞'、'野狼嚎'①。"

---

① 指那些职业的刑事犯。他们在劳动营里形成一个地下组织，以恐怖手段对待其他囚犯，偷盗其他囚犯的东西。——英译者注

卓娅伸手想取自己的白罩衫。

奥列格站起来，把罩衫弄弄平整，帮她穿上。

“您不喜欢他们？”她点点头向他表示感谢，开始扣上罩衫的钮扣。

“我恨他们。”他的视线从卓娅身边滑过，目光峻厉，下颌怪难看地微微移动。“这是些猛禽野兽、专靠牺牲别人过活的寄生虫。我国大事宣传了三十年，说他们正在得到改造，他们是我们的‘社会近亲’。其实他们奉行的原则和希特勒一样：如果你还没有被……（这里他们用的是极其难听的骂人话，反正是这么个意思）。如果你还没有被打，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如果在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衣服，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他们以践踏倒在地上的人为乐，还厚颜无耻地用罗曼蒂克的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可是我们却帮他们制造神话，甚至让他们的歌曲在银幕上大唱特唱。”

“制造什么神话？”现在是卓娅仰视着他，仿佛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说来话长，一百年也不够。您要是愿意，我可以说一个给您听听。”他们现在并排站在窗前，奥列格以长者的身份扼住她的肘部，象开导小妹妹似地说（他的动作跟他要讲的话毫无联系）。“这帮顺手捞以侠盗自居，总是吹嘘他们不打劫穷人，不碰囚犯的圣杖——就是说，不侵夺狱中的基本口粮，其余的样样都捞。可是四七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过境站上，我们一间牢房里连一只海狸也没有——换

句话说，从任何人那里都没有什么油水可捞。'顺手捞'占到将近一半。他们象饿狼似地把所有的食糖、面包都占为己有。而牢房里的人员成分相当别致：一半是'野狼嚎'；一半是日本人；俄国人只有我们两个政治犯——我和一位著名的极地飞行员——北冰洋里有一个岛当时还以他的姓氏命名，可他自己却在坐班房。三个'野狼嚎'丧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们的口粮全部抢去，接连三天什么也不给我们留下。于是日本人商量好(他们的话反正听不懂)，夜里悄没声儿地爬起来，把铺板拆下，喊一声'班宰！'①，纷纷扑向那些'野狼嚎'，劈头盖脸地乱打！他们结结实实地揍了那帮强盗一顿！这个场面很值得一看！"

"你们也挨打了吗？"

"干吗打我们？我们又没抢他们的面包。这天夜里我们保持中立，但我们心里在为日本人拍手叫好。第二天早晨，局面恢复正常：我们又实足得到了规定的糖和面包。可是您知道监狱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把日本人从我们牢房里抽去一半，把一些没有挨揍的'野狼嚎'塞进来增援挨过揍的'野狼嚎'。于是'野狼嚎'们又揍日本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有刀子——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残酷地把日本人往死里打。我和那位飞行员实在忍不住了，便加入日本人一边。"

"打俄国人？"

奥列格举起一只手，用指头抚摩从下巴顺着腮颊的下

① 日语：万岁！——中译者注

缘延伸到脖子上的创疤，仿佛想把它抹去似的，一边说：

“就在那一回，我挨了他们一刀。”

第十三章

幻影也纷纷归来

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日早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还是没有消退，也没有软化。他尚未起床就明白了这一点。一大早，他被乌兹别克老头吵醒。那老头从天麻麻亮起就咳嗽，整个早晨一直在耳边咳个不停。真讨厌！

窗外逐渐露白，晦冥无风的一天又开始了，同昨天、前天完全一样，只能增添愁闷。那个哈萨克牧民一早就盘腿坐在床上，活象一个无知无觉的树墩。今天医生不来巡诊，也没有人被叫去照爱克斯光或包扎换药，他这样哪怕直坐到天黑都可以。老是预兆不祥的叶甫列姆又在埋头读托尔斯泰安慰亡魂的书；偶尔起来在通道里走几个来回，把床震得发颤。总算还好，他不再跟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闹别扭，也不跟别人抬杠。

食骨者出去后，病房里整天不见他的人影。彬彬有礼、给人好感的青年地质学家在读他的地质学，对谁也不妨碍。病房里其余的人都挺安分。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想到妻子要来看他，心头稍感宽慰。当然，妻子不可能给他什么具体的帮助，但至少可以

向她诉诉苦：他的自我感觉多么糟糕；打针一点效果也看不出来；病房里的人又是多么可憎。听她说几句同情的话也是好的。还可以要她带一本书来看看——要鼓舞人心的现代书籍。还要她把自来水笔带来，免得象昨天那样出洋相，不得不向一个小青年借铅笔记单方。对了，最重要的是嘱咐她去物色桦树菌子。

归根结蒂，事情还没有完全绝望：打针如果不起作用，还有别的路子可走。最主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这里的环境也在渐渐地适应起来。早饭后，他把昨天报上登的兹维列夫① 那篇预算报告结尾部分看完。今天的报纸也及时送来了。报纸是焦姆卡收下的，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吩咐先给他，并立刻满意地读到孟戴斯-弗朗斯② 政府垮台的消息。（这就是耍阴谋的下场，谁叫他把巴黎协定强加于人！）他准备回头再读爱伦堡的一篇长文章（他从战争年代便很重视此人的社会影响，尽管爱伦堡有时会逸出轨道，不过这些偏向都得到中央报纸的及时纠正），现在先读另一篇文章，内容是贯彻一月中央全会关于大大提高畜产品生产的决议。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就这样打发白天的时间，直至女工友通知说，他的妻子来了。一般说来，卧床的病人有亲属来探望，可以进入病房。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现在

① 当时任苏联财政部部长。——中译者注

② 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曾于1954年组阁。——中译者注

没有精力去证明他是卧床病人，何况他自己认为，还是离开这些灰心丧气的人，到穿堂里去比较好。于是卢萨诺夫用小围巾把脖子裹暖和些下楼去。

在只差一年就是银婚纪念[1]的时候，丈夫对妻子依然一往情深，象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对卡芭那样，倒是不多的。他一生确实没有比她更贴心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象卡芭那样善于同他共享成功的喜悦，分担灾厄的忧患。卡芭不愧为忠实的伴侣、能干和聪明的女人。“她的头脑抵得上一个村苏维埃!”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在朋友面前夸她。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未产生过对她不忠的邪念，她也没有不忠于他的行为。据说，丈夫的社会地位升高了，便开始耻于提及自己的青年时代，这完全是胡说。今天他们的地位与结婚时的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她是通心粉厂的一名女工，他们最初曾一起在那里的和面车间工作，但卢萨诺夫在娶她之前就当上了厂工会委员，专管安全设施。他曾被共青团派去加强商业部门，一年后担任厂办九年制学校的校长。然而，这段时间以来，他们的志趣没有发生裂变，还保持着无产阶级本色。节日里喝了点酒，如果在座的是熟不拘礼的人，卢萨诺夫夫妇还喜欢回忆在厂里的那段往事，并且一起唱当年的工人歌曲。

现在，卡芭宽阔的腰身连同她的玄狐皮、大小同公文包差不多的手提包以及购物袋里满满一袋食品，在最暖和的角落里一张长椅上足足占着三个坐位。她站起来用温暖而

[1] 西俗：结婚二十五周年称银婚；五十周年称金婚。——中译者注

柔软的嘴唇吻了一下丈夫，翻开皮大衣的下摆让他坐在上面可以暖和一些。

“这里有一封信，”她说时嘴角牵动了一下。根据这熟悉的一牵，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即断定，信的内容是不愉快的。卡芭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头脑冷静、深明事理的人，可就是始终无法摆脱这一胸无城府的女人习惯：凡是得到什么消息，不管是好是坏，肚子里总是藏不住，第一句话就把它捅出来。

“得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高兴地说，“既然还有更重要的事，你就说吧，索性把我整死算了！”

但既然捅了出来，卡芭心中也就得到了解脱，现在可以象正常人一样说话了：

“不，不，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表示后悔。“你怎么样，巴申卡，你怎么样？打针的事我全知道了，星期五我给护士长挂过电话，昨天上午也挂过。要是反应不好，我早就赶来了。但我听说情况非常好，是吗？”

“打针的情况确实很好，”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说，他对自己的刚强表示满意。“可是这里的环境，卡芭……环境太糟了！”于是，这里的种种可恶、丧气的事情，从叶甫列姆和食骨者起，一齐涌上心头。他不知道这满腹牢骚打哪一件开始倾吐才好，结果却痛心地说：“要上个单人厕所也没有！真把我憋死了！这里的厕所根本不隔成一间一间！谁都看得见谁。”

（使用公共澡堂和公共厕所不可避免地有损干部的尊

严。在工作单位里，卢萨诺夫总是到另外一层楼去上厕所，不用公共厕所。）

卡芭明白他憋了一肚子气需要吐一吐，所以不打断他的诉说，反而引导他把遗漏的也想起来，让他逐渐把全部牢骚统统抖了底，最后在无可奈何中提出那个得不到回答的问题："给医生们发了工资是干什么的？"卡芭详细问了他打针时和打针后的自我感觉，问了肿瘤的情况，并且解开他的围巾看了一下，还说：据她看来，肿瘤略略缩小了些。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肿瘤没有缩小，但是听到别人说也许缩小了些，对于本人毕竟是愉快的。

"至少没有扩大，是吗？"

"当然没有！肯定没有扩大！"卡芭对此确有把握。

"只要不再发展就好！"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象在恳求，他的声音含着眼泪。"只要不再发展就好！要是象这样再发展一个星期，那还得了？……那不是要？……"

不，他说不出口，他不敢向那个黑洞洞的万丈深渊里张望。然而，他实在太不走运，这一切实在太危险了！

"下一次打针是在明天。到星期三再打一针。万一不见效，那怎么办？"

"那就上莫斯科！"卡芭坚决地说。"咱们决定下来：要是再打两针还不见效，那就坐飞机到莫斯科。星期五你已经给他们挂过电话，后来又自己改变了主意。我给盛佳平打过电话，还找过阿雷莫夫。阿雷莫夫亲自打电话到莫斯科了解，原来不久前你那种病只有莫斯科能治，病人都往那

边送；后来为了培养当地的专家，这里才开始自己来治！不管怎么样，反正医生都是些可恶的东西！他们怎么可以拿活人作原料谈什么生产成就？无论怎么说，我就是讨厌医生！”

“是啊！”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凄然表示同意。“是啊！这话我在此地也向他们说了！”

“我还讨厌教师！为了玛依卡，他们简直把我烦死了！为了拉甫利克不也是这样？……”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擦了擦眼镜。

“如果在我当校长的时代，那还可以理解。当时教师都是异己分子，跟我们不是一条心，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整他们。可是现在，现在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了吧？……”

“对，你听我说！所以我认为把你送莫斯科问题不大，老关系还没有把你忘记，总可以找到一点理由。何况阿雷莫夫跟他们说妥到那边设法把你安排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怎么样？……且等打了第三针再说，啊？”

他们就这样商定，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心里也亮堂了。总不能在这个死气沉沉的鬼地方束手待毙！卢萨诺夫一家一辈子都是讲究实干、积极主动的人，只有在发挥主动精神的过程中他们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

今天他们无须匆忙，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只想在这里跟妻子多坐一会，不要回到病房里去。他有点儿怕冷，因为外面的门经常开关；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便把自

己肩上的披巾从大衣里边抽出来给他裹上。长椅上坐在他们旁边的人也比较干净、有文化。不妨多坐一会。

他们不慌不忙地逐一讨论被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病搁下来的各种问题。他们只回避悬在他们头上的一件事——他的病也许会弄到不可收拾。针对这种可能的结果，他们无法作出任何安排，采取任何对策，想好任何理由。他们对这种结果毫无准备，单凭这一点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诚然，卡芭头脑里偶尔闪现出一些想法，万一丈夫死去，财产和住房如何分配该有个方案，但他俩长期受到乐观主义精神的薰陶，觉得这些事情与其伤脑筋去预先安排或者搞什么颓废主义的遗嘱，不如任其处在不明不白的状态。）

他们谈到工业管理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年从工厂特别科[1]调到那里去的）的同事打电话来表示慰问和祝愿。（他本人当然不管工业，他的活动天地可不是那么狭隘，工业问题有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处理，卢萨诺夫的工作就是专门监督这些人。）同事们都爱戴他，现在听说他们关心他的病情，他自然高兴。

他们也谈到关于他退休的打算。不知什么缘故，尽管他长期在显要的岗位上、在人事处和特别科工作得无懈可击，看来他还是不能实现毕生的理想——领取特种退休金。甚至在数额和起始期上有些优待的机关干部退休金也捞不到，原因是三九年他没有下决心应召穿上军装。可惜！但

① 克格勃的委婉名称。——英译者注

从最近两年不稳的局势来看，也许并不可惜。也许，安定更可贵。

他们也谈到近几年来人们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想改善生活的普遍愿望，希望穿得好些，住得好些，有比较好的家具，等等。谈到这里，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说，如果治疗进展顺利，只是果真象事先向他们言明的那样要拖上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夫，那末，这段时间倒可以用来把他们的住房整修一下。浴室里一条管子早就需要移动一下，厨房的水斗得换个地方，厕所的墙上该铺上瓷砖，而饭厅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务必重新油漆：换去原来的颜色(她已经在考虑具体选择哪几种色彩)，并且上面一定要用金色涂料，现在时行这种式样。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这一切都没有意见，但马上出现一个头痛的问题：虽然工人是国家开施工单派来的，他们凭单子领工资，可是他们一定会向住户勒索(不是要求，硬是勒索)额外的费用。倒不是舍不得钞票。(当然也确实舍不得！)摆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面前的是一个重要得多、气人得多的原则问题：凭什么要他掏钱？为什么他自己只领规定的工资和奖金，从来不要小费或外快？可是那些不顾廉耻的工人为什么除了工资还额外要钱？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等于放弃原则，是对整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不可容忍的让步。每次接触到这类问题，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总是非常气愤。

"卡芭，你说，他们为什么这样不珍惜工人的荣誉？为什么我们在通心粉厂当工人的时候，从来不提任何条件，不

向工长要任何‘润滑油’？我们压根儿不会产生这种念头！……我们绝对不应该促使他们堕落！这跟行贿有什么两样？”

卡芭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随即指出：要是不给他们钱，要是开始时和半道上不请他们“喝一杯”的话，他们一定会报复，给你拆一点什么烂污，叫你后悔莫及。

“人家告诉我，有一位退休的上校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说：一个戈比的外账也不给！结果工人们把一只死老鼠塞在他浴室的下水道里，弄得水流不出去，臭气冲天。”

关于修房子的事他们什么也定不下来。不论接触到哪个方面，生活都是复杂的，非常非常复杂。

他们谈到了尤拉。他们的这个大儿子长成了一种过于温和的性格，好象不会保护自己，缺乏卢萨诺夫抓住生活不放的那股子劲。他们培养他在法学院毕了业，后来又安排了很好的位置，可是，必须承认，他不是干这个工作的料。无论是确立自己的地位，还是结交有办法的人物，他都不会。这次出差说不定会做错什么事。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很不放心。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则为他的亲事操心。开汽车是爸爸逼着他学的，独家住宅也得由爸爸给他去弄，可是在婚姻问题上该怎样点拨他，免得他犯错误呢？因为他太老实了，一个纺织女工也能把他迷得晕头转向；就算他不可能遇上一个纺织女工，因为他从来不去那些地方，但现在他出差去了哇！万一他冒冒失失跟什么人登记结了婚，这一步走起来非常容易，但其结果不光是一个年轻人的

幸福，而且全家惨淡经营数十年的成绩将毁于一旦！盛佳平的女儿便是这样，她差点儿嫁给大学里同班的一个农村青年，男方的母亲是个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你能不能想象：盛佳平家的住宅陈设多么漂亮，他们家经常有负责干部来作客，而餐桌旁忽然出现这么一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婆，连身份证也没有①，竟是他们的亲家母！这象话吗?!……谢天谢地，后来总算查出这位未婚女婿政治上有问题，才救了他们的女儿。

阿薇叶塔（又名阿娃、阿拉）则完全不是这样。阿薇叶塔是卢萨诺夫家的明珠。父母不记得她什么时候给他们带来过不快和烦恼，顶多在小学时代淘淘气。阿娃长得又美，又有头脑，朝气蓬勃。她有很正确的生活观，也善于处事。对她不必督察，不用操心——她无论在小节或大事上都不会走错一步。她唯一抱怨父母的是不该给她取这样一个名字。她说：不要玩这些花样，你们干脆叫我阿拉得了。但是身份证上写的是阿薇叶塔·巴甫洛夫娜。这名字不是挺美吗？寒假快结束了，星期三她将坐飞机从莫斯科回来，一定会赶到医院里来看他。

取名字真是件苦事：生活的要求在不断地变化，名字却要用上一辈子。现在拉甫利克也在抱怨他的名字。目前在

① 指在国内用的身份证。如果没有身份证，苏联公民不能在国内自由移居或调换工作。城市居民持有这种身份证，但集体农民一般没有，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他们除短期出门外不得离开农村。——英译者注（中译者按：以上情况近几年已有所改变。）

学校里还没什么，大家都管他叫拉甫利克，没有人拿他开心；但今年他就要领身份证了①，上面会怎么写呢？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当初父母确实有此用心：让他跟一位部长、斯大林的百折不挠的战友同名②，各方面都向他看齐。可是如今已有一年多要提起"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这个名字也非得极其小心不可。好在拉甫利克一心想进军校，军队里是不称呼正名和父名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做法？盛佳平夫妇也在这样想，不过不向外人道及罢了。就算贝利亚是个两面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夺取政权的野心，尽可以审问他，可以把他秘密枪毙，但为什么要向老百姓宣布这件事？为什么要动摇他们的信念？为什么要在他们思想上引起怀疑？其实，只要等事情过去以后，发一个秘密文件到一定的级别，把问题解释清楚就可以了。而报上就说是因心肌梗塞逝世，还可以举行隆重的葬礼。

他们还谈到了最小的女儿玛依卡。这一年，玛依卡已不再每门功课都得五分。她不仅失去优等生的称号，从光荣榜上除了名，甚至四分也没捞到很多。问题都因升入五年级而起。前几年一直是一位女老师教她，她了解玛依卡，也了解家长；玛依卡的学习成绩非常出色。可是这一年，她

---

① 苏联公民年满十六周岁，由民警局发给身份证。——中译者注

② 斯大林的安全首脑、铁腕人物贝利亚的名字和父名也是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前不久(1953年7月)，他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后被处决。——英译者注(中译者按：本书正面叙事的年代是1955年初。贝利亚于1953年6月被撤职审讯，同年12月枪决。)

有将近二十个老师分教各门课程，每人一星期只来上一堂课，连学生的面孔都不认识，只要完成教学计划便算了事。至于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损害，孩子的性格会受到怎样的摧残——他们难道考虑这些？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决计不惜精力，一定要通过家长委员会把这个学校的秩序整顿好。其实，秩序都是被那套新制度破坏的。为什么要改成男女同校？男女分校施教是成熟的苏维埃教育学的一项卓越成就，为什么把它抛弃？

他们这样无所不谈地坐了几个小时，但他们的谈话有点没精打采，尽管嘴上不说，心里都有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情绪一落千丈，他不相信他们谈论的人和事的真实性，他什么也不想干，此时最好躺倒，让肿瘤贴在枕头上，把头蒙起来。

而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勉强支持着这席谈话，是因为今天上午收到她的弟弟米奈从K市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简直要把她的手提包烧穿。卢萨诺夫夫妇战前住在K市，他们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代，在那里结了婚，所有的孩子也都是在那里生下的。但战时他们疏散到这里以后，没有再回K市，把住房转给了她的弟弟。

她明白丈夫现在对这样的消息不感兴趣，但这个消息不是可以跟一般的朋友随便谈的。全城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可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他。她在竭力安慰丈夫的同时，其实自己也需要别人的支持！她没法待在家里把这个消息憋在自己肚子里。孩子们之中也许只能对阿薇叶塔说

明一切。对尤拉无论如何不能讲。但要告诉阿薇叶塔也得先跟丈夫商量。

可是丈夫跟她在这里坐得愈久，就显得愈骞，使她愈发感到不可能同他谈这个主要问题。

时间愈来愈晚，她该走了。她开始从购物袋里把带来的食品一件件掏出来给他看。她的皮大衣袖子镶着玄狐皮翻口，大得几乎伸不进张开的袋口。

看见了食品(他床畔小柜里还有不少)，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想起另一件对他说来比任何饮食更要紧的事情，其实今天应该首先谈这件事。他想起了恰嘎——桦树菌子！他抖擞精神开始向妻子述说关于这个奇迹、关于那封信、关于那个医生(也许是江湖骗子)的情况，并对她说，必须立即给什么人写信，请他在俄罗斯给他收集这种菌子。

"在我们K市有的是白桦树。叫米奈给我办这件事多方便?!你马上给米奈写信！还可以请别的老朋友也关心一下！让大家都知道我目前的状况。"

巧极了，他自己提到了米奈和K市！卡芭把手提包的搭钮卡嗒卡嗒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只是没有掏出那封信来，因为弟弟信上的措辞色彩相当阴暗。她说：

"听我说，巴申卡，让K市那边的人纷纷谈论你是否妥当，这还需要考虑……。米奈来信说……不过这可能还不是事实……说是……罗季切夫……在他们城里露脸了……。好象已经恢复名誉……。这可能吗?"

她费力地说出又长又拗口的"瑞—阿—比—里—季—

若一万(恢复名誉)”这个词儿，低头看着手提包的搭钮，准备把信掏出来。就在这个当儿，她错过了那一瞬间，没有看到巴申卡的脸是怎样变得比床单更加惨白的。

“你怎么啦??”她失声叫道，他的神色比那封信更使她惊慌。“你怎么啦?!”

他靠到椅背上，用她的披巾尽量把自己裹紧，这象是女人的动作。

“也许这还不是真的!”她用有力的臂膊抱住他的肩膀，一只手还拿着手提包，似乎努力要把它套在丈夫肩上。“还不一定呢！米奈自己也没有看到他。不过，人们这样说……”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惨白的脸色渐渐消退，但他只觉得周身虚软，包括腰部、肩膀和双手，脑袋被肿瘤扭得侧向一边，不能动弹。

“你告诉我做什么?”他以痛苦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难道我的霉还倒得不够?难道我的霉还倒得不够?……”接着，他两次牵动胸部和头部，作没有眼泪的抽噎状。

“原谅我，巴申卡！原谅我吧，巴西克!”她攀住他的肩膀，自己的一头梳成雄狮式的古铜色鬈发也在颤个不停。“要知道我实在没了主意！难道他会把米奈的一间屋子要回去?这样下去会弄到什么地步啊?你该记得，这样的事例我们已听到过两起。”

“还管它什么屋子！让他要回去，让魔鬼去住那间该死的屋子!”他以耳语一般的哭音回答。

“那怎么成？往后叫米奈怎么挤得下？”

“你还是为丈夫想想吧！你想想，我会怎么样？……他信上提到古宗没有？”

“古宗没有提到……。要是他们一个个都开始回来，那会怎样呢？”

“我怎么知道？！”丈夫压低嗓门回答。“他们凭什么现在把那些人一个个放出来？……怎么可以这样残酷地作践人们的头脑？……”

第十四章

审　判

卢萨诺夫满心指望通过这次会见精神上得到鼓励，不料适得其反，卡芭这次还是不来的好。他扶着栏杆晃晃悠悠登上楼梯，身上愈来愈感到恶寒难禁。卡芭穿着皮大衣不能送他上楼，因为一名女工友闲站着专门对家属挡驾，于是卡芭就遣使她把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送到病房并把一袋食品带去。今天的值班护士是眼睛凸出的卓娅（卢萨诺夫不知怎的在第一天晚上曾对她有好感）。这时她坐在值班小桌旁给一大堆登记表挡着，正同粗野的食骨者在那里调笑，没把病人放在心上。卢萨诺夫向她要一点阿司匹灵，她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阿司匹灵要到晚上才给。但她还是量了一下他的体温，后来给他送了些药来。

床畔小柜里的食品换了新鲜的，但是不想吃。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急于躺下，象他所渴望的那样让肿瘤贴在枕头上（此地居然有相当软的枕头，这也是奇事，否则还得从自己家里拿来），用毯子蒙住脑袋。

种种念头在他脑际翻腾、撞击、燃烧，以致他身体的其他部分象上了麻药似地毫无知觉。他已听不见病房里愚蠢

的闲聊；虽然他的床随着地板一起在叶甫列姆沉重的脚步下震荡，他自己却感觉不到。他也看不见天已放晴，看不见太阳在落山之前完全穿透云层，因为夕照不向着房子的这一边。他也没有觉察时间的飞逝。他一度睡着了，也许是吃了药的缘故；这时正醒过来。醒来见电灯已经开亮，他又沉沉地睡去。直到午夜时分，又在一片漆黑和寂静之中醒来。

他感到睡眠已经告终；怪可亲的一层朦胧的迷雾已经消散。这时，恐惧立刻乘虚而入，揪住他胸膛的中央下方，而且愈攥愈紧。

千头万绪一齐兜上心头，在卢萨诺夫的脑海中，在病房里以及更远的黑暗空间铺展开来。

这甚至不是什么思绪，他就是害怕。很简单，就是害怕。他怕罗季切夫说不定明天早晨会冲破护士、工友的阻拦闯到这里来揍他。卢萨诺夫不是怕受审判，不是怕舆论的谴责，不是怕出丑，可就是怕挨打。他一生只挨过一顿打，那是在学校里他念最后一年书——六年级——的时候：晚上在校门口他被等他"算账"的人包围。当时谁也没带刀子，可是他从此一辈子忘不了无情的拳头撅出坚硬的指骨从四面八方迎候他的那种恐怖。

如果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某人是个青年；即使他后来变成老头儿死去，在我们想象中他总是个青年。同样，罗季切夫在事隔十八年之后归来，想必已成了残废，不是耳朵聋了就是得了佝偻病；但在卢萨诺夫想象中他还是当年那个黝

黑健壮的汉子，被捕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在他们两家合用的阳台上练习哑铃和举重。卢萨诺夫和卡芭一起已把检举他的材料写好、送去、呈上，而罗季切夫还光着上身在叫他：

“巴什卡！你过来！你来摸摸我的二头肌。胆子大一点，使劲攥！这下你明白了吧，新型的工程师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我们不是象爱德华·赫里斯托弗罗维奇那样的佝偻病患者，我们是全面发展的人。可是你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在门上包皮革的办公室里都快发霉了。到我们厂里来吧，我把你安排到车间里去，怎么样？不干？……哈哈！……”

他纵声大笑，然后去揩身洗脸，一边哼着：

> 我们是锻工，
> 朝气贯长虹。

在卢萨诺夫想象中，正是这个大汉挥舞着拳头闯进病房里来。他无法摆脱这个虚幻的形象。

当初他和罗季切夫是朋友，同在一个共青团支部，这套住房也是他们共同从工厂分配得来的。后来罗季切夫上工农速成中学，进高等学校；卢萨诺夫则从事工会和人事档案工作。

先是双方的妻子关系不好，后来他们两人也开始交恶，罗季切夫常常用很不客气的语调同卢萨诺夫说话。偏偏那

时卢萨诺夫家开始感到住房太挤——生了两个孩子，只有一间房。各种因素凑在一起，难免意气用事，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便写了这样一份材料，说罗季切夫在同他私下谈话时对业已被粉碎的工业党[①]的活动表示赞赏，并打算在自己厂里纠集一伙暗害分子。不过，卢萨诺夫要求在这一案件中千万不要提及他的名字，也不要进行对质：他一想到这样的会见就害怕。但审讯员向他保证，根据法律卢萨诺夫无须露面，也不一定要当面对质，只要被告本人承认即可。甚至卢萨诺夫的检举信原件也可以不订入该案件的卷宗，因此被告签字承认第二〇六条罪状的时候，决不会发现他这位邻居的名字。

事情本来可以很顺利地过去，谁知半路上杀出了一个古宗——厂党委书记。他接到保安部门的密令，说罗季切夫是人民公敌，必须把他开除出基层党组织。但古宗坚决不同意，并开始叫嚷："罗季切夫是好同志，要开除他就得拿出过硬的材料来。"结果给自己惹了祸：两天后的夜里，他自己也被捕了。第三天上午，他和罗季切夫作为同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成员很顺利地给开除出党。

但卢萨诺夫现在惶惶不安的是，保安部门在向古宗施加压力的两天内，不得不告诉他，材料来自卢萨诺夫。这就

---

① 1930年11月，某些第一流的苏联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作为"暗害分子"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为一个反革命的"工业党"工作。这个党事实上并不存在。对他们的审讯是随后发动大清洗的先兆之一。——英译者注

意味着，倘若古宗在那边见到罗季切夫（既然他们是同案犯，最后总是要见面的），肯定会告诉他。所以卢萨诺夫现今如此担心罗季切夫这次预兆不祥的归来，担心他心目中的死人真的会复活——这本来是绝对无法想象的。

诚然，罗季切夫的妻子也可能猜得到，但她还活着吗？当初卡芭的设想是：一俟罗季切夫被捕，马上叫卡嘉·罗季切娃搬出去，把整套住房都拿下来，阳台也归他们独用。（现在想想很可笑，没有煤气的住宅里十八平方的一间房子竟会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关于那间房子过户的手续都办妥了，有关方面已派人来勒令卡嘉迁出，不料她使出这样的一招——宣称她怀孕了。他们坚持要证明，卡嘉把证明拿来。果然不假！她预见到：法律规定对孕妇不能迫迁。直到随后的一个冬天来临时，她才搬出去。在她怀孕、生产期间直至产假期满，这漫长的好多个月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儿和她朝夕相处。自然，在厨房里卡芭现在连一声也不许她吱，而当时已满四周岁的阿娃也会怪有趣地捉弄她，往她的燉锅里啐唾沫。

恐惧？此时，卢萨诺夫仰卧在可以听到各种呼吸和鼾声的病房的黑暗之中（只有护士的台灯从穿堂里透过毛玻璃门映进来一点微光），试图用毫无睡意的头脑冷静地分析：为什么罗季切夫和古宗的幻影会使他阵脚大乱？如果别的也经过他插手从而被定了罪的人回来，他是不是也会吓成这个样子？例如：罗季切夫偶然提到的那个爱德华·赫里斯托弗罗维奇，是个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

工程师，曾当着工人们的面骂巴威尔混蛋和恶棍（后来他自己承认梦想资本主义复辟）；那个女速记员，她歪曲了一位重要首长——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保护人——的讲话，事实上在首长的发言中那些话完全不是这样讲的；那个不买账的会计（偏偏还是神甫的儿子，所以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迫使他就范）；还有叶尔锵斯基夫妇……总之，这样的人还少吗？……

对这些人，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一个也不怕，他愈来愈大胆、愈来愈公开地帮助当局确定他们的罪名，甚至两次出面对质，当场提高嗓门揭发对方。那时完全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光彩！① 一切撒谎者、诽谤者、过分勇于自我批评或过分刁钻古怪的臭知识分子——统统不知去向，销声匿迹；而原则性强、立场坚定、忠心耿耿的人们，包括卢萨诺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无不昂首挺胸，扬眉吐气。

可是现在世道变了，出现了一个混乱的、不健康的时代，从前自己在政治上立下的汗马功劳难道成了不光彩的事情？难道他还得担心自己的命运？

担心？简直是扯淡！卢萨诺夫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不能指责自己胆小怕事。他有什么可担心的？也许他算不上特别勇敢，但也回忆不起自己表现过懦怯的事例。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战场上会害怕，——作为一名有经验的、不可多得的干部，根本没有要他上前线。不能断言他在敌机轰

① 英译本此处有如下一句："在那个形势大好的时期——1937 和 1938 年，社会气氛显著地得到澄清，呼吸也变得比较畅快。"——中译者注

炸下或房屋起火时一定惊慌失措，——但他们是在敌机轰炸前离开K市的，火警他也从未遇到过。同样，他从来不怕司法当局和法律，因为他从不触犯国法，而司法当局一向是保护和支持他的。他也不怕舆论谴责，因为舆论也始终站在他一边。州报上不可能刊登不体面的文章攻击卢萨诺夫，因为库兹马·福捷耶维奇或尼尔·普罗科菲耶维奇肯定不让发表。而中央报纸不可能降低到卢萨诺夫的水平。因此，对报章他也从来不必害怕。

甚至乘轮船横渡黑海的时候，他也丝毫不怕海底深不可测。至于他怕不怕登高——说不上来，因为他不至于这样没有头脑，会去爬山或攀登悬崖峭壁，他的工作性质又不要他去架桥。

多年来，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卢萨诺夫的工作一直是管理人事档案。这个职务在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一样。只有无知愚民或不明真相的外人不懂得这是多么细致、微妙的工作，需要具备多么了不起的才能。这是诗一般的艺术，迄今连诗人们也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每个人在生活道路上填过不少表格，每一份表格都要提出无数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照例从那个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管理中心。如此，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这些线都让大家看到的话，整个天空将完全被蜘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象橡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

吹得在街上乱飘。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人们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白璧无瑕的档案就象绝对真理，就象十全十美的理想一样，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刨根究底的话，对每一个活人都可以记下一些不好的、可疑的地方；每个人都做过些错事或隐瞒了些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自然会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那些人产生敬意，承认他们的权威。

如果再用音乐来打一个比方，卢萨诺夫凭着他的特殊地位仿佛拥有一架木琴的全副键板，可以视愿望和必要有选择地敲击其中任何一块。虽然键板都是木头做的，但发出的声音却不一样。

有些键板，也就是手法，使用时特别讲究细致谨慎。例如，倘若要知照某一位同志，他对这位同志有所不满，或者只是给他一个警告，叫他收敛一些，卢萨诺夫就善于采用各种特殊的方式打招呼。当那个人招呼他的时候（当然是对方先打招呼），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可以一本正经地答礼，但不露笑容；也可以把眉头一皱（这是他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略略迟疑一下——仿佛他在犹豫，是否该同这个人打招呼，对方配不配跟他打招呼，——然后再答礼（这里又大有文章可做：或者朝着对方正面转过头去，或者只转一半，或者完全不转）。然而这一小小的停顿照例十分灵验。接受这种稍作停顿或态度冷淡的答礼的工作人员，就会开始认真检查自己可能犯了什么错误。一旦在他心中

播下了怀疑的种子，也许可以阻止他失足，因为他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得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比较晚。

分量较重的做法是，在遇见某人时（或者打电话给他，甚或特地把他叫来）对他说："请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我这里来一趟。""现在行不行？"对方一定会这样问，因为他希望尽早弄清楚为什么事情找他，尽早了结这次谈话。"不，现在不行，"卢萨诺夫照例用温和的、但是严肃的口气回答。他不说有别的事情或要去开会，不，他决不明确解释原因让对方宽心（文章就做在这一点上），他会把"现在不行"这句话说得其中可以包括许多重要的含义，而且并不都是吉兆。"谈什么问题？"对方或许有胆量，或许由于缺乏经验会这样问。"明天就知道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会用丝绒般柔滑的声调避而不答这个不知趣的问题。可是到明天十点钟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哩！其间可以发生多少事情啊！那个工作人员还得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跟家里人交谈，也许还要去看电影或到学校开家长会，然后睡觉（有的能睡着，有的睡不着）；第二天早晨连早饭也吃不下，这个问题在他思想上将老是象锥子一样钻，象耗子一样啃："他找我究竟有什么事？"这好多个小时足够让那个工作人员在好多事情上感到后悔，在好多事情上开始担心，暗暗发誓再也不在会上跟领导唱对台戏。好容易盼到十点钟，他去了，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只不过核对一下出生年月或文凭号码。

同木琴的键板相似，不同的手法可以按木头音阶逐步

升级，直到发出最生硬、最刺耳的声音："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他是整个企业的负责人、当地的'东家'①）请您在几号以前把这份表格填一下。"与此同时，一份表格会递给那位工作人员，但这不是普通的表格，而是存放在卢萨诺夫柜子里的一切表格中最详细、最令人不快的一种，例如在让某工作人员接触机密文件之前要填的那一种。也许根本不需要这位工作人员接触机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也许压根儿不知道有这回事，可是大家对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怕得要死，谁敢去问？那位工作人员接过表格，还故作镇静；其实，如果他有什么事瞒着档案中心，心里早已象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因为在这份表格上什么也没法隐瞒。这是出类拔萃的表格。这是再好没有的表格。

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表格，卢萨诺夫得以迫使好几个女人同她们的根据第五十八条②被监禁的丈夫离婚。这些女人无论怎样设法不露痕迹，如不用自己的名义寄邮包，不从本地寄出，或者根本不寄，也无法钻这表格上森严的问题壁垒的空子，要继续撒谎是不可能的。这道壁垒上只有一个口子：依照法定手续彻底脱离夫妇关系。对于这类情况手续特别简便：法院不必询问囚犯是否同意离婚，离婚后也不通知他们。卢萨诺夫最关心的是离婚成为事实，这样就免得罪犯肮脏的黑手把尚属可救的女人从社会大家庭的正道上拖走。而这些表格并不派任何用场。除非当作笑料，否

① 苏联某些人私下提到斯大林时使用的代名词。——中译者注

② 当时实行的刑法典中主要的政治性条文。——英译者注

则永远不会送给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看。

这工作的诗意就在于可以感觉到，一个人完全在你掌握之中，尽管事实上你还没有把拳头攥紧。

卢萨诺夫在总的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使他得到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本厂通讯、厂工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只不过在不知就里的人看来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大叫大嚷，而是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两三个互相了解的同志之间或由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和卢萨诺夫及其同事们的公文包深处，它可以长期悄悄地跟在某人背后，然后在倏忽间显现本相，从地下王国里张开血盆大口，吃掉牺牲品的脑袋，或向他喷吐火焰——过后又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表面上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本厂通讯、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缺了一个——被解职、除名、清洗了。

卢萨诺夫的办公室也布置得与诗一般细致的政治工作性质相称。这照例是一间清静的屋子，房门上最初用皮革和亮闪闪的图钉装饰起来；后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还在门口添设一道防卫性的屏风，象一只黑洞洞的箱子。这道屏风看起来只是普通的装潢，没什么了不起；不过一米进深，来者仅仅在关上第一道门和推开第二道门之间多花一两秒钟工夫。但在决定性的谈话之前的一两秒钟，来者仿佛受到一次为时极短的囚禁：那里既没有亮光，空气又不流

通，他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见的那个人面前显得渺乎其小。如果说，他本来还有点胆量和自信，那末，一进这只箱子，胆量和自信也会跟他告别。

不用说，从来不会发生几个人一齐闯进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办公室这样的事，被叫去或在电话里获准前去的人只能一个个进入办公室。

办公室的这种布局以及放人进去的秩序十分有利于深思熟虑和有条不紊地履行卢萨诺夫那个部门的职责。如果没有那道屏风，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会感到很不是味道。

不言而喻，根据现实中一切现象互相都有辩证的联系这一条原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工作上的处事方式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和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对于熙来攘往、摩肩接踵的人群愈来愈反感。他们讨厌电车和公共汽车，因为那里总是你推我搡，特别在抢着上车的当儿，随时可能被人冲撞；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一个劲儿地往里挤的时候，会把机油或石灰蹭在你的衣服上。那里还有一种可恶的亲昵作风——拍拍肩膀请你递钱买票或传递找头，你就得为他们效劳，传来递去没个完。徒步在城里走路又太远，也太没有气派，与所担任的职位不相称；何况，步行随时可能遇到意外。于是卢萨诺夫逐步改坐汽车——先是公家的交通车和出租汽车，后来是自备汽车。坐火车就更不在话下。别说普通车厢，就是对号的卧铺车厢也受不了，因为穿羊毛袄、带着提桶、麻袋的人都可以进进出出。因此，卢萨

诺夫一家只坐小间软席车厢。不消说得，卢萨诺夫住旅馆总是预先给他定好房间，不让他睡统铺。当然，卢萨诺夫要休养也不是去普普通通的休养所，一定要去服务周到、条件良好的地方，休养者的浴场和散步的小径必须同旁人隔开。自从医生嘱咐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要多走路以后，除了在这种休养所里同身价差不多的人相处，她只感到没有地方可以走路。卢萨诺夫夫妇一方面保持着俄罗斯性格，原则上爱好群众性的娱乐，另一方面则宁可同领导干部在一起参加比较干净、比较安全的娱乐活动。

卢萨诺夫夫妇热爱人民，热爱他们的伟大的人民。他们为人民服务，愿意为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们一年比一年愈来愈受不了那些……居民，受不了那些桀骜不驯、老是阳奉阴违、还提出种种要求的居民。

他们开始提防衣冠不整、举止粗鲁或者喝得醉醺醺的人，这些人可以在近郊的电气小火车里、啤酒摊附近、公共汽车站或火车站上遇到。衣冠不整的人照例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责任感很差，想必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否则就会穿得体面些。万一发生冲突，民警和法律当然会保护卢萨诺夫，但这种保护必然来迟一步，只能在事后惩罚衣冠不整的无赖，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同他发生正面冲突时实际上毫无防卫能力：他的地位、功绩都不能保护他；对方可以无缘无故地侮辱他，可以骂娘，可以随兴之所至在他面门上猛击一拳，把他的衣服弄脏、撕破、甚至用武力扒去。

卢萨诺夫尽管什么都不怕，对于旁若无人的半醉汉子，说得更明确是对于面门上挨一拳的危险，却心怀恐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为这个缘故，罗季切夫归来的消息起初使他慌成如此模样：卢萨诺夫想象罗季切夫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对准面门给他一拳。倒不是怕他或古宗告他的状。他们从法律上奈何他不得，因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掌握任何证据。但是，如果他们至今还是身强力壮的汉子，想要——用一句粗俗的话来说——把他的鼻子揍扁，那怎么办？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必须克服自己身上这个怕字，必须象一个威武不屈的新型人物那样把恐惧压下去。

首先，这可能纯属想象。罗季切夫也许早已不存在，求上帝保佑，但愿他回不来了。这些关于某人回来了的传闻完全可能是无稽之谈，因为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所接触到的大事动向中，目前还感觉不到可能预兆局面将大大改观的迹象。

再说，纵使罗季切夫真的回来了，那也是回到K市，而不是到这里。他现在还顾不上找卢萨诺夫，他自己也得步步留神，以免重新被撵出K市。可见，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情不自禁产生的恐惧是完全不必要的。

即便他开始寻访卢萨诺夫，也不会一下子就获得通到这里来的线索。坐火车到这里需要三天三夜，穿过八个州。就算他来到本市，总是先找到卢萨诺夫家里去，不会上医院来。在医院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恰恰最安全。

安全！……真可笑……。长出这样一个肿瘤竟然可保安全。赶上前途如此难以逆料的时代，活着跟死去也差不多。如果一天到晚担心某人回来，那还是死了的好。把这些人放回来——真是荒唐！何必呢？他们在那里已经习惯下来，已经变老实了，何必让他们回到这里来搅得人心惶惶？……

看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度过了这场思想上的危机，打算重新入睡。必须想办法睡着。

但他需要出去一趟——这是医院里最可恶的一件事。

他小心地翻身，小心地移动（肿瘤象一个铁拳压在他脖子上），从被褥散乱的床上站起来，穿好睡衣和拖鞋，戴上眼镜，轻轻地趿拉着走出去。

严肃而黝黑的玛丽亚醒着坐在桌旁值班，听到趿拉声警觉地回过头来。

楼梯头一张床上有个新病人——撅出很大一绺额发的希腊人——在那里扭动身躯哼哼个不停。他不能躺下，只能坐着，一双失眠的眼睛惊恐地目送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

在中间的楼梯平台上，一个面孔蜡黄蜡黄、头发还梳得挺光的小个子，靠在外加的两个枕头上吸一只用防雨布做的氧气袋。他床畔的小柜上放着桔子、松饼、果汁糕、酸奶酪，可是他对这一切都无动于中，因为连无形的干净空气也不能畅通无阻地进入他的肺脏。

楼下走廊里还有好几张病床。有些病人睡着了。一个

东方面型的老妇人在痛苦地辗转反侧，浓密的长发披散在枕头上。

接着他从一间斗室前经过，凡是要灌肠的病人，不管是谁，一律搁在那边一张不干不净的小沙发上处理。

然后，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屏住呼吸走进厕所。在这个统舱式的、连马桶也没有的厕所里，他特别感到自己毫无遮蔽、体面扫地。女工友每天在这里打扫好几次，但总是来不及收拾干净，呕吐、血污、大小便的痕迹狼藉一地。要知道，使用这个厕所的有对卫生设备不习惯的野蛮人，有已经不中用的病人。一定得找院长要求准许他使用医生的厕所。

不过，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未必下定决心实现这一具体的设想。

他又从灌肠室旁边、披头散发的哈萨克老妪旁边、睡在走廊里的病人旁边经过。

他又从吸氧气袋的垂死病人旁边经过。

到了楼上，那个希腊人悄悄地问，那嘶哑的声音听起来怪可怕的：

“喂，老兄！这里每一个人都能治好吗？是不是也有死在这里的？”

卢萨诺夫骇然向他看了一眼，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尖锐地感觉到脑袋已不能单独转动，非得象叶甫列姆那样整个身体一起转动不可。粘在脖子上甩不掉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向上压迫他的下颌，向下压迫他的锁骨。

他急忙回到自己床上去。

他怎么还能考虑别的事情?!……他还怕谁?……他还能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他的命运已经在这里，在下颌和锁骨之间决定了。

他将在这里受到审判。

在这位法官面前，有势力的朋友、过去的功劳，一概不能为他辩护。

第 十 五 章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你今年几岁？”

“二十六。”

“喔，这么大了！”

“你呢？”

“我今年十六。你想想，十六岁就丢掉一条腿怎么行？”

“他们要给你截到什么地方？”

“截到齐膝盖——这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截得再少的，我在这儿看见的都是这样。往往还要截去更多。到这里……以后只剩下残肢晃晃荡荡……”

“你就装一只假肢。你打算干哪一行？”

“我打算上大学。”

“什么系？”

“或者语言系，或者历史系。”

“入学考试通得过吗？”

“我想是通得过的。我从来不吃慌。一向很镇静。”

“很好。那末，装了假肢对你有什么妨碍呢？你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也许更坐得住。在学术上可以作出更

大的成绩。”

“那末生活呢？”

“除了学术，还有什么生活？”

“比方说……”

“……结婚？”

“这也应该……”

“会找到的！每一棵树都有鸟儿来栖息！……你现在面临着什么样的抉择呢？”

“什么？”

“是要腿还是要命？”

“那要看运气如何。也许碰巧能对付过去！”

“不，焦姆卡，靠碰巧成不了大事。靠碰巧只会剩下一只空网兜①。有头脑的人不应该存侥幸心。你的肿瘤他们说出名目了没有？”

“好象叫做SA。”

“那是 Sarcoma——肉瘤，你得开刀。”

“是吗？你能肯定？”

“能肯定。如果现在他们要截去我一条腿，我一定答应。虽然我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运动——步行或者骑马；汽车在那边不能开。”

“怎么？他们不准备给你开刀？”

“是的。”

---

① 俄语中的“网兜”一词又称“碰巧袋”，取其随身带着“碰巧”能买到什么东西就掏出来装在里边之意。——中译者注

“你耽误了时机??”

“怎么跟你说呢……。不完全是耽误了时机……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我在野外抽不出身子。其实三个月以前就应该到这里来，可是我舍不得把工作撂下。由于走路、骑马不断摩擦，伤口情况恶化，开始出水、流脓。每次流脓以后倒觉得好些，又想工作了。我打算再熬一阵子。现在我也感到伤口擦痛，恨不得剪掉一只裤腿或者露出屁股坐着。”

“他们不给你包扎?”

“是的。”

“让我瞧瞧，可以吗?”

“你瞧吧。”

…………

“我的天哪，多么……多么黑啊!”

“它生来就是黑的。这里本来是我的一个大胎记，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三处溃疡留下的三条瘘管……。总之，焦姆卡，我的肿瘤跟你的完全不一样。我的病叫做成黑素细胞瘤。这混账东西不饶人。通常是八个月就报销。”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来这里以前已读过一本书。读了以后才恍然大悟。不过问题是：我即使来得早些，他们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成黑素细胞瘤这鬼东西可恶极了：刀子一碰，马上转移。它也

要活，也要按它自己的方式活下去，懂吗？我耽搁了这几个月，结果腹股沟里出了毛病。”

“那末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怎么说？她不是星期六把你叫去过吗？”

“她说，必须想办法弄到一种胶体金。要是能弄到，也许能止住腹股沟里的转移，再用爱克斯光控制腿上的，——这样也许还能拖一阵子……”

“治得好吗？”

“不，焦姆卡，我的病已经不可能治好。成黑素细胞瘤是不治之症，根本没有人治好过。对我来说，截去一条腿还不够，而再往上截到哪儿呢？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个拖法？我能赢得多少时间：几个月，还是几年？”

“这话怎么说？……难道你的意思是？……”

“是的，我是这个意思。焦姆卡，我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是，生命最长久的人并不是活得时间最多的人。对我来说，现在的全部问题在于我还来得及做些什么。总得在世界上做成些什么才对！我需要三年时间！但是这三年我不能躺在医院里，我得在野外度过。”

他俩在瓦吉姆·扎齐尔柯靠窗的床上轻轻地交谈。他们的全部谈话只有邻床的叶甫列姆听得见，但他从清早起就象一段无知无觉的木头那样躺在床上，眼睛直盯着天花板。也许还有卢萨诺夫能听到；他曾以同情的目光向扎齐尔柯看了几眼。

“那你打算做些什么呢？”焦姆卡蹙额问道。

“你听我说。我正在检验一种很可以争议的新设想，中央的一些大学者对它几乎不相信。我的理论是：多金属矿石的矿床可以根据带放射性的水找到。你知道‘放射性水’是什么吗？这里头有千百种不同的迹象，但纸上谈兵反正什么都可以证明，什么都可以推翻。可是我有这样的感觉。我感觉到可以在实践中证明这一切。但为此必须长期待在野外，根据水情、而不用其他任何方法具体找到矿藏。最好是反复试验。可是工作起来总是要耗费不少精力在各种事情上。比方说，没有真空泵，只有离心泵，要发动先得抽去空气。怎么抽？用嘴吸！这样就喝了不少放射性水。而且平时我们也喝。吉尔吉斯族的工人们说：‘我们的祖先不喝这里的水，我们也不喝。’可是我们俄罗斯人却喝它。既然有了成黑素细胞瘤，我还怕什么放射性？我正应该去工作。”

“你这个傻瓜！”叶甫列姆头也不回地用干巴巴的沙嗓子说。可见他全听见了。

“人都快死了，你还研究什么地质学？它帮不了你的忙。还是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人靠什么活着？”

瓦吉姆的一条腿保持原来的姿势，可是他的头在灵活自如的脖子上很轻松地转过来。他的一双生动的黑眼睛炯炯发光，柔软曲折的嘴唇颤动了一下，他毫不见怪地回答说：

“我恰恰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靠创造性的工作活着！这办法很有效。即使不喝、不吃都可以。”

他用一支多边形塑料杆的活动铅笔敲敲牙缝，看他这

句话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理解。

“你把这本书读了，会大吃一惊的，”波杜耶夫用疙疙瘩瘩的指甲敲敲蓝色的封面说道，身体还是不转过来，眼睛也看不见扎齐尔柯。

“我已经看过了，”瓦吉姆回答得极快。“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轮廓太模糊，不带劲儿。照我们看来，应当多做工作！也不是光为了肥己。这才有意义。”

卢萨诺夫身体一震，眼睛赞许地闪出光芒，他大声问：

“请问，年轻人，您是党员吗？”

瓦吉姆还是那样落落大方地把视线转向卢萨诺夫。

“是的，”他温和地说。

“我早就看出了！”卢萨诺夫得意地宣称，并举起一个指头。

他很象一位教员。

瓦吉姆在焦姆卡肩上拍了一下，说：

“好了，回到自己那儿去吧。我得继续工作。”

他又埋头读那本《地球化学方法》，书里夹着一页纸，上面用密密麻麻的小字摘录了几段文字，并加上醒目的感叹号和问号。

他一边读，一边写，别人几乎不能察觉黑色多边形塑料杆铅笔在他手指中间不停地移动。

他全神贯注在书本上，人好象不在这个房间里。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得到了他的鼓励，想在打第二针以前再振作一下，因此决定对叶甫列姆来一个彻底解决，免得他

在这里继续散布悲观绝望的情绪。于是，他正眼望着叶甫列姆，从一边墙旁向另一边墙旁对他进行开导：

"那位同志给你上了很好的一课，波杜耶夫同志。不要这样被疾病压垮。也不能看到一本说教布道的小册子就被它俘虏。您起的作用实际上有利于……"他想说"敌人"两个字；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指出一些敌人，但在这里医院的病床上，究竟谁是敌人呢？……"必须善于看到生活的深处。首先看到功勋的性质。是什么推动着人们在生产上建立功勋？或者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功勋？或者，比方说在内战时期，人们吃不饱、穿不暖，鞋也没有，武器也不行……"

今天叶甫列姆异乎寻常地动也不动：他不仅没有起床在通道上走来走去，而且好象连平时的其他许多动作也不做了。过去他只保重脖子，需要转动头部的时候就不大乐意地把身体扭过去；可是今天他脚也不动，手也不抬，只是用一个指头敲敲书本。人家劝他吃早饭，他回答说："肚子没吃饱，光舔盆底也是白搭。"他在早饭前和早饭后始终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偶尔眨眨眼睛，人家还以为他僵化了呢。

而眼睛却睁着。

他的眼睛睁着，正好一点也不用转动就能看到卢萨诺夫。除了天花板和墙壁，他只看到这个白脸的家伙。

他也听到卢萨诺夫在开导他。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发出的还是那个没好气的声音，只是口齿更不清楚：

"内战时期又怎么样？你在内战时期打过仗不成？"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叹了口气，说：

"波杜耶夫同志，我跟您按年龄还不可能参加过那次战争。"

叶甫列姆鼻子里嗤了一声。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参加。我参加了。"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很雅致地扬起眼镜后面的眉毛，问：

"这怎么可能？"

"很简单，"叶甫列姆慢腾腾地说一句稍停一停。"绰起转轮手枪，就可以打仗。挺好玩的……。这样的人不是我一个。"

"您在什么地方打过仗？"

"在伊热夫斯克[1]附近。打立宪派[2]。我亲手打死过七个伊热夫斯克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的确，当时他自己还是个毛孩子，他把那七个大人一个个结果在叛军盘踞的城市哪儿条街道上，他现在好象还记得起来。

那位四眼贵人还向他唠叨了些什么，但叶甫列姆今天的耳朵仿佛埋在水下，偶尔冒出来听一会儿又潜下去了。

黎明时分，叶甫列姆睁开眼睛，看到一块光秃秃的白色天花板，很久以前一件微不足道、而且早已忘怀的事情，与

---

① 今苏联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属俄罗斯联邦）首府。——中译者注

② 指在1918年1月5日开幕的俄国立宪会议上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组织的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中译者注

此毫无联系地赤裸裸闯进他记忆中来。

那是十一月里的一天，战争已经结束。天在下雪，但落地后积不起来，而落在从壕沟里掘起来的较温暖的泥土上更是消融得无影无踪。当时在挖土，准备埋煤气管道，规定的深度是一米八十。波杜耶夫经过那里，看到深度不符合规定。但作业班长走来，厚着脸皮声称全线均已挖好。“要量一量吗？这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波杜耶夫拿起一根量杆，上面每十公分烫着一道横的黑线，每五十公分的一道横线比其余的长些。他们一起走过去量，不时陷在泡烂了的泥浆里，他穿着军官的高统靴，作业班长穿的是兵士皮鞋。量了一处——一米七十；又继续走去。那里有三个人在挖土：一个是瘦长的农民，一脸黑碜碜的络腮胡子；另一个是过去的军人，还戴着军帽，虽然星徽早已摘去，帽边和帽沿是漆皮的，一条箍带蹭满了石灰和泥巴；第三个年纪很轻，头戴鸭舌帽，身上一件城里人穿的夹大衣又短又窄，相当破旧（当时衣服供应不上，公家没有发给他们），大概还是他念书时做的（叶甫列姆觉得现在他才第一次看清楚这件大衣）。前两个还在勉强挥锹挖土，尽管湿漉漉的泥巴粘在铁锹上甩也甩不掉，而那第三个小伙子胸膛抵着锹柄，象一个被叉起来的稻草人，身上覆着一层白雪，手缩在窄小的袖筒内。公家根本不发给他们手套，脚上只有那个军人穿着靴子，其余两人裹着用车胎胡乱拼凑起来的自制鞋。“干吗站着发呆？”作业班长向小伙子喝道。“存心要人家罚扣你的口粮不成？那还不容易？！”小伙子只是发出一声叹息，愈发

垂头丧气，锹柄在他胸前好象插得更深了。作业班长就在他颈项上打了一下，他一抖脑袋，重新用锹挖土。

他们开始量壕沟。挖起来的土紧靠沟的两边堆着，要凭肉眼看准刻度，必须往那里弯下大半个身体。那个军人做出帮忙的姿态，其实竭力让尺倾斜，企图用这个办法多量十公分。波杜耶夫对他骂了一通娘，把尺子放直。清清楚楚量得一米六十五。

“我说，首长同志，”于是军人悄悄提出请求。“这十来公分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实在挖不动了。肚子里空空如也，力气使不出来。天气又是这样，你也看到了……”

“可是叫我为你们去吃官司，是不是？亏你们想得出来！图纸上明明有条条规定，斜坡要平坦，不是这样中间挖一道槽。”

在他重新挺直身子，把木尺提起来，把腿从泥浆里拔出来的时候，那三个家伙一齐向他昂起脸来：第一张脸上尽是黑胡碴子；第二张象气急败坏的猎狗；第三张长着柔密的绒毛，还从来没有刮过。雪落在这三张不象活人的脸上，他们从下面望着他。那小伙子开腔道：

“好吧。总有一天你也要死的，工长。”

波杜耶夫没有打报告把他们关禁闭，只是如实记下他们的工作量，免得代人受过。回想起来，比这更加剑拔弩张的例子还有的是。从那时起已经十年过去了。波杜耶夫不再在营里工作，那个作业班长也免职了，那条煤气管道是临时敷设的，也许已不再输气，管子也派了别的用场，——可

是，今天送入他耳朵的第一个声音便是：

“总有一天你也要死的，工长。”

叶甫列姆提不出任何有分量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要说他还想活下去吧，那末，那个小伙子难道不想活？要说叶甫列姆意志坚强，悟出了某种新的道理，希望换一个样子生活吧，病才不听这一套呢！它有它的一些条条。

在叶甫列姆褥垫底下已放了第四个夜晚的这本金字蓝皮书里有一篇写到，印度人相信人死的时候不是彻底绝灭，他的灵魂会移到动物或别人身上去。这一条现在颇合波杜耶夫的心意：但愿能带走些自己的什么，不致统统化为乌有。但愿死后还能留下些什么就好。

然而他不相信灵魂可以转世，一丁点儿也不信。

脖子的疼痛向他的头部放射，一刻也不停，而且变得很有节奏，一次总是四拍。这四拍反映到他头脑里的始终是这么一句话：叶甫列姆——波杜耶夫——死了——句号。叶甫列姆——波杜耶夫——死了——句号。

如此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自己也开始默念着这句话。重复的次数愈多，他好象愈是自己脱离自己，脱离那个注定要死的叶甫列姆·波杜耶夫。他愈来愈习惯于自己的死亡，把这当作别的病人死亡看待。而他心中那个把叶甫列姆·波杜耶夫之死视若别人死亡的另一个叶甫列姆·波杜耶夫，似乎不应该死去。

而那个被视若别人的波杜耶夫又如何呢？他恐怕没救了。除非喝桦树菌子的煎汁。可是信上明明写着，这玩意

儿要不间断地喝上一年。为此要用干的菌子约两普特[1]；如果是湿的，要四普特。这意味着要寄八只包裹。还要求菌子不是陈的，最好刚从树上剥下来。这样就不能一古脑儿全捎来，得分批捎，一个月一次。谁能为他收集到那么多菌子并及时寄包裹来呢？而且这个人必须在俄罗斯。

除非是自己的亲人，否则办不到。

叶甫列姆一生接触过许许多多人，但没有一个算得上是他的亲人。

本来可以叫他的第一个妻子阿米娜收集并邮寄。除了她，在乌拉尔以西他没有别的人可托。但是她在回信上八成会这样写道："你死在阴沟里我也不管，你这个老杀才！"即使如此，她也是对的。

从常情来说，她是对的。但照这本蓝皮书的说法，则是不对的。按照书上的说法，她应当可怜他，甚至爱他——不是把他作为丈夫、而只是作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来爱。还应该给他捎菌子包裹来。

书上的道理十分正确，如果人人都照上面所说的去做的话……

这时叶甫列姆的耳朵里出现片刻的清静，便听到那位地质学家在说人活着是为了工作。于是叶甫列姆用指甲敲敲书的封面说了那句话。

后来，他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疼痛又开始向他的头部放射。

---

① 1普特＝16.38公斤。——中译者注

只要这种放射性的疼痛不折磨他，那末，他现在感到最轻松愉快的事莫过于一动不动地躺着，也不治病，也不吃饭，也不说话，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

很简单，那就是不再存在。

但有人在摇他的腿和胳膊肘。原来外科的一个姑娘已在他床畔站了好久，叫他去换药。阿赫马章也帮着把他推醒。

叶甫列姆得起来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他必须把意志灌入六普特重的肉体，强迫自己从床上起来，手、脚、腰都得使劲，强迫裹着肉的骨头从开始陷入的麻痹状态中摆脱出来，强迫关节活动，强迫那么沉的重量竖起来，变成一根柱子，给它穿好上衣，再搬动这根柱子经过走廊和楼梯去受无谓之苦——先是解开、然后再缠上几十米长的绷带。

这一切花的时间很长，又疼，好象在一片灰色的喧嚣中进行。除了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还有两名外科医生——他们不知何故自己从来不做手术，她在给他们讲解，同时进行示范，还向叶甫列姆说了些什么，可是他没有回答。

他感觉到他们已没有什么可谈。所有的话语都被淡漠的灰色喧嚣遮蔽起来。

他们用绷带给他缠得比先前更紧，象套上一只白色的颈箍；他就这样回病房去。绕在他脖子上的东西已经比他的脑袋大，只有上半个脑袋还露出箍外。

这时他遇上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他一边走，一边掏出

一只马合烟① 的荷包。

"他们打算把你怎么样?"

叶甫列姆想了想:"他们到底打算把我怎么样?"在换药室里他虽然好象什么也没听进去,但现在却完全明白了,所以很清楚地回答:

"他们的意思是: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咽气都可以,就是不要死在这个院子里。"

非德劳骇然望着那个怪吓人的脖子(说不定他自己也有这一天),问道:

"要您出院了吗?"

经他这样一问,叶甫列姆想起他不能按自己的心愿再躺到床上去,而是要准备出院了。

接下来,在腰也不能弯的情况下,他还得换上自己平时穿的衣服。

接下来,还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扛着自己的身体这根柱子通过城市的街道。

想到他还得咬紧牙关做所有这些事情,既不知为谁做,也不知为什么要做,这实在受不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他,目光流露的不是怜悯,而是士兵的同情:这颗子弹打中了你,下一颗安知不会打中我。他不了解叶甫列姆过去的生活,在病房里也没有跟他做朋友,可是他喜欢叶甫列姆的直率;在奥列格一生接触过的人中间这远远不是最坏的一个。

---

① 用黄花烟的茎叶制成的劣等烟丝。——中译者注

“那就握握手吧，叶甫列姆！”他抡臂使劲抓住对方的手。

叶甫列姆接受了这有力的一握，咧嘴扮了个鬼脸！

“生下来随风飘，长大了尽胡闹，上西天的路总是这一条。”

奥列格转身出去抽烟，但送报的女化验员走进门来，顺势把报纸交给了他。科斯托格洛托夫接过来刚刚打开，可是卢萨诺夫看见了，立刻十分委屈地向那个还没有来得及退出去的姑娘大声说：

“喂！喂！我明明向您提出过：报纸先给我看！”

他的声音确乎流露出内心的痛苦，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并不怜悯他，反而刺了他一句：

“为什么一定要先给您看？”

“这是什么意思？这难道还用问为什么？”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痛苦的灵魂在呼叫，他苦于无法用言语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是如此无可争辩，是如此明明白白。

如果别人用不摸底的手在他之前打开刚来的报纸，他会产生一种不折不扣的妒忌。这里谁也不可能象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那样看懂报上的文章。他把报纸理解为公开传达的、实际上却是用密码写成的指令，其中不便把一切都直截了当说出来，但行家可以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根据文章的编排，根据回避和略去的内容对最新的动向构成正确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卢萨诺夫必须第一个看报。

可是这道理在此地怎么讲得清？所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只得转为哀告：

“我马上就要打针了。我想在打针前先看一下。”

“打针？”食骨者软了下来。“我这就给您……”

他把报上有关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道和文件以及被挤到角落里的其他消息匆匆浏览一过。他本来想出去抽一支烟。现在，他把报纸弄得飒飒响，正要折好后递给卢萨诺夫，——忽然发现了什么，视线又重新转入报纸，并且几乎立刻用警觉的声音慢腾腾地吐出三个字来，好象把这三个字在舌头和上颚之间反复摩擦：

“有——意——思……。有——意——思……”

贝多芬的四下沉闷的命运叩门声① 在他头顶上方爆发出轰然巨响。但病房里谁也没有听见，可能永远听不见。此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卢萨诺夫大大地紧张起来。“快把报纸拿过来！”

科斯托格洛托夫无意指给任何人看任何一条消息。他也没有一句话回答卢萨诺夫。他把两张报纸叠在一起，一折成二，再折成送来的时候那样，只是六个版面没能按折痕恢复原样，有点鼓鼓囊囊。他向卢萨诺夫那边跨前一步（卢萨诺夫也向他跨前一步），把报纸递了过去。还没

---

① 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一开始由弦乐器奏出的四下和弦象征着命运的叩门声，因此后人把这部作品称为《命运交响曲》。——中译者注

有出门，他就解开用绸子做的烟荷包，用哆嗦的手卷一支马合烟。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在用哆嗦的手打开报纸。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有意思"三个字象一柄匕首插在他的肋骨之间。食骨者到底认为什么事情这样"有意思"？

他那一双老于此道的眼睛很快地滑过一条条标题和公布的会议文件，突然，突然……怎么？怎么？……

用并不醒目的字体排成的一道命令，对于不懂其中奥秘的人说来是无足轻重的，但对于他说来简直象是从报上发出的大喊大叫！这是一道没有先例的、不堪设想的命令：最高法院——苏联最高法院——人事全部更新！

这是怎么回事?!马图列维奇——乌尔里赫的副手下台了?！多季斯托夫下台了?！巴甫连科下台了?！还有克洛波夫也……?！最高法院成立以来有多久，克洛波夫就在里边待了多久！现在克洛波夫也撤了职！……今后还有谁保护党和国家的干部?……换上的都是一些不见经传的名字。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掌管司法部门的人一下子全部被赶走！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这是历史的脚步声……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浑身冒汗。今天清晨他刚刚使自己定下神来，说服自己相信一切恐惧都毫无根据。可是现在……

"给您打针。"

“什么??”他象个疯子似地直跳起来。

甘加尔特医生手拿注射器站在他面前。

“把袖子卷上去，卢萨诺夫。给您打针。”

第十六章

咄咄怪事

他爬着。他在一条混凝土管道中爬着，不，不是管道，恐怕是隧道；两边露在壁外的钢筋有时会钩住他，而且恰恰碰到脖子右侧的痛处。他用腹部爬行，感到最沉重的就是迫使他贴着地面的身体的分量。这分量远远超过他的体重，他不习惯这样的重荷，简直被压扁了。起先他以为是混凝土从上面压迫着他，其实不然，原来是他的身体这样沉重。他拖动身子的时候，觉得它象一袋废铁。他心想：这样沉重他恐怕站不起来，但最主要的是先爬出这条管道，喘一口气，看到一线光明再说。可是这管道长得无穷无尽，无穷无尽。

这时有一个声音——甚至不是声音，只是传到他意识中的念头——命令他向旁边爬。“我怎么能往那里爬呢，那里不是墙壁吗？”他心想。然而，要他向旁边爬的这道命令同把他的身体压扁的那份重量一样无情。他哼了一声，开始向旁边爬——他发现也可以跟刚才笔直前进的时候一样爬。他刚刚对这边有点适应，命令又叫他向另一边爬。他呻吟着又开始向那边爬。沉重的感觉跟刚才一样，既看不

见光明，也望不到尽头。那个清晰的声音命令他向右转，要快；他便两肘和两脚并用，虽然右边是不可穿透的墙壁，他还是爬过去，开始好象有点适应了。这时他又接到向左转的命令，而且也要快；他已毫不犹豫，想也不想，立刻用肘子向左边调整方向——又继续爬去。他的脖子老是被挂住，头部被震得生疼。他一辈子还从未这样狼狈过，而要是他爬不到头，就此死在这里，那可太冤了！

但是，他的腿忽然变轻了，象是充了气，开始浮起来，而胸膛和头部依旧贴在地上。他侧耳静听——没有向他发布任何命令的声音。他想："这下出得去了，让腿先伸出管道，身体跟着向后退，岂不是爬出去了？"于是，他真的开始用手撑起身体（不知哪来的力气？），跟在两条腿后面渐渐地往洞口外面钻。洞口很窄，但主要的问题是血在往头上涌，他担心脑袋会裂开来，死在这里。他在壁上再撑一把，虽然浑身都被擦破，但总算钻了出来。

他发现原来在一处建筑工地中间的大管子上，只是看不见人，显然都下班了。周围是泞滑的烂泥地。他在管子上坐下来歇一会，发现旁边坐着一个姑娘——她身穿稀脏的工作服，不戴帽子，麦秆色的头发披散着，上面没有一把梳子或一枚发夹。姑娘并不看他，只是这样坐着，但他知道姑娘在等他提问。他先是吓了一跳，后来明白对方更怕他。他完全无意谈话，但对方显然在等他发问，于是他问道：

"姑娘，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姑娘回答说，眼睛望着脚下，一边在咬指甲。

"怎么不知道?"他生气了。"你应该知道。你应该坦白交代。把事实真相统统写出来……。你为什么不作声?我再一次问你:你的母亲在什么地方?"

"我正要问您呢,"姑娘抬起头来。

姑娘望着他,一双眼睛水汪汪的。他立刻打了个寒噤,并且想到好几件事情——不是一件接着一件,而是一下子想到,——这姑娘是冲压工葛露莎的女儿,她的母亲因为有攻击人民领袖的言论被关进监狱。女儿在给他送去的表格上隐瞒了这件事。他把她叫去,扬言要为填表弄虚作假的事把她法办,于是她服毒自杀了。她是服毒死的,可是现在从头发和眼睛看来,他猜想她是淹死的。他猜想这姑娘也知道他是谁。他还想到,既然姑娘已经淹死,而自己跟她并排坐着,可见他自己也死了。这一惊顿时使他浑身冒汗。他擦了擦汗,对姑娘说:

"可真够热的!哪儿可以喝水,你知道吗?"

"那边,"姑娘摆一摆头说。

姑娘指给他看的是一只木盆或箱子,里边盛满已经发臭的雨水,还混有绿茸茸的泥浆。他又一次想到,当初她正是喝了好多这样的水,现在要他也喝毒水送命。但既然她要他的命,那岂不是说,他还活着?

"这样吧,"他要了个花招,想摆脱她。"你去给我把工地主任叫来。叫他给我带一双靴子来,否则我怎么走路?"

姑娘点点头,从管子上跳下去,啪哒啪哒踩着泥浆走去,帽子也不戴,身穿工装裤,足登长统靴,完全是工地上的

女青工模样。

他渴得要命，决定就从这盆里喝水。估计喝一点点问题不大。他爬下来，怀着纳罕的心情发现泥浆一点也不滑：脚下的土地说不上是什么样的。周围的一切也有些混沌，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他本可以这样走去，但忽然大吃一惊：一张重要的纸丢了。他把所有的口袋一下子全都掏遍，但心中比手的动作更快地明白，那张纸丢了。

他立刻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东西不能让外人看到。这会给他招来极大的麻烦。他立刻明白丢在哪里——是在他从管子里钻出来的时候丢失的。他急忙往回走。可是找不到那个地方。他完全认不得那个地方。什么管子也没有。只有工人们来来往往。这是最糟糕的，因为可能被他们捡去！

工人们都是他不认识的年轻人。一个穿电焊工帆布上衣、肩下长着襟翼的小伙子停下来望着他。他干吗这样瞧我？会不会给他捡到了？

“小伙子，你有火柴没有？”卢萨诺夫问。

“你又不抽烟，”电焊工答道。

（他们全知道？他们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要火柴有别的用处。”

“什么别的用处？”电焊工注视着他。

的确，他的谎撒得实在愚蠢！这是破坏分子典型的谎话。这样他会被拘留起来，那张纸就可能被别人捡去。而他要火柴正是为了把那张纸烧掉。

小伙子向他愈走愈近。卢萨诺夫慌了，他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小伙子的眼睛直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叶尔linkedin斯卡娅要我照看她女儿时如同托孤，据此，我断定她知道自己有罪，在等候逮捕。"

卢萨诺夫象打摆子似地开始发抖，他问道：

"您怎么知道的？"

（他虽如此问，其实心里明白：小伙子刚刚看过那张纸——他写的告密信。刚才那句话同信上写的一字不差！）

但是电焊工不理他，径自走了。卢萨诺夫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很清楚，他的告密信就在此地附近，一定得尽快找到！尽快找到！

他在墙垣之间乱钻，拐入每一个角落，心一个劲儿地往前闯，可是两条腿跟不上，腿走得太慢了，真要命！终于他看见了一张纸！他立刻想到这正是他丢失的那张。他想向那边跑过去，可是腿完全不动。于是他趴下来，主要靠手推动身体向那张纸爬去。但愿不要被别人抢先一步！但愿别人不要赶在他前头，不要把它抢走！快到了，快到了……。他总算抓住了那张纸！是它！！可是手指甚至已经没有力气把它撕碎，他脸朝下卧倒在地上歇一口气，把纸压在身体底下。

有人推推他的肩膀。他决定不回过头来，不放开身体底下的纸。可是推他的动作很柔和，那是一只女人的手。卢萨诺夫猜到，一定是叶尔linkedin斯卡娅本人。

"我的朋友！喂，我的朋友！告诉我，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她柔声问道，想必一直俯身到他耳边。"您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她在一个好地方，叶莲娜·费奥多罗夫娜，您放心！"卢萨诺夫回答，可是并不向她回过头去。

"在什么地方？"

"在儿童收容站。"

"哪一个儿童收容站？"她不是在审问他，她的声调听起来相当忧郁。

"那我可说不上来，真的。"他由衷地想告诉她，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他把她女儿送去的，而且从那个地方又可能转送到别处去。

"她是不是用我的姓？"她几乎以一种温柔的声音在他肩后问。

"不，"卢萨诺夫表示同情。"这是规定的：必须换一个姓。我无能为力，这是规定的。"

他躺在地上回想，他对叶尔锵斯基一家甚至颇有好感。他跟他们无冤无仇。他之所以不得不告发那老头儿，仅仅是由于丘赫年柯要求他这样做，因为叶尔锵斯基妨碍丘赫年柯工作。男的入狱以后，卢萨诺夫曾出自真心照顾女的和他们的女儿。就在叶尔锵斯卡娅自己准备被捕的时候，她把女儿托付给卢萨诺夫。至于怎么会弄到卢萨诺夫还写了告发她的信——他记不起来了。

他从地上回过头去想看看她，可是她不在，连影子也没

有。（她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看得见呢？）他的脖子里边——右边一侧——象被什么东西狠狠戳了一下。他只得把头放平，继续躺着。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太累了，简直从来没有累成这个样子，只觉得周身疼痛。

他好象躺在煤矿的一条坑道里，但他的眼睛却习惯于黑暗，发现他身旁地上有一架电话，上面洒着无烟煤的碎屑。这使他大为惊讶——此地怎么会有市内的电话机？难道它通得到城里？那就可以打电话叫人给他送喝的来。最好干脆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他摘下听筒，可是拨号音没听到，却听到一个爽朗、干练的声音在问：

"是卢萨诺夫同志吗？"

"我就是，我就是，"卢萨诺夫立刻振作起来（他一下子就感觉到这声音是从上头，不是从下边来的）。

"请到最高法院来一次。"

"最高法院？是！就来！好的！"他已经准备把听筒搁好，猛然间想起了："对不起，到哪一个最高法院：旧的还是新的？"

"新的，"对方冷冷地回答。"抓紧时间。"电话挂断了。

他想起了有关法院人事更新的一切，痛骂自己不该主动拿起电话。马图列维奇不见了……克洛波夫不见了……贝利亚也不见了！这是什么世道？！

可是叫了他就非去不可。他本来没有力气站起来，但因为要他去，就得爬起来。他四肢使劲，身子稍抬起一点又

跌倒，好象一头还没学会走路的牛崽子。诚然，他们没有给他指定确切的时间，但是说了："抓紧时间！"他扶住坑道壁总算撑了起来，晃晃悠悠地向前走去，始终不敢离开坑道壁。不知什么缘故，脖子也是疼在右边。

他一边走，一边想：难道要对他进行审判？事隔这么多年之后还要对他进行审判，怎么能这样残酷无情？唉，这次法院大换班决不是好兆！

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他对最高司法机关十分尊重，也只得硬着头皮在那里为自己辩护。他也敢于为自己辩护。

他要对他们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发出某人有嫌疑的信号。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一张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坏的领袖像，我有责任把这张残片送交有关部门，并发出信号。侦查部门的职责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并非如此。侦查部门的职责就是要查清事实！我只是履行我的公民义务而已。

他要对他们说：所有这些年头重要的是净化社会！从思想上加以净化！这就非对社会实行大扫除不可。而大扫除决计少不了不怕脏的人。

这些理由在他心中摆得愈多，他就愈是感到热辣辣地需要一吐为快。现在他甚至希望早点走到，早点被叫去，他可以冲着他们大声疾呼：

"这样做的不是我一个人！为什么你们偏偏审问我？试问，谁不这样做？如果他不提供帮助，怎么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古宗？他不是自己也吃了官司吗？"

他全身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仿佛已经在那里大叫大嚷；但他发现根本没有喊出声音来，只是喉咙肿胀得厉害，而且疼。

他好象已经不在坑道里，而是在走廊里走，有人在后面叫他：

“巴什卡！你怎么啦？病了吗？怎么路也走不稳？”

他抖擞精神，大概走得象一个健康人了。他回头看看是谁在叫他。原来是扬·兹威涅克，他穿着紧身短上衣，腰束武装带。

“你上哪儿去，扬？”巴威尔问道，同时心里有些纳闷：为什么他这样年轻？应该说，他当年是很年轻，可是从那时起已经多少年过去了？

“还能上哪儿？跟你一样，到调查委员会去。”

“什么调查委员会？”巴威尔努力思考。他好象是被叫到另一个地方去的，但究竟是什么地方——已经想不起来。

他跟上兹威涅克的步伐，和他一起朝气蓬勃地走得很快。他感到自己还没有满二十岁，还是个单身小伙子。

他们经过一间很大的办公厅，在那里的好多办公桌旁边坐着的知识分子有蓄着神甫般的胡须、打着领带的老会计，有翻领钮孔上插着小锤子的工程师，有贵族夫人似的上了年纪的女士，有厚施脂粉、裙子短到膝盖以上的年轻女打字员。他和兹威涅克四只靴子踏着清晰的步伐刚走进去，所有这三十来个人一齐向他们转过头来，有的微微欠身，有的坐着鞠躬，大家都目送着他们，每一张脸上都惊恐万状，

巴威尔和扬看了十分得意。

他们走进隔壁一间屋子，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一握手，然后在铺着红色台布的桌旁就座。

“开始吧！”温卡吩咐道；他是主席。

第一个进来的是冲压车间的葛露莎阿姨。

“葛露莎阿姨，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温卡觉得奇怪。“我们是在清洗机构，你来做什么？你是钻到机构里来的吗？”

接着是一阵哄堂大笑。

“不是这么回事，”葛露莎阿姨并不着慌。“我有个女儿要设法安置到幼儿园里去。”

“好，葛露莎阿姨！”巴威尔大声说。“你写个报告，我们来设法安置你的女儿。现在你别打岔，我们要清洗知识分子。”

他伸手想从玻璃瓶里给自己倒点水喝，可是瓶子是空的。于是他向邻座的人点点头，示意他把桌子另一端的玻璃瓶递过来。瓶子递给了他，不料那也是一只空瓶。

可是他偏偏喉干如焚。

“水！”他请求道。“我要喝水！”

“就来，”甘加尔特医生说，“马上给您送水来。”

卢萨诺夫睁开眼睛。她坐在他身边的床上。

“我的小柜子里有糖渍水果，”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有气无力地说。他感到怕冷，发烧，筋骨酸痛，头脑里咚咚地敲个不停。

“糖渍水果我们会给您加在水里的，”甘加尔特薄薄的

嘴唇露出微笑。她亲自打开小柜，取出一瓶糖渍水果和一只杯子。

窗外想必夕阳很美。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斜着眼睛看甘加尔特给他倒糖渍水果，留神不要让她抖些什么毒药进去。

又酸又甜的糖渍水果沁人心脾。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枕头上从甘加尔特手中把一杯全吃了下去。

“今天我觉得极不舒服，”他诉说着。

“不，您顶过来了，成绩不坏，”甘加尔特表示不同意见。“无非是我们今天给您加大了剂量。”

新的疑虑把卢萨诺夫刺了一下。

“怎么，以后每次都要递增？”

“以后每次就打这么多。您习惯以后，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那么最高法？……”他刚想问，忽然住了口。

他已经闹糊涂了，分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真。

第十七章

伊塞克库尔草根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不知卢萨诺夫接受全剂量的反应如何，所以一天去看了他好几次，下班后也没有就走。如果按排定的程序由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值班的话，她不必到病房去这么多次数，可是那位有经验的护士还是被调去参加工会司库的学习班，所以今天白天由图尔贡值班，而图尔贡这个人有点儿马大哈。

卢萨诺夫接受注射后很不好过，但还不超出可以容忍的限度。接下来他便服用安眠药入睡，但老是翻身、扭动、哼哼。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每次都要逗留一回对他进行观察，按按他的脉搏。他时而四肢蜷曲，时而又伸直两腿。他的面孔红通通、汗涔涔。这颗脑袋摘去了眼镜，再加搁在枕头上，已不再显得那么官气十足。秃后残余的寥寥数茎白发可怜巴巴地贴在颅顶上。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到病房里的次数虽多，她同时也做其他一些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是病房里的小组长，尽管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不过总得有个人担任。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离开卢萨诺夫转向邻近一张病

床的时候，宣布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今天起你当病房小组长。"

科斯托格洛托夫和衣躺在被上看报。（甘加尔特已经是第二次进来，可他还在看报。）由于无法逆料他会作出什么奇怪的反应，甘加尔特说这句话时脸上带着一丝浅笑，意指她也明白这纯粹是一种形式。科斯托格洛托夫放下报纸，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该如何表示自己对她的尊敬，便略略屈起在床上伸得笔直的两条长腿，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回答：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您是想使我在道义上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当官的总免不了犯错误，有时候还会权迷心窍。因此，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我立誓再也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

"那您以前是担任过的了？而且职位很高，是不是？"她也乐于用开玩笑的口吻跟他交谈。

"最高担任过副排长。不过实际上还要高些。我们那个排长因为实在迟钝无能被送去进修，进修出来至少得当个炮兵连长，但不再回我们的炮兵营。而上面派来接替他的另一名军官，一下子就被调到政治处作为编外人员。我们的营长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我是个挺不错的测绘兵，小伙子们也都听我的。于是我就以上士的军衔担任了两年的代排长——从叶列茨直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顺便提一下，说来也许可笑，但那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即使是屈着两条腿，躺在床上终究不大礼貌，所以他把腿放到地上。

"既然如此，您何必推辞呢？"甘加尔特在听他讲或在她自己说话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友好的微笑。"您的好日子又可以回来了。"

"绝妙的逻辑！可是民主呢？您不是在践踏民主原则吗？病房又没选我，选举人连我的履历也不知道……。其实，您又何尝知道……"

"那末，您就谈谈吧。"

她照例说话声音不大，他也把嗓门压低到只让她一个人听见。卢萨诺夫在睡觉，扎齐尔柯在看书，波杜耶夫的床位空着，几乎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说来话长。再说，您站着，我坐着也觉得不好意思。跟女同志不作兴这样谈话。但是，如果我象个士兵那样站起来在通道上立正，那会显得更加愚蠢。您还是在我的床位上坐下吧，请。"

"其实我该走了，"她说，不过还是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告诉您吧，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的苦头大多起因于热爱民主。我曾企图在部队里树立民主风气，也就是跟上司顶嘴，结果在三九年没能进入军官学校，只得继续当兵。四〇年总算到了军官学校，可是在那里又因为冲撞领导被撵了出来。直到四一年才好不容易从远东的一个军士训练班毕业。说老实话，我没当上军官真有点儿气不过。我的朋友都成了军官。年轻的时候这些事没法不放在心上。但我珍惜的还是公道。"

"有一个跟我很接近的人，"甘加尔特眼睛望着被子说，

“他的遭遇也差不多：很有才能，却始终是个老百姓。”

倏忽的冷场、瞬息的沉默在他们两人之间一掠而过，她举目说道：

“可是您直到今天仍旧那样。”

“您的意思是说仍旧是老百姓，还是有才能？”

“仍旧爱冲撞人。比方说，您平时跟医生——特别是跟我——说话的态度怎么样？”

薇拉·甘加尔特提出这个问题的神态是严厉的，但她的严厉与众不同，外刚而内柔，一如她所有的言语和动作。这不是那种懒散的荏弱，而是一种悠扬的、基于和谐的柔美。

“我冲撞您？我跟您说话可是必恭必敬的。这是我最礼貌的谈话方式，您还不知道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为您无法想象我的处境有多狼狈。当时我几乎只剩一口气了，他们才勉强放我出州境。我来到此地，不料这里的冬天竟下着瓢泼大雨，我只得把毡靴夹在胳肢窝里，因为我们那里正是霜雪满天。我的外套淋得稀湿，简直可以绞出一桶水。我把毡靴放在行李寄存处，坐电车去老城，我有一个那里的地址，还是在前线时我手下的一名士兵给我的。当时天已经黑了，全车的人都劝我不要去，说是会被宰了的！五三年大赦把鸡鸣狗盗之辈都放了出来，从此再也没法逮住他们。而我对于那个士兵究竟是不是在那里也没有把握，问问那条街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就去找旅馆过夜。一些旅馆的穿堂实在太漂亮，我不好意思把

脚跨进去。有几处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我递过去的不是身份证，而只是流放证明，人家立刻回答说：'不行，不行！'有什么法子？我倒是愿意一死了事，可是为什么要死在街上篱垣下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对他们说：'听着，我是该你们管的。你们安排我过夜吧。'他们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一通，说：'到茶馆去过夜吧，我们一般不到那里检查证件。'可是我找不到茶馆，只得回到火车站。睡又不能睡，因为民警要赶。一清早我就到你们的门诊部来排队。大夫看了以后，说必须立即住院。我又得坐两部电车到城市另一端的监督处去。尽管全苏联都有一定的工作时间，可是监督官走开了，你有什么办法？他才不理这一套呢。他也不留一张字条知照流放人员，说明自己会不会回来。我寻思：我要是把证明交给他，恐怕没法从火车站取回毡靴。于是只得再坐两部电车奔火车站。每次行程就得花一个半小时。"

"我怎么不记得您带着毡靴？难道真有吗？"

"您当然不可能记得，因为我在火车站把那双毡靴卖给了一位大叔。我盘算这个冬天要在医院里度过，下一个冬天反正活不到。卖了毡靴，再次上监督处。光是坐电车就花了十个卢布。那边还有一公里烂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厉害，简直寸步难行。我还到处背着自己的行李袋。谢天谢地，监督官总算回来了。我把流放地所属州监督处的证明交给他作抵押，并出示你们门诊部开的住院证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几个字。于是我就坐车……还不是

到你们这儿来，而是去市中心。我从海报上看到，市里正在上演《睡美人》[1]。”

“您倒还有闲情逸致去看芭蕾舞！早知如此，我才不让您住进来哩！一定不让！”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这是奇迹。临死前还能看一场芭蕾舞——岂不妙哉？！即使不死，我在永久流放中也永远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活见鬼！剧场临时把戏换了！《睡美人》换上了《阿古-瓦雷》[2]。”

甘加尔特不出声地笑着连连摇头。她对这个垂死的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头当然表示赞赏，十分赞赏。

“怎么办？音乐学院有一个女研究生在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可是离车站太远，到那里连凳子角也占不到一个。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只有一个办法：到医院来把我自己交给你们。我来到此地，院方说：‘没有床位，得等几天。’病人们告诉我：在这儿等上一个星期也是常有的。可是叫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呢？怎么办？不要我从劳动营里学来的一套无赖手段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您还打算从我手里把证明拿走，可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客客气气跟您说话？”

现在回忆起来的确很有趣，两个人都觉得挺可笑。

他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几乎不用脑筋，心里在想的是：如

---

① 根据法国作家夏尔·佩罗（1628—1703）的童话改编的芭蕾舞剧，由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93）作曲。——中译者注

② 斯大林时代的一出意大利化的乌兹别克歌剧。——英译者注

果她是四五年从医学院毕的业，她现在至少有三十一岁，跟他差不多年纪。可是为什么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在他看来比二十三岁的卓娅还年轻？不是面貌，而是体态和靦觍、羞怯的神情给人这样的感觉。看到这样的女人，往往令人推测，她也许还没有……。只要仔细观察，可以从一颦一笑发现她们跟已婚女子不一样。但甘加尔特是结过婚的。那究竟为什么？……

而甘加尔特望着他，也在纳闷：为什么他最初给她留下的印象如此不友好、不文明？诚然，他的目光阴郁，脸生横肉，但他明明会以非常和蔼可亲的态度看人、说话，就象现在这样。八成他随时准备好两副面孔，视需要变换使用。

"关于芭蕾舞和毡靴的事我现在全明白了，"她笑道。"可是，皮靴的事又怎么呢？您明明知道，您的皮靴是对我们的制度闻所未闻的破坏。"

她眯缝着一双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把嘴一撇。"要知道即使在监狱里也有放风的规矩。我不能不散步。否则我的病好不了。你们总不愿剥夺我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吧？"

是的，他喜欢散步。甘加尔特曾几次看到他沿着这个医疗中心的冷僻小径徘徊良久。散步的时候他的模样颇为奇特。他从被服管理员那儿死乞白赖弄来了一件缝制得很难看的女式晨袍，因为数量不够，对男病人不发晨袍。他把那件晨袍的宽余部分重叠起来裹在胸前，用一条搭扣上缀有五角星的军用阔皮带束紧，把皮带下的褶裥从腹部挤向

两侧，但袍襟还是哗喇喇地飘。他足登军人皮靴，不戴帽子，一头黑发蓬蓬松松，坚定地迈着大步，时慢时快，眼睛看着脚下的石子，走到自己规定的界限前一定掉转方向。他总是抄着手，而且总是一个人，不跟任何人同行。

“这两天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就要来查病房，要是他看见了您那双皮靴，您知道会怎么样？我会受到通报批评。”

这一次她也没有提出敦促，而是恳请，简直近乎向他央求。她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气，倒是有点儿从属的味道。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大爪子碰碰她的手，力图使她放心地说：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我向您提出百分之百可靠的保证，绝对不让他发现靴子。即使在穿堂里我也不让他撞见我穿着靴子。”

“可是在小径上呢？”

“在那里他认不出我是他那栋楼里的！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不妨闹着玩儿写一封匿名信，揭发我私藏皮靴，让他带两名工友来搜——他们照样搜不出来。”

“写信告密难道是要得的？”她又眯缝起眼睛。

还有一点他瞧着不顺眼：她干吗要搽口红？这只能使她显得俗气，破坏她的韵致。他太息一声。

“反正有人写的，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写这种信的

大有人在！而且能起作用。古罗马人说：testis unus——testis nullus，唯一的人证不能算人证。可是到了二十世纪，连一个人证也是多余的，一个没有也行。”

她把视线移向一边。这种事情不大好谈。

“那末您打算把它藏到哪儿去呢？”

“您是问靴子？办法有好几十种，要看在什么时候。可以扔在冷炉子里，可以用绳子吊在窗外。您放心！”

真叫人没法不笑出来，也没法不相信他一定能过关。

“入院第一天您是用什么办法混过来没把它交出去的？”

“这太简单了。在更衣的小间里，我把靴子放在门背后。工友把其余的一切统统塞进一只带号牌的口袋送到中心保管处去。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用报纸把靴子一包，就带了进来。”

他们就这样闲聊着。现在是上班时间，她为什么坐在这里不走？卢萨诺夫睡得很不安稳，直冒汗，但没有醒来，也不呕吐。甘加尔特再一次给他按了脉，正要走开，但骤然想起了一件事，又回过头来对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您还没有得到补充营养吗？”

“没有，”科斯托格洛托夫警惕起来。

“那末从明天开始。每天两只鸡蛋、两杯牛奶和五十克黄油。”

“什么？我没听错吗？我一生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伙食！……不过，老实说，这也是公平的。要知道，我是连病

假补贴也得不到的。”

“那是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我加入工会还没有满六个月，所以我什么权利也享受不到。”

“哎呀——呀！怎么会这样的呢？”

“我已经失去了那种生活的习惯。其实，我到了流放地，应该想到尽快加入工会。”

这人一方面如此聪明灵巧，另一方面又如此不善钻营。这份补充营养还是甘加尔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他争来的……。不过她该走了，这样谈下去可以谈上一整天。

她已经快走到门口，只听得他带着讥诮的口气喊道：

“等一等，您莫非要笼络我这个病房小组长不成？……要是我上任的头一天就贪污腐化，我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责备！……”

甘加尔特走了出去。

但是，在病人吃过午饭后，她不可避免地又得去看一下卢萨诺夫。这时她已得悉，院长已定于明天查病房。这样，病房里又多了一件事儿——得去检查一下病人的床畔小柜，因为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特别注意床畔小柜里不得有面包糕饼的碎屑或过多的食物，最好是除了规定的面包和食糖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还要检查清洁卫生，那股细心劲儿连女人也望尘莫及。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登上二楼，先昂起头来仔细察看墙顶和天花板。她好象看见西布加托夫床边上方的角落

里有一张蜘蛛网（外面太阳冲破了云层，光线比刚才好了些）。甘加尔特把工友叫来（正好轮到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值班，不知怎的麻烦事儿总是落到她身上），告诉她在明天之前该怎样打扫洗刷，并指给她看那张蜘蛛网。

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从罩衫里边掏出眼镜来戴上，说：

"果然是，您说得一点不错。真丢脸！"她摘下眼镜，便去搬梯子，取刷子。她打扫时照例不戴眼镜。

接着，甘加尔特走进男病房。卢萨诺夫还是那样，大汗淋漓，但脉搏慢了下来，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恰好穿上靴子和晨袍，打算出去散步。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向全室宣布明天有一次重要的巡诊，请大家各自先把床畔小柜好好整理一下，然后由甘加尔特进行检查。

"我们先从小组长查起，"她说。

其实不必从小组长查起，可是她不知道为什么又向那个角落走去。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的身姿就象两个顶点相接的三角形：下面的一个三角稍宽，上面一个较窄。她的腰肢是那么细，令人手痒痒的直想夹住那个部位把她抛起来。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并没有作出任何这样的举动，只是很乐意地打开自己的床畔小柜让她检查：

"请吧！"

"对不起，对不起，"她一路挤过去。科斯托格洛托夫让到一旁。她紧挨着小柜在他床上坐下，开始检查。

她坐着，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她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脖子袒露的纤细线条，她的头发颜色不算太深，在脑勺上盘成一个朴素的髻子，没有丝毫赶时髦的味道。

不行，必须设法摆脱这股情感的浪潮。不能这样看到每一个长得比较俊的女人就失魂落魄。刚才她在这里坐过一会，聊一阵天，走了；可是这几个小时他一直惦着她。她当然完全不知道。晚上她回到家里，有丈夫和她拥抱。

必须摆脱出来！但唯一的途径恰恰是通过女人来摆脱，舍此别无他法。

他站在那里，一眼不眨地盯着她的后脑。白大衣的后领向上竖起，象一只小帽兜，露出一根圆鼓鼓的小骨头——这是最上端的脊骨。真想伸出一个指头去抚摩一下。

"这小柜肯定是医院里最邋遢的一只，"其时甘加尔特正在发表评论。"面包屑、油纸，还有马合烟、书、手套。您怎么不害臊的？您得把所有这些东西今天全部收拾干净。"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她的颈脖，一声不吭。

她拉开柜子上端的一只小抽斗，发现在其他零星物件中有一只盛着褐色液体的小瓶子，大约有四十西西。瓶子塞得很紧，旁边有一只好象旅行时携带的塑料小杯，还有一支滴管。

"这是什么？药品？"

科斯托格洛托夫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没什么。"

"这是什么药？我们没有给过您这样的东西。"

“那又怎么样？我难道不能自备药品吗？”

“只要您住在我们医院里，没有得到我们的许可当然不能自备药品！”

“我不好意思告诉您……。这是治鸡眼的。”

她拿起那只上面没贴标签的小瓶子，想打开它嗅一嗅，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即加以阻止。他把两只粗大的手掌一齐按在她的手上，扳开了那只想要拔去瓶塞的手。

老一套，照例是手的接触——谈话之后不可避免的下文。

“小心，”他很婉转地提出警告。“对付这玩意儿需要懂得诀窍。不能沾在手上。也不能嗅。”

说着，他很客气地把瓶子拿了过来。

这毕竟超出了一切儿戏的限度！

“这是什么东西？”甘加尔特正色问道。“一种烈性药剂？”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她身旁坐下，用谈正经的口吻轻轻地说：

“一种极厉害的药剂。这是伊塞克库尔的草根。无论是它的酊剂还是干根，都嗅不得。所以塞得这样紧。如果用手拿过这种药，事后不洗干净，忘记了舔一下，可以送命。”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这一惊非同小可，她说：

“那您要它做什么？”

“真糟糕，”科斯托格洛托夫嘀咕着，“被您一发现可就

麻烦了。我应该把它藏起来……。我是用它治病的，直到现在还在用。"

"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她的目光对他进行审察。此刻她完全不眯缝起眼睛。此刻她是医生，不是别人。

她虽然摆出十足的医生架势，但一双眼睛却是淡咖啡色的。

"仅此而已，"他老老实实地说。

"也许您是……留着必要时用的？"她还有些不大放心。

"如果您愿意知道的话，我在到这儿来的路上的确有过这样的念头。目的是免得受不必要的痛苦……。但后来疼痛消失，这个因素也就排除了。可是我继续用它治病。"

"在暗地里？在没人看见的时候？"

"既然不让人自由自在地过日子，那有什么办法呢？不是到处都有制度吗？"

"您滴用的剂量是多少？"

"按级数递增递减。从一滴到十滴，再从十滴到一滴，然后停滴十天。目前正在停滴阶段。说老实话，我不敢肯定我的疼痛消失完全是爱克斯光的功效。也许跟草根也有关系。"

他们俩都压低了嗓门说话。

"这是用什么浸制的酊剂？"

"伏特加。"

"您自己做的？"

"嗯。"

"浓度呢？"

"怎么说呢……。他给了我一捆，说：这点可以浸三公升。我就分了一下。"

"多少斤两？"

"他也没称。只是毛估了一下。"

"毛估？这样的剧毒药他只是毛估一下？这是乌头！您考虑过没有？"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生气了。"您要是尝到过一个人在整个宇宙中奄奄一息的滋味，而监督处还不让您出村镇一步，那时您再考虑什么乌头白头吧！还问多少斤两！您可知道这一把草根对我可能意味着什么？可能使我再延长二十年苦役！罪名是擅离流放地。可我还是去了。到一百五十公里以外的山里去。那里住着一位老人，姓克烈缅卓夫，他的胡须象巴甫洛夫院士。本世纪初他就被流放到那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巫医！他自己采药，自己规定剂量。他在自己所住的村里也被人取笑，在自己的故土更是没没无闻。不过有人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去看他。《真理报》也派一名记者去采访过。据说，那位记者也很信服。可是现在传闻说这位老人被投入了监狱。因为不知哪个混蛋浸了半公升药酒，随便搁在厨房里。过十月革命节时家里请客，因为伏特加不够，客人们在主人走开的时候把药酒喝了。结果三个人毕命。还有一户人家的小孩子也误服药酒中了毒。这跟老人有什么相干？他明明警告在先……"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发现所说的这些情况对他自己不利，便沉默了。

甘加尔特激动地说：

“问题就在这里！在公共病房里禁止存放剧毒药剂！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否则可能造成不幸事件。把瓶子给我！”

“不，”他一口拒绝。

“拿来！”她愤怒地蹙起眉额，把手伸向他握紧的拳头。

科斯托格洛托夫粗壮有力、干过许多活的手指攥得严严实实，连里边的小瓶子也看不出。

他微笑着说：

“您这样是不行的。”

她展开了蹙紧的双眉。

“反正我知道您什么时候出去散步，我可以趁你不在把瓶子没收。”

“谢谢您提醒我，我一定把它藏起来。”

“用绳子吊在窗外？我现在该怎么处？去报告吗？”

“我相信您不会。您自己今天还谴责过告密行为！”

“可是您逼得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哇。”

“那就应该告密啦？不光彩。您担心药酒会被人——比方说这位卢萨诺夫同志——误服？我决不让这种事情发生。我把它包起来藏到别的地方去。但我终究是要离开你们这个医院的，那时我当然又要用它来治病！您是不是不相信它的功效？”

“绝对不信。这是愚昧者的迷信，这是在玩儿命。我只

相信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道理！学校里是这样教我的。所有的肿瘤学家也都是这样想的。把瓶子拿来。”

她还是试图扳开他最上面的一个指头。

他看着她那双嗔怒的淡咖啡色眼睛，不但不愿同她争辩、顽抗，而且非常乐于把这只小瓶子交给她，哪怕她把整个小柜都拿去也行。但要他背弃自己的信条实难从命。

“咳，神圣的科学啊！”他喟叹道。“如果这一切都是那么绝对正确的话，也就不会每过十年自己否定自己了。我该相信什么呢？相信你们的针剂吗？我倒要请教，为什么最近又决定给我打针？那是一种什么针剂？”

“那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药物！对您的生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拯救您的生命！”她以特别坚决的口气说出这几句话，信心在她眼睛里闪耀着光芒。“别以为您的病已经痊愈！”

“请说得确切些！这种针剂起什么作用？”

“为什么您还要我说得更确切呢？打这种针可以治病，不让转移发生。如果讲得更确切，您反而不懂……。好了，把瓶子给我吧，我向您保证：在您出院的时候，我一定还给您。”

他们四目对视。

他已经为出去散步穿好女式晨袍，腰里束着缀有五角星的皮带，模样儿滑稽透顶。

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要他交出瓶子。他倒不是心疼这瓶药，家里他还有十倍于此的乌头。他是为另一件事心疼：这

个淡咖啡色眼睛的女人，她是那样容光焕发，跟她谈话是那么愉快，然而永远不可能吻一吻她。将来他回到穷乡僻壤，简直无法相信曾经同这样一个容光焕发的女人并肩坐在一起，而且她曾经千方百计要救他——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生命！

其实，这正是她无能为力的事情。

“交给您我也不放心，”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没准儿会给您家里的人误喝了。”

（谁？她家里谁会误喝?!……她是只身独居的。现在说这话委实不合时宜、不成体统。）

“好吧，那就来一个不分胜败。干脆把它倒掉。”

他笑了起来。想到自己能为她做的事竟如此之少，他觉得很遗憾。

“得了。我到外面去把它倒掉。”

不管怎么说，她的口红涂得大不应该。

“不，现在我不相信您了。现在我得亲眼看您这样做。”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何必倒掉呢？我还是把他送给一个你们反正救不了的人吧。说不定对他能起作用。”

“给谁？”

科斯托格洛托夫向瓦吉姆·扎齐尔柯的床位那边一扬脑袋，把声音压得更低，说：

“他生的不是成黑素细胞瘤吗？”

“现在我充分肯定非倒掉不可，否则您一定会把什么人毒死！您居然忍心把毒药给一个重病人？他要是服毒自尽

怎么办？您难道不怕受到良心谴责？"

她总是回避称呼他。在这次长谈的全过程中，她一次也没有用任何方式称呼他。

"他决不会服毒自尽。这是个坚毅的小伙子。"

"不行，不行！走，去把它倒掉。"

"我今天的情绪实在好得出奇。行，那就走吧。"

他们从床位之间的通道挤出去，然后下楼。

"您不冷吗？"

"不，我里边穿着毛衣。"

她为什么要说"里边穿着毛衣"？现在他倒想瞧一瞧是件什么样的毛衣，什么颜色。然而，这也是他永远看不到的。

他们走到台阶上。天已放晴，春意盎然，外地来的人简直没法相信今天才二月七日。户外阳光灿烂。枝叉高耸的白杨和组成树篱的灌木都还是光秃秃的，但背阴处的积雪也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小簇。树木间残留着倒伏的隔年芜草，颜色棕红中杂有灰白。小径、方板、石子、沥青还是湿润的，没有晒干。小花园里人来人往，纷沓如常：或相向而行，或迂回超前，或对角交叉；其中有医生、护士、工友、打杂的、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的亲属。在两个地方甚至有人坐在长椅上。各科的楼房这里那里已有人最先打开窗子。

如果就在台阶前倒掉药酒，那也太离谱了。

"到那边去吧！"他指了指癌症楼和耳鼻喉科楼之间的一条甬道。这是他散步的地点之一。

他们并排走在石板小径上。甘加尔特那顶按飞行员式样制作的医生小帽正好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肩头。

他斜睨着甘加尔特。她走路的神态严肃，象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他觉得挺可笑。

“请问，在中学里人家叫您什么？”他突然问。

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

“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没什么意思，无非问问罢了。”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石板路面上响起轻微的咯咯声。还在头一回，他躺在地上等死，甘加尔特走近来的时候，他就曾发现她有一双小羚羊一般的细腿子。

“薇加，”她说。

（其实，这也不是真话。至少不完全是真话。在中学里这样称呼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有才能而始终当老百姓的人，后来没有从战场上回来。在一时的冲动下，也不知为什么，她忽然把这个名字告诉了第三者。）

他们从阴暗处走上两栋楼房之间的甬道，太阳直射到他们身上，这里有一股微风。

“薇加？取星座的名字①？但薇加这颗星白得耀眼。”

他们停住脚步。

“我可并不辉煌夺目，”她点点头说。“我是薇拉·甘加尔特。仅此而已。”

这一回不是她在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前茫然失措，而是

① “薇加”是天琴座α星即织女一的西文名称。——中译者注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她面前茫然失措。这还是第一次。

“我是想说……”他企图辩解。

“全明白了。倒吧！”她发出命令。

她没让自己露出笑容。

科斯托格洛托夫把拧得很紧的瓶塞弄松后小心地拔去，然后弯下身子（他穿着下摆盖在皮靴上的裙式晨袍做这样的动作委实令人绝倒），从上次铺路时留在这里的石堆上扳开一小块石头。

“请看！回头别说我把药酒倒在自己口袋里了！”他蹲在她脚边宣布。

她的腿，那双小羚羊似的细腿子，他在头一回看见她时就注意到了。

他把那一小瓶浑浊的棕色药酒洒在一个阴湿的小坑里黑糊糊的泥土上。这几滴液体本来可能给某人带来死亡，也可能给某人带来健康。

“可以埋好了吧？”他问。

她站在那里俯视着他，脸上绽开了笑容。

他倒掉药酒、盖上石块的动作有一股顽童的孩子气，但又象在设誓搞什么密谋。

“您也该夸奖我一番才是，”他从地上站起来。

“我表示赞赏，”她微微一笑，但是带着几分哀愁。“您散步吧。”

她向癌症楼走去。

他望着她白色的背影：两个三角形，上面一个，下面

一个。

怎么搞的，女人向他表示的任何一点关注竟使他激动成这个样子！每一句话在他听来都包含着比实际上更多的涵义。每一个举动之后他都在等着下文。

“薇——加！薇——加！”他悄悄地说着，希望借此遥送自己的心声。“回来吧，你听见吗？来，把身体转过来！”

但心声没有送到。她没有转过身来。

第十八章

在墓道的入口处[①]

自行车和铁环一旦滚动起来，只能在运转中保持平衡，一停即倒。男女之间的游戏也是这样：只要开了头，只能在发展中继续存在。如果今天与昨天相比没有进展，游戏就做不下去。

奥列格好不容易捱到该轮到卓娅值夜班的星期二晚上。他们玩的色彩斑烂的铁环一定得滚到比上一个夜班和星期日白天更远的地方。他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充分的推动力促使铁环运转，并预见到卓娅身上也不乏同样的劲头，因此激动地等待着她来接班。

他先是到小花园里去迎候，因为知道卓娅将从哪条曲径上来。他在那边抽了两支马合烟卷，后来考虑到自己穿

---

① 俄国诗人普希金1829年所作的一首抒情诗《我踯躅在闹市街头……》最后一节有如下四行：

> 让年轻的生命
> 和无情的草木
> 在墓道的入口处
> 葆其永恒之青春。

——中译者注

着女式晨袍想必傻相十足，同他希望给卓娅留下的印象大有径庭。何况天已黑了。于是他回进楼房，脱去晨袍和靴子，穿着睡衣(可笑的程度决不稍减)站在楼梯旁边。他那直立的头发今天给尽可能压平了些。

她出现在医生更衣室里，因为即将迟到而心急慌忙。但看到了他，卓娅立刻扬起眉毛，倒不是觉得诧异，而象是表示本该如此，她也估计到会在这里楼梯旁边遇见他。

她没有停留。科斯托格洛托夫生怕落后，便抬起长腿两级一跨和她并排上楼。现在他这样做并不费力。

“怎么样，有新闻吗？”她一边走，一边问，仿佛奥列格是她的副官。

(新闻？最高法院大换班！这是真正的新闻。但要理解个中奥秘，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现在卓娅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个。)

“我给您想出了一个新名字。我终于明白了该怎么称呼您。”

“是吗？那您说该怎么称呼？”她在搭碴的同时非常利索地顺着梯级登楼。

“边走边谈不大方便。这事儿很重要。”

他们已经到了楼上，在最后几级梯磴上他落后了。

他望着卓娅的背影，发现她的腿粗了点儿，不那么纤巧。不过，这两条腿跟她壮实的体态相当配称，甚至别具韵致。不过，看到象薇加那样轻盈的细腿子，意境自然不同。

他自己也对自己感到惊讶。过去，他从来不想也不看

女人的腿，认为这是庸俗无聊的事。他从不对女人评头品足。他爷爷会说这是求雌狂。不过，常言道：肚子饿的时候就该吃，年纪轻的时候就该爱。可是奥列格年轻时把什么都耽误了。现在，正象秋天的草木急于吸干土地的最后几滴汁水，以免追悔夏季没有及时喝足一样，奥列格一方面重返生活为时尚短，另一方面却已过了盛年（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急于看到女人，恨不得把她们吞下去——包括在不便对她们明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吞噬"。女人身上有些什么，他比别人敏感，因为他多年没有看见女人，更没有这样接近过。他听不到她们的话声，把女人的音色也给忘了。

卓娅接了班，立刻象一只陀螺那样转将起来，确乎象一只陀螺，围着她的小桌子、医嘱单和药品柜转个不停；接着又很快地飞进某一扇门——陀螺也是这样飞的。

奥列格时刻观察着，一见她捞到片刻间歇的机会，马上出现在她面前。

"整个医院里就没有旁的新闻了吗？"卓娅用她甘美的声音问道，一边在电炉上煮针筒，并划破一只只安瓿。

"喔！医院里今天有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巡视了病房。"

"是吗？幸亏不在我值班的时候！……怎么样？您的靴子被他拿走了没有？"

"靴子倒没有拿走，但发生了一场小冲突。"

"怎么回事？"

"总的说来，这场面十分壮观。一下子进来大约十五件

白大衣——包括各科主任、主治医师、住院医师，还有几个我从来没见过的。院长象饿虎扑羊似地打开大家的床头小柜。但我们已得到秘密情报，事先作了一些准备，因此他什么也没有捞到。他皱紧眉头，非常不满。这时别人恰巧向他报告我的情况，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了一点小小的纰漏：她在摘读我的档案时……”

“什么档案？”

“对了，应该说病史，我老是搞错……。她在摘读病史时，提到了第一次下的诊断，无意间说出我是从哈萨克来的。”

“‘什么？’尼扎穆丁说。‘不是本共和国的？我们自己床位还不够，难道还得给外来人治病？立刻让他出院！’”

“那样说来，病房里一半都是‘外来人’！”

“当然，他无非是挑我的刺儿。可是我没料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竟象一只老母鸡保护小鸡那样挺身而出，为我说话：‘这是医学上一个复杂的病例！对我们得出根本性的结论是不可缺少的……’我简直窘得无地自容，因为最近我还跟她发生过争吵，自己要求出院，她也向我发过一通脾气，而现在竟为我仗义执言。我只消对尼扎穆丁哼儿哈儿胡乱应上一声，到中午我早已经不在此地！现在也见不到您了……”

“这么说，您是为了我才没有哼儿哈儿喽？”

“这还能做假？”科斯托格洛托夫把嗓门压低。“您没有把家里的地址留给我，叫我上哪儿去找您？”

但她忙于工作，没法确定她究竟信不信这话。

“我怎么能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台呢？”他继续说，声音又提高了些，“我象木头人似地坐着，一语不发，而尼扎穆丁冲着她嚷道：‘我可以马上到门诊部去给您弄五个这样的病人来！而且都不是外来人。让他出院！’这时我大概干了件蠢事，把这样一个离开此地的好机会给丢了！我觉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怪可怜的，她象挨了打似地眨巴着眼睛，无话可说。我把胳膊肘在膝盖上一支，清了清喉咙，用平稳的语气问：‘我是从生荒地来的，你们怎么能把我打发走呢？’

“‘啊，是垦荒工作者！’尼扎穆丁可吓坏了（差点儿犯了一个政治性错误！）。‘我们的国家愿为垦荒者提供一切，什么也不吝惜。’然后就走了过去。”

“您可真有办法，”卓娅摇摇头说。

“卓娅，我是在劳动营里磨老了这张脸皮。过去我不是这样的。我身上许多特征都不是原来有的，而是在劳动营里形成的。”

“那末嘻嘻哈哈的态度难道也是从那里来的？”

“为什么不是？我之所以变得嘻嘻哈哈，是因为我失去的太多了，对于各种损失已经习以为常。我感到奇怪的是：在这里，亲人会面时老是哭鼻子。又没人遭流放，也不没收他们的财物……”

“这么说，您还可以在这里住一个月？”

“啐！但愿不要被您的毒口言中……。不过少不了还

得住上一两个星期。这下我好象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立下了忍受一切的保证书……"

一支针筒灌满了经过加温的注射液，卓娅一溜烟走了。

今天她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不知如何是好。根据最近的医嘱，她也得给奥列格注射一种针剂。针规定打在身上通常最耐折腾的部位，但根据他们目前所处的微妙状态，这针没法儿打：它会使这场游戏前功尽弃。同奥列格一样，卓娅不愿把这场游戏和这种微妙状态搞糟。他们的铁环还得滚上一大段路程，她才可能以新的姿态给他打针——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密切到可以很自然地这样做。卓娅回到桌旁，一面给阿赫马章准备同样的一针，一面问：

"怎么样？打针的时候您老实不老实？不会踢人吧？"

居然提这样的问题，而且是问科斯托格洛托夫！他正在等候表白的机会。

"卓娅，我的信条您知道。在可能范围内我始终认为针最好不打。但要看跟什么人打交道。跟图尔贡最妙：他老是在找机会学下象棋。我跟他约定：我赢了，就不打；他赢了，就打。但问题在于我即使让他一只车也能对付。可是碰到玛丽亚，这一手就用不上：她照例拿着针筒走过来，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尝试着说几句笑话，她立刻把我的话打断：'病员科斯托格洛托夫！褪去衣服准备注射！'她从来不说一句有人情味的题外话。"

"她恨你们。"

"恨我？"

“恨所有的男人。”

“从根本上说，这也许有道理。现在来了位新护士，跟她我也不善于打交道。将来奥林匹亚达回来就更难办，她是寸步不让的。”

“我也要象她那样！”卓娅说着量出两西西针剂。但她的语调显然不那么坚决。

她给阿赫马章打针去了。桌旁又剩下奥列格一个人。

卓娅不愿给奥列格打这针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理由。从星期日开始，她就在考虑要不要把这种针剂的作用告诉他。

如果他们互相闹着玩儿的事情成了真（这是有可能的），怎么办？如果这一次不是以灰溜溜地捡起散扔在屋子里的衣裳而告终，相反结成某种长久的关系，卓娅当真决定为他做一只小蜜蜂，到他的流放地去（归根到底他说得有理：谁知道幸福在什么穷乡僻壤等着你？），那末，指定给奥列格注射的针剂就不光是他的事情，也涉及到她。

而卓娅是反对给他打针的。

“怎么样？您是不是鼓足了勇气？”她带着一支空的针筒回来，高高兴兴地说。“病员科斯托格洛托夫，去把衣裳褪下准备打针！我马上就来！”

可是他坐在那里，用一双完全不象病人的眼睛望着她。他脑子里压根儿没有打针的事，他们已经彼此心照。

他望着她那双略略暴突的、象要夺眶而出的眼珠子。

“卓娅，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他低声咕哝道。

他的声音愈是闷哑，卓娅的嗓门愈是清脆。

“别的地方？”她感到奇怪，便笑了起来。“去城里？”

“到医生房间里去。”

卓娅全盘吸收了他那目不转睛的视线，以毫无逗弄意味的语调说：

“不行，奥列格！工作很多。”

他似乎没有领会：

“走！”

“对了，”她想起了一件事。“我得灌满氧气袋给……”她朝楼梯那边摆一摆头，也许还说了病人的姓名，反正他没有听见。“可是氧气筒的开关紧得要命。您帮我一下忙。走。”于是卓娅在前、奥列格在后，下一段楼梯走到转弯的平台上。

那个面色蜡黄、鼻子削尖的不幸的肺癌患者，不知是素来如此瘦小，还是被病魔啃蚀得这般模样，他的情况坏透了，巡诊时医生已不跟他谈话，什么也不问他。他坐在床上，急促地吸着氧气，可以听到他胸中咝咝作声。他本来病情就不妙，但今天又大大恶化，甚至外行也看得出来。一袋氧气已被他吸光，另一只空袋放在旁边。

他目前的状态极其糟糕，任何人经过或走到他跟前，他都已看不见。

他们从他那里拿了一只空袋，继续下楼。

“你们对他用什么方法治疗？”

“不用什么方法。他的病不能动手术。爱克斯光也不

起作用。"

"你们一律不打开胸腔?"

"在本市还没有打开过。"

"那末他只能死喽?"

她点点头。

虽然她手里拿着防止他窒息的氧气袋，但他们旋即把这事给忘了。因为更有意思的事情眼看着就要发生。

高高的氧气筒竖放在此刻锁了起来的一条走廊里，也就是当初甘加尔特把淋湿、垂死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安置在那里的爱克斯光治疗室外的走廊。这个"当初"离现在其实还不到三个星期……

如果不开亮走廊中第二盏电灯的话（他们只开了第一盏），那末，放氧气筒的墙壁突出部分后面有一个角落便沉浸在幽暗之中。

卓娅的身量比氧气筒低，奥列格则比它高。

她把氧气袋的阀门接在氧气筒的阀门上。

他站在后面，嗅着从她帽子下面露出来的头发的气息。

"就是这个开关紧得要命，"她抱怨道。

他的手按到开关上，一下子就把它拧开了。氧气带着轻微的刺刺声输入袋中。

接着，奥列格不用任何借口，将原来按在开关上的一只手扼住卓娅原来拿着氧气袋的一只手的腕子。

她没有打颤。她并不惊讶。她注视着袋子逐渐膨胀。

于是他的手从她的腕部朝上滑向胳膊肘儿，通过上臂

滑向肩膀。

这是不隐晦的侦察，但对他俩说来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核实一下说过的话对方是否全都理解正确。

是的，全都理解正确。

他还用两个指头挑动了一下她额前的刘海，她没有抗拒，没有退缩，——她仍注视着氧气袋。

于是他使劲搂住她的肩胛，使她整个身躯倾向自己，他终于够到了她的嘴唇——那两瓣向他笑得那么频繁、唧唧喳喳说过那么许多话的嘴唇。

卓娅的嘴唇和他的接触时并没有张开，不是松软的，而是绷紧、迎合、有准备的。

仅仅一瞬间的工夫，这一切全清楚了。刚才他还记不得，他忘了嘴唇有各种各样，接吻也有各种不同的接法，一个吻跟另一个吻可以有霄壤之别。

但以轻轻的一啄开了头的这个吻，却延续为紧紧的拥抱、长久的粘合，而且欲罢不能。为什么要作罢呢？嘴唇互相贴在一起，可以永远保持这样的姿势。

但经过一段时间，两个世纪以后，嘴唇还是分开了，奥列格这才第一次看见卓娅，并立刻听到她在问：

“你接吻的时候干吗闭上眼睛？”

他闭上了眼睛？他可不知道哇！他没有留意。

“你是不是把我想象成另一个女人？”

另一个什么人？他谁也不记得……

象潜水者刚喘过一口气，重又钻入水底去采埋得很深

的一颗珍珠那样，他们的嘴唇又贴在一起，但这一回他注意到自己闭上了眼睛，便立即睁开。离自己很近很近，近到难以想象处，他看到她的两只黄褐色眼睛几乎象猛禽在觅食。她还是自信而熟练地抿紧嘴唇接吻，不稍松弛，还微微摇晃着身子，一眼不眨地看着，仿佛在根据他的眼神观察他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长吻后的反应。

忽然，她的眼睛向旁边一瞟。她猛地挣脱出来，叫了一声：

"开关！"

我的上帝，开关忘了！他急忙把一只手按在开关上，迅速把它拧紧。

氧气袋居然没有爆炸！

"这就是接吻的结果！"卓娅还没有把呼吸调整好，就气急败坏地说。她的刘海被扯乱，帽子也歪了。

虽然她的话完全符合事实，可是他们的嘴又合在一起，每个人都想把对方吸干。

走廊口装的是玻璃门，可能被人看见从墙壁的突出部分后面支起两只胳膊肘儿——卓娅的一只白皙，奥列格的一只微红。管它！

当空气终于重新进入肺部的时候，奥列格捧住卓娅的脑勺子，端详着她的脸，说：

"卓珞冬契克！这才是你的名字！卓珞冬契克！"

她扭动嘴唇跟着模仿：

"卓珞冬契克？……庞契克？……"①

还不错。可以。

“你不害怕我是一个流放者、一个犯人？……”

“不，”她轻率地摇摇头。

“也不嫌我老？”

“你老在哪儿?!”

“不嫌我有病？……”

她把前额偎在他胸前，就这样站着。

他把卓娅，把那两只温暖的椭圆形支架往自己身上贴得更紧些，再紧些（他始终不知道那把沉重的尺子能不能在这支架上搁稳），说：

“您真的愿意到乌什-铁列克去？……我们结了婚……在那里盖一所小房子。”

这一切看来正象是她所需要的下文，这也是她的小蜜蜂本性的组成部分，继衣裳零乱散扔在房间里之后她恰恰等着这样稳定的、建设性的续篇。她紧紧偎着他，整个胸怀都感觉到他，并且整个胸怀都期望得到解答：是他吗？这一切是否注定要从他那里得到？……

她踮起脚，再次用臂肘搂住他的脖子，说：

“奥列格！你可知道这种针剂起什么作用？”

“什么作用？”他的面颊在她腮帮上摩擦。

“打这种针……怎么跟你说呢……。它们的科学名称

① “卓珞冬契克”是一个杜撰的名字，除保留卓娅名字中的一个音节外，前半部分还有“金”的意思，也许指卓娅金色的刘海；“庞契克”是一种油炸的甜饼。——中译者注

叫做激素疗法……。它们是交叉使用的：给女人注射男性荷尔蒙，给男人注射女性荷尔蒙……。据认为，这样可以抑制转移……。但首先受到抑制的是什么，你可明白？"

"什么？我不明白！不完全明白！"奥列格紧张地问，顿时面色和声音都变了。现在他抓住她的肩膀已经和刚才不一样，现在仿佛要从她身上抖出真相。"你说，你说呀！"

"首先受到抑制的是……性的能力……甚至在交叉次生特征出现之前就会发生。大剂量使用时女人会长出胡子，男人会隆起乳房……"

"等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奥列格吼叫起来，他这才开始明白。"你是说那些针剂？就是现在给我打的针？这种针怎么样？会把一切都抑制下去？"

"还不至于把一切都抑制下去。里比多会保留很长时间。"

"里比多是什么？"

她正视着他的眼睛，轻轻掠了一下他的一绺额发，说：

"就是你现在对我产生的那种感觉……那种欲望……"

"欲望还保留着，可是能力丧失了，是吗？"他象挨了当头一棒，还紧紧地追问。

"能力会大大削弱。以后连欲望也会减退。你懂吗？"她用一个指头抚摩他的疤痕和今天刚刮过的面颊。"所以我不希望你打这种针。"

"好——哇！"他终于定下神来，挺直身躯。"好——极——了！我的心早就感觉到她们在捣鬼，果然不出所料。"

他想把那些个医生——所有的医生——痛骂一顿，骂他们任意摆布别人的生命；但忽然想起了甘加尔特容光焕发、满怀信心的面庞——昨天她曾是那么热情友好地望着他说："对您的生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拯救您的生命！"

原来薇加指的就是这个！她对他是好心吗？仅仅为了保他的命，她不惜用欺骗手段把他引向那样的命运？

"你将来是不是也会这样做？"他斜睨着卓娅问。"学校里是这样教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对不对？那就是说，该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不放，是吗？"

他又何必指责她呢？她对生命的理解同他一样：如果缺少这个，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今天，她单凭两瓣贪婪的、火样的嘴唇就载了他沿着高加索山脉凌空翱翔。眼前她站在那里，嘴唇也在那里！趁这股里比多还在他腿上、腰间流动，得赶紧接吻！

"……那末，你能不能给我打一种针可以起到相反的作用？"

"那我就会从这里被赶走……"

"有这样的针吗？"

"就是同样的针剂，只要不交叉使用……"

"听着，卓琣冬契克，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

"我们已经换过地方。而且已经到了。现在应该回去了……"

"到医生房间里去，走！……"

“不行，有一个工友在那里，有人进进出出……。再说，天还没有黑……”

“那末夜里……”

“别着急，奥列格！否则我们就没有明天了……”

“既然明天连里比多也没有了，还要什么‘明天’？……不，这不可能发生。谢谢你，卓娅，里比多会有的，是不是，啊？里比多会有的……。快，你想一个主意，我们找一个地方去！”

“奥列格，总得为今后留一点余地……。别着急！……先得把氧气袋送回去。”

“对，把氧气袋送去。我们马上送去……”

…………

“……马上送去。”

…………

“送去……马上……”

他们不是手拉着手，而是一起捧着一只膨胀得象足球的氧气袋上楼去，任何一个人移步时发出的震动都通过氧气袋传给另一个人。

这办法就好象手拉着手一个样。

在楼梯平台上，在一天到晚有忙于自己事情的病人和健康人匆匆经过的通道床位上，那个面黄肌瘦、胸廓干瘪的肺癌患者坐在好多枕头中间。他已经不咳嗽，而是用脑袋撞着弓起的膝盖。也许，他的前额觉得自己的膝盖犹如一堵墙。

他还活着，但他身边却没有一个活人。

可能他正是今天临终，他——这个被抛弃的、渴望同情的奥列格的弟兄、奥列格的同类。如果奥列格坐到他床边去陪他一夜，也许能减轻他最后几个小时的痛苦。

然而，他们把氧气袋给他后就走了。这只垂死者的氧气袋，他的最后几西西空气，对他们说来只是一个到无人处去偷偷接吻的借口罢了。

奥列格象被绳子牵着跟在卓娅后面上楼去。他考虑的并不是背后那个垂死的人（半个月以前他自己也曾是那么模样，或者半年以后又会是那样），而是在考虑，如何说服这个姑娘、这个女人、这个娘们同他一起到无人的地方去。

他本来已经忘记了那是什么滋味，现在重新领略到嘴唇被热吻揉皱、甚至变得毛糙的痠痛感，益发觉得突然。这种感觉象青春的血液流遍他的全身。

第十九章

接近于光的速度

不是所有的人都管妈妈叫妈妈的，尤其是当着旁人的面。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妈妈。可是，扎齐尔柯家的瓦吉姆、鲍里斯和尤里从不感到这有什么可难为情的。他们一致爱自己的妈妈，父亲生前如此，父亲被枪决后爱得更甚。三兄弟年龄相距不大，在成长过程中几乎不分长幼，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都积极肯干，不为街头不良习气所染，从未使他们的寡母伤心难过。小时候他们一起照过一张相，以后为了有个比较，她每两年要带他们全体上一次照相馆（后来用自己的照相机拍），一张又一张的相片陆续放进家庭照相簿：母亲和三个儿子。母亲是淡黄头发、白皮肤；而三个儿子都是黑头发，大概是从当年娶了他们的扎波罗热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虏那里继承得来的。旁人分不大清楚相片上哪个是哪个。每照一次相，他们都明显地成长、壮大，赶过妈妈；而她则在逐渐地变老，但面对镜头总是挺直腰板，为有这样一部记载自己生平的活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她是本城一位有名的医生，曾赢得许多奖状、鲜花和表示谢忱的蛋糕。不过，即使她平生没有

为公众做过任何有益的事，单是抚养大这样三个儿子已经不枉一个女人的一生。三兄弟都进入同一所工科大学：老大在地质系毕业；老二在电机系毕业；老三刚从建筑工程系毕业，妈妈就和他住在一起。

如此直到得悉瓦吉姆患病为止。星期四她差点儿赶到这里来了。星期六接到董佐娃的电报，说是需要用胶体金。星期日电复董佐娃，说自己到莫斯科去设法弄这种东西。星期一她到达那里，昨天和今天谅必在求见部长或跑其他一些重要部门，请他们看在牺牲的父亲份上从胶体金储备中拨一点给儿子。（战时父亲留在城里，以吃过苏维埃政权苦头的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后因与游击队联系并掩护我们的伤员遭德国人枪决。）

这类求爷爷、告奶奶的做法甚至在千里之外已经令瓦吉姆作呕和感到屈辱。他讨厌任何走门路、吃老本、找熟人的行为。就连妈妈给董佐娃发了一份请她关照的电报已经叫他受不了。尽管活下去对他说来是多么重要，但他即使面对癌症这样狰狞可怖的死神也不愿享受任何特权。不过，对董佐娃作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后，瓦吉姆很快就明白，即便妈妈不发电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不会少花工夫关心他。所不同者只是，董佐娃本来不会发电报嘱咐胶体金的事。

现在，如果妈妈能弄到这种胶体金，她一定坐飞机送来。倘若弄不到，也要飞来。瓦吉姆从医院给她写过一封信谈起恰嘎。是的，他信上谈到了恰嘎，倒不是因为相信它

能克奏神效，而是为了让妈妈多一件救人的事可做。万一她走投无路，也会违背作为一个医生的全部知识和信条，到深山里去寻访那位巫医，求伊塞克库尔的草根。（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来向他表示歉意，不该服从一个娘们的意志把草根熬的药酒给倒掉。不过那一点点毕竟太少，好在他有那位老人的地址。假如老人已被关进监狱，他表示愿从自己的储备中让一部分给瓦吉姆。）

只要大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妈妈的日子就没法过。妈妈一定要竭尽全力，甚至超过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出不必要做的事情来。她甚至会跟他到考察队去，虽然他在那边有嘉尔卡照顾。瓦吉姆从有关自己疾病的片言只语中读到和听到，他那个肿瘤本身归根到底是由于妈妈过分爱护和关心而起：从小他腿上有一大块色斑，妈妈是个医生，显然知道变性的危险；她总是找各种借口摸摸他这个斑点，有一次她坚持请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动了预防性手术——看来，这恰恰是不应该做的手术。

但是，纵然他如今面临死亡的威胁确因妈妈过于谨慎所致，他也不能责怪她，无论当面还是背后。讲究实际不应该如此走向极端，不能光看结果来判断是非；比较合乎情理的办法还是要看动机。仅仅着眼于自己的壮志未酬而生妈妈的气也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如果没有他这个人，如果不是妈妈给了他——瓦吉姆——以生命，还有什么雄心壮志可言呢？

人有牙齿，就用来啃，用来嚼，用来咬。而植物没有牙，

试看它们生是多么平和，死也是多么安详！

但是，瓦吉姆可以原谅妈妈，却不能原谅事态的演变！他连一平方厘米的上皮也不准备放弃！想到此，他不能不咬牙切齿。

啊，这可诅咒的疾病来得真不是时候！为什么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象割草一般拦腰斩断？

诚然，瓦吉姆自幼一直隐约预感到他的时间将不够用。如果有女客或街坊来天南地北扯个没完，耽误妈妈和他的时间，他总是很懊丧。在中学和大学里逢到劳动、参观、联欢、游行，照例把时间比实际需要定早一两个钟头，因为估计大家肯定都姗姗来迟，他对此十分恼火。瓦吉姆一贯讨厌半小时的新闻广播，因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内容五分钟就容纳得了，其余都是水份。到任何一家商店去，你有十分之一的概率会赶上那里正在关门结账、盘点或移交存货，而这是永远无法预见的；任何一处村苏维埃，任何一处村邮政所在任何一个工作日都可能不办公，这在二十五公里以外也是绝对无法预见的——类似的事情都能把他气炸。

也许，吝惜光阴是父亲在他身上播的种。父亲也不喜欢无所事事。他记得，父亲曾把他夹在两膝之间颠簸，一边说："瓦吉卡！你要是不懂得怎样利用一分钟，那末，一小时、一天、一辈子也会被你白白浪费掉。"不，不！在时间上这份不知餍足的贪心从小就在他身上扎根，与父亲的影响无干。只要孩子们的游戏开始变得不够劲儿，他便不愿跟他们一起呆在大门口，立刻掉头走开，而不大在乎他们的

嘲笑。他要是觉得一本书淡而无味，不等看完就会把它撂下，另找内容扎实些的。倘若一部影片开始几个镜头显得无聊(事先你对这部影片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故意不让你知道的)，他便自认晦气，花了冤钱，随着椅子砰然作声离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时间和未被污染的头脑。他讨厌某些教员非得把全班训上十分钟不可，后来弄得来不及讲课，有的内容语焉不详，有的地方又太烦琐，打了下课铃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无法想象，一个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可能安排得比他们的上课时间更有条理。

也许，在并不自觉的情况下，他从小已模模糊糊地感到了潜伏在自己身上的危险。完全无辜的他，一生下来就处在这个色斑的威胁之下。他童年时就如此爱惜光阴，把吝惜时间的习惯传给两个弟弟，一年级便开始看大人的书，六年级已在家里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凡此种种，都可以说他已经在跟未来的肿瘤抢时间。但这是摸黑的赛跑，看不见敌人在哪里。而敌人却看得一清二楚，在他跑得最上劲的时刻扑过来咬了他一口！这简直不是疾病，是毒蛇！它的名字也象一条蛇——恶性黑色素瘤。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瓦吉姆没有注意到。那是在阿尔泰山区野外考察的时候。先是发现那个色斑硬化，接着感到疼痛，后来溃破了觉得好些，后来重又硬化，而且被衣服摩擦得几乎不堪行走。但是他既不写信告诉妈妈，也没有把工作撂下，因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资料，他必须带着这些资料上莫斯科去。

他们的考察队只是研究带放射性的水，根本没有找矿的任务。但是瓦吉姆尽管年龄不大，却读过很多书，而且特别爱好并非个个地质学家都熟悉的化学，他预见到，或者说预感到，在这个领域内正在酝酿产生一种新的探矿方法。考察队长对他的这一意向大不以为然，考察队长需要的是完成计划。

瓦吉姆要求去莫斯科，队长不让他为此目的去出差。于是瓦吉姆把肿瘤给他看，取得了病假证明，来到这个医院，这才了解到医生的诊断。这里要他立刻住院，说事情不容耽搁。他拿了住院证明，却坐飞机到莫斯科，希望见到正好在那里开会的切列戈罗策夫。瓦吉姆从未见过他，只读过他编的课本和其他著作。有人告诫他，说切列戈罗策夫至多只听一句话，并根据这第一句话作出判断，是否有必要跟该人谈话。瓦吉姆在去莫斯科的途中一直在盘算如何说这句话。会议休息时，他在小卖部的入口处被介绍给切列戈罗策夫。瓦吉姆象开枪似地说出了这句话，切列戈罗策夫不再上小卖部，他挽住瓦吉姆的臂肘，把他带到一旁。这次在瓦吉姆看来紧张到白热化程度的五分钟谈话，难就难在必须说得飞快，又不能漏听对方回答的每一个字，既要适度显示自己的学识，又不宜全部抖底，还得保留主要的一张牌。切列戈罗策夫向他倾泻了一大堆反驳的意见，其中心内容是：带放射性的水只是一种间接标志，不能作为基本标志，据此找矿势必落空。他虽如此说，但似乎很欢迎别人能说服他。他等着瓦吉姆能改变他的信念，等了一分钟没有

下文，便放他走了。瓦吉姆还得到这样的印象：整个莫斯科地质科学研究所都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只有他一个人在阿尔泰山区的石砾中打滚。

暂时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好的结果。目前正需要脚踏实地埋头工作！

可是偏偏这时候不得不住进医院……并向妈妈吐露真情。他本来可以到新切尔卡斯克去，但他喜欢这个地方；再说，离他的山区也比较近。

在莫斯科，他了解的不光是有关水和矿石的事情。他还了解到，成黑素细胞瘤的患者无一幸免：难得有活上一年的，通常只能活八个月。

如同以接近于光的速度运动的物体一样，他的时间和他的质量现在正变得与别的物体、别的人不一样：时间更浓缩；质量的穿透力更强。几年对他来说被压缩成几个星期；几天则缩成几分钟。他一生对时间素来抓紧，但现在他才真正匆忙起来。度过六十年安稳的日子，连傻瓜也能成为博士。然而他才二十七岁啊！

二十七岁是莱蒙托夫的终年①。莱蒙托夫何尝愿意死去。（瓦吉姆知道自己有点儿象莱蒙托夫：个儿也不高，头发漆黑，细腰小手，只是没有胡髭。）然而，他却把自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是记上一百年，而是永记不忘！

死亡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只条纹斑

①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14—41）——俄国浪漫派诗人、作家。他是在一次决斗中被杀死的。——英译者注

斓的豹子，瓦吉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为邻共处的方式。怎样卓有成效地度过剩下的这几个月（如果说只剩下几个月的话）？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对待。经过这样的分析，他注意到自己好象已对它习惯起来，甚至开始不见外了。

最最要不得的想法是一切从自己失去了什么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的话，他该有多么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字：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记忆中可以永葆青春，临死前闪起的火光将永不熄灭。瓦吉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迹近荒诞的道理：天才比俗物较容易理解死亡和接受死亡。事实上，天才一死失去的比俗物要多得多！俗物则非长寿决不满足，尽管伊壁鸠鲁① 早就指出，蠢人即使有了长生术也不知怎么处。

只要能支持三四年，在我们这个科学全面蓬勃发展、各种发明层出不穷的时代，一定也能找出治成黑素细胞瘤的药物——这个设想当然令人神往。但瓦吉姆决定排除一切霍然痊愈的梦想，哪怕夜里也不在这类无益的念头上花费几分钟。他决定咬紧牙关，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后给人们留下一种新的找矿方法。

---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说过这样的话："生活过得不聪明、不好、不公正，也就不可能生活得愉快；生活过得不愉快，也就不可能生活得聪明、好和公正。"——中译者注

他希望以此来补偿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无憾。

二十六年来，他认为最充实、最丰满、最和谐的感觉莫过于时间过得有益这样一种感觉。末了这几个月时间最合理的过法也应该如此。

瓦吉姆正是怀着这样一股工作的热情，挟着好几本书走进病房的。

他估计将在病房里遇到的第一个敌人是广播喇叭，瓦吉姆准备用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与之作斗争：先是说服其他病人，接下来用针造成短路，必要时把插座从墙上挖掉。非装不可的广播喇叭不知何故在我国到处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实则相反，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只能鼓励不动脑筋，做思想懒汉。可是瓦吉姆几乎从来不曾说服过任何人相信这一点。经常性的絮叨，交替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消息和非你所要欣赏的音乐（还往往同你的情绪格格不入），无异盗窃时间、空耗精神，而分散精神对于好逸恶劳的人是很舒服的，对于积极主动的人则不能容忍。伊壁鸠鲁所说的那个蠢人掌握了长生术，大概除了听广播外不知如何消磨无穷的永恒。

但是，瓦吉姆走进病房，竟喜出望外地没有发现广播喇叭！二楼别的地方也没有。（省略这项设施的原因是：医院年复一年地计划要搬到另一幢设备较好的房子里去，新地方一定会配备完整的广播装置。）

瓦吉姆心目中第二个敌人是黑暗——熄灯早，开灯晚，窗子远。但是焦姆卡慷慨地把靠窗的床位让给他，瓦吉姆

从第一天起就适应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寝，天一亮就醒来开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最安静的几个小时。

第三个可能的敌人是病房里过多的闲聊。事实上确实有那么一点儿。但总的说来，瓦吉姆对病房里的人员组成表示满意，首先在安静问题上表示满意。

他对叶根贝尔吉耶夫最有好感，因为叶根贝尔吉耶夫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对任何人都展开肥厚的嘴唇和肥厚的腮帮，露出童话里壮士的笑容。

穆尔萨里莫夫和阿赫马章也不讨人嫌，挺可爱。他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的时候，对瓦吉姆毫无妨碍，何况他们说话总是心平气和，颇合道理。穆尔萨里莫夫样子象一位高龄的贤哲。瓦吉姆在山地里见过这样的人。只有一次穆尔萨里莫夫忽然激动起来，跟阿赫马章争论得火气挺大。瓦吉姆请他们翻译给他听听。原来穆尔萨里莫夫对于取名字的新花样——把几个字拼在一起作为一个名字——大不以为然。他断言真正是先知留下的名字只有四十个，其余的名字都不正确。

阿赫马章也是个挺知趣的小伙子。你要是请他轻声些，他一定照办。有一次瓦吉姆给他讲埃文基人①的生活，大大激发了他的想象力。阿赫马章接连两天一直在思量着这种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不时向瓦吉姆提出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说说，这些埃文基人穿的是什么服装？"

① 居住在北冰洋沿岸的一个少数民族。——英译者注

瓦吉姆三言两语作了回答，阿赫马章便会几个小时沉浸在深思中。过后他又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问：

“那末，这些埃文基人一天的作息时间是怎样安排的？”

第二天早晨，他又问：

“你说说，给他们交代些什么任务？”

他不能接受埃文基“就这样过日子”的解释。

常常来跟阿赫马章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也很有礼貌，给人好感。他显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懂得大声说话不体面、不应该。即使在跟阿赫马章发生争论的时候，他也好象竭力使对方心平气和，比方说：

“这里的葡萄难道是真正的葡萄？这里的甜瓜难道是真正的甜瓜？”

“那末，你说哪里才有真正的？”阿赫马章似乎很激动。

“克里米亚……。你要是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焦姆卡也是个好孩子，瓦吉姆看得出他不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空谈家。焦姆卡好学多思，什么都想弄懂。诚然，他脸上没有打上天才的光辉烙印，当某一个念头骤然闯入他脑中的时候，他往往显得愁眉不展。学习的道路对他来说是不平坦的，用脑也不轻松，但象这种看起来比较迟钝的料有时却能成大器。

瓦吉姆觉得卢萨诺夫也并不讨厌。这是个一生勤勤恳恳工作的干部，尽管不会给人类从天上摘下星星来。他的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只不过他不善于深入浅出地把道理讲透，只会硬邦邦地照本宣科。

科斯托格洛托夫起初给瓦吉姆的印象不佳，象是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后来发现这是表面现象，其实他并不傲慢，甚至每每与人方便，只是他半世坎坷，以致性情暴躁。看来，他的颠沛蹭蹬根子在于自己别别扭扭的性格。他的病正在好转，还来得及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精力集中，目标明确。他最大的毛病正是精力不够集中，这表现在他把时间都化整为零耗费掉了——一会儿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徘徊，一会儿抽烟，一会儿拿起书本，但旋即扔下。他跟女人的接触也太频繁。用不着十分精细的观察力就可以发现，他跟卓娅和甘加尔特都有一手。

她们俩的确都很漂亮，但瓦吉姆在死亡的深渊边上决没有闲情逸致做这种游戏。嘉尔卡在考察队等他，盼望着能同他结婚；但他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属于嘉尔卡的日子不多了。

他将不属于任何人。

这就是代价，必须全部清偿。某种欲望一旦把我们抓住，就取代了其他一切欲望。

病房里瓦吉姆讨厌的一个人乃是波杜耶夫。波杜耶夫凶悍、强横，可是一下子垮了下来，成了托尔斯泰那套诵经说教的信徒。瓦吉姆不能忍受这些宣扬顺从和爱他人的蛊惑性神话，其内容无非是要人们牺牲自己，张口瞪眼候机会给不相识的人提供帮助，至于对方可能是游手好闲的懒虫或招摇撞骗的坏蛋则不去管它！这种空泛而苍白的冒牌真谛，同瓦吉姆朝气蓬勃的坚毅性格，同他象弦上之箭一般急

于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是格格不入的。事实上他也下了决心只予不取；但不是零打碎敲，不是踉踉跄跄地走一步，布施一点，而是要建树辉煌的功勋，一下子献给全国人民和全人类！

因此，波杜耶夫出院，淡黄色头发的菲德劳搬到他的床位上，瓦吉姆对此感到高兴。菲德劳才真正算得上安分，病房里数他最沉静。他可以整天不开口，躺在床上忧郁地望着前方。真是个怪人。作为一个邻居，他完全符合瓦吉姆的理想。不过，后天——星期五——要给他施手术了。

他们双方一直保持沉默，可是今天到底谈起了生病的事。菲德劳说他曾经患过脑膜炎，差点儿死掉。

"哦！是撞伤引起的吗？"

"不，是感冒引起的。我在厂里热昏了，后来他们用车送我回家的时候，头部着了凉。结果脑膜发炎，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他安详地叙述事情的经过，面带淡淡的笑容，并不渲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幕惨剧。

"怎么会热昏的呢？"瓦吉姆问，不过眼睛已经睥睨着书本，因为时光正在流逝。但只要谈起疾病，病房里随时都有人听。菲德劳发现卢萨诺夫的视线从房间的另一端向自己这边投来，今天他的目光十分温和。现在菲德劳的话也可以说是对他讲的：

"厂里的锅炉发生故障，必须进行一次复杂的电焊抢修。但如果把蒸汽全部放掉，让炉子冷却，以后再重新加

温，就得一天一夜。厂长夜里派车来接我，说：‘菲德劳！为了不影响生产，你穿上安全服冒着蒸汽进去抢修一下，行吗？’我说：‘既然需要，我去！’那是在战前，生产指标逼得很紧，只能这么干。我就进去干了一个半小时光景……。怎么能推辞呢？我在厂里的光荣榜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

卢萨诺夫听着，现出赞许的表情。

“我认为，这是够得上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行为，”他夸了一句。

“我本来就是……党员，”菲德劳作了一个更谦逊、更沉静的微笑。

“过去是？”卢萨诺夫想纠正他的话。（这些人也真是，一夸就当起真来。）

“现在也是，”菲德劳非常沉静地说。

卢萨诺夫今天没有心思细想别人的事情，顾不上跟人家争论或告诫对方不要忘其所以。他自己的处境就极其悲惨。但这样赤裸裸的谎话实在不能不加以制止。而地质学家已经钻到书本里去了。于是卢萨诺夫用微弱的声音沉着而清晰地说（他知道别人一定会竖起耳朵听明白的）：

“这不可能。您不是日耳曼人吗？①”

“是的，”菲德劳点点头，似乎有些沮丧。

“那不就对了吗？”

事情好象够明白了，但对方还是不承认。

“你们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时候，党证都得收去。”

---

① 卢萨诺夫是根据菲德劳这个姓氏作出的判断。——中译者注

"没有收去，"菲德劳摇摇头回答。

卢萨诺夫把嘴一撇，只觉得说话很费力：

"这显然是工作中的疏忽。有关部门想必匆匆忙忙出了差错。现在您应该自己交出去。"

"不，决不！"菲德劳尽管怕羞，可还是坚持立场。"我领到党证已经第十四个年头了，怎么会发生差错？区委曾召集我们开会，向我们讲清楚：'你们仍然是党员。到流放人员监督处登记管登记，你们的党费还是照样缴纳。你们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但在普通岗位上仍应模范地劳动。'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卢萨诺夫叹了一口气。

前天打的第二针丝毫不见效——肿瘤没有消退，也不变软，还是那么铁一般硬的一块抵着他的下颌。今天，他周身乏力，躺在那里等打第三针，预料又将陷于痛苦的谵妄。他跟卡芭说定，如果三针不见效，就上莫斯科。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斗志已丧失殆尽，他现在才尝到了束手待毙的滋味：三针也罢，十针也罢；在此地也好，去莫斯科也好——如果药石对肿瘤不起作用，说什么也是白搭。诚然，肿瘤还不等于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使你成为残废、畸形，镇日价缠绵病榻；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毕竟忽略了肿瘤与死亡之间的联系，一直到昨天为止。昨天，那个看了不少医学书籍的食骨者，开始给某人讲解，肿瘤会向全身扩散毒素，因而不能让它留在体内。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顿觉热辣辣的一阵灼痛，于是

他明白了，完全不理会死亡是行不通的。死亡当然仍旧要不得，但不能不加以考虑。

昨天，他在楼下目睹给一个手术后的病人用被单连头盖起来。现在他方始懂得从工友之间的交谈中曾经听到的一句切口："这个人快盖被单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死亡在我们心目中通常是黑色的，但这仅仅是它的前驱征兆，真正的死亡其实是白色的。

卢萨诺夫当然知道，既然人人都有一死，某一个时候他也得办理移交。但那是某一个时候，可不是现在！某一个时候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死去。为什么？因为：那怎么成呢？以后又怎样呢？少了我将是怎么个局面呢？

他对自己感到惋惜。他不忍想象，这样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说灿烂辉煌的生活，竟被从横处飞来的一块肿瘤石子打歪了。他的头脑怎么也无法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白色、冷漠的死亡化为一条被单，裹着空虚无形的躯体，趿着拖鞋，小心翼翼、悄没声儿地向他走近来。遭到死亡这次偷袭的卢萨诺夫，不仅没有力量同它搏斗，甚至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它是非法来到的，没有一条规定，没有一项指示能保护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虚弱得不再怀着公民的一腔热血来对待病房里发生的事情。今天化验室的一个姑娘来统计选民名单（病人在医院里也要参加选举）。她向大家收本人的身份证，所有的

人都交了身份证或集体农庄的证明，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什么也没有。化验员自然表示惊讶，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证。而那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居然还大吵大闹，说她应该具备起码的政治常识，流放者有各种各样，她不妨打电话到某处去问；说他有选举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万不得已时他也可以不参加投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才意识到，自己住进这所医院无异陷入一个罪恶的逋逃薮！他是跟什么样的人同居一室啊！这个流氓竟敢拒绝熄灯，还随心所欲地打开气窗，向院长自称是垦荒者，甚至抢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之前第一个翻开谁也没有看过的当天报纸。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果然没有料错，他的心早就感觉到此人决非善类！

可是现在卢萨诺夫被淡漠的浊浪所淹，连揭露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劲头也拿不出来。甚至这个逋逃薮不知怎的也已经不再伤害他的尊严了。

被单的帽兜在他前面若隐若现。

穿堂里传来工友奈丽亚刺耳的声音——全院上下只有她一个人有这样的嗓门。她甚至连名字也不喊，就这样隔着二十米地在问某一个人：

"喂，这双漆皮靴子值多少钱？"

另一个人怎么回答听不清楚，接着又是奈丽亚的声音：

"嗳——嗳，我要是穿上这样一双靴子，那些少年郎不成群地围着我转才怪呢！"

另一个大概有所怀疑，于是奈丽亚部分地表示同意：

"喔，是啊！我头一回穿卡普隆丝袜的时候，喜欢得命都不要。可是谢尔盖扔了一根火柴，一下子把袜子给烧了个窟窿，这畜生！"

这时她拿着刷子走进病房，问：

"小伙子们，听说地板昨天已经狠狠地擦洗过了，咱们今天就马虎一点，行吗？……哦，对了！告诉你们一条新闻！"她想起来了，便指着菲德劳，得意洋洋地宣布："你们这儿那个人自己报销啦！"

弗里德里希·雅各勃维奇这么沉得住气的人也耸了耸肩膀，觉得很不自在。

大家不懂奈丽亚说的是什么，于是她进一步解释道：

"喏，就是那个麻脸！脖子给绷带缠得老粗老粗的！昨天死在火车站靠近卖票的地方。现在尸体已送来解剖。"

"天哪！"卢萨诺夫悲怆地说。"工友同志，您说话怎么这样不知进退！这种令人丧气的消息传播它做什么？您该向我们报道一些叫人开心的消息才对。"

整个病房都陷入了沉思。的确，叶甫列姆说话动不动就提到死，看来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他经常在这条通道上当路站停，从牙缝里吐出每一个字正告大家：

"咱们的事情简直糟透了！……"

然而，叶甫列姆走的最后一步大家还是没有料到。他走了以后，留给大家的印象是活生生的。可是现在必须想象，那个人前天还踩着大家在上面行走的地板，此刻已躺在太平间里，被开膛剖肚，象一支胀裂的灌肠。

“叫人开心的也有，我说出来，保管你们笑痛肚皮。不过也许有伤大雅……”

“没关系，你说好了！”阿赫马章请她讲。“来吧！”

“对了！”奈丽亚又想起了什么。“好乖乖，叫你去照爱克斯光呢！你！你！”她指着瓦吉姆。

瓦吉姆把一本书搁在窗台上。他小心地用手帮忙让一条坏腿着地，然后再放下另一条腿，朝门外走去。要不是那条僵直的腿，他的身段丝毫不比芭蕾舞演员逊色。

他听到了波杜耶夫的死耗，但并不觉得惋惜。波杜耶夫不是一个对于社会很宝贵的人，就象这位放荡不羁的女工友一样。而人类的价值毕竟不在于量而在于质。

化验员拿着一份报纸走进来。

食骨者跟在她后面抢着要看。

“给我！给我！”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伸出一只手有气无力地说。

他总算拿到了报纸。

他没戴眼镜就已经看到，整个第一版全是大幅照片和大字标题。他把身子抬得高些，戴好眼镜，看到这果然如他所料——最高苏维埃会议闭幕了：一张照片拍的是主席团和会议大厅，并用大字排着最近的重要决议。

这些决议字体之大，可不必再翻报纸到什么地方去找某一段不引人注目、但是意味深长的文字。

“什么？？什么？？”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实在忍不住了，虽然他并不以病房里任何人为对象；再者，看到一条新

闹如此大惊小怪，甚至向报纸提问，也不象话。

头版头条用大字刊登着：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自动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满足这一请求。

卢萨诺夫原来只等着通过预算的会议，竟然是这样闭幕的！……

他感到全身疲软，拿着报纸的手放了下来。他不能再往下看。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他已无法看懂明明白白告诉全体人民的指示。但他懂得，事态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变得太快了！

好象从极深极深的地下，地层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只是轻微地颤动了一下——但是这一下却震撼了整个城市、医院，包括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床位。

但是，甘加尔特医生却身穿刚烫得笔挺的白大衣，面带鼓励的笑容，手里拿着注射器，踏着轻软、平稳的步子从门口向他走过来，根本不理睬房间和地板在摇晃。

"来，该打针了！"她和颜悦色地发出邀请。

科斯托格洛托夫把报纸从卢萨诺夫腿上拉了过去，他也立刻看到了这条消息。

他看了以后站起身来。他坐不住了。

这条消息确切的涵义他也不全懂。但既然前天最高法院全部改组，今天又更换总理，这意味着传来了历史的脚步声！

不能想象，也无法相信，历史的脚步声会预示更坏的

结果。

前天他还用两手按住想要跳出来的心，不准自己相信，不准自己抱任何希望。

但过了两天，还是贝多芬的那四下带有提示意味的叩门声，竟象通过扩音器传出来，一下子响彻云霄。

可是病人们安静地躺在床上，居然没有听见！

薇拉·甘加尔特也照旧安详地把恩比兴注入卢萨诺夫的静脉。

奥列格飞也似地跑了出去——去散步！

到广阔的天地去！

第二十章

美好的回忆

不，他早就不准自己存任何幻想！他甚至不敢让自己高兴！

只有在服刑的最初几年，资格不老的囚犯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阵关于大赦的耳语都当作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从牢房里叫出去只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文件，然后把他推进底下一层的另一间牢房，那里的空气也同样混浊，但是更加黑暗。而大赦则一拖再拖，从胜利纪念日拖到十月革命节，再拖到最高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大赦象肥皂泡那样破裂，或者只宣布赦免窃贼、骗子、逃兵，而不向打过仗、吃过苦的人宣布。造化在我们心上为欢乐设计的那些细胞，由于闲置不用而衰亡。胸中供信心栖宿的那几个立方厘米，则因经年空关而萎缩。

他尝够了幻想破灭的滋味，做腻了获释归家的美梦，最后，他只想回到自己美丽的流放地，回到心爱的乌什-铁列克去！是的，是心爱的！说也奇怪，但从此地医院里，从这个大城市，从这个奥列格觉得自己已适应不了、恐怕也不想

适应的结构复杂的大千世界遥望他那一角放逐地，确实令人神往。

乌什-铁列克的意思是“三棵白杨”。它因三棵远在十公里以外的草原上也望得见的古老白杨而得名。三棵树挨得很近，它们不象一般白杨那么挺拔，甚至有些弓腰曲背。它们大概都已有四百年高龄。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它们不再往上长，而是向旁边扩展，在一条主要的灌溉渠上方织成浓密的荫盖。据说，当年敖尔里还有好些这样的树，但在三一年被砍倒了。以后这种树再也种不活。少先队员们栽的树苗再多，一抽芽立刻被羊啃掉。只有美洲槭树在区委会门前的大街上扎根成活。

世上究竟什么地方更可爱：是你呱呱坠地、什么也不懂，甚至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莫名其妙的地方可爱呢，还是第一次听到对你讲“好了，不用押送，自己走吧！”的地方可爱？

自己走！“把你的铺盖拿去，走！”

那是半自由状态的第一夜！监督处暂时还注意他们，不让进镇，但容许自由睡在姆维德派出所院子里的干草棚下面。棚棚下几匹站着不动的马整夜轻轻地嚼着干草——再也想象不出有什么声音能比这更甜美的了！

但是奥列格半宿没能睡着。院子的硬地给月光照得一片白，于是他起来象精神失常似地按对角线穿过院子走去。没有任何了望哨，没有任何人看着他。他幸福地在高低不平的院子里磕磕绊绊地走着，昂首仰望白色的夜空，不停步

地不知走向何方，似乎担心来不及赶到，似乎明天不是要去某一个穷乡僻壤的敖尔，而是要进入一个高奏凯歌的广阔世界。南方早春的温暖空气里一点也不安静：如同一个铺得很散的大火车站上空机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彻夜不停，从村镇的四面八方一夜到天亮都有驴子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象吹号似地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它们在诉说自己求偶的情欲和传种的信心。这种求偶的呼声在奥列格本人胸中引起了共鸣。

试问，难道还有比你度过这样一夜的地方更可爱的吗？

就在这天夜里，他又恢复了希望和信心，虽然他已多次发誓断绝这样的念头。

经过劳动营的生活以后，流放者的世界不能说十分残酷，尽管这里逢到灌溉季节也会因争水而挥动农具打架，甚至互相砍脚。流放者的世界宽广得多、轻松得多、丰富得多。但这里也有残酷的一面，要往地下扎根，让茎吸收养分不是那么容易的。

还必须想方设法不让监督处把你打发到深入沙漠一百五十公里以上的腹地去。还得找一个泥秸屋顶栖身，付一点钱给女房东，而事实上没有钱能付给她。每天要吃的面包得花钱买，另外还得在食堂里买点儿什么。必须找一份工作，可是挥了七年洋镐，毕竟不愿意拿起农具去浇水种地。虽然村里一些寡妇拥有土房、宅旁园地乃至奶牛，十分乐于招一个单身流放者做丈夫，然而他觉得把自己卖出去当男人也为时尚早：要知道生命似乎不是行将告终，而是方

兴未艾哩。

以前在营里估计这些个男人到了外面将供不应求，囚犯们满以为一旦摆脱押解者的监视，第一个女人就是你的。大家想象她们都是形单影只，整天哭哭啼啼，除了想男人什么也不考虑。但到了村里，发现孩子一大堆；妇女的生活似乎内容挺丰富，并不凄清孤独；姑娘们没有一个愿意就此同居，一定要明媒正娶，在镇上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盖一座房屋。在乌什-铁列克通行的还是上一个世纪的习俗。

奥列格早已摆脱了押解者的监视，可他还是象关在铁丝网围墙之内时一样过着没有女人的日子，虽然村里有的是同画片上一模一样的黑头发希腊女子和勤劳的日耳曼金发姑娘。

他们被送到流放地时单子上写明永久字样，奥列格完全认了命，准备永久流放，也无法设想任何其他办法。可是在这里成家，心里总不是那么毫无保留。贝利亚倒台了，仿佛一尊中空的塑像豁啷啷顷刻坍塌；大家都在期望发生剧变，可是变化进展缓慢，幅度不大。奥列格找到了以前的女朋友——她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流放地，跟她通了几封信。他还打算跟旧时在列宁格勒相识的一个女的通信，好几个月一直指望她会到这里来。（其实，谁愿意扔下列宁格勒的住宅，到他这鬼地方来？）这时肿瘤出现了，它以持续难忍的疼痛压倒其余的一切，连女人对他也不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奥列格体会到，流放不是只有难堪的一面——这一面

从奥维德[1]开始人人都知道，即使不是亲身经历，从书上也看到过（地方不是你喜爱的；人也不是你愿与相处的），——同时也有解脱的一面——这一面一般不大知道，它可以使你从怀疑和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身份证、同时被要命的第三十九条[2]卡住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东奔西走，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到处都被驱逐，老是为一点点细节失检而自怨自艾。而囚犯来到流放地反而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自己想要到这里来的，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作了安排，他不必担心错过某处一个好位置，不必为谋求较好的待遇而奔忙。他知道所走的是唯一的路，这就使他感到精神振奋。

现在，开始康复的奥列格站在错综复杂的生活面前，为有乌什-铁列克这样一小块福地而高兴，那里为他作好了必要的安排，那里一切都清清楚楚，那里把他当作和大家一样的公民看待，不久他就要象回家一样回到那里去。象回家一样。已经有一些亲缘的纽带在把他往那边拉，使他直想把那个地方称为“我们那儿”。

奥列格待在乌什-铁列克的一年工夫却病了九个月，对那里的景色和生活的细部还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观察，仔

[1] 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后18）——古罗马诗人，曾被奥古斯都皇帝流放到黑海西岸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一带。——中译者注

[2] 第三十九条对曾经在劳动营里关过的人在工作和居住权利上规定了限制。——英译者注

细的欣赏。对一个病人说来，草原似乎尘土太多，阳光似乎太猛，宅旁园地都被烤焦了，搅拌切藁做砖坯也太费劲。

但现在，象那些叫春的驴子一样，生命的号角又在他身上吹响。奥列格虽然漫步走在这个树多、人多、色彩丰富、砖房如林的医疗中心的小径上，却满怀深情地从记忆中唤醒乌什-铁列克那个世界里平淡无奇的一草一木。那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对他说来更可贵，因为那是他的世界，至死都是他的，永久是他自己的，而这里却是暂时的、租来的。

他回想起草原上的“茹桑”——它的气味象苦药，可又是那么亲切！他也想起了多刺的“冉塔克”，还想起刺儿更多的“珍吉尔”——这种植物沿着篱笆生长，五月里开紫色的花朵，芬芳一如丁香。还有那种叫“芝杜”的树，它的花香浓得令人头晕，犹如欲念失了分寸、香水喷得过多的女人。

说来也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和小块田地感情上剪不断、理还乱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不是太炎热、就是风太大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作休息日，下雨更象是过节，而且对于在此住到老死似乎也已经安之若素。他对象萨梭贝托夫、铁列根诺夫、茂柯耶夫、斯科科夫兄弟这样一些人似乎已经有了感情，尽管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语言；透过真情实感与一时冲动掺杂在一起的表象，透过他们对于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他们根本上是一个纯朴的民族，任何时候都以真心对待真心，善意报答善意。

奥列格年已三十有四。所有的大专院校都不收超过三十岁的学生。他已永远不可能受到高等教育。受不到就算了。前不久他刚从一个泥秸砖的制坯工上升为土地测量员的助手。(他向卓娅说自己是土地测量员，那是撒谎，其实仅仅当个助手，工资三百五十卢布。)他的上司——区土地测量员——对于测杆上的刻度不甚了了，按说工作够奥列格忙的。然而他几乎没有工作可做。集体农庄持有发给它们永久使用土地(又是永久)的证书，他只须偶尔把集体农庄的地割去一部分给扩展中的市镇。跟米拉布[①]比起来还差得远哩！米拉布是农田灌溉的主宰，眼睛不看也能感到背后土壤水分的细微变化。过几年奥列格可能得到更合适的工作。但即使在目前，他回想起乌什-铁列克来心里也是热乎乎的，只等疗程结束就回到那边去，哪怕病只治了一半也急于回去。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倘若对自己的流放地怀着一肚皮怨气，憎恨它，诅咒它，岂非更合情理？事实上偏偏不是这样，甚至一些颇堪讽刺作家鞭挞的事情，在奥列格看来也只是可供一笑的趣闻。例如，新来的校长阿本·贝尔登诺夫把萨弗拉索夫的《白嘴鸦》[②]从墙上撕下来扔到柜子后面，因为他看到上面有教堂，认为这是宗教宣传。区卫生局长——一位精明干练的俄罗斯女同志——经常在讲台上向区里的知识分子做报

---

① 中亚的水吏。——中译者注

② 阿列克塞·萨弗拉索夫(1830—97)——俄国风景画家。《白嘴鸦飞来了》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中译者注

告，私下却以两倍的价格向当地的女士销售一种新花样的绉纱，直到这种料子也在区百货商店出售为止。在滚滚烟尘中疾驰而过的救护车往往根本不是载的病人，而是充当书记的小轿车，甚或是给某些人家里送鸡蛋面和鲜奶油去的。再如，个子很小的零售店负责人奥连巴耶夫的"批发"业务也是够精彩的：在他的小小食品店里老是空空如也，卖掉的商品的空箱子却在屋顶上堆积如山；他因超额完成计划而获得奖金，平时经常在店门口打瞌睡。他懒得零称零卖，分散包装。他先是供应所有的大人物，然后选定若干他认为够格的对象，悄悄地对他们说："拿一箱通心面去，要就是一箱"，或"拿一大包白糖去，要就是一包"。整包、整箱的商品从仓库直接搬到家里，可是一笔笔都算作奥连巴耶夫的营业额。还有，区委第三书记一心想以校外学员身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可是任何一门数学他都一窍不通，于是黄夜趋访一个流放的教师，送给他一张紫羔皮。

他对所有这些事情的反应只是一笑而已，因为他是曾经狼窟（劳动营）难为人了。是啊，在劳动营里待过以后，这类事情难道不象笑话？难道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

要知道，薄暮时分穿上唯一的一件白衬衫（领子已经磨破，至于裤子和皮鞋就不必问了），沿着镇上的大街走去，乃是一种享受哇！在俱乐部门前的芦席棚下可以看到"缴获新故事片……"[①] 的海报，还有那个白痴瓦夏在招徕所有的

[①] 1945 年红军从德国缴获一批西方电影，战后曾在俄国放映好多年。——英译者注

人进去看电影。花两个卢布可以买一张最便宜的票——第一排，跟一些小家伙坐在一起。一个月打一次牙祭——花两个半卢布到茶馆里去挤在切禅族的汽车司机们中间喝一杯啤酒。

在笑口常开地对待流放生活的态度方面，奥列格受到的影响大半来自卡德明老俩口——妇科医生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他的老伴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卡德明夫妇在流放中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说：

"太好了！这比以前好多了！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真是走运哪！"

他们要是弄到一只白面包——高兴得不得了！市场上牛奶价格稍跌——高兴得不得了！① 今天俱乐部里放一部好电影——高兴得不得了！来了一位专家给他们镶了牙——高兴得不得了！又派来了一位妇科女医生，也是流放者——非常好！让她专看妇科病，管非法堕胎的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可以看一般内科病，钱虽然少些，但比较安稳！倘若出现橙黄——粉红——火红——猩红——血红的草原夕照，身躯细长、头发花白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就携同臂粗腰圆、有些病态地愈来愈胖的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步履稳重地走到镇边几所房子外面去欣赏这良辰美

---

① 英译本这一句是："要是他们在书店里发现一部两卷本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品选——高兴得不得了！"（按：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是苏联老一辈的非党作家，以文笔优美见长。）——中译者注

景。（他的动作是多么灵活，她又是多么迟缓。）

但种种乐趣把生活装点成一连串的火树银花，是从他们买下一座带宅旁园地的半倾圮土房子那一天开始的。他们明白，这是他们一生的最后一处栖身之所，是他们在此终其天年的最后归宿。（他们相约要死一起死；一个上路，一个随行；否则留下的一个有何生趣？）他们没有任何家具，便请霍姆拉托维奇老头（也是流放者）给他们在角落里用切藏砖砌了个平台。这就算是一张双人床：多宽敞，多舒坦——真叫人高兴！缝了一只大口袋，里边塞上麦秸——就是一张床垫。再请霍姆拉托维奇做一张桌子，还必须是圆的。霍姆拉托维奇摸不着头脑：他在世上活了六十多岁，从来没见过圆桌。干吗要做圆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搓着一双妇科医生白净而灵巧的手说："请您别管！反正一定要圆的！"下一件事要办的是设法搞到一盏玻璃的——不要铁皮的——高脚煤油灯；不要七分的，一定要十分的①；还另外要几只玻璃罩子备用。乌什-铁列克没有这种灯卖，他们便托好心人从老远的地方逐步捎来。终于，圆桌上出现了这样一盏灯，罩子上方还有自制的遮光——在大都市里人们竞相购置落地灯柱、氢弹也已经发明的一九五四年，在这里乌什-铁列克，自制圆桌上的这盏煤油灯竟把简陋的滑秸泥小屋子变成十八世纪的豪华客厅！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三人围桌而坐，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百感交集地说：

① 指灯芯的宽度。七分灯、十分灯就是灯芯宽十分之七英寸和一英寸的油灯。——中译者注

"啊，奥列格，我们现在的生活太好了！您要知道，除开小时候不算，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她说得对！因为人们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观。后两者始终由我们自己作主，那就是说，只要自己愿意，人随时可得到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他。

战前他们同卡德明的母亲住在莫斯科附近。婆婆的性格颇不能容人，老是吹毛求疵，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又是如此孝顺母亲，以致当时已届中年、自食其力、也不是第一次结婚的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经常郁悒寡欢。现在她把那几年叫做她的"中世纪"。直到发生了极大的不幸，才让一股清新的气流闯进他们的家庭。

不幸的降临也是婆婆牵的线：战争的第一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前来要求暂避。婆婆对家里人如此峻刻，偏又恪守基督教的普遍信条，认为收留一个逃兵义不容辞，甚至也不同儿子、媳妇商量一下。逃兵在她家住了两夜然后离去，后来在别处被逮住，在受讯时交代了那户人家曾留他住过。婆婆已年近八旬，当局倒没有碰她，但认为应当把五十岁的儿子和四十岁的儿媳妇抓起来。提审时问及，那逃兵是不是他们的亲戚；如果是的话，可大大从宽发落，因为这不过是徇私行为，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情有可原。但逃兵同他们非亲非故，只是路过罢了，结果卡德明夫妇不是作为逃兵的窝藏者，而是作为有意识破坏红军战斗力的祖国公敌各判十年徒刑。战争结束了，那个逃兵在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

大赦中获释。(历史学家将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逃兵最先得到宽恕,而且不加限制?)他已忘了当初在哪户人家住过,连累了什么人遭殃。可是卡德明夫妇跟那次大赦却沾不到一点儿边,因为他们不是逃兵,而是敌人。他们服满了十年徒刑,还不放他们回家,因为他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一个集团,一个组织——丈夫和妻子!——所以必须永久流放。卡德明夫妇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事先提出申请,要求至少把他们流放到同一个地方。当时似乎谁也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这一请求好象也是合情合理的,但还是把丈夫流放到哈萨克南部,把妻子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也许有意把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是同一组织的成员?……不,这倒不是对他们的惩罚,不是故意刁难,只不过内务部机构内根本没有人管照顾夫妇同住这件事,所以没有让他们住在一块。年近半百、手脚浮肿的妻子被放逐到泰加森林①,那里除了在劳动营时已非常熟悉的伐木外,没有别的活可干。(但直到现在,她回忆起叶尼塞河流域的泰加森林,仍说:那里的风景美极了!)他们还花了一年工夫,不断向莫斯科写信求告;最后总算派了一名特别解差把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押到这里乌什-铁列克来。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怎能不高兴?!怎能不爱乌什-铁列克?!怎能不爱这所滑秸泥的小茅屋?!他们还想过什么样的好日子?!

永久流放就永久流放吧!这点时间足够把乌什-铁列

---

① 北冰洋沿岸不毛之地与草原之间的针叶林。——英译者注

克的气候作一番周密的研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共挂出三支温度计，安放了一只计算降水量的罐子，并去向英娜·施特律姆——管理国家气象站的一个高中毕业生——了解风力。气象站如果还观察到什么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都一一记入资料齐全、数据精确的气象日志。

他自幼就从当交通工程师的父亲那儿养成经常渴望工作、酷爱精确和齐整的性格。谁也不认为柯罗连科[①]是个迂夫子，但他也说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引证的是原话）："凡事有条不紊，我们心里就熨帖。"卡德明大夫还有一句心爱的口头禅："事物都知道自己的地方。"事物本身知道，我们可不应当妨碍它们。

在冬天的晚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喜欢从事一种消遣：装订书籍。他喜欢把蓬松、散开、扭曲的书整理得生气勃勃、悦目赏心。就在乌什-铁列克，他甚至请人做了一台装钉压书机和一把极其锋利的切纸刀。

卡德明夫妇刚付清土房子的代价，便开始厉行节约。他们只穿旧衣服，逐月省一点钱下来买一架用干电的收音机。他们首先得请文化用品商店的库尔德族[②]店员为他们留开一些电池。因为电池如果到货的话，也是跟收音机分别到的。然后他们必须克服所有流放者对收音机怀有的恐惧：

① 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853—1921）——革命前的俄国作家，在切望"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中间受欢迎。——英译者注

② 主要居住在土耳其、伊朗等中西亚各国和苏联南高加索一带的一个民族。——中译者注

内务部的官员会怎么说呢？他们买收音机是不是为了听BBC[1]？恐惧克服了，电池弄到了，收音机打开了——放出的音乐在囚犯的耳朵听来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而且没有干扰声，因为电池供应的电流均匀。在卡德明的土屋中，每天从节目中挑选收听的有普契尼[2]、西贝利乌斯[3]、鲍尔特醸斯基[4]等人的作品。收音机充实了他们的天地，甚至不仅仅如此：现在他们没有什么需要取自外界，相反，还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匀给别人。[5]

但春天一到，晚上就没有太多时间听收音机了。他们得照看那片小小的宅旁园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把这一亩五分地划分得如此别出心裁，恐怕连鲍尔康斯基老公爵[6]和他那荒山田庄上特聘的建筑师也望尘莫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虽然年已花甲，但在医院还十分活跃，一个人干一个半人的工作量，无论哪天夜里随时都准备跑去给产妇接生。在镇上，他走路总是急匆匆地健步如飞，并不因自己须发斑白而不好意思，只见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做的一件帆布上装的衣襟迎风飘扬。可是使起铁锹来

---

① 英国广播公司的英文简称。——中译者注

② 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作曲家，作有«托斯卡»、«蝴蝶夫人»等歌剧。——中译者注

③ 西贝利乌斯(1865—1957)——芬兰作曲家，芬兰民族乐派最杰出的代表。——中译者注

④ 鲍尔特醸斯基(1751—1825)——俄国宫廷作曲家，主要创作是意大利歌剧和教会合唱音乐。——中译者注

⑤ 以上整整一段译自英译本，俄文本缺。——中译者注

⑥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英译者注

他毕竟气力不济了，早晨干一个半小时，便开始气喘吁吁。但尽管手脚和心脏跟不上，经营规划照样一丝不苟，设计得十全十美。他带领奥列格在种着两株小树为界的宅旁空地里参观，十分自豪地向他介绍：

"奥列格，整个这块地将有一条小径贯穿。左面你将来会看到三棵杏树，目前已经种下去了。右边将辟为葡萄园，我相信一定能扎根。小径的尽头是一座亭子——乌什-铁列克还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的亭子！亭子的基石已经安好，那里放一张半圆形的土秸砖台（那个霍姆拉托维奇又莫名其妙：干吗砌半圆形的？），这里的细杆子上将让啤酒花攀藤，旁边还将种上芬芳扑鼻的烤烟。白天我们将在这里避暑，晚上生茶炉子喝茶，到时务必请您光临！"（不过，茶炉子他们还没有买哩。）

他们的宅旁园地里还将长起什么来，这就不知道了，眼下看不出；至于肯定不种的东西却有土豆、卷心菜、黄瓜、西红柿和南瓜，而这些他们的邻居都种。卡德明夫妇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东西不是都买得到吗？"他们也确实是买蔬菜吃的。乌什-铁列克的定居者很善于经营，自己养奶牛，养猪，养羊，养鸡。卡德明夫妇也不完全反对饲养家畜，不过他们的饲养方针不能带来实惠，因为他们只养狗和猫。卡德明夫妇的想法是这样的：牛奶和肉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但狗的忠心上哪儿买去？难道你花钱能叫两耳招风、毛象玄狐、大得象熊的茹克或小巧玲珑、全身雪白、可是两只小黑耳朵抖个不停的托比克跳跳蹦蹦欢迎你？

我们现在把某些人喜欢动物看得一文不值，甚至还要取笑别人爱猫。但如果我们从讨厌动物开始，往后是不是必然会发展到对人也讨厌呢？

卡德明夫妇对畜养的每一只动物爱的并不是它们的皮毛，而是它们的个性。从老俩口身上焕发出来的一片至诚，无须训练，很快就能被他们畜养的动物吸收过去。卡德明夫妇跟它们说话的时候，这些畜生十分珍惜，会一连听上很久。畜类对于主人跟它们交朋友这一点相当器重，颇以到处伴随他们为荣。要是托比克躺在房间里（狗出入房间不受限制），看到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穿上大衣，拿起拎包，它不仅立刻懂得要到镇上去散步，而且会霍地跳起来，跑到花园里去找茹克，并旋即同它一起回来。托比克在那里用狗的语言告诉它即将出去散步，于是茹克就兴冲冲地跑来，准备出发。

茹克的时间观念很强。它把卡德明夫妇送到电影场以后，不是躺在俱乐部门口，而是自行离去，但电影散场时一定再来接他们。有一次一部影片总共只有五本①，结果它来迟了。起初它是多么懊丧，后来又跳呀蹦呀闹得多欢哪！

狗从来不跟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去上班，它们懂得这不太象样。要是傍晚时分卡德明大夫踏着轻健的步伐出门，狗会根据某种心灵的电波感应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他是去探望一个产妇（那时它们便留在家里），还是去游泳（那时它们便跟去）。游泳要走不少路，到五公里外的秋河去

① 影片胶卷每本放映时间为九分钟左右。——中译者注

游。本地人或流放者，青年人或中年人，都不是每天到那里去的，因为太远了。只有男孩子经常去，还有就是卡德明大夫和他的狗。说实在的，唯有这种出游狗才不十分欣然从命，因为草原上的这条路地硬多刺，茹克的爪子划破了好几处，疼得厉害；而托比克有一次喝了几口水，很怕再掉下河里去。然而，责任感高于一切，所以它们还是坚持随大夫全程往返。不过，在离河三百米的安全地带托比克就开始落后，生怕把它拖下水，先是晃耳朵、接着摇尾巴表示歉意，后来就躺下。茹克则一直走到陡岸边，在这里蹲下它硕大的身躯，象一座雕像从岸上俯视主人游泳。

奥列格经常上卡德明家串门儿，托比克认为对他也有随从的义务。（奥列格到他们家去得那样勤，终于引起管理当局的不安。一名官员曾对他们分别加以盘诘："你们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密切？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你们谈些什么？"）茹克不一定随从奥列格，但托比克一定要送，甚至风雨无阻。有时外面在下雨，街上泥泞肮脏，爪子觉得又冷又湿，托比克实在不想出去；它伸伸前腿，又挺挺后腿——但还是去了！托比克也是卡德明与奥列格之间的信差。如果需要通知奥列格，今天有好电影，或者电台要播送好的音乐节目，食品店或百货店里有什么东西卖——只消给托比克套上一只布制的颈圈，里边附一张字条，把方向指给它看，明确地说："去找奥列格！"它不管什么天气都会乖乖地用细长的腿小跑步去找奥列格；如果人不在家里，它就在门口等候。最稀奇的是：谁也没有教过它，没有对它进行专门的训

练，它从第一次接受使命开始，就通过感应电波全懂了，以后照此办理。（当然，为了坚定它的耿耿忠心，奥列格每次也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作为传书递简的酬报。）

托比克还有一点令人纳罕的，那就是它的眼睛经常现出一种忧郁的表情。它笑的时候也不是龇牙咧嘴，只是用耳朵来表示。

茹克的身量和体型象德国牧羊犬，但它身上没有牧羊犬的警觉和凶悍，而是洋溢着高等动物的和善。它的年纪不小了，前后换过许多主人，而卡德明家是它自己挑的。在这以前，它属于茶馆掌柜（或经理）瓦萨泽所有。瓦萨泽用链条拴住它，令其看守放空器皿的箱子，偶尔放它去咬邻家的狗取乐。茹克打架勇猛，那些好摆架子的黄狗见了它就胆战心惊。其实茹克禀性善良，爱好和平，只是它不能不相信自己的主子。有一次它被解去链条到卡德明家附近参加狗的婚礼：好些公狗正在追求娇小的洋娃娃——托比克的母亲。茹克因为身量太大遭到拒绝（所以未能成为托比克的继父），但它对卡德明家的院子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开始经常跑到这里来，虽然这里并没有吃的招待它。瓦萨泽离开此地时，把茹克送给同遭流放的女友爱米丽亚。爱米丽亚给茹克吃得很好，可是它一再挣脱束缚，跑到卡德明家去。爱米丽亚很生卡德明夫妇的气，每次把茹克领回去，重新用链条把它拴起来；可是茹克照样挣脱出去。于是爱米丽亚用链条把它同一只汽车轮胎拴在一起。忽然，茹克看到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街上走，她甚至故意把头扭

向一边。茹克拚命向她冲去，竟象一匹拉车的马喘吁吁地用自己的颈项拖着轮胎走了有一百米左右，最后摔倒在地。此后，爱米丽亚便放弃了茹克。新主人的抽象博爱精神很快就感染了茹克，成为它主要的行为准则。从此，街上的狗完全不再怕它。茹克对待所有的路人态度都很和气，但不是谄媚讨好。

可是，乌什-铁列克也有喜欢开枪打动物的人。他们如果猎不到更可口的野味，就喝得醉醺醺地在街上找狗捕杀。茹克已经两次遭到枪击。现在它怕任何瞄准它的管口，包括照相机的镜头也怕，所以不让照相。

卡德明家还养猫——那是一些被娇惯、任性、爱好艺术的动物。但奥列格此刻漫步走在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想象中看到的却是茹克忠厚善良的大脑袋，不是在街上走的茹克，而是突然出现在他窗外的茹克——它用后腿支起身子，象人一样朝窗内张望。这意味着：托比克在它旁边纵上跳下，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随即就到。

深深为之心动的奥列格感到，他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满意，对于流放生活完全认了命，只求老天赐他健康，决不祈求更多的奇迹。

但愿能象卡德明夫妇那样过日子，那样高高兴兴地随遇而安！略有所得便知足的人才是智者。

什么叫乐观者？乐观者会这样说：别处都比较差，我们这里还好，我们的运气不坏。乐观者认为有一点东西就不错了，所以没有苦恼。

什么叫悲观者？悲观者会这样说：别处都呱呱叫，别处都比较好，只有我们这里最倒霉。悲观者老是自叹命薄。

现在但求好歹熬到疗程结束！然后趁还没有变成一个废物，从这个爱克斯光疗法、激素疗法的虎口中逃出去。

回到乌什-铁列克去。再也不打光棍儿！结婚，娶老婆！卓娅未必会去。即使愿去，也要在一年半以后。又得等待，又得等待，一辈子都是等待！不！不能再等。

他可以娶克桑娜——她是那么硬邦邦而又软绵绵：举止是硬邦邦的，体型是软绵绵的。只是脑袋太圆了。然而持家却是好手！你瞧她擦起盆子来，毛巾往肩上一搭——简直象个女王！能叫你看得出神。娶了她可以扎扎实实过日子：盖一所漂亮的房子，生一大群孩子。

也可以娶英娜·施特律姆。想起来有点可怕，因为她才十八岁。但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她微笑的时候心不在焉中透出倔强的神态，若有所思中包含挑战的意味。但吸引他的正是这一点……

不要相信任何前驱征兆，不要相信什么贝多芬的叩门声！这一切都是镜花水月。硬着头皮把心一横，不存任何幻想！决不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决不期望得到什么改善！

有什么就满足于什么！

永久就永久吧！……以后没有你，日子照样过。

哦，春意啊，不要撩拨我吧！

第二十一章

阴影在消散

奥列格有幸恰恰在医院门口遇见她，为她开门，自己闪到一旁。否则的话，她走路的冲劲这么大，身子又微微前倾，恐怕会把他撞倒。

他一眼就看清了：巧克力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浅蓝色的贝雷帽①；头略略侧着，好象在顶风行路；大衣的款式非常别致，仿佛是一件长得不可思议的上衣，钮子一直扣到喉咙口。

倘若他知道这是卢萨诺夫的女儿，一定折回来。现在他仍到冷僻的小径上去散他的步。

阿薇叶塔费了点儿唇舌获准上楼，因为她父亲病体太虚弱，不能下楼，这一天又是星期四——可以探望病人。她把大衣脱了，可是披在红酒色的运动衫外面的一件白罩衫是那么小，除非她小时候的手才能伸进罩衫的袖子。

昨天打了第三针后，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确实软瘫了，非万不得已脚已经不伸出被窝。他甚至很少翻身，进食相当勉强，眼镜也不戴，别人谈话他也不插嘴。过去，周围

① 一种扁圆无沿的软帽。——中译者注

的生活总会引起他强烈的反应，不是热烈赞同就是坚决反对；现在，周围的生活对他说来已黯然失色，可有可无。他一贯拥有的毅力动摇了，开始向自己的虚弱屈服，甚至发现这种状态相当惬意。但这是一种不妙的惬意，就跟行将冻僵的人没有力气动弹差不多。他先是讨厌、继而害怕的肿瘤，现已掌握主动权；如今不是他说了算，而是肿瘤说了算。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阿薇叶塔要从莫斯科飞来，今天上午一直在等她。他象往常一样怀着喜悦的心情等着她，不过今天也有点儿担心：他和妻子商定，由卡芭把米奈舅舅的来信、有关罗季切夫和古宗的事原原本本告诉阿薇叶塔。过去她没有必要了解这些事情，但现在他们需要她开动脑筋出出主意。阿薇叶塔极其聪明，她考虑问题从来不比父母稍差，只比他们高明。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多少总有点儿担心：她知道这件事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她能不能把自己置身于彼时彼地，理解父母的处境？会不会冒冒失失斥责父母咎由自取？

阿薇叶塔进病房也象是顶风行路那样向前直冲，虽然她一手提着沉甸甸的拎包，另一只手拉住披在肩上的白罩衫。她那年轻的脸上气色很好，容光焕发，没有探望者走到重病号床前时那种表同情的一脸愁苦相；要是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看到女儿现出这种表情，只会感到难过。

“嗨，爸爸！你好吗，爸爸？”她兴冲冲地招呼着，在他床上坐下，真诚地、并不勉强地吻了他已经有些胡子拉碴的左

右两颊。“今天你觉得怎么样？你如实告诉我！说呀！”

她那如花儿盛开的容颜和令人兴奋的严格态度给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一点力量，他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

“怎么对你说呢？”他慢慢腾腾、有气无力地说，似乎自己在向自己解释。“那玩意儿恐怕没有缩小，没有。但有这样的感觉，好象头部扭动稍微自由了些。比过去好那么一丁点儿。压迫的感觉略略有所减轻，反正我也说不上来。”

女儿不问父亲，就给他把领子敞开，但又丝毫不让他感到疼痛。她从正中观察肿瘤，那神态仿佛她是医生，有可能逐日比较病情的进展。

“我看没什么大不了！”她下了断语。“甲状腺肿大，如此而已。妈妈在给我的信上写得怪吓人的，我还以为——你——我的天！你说扭动稍微自由了些，是吗？这么说，打针是有好处的，看来，这一点可以肯定。以后还会继续缩小。要是能缩小一半，它对你就没有多大妨碍，那时你出院也不要紧。”

“你说得对，”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叹一口气道。“只要能缩小一半，也就能凑合了。”

“可以在家里继续治疗！”

“你是说，我可以在家里打针？”

“为什么不可以？等你对于打这种针习惯了，能适应下来，那时你可以回家去继续治疗。这事我们再合计合计，再考虑考虑！”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情绪渐见回升。且不管是否同

意在家里打针，单是女儿准备通过强攻达到目的的决心已使他感到自豪。阿薇叶塔上体向他倾斜，他不戴眼镜也能看清女儿诚实开朗的面庞是那样坚毅、充满活力，鼻翅儿和眉毛遇到任何不平就会颤动起来。有人——好象是高尔基——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孩子不比你强，你算是白白生了他们，你也算是白活了。可是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并没有白活。

不过他毕竟有些心神不定：她是否知道了那件事？她马上会说些什么？

但她并不急于转到那件事上，她还问了一些关于治疗的情况，问这里的医生怎么样，并打开他的床头小柜检查了一下，看看他吃了些什么，哪些食物已经变质，给他换上新鲜的。

"我给你带来了一种补身体的酒，你可以喝一小杯。红鱼子酱也拿来了，你不是喜欢吃的吗？还有桔子，从莫斯科带来的。"

"很好。"

与此同时，她把整个病房以及病房里有些何许样人环顾了一遭，通过眉额灵活的一掀向他表示：这地方太寒碜了，但必须怀着幽默感看待这一切。

虽然好象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对话，她还是向父亲更凑近些，他们这样交谈只有对方听得见。

"是啊，爸爸，这太可怕了，"阿薇叶塔开门见山地说。"这在莫斯科已经不是新闻，人人都在谈这件事。对过去的

案子已开始普遍复查。”

“普遍复查?!”

“一点也不假。现在这简直跟流行病一样。这股风刮得可厉害哩!好象历史的车轮可以倒转似的!谁有这样的能耐?谁有这样的胆量?好吧,就算当初对他们判刑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但现在让他们从老远的地方回来又何必呢?如今再让他们在原来的生活中重新扎根——这岂不是一个痛苦的、难堪的过程?这首先对他们本人也是残酷的!有些人已经死了——又何苦去惊动他们的阴魂?何苦还要刺激亲属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报复情绪?……再说,‘恢复名誉’这个词儿本身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错!问题是一定有的,不过没那么严重罢了。”

啊,多聪明的孩子!她说得多么理直气壮!尽管还没有谈到自己家里的事,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已经看出,他随时都能从女儿那里获得支持,阿拉决不会嫌弃他。

“你已经知道有人回来了吗?甚至回到莫斯科?”

“对,甚至回到莫斯科——正是这样。现在他们都拚命往莫斯科爬,就象蚂蚁嗅到蜜糖似的。还发生了一些悲剧性的事故!你能不能想象:有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安稳,忽然被叫到那边去。原来叫他去对质——你能不能想象?”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脸上的表情象吃了什么酸得要命的东西。阿拉注意到了,但她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地表达出来,所以不能刹车。

"……他们要他把二十年前讲过些什么再重复一遍，你能不能设想？试问，谁还记得那么清楚？这对谁有好处？既然你们忽发奇想，那就恢复名誉得了，用不着搞什么对质！何必这样触人家的神经?！那个人回到家里，差一点点上吊自杀！"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躺在床上，直冒冷汗。他们可能要他去跟罗季切夫、叶尔锵斯基或别的什么人当面对质——这一层他可还没有想到！

"谁逼着这些傻瓜蛋在胡说八道的供词上签了字？他们不应该签字嘛！"阿拉灵活的思想看问题面面俱到。"总而言之，怎么可以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旧账统统翻出来？也该为当时做工作的人想想！正是应当为他们着想！叫他们怎么禁得起这样的剧变?！"

"妈妈告诉你了？……"

"是的，爸爸！她告诉我了。你千万不要为这件事烦心！"她用坚定有力的双手夹住父亲的肩膀。"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看到什么苗头就发信号的人是先进的、有觉悟的人！他凭着对社会的良好意愿行事，人民对此是器重的、理解的。在个别情况下，这样的人也可能出纰漏。但要不犯错误，除非什么也不做。通常，人总是遵循自己的阶级本能处理问题，这样做肯定错不了。"

"谢谢你，阿拉！谢谢你！"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觉得眼泪在往上涌，但这是愉快、舒畅的眼泪。①他用汗涔涔的手抚摩着女儿凉丝丝的手。"年轻人对我们表示谅解，

这非常重要。告诉我，你认为怎么样：法律上有没有这样一条，可用来对我们……比方说，对我……追究……追究责任……因为证词不确实？”

“你想象一下，”阿拉立刻作出反应，“我在莫斯科偶然听到一席谈话，人家也提出了类似的忧虑。一位法学家作了解释，说法律针对所谓伪证罪的条文规定判刑不超过两年，可是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宣布过两次大赦，可见完全不存在追究伪证责任的问题！所以，罗季切夫压根儿吱不出声来，你放心！”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觉得，肿瘤对他的压迫又放松了一些。

“啊，你真是我的聪明孩子！”他幸福地舒了一口气说。“你总是什么都知道！你总是到处下及时雨。你重新给了我不知多少力量！”

他双手抓住女儿的一只手，恭恭敬敬地吻之再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无私的人。他总是把孩子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他知道自己除了一片忠心、一丝不苟、一贯到底这几条，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华。但他的精神却在女儿身上真正得到发扬光大，他简直沐浴在她的光辉之中。

披在她肩上的那件象征性的白罩衫老是滑下去，阿拉

① 英译本此处有卢萨诺夫说的几句话：“你说得好：人民对此是器重的、理解的。我们养成了一种要不得的习惯——总是把人民看得水平很低。”——中译者注

不耐烦经常去抓住它，索性哈哈地笑着把它扔在床架上盖住父亲的体温曲线图。反正这时候医生、护士都不会进来。

阿拉只穿着那件红酒色的新运动衫——父亲还没有见她穿过。一道Z字形的白色阔条子从袖口到袖口穿过运动衫的两只衣袖和前胸。这道迅捷的闪电与阿拉果断的动作非常相配。

如果钱花在让阿拉穿戴齐整上面，做父亲的从来不埋怨。他们从私人手中买这买那，其中包括进口货，——所以阿拉的服装具有大胆、豪放的特点，充分显示她壮健、明朗的美，这与她坚定、明晰的思想十分调和，相得益彰。

"阿拉，"父亲轻声问道，"你可记得，我要你打听一件事儿？那个在某人的讲话或文章中不时可以碰到的怪名词儿——个人迷信——难道指的是？……"

要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往下再说出一个字，他甚至会感到气闭。

"恐怕是的，爸爸……。恐怕是的……。比方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曾几次提到这事儿。问题在于谁也不明确地讲，只是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阿拉，这可是亵渎神圣的行为！……难道他们竟敢这样做，啊？"

"可耻！丢脸！不知是谁撒的种，如今藤到处爬开了……①爸爸，看问题必须灵活一些，必须跟上时代的要求。我也许会使你不快，爸爸，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应当跟每一个新时期协音同调！我刚刚在那边作了一些观

察。我在作家圈子里转了不少时候，你以为这两年来作家们改弦易辙是容易的吗？可不简单哪！不过，那些作家毕竟有经验、识时务，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

阿薇叶塔在他面前坐了一刻钟，用明快的语言把往昔的妖魔鬼怪打得落花流水，扫清了广阔灿烂的前景。在这十五分钟内，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病显著地好转了，精神也振作了，他现在一点不想谈那个讨厌的肿瘤，好象已没有必要设法转到别的医院去，只想听女儿讲快乐的事情，吸几口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流。

"你说说，你说说，"他要女儿继续讲。"莫斯科那边怎么样？你跑了这一趟，有些什么感想？"

"啊！"阿拉象马甩掉牛虻似地摇摇头说。"莫斯科的印象怎么讲得完？莫斯科这地方非亲自去住不可！莫斯科是另一个世界！到莫斯科去一趟——就好比向前看五十年！首先，莫斯科人都坐着看电视……"

"我们这里不久也会有的。"

"不久也会有！……即使有了也不是莫斯科的节目，那算什么电视！我可以跟你说得更广泛些，我有这样的感觉（我在这方面的灵敏度一向很高），不久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将起很大的变化，日常生活的全面革命正在迫近。且不说电冰箱和洗衣机，变化比这要剧烈得多。在莫斯科，往往

---

① 英译本此处有如下几句："可是，他们一面尽管谈'个人迷信'，一面却又称'伟大的继承者'。可见，无论朝哪一个方向都不应当走得太远。"——中译者注

可以看到全部是玻璃的穿堂。旅馆里放的是矮矮的小桌子，很矮很矮——跟美国人的一样。开始时甚至会感到无所适从。象我们家里那种绸布灯罩现在是寒碜、俗气的东西，现在一定得用玻璃的。更时兴的是落地灯，可以搬来搬去。两头竖板的床现在最见不得人，一般都只有矮而宽的沙发或软榻……。房间的面貌正在大大变样。生活的整个格调都在变化……。这是你不能想象的。不过我跟妈妈已经谈过了，我们得下决心把很多东西换掉。可是这里是买不到的，得想办法从莫斯科运来……。当然，也有一些有害的新花样，应当受到批判，例如那种淫荡的摇摆舞，简直无法形容！还有蓬蓬松松的发型，故意搞得披头散发，好象刚从床上起来似的。"

"这都是西方想要腐蚀我们。"

"当然，如今是世风日下。这在文化领域中也一下子反映出来了，比如诗歌就是这样。近来出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叶夫图申科。他写的诗实在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可他就是会大叫大嚷，双手乱挥，个儿又瘦又长。姑娘们都崇拜他……"

随着谈话的内容从秘密转向一般，阿拉的声音逐渐提高，不受拘束，病房里人人都能听见。但其中只有焦姆卡一个人放下自己的事情，暂时忘却愈来愈不可避免地要把他拖上手术台的疼痛，竖起耳朵在听阿薇叶塔说话。其余的人或者不注意，或者不在病房里，只有瓦吉姆·扎齐尔柯偶尔从书本上举目看看阿薇叶塔的背影。她的背脊弯成一座

牢固的桥，紧紧绷着一件尚未充分张开弹性的运动衫，呈现出葡萄酒一般均匀的一片深红色，唯独一只肩膀上撒着一团折射的日影——这不是太阳直接留下的痕迹，而是某一扇开着的窗的反光，——泛出一种滋润的绛色。

“你多谈谈自己的事！”父亲说。

“好吧。这一趟我去得很成功，爸爸。他们答应要把我的一本诗集列入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当然，是明年的计划。但这是最快的了。再要快已不能想象！”

“真的吗？你说什么，阿拉？一年以后难道我们就能拿到你的诗集？……”

“即使一年来不及，顶多过两年……”

今天女儿给他带来的喜悦简直象雪崩压顶。他知道阿薇叶塔把她写的诗带到莫斯科去了，但原来以为从一页页的打字纸到封面上印着阿拉·卢萨诺娃的书这段路不知多么遥远，几乎走不到头。

“怎么给你搞成功的？”

阿拉也露出得意的微笑。她的微笑能使周围的人受宠若惊。

“当然，要是把诗直接送到出版社去投稿，谁会理你？这里的竞争可激烈呢！但是安娜·叶甫根尼耶夫娜把我介绍给M，又介绍给C，我给他们朗诵了两三首诗，他们都表示喜欢。接下来由他们给某人挂个电话，给某人写张便条，事情就妥啦。一切都很简单。”

“好极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脸上喜气洋洋。他

在床畔小柜上摸到了眼镜戴起来，好象准备当场立即看到那本珍贵的书。

焦姆卡有生以来头一遭看见一位活生生的诗人，而且还是女诗人。他甚至张开嘴巴忘了合拢。

“我对他们的生活看了一个饱。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纯朴！一些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互相直呼其名。他们本人毫无架子，爽直可爱。我们把作家想象成坐在云端里，前额苍白，高不可攀！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并不排斥生活的各种乐趣，照样喜欢吃喝玩乐，而且总是跟朋友一起享受。他们互相逗趣儿，有说有笑。我认为他们过的确实是快乐的生活。可是到了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便躲在别墅里把自己关上两三个月，作品就出来了！这恰恰是我所喜爱的生活——独立！自由！体面！我要尽一切努力加入作家协会！”

“怎么，你不打算按自己所学的专业工作啦？”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紧张。

“爸爸！”阿薇叶塔压低嗓门道。“不知你是否同意，反正当记者是一份奴仆的差使。人家给你任务：干这个，干那个；去访问一些名流；自己毫无用武之地。这怎么能跟作家相比！……你可知道，有一位作家，自己刚刚成名，马上把他的妻子、甥女也教会写作。现在三个人都在写书！”

“了不起！”

“因为这样上算！”

“阿拉，我总有点儿担心：万一你搞不出名堂，那怎

么办？”

“怎么会搞不出名堂呢？你太天真了。高尔基说过：‘任何人都能成为作家！’只要下功夫，没有达不到的目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我就做一个儿童作家，反正这是人人都做得到的。”

“总的讲来非常好，”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沉吟道。“总的讲来很出色。当然，应该由象你这样道德上健全的人去搞文学。”

“我的姓氏也很好，清脆响亮！我不打算用笔名。再说，我的外表也具有地道的文学家风度！”

“阿珞琦卡，万一搞不成呢？要知道，干这一行要把每一个人都描写得生动逼真……”

“我有一个主意！我不打算在每一个人物上多花力气，这根本不必要！我在设想这样一项大胆的创举：用泼墨的笔法一下子描写整个整个的集体。其实，全部生活归根结蒂在于集体，而不在于个别的人！”

“也许如此，”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得不承认。但还有一种危险，女儿在亢奋中可能对之估计不足。“可是你得考虑一下，要是批评界骂起你来，怎么办？要知道，在我国这等于代表社会进行谴责，这是很危险的！”

但是阿薇叶塔把巧克力色的头发朝后一甩，象剽悍的女武士那样无所畏惧地展望未来：

“老实说，他们决不会十分认真地骂我，因为我在思想性上不犯大错误！至于在艺术性方面——天哪，谁能不挨

骂？就拿巴巴耶夫斯基①来说吧：一会儿人人夸；一会儿人人骂，谁都跟他划清界限，连最忠实的朋友都不理他。但这是暂时的现象，他们迟早会改变看法，回到他那儿去的。这是生活中比比皆是的曲折奥妙之一。比如，过去说：'冲突不许存在！'现在又说什么'虚假的无冲突论'。但如果意见发生分歧，如果一部分人唱老调，另一部分人出新腔，那就显而易见情况起了变化。如果大家一下子都唱新腔，也就看不出转折了。刚才我说过：最主要的是识时务，跟上时代！这样肯定挨不到批……。对了！爸爸，你说要书看，我给你拿来了几本。现在你正是看书的好机会，要不你哪有时间？"

她从拎包里取出几本书来。

"喏，这儿有《波罗的海之春》、《打死他！》——不过这是诗歌，你要看吗？"

"好吧，《打死他！》留下得了。"

"《我们这里已是早晨》、《光明普照大地》、《和平缔造者》、《山花烂漫》……"

"等一下。《山花烂漫》我好象看过了……"

"你看的是《大地花开》，这本是《山花烂漫》。还有《我们永远年轻》，这本非看不可，你先看这一本。这些书的书

---

① 谢苗·巴巴耶夫斯基（1909—）——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光明普照大地》曾获得斯大林奖金。苏共二十大前后，这些作品被斥为宣扬个人迷信的典型。后来他还发表了《人世间》、《现代人》、《哥萨克镇》等好几部长篇小说。——中译者注

名就振奋人心，我故意为你挑了这几本。”

“好吧，好吧，你搁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满意地说。

同扎齐尔柯一样多的一堆书也出现在他的床畔小柜上。①

阿薇叶塔准备走了。

焦姆卡在自己的角落里愁眉苦脸地憋了很久，不知是腿上疼痛不止呢，还是不好意思跟这样一位令人眼花缭乱的青年女诗人搭讪，这时终于鼓足勇气问道（由于事先没有清一清嗓子，一句话说到半道上又咳嗽了一阵）：

“请问……您对文学必须真诚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②

“什么，什么？”阿薇叶塔立即向他转过头来，但表情是恩赐式的半张笑脸，因为焦姆卡沙哑的嗓音已经清楚地表

---

① 以上两段在英译本中是这样的：

“好吧，”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你把它们搁在那儿。不过，你拿来的书中是不是有带点儿感伤味的？”

“感伤？没有，爸爸。我考虑到……你所处的精神状态……”

“象这一类书我已经够熟悉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举起两个指头朝着那堆书一挥。“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些能打动心灵的东西来？”

“行，”阿薇叶塔若有所思地说。“等妈妈来的时候，我让她把大仲马的《玛尔戈皇后》（中译者按：这是以十六世纪法国宫廷阴谋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带来。”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中译者注

② 接下来的一席对话指的是弗拉基米尔·波梅朗采夫发表在1953年12月号《新世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发表时曾遭到共产党报刊攻击的文章，却是即将出现“解冻”的第一个迹象。——英译者注

明了他的丽舰。“这种真诚难道也钻到这里来啦？为了这种真诚，整个编委会已经被赶下了台，可是它又在这里冒了出来。”

阿薇叶塔打量着焦姆卡的脸——看来这少年没有受过教育，智力也不发达，——叹了一口气。她叹息是因为没有时间开导他，但是听任这孩子受到不良影响也不应该。

“听我说，小朋友！”她象是从讲台上用响亮、有力的音调宣称。“写这篇文章的人把一切都搞颠倒了，或者他没有考虑周到。真诚决不能作为衡量一本书的主要标准。如果一个作者思想不正确，立场不对头，他的真诚只能加强作品的坏影响，他的真诚就是*有害的*！主观的真诚可能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背道而驰——这个辩证法您懂吗？”

焦姆卡很难领会这番道理，他皱紧眉头。

“不大懂，”他说。

“好吧，我来向您解释。”阿薇叶塔张开两条胳臂，白色的Z字形条子象一道闪电从一支胳臂经过胸部通到另一支胳臂。“取一件令人泄气的事实照原样描写一通，是再省力不过的。但应当往深处翻耕，让暂时还看不见的未来的萌芽露头。”

“不过，萌芽……”

“什么？？”

“萌芽应当自己成长，”焦姆卡急忙插话，“如果用翻耕的办法让萌芽露头，它们就长不起来。”

“好，我们现在不是谈农业，小朋友。把真相告诉人

民——这完全不等于光讲坏的，光指摘缺点。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好的，使它变得更好！要求写所谓'严峻的真实'这种怪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真实忽然必须是严峻的？为什么真实不能是光彩夺目、引人入胜和乐观主义的呢？我们的文学都应该喜气洋洋！仔细想来，要是把人们的生活写得阴森暗淡，岂不是对人们的侮辱？人们喜欢看到的是经过打扮的生活。"

"一般地说，可以同意这种讲法，"后面传来一个清晰悦耳、但嗓门不大的男人声音。"确实如此，何苦令人灰心丧气呢？"

阿薇叶塔当然不需要任何同盟军，但她凭着一贯的好运气知道，如果有人发表意见的话，一定是支持她的。她面向窗子转过身去，白色的Z字迎着日影刷的一闪。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年纪与她相仿）手拿一支多边形黑杆的活动铅笔轻轻敲着自己的牙齿。

"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他好象在自言自语，也许是说给焦姆卡听的，但又象说给阿拉听。"文学是在我们情绪不好时给我们解闷的。"

"文学是生活的导师，"焦姆卡嘀咕道，但随即自己为这句话说得很不得体而涨红了脸。

瓦吉姆把头朝后一仰，说：

"好一个导师，算了吧！没有文学我们也弄得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作家难道就比我们干具体工作的人高明？"

他跟阿拉互相打量了一下。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尽管

他们年纪接近，对方的外貌也不可能不引起自己的好感，但各人自己的生活道路都已经走定了，不可能从任何偶然的一瞥之中去寻找一场奇遇的开端。

"总之文学的作用被夸大得很厉害，"瓦吉姆提出他的见解。"往往把书捧到不应有的高度。就拿《巨人传》①来说：没读以前以为怎么了不起；可是读过以后，发现通篇都是下流话，完全是浪费时间。"

"现代作家的书里也有色情成分。这不是多余的，"阿薇叶塔严肃地表示不同意。"同最先进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它能起调味作用。例如在……"

"这是多余的，"瓦吉姆深信不疑地把她顶回去。"把话印在书上不是为了刺激情欲。兴奋剂可以到药房去买。"

说到这里，他低下头去读自己的书，再也不看穿红酒色运动衫的女武士，不等她来说服自己改变观点。

阿薇叶塔最恼恨人们的思想不是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类——正确的和错误的，而是按区别极不明显的各种色调排列得十分松散——这只能造成思想混乱。比如现在就摸不准，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她的？她应该同他辩论呢，还是就这样算了？

她决定就这样算了，然后继续面向焦姆卡，言归正传：

"你要明白，小朋友，描写现有的东西比描写现在还没

---

①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布雷（?—1553）所著长篇小说。原书名为《嘎干丢阿与潘塔格吕埃》（一译《高康大与胖大官儿》）。——中译者注

有、但你知道将来会有的东西容易得多。今天我们肉眼看到的事物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是应该有的事物，是明天会有的事物。我们美好的‘明天’才是应当加以描写的！……”

“那末明天描写什么呢？”糊涂的少年蹙额问道。

“明天？……明天就写后天。总是朝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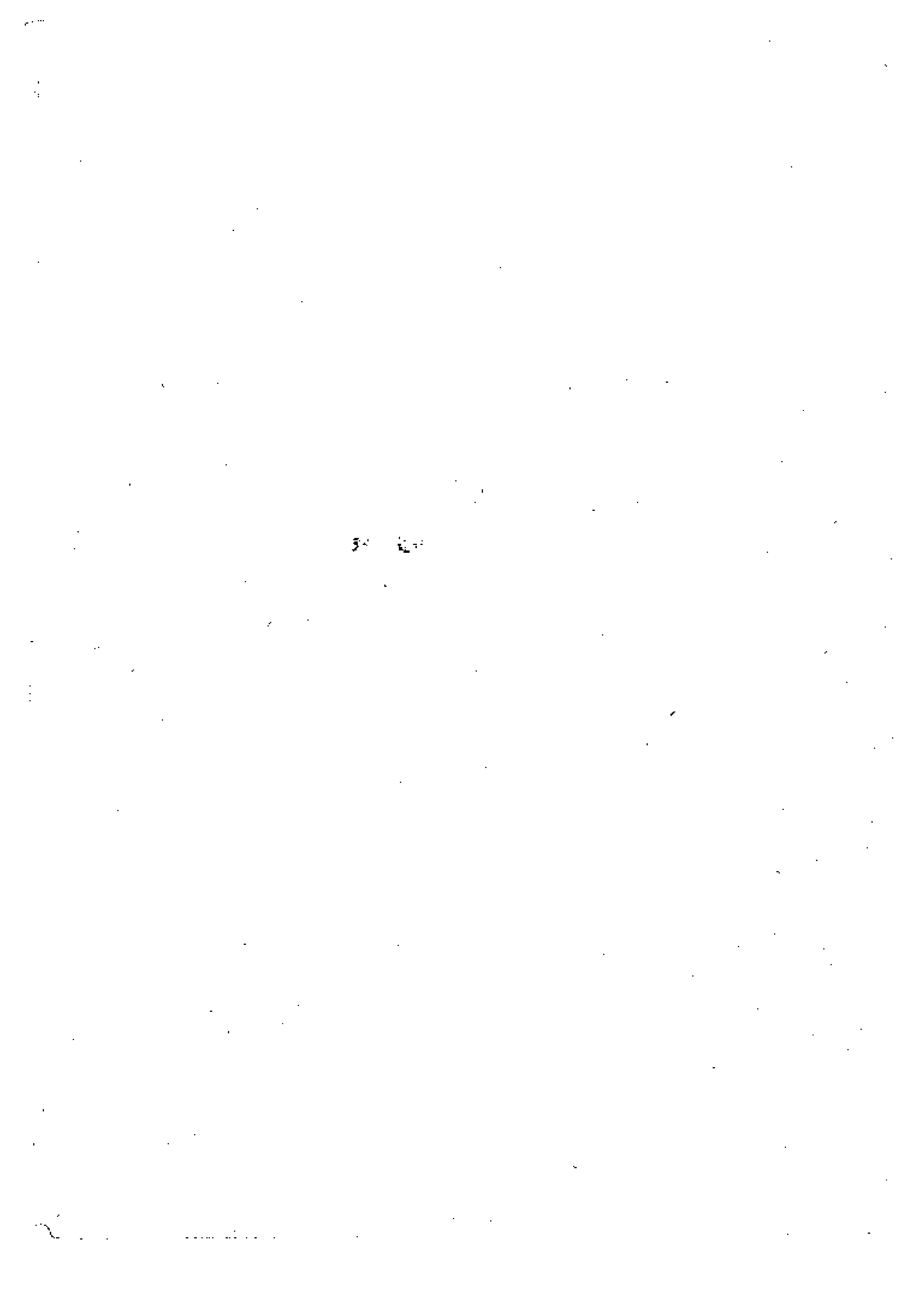
这小伙子头脑相当迟钝，不值得在他身上多费唇舌。阿薇叶塔只是为了在群众中捍卫真理，才把话讲完：

“这篇文章是有害的。它笼而统之、蛮不讲理地指责作家们不真诚。只有庸人才对作家这样不尊重。问题在于必须器重作家，因为他们是辛勤的劳动者！要指责不真诚，可以指责西方的作家，因为他们出卖自己，否则读者就不买他们的书。那里只要有钱什么都买得到。”

阿薇叶塔已经从床沿上起身站在通道里——她结实、挺拔、健康，是卢萨诺夫家的良种。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欣然听完了她给焦姆卡上的这一课。

阿拉已经吻过父亲，最后还举起一只手，张开五个指头，给他打气：

“爸爸，为健康而奋斗吧！努力奋斗，继续治疗，甩掉肿瘤——什么也不用担心，”她意味深长地加重语气。“一切的一切都会变得非常好！”



第 二 部



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

亲爱的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请你们猜猜，下面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那是什么地方？窗上装有栅栏（不过仅仅装在楼下的窗上，是防盗贼的，栅栏还有图案——象从一角射出来的光线，也没有窗板）。房间里排着一张张配备被褥、枕头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破了胆的人。清晨是面包卷、糖、茶（不同的是另外还有早餐）。上午大家都保持阴郁的沉默，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可是晚上往往闹哄哄地展开热烈的讨论。争论的题目无非是：要不要打开气窗；谁可能好转，谁将要恶化；撒马尔罕的大清真寺有几块砖头。白天，人们被单独地“吊出去”跟公职人员谈话，接受“处理”，跟家属会见。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东西可以交给这里的人送进来，收到东西的高兴得如获至宝。某些人可以得到额外的营养品，不过不是犒赏打小报告的（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也得到补充营养）。有时也搞查铺，把私人的东西拿走，因此不得不瞒三藏四，为维护散步的权利而斗争。洗澡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同时也是一场磨难：炉子热不热？水够不够？发

什么内衣？最有趣的是新来的人刚被带进房间，他照例开始提出各种希奇古怪的问题，对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还一无所知……

怎么样，猜到了没有？……你们一定会说我在吹牛：如果是中转监狱——哪来的被褥、枕头？如果是还押监狱——为什么没有夜间提审？估计这封信将受到乌什-铁列克邮局的检查，因此，恕我不能作别的类比。

这样的生活我在癌症楼里已经过了五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好象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而且没完没了。最使人苦闷的是我没有期限，要等特释（可是监督处开的许可证只有三星期，严格说来我已经过了期，可以对我安上逃亡的罪名）。他们只字不提什么时候让我出院，连一点口风也不透。显然，根据医疗指示，他们必须从病人身上榨取可以榨取的一切，直到血完全“不中用”时才放他走。

我把结果向你们报告：我在经过两个星期治疗后一度产生的高高兴兴地重返生活的感觉，也就是你们在上次来信中称为“欣快症”的那种状态——已完全消失，连一点影踪也不留。我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坚持要求出院。对我的治疗中一切有益的部分已告结束，现在开始的全都是有害的。

我每天要挨两次爱克斯光轰击，每次二十分钟，三百拉德；虽然我早已忘记了离开乌什-铁列克时的疼痛，但是尝到了恶心的滋味。我的朋友啊！爱克斯光引起的恶心（也可能是打针引起的，反正各种因素凑在一起）——这才是要命的事情！简直要把你的五脏六腑翻过来，而且接连几个

小时！烟当然已经戒掉，是自己不想抽了。这种可恶透顶的状态使我步也散不成，坐也坐不稳，我只找到一种比较好受的姿势（此刻我就是以这种姿势在写信，因而用的是铅笔，字也是歪歪扭扭的）：不垫枕头，仰天平躺，腿稍微抬起一点儿，脑袋甚至略略从床沿下垂。当你被叫去接受照射时，走进充满浓烈的"爱克斯光味儿"的器械室，简直叫人担心会当场呕吐。本来，腌黄瓜和泡菜还能抑止这种恶心的感觉，可是在医院里和整个医疗中心不用说都见不到，而病人是不准出大门的。有人说："叫家属给你捎一点来！"家属！……我们的家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泰加森林里用四条腿奔跑①，这是众所周知的！一名可怜的囚犯有什么办法呢？我就穿上靴子，用军用皮带把女式晨袍束起来，悄悄地走到医疗中心的半已倾圮的围墙跟前。我翻过围墙，越过铁路——五分钟后已到了市场上。无论在市场附近的小巷里，还是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了我国人民神经之健全，他们对什么都习惯了。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绷着脸儿讨价还价——恐怕只有老班房有这种能耐。（看到一只雪白嫩黄的肥鸡，他们会带着很重的鼻音问："大婶儿，你这只痨病小鸡雏要多少钱？）可是我总共只有多少钱？这点钱是来得容易的吗？……我的爷爷常说："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省一个卢布，能救一条命。"我的爷爷真聪明。

---

① 暗指在俄国广泛流传的一句挖苦话。安全警察向企图称他们"同志"的囚犯说："泰加森林里的狼才是你们的同志。"——英译者注

我全靠黄瓜在苟延残喘。治疗初期突然恢复的胃口已经大减。原先我在爱克斯光下体重也能增加，可是现在又在落膘。脑袋沉得厉害，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倒。当然，肿瘤剩下一半也不到，边缘变软了，我自己勉强也摸得着。不过在这同时血受到了破坏，他们在给我吃一种能增加白血球的特殊的药(大概也要破坏什么!)，并且“为了激发白血球增多”(这就是他们的用语，天哪!)①要给我注射……牛奶!真是野蛮透顶!为什么不给我一杯新鲜牛奶呢?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给我打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同放射科主任的关系相当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真是铁面无私。最近一次她摸了我的胸脯，断言说“摸不出对人造雌酚的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我煞有介事地表示愤慨(事实上我当然骗她)。

然而对我的负责医师拿出倔头倔脑的态度来，我觉得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非常温柔和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有一次曾开始对我解释“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典故。以后请再提醒我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也不大在行。如果她要开什么跟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先低头垂眼，于是我不知怎么就会让步。某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几件事情她尽量回避直言说穿，我也不好意思追问到底。顺便提一下，她长

① “激发”在原文中与“挑衅”是同一个词。——中译者注

得挺不错，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她向我介绍自己时说有丈夫——我记得很清楚；可是忽然真相大白，原来她根本没有丈夫。显然，她把自己没有丈夫这件事看作一桩耻辱，因此撒了谎。

她身上的书呆子习气很重，她也毫不动摇地相信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我没法使她对那套方法产生怀疑。反正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一名理智的盟友。我只得留神倾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搞清楚情况，使自己心中有数。

要作出决定还是有困难：我该怎么办？采取什么对策才是正确的？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是那里最可能发现转移——这话究竟有几分可靠？为什么他们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射线单位向我轰击？是否真的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还是以防万一，打上五倍、十倍的保险系数，象架桥一样？还是单纯执行没有知觉、无动于中的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他们就会失业？但我敢摆脱那些指示。我还敢冲破这个框框，只要把真情告诉我！……——可他们就是不讲。

其实我又不要求长命百岁！何必想得太远呢？……长期以来，我不是在看守的监视下，就是在疾病的痛苦中讨生活；现在我只想在没有看守和没有疼痛——两者同时都没有——的情况下过一些日子。这就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宁格勒，也不要里约热内卢，我只要到我们偏僻的小

地方乌什-铁列克去。夏天快到了，今年的夏天我希望能睡在星空下的行军床上，夜里醒来根据天鹅星座和飞马星座的位置移转可以知道是几点钟。只要求今夏能过这样的日子，能看见不是被劳动营的探照灯照亮的星空；以后哪怕永远不再醒过来也可以。对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还想在溽暑减退的时候同您一起（当然还有茹克和托比克），沿着草原上的小路走到秋河较深处水可及膝的地方，在沙底上坐下来，让两腿顺流浮起，这样坐上很久很久，跟对岸的苍鹭较量谁更稳得住。

我们的秋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注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精力一路随便分送给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什么也干不成，注定了只能背着恶名销声以殁；而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留下的全部纪念只是通过见面、谈心、帮助等方式互相捧给对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但就连这最后的一段水面医生也要剥夺。不知凭什么权利（他们从来没想到过问问自己有没有权利），他们未经我同意就代替我决定采用一种可怕的疗法——激素疗法。这等于一块烧红的铁，只要在你身上烫一次，管叫你一辈子变成废物。而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这样稀松平常！

过去我早就考虑过，现在特别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生命的最高价格究竟值多少？到底可以为它付出多少代价，再

多就不可以？按照现在学校里所教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那就是说，要不惜任何代价抓住生命不放……。劳动营帮助我们许多人认识到，出卖、陷害无能为力的好人——这样的代价太高，我们的生命不值那么多。至于奉承、拍马、说谎——营里的意见有分歧。有人说这代价还可以忍受。也许如此。

可是，为了保全生命，付出使生活平添色彩、香味和刺激的那一切——这代价又如何呢？换得的只是包括消化、呼吸、肌肉活动和脑髓活动的生命，变成一具活动标本——这样的代价是不是漫天讨价？是不是一种嘲弄？要不要付？待过七年部队和七年劳动营之后，过了两个七年——童话和圣经里经常提到的期限——之后，再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冤了？

本来我一分钟也不会犹豫，早就跟他们彻底闹翻，扬长而去——但这样我将失去他们出具的证明。而证明乃是我们流放者的命根子！哦呵呵，可少不了它哇！说不定，明天监督官或负责安全的官员会把我流放到再远三百公里的沙漠里去。有了证明我就攀得住了："该病员需要经常观察、治疗"，请原谅，长官！一个老犯人岂能放弃医生证明？这是不可想象的！

那就是说，又得重施故技、弄虚作假、死乞白赖——这种把戏耍了一辈子实在腻了！……（顺便提一下，由于花招耍得太多，感到厌倦，结果干了蠢事。我请您给我寄来的鄂木斯克那位化验员的信，就给我自己招来了所有的麻烦。我

把信交了出去，他们立即拿去夹在病史一起，事后我才明白，放射科主任在这件事上骗了我：现在她正放手对我实行激素疗法，本来她也许还有所怀疑。)

等我回到乌什-铁列克，为了不让肿瘤向任何部位转移，我还要用伊塞克库尔的草根把它钉死。用剧毒治病有一种悲壮感，因为毒药不装扮成无害的药物，它公开宣称："我有毒！小心！否则不得了！"我们知道自己冒着什么样的风险。

你们最近的来信(这封信到得特别快——只隔五天，而以前的都要隔八天)使我心中很不平静：怎么，我们区里来了大地测量考察队？要是能站到经纬仪旁——这该多么令人高兴哇！哪怕只干上一年象样的工作也是好的！可是他们会要我吗？这项工作肯定需要越出限制居留范围，而且这种事情总是高度保密的，毫无例外，可我是个不清不白的人。

你们赞赏的《滑铁卢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①我是看不到的了：乌什-铁列克不会放第二次；而这里要看电影，必须出院后在什么地方过夜。可是到哪儿去过夜呢？何况，我出院的时候是不是只能在地上爬行？还很难说。

你们表示愿意寄一点钱给我。谢谢。起先我想谢绝，因为我一生总是避免(确实避免了)举债。但我想起，我死后还不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一件乌什-铁列克的羊皮袄

① 《滑铁卢桥》是英国片，在我国放映时译名《魂断蓝桥》；《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品之一。——中译者注

毕竟值几文钱！还有当毯子盖的两公尺黑呢料！还有梅尔尼丘柯夫送的一只鸭毛枕头！还有钉成一张床的三只木箱！还有两只平底锅！一只劳动营发的缸子！一把汤匙！还有一只水桶！剩下的盐木①！一把斧头！最后，还有一盏煤油灯！我没立下遗嘱真是太粗心了！

那末，如果你们能寄一百五十卢布（不要多寄！）给我，我表示感谢。你们的嘱托——物色一些灰锰氧、小苏打和桂皮——我一定照办。你们考虑考虑再写信告诉我：还要些什么？要不要搞一只轻便熨斗？我保证带回来，别不好意思开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您的气象报告看来，你们那里还相当冷，雪还没有化。可是这里已是春天，这简直不大象话和不可理解。

提起气象报告，我倒想起了。如果见到英娜·施特律姆，请代我向她深深致意。请告诉她，我在此地经常想到她……

不过，恐怕不提也罢……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在心中低吟，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什么。不知道我有权利要什么。

但我一想起给我们带来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语——“以前不是更坏吗？”精神顿时为之一振。别人姑且不谈，我们总不应该把脑袋耷拉下来！我们好歹还要挣扎一番！

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她两个晚上写了十封信。

① 一种沙生树木，是上等的燃料。——英译者注

我寻思：象你们对人这样将心比心、持之以恒的关切，如今何其罕见也。如今谁还能这样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贡献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件愉快的事，因为我知道你们会朗读这样的信，而且一读再读，还会逐句玩味，逐条作复。

祝你们继续幸福顺遂，我亲爱的朋友！

你们的

奥列格

1955年3月3日

第二十三章

干吗不好好过日子?

三月五日这一天，外面阴沉晦暗，寒雨濛濛，可是病房里忙碌异常，新闻迭出：焦姆卡要搬到楼下外科病房里去，他昨天在手术志愿书上签了字；这里又来了两个新病人。

第一个新病人正好占用门口角落里焦姆卡的床位。这是个高个儿，但伛偻得厉害，背脊不直，容颜苍老。他的两只眼睛如此浮肿，下眼皮如此低垂，以致一般人呈横置的椭圆形的双目在他竟变成两个圆圈；在这两个圆圈中，眼白现出一种病态的红色，而鼻烟色的虹膜环也由于下眼皮拉长而显得特别大。这老人似乎在用这双奇大奇圆的眼睛打量着所有的人，那种专注的神情叫人觉得很不痛快。

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已大不如前：他的腿一刻不停地感到抽筋折骨般的疼痛，他已经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必须勉强熬住不叫喊，才能不惊动别人。他被折腾得实在受不了，那条腿在他心目中已经不是无价之宝，而是成了可诅咒的负担，只想尽快、尽可能利索地摆脱它。一个月以前被他视为生命之终结的截肢手术，现在象是得救之道。我们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会这样改变。

虽然焦姆卡在签字同意之前已同病房里所有的人商量过了，但今天他结扎好包裹，跟大家告别时，还有意识地让大家再安慰他几句，劝他放宽心。瓦吉姆也只得重复已经说过的话：焦姆卡能这样便宜地解决问题算是够幸运的了，他——瓦吉姆——要是能跟他两下交换，还求之不得呢。

可是焦姆卡偏偏不以为然地说：

"那是用锯子锯骨头啊！就象锯木头一个样。据说，不论处在何种麻醉状态都听得见。"

但瓦吉姆不善于、也不喜欢多劝：

"反正你不是第一人。别人禁得起的，你也受得了。"

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各方面一样，他是公正而言行一致的：他不要别人安慰他，也不接受别人的安慰。任何安慰本身即包含有某种软弱的宗教味道。

瓦吉姆还同刚到此地时一样精神抖擞、懂得自爱而又不失礼貌，只是在山区晒黑的皮肤已开始转黄，嘴唇往往因疼痛而微颤，前额因焦躁和困惑而牵动。在这以前，他只是口头上说只能活八个月，一面还骑马，坐飞机去莫斯科，会见切列戈罗策夫——事实上他内心深处还相信能闯过这一关。但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那八个月中的一个月，也许已经不是八个月中的第一个月，而是第三或第四个月了。走路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很难幻想还能骑上马背到野外去。疼痛已扩展到腹股沟。他带来的六本书三本已经看完，但原先认为根据水情找到矿藏是唯一要紧事的信心却有所下降，因而他已不象原先那样全神贯注地看书，打的

问号和惊叹号也不那么多了。要是忙得感到一天的时间不够用，瓦吉姆一直认为这是生命没有虚度的最好标志。但现在不知怎的他开始感到一天的时间够用了，甚至有余，而感到不够的是生命。他能象弦一样绷紧的工作毅力松弛了。他已不是那么经常一大清早醒来，在安静的氛围中看书。有时他也会蒙头盖脑地躺着，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低头服输、一了百了也许比硬着头皮奋斗来得轻松。这里鄙琐的环境、愚蠢的谈话使他感到荒唐而又可怕，他恨不得把训练有素的自持力撕得粉碎，象野兽向着陷阱嚎叫："玩笑开得够啦，别扯住我的腿！"

瓦吉姆的母亲跑了四个高干接待室也没有弄到胶体金。她从俄罗斯带来了恰嘎，跟一名女工友说妥，请她每隔一天熬好几罐煎汁带去，自己再上莫斯科去跑另外一些接待室弄那种金子。她不能眼看在某个地方存放着放射性金，而她儿子的肿瘤转移却要渗透到腹股沟。

焦姆卡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说几句或听几句临别的话。科斯托格洛托夫成对角线斜卧在自己铺位上，腿搁在床栏杆上，脑袋从床垫上向通道里倒垂。这样，焦姆卡看他是颠倒的，他看焦姆卡也是颠倒的。他伸出一只手，轻轻地道了珍重（现在他感到大声说话很费劲，会使肺下震痛）：

"别丧气，焦姆卡。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回来了，我看见的。他干起来又快又利落。"

"真的吗？"焦姆卡脸上豁然开朗。"你亲眼看到的？"

"亲眼看到的。"

“那就好了！……总算被我捱到了！”

的确，那位两臂下垂显得太长的高个儿外科大夫只要在医院的走廊里出现，病人们的精神便为之一振，仿佛恍然大悟这里整整一个月正是少了这位长脚大夫。如果先叫外科医生们在病人面前一个一个走过去，然后让他们挑选，——那末，一定所有的病人都登记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做手术。他在医院里老是显得无精打采，但就连他的这种表情也被解释成今天不是手术日。

虽然焦姆卡说不上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哪点不好，虽然娇小的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是个很好的外科医生，但躺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那双猿猴般多毛的手下时情绪大不一样。不管结果如何，救得了也罢，救不了也罢，反正他自己没有走错一步。焦姆卡不知何故就是有这样的信心。

病人和外科医生的亲近为时极短，但是却比跟亲爹更亲。

“怎么，那位外科大夫很好？”眼睛浮肿的新病人从原先是焦姆卡的床上用低沉的声音问道。他的神态相当狼狈，似乎茫无所措。他怕冷，甚至在屋里也在睡衣外面再穿绒布晨袍，钮子不扣，腰带不束。老头四顾张望，象是在独家村里深夜被敲门声惊醒，从床上下来后不知灾祸从何处降临。

“嗯——嗯——嗯！”焦姆卡的神情愈来愈开朗，愈来愈满意，仿佛这次手术一半已经成功。“呱呱叫！没说的！您

也要动手术吗？您是什么病？”

“也要，”新病人只简单地回答，对于后面那句问话充耳不闻。他的面孔没有感染到焦姆卡的轻松，他那双呆滞的大圆眼睛毫无变化——不知是太专注了呢，还是完全视而不见。

焦姆卡走了，有人给新病人铺好了被褥，他坐到床上，身体靠着墙壁，又默默地瞪出一双大眼睛。他并不转动眼珠，而是盯住了病房里某一个人就一直这样瞧着。过后又把整个头部转过去瞧着另一个人，也可能视线从那人旁边滑过。病房里无论有什么动静，他都毫无反应。他不说话，不问也不答。一小时过去了，别人从他口中探听到的仅仅是：他来自费尔干纳。此外，据护士透露，他姓舒路宾。

他是一只猫头鹰，没说的，——卢萨诺夫一下子就认定这双盯住一点发呆的圆眼睛是猫头鹰的眼睛。病房里的气氛本来就够叫人泄气的，这只猫头鹰来得完全不合时宜。他阴郁地盯着卢萨诺夫瞧上半天，瞧得他浑身不自在。他对所有的人都这样盯住不放，好象这里所有的人都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们病房里的生活已不可能象原来那样自然地进行。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昨天打了第十二针。他对这种针剂已经习惯，也没有陷入谵妄，但他经常感到头痛和虚弱。最主要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他没有生命危险。当然，这纯粹是家庭里的一场虚惊。肿瘤已缩小一半多，还留在脖子上的部分变软了，虽然碍事，但问题不大。头部逐渐又能

转动自如了。剩下的问题只是虚弱。虚弱是可以忍受的，其中甚至别有乐趣：躺在床上看看《星火》和《鳄鱼》①，喝几口滋补剂，挑想吃的、可口的往嘴里送，跟亲爱的人聊聊，听听收音机——不过这是回家以后的事。剩下的问题只是虚弱，但董佐娃医生每次都要用手指直撅撅地在他腋下扪诊，好象用棍棒戳他。她在寻找什么东西。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可以料到她在找第二个新的肿瘤。她还把他叫到诊室里去，让他躺下，然后同样戳得人生疼地探察他的腹股沟。

"怎么样，会转移不？"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紧张地问。他因肿瘤消退而产生的喜悦顿时蒙上阴影。

"治疗的目的正是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董佐娃把头一甩。"但还需要打好多针。"

"还要打多少针？"卢萨诺夫大惊失色。

"到时候再说。"

（医生从来不直截了当地说话。）

打了十二针他已近乎瘫痪，医生看到他验血的报告直摇头，可是还得忍受多少针？病毕竟比人凶，总是有办法收拾你。肿瘤开始消退了，可是并没有真正的快乐。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日子过得没精打采，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幸亏食骨者也老实了，不再大声嚷嚷，出言不逊。现在看得出他不是装腔作势，生活把他也降伏了。他愈来愈经常地把头部往下倒垂，眼睛眯成两道缝，这样躺上很久。巴

---

① 《星火》周刊是苏联的综合性画报；《鳄鱼》旬刊是刊登讽刺小品和漫画的杂志。——中译者注

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常常服用头痛粉，用湿毛巾抹前额，闭上眼睛避光。他们往往一连好几个小时这样并排儿躺着，相安无事，没有口角发生。

在这些日子里，宽阔的楼梯平台上方（那个老是吸氧气袋的小个子已从那里被送往太平间）挂起了大幅标语——照例用白字写在长长的红布上：

病员们！不要互相谈论你们的疾病！

用这样的红布，在这样显著的地方，悬挂庆祝十月革命节或五一节的口号当然更体面些；但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这一号召也很重要。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已有好几次据此制止病人们说那些丧气话。

（总的说来，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不要把肿瘤病人集中在一起，应当把他们分散在普通医院里，他们就不会互相吓唬，甚至不必向他们说明真相，这要合乎人道得多。）

病房里人员经常变更，但来的从来不会高高兴兴，都是神色沮丧、形容憔悴。只有阿赫马章——他已经扔掉拐棍，即将出院——露出洁白的牙齿，笑口常开。但他只会自得其乐，不善于使任何别人开心。也许唯一的结果是引起人家的妒忌。

今天，在那个阴郁的老人来到之后约两个钟头，时间是灰濛濛的下午，大家都躺在床上，被雨打湿的窗子透不进多少日光，午饭前就想开电灯，希望夜晚早点来临；这时，忽然有一个身材不高、十分活跃的人抢在护士前头迅速地健步

走进病房。他不是走进来，而是急冲冲闯进来的，仿佛知道这里整好了队准备欢迎他的人都等得累了。可是，见大家都灰溜溜地躺在床上，他大感意外，立即站住，甚至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带着责备的意味兴致勃勃地开言道：

“喂，弟兄们，你们干吗个个都象落汤鸡似的？你们蜷着腿做什么？”虽然他们不是一支欢迎他的仪仗队，他却做了一个半似军人的手势，好象在向大伙敬礼，一边自我介绍：“恰雷，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请多关照！稍息！”

他脸上没有癌症病人的倦容，只有乐观、自信的笑容，于是有几个人也报以微笑，其中包括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一个月来，卢萨诺夫始终与愁眉苦脸的呻吟者为伍，今天才看到一个真正象样的人！

“好吧，”来者没有问任何人，凭着一双尖利的眼睛看准了自己的床位，便踏着有力的步伐走过去。这是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旁边原先属于穆尔萨里莫夫的一张床，这位新病人走进跟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合用的一条通道。他在铺位上坐下，晃动身子把床摇得吱吱嘎嘎直响。接着便下了断语：“只剩四成新。院长肯定不逮耗子。”

他开始安放自己所带的东西，其实他没带来什么东西：手里什么也没拿，一只口袋里是剃刀，另一只口袋里有方方的一包东西——那不是一包纸烟，而是一副纸牌，几乎还是新的。他从套子里抽出牌来，手指在上面弹了一下，一双鉴貌辨色的眼睛望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玩儿不？”

"有时候也玩玩，"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友好地说。

"普列菲朗斯①？"

"很少玩。多半是玩杜洛克。"

"这不能算牌戏，"恰雷严肃地说。"那末什托斯呢？文特？扑克？"

"一窍不通！"卢萨诺夫尴尬地把手一挥。"没时间学。"

"不用到旁的地方去学，就在这里教您，"恰雷劲头十足地说。"常言道：不会就教，不愿就逼！"

接着，他笑了。按他的脸盘来讲，他的鼻子似乎大了些——这是一个软绵绵、红彤彤的大鼻子。但正因为有了这个鼻子，他的脸才显得天真、开朗、讨人喜欢。

"没有比扑克更够劲儿的了！"他以权威的口气宣称。"下注等于摸黑。"

对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表示放心后，他还环顾室内物色牌友。但附近没有人能使他产生一点希望。

"我来！我愿意学！"阿赫马章在背后喊道。

"好，"恰雷予以赞许。"你去找一件可以当桌子的东西来，放在两张床位中间。"

他继续环顾，看到了舒路宾呆滞的目光，看到还有一个乌兹别克人缠着粉红色的头巾，下垂的胡髭如根根银丝，——这时奈丽亚带着水桶和抹布进来准备洗地板，虽然现在似乎不是时候。

"哦——哦！"恰雷立即表示赏识。"好一位大座子姑娘！

① 一种定约桥牌。——英译者注

听我说，你过去在什么地方？咱们应该一块儿去荡秋千，万无一失。”

奈丽亚撅起肥厚的嘴唇，她这样算是微笑。

“那又怎么样？现在也不晚哪，”她说。“不过你是病人，恐怕不中用。”

“肚皮贴肚皮，功效胜良医，”恰雷不甘示弱。“你是不是见我害怕了？”

“你身上还能有多少男人味？”奈丽亚打量着对方。

“放心，反正够你消受的！”恰雷还以颜色。“快，快，弯下腰去洗地板吧，让我好好瞧一下尊臀！”

“瞧吧，免费招待，”奈丽亚十分大方；她把湿抹布啪的一声扔到第一张床位底下，然后弯腰开始洗地板。

这个人可能压根儿没有病。外面看不出他有什么伤口，脸上也不反映体内的疼痛。会不会他是靠意志的命令支持着，以便做出病房里所没有的、但是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应该给自己树立的榜样？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用歆羡的目光望着恰雷。

“您是什么病？”他低声问，不让别人听见。

“我吗？”恰雷抖动一下脑袋。“息肉！”

息肉到底是怎么回事，病人中谁也说不清楚，但往往有人身上生出息肉来。

“疼不疼？”

“正因为疼了，所以我到这里来。要开刀就开吧，拖什么？”

“长在什么地方?”卢萨诺夫还是那么恭恭敬敬地问。

“大概在胃上!”恰雷满不在乎地说，脸上还带着笑容。“反正要把胃切去四分之三。”

他用手掌比作刀子做了个剖腹的动作，同时微眯着眼睛。

“那怎么行?”卢萨诺夫大为惊异。

“没关系，我能适应！只要伏特加渗得进去就好!”

“您可真沉得住气!”

“亲爱的邻居，”恰雷频频点头。他那目光直率的眼睛和红彤彤的大鼻子显得挺和气。“要是不愿见阎王，万事都得往高兴处想。多说多痛苦，少说少烦恼。我奉劝你也想开点儿!”

这时阿赫马章拿来一块胶合板，他把木板搁在卢萨诺夫和恰雷的床位中间。不错，挺稳当。

“这才比较文明，”阿赫马章很高兴。

“开灯!”恰雷发布命令。

灯开了。气氛变得更加愉快。

“还缺一个人，谁来?”

第四个人一时物色不到。

“没关系，您先给我们讲解。”卢萨诺夫兴致很高。他象个健康的人那样坐着，脚搁在地板上。脑袋转动时颈部的疼痛比以前大大减轻了。尽管只有一块胶合板，可是在他眼里却是一张小小的牌桌，被天花板上射下的灯光照得欢快明亮。红黑花色在纸牌光滑的白色衬底上显得清晰醒目。

恰雷的话也许有点道理，如能象他这样对待疾病，说不定病真的自然会好起来。干吗老是哭丧着脸？干吗尽想凄凄惨惨的事儿？

“讲吧，还等什么？”阿赫马章催促道。

“好，”恰雷以放电影胶片的速度让全副纸牌从他熟练的手中一一通过：不需要的剔去，需要的留下。“要用的牌是从 9 到 A，一共二十四张。花色由小到大的顺序是：梅花、方块、红心和黑桃。”他把每一种花色都拿给阿赫马章看。“懂了吗？”

“是，懂了！”阿赫马章十分满意地应道。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把拣出来的牌时而折弯弹响，时而稍洗一下，一边继续讲解：

“每人分五张牌，余下的放在中央。现在要弄清楚牌的大小。由小到大的顺序是：一对。”他当即示范。“两对。顺次——就是五张牌依次相连。象这样便是。或者这样。接下来是三张同点。然后是富尔……”

“谁是恰雷？”有人在门口问。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你爱人来了！”

“您看见她带了网兜没有？……好吧，弟兄们，暂停片刻。”

他劲头十足、无忧无虑地向门口走去。

病房里静了下来。电灯象晚上一样开着。阿赫马章回到自己床上。奈丽亚很快就洒了一地的水，大伙只得把脚

提起来搁到床上。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躺下来。他老是感觉到那只猫头鹰从角落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象是有一股顽强的力量在指责他，从侧面压迫他的头部。为了减轻这股压力，他问：

“同志，您是什么病？”

但那个阴郁的老头甚至没有迎着问话的人作任何礼貌的表示，好象不以为有人在问他。那双鼻烟色中透出微红的大圆眼睛似乎望着卢萨诺夫脑袋旁边的空间。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没等到回答，便开始把玩自己手中光滑的纸牌，这时却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

“一样的东西。”

究竟是跟什么“一样的东西”？无知的乡下佬！……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再也不去看他，只顾仰卧到床上，就这样躺着寻思。

恰雷的来到和玩纸牌的事使他分了心，本来他在等报纸。今天这个日子太令人难忘了。[1] 这是非常重要和具有标志意义的日子，他得根据报纸好好预测一下未来。而国家的未来也就是你个人的未来。报纸会不会全部加上悼念的黑框？还是只加在第一版？照片占整版篇幅，还是只占四分之一？标题和社论用什么措辞？自从二月份撤换了一大批人以后，这一切格外意义重大。要是在上班的话，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还可以从别人那里摸摸气候，可是在这

① 1955年3月5日是斯大林去世两周年。——英译者注

里唯有报纸。

奈丽亚在床位之间挤来挤去，任何一条通道都容她不下。但她洗得很快，此时已在扫尾，把卷起的地毯重新铺好。

瓦吉姆照了爱克斯光回来，踏着地毯走进病房，小心地搬动那条坏腿，不时因疼痛而牵动嘴唇。

他手里拿着报纸。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向他招招手：

“瓦吉姆！到这儿来坐一会。”

瓦吉姆停步踌躇了一下，然后拐进卢萨诺夫床边的通道，坐下时把裤子略略撑起，免得擦着痛处。

看得出瓦吉姆已翻开过报纸，现在折得跟送来时不一样。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刚接过报纸，立刻看到版面四周既没有黑框，第一版上也没有照片。他急忙把报纸翻得飒飒作声，仔细寻找，可是从第一版翻到最末一版，哪儿也没有发现照片、黑框或大标题。好象压根儿没有任何文章！

“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问瓦吉姆，可是不敢说出究竟没有什么。

他跟瓦吉姆素昧平生。虽然瓦吉姆是个党员，但还太年轻，也不是领导干部，不过是个狭隘的专业工作者。他头脑里可能被塞进些什么，很难设想。不过有一次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他大加赏识。病房里在谈论一些民族被集遣的事，瓦吉姆从他的地质学书本上抬起头来，朝卢萨诺夫看看，耸耸肩膀，轻轻地对他一个人说：“看起来问题总是有

的。在我们国家里不会无缘无故叫人流迁。”

通过这句正确的话，瓦吉姆表现出他是个头脑清楚、思想坚定的人。

看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看错人！他无须乎向瓦吉姆说明自己指的是什么，瓦吉姆已经先找过了。他还把卢萨诺夫激动之余没有留意的一篇底栏专论指给他看！

这是一篇寻常的底栏专论，一点也不醒目，照片也不登，是一位科学院院士写的文章。文章根本不是纪念逝世两周年！不提全民的悲痛！不提此人“活着并将永远活下去”之类的话！而是谈《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

难道仅此而已？难道只是“若干问题”？只是这些问题？建设！为什么只谈“建设”？这跟写一篇有关防护林带的文章有什么两样？赫赫战功哪里去了？哲学天才哪里去了？科学权威哪里去了？全民敬爱为什么不提？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眉头打结，痛苦非常，他透过眼镜镜片望着瓦吉姆黝黑的面孔。

“这怎么可能，啊？……”他小心地扭过头去看看背后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后者大概睡着了：眼睛闭着，头还是那么倒垂。“两个月以前——才两个月，可不是吗？——您该记得，是诞生七十五周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巨幅照片！大字标题——《伟大的继承者》。可不是吗？……啊？……”

甚至不是危险，不是由此产生的威胁到还活着的人们

的那种危险，而是忘恩！——这才是此刻最使卢萨诺夫痛心的事情，仿佛他自己的个人功绩、他自己的无可非议的品德被唾弃和推翻了。既然震古烁今的光荣不到两年就被啃蚀殆尽，既然最最敬爱的、最最英明的、你所有的顶头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都得服从的那个人在二十四个月之内就被卷起来揉做一团，——那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怎么能恢复健康？

"是这样的，"瓦吉姆说得很轻，"形式上不久前有过一项命令，规定不纪念逝世日，只纪念诞辰日。可是，从文章看来，当然……"

他怏怏不乐地摇摇头。

他也有一种仿佛受了委屈的感觉。首先是为死去的父亲不平。他记得父亲是多么热爱斯大林！——当然比爱自己更甚（父亲从来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也超过对列宁的爱。而且肯定超过对妻子和儿子的爱。提起家庭时他可以心平气和、谈笑风生；提起斯大林时则从来不是这样，他的声音必定会发抖。斯大林的像一张挂在他书斋里，一张挂在饭间里，还有一张挂在育儿室里。三个儿子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看到墙上那两道浓眉、那浓密的胡髭、那庄矜的面容——似乎永远沾不上恐惧和轻浮的欢乐，它的全部感情都压缩在一双黑眼睛丝绒一般的光泽之中。

还有，斯大林发表的每一次讲话，父亲总是自己先从头至尾读过，然后选几段念给孩子们听，并进行讲解：这里蕴藏着多么深刻的含义，说得是多么精辟，用的俄语又是多么

纯粹。后来，父亲已经去世，瓦吉姆也长大了，他才开始感到那些讲话的语言有点淡而无味，思想也谈不上凝练，倒是可以用简短得多的方式来表达，而在这样的篇幅中本来可以包含更多的思想。他心中如此认为，嘴上是不会说的。他总觉得，还是在口头上表示从小养成的崇敬之情比较顺理成章。

他逝世的那一天瓦吉姆记忆犹新。老年人、青年人、孩子都哭了。姑娘们号啕大哭，小伙子们揉着眼睛。从这片泪水汇成的汪洋大海看来，似乎不是死了一个人，而是整个宇宙裂开了一道巨缝。他觉得，纵使人类能熬过这一天，它也将作为一年中最黑暗的日子永远铭刻在记忆中。

可是到了两周年，连表示悼念的黑框也没有花费油墨加上。甚至没有写上一句简单的温暖话："两年前离开了我们……"。而上次大战中无数战士正是喊着这个人的名字前仆后继，说完他们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的。

倒不仅仅因为瓦吉姆自幼受到这样的教育（习惯他可以改变），而是全部理智的考虑，要求对这位死去的伟人表示敬意。他是智慧的化身，他放射的光辉叫人确信明天不会逸出未来的轨道。他提高了科学的地位，提高了学者的地位，把他们从工资、住房等琐碎观念中解放了出来。科学本身要求他的稳定性、他的一贯性，要求即使明天发生什么大动荡也不会迫使学者们分散精力，迫使他们放弃最有好处和最有意思的工作去处理社会结构的纷争，去教育低能儿，或者去说服笨蛋。

瓦吉姆悒悒地拖着他的坏腿回到自己床位上去。

这时恰雷带着满满一网兜食品高高兴兴回来了。他把食品一一放进与卢萨诺夫合用的通道另一侧的床头小柜，一边谦和地笑道：

“趁胃还没有割掉，我得痛痛快快吃几天！往后只剩下肠子，鬼知道能吃什么！”

卢萨诺夫对于恰雷无限羡慕：这才是个乐观主义者！真是好样儿的！

“酸辣番茄……”恰雷继续在移置食品。他用手指直接从瓶子里捞出一只来吞了下去，眯着眼睛说：“啊，呱呱叫！……小牛肉。煎得肉嫩汁多，不太干硬。”他碰了一下，舔舔指头。“好一双女人的巧手！”

“这么说，您是本地人喽，”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不，不是本地人。我只是经常到这里出差。”

“那末，爱人在本地？”

但恰雷没有听进去，他已经把空网兜拿走了。

回来后，他打开小柜，眯缝起眼睛看了一下，又吞下一只番茄，然后关上小柜。他得意地晃晃脑袋。

“咱们刚才讲到哪里啦？我再往下讲。”

其时阿赫马章已找到第四个牌友——楼梯上一个哈萨克青年。适才阿赫马章正坐在自己床上，用俄语并佐以手势声情激越地向那个哈萨克青年描述，“我们俄国人”怎样把土耳其人打得落花流水（昨天晚上他到另一栋楼去看了一部电影《攻克普列文》）。① 现在他俩都走过来，再次把木

板搁在床位之间。恰雷比刚才兴致更高，他用一双灵巧的手迅速地理着纸牌，让他们看各种样板：

"刚才讲到富尔，是不是？富尔就是三张同点加一对。懂了吗，切克梅克②？"

"我不是切克梅克，"阿赫马章摇摇头，但并不生气。"我在参军前才是切克梅克。"

"好。接下来是同花。就是五张牌同一花色。再下面是四张同点，第五张随便什么都可以。然后是小同花顺次。就是同一花色的一手顺次牌，从 9 到K。瞧，就象这样……或者这样……。还有更大的，叫大同花顺次……"

当然，并不是一下子都能了然于胸，但是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鼓励他们，说在玩的过程中会更清楚。主要的是，他这样好心好意地讲解，语调是这样亲切，口齿是这样清楚，使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打心底里感到温暖。他决计想不到在统舱病房里会遇上这样一个可亲可爱的人！现在他们坐在一起，形成一个团结友好的集体。这样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玩牌，甚至可以整天玩下去，何必考虑疾病？何必去想其他不愉快的事情？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说得对！

卢萨诺夫刚要想提出条件：在他们适当地掌握这种牌

---

① 普列文是保加利亚北部一城市。1877－78 年俄土战争中，俄军从土军手中攻占该城。此处作者讽刺乌兹别克人阿赫马章不用对方大体上能听懂的本民族语言（因乌兹别克语与哈萨克语都属突厥语系），硬要用俄语（宁可佐以手势）宣扬"我们俄国人"的战功。——中译者注

② 俄罗斯人对乌兹别克人的蔑视性称呼。——英译者注

戏之前，不赌钱，——忽然门口又有人问：

“谁是恰雷？”

“我是恰雷！”

“到楼下去，你爱人来了！”

“呸，这婊子！”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并无恶意地啐了一口唾沫，“我对她说过：星期六不要来，星期日来。差点儿没撞车！……对不起，弟兄们。”

牌又没玩成，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走了，阿赫马章和哈萨克青年把牌拿去先温习一番。

于是，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又想起了肿瘤和三月五日，从角落里又感觉到猫头鹰不以为然而又紧盯不放的目光。一扭头，他看到食骨者睁着眼睛。这家伙压根儿没睡着。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段时间内完全没有睡着，当卢萨诺夫和瓦吉姆窸窸窣窣翻阅报纸和窃窃私语的时候，他每一句话都听见了，故意不睁开眼睛。他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听听瓦吉姆会怎么说。现在他已无须乎把报纸拉过来打开，一切都已清清楚楚。

又跳起来了。心又在突突地跳。心在嘣嘣地敲一扇铁门，这扇门本来永远不会打开，可是现在竟发出轻微的嘎嘎声！居然颤动了一下！铰链上的铁锈开始跌落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从自由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无法理解。听说两年前的这一天，老人们都哭，姑娘们也哭，整个世界如丧考妣。这景象在他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因为他记

得他们那里当时是怎么个景象。那天忽然不叫他们出工，营房门上的锁也不开，把他们关在里边。营地外面的广播喇叭本来随时都听得见，这天却关掉了。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说明头儿们慌了手脚，象是大祸临头。而头儿们遭祸殃，囚犯们就喜洋洋！不用出工，在铺位上躺着，饭自会送来。起初大伙尽睡大觉，后来觉得蹊跷，再后来就弹弹吉他，弹弹班多拉[①]，互相"串床铺"猜测究竟出了什么事。囚犯哪怕被关到天涯海角，真相总是会渗透进来的，怎么也堵不住！或者通过切面包的女人，或者通过老虎灶，或者通过伙房渗进来。以后就慢慢地传开去，传开去！最初还不太肯定，只是在营房里走来走去"串床铺"的时候窃窃私议："喂，伙计们！看起来食人者报销啦……"——"你说什么???"——"我绝对不信！"——"我完全相信！"——"早就到时候了!!"顿时哄堂大笑！吉他，弹响一点；班多拉，弹响一点！可是，整整一昼夜没开营房门。第二天早晨，在西伯利亚还相当冷，全营奉命列队，一个少校、两个大尉和其他几名尉官全部到场。伤心得脸色发黑的少校开始宣布：

"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告诉你们……昨天，在莫斯科……"

囚犯们皮肤毛糙、颧骨突起、又黑又粗的丑脸开始咧嘴现出怪相，只差没有公开欢呼。少校看到这种即将笑出来的表情，暴跳如雷地下令：

"脱帽！"

---

① 一种乌克兰弹拨乐器。——中译者注

于是几百名囚犯在刀锋刃尖上犹豫不定：不脱吧，暂时还不可能；脱吧，未免太屈辱了。这时，营里一个擅长恶作剧的幽默诗人抢在所有的人前头，把自己头上一顶充毛皮的斯大林式帽子摘下来就往空中一抛！——他执行了命令！

几百人都看见了，一下子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

少校几乎气闭。

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之后，科斯托格洛托夫如今了解到，当时老人们哭了，姑娘们哭了，整个世界如丧考妣……

恰雷回来时更高兴了，而且又带来满满一网兜食品，不过已经是另一只网兜。有人吃吃地暗笑，可是恰雷自己首先公开地大声笑道：

"这些个娘儿们，你拿她们有什么办法？她们就是喜欢这一套，那为什么不让她们高兴高兴呢？这又碍着谁来？

不管烧火丫头，还是垃圾千金，
只要是女人，左不过是这么颗心……！"

接着纵声大笑，引得听的人也都合不拢嘴，他自己笑得直把手摇。卢萨诺夫也由衷地笑起来，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编的顺口溜妙极了。

"那末你的太太又是怎么颗心呢？"阿赫马章乐得气儿也顺不过来。

"甭提了，老弟，"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叹一口气，把

食品一一放进床头小柜。"咱们的法律需要改革一下。这个事儿倒是穆斯林的办法比较通情达理。从去年八月份起允许人工流产以后，生活中的这个问题大大简化了！干吗叫女人孤单单地过日子？应当有人去看看她们，哪怕一年一回也好。对于出差的人也方便：每到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安乐窝。"

食品中间又可以看到一只深色的瓶子在眼前一晃。恰雷关上小柜的门，把空网兜拿出去。看来他对这一个娘儿们不十分娇宠，因为他旋即回来了。他象过去叶甫列姆那样站在通道里，一边望着卢萨诺夫，一边搔搔脑勺子上的鬈发（他的头发长得郁郁勃勃，颜色介乎亚麻和燕麦秆之间），说：

"来吃一点儿，怎么样，高邻？"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颇有同感地微微一笑。今天的午饭不知怎的到现在还没有送来，而看到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咂着嘴唇把一件件食品放进小柜以后，压根儿不想吃那种饭了。加之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本人和他的厚嘴唇上挂着的微笑能引起一种愉快的、心里发痒的感觉，使你巴不得能跟他一起坐下来进餐。

"来吧，"卢萨诺夫邀请他坐到自己小柜旁来，"我这儿也有一些东西……"

"来两杯，怎么样？"恰雷弯身问道，他那双麻利的手已忙着把瓶瓶罐罐、大包小包往卢萨诺夫的小柜上搬过来。

"那不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摇摇头说。"我们的

病是严格禁止……”

一个月以来，病房里任何人连想也不敢想，可是对于恰雷说来，不这样简直不可能。

“你叫什么？”他已经到了卢萨诺夫床前的过道里，同他促膝而坐。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

“巴沙！”恰雷亲热地把一只手搁在他肩膀上。“你别听医生那一套！他们治病是要把人往坟墓里整。咱们可要活——高高兴兴地活！”

马克西姆·恰雷长着大红鼻子和丰腴嘴唇的一张憨直的脸上信心十足，态度友好。今天是星期六，在星期一之前医院里一切治疗事宜均告暂停。而灰濛濛的窗外雨下得正大，把卢萨诺夫同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统统隔开。报纸又不登悼念照片，委屈的浊水在心头凝结。电灯早就赶在漫漫长夜之前照得病房里亮堂堂，在此情此景中跟这个确实可爱的人一起喝一杯，吃一点，然后打打扑克，有什么不可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朋友一定觉得是条新闻——他居然打起扑克来了！）

恰雷真是个机灵鬼，酒瓶已经被他塞到枕头底下。他用一个指头把瓶塞挖了出来，在膝盖旁边悄悄地给两人各斟上半杯。他们就在那里碰了碰杯。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拿出了地道的俄罗斯性格——把前不久的恐惧、禁忌和誓言一概抛在脑后，他只想涮去心头的忧郁，让自己暖和暖和。

“咱们要活下去！一定得活下去，巴沙！”恰雷郑重其事地说，他那怪有趣的面孔忽然变得一本正经，简直凶得可怕。“谁愿意翘辫子——让他请便；咱哥儿俩可一定要活下去！”

他们就把这句话当祝酒辞干了杯。这一个月以来，卢萨诺夫元气大伤，除了淡淡的红酒什么也没喝过，现在一下子象点着了火，而且这团火不断地扩散、蔓延到全身，并且向他劝说：垂头丧气完全不必要，进了癌症楼人们照样过日子，还要从这里出去。

“那些个……息肉……疼得厉害不？……”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是有些疼。可我不理它！……巴沙！喝了伏特加不会更糟，你记住！伏特加能治百病。到上手术台的时候我还要喝酒精，你以为怎么着？瞧，就那个小瓶子……。为什么要喝酒精？因为酒精一下子就能被吸收，可以把多余的水份排干。开刀医生把我的胃翻过来一看——什么也找不到，干干净净！而我反正醉了！……你也上过前线，该懂得这个道理：进攻开始以前要发伏特加……。你负过伤没有？”

“没有。”

“运气好！……我负过两回伤：这里一回，这里又是一回……”

两只杯子里又各斟上一百克光景。

“不能再喝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太坚决地推辞说。“危险。”

“什么危险？你听了什么人的鬼话觉得危险？……来，吃几只番茄！啊，多好的番茄！”

说得对啊，既然开了戒，一百克跟二百克有什么两样？既然大伟人死了也没人提起，二百克跟二百五十克有什么不同？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第二杯也干了，算是对东家表示怀念，就象在忌日宴上一样。他凄恻地扭曲嘴唇，然后把番茄往上下唇之间送。他怀着同情听马克西姆说话，两人的脑门子几乎要碰在一起了。

“咳，这番茄红得多可爱！”马克西姆在发议论。“这里一公斤卖一个卢布，要是带到卡拉干达①，值三十卢布！人家还抢不着呢！可你要带——不行。托运——不接受。为什么不行？你倒说说——为什么不让带？”

马克西姆·彼得罗维奇激动起来了，他的两眼圆睁，在紧张地探求！探求生活的意义！

“一个穿旧上衣的矮个子去找站长问：‘站长，你要活下去不？’站长连忙抓起电话，他以为这人来谋杀他……。可是这个人在站长办公桌上放下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为什么不让带？’他问。‘为什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活，我也要活。吩咐把我的几筐番茄作行李托运！’生活胜利了，巴沙！就这样，一列火车名义上是‘客车’，其实从头至尾是番茄车：行李架上是番茄筐，坐位底下是番茄筐。对列车员——开销一点点小意思。对验票员——一点点小意思。出了路局的管辖范围，换上别的验票员——又是一点

① 哈萨克共和国的煤城。——中译者注

点小意思。”

卢萨诺夫的脑袋开始旋转，他浑身感到热乎乎的，此时疾病已被压倒。但是，马克西姆所说的事情好象跟……难以协调。反正他的话有点不大对头……。这违反我们国家的……

“这岂不是违反……”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这样？……这不好……”

“不好？”恰雷感到奇怪。“那你尝尝这一种腌得不太咸的番茄。再来一点鱼子酱！……在卡拉干达，石头上刻着标语：‘煤就是粮食。’这是指工业的粮食。可是人们要吃番茄——没有。要不是会做生意的人给他们运去——就吃不成。人们花二十五卢布抢到一公斤——还道一声谢谢。这样总算有番茄看见了，否则连看也看不见。卡拉干达那里的人实在蠢得可以——你简直无法想象！他们雇了保镖、打手，不是派他们去装几十车皮的苹果来，却把他们分布在各条草原大路上——要是有人往卡拉干达运苹果，就拦下来，不许通过！他们一直在那里把守，这帮笨蛋！……”

“怎么，你就是干这个的？你？”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大为懊丧。

“干吗问我？我可不带着箩筐跑单帮，巴沙。我是带公文包、手提箱的。少校、中校的出差证快到期了，他们去敲票房的窗子，可是车票都已经卖完！一张票也没有！！……我可从来不敲票房的窗子，却总是能弄到车票。我知道在哪个车站该去找卖茶的，在哪个车站该去找行李寄存处。

要记住，巴沙：生活是无往而不胜的！”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巴沙，我的工作是技术员。虽然我没有在技术专科学校毕过业。我还充当经纪人。我的工作要使口袋里老是装得饱饱的。什么地方没油水了——我就离开那儿。懂了吗？”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开始觉察到事情不是朝着他原来设想的方向发展，有点偏到斜路上去了。然而，马克西姆是这样好、这样爽朗的一个自己人——一个月以来他还没有遇见过第二个。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实在不忍心得罪这样的人。

“可是——这样好吗？”他只是问。

“好，很好！”马克西姆请他宽心。“你尝尝这小牛肉。回头咱们再把你的糖渍水果干掉。巴沙！咱们在世上只活一次——干吗不好好过日子？应当好好过日子，巴沙！”

这一点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能不同意，这话说得有理：我们在世上只活一次——为什么不好好过日子？只不过……

“你要明白，马克西姆，这样的事是不光彩的……”他婉转地提醒对方。

“怎么说呢，巴沙，”马克西姆同样推心置腹地回答，一只手搂住他的肩膀。“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看。在一个地方是这样，在另一个地方就是另一个样。

别看一粒小尘沙，
掉在眼里麻烦大。
粗笨汉子再寒碜，
娘们喜欢也风雅。”

恰雷哈哈大笑，并拍着卢萨诺夫的膝盖。卢萨诺夫也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他说：

“这些诗在你肚子里装得可真不少！……想不到你竟是一位诗人，马克西姆！”

“那末你是干什么的？你做什么工作？”新朋友向他打听。

尽管他们已经互相搂抱着谈得如此投机，这时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是情不自禁地摆出庄重的神态：这是他的地位使然。

“大体说来，我是搞人事工作的。”

他说得比较谦虚。事实上当然还要高些。

“在什么地方？”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了。

“听我说！”马克西姆大为高兴。“有一个很好的人得安排个工作！入场费按规矩办事，你放心！”

“你说到哪儿去了？！亏你想得出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动了气。

“这有什么想不出的？”恰雷愕然反问。他眼睛里又开始颤动着那种探求生活意义的目光，不过这一回已经被酒

泡得有点模糊了。"要是人事干部不收入场费——他们靠什么过日子？拿什么养活孩子？我问你，你有几个孩子？"

"这报纸您看完了没有？"有人用低沉的、使你感到不愉快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方说话。

原来是猫头鹰从角落里走了过来，一双浮肿的眼睛不怀好意，晨袍的纽子没有扣上。

原来报纸被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坐在身下弄皱了。

"请拿去！请拿去！"恰雷连声应道，一边把报纸从卢萨诺夫屁股底下抽出来。"巴沙，你身体挪一挪！拿去吧，大叔，旁的东西我不敢说，这玩意儿我们不吝惜。"

舒路宾绷着脸接过报纸转身想走，但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他留住。舒路宾怎样默默地盯着别人不放，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已开始如法炮制，对他细细端详，现在则看得更加真切，更加清楚。

这个人可能是谁？这张脸是那样地不同寻常。他象一个刚刚卸妆、一场戏演下来累得精疲力竭的演员。科斯托格洛托夫使出中转监狱里见面第一分钟就可以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的那种油腔滑调，从半倒悬的仰卧状态中问道：

"大叔，您是干什么的，啊？"

舒路宾不单单把眼睛，而是把整个头部转向科斯托格洛托夫，一眼不眨地又对他凝视半晌，同时用脖子画了一个奇怪的圆圈，似乎觉得领子太紧。事实上，衬衫的领子很宽敞，根本不可能妨碍他。突然，他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置之不理。

"图书馆管理员。"

"在什么地方?"科斯托格洛托夫抓紧时机，立即提出第二个问题。

"在农业技术专科学校。"

不知道什么缘故，想必因为他老是坐在角落里用呆滞的目光看人，老是象鸱鸮一样保持沉默，总之卢萨诺夫很想羞辱他一场，教训他一番。也许是伏特加在他头脑里作祟，反正他以不必要那么高的嗓门和不应该那样轻率的态度喊道：

"自然不是党员喽?"

猫头鹰一双鼻烟色的眼睛转向卢萨诺夫，眨巴了一下，似乎以为自己听错了，接着又眨了一下。这时，他忽然开口道：

"相反。"

说罢，就向病房的另一端走去。

他走路的姿势不太自然。他大概有什么地方感到擦痛或刺痛。他加快步子，晨袍的前襟向两边敞开，身体别扭地前倾，样子象一只大鸟——翅膀被剪得很不齐整，为的是不让它鼓翼飞翔。

第二十四章

输　血

科斯托格洛托夫坐在花园长椅下面的一块石头上晒太阳，挺别扭地曲着一双穿靴子的腿脚，膝盖呼着地。手象两条鞭子垂到地上，不戴帽子，耷拉着脑袋。他身穿灰溜溜的晨袍（已经不束皮带）坐在日光下，瘦骨嶙峋，动也不动，就象这块灰色的石头。他的一头黑发和背部已被烤得发烫，可是他仍毫不动弹地坐着接受三月春日的热量，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他可以这样莫名其妙地坐上很久，从阳光中补充他过去在面包和菜汤中所得不到的东西。

旁观者甚至看不出他的肩膀随着呼吸而一起一伏。不过，他的身体也不向哪一边倾倒，还能保持平衡。

楼下的一个胖工友，就是当初要把他从走廊里撵走以免破坏无菌状态的高大女人，她特别喜欢嗑向日葵籽儿，这时在小径上挺悠闲地嗑了几颗，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用市场上招徕顾客的热和声音招呼他：

“嗳，他大叔！你听见没有，他大叔！”

科斯托格洛托夫抬起头来，迎着阳光脸上挤出很多皱纹，故意眯着眼睛打量她轮廓模糊的形象。

"大夫叫你到换药室去。"

他象一块晒热的化石坐惯了，懒得动弹，实在不想站起来，仿佛是被叫去做他所痛恨的苦工。

"哪个大夫？"

"哪个要你，哪个就叫你！"工友提高了嗓门。"我可没有义务满园子找你这个人。去吧。"

"我又不需要换药。肯定不是叫我，"科斯托格洛托夫还赖着不走。

"是叫你，是叫你！"工友利用说话的间隙嗑了几颗葵花籽。"你这样的长脚鹭鸶还能跟谁搞错？我们这儿就你这样一个宝贝。"

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一口气，伸直腿脚支在地上，打着哼哼站起身来。

工友不以为然地瞧着他，说：

"老是走来走去，不注意保养精神。得好好躺着。"

"哦，阿姨，"科斯托格洛托夫叹道。"谁也不能未卜先知啊，你说是不是？"

他沿着小径蹒跚地走去，皮带不束，弯腰曲背，没有半点军人的气概。

他到换药室去，准备把又一件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顶回去，尽管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在换药室里等他的不是爱拉·拉法伊洛夫娜（她接替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已有十来天），而是一个胖乎乎的年轻女人；说她面色红润远远不够，她的腮帮子简直象两团

火，显然异常健康。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第一次看见她。

“您姓什么？”刚到门口她就冲着奥列格问。

虽然阳光已不直射他的眼睛，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仍然眯着眼睛，现出老大不乐意的神情。他急于判断究竟是怎么回事，从而制订对策，但是不忙回答。有时候必须隐姓埋名，有时候必须撒谎。他还不知道目前采取哪一种做法是正确的。

“喂，您姓什么？”那个两条胳臂圆鼓鼓的女医生又问了一遍。

“科斯托格洛托夫，”他勉强承认。

“您跑到哪儿去了！快脱衣服！到这儿来，躺在桌子上！”

科斯托格洛托夫这才一下子全想起、全看见和全明白了：原来是给他输血！他忘了这是在换药室里做的。但是，第一、他仍然坚持原则：别人的血不要，自己的血不给！第二、他信不过这个精力充沛的小娘们，她本人好象喝饱了献血者的血。薇加走了。新医生另有一套习惯，会犯另一些错误。干吗要搞这种走马灯式的鬼名堂？什么事情都没有个常规。

他沉着脸脱去晨袍，想找个地方挂起来（护士指给他看了），其实心里在找借口拒绝输血。晨袍挂好了。上衣也脱下来挂好了。再把靴子塞到角落里，光着脚在铺漆布的干净地上走过去，躺在一张垫得比较软的高台上。他还没有想出任何借口，但他知道马上就能想出来。

台子上方亮闪闪的钢架上竖立着输血器械：橡皮管、玻璃管——其中一只里有水。同一只架子上有好几个插大大小小瓶子的圆圈：有五百西西的、二百五十西西和一百二十五西西的。一只一百二十五西西的瓶子是满的，里边褐色的血液一部分被写着血型、献血者姓名和献血日期的标签所遮盖。

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眼睛练就一种不待邀请自行察看一切的熟巧，他利用爬上台子的那一会儿工夫，已经把这些全看清楚了。他并不把头靠到搁头的一端，却抓住一点做起文章来：

"喽——喽！二月二十八号。是陈血了。不能输。"

"这是什么怪论？"女医生恼了。"陈血，新血，您对于血液保藏懂得什么？血液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

她那本来就很红的脸，一生气变成了紫红色。露到肘子的胳膊丰腴而微红，皮肤上有一些粉刺，不是寒冷引起的鸡皮疙瘩，是固有的。不知为什么正是这些粉刺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打定主意不让输血。

"把袖子捋起来，手臂放松！"女医生向他下令。

她已经干了一年多输血工作，记忆中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多疑的：每个人都摆出一副自己是伯爵血统的架势，生怕被搅混。病人们照例眼睛瞅着瓶子，声称颜色不正，血型不对，日期太远，是不是太凉或太热，是否凝结，也有的干脆问："你们给我输的是坏血吧？"——"谁说的？"——"上面明明写着：'切勿动用'。"——"因为原先已经指定给一个人，

后来他不需要了。”病人已经伸出胳膊让她插针，嘴里还在嘀咕：“反正这血的质量不好。”她全仗坚强的毅力才得以摧毁这些愚蠢的疑虑。何况，她的时间老是很紧，因为一天要在好几个地方输血，规定的工作量相当大。

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所医院里已经看到过因静脉重复穿刺或针头戳得不准而造成的血肿，也看到过因匆匆输血未做试验而在输血后引起恶寒震颤。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愿信托这双不耐烦的、长着粉刺的淡红色肥手。对他来说，自己的血，纵使遭到爱克斯光破坏变得呆滞了的病人血，也毕竟比补充进来的新血更宝贵。自己的血将来总会复元。如果医院因他血液情况不妙而中断治疗——那更好。

“不，”他阴郁地拒绝捋起衣袖或放松手臂。“你们的血太陈，而且我今天不大舒服。”

他明明懂得不应该一下子提出两条理由，只该提一条。可是两句话一齐冲口说了出来。

“我马上给您量血压，”医生没有被难倒。护士已经把血压计给她拿来。

这位医生是新来的，护士则原来就是换药室的，不过奥列格以前没跟她打过交道。护士简直是个小姑娘，但个子挺高，肤色黑黑的，眼眶的轮廓有点象日本人。她的头发梳成一种极其复杂的式样，护士帽也罢，甚至头巾也罢，都不能把发型遮住。因此，这座发塔上的每一个飞檐、每一串铃铛她都用一条条绷带耐心地缠起来——这意味着她必须提前十五分钟上班才来得及缠好。

这一切跟奥列格全不相干，可是他津津有味地端详着她那顶白色的冠冕，竭力想象这姑娘的发式除去了绷带该是怎么个样儿。这里的主要人物是医生，必须毫不迟疑地跟她斗，提出异议，设法脱身，可是他却在打量眼睛轮廓象日本人的姑娘，浪费时间。同任何年轻女子一样，冲着年轻这一点，她身上就包含着一个谜，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这个谜，一颦眉一回首都意识到这个谜。

其时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手臂被医生用黑蛇似的一条带状橡皮管扎起来，测量结果，血压还是可以的。

他正欲开口说出不同意输血的下一个理由，忽然门外叫女医生听电话。

她愣了一下，然后走出去。护士把橡皮管装进匣子，而奥列格仍仰卧在台上。

“这医生是哪儿来的，啊？”他问。

姑娘的声音的旋律也都跟她内涵的谜有关，她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十分注意听自己的声音：

“是输血站的。”

“她干吗把陈血拿来？”奥列格至少想探一探这姑娘的口气。

“这不是陈血，”姑娘平稳地转过头去，顶着冠冕在室内走。

她信心十足地认为，凡是她需要知道的她都知道。

也许确实如此。

太阳已转到换药室这一边。阳光虽不直接射到这里来，

但两扇窗子被照得十分明亮，还有一部分天花板给不知从什么东西反射过来的一大片光影所覆盖。屋子里很亮，而且相当整洁、安静。

这地方很不错。

奥列格看不见的门开了，但进来的是另一个人，不是刚才那个医生。

来者几乎没有笃笃的鞋声，不用鞋跟显示自己的性格。

奥列格却猜到了。

除她以外，没有别人这样走路。这间屋里就少了她，单单少她一个人。

薇加！

是的，是她。她进入了他的视野。她那样神态自若地走进来，好象刚从这里出去一会儿。

"您到哪里去了，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奥列格笑眯眯地问。

他没有大声嚷嚷，只是轻轻地、高兴地问了这么一句。他也没有坐起来，虽然没有被缚在台上。

屋子里这下变得彻底明亮、整洁、安静了。

薇加也笑眯眯地向他提问：

"您在造反？"

但奥列格反抗的意图已告软化，现在他反而为躺在这张高台上感到高兴，你还不大容易把他赶走呢。他回答说：

"我吗？……不，我不造反了……。您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多星期没看见您了。"

她站在台边，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来说，象是在向一个头脑迟钝的学生口述不习惯的生字：

"我到各地去建立肿瘤防治站，从事抗癌宣传。"

"下基层？"

"是的。"

"以后还要去吗？"

"暂时不去。您觉得不舒服？"

这双眼睛里的神情如何呢？从容不迫。思想集中。还有就是情况尚未得到证实之前最初的忧虑。总之，这是一双医生的眼睛。

但除开这一切，这双眼睛还是淡咖啡色的：相当于一杯咖啡里倒进两指牛奶那种颜色。不过，奥列格久矣乎不喝咖啡，颜色也记不得了。主要的是这双眼睛十分友好！可以说是老朋友的眼睛！

"不，没什么了不起。大概是晒太阳晒得太暖的缘故。我坐着，坐着，差点儿睡着了。"

"您怎么可以晒太阳?！难道您不懂得肿瘤切忌加温？"

"我以为指的是不能用热水袋。"

"可是更不能晒太阳。"

"这样说来，黑海浴场是不准我去的喽？"

她点点头。

"生活啊！……哪怕把流放换成诺里尔斯克[1]也行……"

---

[1] 苏联最偏北的大城市。——英译者注

她耸耸肩膀。这不仅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也超出理解所及的限度。

"您为什么出尔反尔？"

"什么？"

"为什么不遵守我们的协议。您曾答应要亲自给我输血，不把我交给任何实习生。"

"她不是实习生，相反，她是专家。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插手。不过她已经走了。"

"怎么走了？"

"给叫去了！"

哦，走马灯！要摆脱走马灯，还得靠走马灯。

"这么说，现在您来了？"

"我来了。不过您说的陈血是怎么回事？"

他一扭头指给她看。

"这血不是陈血。但这不是给您的。您要输二百五十西西。瞧。"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从另外一张小桌上取来一只瓶子给他看。"您看上面的标签，好好检查检查。"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是该死的生活把我搞成这样的：对谁也不相信，对什么都要自己检查。可是，在不需要检查的时候，您以为我不高兴吗？"

这话是用极其疲惫的语调说的，似乎他已奄奄一息。然而，他不能禁止自己尖利的眼睛去核实一下。结果他看到标签上贴着："A型——伊·亚罗斯拉夫策娃——三月五日。"

"哦，三月五号——这非常合适！"奥列格一下子振作起来。"这很有好处。"

"您总算明白了这对您有好处。可是以前您老是争辩！"

其实是她不明白。得了，不必再争。

他把衬衫袖子捋到胳膊肘以上，把右手放松，让它自由地搁在身旁。

确实，对于他这种老是怀着戒心步步留神的性格说来，最大的乐趣恰恰在于能够把自己交给信得过的人。现在他知道，这个和蔼可亲、几乎同空气一样轻盈的女人，每一个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决不会重手重脚，决不会出任何纰漏。

所以他躺在那里，好象在休息。

天花板上一大块淡淡的、象花边一般疏朗的光影，递化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这个不知从什么东西反射过来的光影，现在也使他悦目赏心，为这间整洁、安静的房间平添一种装饰。

而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背信弃义地用针从他的静脉里抽出几滴血，摇动离心机，倒在一只盘子里分成四小摊。

"为什么要四摊？"他问这话仅仅由于一辈子习惯于到处问长问短。现在他甚至懒得去弄清楚其中的道理。

"一摊为了确定相容性，三摊是为了核对血型。以防万一。"

"既然血型符合，为什么还需要确定相容性？"

"看看病人的血清同献血者的血会不会凝结。这种情

形很少，但不等于没有。”

“原来如此。那末转动它干什么？”

“是为了把红血球剔除。您什么都想知道。”

当然，不知道也可以。奥列格望着天花板上淡淡的光影。世上的事不可能全知道。无论怎样，到咽气的时候仍旧是个傻瓜。

顶着白色冠冕的护士把三月五日的那一瓶倒过来固定在架子的夹钳上，然后在他肘子下面垫上一只小枕头。她用一条红色的橡皮止血带扎在他的臂肘上端并开始卷紧，一边用日本式的眼睛注视着是不是够了。

奇怪，刚才他怎么会觉得这姑娘身上包含着谜。什么谜也没有。她跟别的姑娘没什么两样。

甘加尔特拿着注射器走到台前。注射器是寻常的，里边盛着透明的液体；可是针头不寻常：它不是针，是一根管子，末端呈三角形。管子本身倒没有什么，只要人家不把它往你身上插。

“您的静脉可以看得很清楚，”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说，其实却掀动一撇眉毛在寻找。接着，她使劲把那可怕的针头插了进去，似乎可以听到皮肤破裂的声音。“好了。”

这里头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为什么用橡皮带绕在臂肘上端？为什么注射器里有水一样的液体？可以提出来问，也可以自己动动脑筋：大概是不让空气冲进静脉，也不让血液冲进注射器。

其时针头还留在他的静脉里，止血带先是放松，然后解

除，注射器被巧妙地拔去，护士把一个装置的尖端在小盘上面甩了几下，把最初的几滴血甩掉。甘加尔特就把这个尖端代替注射器接在针头上，用手按住，同时稍稍旋松上面的螺丝。

在那个装置中间稍大的玻璃管里，穿过透明的液体慢慢地一个接着一个升起透明的气泡。

随着气泡的上升，问题也接二连三地冒了出来：为什么用这样宽的针头？为什么把血甩掉？这些气泡又说明什么？但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么多问题，叫一百个聪明人也来不及回答。

如果要问，他倒想问别的事情。

房间里一切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尤其是天花板上那个淡淡的光影。

针头得插上很久。瓶子里血液的水平几乎看不出在降低。一点也看不出来。

"您还有事要我做吗，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日本姑娘模样的护士恭敬地问，同时注意听自己的声音。

"没有了，"甘加尔特轻轻答道。

"那我想出去一趟……半个小时，可以吗？"

"我没有事要您做了。"

姑娘几乎象逃跑似地顶着白色的冠冕奔出去。

屋里只剩下他们俩。

气泡缓慢地上升。但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碰了一下螺丝——气泡就不再升起来。连一个也没有。

“您把它关了？”

“是的。”

“为什么？”

“怎么，您又想知道啦？”她微微一笑。但这是带着鼓励意味的微笑。

换药室里十分安静。墙壁牢靠，门户厚实。只须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话，只须把话象呼气一样吐出去，全不费力。

“是啊，都怨这该死的脾性。老是想知道得超过允许知道的限度。”

“只要还想知道，那就不错了……”她说。她对于自己说出的话从来不是有口无心的。她的嘴唇以幅度极小的动作——左右两边不一样地扭曲，略略撅起或微微牵动——配合并阐发所要表达的意思。“输入最初的二十五西西以后，应当暂停较长时间，观察一下病人感觉如何。”她一只手仍按住衔接针头的尖端。她微微绽开笑容，和蔼而仔细地弯身俯视着奥列格的眼睛，问道：“您自己觉得怎么样？”

“眼前觉得挺好。”

“‘挺好’——是不是过分了？”

“不，的确挺好。比‘好’要好得多。”

“有没有恶寒的感觉，或者嘴里不是滋味？”

“没有。”

瓶子、针头和输血——这一切是一件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共同的工作，其对象好象是第三者，他们正在同心协力

对他进行治疗，并且想把他治好。

“那末，除了眼前这个时候呢？”

“除了眼前这个时候？”在有合法的权利这样做的情况下，在无须把视线移开的情况下，象这样长时间四目对视真是太好了。“总的说来很糟糕。”

“糟在哪里？ 您说说……”

她怀着同情和忧虑问他，就象一个朋友。但得到的却是……当头一棒。奥列格感觉到她立刻就要挨这一棒。淡咖啡色的眼睛无论怎样充满柔情，这一棒还是逃不过。

“精神上糟透了。糟就糟在我意识到自己为生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且连您也参与其事对我进行欺骗。”

“我？？”

当人们一眼不眨地四目对视的时候，眼睛会显示出一种完全陌生的特性，你会看到在目光一扫而过的时候发现不了的东西。眼睛仿佛失去了那层有色的保护膜，不说一句话也会把真情和盘托出，怎么也留不住。

“您怎么能这样苦苦地劝我相信打针是必要的？而且说我反正不能理解打这种针的作用。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激素疗法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对毫无戒备的淡咖啡色眼睛搞这样的突然袭击当然不够光明磊落。但真的要问也只有这样一种问法。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开始跳动，她完全惶惑了。

于是，甘加尔特医生——不，是薇加——把视线向旁边移开去。

就好象从战场上拉下尚未被彻底击溃的一个连。

她朝瓶子里看了一下——但有什么可看的，血不是被关住了吗？她看了一下气泡——但气泡也不上升。

她旋开螺丝。气泡升起来了。大概是时候了。

她摸摸那一条从装置垂向针头的橡皮管，象在帮助排除管子里的一切滞塞。她还往尖端下面垫一点棉花，不让管子有一点点弯曲。她还用一条橡皮膏把尖端贴在他手上，再把橡皮管穿过这只手的象钩子一般翘起的指头，这样管子就自行挺直。

现在薇加就不必再拿住橡皮管，不必站在他旁边，不必同他四目对视。

她脸色阴郁而严肃地调节了一下输血装置，使气泡冒得稍快，然后说：

"就这样，别动。"

说完，她走开了。

她没有走出房间，只是走出了他的眼睛这个镜头所及的画面。由于他不能动弹，他的视野里只剩下：一只带仪器的架子、一瓶褐色的血液、亮闪闪的气泡、阳光灿烂的窗子顶端、每扇六格的窗子在毛玻璃灯罩上的倒影以及隐约可见一个淡淡的日影的整个天花板。

而薇加不见了。

但他问的话却落了空，象一件由于笨手笨脚没有传递好的东西。

所以她没有接住。

奥列格还得继续在这上头花费力气。

他仰视着天花板，慢条斯理地开始自言自语：

“既然我本来就已经失去了全部生活，既然我直到骨髓里都记得自己是个永久的囚犯、永久的罪人，既然命运不能为我提供任何较好的前景，而且还要有意识地、人为地扼杀我身上的这种能力——这样一条命何必去救它？何苦呢？”

薇加全都听见了，但她在镜头之外。也许这样更好，这样话比较容易说出口。

“我先是被剥夺了自己的生命，现在还要剥夺我……传种的权利。现在还有谁要我这样一个废物中的废物？我还能派什么用场？……供人怜悯？……接受施舍？……”

薇加不做声。

天花板上的日影不知为什么偶尔会颤动几下，好象边缘收缩拢来，或者一道皱纹从上面掠过，仿佛它也百思不得其解。过后它又不动了。

透明的气泡冒得正欢。瓶子里血的水平逐渐降低。已经输去四分之一。这是一个女人——伊丽娜·亚罗斯拉夫策娃——的血。是姑娘？还是老太婆？大学生？还是小贩？

“施舍……”

突然，薇拉——尽管仍在镜头以外——说话了。她简直不是反驳，而是在什么地方憋得全身都快气炸了：

“这不是事实！……难道您真的这样想吗？我不相信这是您的想法！……不妨扪心自问！这不是您自己的思想，这是您从旁的地方捡来的！”

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样激烈地说话。他决没有料到，她感情受到伤害时会这样愤懑地说话。

她把自己的话头骤然打断，不做声了。

"那末该怎样想呢？"奥列格试图小心地把她引出来。

我的天，多静啊！连气泡在密封的小瓶子里生灭的轻微声息都清晰可闻。

她实在难于启齿。她拚命想越过这一道鸿沟，但是力不从心，语不成声。

"总有人不这样想的！哪怕只是极少数，但终究不这样想！要是全都这样想，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处？活着又有什么意思？……那还活得下去吗？！……"

这最后一句话她又是不顾一切地喊出来的——她终于越过了鸿沟。这一声喊等于她使出全部力气在奥列格背上击一猛掌，为的是把他懒得动弹的笨重身躯推向那唯一可以得救的彼岸。

于是，就象由顽童用葵花杆做的投石器（作用等于加长胳膊）射出的一颗石子，甚至象由战争最后一年那种长筒炮射出的一发炮弹（先是呜的一声呼啸而过，接着在高空中噗哧噗哧直响），奥列格腾空跃起，按一条疯狂的抛物线飞行，挣脱强记的束缚，丢开捡来的一切，越过自己一生的第一片沙漠、第二片沙漠，飞到一个阔别多年的地方。

那是保留在童年回忆中的地方！他一时竟认不出来。但是刚眨巴了一下还有点模糊的眼睛认出来以后，他就感到羞愧难当：这点道理当年他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已经懂

得。可现在不是由他告诉薇拉，而是由薇拉作为一大发现首先告诉他。

回忆中还有一件事情好象与此遥相呼应，必须赶快把它想起来，快！他想起了！

他很快就回忆起来，但说起来却不慌不忙，有条有理：

“有一个姓弗里德兰的性病医生，他写的书在二十年代曾经轰动我国。当时认为让群众和青年开开眼界很有好处。这象是宣传卫生常识，谈的都是一些最不便谈的问题。

“总的说来，这大概是必要的，这比保持假道学式的沉默好得多。有一本书名叫《在关着的房门里边》，还有一本叫做《爱的苦恼》。您……读过这些书没有？至少，做了医生以后……有没有读过？”

气泡每隔相当长时间才发出噗的一声。也许还有呼吸的声音从镜头画面以外传来。

“我承认，我很早就读了，大概才十二岁。当然瞒着大人偷偷地读。读了以后感到震惊，但也感到空虚。反正……简直不想活了……”

“我读过，”忽然，一个毫无表情的声音回答他。

“是吗，您也读过？”奥列格高兴地说。他说“您也读过？”这句话的口气，仿佛现在仍是他首次涉及这个问题。“面对这样彻底的、逻辑性很强的、无可辩驳的唯物主义，试问……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其中作了精确的统计，用百分比表示多少女人什么也感受不到，多少女人感到狂喜。有些病史表明，女人为了……探索自己，怎样从一个范畴转到另

一个范畴……”在不断回忆起新的内容的同时，他倒抽了一口气，好象撞痛或烫痛了什么地方。“作者无情地断言，夫妇关系中任何心理因素都是第二性的，他认为一切所谓‘性格不合’的现象都可以用生理学来解释。您大概还都记得。您是什么时候读的？”

她没有回答。

不应该追问。大概，这些话他已经说得太粗鄙、太直率。他实在不懂得跟女人谈话的诀窍。

天花板上一块淡淡的日影忽然起了涟漪，不知从哪里闪起一些亮晶晶的银色点子，开始频频浮动。根据这一片浮动的涟漪，根据这些微乎其微的波纹，奥列格终于明白，天花板上那团高高的，神秘的星云，只不过是窗外墙脚下一潭积水的反照，一个寻常的水洼的映象。风一吹，水面起了微波。

薇加默不作声。

“请您原谅！”奥列格表示歉意。他觉得向她道歉是件愉快的、甚至甜蜜的事情。“我恐怕没有把我的意思表达好……”他尝试着向她扭过头去，但还是看不见她。“要知道，这将毁掉世上所有的人情味。要是成为这种观念的俘虏，要是接受这一套理论，那……”现在他高兴地回到自己原来的信念，并且正努力说服——她！

薇加回来了！她进入了画面，脸上根本没有刚才他似乎听到的绝望和激愤，只有跟平时一样和善的笑意。

“我也希望您不要接受。而且我相信您是不会接受的。”

她甚至容光焕发。

这不是他的童年伙伴吗？不是和他同学的小女孩吗？他怎么不认识她啦？

他很想说一句非常友好、非常亲昵的话，例如“把你的小手伸出来！”之类。很想跟她握握手，说：“今天谈得很投机，真是太好了！”

但他的右手插着针头。

真想直呼其名——薇加！或者——薇拉！

但是不可能。

而瓶子里的血已降低一半。前几天，它还在别人的体内流动，那个人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思想；可是现正向他体内注入红褐色的健康。此外它果真什么也没有带来吗？

他注视着薇加的一双手忙个不停，看她把肘下的小枕头垫平些，把尖端下面的棉花塞紧些，手指头在橡皮管上来回抚摩，把输血架子可以移动的上半部分连同瓶子稍稍抬高些。

他不光是想握一握这只手，他甚至想吻一吻这只手。尽管这同他所说的自相矛盾。

第二十五章

薇　　加

她走出医院时喜气洋洋，一边抿嘴轻轻哼着只有自己听得见的调了。她穿一件浅灰色的夹大衣，已经不登靴子，因为街上都干了。她觉得浑身轻松，两条腿尤其轻快，走路毫不费劲，哪怕贯穿全城也没有问题。

傍晚同白天一样阳光灿烂，虽然已有些转凉，但是春意盎然。挤进闷得要命的公共汽车里去太冤了。今天她只想步行。

于是就徒步走去。

他们这座城里没有比开花的杏树更美的了。她忽然心血来潮，一定要赶在春天来临之前看到开花的杏树，哪怕能看到一棵也好，试试运气如何，只要向某处的篱笆后面或土墙里边远远地看上一眼，它那空濛的粉红色花朵不可能同任何别的花木混淆。

但毕竟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树木刚才开始由灰转青，现在正是树上不是毫无绿意、但灰色还显然占着优势的当儿。如果看到某一座土墙里边有一小块顶住城市砖石的围攻保存下来的园地，那里除了刚翻耕的棕红色干土还是光

秃秃的。

时令还早。

平时，薇拉乘上公共汽车之前，好象老是匆匆忙忙。可是坐在弹簧已坏的座位上或踮着脚抓住吊环的时候，却总是这样想："我什么也不想做，整整一个晚上什么也不想做。"理性上明知不该如此，晚上的时间却总是胡乱打发过去，第二天早晨再乘公共汽车赶去上班。

今天她不慌不忙地徒步走着，可是心里什么都想做！许多事情一下子都冒了出来：要做家务，要跑商店，还要做衣服、上图书馆，或者做其他愉快的事情——这些事儿谁也没有禁止或妨碍她做，然而迄今为止她不知为什么总是竭力加以回避。现在她每一件都想做，甚至想一下子做好！但是，她偏偏不急于乘车回去赶紧做这些事情，一件也不急于做，反而慢慢腾腾地走着。皮鞋在干燥的沥青路上每跨一步，对于她都是一种享受。

她从几家还没有打烊的商店门前经过，却不拐进任何一家去买她需要吃的或用的东西。她从好些海报前面走过，却一张也不看，尽管按她现在的心情正想看看它们的内容。

她就这样走着，走了很久。全部乐趣都在步行之中。

她脸上时而浮起笑容。

她想看开花的杏树，可是看不见，时令尚早。

昨天是三八妇女节，可是她悒悒不乐，似遭鄙弃。今天是工作日，情绪却如此轻松愉快。

今天之所以有节日的心情，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对了。

她蕴藏在心底的那些论点尽管自己坚信不移，却遭到嘲笑，得不到承认，而她还悬在这不绝如缕的一根线上，——如今发现却原来这是一条钢丝绳，它的可靠性竟得到这样曾经沧海、多疑而倔强的一个人的承认，而且这个人自己也毫不犹豫地愿意攀住它。

他们就象在人心叵测的无底深渊上空坐在高架铁缆车里滑行，互相都能充分信任。

这简直使她欣喜若狂！尽管她知道自己精神正常、并非疯癫，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听别人说你精神正常、并非疯癫！她只想对他表示谢忱，谢谢他说了这样的话，谢谢他作如是想，谢谢他历经颠沛还能保持这样一颗灵魂。

这番谢忱他完全当之无愧，而目前需要做的是向他解释，就激素疗法的事向他说明情况。他摈弃了弗里德兰，但也摈弃激素疗法。这里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自然，病人无须负逻辑责任，医生却要对逻辑负责。

这里头存在矛盾也罢，不存在矛盾也罢——反正必须说服他接受这种疗法！不能听任这个人被肿瘤抓回去！她的激情之火愈烧愈旺：必须说服他，必须拗过他，非把这个病人治好不可！但要磨破唇舌说服这样一个嘴凶而固执的人，首先必须充分自信。可是在遭到他的指责时，她自己猛然想起，他们医院里采用激素疗法的依据是全苏联的一项统一指示，它以广泛的肿瘤类别为对象，论点也相当笼统。现在她不记得有哪一篇专题学术论文论述激素疗法具体对遏制精原细胞瘤有效，而这类文章可能不止一篇，还有外国

的。要证明这一点，必须把这些文献全部读遍。过去她读过的实在不多……

但现在！现在她什么都要做！现在她一定要去读。

科斯托格洛托夫有一次不客气地对她说，他看不出他那个用药草治病的巫医哪点不如医生，并说医学未必能象数学一般拿出精确的数据。当时薇拉几乎生气了。但事后一想，这话也有一部分道理。在用爱克斯光破坏细胞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哪怕只是约略地知道——遭到破坏的正常细胞占多少百分比，反常细胞又占多少？这比巫医不称份量而用手掬晒干的草根究竟可靠多少呢？再看另一个例子：人们纷纷用青霉素治病，都说青霉素有效；可是医学界有谁真正解释清楚：青霉素的效力究竟何在？这难道不也是一本糊涂账？……必须经常注意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多读，多想！这要花多少时间哪！

但今后她什么都有时间去做！

她不知不觉已到了自己家门前的院子里——真快！她登上几级梯阶，跨进栏杆上挂满地毯、门毡的公用长廊，穿过有不少凹坑的水泥地，兴冲冲地用钥匙打开整套公寓合用的门（门上的保护层有些地方已告剥落），沿着幽暗的走廊前进——那里并不是每一盏灯都可以开的，因为分别接在各家的电度表上。

她用另一枚钥匙开了自己房门上的弹簧锁，这间斗室今天在她看来一点也不凄凉：同市内所有的底层窗户一样，窗上也装着防盗贼的栅栏。这时室内被薄暮笼罩，只有早

晨才能射进明媚的阳光。薇拉在门口站停，大衣也不脱，看着自己的房间直纳罕，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在这里日子可以过得挺好、挺快活！大概只要换一块台布就可以了——马上就换。一些地方的尘垢要揩去。墙上的画也许该换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的白夜和阿卢普卡的黑柏。

但是，她脱去大衣，系上围裙，却先到厨房里去。她朦朦胧胧记得有一件事应该在厨房里开始做。对了！应当把煤油炉点起来，给自己做点东西吃。

可是，邻家的儿子——一个中途辍学的健壮少年——把一辆摩托车塞到厨房里，一边吹口哨，一边拆卸摩托车，把零件一一放在地上涂油。夕阳照进这里来，厨房里还相当亮。当然，要挤到自己的桌子旁边去也可以，但薇拉忽然完全不想在这里张罗了，只想到房间里去，一个人待在那里。

她并不想吃东西，一点儿也不饿！

于是她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咔嚓一声把弹簧锁欣然锁上。今天她完全没有必要走出房间。玻璃盆里有巧克力糖，她可以慢慢地咬着吃……

薇拉在妈妈留下的抽屉柜前蹲下来，拉开一只很沉的抽屉，里边放着另一块台布。

不，先得把尘垢抹去！

但是，首先得换上比较朴素的衣服！

薇拉如此频频转换行动的方向感到不亦乐乎，就象跳舞时不断变更舞步似的。每一次转换都给她带来新的乐趣，

跳舞的妙趣亦在其中。

也许，该先挂上要塞和黑柏？不，这要动用锤子、钉子，干男人活最不愉快。暂时就让原来的画挂着！

于是她拿起一块抹布在房间里抹灰尘，一边低声哼着调子。

但她几乎一开始就看见斜靠在一只大肚子香水瓶上的彩色明信片——昨天收到的。正面是红玫瑰、绿缎带和一个浅蓝色的8字。反面是打字机用黑色字体打就的几句祝辞。这是基层工会寄给她祝贺国际妇女节的。①

凡是节日对于孤独者都是一种负担。但是，妇女节对于一个年华正在逝去的单身女人说来更是难以忍受！孀居或未嫁的女人聚在一起喝酒唱歌，表示她们很快活。这个院子里昨天就有这样一次聚会。其中还有一个男人，不知是哪个的丈夫；后来她们喝醉了，就轮流同他接吻。

基层工会的祝贺并没有任何挖苦的意思：祝她在劳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祝她个人生活幸福。

个人生活！……无非是一张老是滑下来的面具。无非是一条被抛弃的死蛹。②

她把明信片撕成四片扔进废纸篓。

她继续收拾屋子，揩拭香水瓶、一座仿造克里米亚风景

---

① 三月八日在苏联是作为国际妇女节来纪念的。原先，这个日子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妇女团结一致，但现在已纯粹变成男人向妇女献花、致意的一个机会。——英译者注

② 俄文“个人”、“面具”、“蛹”这几个词互相近似。——中译者注

的玻璃模型、收音机旁的一只唱片匣、一只多边形塑料外壳的电唱机。

现在她可以听自己有的任何一张唱片而不必担心被触到痛处，可以放那张最叫她受不了的：

"如今，和过去一样，

我还是独处一方……"

不过她找了另外一张放上去，打开收音机的拾音一档，然后坐到妈妈留下的深靠背圈椅里，把穿着袜子的两只脚也缩到椅子上去。

抹灰尘的揩布一只角仍握在她心不在焉的手中，象一面三角旗垂到地板上。

房间里已是暮色沉沉，收音机的调谐度盘清晰地闪着绿光。

这是芭蕾舞剧《睡美人》组曲。现在是柔板，接下来是仙女出现的一段。

薇加听着，但不是为自己听。她想象着：一个被雨淋湿、疼痛难忍、死在眼前、从未得到过幸福的人，从歌剧院的楼座听这段柔板，该作何感想。

她把这段柔板再放一遍。

又放了一遍。

她开始谈话，但不出声。她在想象中同他谈话，仿佛他就坐在那里，隔着一张圆桌，也是在闪着绿色微光的暮色中。她在说她必须说的话，并且也听他说。她能正确无误地听到他可能回答的话。他这个人会作出什么反应是颇难

逆料的，但她似乎有些习惯了。

她在向他把今天的话讲完——根据他们目前的关系，这话还断乎说不出口，象现在这样是可以的。她在向他阐述自己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论。海明威笔下的超级男人是一些尚未上升到人的生物；海明威，您只是在浅水里游泳。（奥列格一定会没好气地冲着她说：他从来没有读过什么海明威的书。他甚至会夸耀：部队里没有这种东西，劳动营里更不用说了。）女人要求于男人的完全不是这个，女人需要的是温柔体贴，需要感觉到和他在一起可保安全——让他做女人的挡箭牌、避风港。

（不知什么缘故，偏偏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薇加才能获得这种安全感。）

关于女人的说法则更其混乱。卡门[1]曾被宣布为具备最典型的女性特征。被认为最具备女性特征的是无所顾忌地寻求快感的女人。但这是伪装成女人的男人。

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地方需要解释。但由于缺乏思想准备，他好象一时不知所措，正在细细考虑。

而她再一次重放那张唱片。

天已经黑了，她忘了继续抹灰尘。调谐度盘的绿光颜色愈来愈深，室内被照亮的程度愈来愈高。

---

[1] 卡门——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梅里美在同名小说中（一译《嘉尔曼》）、作曲家比才进一步在同名歌剧中创造的一个吉卜赛女郎形象。——中译者注

开灯她无论如何不愿意，绝对不开，可是她又非看一看不可。

不过，她的手在幽暗中也很有把握地摸到了墙上那只镜框，怀着深情把它摘下来凑到调谐度盘前面。即使调谐度盘不放出这点绿幽幽的星光，哪怕立刻熄灭，薇拉仍能看清照片上的一切：这是一个男孩清秀的面庞，一双尚未见过世面的眼睛象万里无云的天空一无遮蔽；雪白的衬衫上系着生平第一条领带，身上穿的是生平第一套西装；上衣的翻领上别着一枚白色圆圈中间有一个黑色侧面头像的徽章（甚至不吝惜在新衣服上扎针眼）。照片是6英寸×9英寸，像章极小极小，但白天还是看得很清楚，现在凭记忆也能看到，这是列宁的侧面头像。

“我不需要别的勋章，”男孩的微笑仿佛在说。

就是这个男孩替她想出了薇加这个名字。

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以后很快就枯死。

薇拉·甘加尔特的恋爱也是这样。她开始恋爱时年纪还很小，还坐在课桌旁。

可是他——在前线牺牲了。

在这以后，这场战争无论怎样都可以：正义的也罢，英雄的也罢，卫国战争也罢，神圣战争也罢——对于薇拉·甘加尔特反正是最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她也同未婚夫一起被打死了。

她是多么希望她也被打死啊！当时她中断了医学院的学业，立即要求上前线。但没有被批准，因为她是日耳曼人。

战争爆发后第一年夏天的两三个月，他们还在一起。当时明知道他很快就要去参军。现在，事隔一代之后，任何人都无法解释：当时他们怎么没有结婚？纵使不结婚，他们怎么把这几个月——最后的、仅剩的几个月——也蹉跎了？当一切都在崩塌、断裂的时候，他们面前还有什么障碍？

障碍还是有的。

现在这件事向谁也讲不清楚。包括向她自己。

"薇加！我的薇加！"他从前线大声疾呼。"在你还没有属于我之前，我不能死！现在我已经觉得：只要我能有三天工夫抽出身来——度假！住医院！——我们就结婚！你说是不是？啊？"

"你不要为这件事心里难过。我永远不属于别人。我是属于你的。"

她曾经这样满怀信心写信给他。当时他还活着！

可是他没有负伤，他既没有住医院，也没有得到假期。他是被当场打死的。

他死了，可是他的星在放光。一直在放光……

但是星光在空照。

这不是本身已经熄灭、而它的光还在运行的那种星。这是本身还辉煌灿烂、可是它的光辉已经谁也看不见、谁也不需要的那种星。

她要上前线没有被批准，要死死不成。那就只得活下去。只得回医学院读书。她在大学里还是个小组长。下乡收割庄稼、大扫除、星期日义务劳动——她总是带头。她还

有什么可做呢？

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指导她实习的奥列宪科夫医生对她十分满意（是他把薇拉推荐给董佐娃的）。她的事情只剩下治疗和病人。她只能从中得到解脱。

当然，如果站在弗里德兰的水平上考虑问题，那末，念念不忘一个死人而不另找一个活人——那是荒唐、反常、发疯。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体组织的规律、激素的规律、年龄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能？但薇加知道，这些规律在她身上统统被推翻了！

倒不是她认为自己被"永远属于你"这一誓言终生束缚住了。但也有这个因素：一个人对你太亲密了，他是不可能完全死灭的。那就是说，他多少能看到一些，多少能听见一些，他是存在的，他还有。他将在无能为力的状态中默默地看到你对他不忠。

如果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如果另一个这样的人没有，哪里还谈得上细胞生长、反应和分泌的规律！这跟细胞有什么相干？这跟反应又有什么相干？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变得麻木了，疲倦了。我们在悲痛和忠诚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们把悲痛和忠诚交给了时间。只有在每天吃饱肚皮、舔舔指头这方面，我们才寸步不让。如果两天不给我们吃饭，我们便会精神失常，我们便会发疯。

瞧，我们人类前进得就那么远！

薇加没有变样，但她的心碎了。她母亲也死了，而她只跟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母亲也是因为伤心而死的，因为她的儿子——薇拉的哥哥、一位工程师——在四〇年被捕了。头几年他还有信写来。头几年她们还给他捎邮包到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境内某个地方去。但有一次邮局发来一份莫名其妙的通知。母亲去把她寄出的邮包领了回来，上面盖了好多邮戳，地址也一再被划去、重写。她把邮包象一口小棺材那样带回家来。他刚出生的时候，这匣子几乎盛得下。

这使母亲垮了下来。再加儿媳不久又嫁了人。母亲对此完全不能理解。她对薇拉则能够理解。

于是薇拉只剩下孑然一身。

当然，不是只剩下她唯一的人，而是在千千万万人中间她却是孑然一身。

全国的单身女人是那么多；你简直想就所有自己认识的女人作一个粗略的估计：是不是单身的比有丈夫的更多？这些单身女人都同她差不多年纪。都是在十年内先后出生的。也就是倒在沙场上的那些人的年龄。

战争对待男人是慈悲的，所以单把他们带走，留下女人在痛苦中过一辈子。

要是有男人从战争的废墟下幸存归来而尚未结婚，他娶妻子就不挑同自己年龄相仿的，而是挑比较年轻的。至于那些年轻几岁的，就要小整整一辈。他们是孩子，没有经受战争的辗压。

千千万万女人就这样生活着，她们从未被编成师，她们来到世上一点不起作用。历史把她们漏掉了。

但其中也有一些女人得免于厄运，只要她们对待生活有 auf die leichte Schulter① 的本领。

好多年寻常的和平生活如水流逝，而薇加始终象戴着防毒面具，脑袋老是被可恶的橡皮套住。她简直要发疯了，她被闷得虚弱不堪——于是把防毒面具扯下。

看起来她的生活好象比较近乎人情了：她允许自己得到别人的好感，开始注意穿戴，不回避与人们见面。

忠贞不渝包含着高度的快感。也许是最高的快感。即使你的忠贞不被人知道也无所谓。

哪怕你的忠贞不被人赏识也不要紧。

但只要它推动着什么就行！

可是，倘若它什么也不推动，倘若谁也不需要呢？……

防毒面具的圆眼孔不管有多大，从里边看出来终究不清楚。现在，摘去了防毒面具的玻璃片，薇拉看得清楚了。

但她没有看清楚。由于缺乏经验，她撞得很疼。由于不够谨慎，她失足了。那一段短暂的、不足道的亲近关系，不仅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轻松或光明，反而使她遭到玷污和屈辱，破坏了她的生活的完整和匀称。

可是现在要忘记它、抹掉它却办不到。

不，满不在乎地对待生活不是她的特长。一个人愈是脆弱，就愈需要有几十处、甚至几百处相合才能接近一个跟

① 德语：满不在乎，不当一回事。——中译者注

自己类似的人。每多一处相合，只能把接近的程度提高一点点。然而，只要有一处相左，立刻能使前功尽弃。偏偏这种意见相左总是出现得很早，暴露得很清楚。她找不到一个人商量：该怎么办？日子怎么过下去？

世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生活的道路。

有人力劝她领一个孩子。她同好多女人就这件事仔细合计了很久，她已经被说服了，自己心里也热乎起来，到育婴堂也去过好几回。

但最后她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她不能这样出于绝望横下一条心去爱一个孩子。比这还要危险的是：以后她可能不再爱那个孩子。而更加危险的是：他长大后可能把她视同陌路。

最好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女儿！（一定要女儿，因为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培养，对男孩子就不可能这样做。）

然而，她也不能同一个陌生人再走一趟这条泥泞的路。

她在圈椅里一直坐到午夜，从傍晚开始急于要做的那些事情一件也没有做好，连灯也没有开。收音机调谐度盘上这点光对她已够亮了，看着这柔和的绿光和黑色的刻度，思路十分通畅。

她听了好多张唱片，其中最动人心弦的几张听了也并不觉得难过。她还听了几首进行曲。放进行曲的时候就好象在她前面的黑暗中举行凯旋式，而她朝一边曲着两条纤细的腿，坐在庄严古朴的高背靠椅里，俨然是一个胜利者。

她穿过了十四片沙漠，总算走到了。她度过了十四个

精神错乱的年头，结果证明是对的！

正是今天，她多年的忠贞获得了新的、完全的意义。

她几乎保持了忠贞。可以认为这是忠贞。在主要的方面够得上忠贞。

但正是现在，她只觉得那个死者是个孩子，而不是今天的同龄人，不是一个男人——没有那种只能供女人作防空洞的笨重的男人惰性。他既没有看到战争的全貌，也没有看到它的结束以及战后多年艰苦的岁月，他始终是一个坦率的眼睛一无遮蔽的少年。

她躺到床上，但没有立即入睡，也不担心今夜睡眠不足。入睡后还频频醒来，而且做了好多梦，一宿做这么多梦似乎太多了些。有一些梦毫无道理，有一些她却竭力想保存在脑海中留到天明。

早晨她醒过来，脸上泛起笑容。

公共汽车里她被挤挤压压、推推搡搡，甚至脚上被踩，但她毫不怨恨地忍受着一切。

穿上白大衣走去开五分钟的碰头会时，她高兴地老远就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魁梧、强壮、可笑而又可爱的大猩猩式身躯从楼下的走廊里迎面而来。他从莫斯科回来后，薇拉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他的两条胳臂太重太大了，下垂时几乎把肩膀也拖着往下沉；看起来象是身材的缺陷，事实上却是优点。他的头部象是用非常粗犷的笔法画就，按梯队阵式排列成好几层，圆顶歪在脑后；一顶白色船形小帽照例很随便地、可有可无地戴在头上，还从后面翘起几只角，

顶上则被压瘪。他的胸膛套着前面不开襟的白大衣，犹如涂着白雪样伪装漆的坦克的前部。他一路走，一路和往常一样微眯着眼睛，表情严厉得可畏，但薇加知道，他脸上的线条只须稍加调整，就能变成抿嘴的笑颜。

当薇拉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面对面同时出走廊，在楼梯口相遇时，他脸上的线条果然移动了。

"你回来使我太高兴了！我们真想念你啊！"薇拉先向他说。

他笑得更开朗些，并用垂着的一只手从下面挽住她的臂肘，使她转向楼梯。

"你什么事情这样开心？告诉我，让我也高兴高兴。"

"没有什么。怎么样，这一趟跑得好不好？"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叹道：

"好，可也有扫兴的地方。莫斯科是个刺激人的地方。"

"你以后再详细谈。"

"我给你带来了些唱片。三张。"

"真的吗？是些什么？"

"你知道，那些圣-桑[1]什么的我搞不清楚……。反正莫斯科百货大楼里现在有慢转唱片柜，我把你开的单子交给他们，一位女营业员就包了三张给我。明天我给你带来。听我说，薇鲁霞，今天咱们去参加一次审判会。"

"什么审判会？"

"你还不知道吗？他们要审判第三医院的一个外科

---

① 圣-桑(1835—1921)——法国作曲家。——中译者注

医生。”

“是法院正式开庭？”

“暂时还只是同志式的。① 不过调查已进行了八个月。”

“为了什么事情？”

护士卓娅刚值完夜班从楼梯上下来，同他们俩一一招呼，只见黄色的睫毛大幅度地一闪。

“一个婴孩在手术后死了……。趁我从莫斯科回来还有一股子冲劲，一定要去放几炮。等到在家里待上一个星期，尾巴又夹紧了。咱们去，怎么样？”

但薇拉既来不及回答，也来不及拿主意，因为此刻必须到圈椅罩着套子、桌上铺着天蓝色台布的会议室去开五分钟碰头会。

薇拉十分珍视自己同列夫的关系。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样，他是薇拉在医院里最接近的人。他们的关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个没有妻子的男人和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之间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列夫从不用特别的目光看她，从不言语挑逗，不越出界限，不滋生野心；薇拉就更不必说了。他们的关系安全而友好，一点也不紧张；恋爱、结婚之类的话题在他们之间一直避而不谈，好象世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想必能猜到，薇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关系。他本人从前有过妻子，后来没有了，后来又跟某人“交过朋友”，医院里的半边天（这等

① 一群同事对某人的错误行为进行审讯。这种会议作出的判决没有法律效力，但可建议将此案提交正式法庭审理。——英译者注

于整个医院)喜欢谈论他，目前好象怀疑他同手术室一名护士有关系。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安瑞莉娜关于这一点言之凿凿，但人家怀疑她自己想钓列夫这条鱼。

在整个五分钟碰头时间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直在纸上画什么有棱有角的图形，甚至用笔尖戳破纸张。相反，薇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她心中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稳。

碰头会结束了，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从大间女病房开始巡诊。她在那里有许多病人，每次巡诊要花很多时间。她在每一个病人床上都要坐一坐，替她诊视，或同她轻声谈话。她不要求在整个这段时间内病房里鸦雀无声，因为这反而会显得拘束，何况要制止女人们说话也不可能。(在女病房里比在男病房更需要讲究策略，更需要谨慎小心。在这里，她作为一个医生的资格和成绩不是那么无可争议。她只要情绪稍微好一些，或者过分热中于按照精神疗法的要求劝病人相信一切都能顺利告终，——她马上会感到病人怀着公开的敌意瞪着她，或怀着妒意侧目而视，意思是说："你自然无所谓。病又不生在你身上。你怎么能理解?"按照同样的精神疗法，她劝那些绝望的女病人在医院里还是应该注意自己的仪容，梳梳头发，略施脂粉。但如果她自己热中于打扮，一定不受欢迎。)

今天也是这样。她尽可能质朴而大方地从一张床位走到另一张床位，按老习惯不理会嘈杂的人声，只听自己的病人说话。忽然，从另一面墙那边响起一个特别拖泥带水的

声音:

"都是些什么病人！这里有些个病人整天象公狗围着母狗转！就拿那个头发蓬蓬松松、晨袍外面束皮带的家伙来说，每逢那个叫卓娅的护士值夜班就跟她拥抱！"

"什么？……您说什么？……"甘加尔特问她的病人。"请再说一遍。"

病人就再说一遍。

（昨天夜里不是卓娅值班吗?！昨天夜里，正是调谐度盘的绿灯亮着的时候……）

"对不起，请您再从头详详细细说一遍。"

第二十六章

卓越的创举

一个并非新手的外科医生什么时候会神经紧张？不是在施手术的时候。施手术时做的是光明正大的工作，知道干了什么再干什么，只要把该切除的东西坚决去除干净，免得将来后悔搞得不彻底。除非偶尔情况骤然恶化，病人大量出血，或想起卢瑟福①是在割疝气时死的。外科医生神经开始紧张是在手术之后，如果病人的热度仍然不退或肚皮继续隆起。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不用解剖刀在想象中打开腹腔，看看出了什么毛病并加以纠正，而宝贵的时间却眼看着正在流逝。

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有一个习惯：在五分钟碰头会之前先跑去看一眼经自己施行手术的病人。由于明天是手术日，今天将在巡诊上花很多时间，他不能等一个半小时之后才了解经他作胃切除的一个病人和焦姆卡的情况。他先去看了胃病人——情况还不坏；他吩咐护士该给他灌些什么流汁，每次灌多少。然后到隔壁一间

① 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曾于1919年最先分裂原子核。——中译者注

只睡两个人的小室里去看焦姆卡。

这里的另一个病人已开始康复，即将出院，而焦姆卡平卧在床上，面色灰白，被子盖到胸前。他仰望着天花板，但目光不是感到宽慰，而是阢隉不安，眼眶周围的肌肉高度紧张，仿佛想看清天花板上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又看不清楚。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默默地站住，两腿向左右微微分开，身体略略侧向焦姆卡，长长的胳膊空悬着，右手甚至稍稍挪向一边。他皱眉望着焦姆卡，那姿势宛若在估量：要是他立刻挥动右拳对准焦姆卡的下颌打去，那会怎样？

焦姆卡转过头来看见后，放声大笑。

外科医生带有威胁性的严厉表情也一下子转为欢笑。列夫·列昂多尼维奇向焦姆卡眯眯一只眼睛，把他当作能够会意的自己人，说：

"怎么样，没问题吧？一切正常？"

"哪能正常呢？"焦姆卡有许多苦可诉。不过，一个男子汉向一个男子汉诉苦当然不象话。

"疼吗？"

"嗯。"

"老地方？"

"嗯。"

"这感觉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焦姆卡。在未来的一年内，你还会去抓那个地方，结果抓一个空。但感到疼痛的时候，你还是要想到：它已经没有了！这样会好受些。主要的

是你今后将活下去，懂吗？而一条腿见鬼去了！”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话真叫人宽心。他说得对，这讨厌的累赘——让它见鬼去吧！少了它反而轻松。

“回头我再来看你！”

他这才赶去开碰头会，一路飞快地劈开空气。他是最后一个到会（尼扎穆丁看见有谁迟到相当恼火）。他的白大衣前面不开襟，把他的胸膛紧紧裹住；背后勉强扣住，但两襟怎么也碰不到一块儿。他在医院里走路老是急急忙忙，上下楼梯两级一跨，手和脚的动作朴实而幅度大——病人们正是根据这类大幅度动作断定，他不是在这里吊儿郎当混日子。

五分钟碰头会一开就是半个小时。尼扎穆丁庄重地（据他自己认为）走进来，庄重地（据他自己认为）招呼大家，开始挺有意思（据他自己认为）、不慌不忙地主持会议。他显然在留神听自己的音调，每做一个手势，每一次转动脖子，他都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自己是多么仪表堂堂，智慧过人，学问是多么大，威信是多么高。在他的故乡，人们创作了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在本市，他是知名人士；报上有时也提到他。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翘起二郎腿坐在被他略略挪后的一把椅子上，五指张开的手插入束在腹部的白腰带。他戴着船形小帽，面带怪别扭的愠色，由于他在领导面前经常面带愠色，院长也就不认为这是针对他的。

院长不把自己的职务理解为夙夜匪懈、殚精竭虑的工

作，而是理解为经常出风头、领奖赏以及获取一系列特权的机会。他的头衔是院长，他相信自己有了这个头衔就是一院之长，是首席医师，相信自己比其余的医生懂得更多（当然不一定包括全部细节），相信自己完全了解他属下的医生如何进行治疗，他们全靠他的点拨和指导才得以避免各种错误。因此，他势必要把五分钟的碰头会拉得这样长，并认为定能得到在座所有的人欢迎。既然院长的权力如此可喜地大大重于他的职责，他在录用行政人员、医生和护士到医院来工作方面做法十分简单——他录用的都是州卫生局、市委或他指望不久在那里通过答辩取得学位的医学院里某人打电话托他给予关照的那些人，或者他在丰盛的晚餐后情绪颇好的时刻许了愿，或者那个人和他自己一样属于一个古老家族的同一旁支。倘若科室负责人提出异议，说新近录用的工作人员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那时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会用比他们更惊讶的口气说："那就教呗，同志们！否则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正在向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指出，他们工作中存在哪些毛病，他们该如何加倍努力拯救人们宝贵的生命。他的鬓发斑白，这种霜华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象一圈庄矜高贵的光轮围住天才和笨伯、圣贤和坏蛋、勤人和懒汉的脑袋；他器宇轩昂，神态从容，那是思想没有经受过磨难的人得天独厚的表征；他的皮色浅黑均匀，同斑白的鬓发相得益彰。坐在孔雀蓝台布旁边公家的直背沙发、圈椅和普通椅子上状似集中注意听着的无非是两种人：一

种是他还没有辞退的；一种是他已经录用的。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可以清楚地看到鬈发的哈尔穆哈默德夫所坐的位置。他的模样跟科克船长①游记中的插图差不多，好象刚走出丛林：头上遍插繁茂的树枝，青铜色的脸上洒满漆黑的麻点，龇着一口雪白的阔牙，现出乐不可支的怪笑，只缺少鼻子里穿一个环。问题当然不在于他的模样，同样也不在于一纸不假的医学院毕业文凭，而在于他任何一次施行手术非把事情搞糟不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曾让他做过两次手术，不料竟成为终生憾事。开除他吧，又办不到——这将是破坏民族干部政策。因此，哈尔穆哈默德夫三年多来只能写写比较简单的病史，巡诊和换药的时候他总是煞有介事地在场，夜里照样值班（睡觉），最近甚至多领半份工薪，尽管也跟不担任额外工作的人同时下班。

这里还坐着两个持有外科医生文凭的女人。一个是潘焦兴娜，四十上下年纪，胖得出奇，老是心事重重，因为她先后跟两个丈夫生了六个孩子，可是钱不够用，也没有时间照看他们。这份心事老是挂在她的脸上，即使在所谓的上班时间，也就是她为了领工资必须待在医院里的那几个小时，这种表情也不消失。另一个是安瑞莉娜，两年多以前从医学院毕业到此。她年轻、娇小、红发、俊俏，由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对她并不倾心而恨得他要命，目前是外科中跟他捣乱的主要策划者。这两位女医生都只能看看门诊，任何

① 詹姆士·科克（1728—79）——英国航海家。曾作三次环球航行，发现了太平洋中的许多岛屿。——中译者注

时候都不能让她们主刀；但院长也有重要的理由永远不能把其中的任何一人解职。

外科在名义上有五个医生，工作量是按五个外科医生布置的，但手术只有两个人能做。

这里还坐着好多护士，其中有几个跟那些医生可谓半斤八两，但她们也被尼扎穆丁·巴赫拉莫维奇录用了，并受到他的保护。

有时候这一切把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挤得实在够呛，简直一天也没法再干下去，直想拂袖而去！可是到哪儿去呢？无论换哪一所医院都有院长，说不定比这个更坏，他们都有烜赫的虚名，都有一帮子尸位素餐的自己人。最好是独当一面办一所与众不同、讲究实效的医院；编制内的人员都是切切实实的工作人员，不起作用的一个也不要。然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地位够不上担任院长，除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而他从莫斯科来到此地已经走得够远了。

再说，他对于担任领导工作压根儿没有热情。他知道，担任行政职务往往与甩开膀子工作互相抵触。何况，他在生活中有一个时期也看到过一些人从高位上摔下来，通过他们的事例认识到权力的虚幻：他曾看到一位师长巴不得去当勤务兵，他也曾把自己的第一位实习导师、外科医生科里亚柯夫从污水坑里拖起来。

某些时候情况也有所缓和，矛盾不那么尖锐，使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感到还可以忍受，不必求去。那时他反而开始担心自己和董佐娃、甘加尔特会被挤出去，觉得事情正在

朝这个方向发展，偏偏形势不是一年比一年明朗，倒是一年比一年复杂。而他已不大禁得起生活的坎坷：毕竟是近四十岁的人了，身子已需要舒适和安定。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老是处在一种徬徨的状态。他不知道究竟该奋起猛冲呢，还是随波逐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此地、也不是这样开始的，最初确有不凡的气势。有一年他距离斯大林奖金只差几步路，不料他们的整个机构因工作绷得太紧和过分匆忙而垮掉了，那时他才发觉自己连副博士论文答辩也没有通过。一部分是因为科里亚柯夫当初曾这样叮嘱他："您只管努力干，干！写的时间将来有的是。"可是这时间又在哪里呢？

也许，把写论文的事看成狗屁倒也干脆！……

不过，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对院长的不满在脸上并无反映，他眯着眼睛似乎在听。何况，组织上正建议他下个月施行第一例胸腔手术。

但任何事情总有个完结，五分钟碰头会亦不例外。外科医生们走出会议室，陆续聚集在二楼的穿堂平台上。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还是那样把两手插在腰带与腹部之间，象一位面有愠色而又心不在焉的统帅，率领两鬓苍苍、弱不禁风的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鬈发蓬松的哈尔穆哈默德夫、肥胖的潘焦兴娜、红发的安瑞莉娜以及两名护士到病房里去巡诊。

在需要赶紧工作的时候，巡诊犹如走马看花。今天也有不少事需要赶紧做完，但按照日程今天是缓慢的全面巡

诊，不能漏掉一张外科病床。所以他们一行七人不慌不忙地走进每一间病房，泡在由于懒得通风加上病人自身散发的气息和各种药品混在一起触鼻的味儿造成的浑浊空气里，挤在床位之间狭窄的通道中，让路时尽量靠边，然后互相回顾。他们簇聚在每一张病床旁，必须花一分钟、三分钟或五分钟了解该病人的痛苦，就象他们已经适应病房里浑浊的空气那样了解他的痛苦、感受、过去的和现在的病史、治疗的进程、今天的状态，总之，凡是理论和实践容许他们做的一切无不照做。

设若他们的人数少些，设若他们每一个人都精通本行业务，而不是光按名义领工资，设若不是每一名医生要治三十个病人，设若他们不必绞尽脑汁为写病史考虑最保险的措辞（因为不知哪一天它可能成为检察官的文件），设若他们不是凡人，即被自己的皮和骨、自己的记忆和意愿牢固地束缚住的人，由于意识到自己没有遭受这种疾苦而觉得轻松的人——那末，象这样的巡诊恐怕是最好的办法了。

然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知道，这些条件并不具备，而巡诊却既不能取消，也不能代替。因此他率领大家巡行如仪，眯缝着眼睛（一只比另一只眯得稍甚）顺从地听负责医师报告每一个病人的情况（不是凭记忆背出来，而是照文件夹念的）：他来自何方，何时入院（有些老病人的这些事实他早已熟悉），因患何症入院，目前接受何种治疗，剂量如何，血球数据如何，是否已拟定施行手术，有何障碍，抑或问题尚待决定。他一一听完，并坐到好些病人的床沿上，对某

些病人则要求露出患处进行视诊和扪诊，然后亲自给病人盖好被子或让别的医生也来扪触一下。

真正的难题在这样的巡诊时是解决不了的，为此必须把病人叫去个别处理。巡诊时不能什么事情都直言不讳，所以也不可能彼此谈清楚问题。在这里甚至不能说任何人的病情恶化，只能说："进程有些复杂化。"在这里，一切都用委婉的别名替代，有时甚至用别名的别名，或者说得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唯从来没有人说过"癌"或"肉瘤"，就连病人已多少有点懂的别名 CR 或 SA 也不出口。代替这些名目用的是不那么耸人听闻的字眼，如："溃疡"、"胃炎"、"炎症"、"息肉"。至于这些字眼究竟该如何理解，只能在巡诊后充分说明。为了便于彼此了解，有些话还是可以说的，例如："纵隔阴影扩大"、"这一病例不宜施行切除术"、"不能排除致命后果"（那意思就是："说不定会死在手术台上"）。逢到实在无词达意的时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就说：

"把这份病历另置。"

说罢继续前进。

在这种巡诊时，他们达不到多少了解病情、相互了解和决定办法的目的。唯其如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更加重视给病人打气。他甚至开始把打气看成这种巡诊的主要目的。

"Status idem，"有人向他报告。（这就是说："还是老样子。"）

"是吗？"他高兴地应道。接着他急于向病人直接了解：

"您真的感到好一些了吗?"

"好象是的,"病人有些诧异地附和着。病人自己并没有注意到,但既然医生注意到了,那想必没错。

"您瞧,可不是吗?这样一点一点您就会好起来的。"

另一个病人却惊慌地问:

"大夫!我的脊椎骨为什么这样疼?是不是那里也有肿瘤?"

"不——不,"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微笑着拖长了声调回答。"这是继发现象。"

(他说的是实话:转移确是继发现象。)

在一个死灰色的面孔瘦削得可怕、嘴唇微微翕动的老头床边,他听到的报告是:

"病人目前服用强身和止痛药物。"

那就是说:完了,治疗已经来不及,也没有办法,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就好。

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把两道浓眉打成个结,仿佛下决心说明一件难于启齿的事情,小心翼翼地揭开真相:

"大伯,咱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您现在感觉到的是在这以前所进行的治疗的反应。但不要催得我们太急,安静地躺着,我们一定要把您治好。您好好躺着,看起来好象对您不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其实您的机体正在我们的帮助下保卫自己。"

病入膏肓的老头点点头。开诚布公引起的反应远非那么不可收拾,相反能燃起病人的一线希望。

“髂区有这种类型的肿瘤生成，”负责医师向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报告，并给他看爱克斯光照片。

他向着亮光看看黑糊糊的透明爱克斯光底片，点点头表示赞许地说：

“片子拍得很好！非常好！”

病人得到了鼓舞：情况不光是好，而且是非常好。

而照片之所以很好，是因为无须再拍，它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肿瘤的大小和边缘。

在一个半钟点的总巡诊时间内，外科主任就这样一直说着并非心中所想的话，留神勿使语调表露自己的感情，同时又要让负责医师在病历上作出正确的记录——那一叠订在一起的手写薄病历纸将来可能成为审判他们中任何一人的依据。他没有一次遽然转过头去，没有一次用惊慌的目光看人，病人们从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和善而带一点无聊的表情看到，他们的病极其平常，都是早已知道的，没有一例疑难杂症。

一个半小时连带着科学思考的戏演下来，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累了，便揉揉脑门子，让皮肤舒展一下。

可是有个老妇人抱怨说好久没人给她叩诊了，于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就在她身上各处敲了几下。

在男病房里，一个老头宣称：

“对了！我有些话要告诉您！”

接着便语无伦次地谈起他对自己的病痛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解。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耐心地听着，还频频点头。

“您刚才好象有话想说！”老头让医生发表意见。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笑道：

“叫我说什么呢？我们跟您的利益是一致的。您希望恢复健康，我们也希望您恢复健康。咱们就继续协同行动。”

跟乌兹别克族病人交谈时，他还能说几句最简单的乌兹别克话。有一个戴眼镜的女病人，知识分子气息很浓，甚至看到她穿着晨袍躺在病床上也叫人不好意思，对她就不当众进行视诊。对一个有母亲陪着的小男孩，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认真地跟他握手。他给这个七岁的病人肚皮上先用指头弹一下，然后两人一起笑起来。

只有对一个要求他请一位神经科医生来会诊的女教师，他才不十分客气地回敬了几句。

不过，这已经是最后一间病房。他走出来时感到相当疲劳，象是刚做完一例复杂的手术。他宣布说：

“休息五分钟，抽口烟。”

于是他跟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变成了两支大烟囱，那股劲头之猛，仿佛这是他们整个巡诊的意义目的所在（但他们又严厉告诫病人，说吸烟会致癌，在绝对禁忌之列）。

然后大家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刚才巡诊时报出来的那些姓名再次被提到，但巡诊时一个旁听者可能获得的印象——病情普遍好转和健康恢复在望——在这里却如烟消云散。那个 Status idem 的女病人是无法施行手术的，对她作爱克斯光照射性质属于治标，无

非是解除一些皮肉之苦，根本不指望治本。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跟他握手的那个小男孩患的也是不治之症，肿瘤已全面扩散，仅仅由于家长的坚持，不得不再让他在医院里待一阵子。关于那个要求叩诊的老妇人，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

"她今年六十八岁。如果用爱克斯光治疗，她也许能拖到七十岁。如果动手术，她连一年也活不了。您以为如何，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

既然象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这样一个手术刀的崇拜者都放弃了动刀的念头，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更不会反对。

其实，他完全不是手术刀的崇拜者。他是个怀疑论者。他知道使用任何仪器都不如肉眼看得清楚。而要铲除病根，什么都不及刀子来得干脆。

有一个病人不愿自己下决心接受手术治疗，要求同家属商量商量。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这时说：

"他的家属远在偏僻的外地。等咱们跟他们联系上，再等他们到来谈出他们的意见，他早就死了。必须说服他上手术台，明天不行就到下一次。风险当然很大。也许打开看一下以后只能缝起来了事。"

"倘若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哈尔穆哈默德夫一本正经地问，好象冒风险的不是别人，正是他。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把两道形状奇特、互相接连的长眉一扬。

“那还是‘倘若’，可要是咱们不采取措施，他必死无疑，”他心想。“目前医院的死亡率挺不错，可以冒一下风险。”

他每一次都问大家：

“谁有不同意见？”

他感兴趣的只是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的意见。尽管经验、年龄和方法上存在差距，他们两人的意见几乎总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明白事理的人最容易达到互相了解。

“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问，“对那个黄头发的姑娘，我们难道别无他法了吗？非割除不可？”

“别无他法。非割除不可，”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把两片弯弯曲曲、浓施口红的嘴唇一撇。“以后还得好好照一个时期的爱克斯光。”

“可惜！”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突然喟叹一声，垂下戴着滑稽船形小帽的多层次、歪圆顶脑袋。他用很大的大拇指抚摩另外四个指头，象在察看自己的指甲，一边嘟哝着：“给这样年纪轻轻的人做割除术，实在不忍下手。总觉得是在做违反天性的事情。”

他把大拇指甲在食指尖上又磨了一阵。左思右想没有办法。于是他抬头问道：

“同志们，你们可明白舒路宾是怎么回事？”

“CR recti① ？”潘焦兴娜说。

① 直肠癌。——中译者注

“对，是 CR recti，但你们可知道这又是怎样才发现的？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整个防癌宣传工作和肿瘤防治站究竟起多少作用。奥列宪科夫有一次在报告会上说得好：不屑把手指伸进病人肛门的医生根本不配当医生！我们有些人实在太不负责任！舒路宾跑过好多门诊所，诉说便意频繁、大便出血，后来已感到疼痛，他们给他作了各种化验，可就是没有费一举手之劳——用指头摸一下！他们把他的病当痢疾治，当痔疮治——全都是白搭。有一次，他在某门诊所看到墙上的横幅标语，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读了以后方始猜到！结果是自己用手指摸到了自己的肿瘤！为什么医生不能早半年这样做呢？”

“部位深不深？”

“大概七公分左右，正好在括约肌后面。本来还完全可以保留肌肉块，这人就还是一个好好的人！可现在，括约肌也蔓延到了，只得施行退行性切断术，也就是说，将来排粪根本没法控制，也就是说，得把肛门翻向一边，这日子怎么过？……那位大叔人倒是挺好的……”

他们开始排明天施行手术的名单，勾出哪些病人应予以强化药效的术前处理以及使用何种强化剂；哪些人必须先洗澡，哪些人则不必；对哪些人应做什么准备工作。

“恰雷几乎不需要强化剂，”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说。“他患的是胃癌，可是精神这样好，实在少见。”

（殊不知明天早晨恰雷会自己给自己提供小瓶子里的强化剂。）

他们议定什么人给什么人当助手，什么人负责血情。结果不可避免地又是安瑞莉娜给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当助手。这意味着，明天她又将站在他对面，而手术护士将在一旁来回走动，那时安瑞莉娜的注意力不可能集中在工作上，一定老是冷眼观看他跟手术护士的动静。那位护士也相当神经质，也是惹不得的，谁也别想从她那里问清楚：缝线究竟消过毒还是没有消过毒。可是这却关系到整个手术的成败……。这些该死的娘儿们！她们就是不懂得男人有一条起码的规则：工作的时候不能……

粗心的爹妈在生下这个女儿的时候给她取了安瑞莉娜这个名字，他们万万想不到她长大了会变成怎样一个魔鬼。①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斜瞅着她那尽管有点象狐狸的俏脸蛋儿，颇想用和解的口吻说：

"听着，安瑞莉娜，或者安瑞拉，反正您喜欢什么，我就叫您什么！您有的是才能。假如您不是把才能用于找对象，而是用在外科学上的话，您已经可以干得挺不错了。听我说，咱们可不能吵架。要知道，咱们是站在同一张手术台旁边的……"

然而，她会把这番话理解成：他终于招架不住，准备投降了。

他还想详细介绍昨天的审判会情况。但他仅在吸烟时向叶甫根尼娅·乌斯季诺夫娜简单地开了个头，至于对这些同事，他根本不想讲给他们听。

---

① 安瑞莉娜这个名字包含"安琪儿(天使)"的词根。——中译者注

他们的工作安排刚一结束，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便站起来，点一支烟，大幅度摆动两条过长的胳膊，让被白大衣绷紧的胸膛劈开空气，沿着走廊向放射科快步走去。他想把全部过程单单告诉薇拉·甘加尔特。他在近焦距器械室内发现薇拉同董佐娃坐在一张桌旁处理文件。

“你们该休息吃午饭啦!”他进去宣布。“给我一把椅子。”

他将椅子往屁股后面一扔，坐了下来。他有意高高兴兴地来跟朋友聊聊，但发现气氛有点异样。

“你们干吗这样不欢迎我?”

董佐娃淡淡地一笑，她用一个指头转动着一副角质宽边眼镜，说:

“恰恰相反，我正不知道该怎样讨您的好。您肯给我施行手术吗?”

“给您? 决不!”

“为什么?”

“万一我把您宰了，人家会说我是出于妒忌，因为您的放射科比我的外科成绩好。”

“不开玩笑，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我是认真问您。”

的确，很难设想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会跟人开玩笑。

薇拉坐在那里，神情忧郁，身子缩紧，两肩拱起，似乎有些怕冷的样子。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这几天我们就要给柳德米拉·

阿法纳西耶夫娜检查一下。原来她早就觉得胃疼，可她一直不说。自己还是肿瘤学家呢！”

“不用说，您已经收集了所有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是癌喽？”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从一边太阳穴延伸到另一边太阳穴的奇异眉毛由直变弯。在毫无可笑因素的最平凡的谈话中，他通常露出嘲弄的表情，只是不知嘲弄何人。

“还没有收集齐全，”董佐娃承认。

“不妨举出一些来。”

董佐娃说了。

“证据不足！”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认为。“等薇珞琦卡在诊断意见上签了字，咱们再谈。我不久将被任命主持一所医院的工作，那时我要把您的薇珞琦卡带去当诊断医师。您放不放？”

“薇珞琦卡绝对不放！您要别人吧！”

“任何别人都不要，只要薇珞琦卡！否则我给您开刀又图什么？”

他说说笑笑，把一支烟卷抽到不能再抽，可是心里想的完全不是可笑的事。还是那个科里亚柯夫说的：年轻的经验不足，年老的精力不济。但甘加尔特目前（和他自己一样）正处在巅峰时期：经验的穗子已经灌浆，而精力的茎杆还挺结实。他眼看着薇拉从一个黄毛丫头般的住院医师变成如此干练的诊断医师，致使他对薇拉的信任不下于对董佐娃的信任。有了这样的诊断医师，外科医生纵使是个怀疑论者，也尽可高枕无忧。不过，女人的这个巅峰期比男人

为时更短。

“你带了点心没有？”他问薇拉。“你反正不吃，还得带回家去。拿来给我吃吧。”

玩笑管玩笑，夹干酪的面包还是拿了出来。他一边自己吃，一边还劝别人吃：

“你们也来一点！……昨天我去参加了一次审判会。可惜你们没有去，从中可以吸取一些教训！在学校里举行。到会的有四百人左右，大家都很感兴趣！……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因肠扭转发生梗阻，需动手术。手术做了。孩子活了几天，已经能做游戏！——这是得到确定的事实。忽然又发生局部梗阻，结果孩子死了。那个可怜的外科医生被司法部门折腾了八个月，天知道这八个月内他怎么给病人动手术。出席审判会的有市卫生局里的人，有市首席外科医师，有医学院的公众起诉人①。你们明白不？那起诉人一个劲儿地指责医生不负责任的态度是犯罪！还把家长拖来作证，——这样的证人立场可想而知！——说什么被子盖得不平整等等，反正全是蠢话！而群众——我们的公民——坐在那里，气得两眼圆睁，心想：这帮医生真是混蛋！而听众里边也有医生，我们完全明白事情有多么荒唐，看到这是个陷人坑而又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是在把我们自己往坑里推。今天是你，明天兴许会轮到我！可是我们一声

① 在所谓的“同志审判会”上，这并不是正式的公职检察官，而是由“医学界公众舆论”推举出来仅仅在这种审判会上提出指控的一名代表。——英译者注

不吱。如果我不是刚从莫斯科回来，八成也会忍气吞声。但在莫斯科呼吸了两个月新鲜空气，好多观念发生了变化；原先以为生铁浇铸的栅栏不料竟是朽木。于是我就跳出来发了言。”

“那里可以自由发言？”

“是的，有些类似辩论会。我说：你们演这么一出猴戏怎么不害臊的？（我真是这样放的炮！他们立刻大声嚷嚷：‘不许他讲下去！’）你们以为医疗错误容易发生，而审判错误就不容易发生吗？！这一事故完全是科学分析的课题，决不是开庭审理的对象！应当召集几位医生进行有水平的科学分析，不需要其他人参加。我们外科医生每星期二、星期五都要冒风险往布雷区里走！我们的全部工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母亲应当把孩子托付给我们，而不是到庭上来作证！”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这时又激动起来，只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颤动了一下。他忘了干酪面包还没有咽下去。他撕破只剩下半包的烟卷包装纸，抽出一支来点着了，说：

“而这个外科医生还是俄罗斯人哩！倘若是日耳曼人，或者是伊——乌（犹）太人，”他撅起嘴唇把“犹”字拖得很长，“那就准保有人喊出：‘绞死他！还等什么？’……我讲完后不少人鼓掌。叫我怎么能沉默？绞索已经套上了脖子，就应该把它扯断，还等什么？！”

这番叙述使薇拉受到极大的震动，她听得直晃脑袋。她的眼神显得聪明、紧张、会意，正因为如此，列夫·列昂尼多

维奇喜欢把什么都告诉她。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困惑地听着，抖了抖大脑袋上剪短的灰白色头发。

“我同意起诉人的意见！对我们做医生的不这样要求怎么行？有人把纱布缝在病人肚子里，说是忘了！有人把生理盐水当奴佛卡因输注给病人！有人上石膏造成人家的腿坏死。有人把剂量搞错十倍！输血的时候把血型也弄错！有时还把病人烫伤！不这样对待我们，怎么得了？应该象教训孩子一样揪我们的头发！”

“您简直要置我于死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张开一只大手举到头上作自卫状。“您怎么能这样说话？这个问题甚至越出医学的范围！这是一场关系到整个社会性质的斗争！”

“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甘加尔特力图抓住双方的手不让挥动，促使他们平静下来。“当然必须提高医生的责任感，但办法应该是减轻他们的负担，把额定工作量降低一半，降低三分之二！门诊时一个钟点要看九个病人——脑子怎么受得了？应当让医生从容不迫地跟病人谈谈，从容不迫地进行思考。动手术，一个外科医生一天只做一例，而不要做三例！”

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还互相叫嚷了好一阵子，不以对方的意见为然。最后薇拉总算使他们平静下来，问道：

“结果究竟怎样？”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把眯缝的眼睛张开，现出笑容，说：

"医生被保住了！整个审判会变成破裂的肥皂泡，只有一点得到确认：病历的记载不够妥当。不过且慢，事情还没完！判决之后，市卫生局的官员发了言，说什么我们对医生的教育不够，对病人的教育不够，工会开会太少。最后由市首席外科医师讲话。你们猜他从这一切得出了什么结论？悟出了什么道理？他说：'同志们，对医生进行审讯——这是一项卓越的创举，十分卓越！……'"

第二十七章

各人都有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事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规定作一般性巡诊，所以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独自去看她的照光病人。到了楼上穿堂里，一个护士陪她一起巡诊。

这个护士是卓娅。

她们在西布加托夫床边站了一会，但由于对他采取任何新的措施都由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亲自决定，她们也没有逗留太久，就走进病房。

她俩的身材确确实实一般高低：嘴唇、眼睛、帽子都在同一水平上。但因为卓娅结实得多，所以也显得大些。可以设想，过两年她自己当上了医生，看上去将比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来得神气。

她们沿着另一排床位走去，奥列格始终只看到她们的背影，看到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帽子下面的黑褐色发髻以及从卓娅帽子底下露出的金色鬈发。

那一排床位今天全部都是照光病人，所以她们行进较慢，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在每一个病人床沿上坐下，观察患处，同他谈话。

她看了阿赫马章的皮肤，看了病历上以及最后一次验血报告上的各种数据，说：

“很好，照光即将结束！你可以回家啦！”

阿赫马章高兴得咧开了嘴。

“你家在哪儿？”

“卡拉巴伊尔。”

“好，你可以回到那里去了。”

“我的病好了？”

“好了。”

“完全好了？”

“眼前已经完全好了。”

“这么说，我不用再来了？”

“过半年再来。”

“既然完全好了，再来做什么？”

“让我们瞧瞧。”

她走完了整整一排床位，一次也没向奥列格这边转过头来，始终背对着他。只有卓娅朝他那个角落看了一眼。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在瓦吉姆床边逗留了很久。她看了他的腿，摸了两侧腹股沟，尔后又摸腹、髂，同时不断问他觉得怎么样，还提了一个对于瓦吉姆来说是陌生的问题：他吃了不同的东西有何不同的感觉？

瓦吉姆思想集中，她轻声问，他轻声答。当薇拉出乎他意外地摸到右髂并问起饮食的时候，瓦吉姆问：

“您是不是在查肝区？”

他想起母亲临走之前象是无意间给他摸了一下，摸的也是这个部位。

“您什么都想知道，”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摇摇头说。“如今的病人水平实在高，我们的白大衣完全可以脱给你们穿了。”

头发漆黑、皮肤黑里泛黄的瓦吉姆，脑袋端端正正搁在白枕头上，他以严肃而洞察幽微的目光望着医生，酷似一尊少年神像。

“我是明白的，”他轻声说。“我看过书，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话说得心平气和，丝毫也不硬要甘加尔特同意或立即向他说明一切，致使薇拉反而窘得无言对答，坐在他的床沿上，好象很对他不起。他品貌端秀，风华正茂，谅必颇有才能，使薇拉不由得想起与她家很熟的一个家庭里的一个青年。他的垂死期拖得很长，头脑十分清楚，可是医生束手无策。正是由于看到他的情状，当时还在念八年级的薇拉才改变主意不当工程师，决定要做医生。

但现在她也无能为力。

瓦吉姆床旁窗台上一只玻璃罐子里盛着深褐色的恰嘎煎汁，常有其他病人怀着羡慕的心情来看这种草药。

“您在喝？”

“是的。”

甘加尔特本人并不相信恰嘎——她过去从未听谁说起过这玩意儿。不过，它至少没有害处，这不是伊塞克库尔草

根。如果病人相信——这一点本身就有好处。

“物色放射性金的事进行得怎样了?”她问。

“还只是许诺而已。也许最近能给,”他仍然那样拘谨而沉郁地说。“但是这东西还不能直接拿到手,得从上面逐级往下转来。请问,”他目不转睛地正视甘加尔特的眼睛,要求她回答,“如果在……两星期后送到,是不是已经转移到肝脏了?”

“不,您怎么说的?!当然不会!”甘加尔特煞有介事地撒了个谎,看来他相信了。“如果您愿意知道的话,这个过程是以月计算的。”

(可是她在髂骨之间扪诊又是为什么?为什么问他进食后有什么反应?)

瓦吉姆倾向于相信她的话。

相信比不信好受些……

在甘加尔特坐在瓦吉姆床沿上的这段时间内,卓娅闲着无聊,因为站得近,就转过头去从侧面瞧瞧奥列格窗台上的一本书,接着又向他本人瞧了瞧,通过眼神提出问题。但不知她要问什么。她扬起眉毛提出疑问的眼睛倒是挺美的,只是奥列格毫无表情,默然不答。通常巡诊时,她每次都能抓住只有他一个人看得见她的眼睛的机会,象拍发由点和画组成的莫氏电码信号似地,通过眼睛里一闪即逝的快乐的火花向他致意。然而近来画式火花好象不见了,点式火花也有所减少。

奥列格在生卓娅的气,因为在他如此依恋卓娅、要她委

身的那几天里，她不肯让步。在接下来轮到她值班的几个夜晚，他用手和嘴唇重复过去那一套时，感受已经不如先前强烈，觉得有点勉强。后来她值班时，奥列格干脆不去找她，在床上睡大觉。现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又何必来这些个马后秋波，他不理解。他正是要以自己十分平静的神态向她表示这种不理解。别的还不打紧，玩这种眉来眼去的把戏，他觉得自己未免太老了些。

他根据这些日子的惯例准备接受详细检视，所以把睡衣上装卸掉，正打算脱去贴身的衬衣。

但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结束了对扎齐尔柯的巡诊，擦擦手朝这边转过脸来时，不仅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微笑，不仅不请他详细述说，不坐到他床沿上来，甚至看他的时候也只是流星般的一瞥，仅够表明接下来轮到他了。然而，冲着这短暂的一瞥，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看出这双眼睛的神情变得多么淡漠。在给他输血那天这双眼睛所焕发的光彩和喜悦，甚至原先那种亲切的好感以及原先那种关切的同情——一下子都已从那里消失。眼睛变空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甘加尔特说，但视线却大部投向卢萨诺夫，“疗法照旧。奇怪，”她向卓娅看看，“激素疗法好象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卓娅耸耸肩膀。

“也许是机体的特殊性吧？”

她显然把甘加尔特医生的话理解成作为一个同行跟她商量，因为卓娅过一两年也将成为医生。

但是甘加尔特没有把卓娅提出的看法听进去，而是用完全不象商量的口气问她：

“是不是按时按量给他注射了？”

反应迅速的卓娅略略把头一昂，略略瞪出一双黄褐色的暴眼睛，直盯着医生，表示诚实的惊讶：

“这怎么可能存在疑问？……凡是规定的疗程……从来不马虎！”卓娅差一点点就要认为这是对她的侮辱。“至少，在我值班的时候……”

别人值班的情形问不到她，这不言自明。可是，“至少”这两个字她是一阵风吹过去的，而不知何故正是这含糊而匆促的声音使甘加尔特确信卓娅在撒谎。既然针剂没有充分显示作用，必定有人没给他注射！这不可能是玛丽亚。也不可能是奥林匹亚达·符拉迪斯拉沃夫娜。而众所周知，在卓娅值夜班的时候……

但是，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从卓娅大胆的、准备反击的目光意识到，要揭穿这一点是办不到的，卓娅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而有恃无恐。卓娅硬顶的劲头和否认的决心之强，使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招架不住，终于垂下眼睛。

每当她对某人产生不快的想法时，总是把眼睛垂下。

她负疚地垂下了眼睛，可是得胜的卓娅继续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坦直的目光逼视着她。

卓娅胜利了，但她旋即明白不能再冒这样的风险：万一董佐娃盘问起来，加上有某一个病人——例如卢萨诺夫——证实她什么针也没有给科斯托格洛托夫打过，那就

可能把医院里的饭碗砸碎，并且在学校里也造成不良影响。

冒险——究竟为了什么？那场游戏实际上到了玩不下去的地步，棋子已走不出新着，轱辘再也没地方可以滚。要是越出游戏的界限，要求派到那个愚蠢的乌什-铁列克去工作，终生跟随这样一个男人……，这未免太荒唐，卓娅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于是她用毁约——推翻不给他打针的协议——的目光对奥列格打量了一下。

奥列格清楚地看到，薇加甚至不愿向他瞅上一眼，但完全不明白原因何在，为什么这样突如其来？好象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情况足以使局面急转直下。诚然，昨天在穿堂里她别过头去没有看他，但当时他以为这是偶然的。

这就是女人的性格，他完全把这些给忘了！她们性格中的一切都是如此：只要吹一口气，立刻无影无踪。只有跟男子汉才可能有持久、均衡、正常的关系。

瞧，卓娅也是一样！她把睫毛一扬，已经在责怪他。她胆怯了。如果开始给他打针，他们之间还剩下什么？还有什么秘密？

可是，甘加尔特究竟要怎么样？一定要他把每一针都打进去？为什么她对打这种针这样重视？如果看在她的好意份上——这代价是否太大？……去她的！

而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其时正以关切而温暖的口吻跟卢萨诺夫谈话。这种温暖格外反衬出她对奥列格的态度之生硬。

“您现在对打针已经习惯。您适应得很好，将来一定不

愿停止呢，”她说着逗趣儿的话。

（拍人家的马屁，亏你说得出口！）

卢萨诺夫在等医生给他巡诊时看到和听到了甘加尔特同卓娅之间的冲突。作为病床的邻居，他明明知道那丫头为了她的野汉在撒谎。他知道卓娅跟食骨者串通一气。假如问题只涉及食骨者一个人，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肯定会向医生告密；自然不是在巡诊时当众揭发，可以在医生的工作室里悄悄地谈。但他不敢得罪卓娅。说也奇怪：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他懂得，哪怕是最不足道的护士也能用令人哭笑不得的办法实行报复。医院里有一套特殊的隶属体制，在他住院期间，为了与已无关的一点小事即使跟一名护士把关系搞僵也是不足取的。

如果食骨者蠢得不愿打针，这是他自作自受。他死了也是活该。

至于自己，卢萨诺夫确信现在他死不了。肿瘤退得很快，他每天怀着得意的心情等候巡诊时医生向他证实这一点。今天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也证实肿瘤继续消退，疗程进展顺利，而虚弱和头疼他慢慢能加以克服。她说还要给他输血。

现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非常珍视那些知道他的肿瘤起初有多大的病人能提供旁证。如果食骨者不算在内，这样的见证病房里只剩下阿赫马章一人，还有就是目前从外科病房回来的菲德劳。他脖子上的刀口愈合得比较好，不象以前的波杜耶夫那样。每一次换药，缠在上面的绷带

就减少一些。菲德劳睡在恰雷的床位上，因而做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第二个邻居。

这件事本身当然有辱卢萨诺夫的尊严，可说是命运的恶作剧：居然让他睡在两名流放者之间。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住院前的脾性，他一定去找负责人把它作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提出来：能这样把领导干部跟有害于社会的可疑分子混同起来吗？然而这五个星期以来，被肿瘤牵着鼻子折腾至今的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却变得心肠软了些，或者说想开了些。对食骨者可以把背朝着他，反正他近来不大出声，很少动弹，一直躺着。至于菲德劳，如果把胸襟放宽些，他这个邻居还可以。菲德劳第一件事就是对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消退之快表示惊叹（只及原先三分之一了！）。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要求下，他看了又看，赞了又赞。他性子好，不得罪人，随时愿意听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他说些什么而从无异议。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能在这里多谈自己的工作，但是尽可以详细介绍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衷心喜爱、并且不久就将回到那里去的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秘密，菲德劳当然乐于听听别人的居住条件有多么好（将来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住所）。一个人过了四十岁，根据他的住房完全可以作出判断：这是何许样人？他有哪些贡献？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分好几次介绍他家住房的布局和陈设，第一间如何，第二间怎样，第三间……，阳台在什么地方，有哪些设备。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记性很好，他清楚地记得每一口橱柜、每一张沙发是在何时何地、花多少钱买的，有些什么优点。他特别详细地向邻床的病人介绍家里的洗澡间，用什么材料铺地面，贴墙壁，介绍瓷砖的壁脚、放肥皂的小搁板、枕脑袋的圆凹口、热水龙头、淋浴装置、挂毛巾的杆子。可不要小看这些细节，要知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存在，而存在决定意识。应当使生活愉快、舒适，才能有正确的意识。高尔基说过，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全的体魄。

头发眉睫淡得几乎没有颜色的菲德劳，听卢萨诺夫一一道来，听得张口发呆。他从来不抬一句杠，甚至在缠着绷带的脖子容许的限度内还点头称是。

这个安分沉静的人虽然是日耳曼血统，虽然是个流放者，却可以说是个满不错的人，跟他做病床的邻居还过得去。形式上他还是个共产党员哩。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本着心直口快的一贯作风当面对他这样讲：

"菲德劳，把你们流迁是国家的需要。您懂吗？"

"我懂，我懂，"菲德劳带着不能弯曲的脖子点头行礼。

"要知道当时不这样做不行。"

"当然，当然。"

"对于当局的一切措施必须正确理解，包括流迁在内。无论怎样，您应当珍惜这一点：您还保留了党籍。"

"那还用说！当然……"

"而党内职务您不是以前也没有担任过吗？"

"没有，我没有担任过。"

“一直是普通工人？”

“一直是机修工。”

“当年我也是个普通工人，可是您瞧，如今可不同了！”

他们还详细地谈到各自的子女。却原来菲德劳的女儿亨丽埃塔已在州立师范学院念二年级了。

“噢，真了不起！”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感慨万千地说。“这可不能等闲视之啊。您是被流迁的，女儿照样上大学！在沙俄时代谁能作这样的梦想？你们却不受任何阻碍，不受任何限制。”

这时弗里德里希·雅各勃维奇第一次表示不以为然：

“限制从今年起才取消。过去非得监督处许可不行。各大专院校曾多次把报考证件退回，说是成绩不及格。谁能到那里去查对？”

“不管怎样，您的女儿已经在上大学二年级！”

“是这么回事：她篮球打得很好。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录取她的。”

“不管为什么原因录取，总得凭良心嘛，菲德劳。从今年开始，限制已完全取消。”

归根到底，菲德劳在农业部门工作，卢萨诺夫在工业部门工作，自然得给予照顾。①

“现在，有了一月全会的决议，你们的工作一定会大有

---

① 按照苏联的官方见解，工人阶级是其他一切社会集团的天然领袖。“工人”卢萨诺夫认为把“农民”菲德劳置于自己的保护下是很自然的。——英译者注

起色，”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和颜悦色地开导他。

“当然，当然。”

“因为在各机器拖拉机站的业务区建立辅导小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① 这一措施定能解决问题。”

“对，对。”

但光说“对”还不够，必须好好领会。于是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再向这位好说话儿的邻居仔细讲解，为什么拖拉机站在建立辅导小组后将变成坚强的堡垒。他还跟菲德劳讨论共青团号召栽种玉米的问题，谈到青年们今年要大抓玉米，这也将使农业的整个面貌大大改观。② 从昨天的报纸他们读到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制订办法的消息——他们又有许多话可谈了！

总的说来，菲德劳是个正派的邻居，有时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干脆读报给他听——有些消息要不是在医院里闲得无聊，他自己是不会逐字阅读的。例如：关于为什么在没有同德国缔结和约之前不能同奥地利缔结和约的声明；拉科西在布达佩斯的讲话；反对可耻的巴黎协定的斗争进入如火如荼的新阶段；在西德对那些曾参与集中营暴行的人的审判如何虚应故事、从宽从了。有时他也把多得吃不了

① 当时拖拉机站的职能是向集体农庄提供农业机械。拖拉机站的经营管理对农业的经营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里指的是对拖拉机站实行的无数次改组中的一次。——英译者注

② 当时赫鲁晓夫刚当上党的首脑。他相信在北俄广种玉米可以解决粮食和饲料问题。他号召共青团员同不相信那里能种植玉米的人作斗争。然而，他的计划却被气候条件挫败了。——英译者注

的自备食品请菲德劳吃，或者把医院的伙食分一部分给他。

但是，尽管他们交谈的声音很轻，总是摆脱不了拘束的感觉，因为他们的谈话显然始终都被一动不动地默默坐在菲德劳邻床上的那只猫头鹰——舒路宾——听到。自从这个人来到病房里，你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他的存在；他的一双沉得抬不起来的眼睛正在看，耳朵显然什么都听得见；如果他眨巴眼睛，说不定还是不以为然的表示。他的存在对于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成了一种经常的压力。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试图引出他的话头，了解一下他心里想些什么，或者问问他得的什么病。但是舒路宾每次只阴郁地回答寥寥数语，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谈自己的肿瘤。

他要是坐着，总是保持某种紧张的姿态，不象一般人那样坐着休息，而是坐在那里苦干。舒路宾紧张的默坐也使人感到他时刻怀着戒心。有时他坐得累了，就站起来，但他走路也疼。他一瘸一拐挪动几步后便开始站着，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动不动。这也异乎寻常，而且很不好受。何况舒路宾还不能站在自己床前——这样会把门堵住；通道上也不能站——会妨碍交通。因此他看中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窗子和扎齐尔柯的窗子之间的墙壁。他高高地站在那里，象敌人的哨兵监视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他只要背靠到那边墙上，就会站上半天。

今天巡诊后他就这样站着，位置处在奥列格和瓦吉姆视线的交接点上，象一座浮雕突出在壁外。

床位的排列方式使奥列格和瓦吉姆经常目光交接，但互相交谈不多。首先，两人都感到恶心，没有闲聊的雅兴。其次，瓦吉姆早就向所有的人声明在先：

"同志们，靠说话想叫一杯水变热，如果声音不大，估计需要两千年；即使大叫大嚷也要七十五年。还必须以热量不从杯中散发为前提。瞎扯闲聊究竟有什么好处，请各位考虑一下吧。"

更何况他们每人都向对方说过一些使人不悦的话，也许并非故意。瓦吉姆对奥列格说："应该斗争！我不明白，你们在那边为什么不斗争。"（这话说得有理。但奥列格还不敢开口讲他们如何斗争的故事。）奥列格则对瓦吉姆说："他们这样吝惜金子准备给谁？你父亲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他们为什么不给你？"

这话也有道理。瓦吉姆自己也愈来愈经常这样想，这样问。但是从旁人口中听到这个问题却不好受。一个月前，他还认为妈妈的奔波是精力过剩，抬出父亲的功劳要求照顾并不光彩。但现在，他带着一条好象被捕兽器夹住的腿，急煎煎地等待妈妈打电报来告知好消息。他用种种方式暗自占卦，但愿妈妈不虚此行！托庇于父亲的功劳得救诚然受之有愧，但是凭本人的才华得救却完全理直气壮，只不过分配金子的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才华。怀着尚未震世的满腹奇才撑得慌是痛苦的，但这是免不了的。未让才华一放异采便赍志而殁——却要比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这间病房里其他任何人的死悲惨得多。

瓦吉姆感到一种孤独的搏动和颤栗，倒不是因为妈妈或嘉尔卡不在他身边，也不是因为没有人来探望他，而是因为周围的病人、医务人员或掌握着他的命脉的人都不知道，活下去对他来说要比对任何别人重要得多！

这个想法在他头脑里象锤子敲个不停，从希望敲到绝望，又从绝望敲到希望，致使他不能领会自己正在阅读的内容。他读了整整一页，发现没有读懂，脑袋发沉，没法象山羊跑坡一般顺着别人的思路驰骋。他对着书本发呆，旁人看来他在读书，其实并不在读。

腿被夹住了——整个生命也一起被夹住。

他这样坐着，而舒路宾站在他床旁的墙边，沉浸在自己无言的痛苦之中。科斯托格洛托夫也默默地躺着，脑袋从床上向下倒悬。

他们象童话中的三只鹭鸶，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沉默。

奇怪的是，恰恰是他们三人中沉默的功夫最到家的舒路宾忽然问瓦吉姆：

"您确信不是在自找苦吃吗？您要这一切做什么？为什么定要这样？"

瓦吉姆抬起头来，用一双近乎乌黑的深色眼睛对老头打量了一下，似乎不相信这长长一串问话是从他口中吐出来的，也许这个问题本身也使人感到惊讶。

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乖谬的问题是他听错了或者不是这老头儿提出来的。老头一双沉重、发红的眼睛好奇地睥睨着瓦吉姆。

必须回答。回答的话是现成的，但不知怎的瓦吉姆感觉不到通常那股富有弹性的冲动，不急于作出反应。他只是机械地照搬所需要的回答，声音不高，意味深长：

"这事儿有意思。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

不管内心怎样阢陧不安，不管腿怎样疼痛难忍，不管那无情的八个月怎样似水流逝，瓦吉姆仍以沉着为乐，只当任何人头上都没有笼罩愁云惨雾，只当他们是在休养所，而不是在癌症楼。

舒路宾低头瞧着地上。后来，他在躯干保持不动的情况下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脑袋打转，脖子按螺旋形扭动，象是要把脑袋甩掉，可又甩不掉。他说：

"'有意思'不成其为理由。做生意也有意思。赚钱、数钞票、置产业、盖房子、添家具——这一切也都有意思。按这种解释，科学同一系列唯利是图、极不道德的行径相比也不见得高出多少。"

奇怪的见解。瓦吉姆耸耸肩膀，说：

"但如果我确实认为有意思，认为没有其他更有意思的事了，那怎么说呢？"

"您是指在医院里，还是指一般而言？"

"指一般而言。"

舒路宾张开一只手的五个指头——它们自己发出咭咭嘎嘎的响声。

"要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您永远也创造不出任何合乎

道德的东西来。”

这委实是彻头彻尾的奇谈怪论。

“科学本来就没有义务创造精神财富，”瓦吉姆向他解释。“科学创造的是物质财富，这是它值得供养的理由。请问，您说怎样才合乎道德呢？”

舒路宾闭上眼睛，半晌才睁开，然后又来一次。他慢腾腾地说：

“能促使人类灵魂相互琢磨得纯洁光明。”

“科学不正是带来光明的吗？”瓦吉姆含笑道。

“但不是带给灵魂！……”舒路宾摇摇一个指头。“既然您说‘有意思’，那末，我倒要问：您有没有走进集体农庄的养鸡场去待过五分钟？”

“没有。”

“请想象一个又长又矮的棚子，里边暗得要命，因为窗子只是几个窟窿眼儿，还装着铅丝网，防止鸡飞出去。一名女饲养员要管两千五百只鸡。棚里是泥地，鸡老是乱啄乱刨，空气里的灰尘之多，实在需要套防毒面具。她还得不断地把极不新鲜的鳀鱼放在没有盖的锅里煮——真是臭气冲天！没有人跟她替班。夏天从清晨三点要干到天黑。才三十岁的人看上去有五十岁。您认为这个饲养员的工作是不是有意思？”

瓦吉姆讶异地掀动眉毛，说：

“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

舒路宾伸出一个指头点着瓦吉姆，说：

“做买卖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饲养员吃的正是科学不发达的苦，”瓦吉姆找到了一条有力的论据。“科学发达了，所有的养鸡场都将干干净净。”

“可是在没有发达之前，您不是每天早晨往煎盘里打三个鸡蛋吗？”舒路宾闭上一只眼睛，用睁着的一只看人，使人益发感到不快。“在科学发达到那种程度之前，您是否愿意到养鸡场去工作一个时期？”

“他阁下不会觉得有意思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从倒悬状态中发出粗鲁的声音。

卢萨诺夫以前就发现舒路宾在农业问题上的见解具有这种自以为是的特点。有一次，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在就谷物问题讲解什么道理，舒路宾插进来对他作了纠正。现在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就来刺他一下：

“您莫非是从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1]毕业的？”

舒路宾打了一个寒噤，向卢萨诺夫转过头去。

“是的，是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毕业的，”他感到惊奇地加以确认。

忽然，他一挺胸，现出神气十足的样子。接着，又弯下腰来，犹如一只被剪去翅膀的鸟，想飞又飞不起，还是和原来一样动作笨拙地一瘸一拐向自己的床位那边走去。

“那您为什么在当图书管理员啊？”卢萨诺夫得意洋洋地冲着他的背影追问。

---

① 苏联最著名的农业高等学校。——英译者注

但舒路宾已经缄口不语，象树墩一样保持沉默。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不尊敬那些在生活道路上不是向上、而是往下走的人。

第二十八章

诸 事 不 吉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刚回到医院里，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断定他是个有头脑的实干家。由于闲得慌，在巡诊时奥列格便留心对他进行观察。大夫的这顶帽子戴到头上时显然从来不照镜子；这双过长的手有时握成拳头插进胸前不开襟的白大衣口袋；嘴角收缩，那模样似乎想吹口哨；尽管他看起来孔武有力，威风凛凛，但在跟病人谈话时却颇饶风趣——这一切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产生强烈的好感，很想跟他谈谈，向他提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此地的女医生中谁也不能回答或不愿回答的。

但是没有机会提出问题：巡诊时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除了自己的手术病人谁也不理，经过照光病人的床位只当那里空着；在走廊里和楼梯上任何人跟他打招呼，他只是答礼如仪，但脸上始终摆脱不了心事重重的表情，而且他老是来去匆匆。

有一次，在谈起一个干了什么事先是抵赖、后来承认的病人时，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呵呵笑道："到底改了宗！"这使奥列格受到更大的震动。因为这个词儿的这层意义不是

任何人都会用的。

近来，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医院里闲荡比过去少了，同外科主任相遇的机会就更少。但是有一回他亲眼看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打开手术室隔壁一间小屋子锁着的门走了进去，这意味着那里肯定没有别人。于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敲了敲涂漆的玻璃门，把它打开。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刚侧身坐下——这是不打算坐久的姿势，但已经在写着什么。

“嗯？”他抬起头来，好象并不感到奇怪，显然还在集中注意力考虑如何写下去。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空！性命攸关的问题只能在一分钟内决定。

“对不起，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尽他所能努力做到不失礼貌。“我知道您很忙。可是除了您，我实在没人可以商量……。您能给我两分钟时间吗？”

外科医生点点头。看得出，他还在考虑自己的事。

“对我正在采取一个疗程的激素疗法，形式是……肌内注射人造雌酚……，剂量为……”（科斯托格洛托夫平时采用并引以为荣的做法是：用医生的语言、学医生的精确作风同医生交谈，以此要求他们对他开诚布公。）“我想了解的是：激素的作用是否具有积聚性？”

这番开场白甚至没有花去他请拨的一百二十秒钟的零头。接下来的时间已不由他掌握，他抄起两手默默地站在那里，俯视坐着的外科医生，由于自己身材细长而显得有点

伛偻。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皱眉蹙额想把注意力从别的事情转到这上头来。

“嗯……不，我看不应当有，”他答道。但不是斩钉截铁的口气。

“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有积聚性，”科斯托格洛托夫并不罢休，仿佛他希望有积聚性，再不然就是对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不太相信。

“不会吧，不应当有，”外科医生仍然没有把话说绝，也许因为这不属他的领域，或者他的思想还没有从别的事情上转过来。

“我迫切需要了解，”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眼神和口气似乎带有威胁的味道，“经过这次疗程，我是否将完全丧失那种机能？……我是指……在涉及女人的问题上。还是仅仅在一定时期内如此？注入的这种激素会不会离开我的身体。还是将永久留在体内？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也许可以通过注射同性激素逆用这种疗法？”

“不，我不主张这样做。不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望着这个黑发蓬松的病人，首先看到的是他那道引人注目的创疤。他想象这道砍痕才出现时的样子，假设这是刚送到外科病区的一例外伤，那该怎么办。“您问这干什么？我不理解。”

“怎么不理解？”科斯托格洛托夫倒是不理解这里头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也许，这位有头脑的实干家忠于自己作

为一个医生应当遵守的规矩，也只是劝病人认命？“您不理解？”

这已经越出两分钟的时限，也越出医生与病人关系的界限，但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却以一下子就为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并赏识的那种不沾傲慢的态度，突然压低嗓门，不打官腔，象对老朋友似地说：

“听我说，难道生活的全部精华都在娘儿们身上？……要知道，这档子事一旦生了腻可够呛……只会妨碍正经事儿。”

他说得十分诚挚，样子甚至很疲倦。他想起自己在生活中最紧要的时刻缺乏一股子拚劲，说不定正是因为精力被这样耗费了。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不能理解他的话！奥列格现在无法想象这种感觉会生腻！他的头向左右两边机械地摇晃，眼睛视而不见。他说：

“我此生再也没有更正经的事了。”

但肿瘤医院可没有把这样的谈话订入规章！病人不应向医生——何况还是非本科的医生——征询，医生也不应同病人讨论生活的意义！那位足登高跟鞋、走起路来整个身躯微微扭动的娇小的外科女医生，向门内一探头立刻走进来。她径直走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紧跟前，把一纸化验单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自己倚着桌子（奥列格远远看去好象她贴着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不用任何方式称呼他，说道：

“瞧，奥甫吉延柯的白血球是一万。”

她的松散的头发象一团淡淡的红色烟雾在列夫·列昂尼多维奇面前飘荡。

“那又怎么样？”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耸耸肩膀。“这不是良好的白血球增多，这说明他有炎症，应当照射爱克斯光加以抑制。”

于是她又说了好些话（她的一只肩膀确实贴着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的胳臂）。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才写了几个字的纸放在那里没有下文，蘸水钢笔在他手中倒转过来用武无地。

很明显，奥列格必须出去。设想了好久的一次谈话偏偏在最精彩的节骨眼上被打断。

安瑞莉娜回过头来，不明白科斯托格洛托夫还待在这儿干什么；但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也从她头顶上往这边瞧，目光带着几分幽默。他的脸上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表情，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敢于继续提问：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我还想问一下：您听说过一种叫做恰嘎的桦树菌子没有？”

“是的，”他回答得相当爽快。

“您对它怎么看？”

“很难说。我料想，有几种地域性的肿瘤可能对它敏感。比方说胃部的肿瘤。现在莫斯科掀起了一阵恰嘎狂。据说，方圆二百公里以内的菌子都被采光了，树林里别想找到。”

安瑞莉娜从桌旁把身子站直，拿起那张化验单，带着鄙夷的神情，还是那样傲岸地一路扭扭摆摆而去，姿态非常动人。

她虽然走了，可是他们的第一次谈话却已遭到破坏。他的问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答，然而再回过头去讨论女人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毕竟不相宜。

不过，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向他投来的轻松愉快的一瞥以及那种十分平易近人的态度，鼓励着科斯托格洛托夫提出他准备好的第三个问题，这也不是鸡毛蒜皮的问题。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请原谅我的冒昧，"他晃晃脑袋。"如果我说得不对——就算我没说。您……"他也压低嗓门，眯缝起一只眼睛，"您……有没有到过那个人们永远跳舞唱歌的地方？"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活跃起来了：

"到过。"

"真的吗？"科斯托格洛托夫喜出望外。他们敢情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哪一款？"

"我哪一款也不是。我是自由人。我在那里工作过。"

"啊，自由人！"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失望。

不，他们的遭遇毕竟不同。

"您是根据什么猜到的，"外科医生好奇地问。

"根据一个词儿：'改了宗'。还有，您好象也说过谁是'窝家'。"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笑了：

“改也难哪。”

遭遇虽不一样，但他们已比刚才有了多得多的共同之处。

“在那里待了多久？”科斯托格洛托夫熟不拘礼地问。他甚至挺直腰板，不再是那种蔫不唧的样子。

“大约有三年工夫。复员后被派去的，怎么也脱不了身。”

其实他不必补充。但他补充了。明明是光荣、崇高的工作，可是正派人为什么认为非表白一番不可呢？人身上毕竟有这样一种指示器，怎么也挖不掉。

“担任什么职务？”

“卫生处长。”

嘍！原来同杜宾斯卡娅夫人一样充当生与死的主宰！如果问及那位夫人，她决不会作任何表白。而这个人却离开了那里。

“这么说，您在战前已经从医学院毕业？”科斯托格洛托夫象牛蒡草似地粘上了一连串新的问题。事实上他大可不必如此，这纯粹是在中转监狱里养成的习惯——几分钟内，利用送饭的小洞门两次啪哒啪哒开关之间的间歇了解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的身世。“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不，我才念完四年级，就志愿上前线当无级衔军医，”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放下没有写好的纸站起来，很感兴趣地走到奥列格跟前，用指头试按、抚摩他的伤疤。“这是从那边带来的？”

“嗯。”

“缝得很好……。好。是囚犯中的医生缝的？”

“嗯。”

“他姓什么，可还记得？是不是科里亚柯夫？”

“不知道，那是在中转监狱。那个科里亚柯夫吃的是哪一款的官司？”奥列格又缠上了科里亚柯夫，急于把他的情况也打听清楚。

“他吃官司是因为他父亲当过沙皇军队的上校。”

但这时，那个眼睛象日本人、头上顶着白色冠冕的护士进来叫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到换药室去。

科斯托格洛托夫又弓起背脊沿着走廊踽踽而行。

又是一篇已由虚线勾出轮廓的传记。甚至有两篇传记。其余的已不难靠想象补充。到那里去的人竟有那么多种多样的原因……。不，他考虑的不是这个，他考虑的是：自己在病房里躺着，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在花园里散步，觉得睡在邻床或迎面走来的人表面上没有任何特征。无论是他还是你，都不会想到把对方叫住，说：“喂，把你的领襟翻过来！”其实，安知那里一定没有秘密会社的徽章?！也许他恰恰到过那里，有过接触，沾过边儿，了解内情！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但是你休想问出什么名堂来。他们每一个都是哑巴！从外表一点也猜不透。藏得可真够严实的！

果真有朝一日女人将成为累赘？太荒谬了！难道男人会餍足到这种程度？这简直不可想象！

总的讲来，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列夫·列昂

尼多维奇的否定性答复并不是那么坚决，还不能就此相信他的话。

科斯托格洛托夫有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原来被判处极刑，现在改为无期徒刑。他可以继续活着，可是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应该认识到，一切都已失去。

一切……

他忘了自己要到哪里去，在楼下走廊里愣住了站着不动。

从离他三扇门的一间屋子里出现一件小小的白大衣，腰部特别纤细，一下子就认得出来。

薇加！

她在向这边走来！他俩之间的直线距离才几步路，只消绕过靠墙壁的两张病床。但奥列格没有迎上前去，有一秒钟可以考虑，再考虑一秒钟，再等一秒……

从那次巡诊后，三天来她一直冷若冰霜，公事公办，没有向他投过友好的一瞥。

起先他心想：见她的鬼去吧！他也可以照样回敬。打躬作揖解释误会他可不干……

但毕竟于心不忍！不忍伤她的心。对自己也不忍。难道他俩马上要象陌路人一样擦肩而过？

他有什么过错？这是她的过错：在打针的问题上欺骗他，阴损他。应该是他不能原谅她，而不是相反！

她眼睛不看对方（但是看见了！）走到他近身，奥列格违

背自己的意愿，用一种温和地请求的语调对她说：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

（愚不可及的语调，但他自己听着舒服。）

她举起一双冷冰冰的眼睛，看见了他。

（说真的，凭什么要原谅她？……）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您是不是肯……再给我输一点血？”

（好象有点屈辱，但还是觉得舒服。）

“您不是拒绝接受输血吗？”她仍然以不宽容的严峻态度望着他，但些许的犹豫在她眼睛里——那双可爱的咖啡色眼睛里——颤动了一下。

（算了，从她自己的角度来看，她并没有过错。在同一所医院里这样互相疏远，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那一次我觉得挺好。我愿意再来一次。”

他脸上堆笑。在这同时，他的刀疤显得有点弯曲，但也显得短了些。

（眼下先原谅她，以后再谈。）

看她的眼神毕竟似有所动——可能已感到懊悔。

“明天也许有血送来。”

她好象还扶着一根无形的柱子，但柱子正在她手下熔化或弯折。

“不过一定要您给我输！一定要您做！”奥列格真心提出要求。“否则我不要。”

她努力不再看他，摇摇头避开这一切，说：

“到时候再说。”

说完，就走过去了。

可爱，不管怎样还是可爱。

然而，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既然无期徒刑已成定局，还谋求什么？

奥列格呆立在通道上，回想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来着？

对了，他要去看看焦姆卡。

焦姆卡躺在仅睡两人的一间斗室里，但另一个病人出院了，新病人要明天从手术室送来。暂时只有焦姆卡一个人睡在那里。

一个星期过去了，被截短的腿上最初那团热辣辣的火焰已经冷却下来。手术正在成为往事，可是腿继续活着，仍象未截去前一样折磨着他。焦姆卡简直可以感觉到截去的那只脚每一个脚趾的搏动。

焦姆卡见了奥列格象看到亲哥哥一样高兴。以前同室的病人也确乎是他的亲人。一些女病人还送了些吃的给他，放在床畔小柜上用餐巾盖着。医院外面却没有人来看他，也没有人捎东西来。

焦姆卡仰卧在床上安抚他的一条腿——实在只剩下膝盖以上一段，一条大腿也不完整，还有就是缠在上面的一大堆绷带。但他的头和手活动自如。

“你好，奥列格！”他握住奥列格伸过去的手。“来，坐下谈谈。病房里怎么样？”

焦姆卡已经离开的楼上那间病房，对他来说是习惯的

天地。楼下这里的护士、工友都是另一些人，规矩也不一样。她们老是相骂吵架，斤斤计较谁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病房里有什么可谈的？”奥列格望着焦姆卡瘦削得厉害、显得怪可怜的面孔。两颊好象被刨出了两道槽，眉额似乎经过辗压，鼻子、下巴都削尖了。“还是老样子。”

“人事干部还在那里不？”

“还在那里。”

“瓦吉姆呢？”

“瓦吉姆的情况不妙。金子没有弄到。现在正担心会转移。”

焦姆卡皱眉叹道：

“真可怜。”听口气似乎他比瓦吉姆年长。

“所以，焦姆卡，你得感谢上帝，你那条腿及时甩掉了。”

“我也还可能发生转移。”

“那恐怕不至于。”

这种致命的个别细胞象黑夜里特务的小船。它们是不是偷渡过来了？在哪里拢岸？谁也看不见。连医生也看不见。

“给你照爱克斯光吗？”

“他们用小车推我去照。”

“小老弟，在你面前的道路很清楚：养好身体，学会使用一根拐棍。”

“不，要用两根拐棍。两根。”

这可怜的孩子把什么都考虑过了。他本来就象大人那样绷着脸，现在更显得老气横秋。

"哪儿给你做拐棍？这里？"

"矫形科。"

"总该免费了吧？"

"我写了申请书。我哪有钱付给他们？"

两人同声叹息——略略有点象年复一年没有欢乐只有愁的那种人的叹息。

"明年你怎么把十年级念完毕业？"

"豁出一条命也要念完它。"

"往后靠什么维持生活？你又不能再站到机床前去。"

"他们答应给残废津贴。不知道算二级还是三级。"

"三级的有多少？"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于各种等级的残废津贴同各种民事法律一样搞不清楚。

"只够买面包，不够买食糖。"

焦姆卡确实象个大人，什么都想得周到。肿瘤千方百计要把他的船凿沉，他照旧掌他的舵。

"还想上大学？"

"要争取。"

"学文学？"

"嗯。"

"听我说，焦姆卡，我认真地劝你：不要把自己毁掉。你还是搞搞收音机的好——生活既安定，还可以赚点外快。"

"让鬼去搞收音机，"焦姆卡扮了个不屑的鬼脸。"我爱

的是真理。"

"你修收音机不也可以讲真理吗，傻瓜！"

两人没谈到一块儿。他们还闲扯了些这样那样的话题。也谈了奥列格的情况。这也是焦姆卡身上完全不同于孩子的一个特征——关心别人。年轻人往往把心思集中在自己身上。奥列格也象对大人一样对他讲了自己的处境。

"哦，真缺德……"焦姆卡咕哝道。

"你恐怕不愿跟我对调吧？"

"鬼知道……"

在一般情况下，焦姆卡在这里照爱克斯光加上做拐棍还得待上一个半月左右，大概五一节前可以出院。

"你打算最先上哪儿去？"

"立刻上动物园！"焦姆卡劲头来了。关于这座动物园他对奥列格不知讲过多少回。以前，他们并排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焦姆卡很有把握地指给他看，动物园隐藏在河那边茂密的树木后面什么地方。多少年来，焦姆卡从书上看到、从广播里听到过关于各种动物的故事，可是从未亲眼见过一只狐狸、一头熊，更不用说老虎和大象了。他所住的地方既没有动物园，也没有马戏团或树林子。他从小就向往着见识见识各种动物；这个梦想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淡忘。他期待着这次会见将给他带来某种特别的感受。他拖着一条疼痛的腿来到此地住院的那一天，第一件事便是到动物园去，不巧那里偏偏是休息日，不开放。"听我说，奥列格！你想必不久就要出院了，可不是吗？"

奥列格弓腰曲背坐在那里。

"想必是这样。血愈来愈支持不下去。恶心实在难受。"

"你难道不到动物园去?!"这是焦姆卡所不能容许的。奥列格倘若不去，焦姆卡会对他有看法。

"我大概会去。"

"不，你一定得去！我请求你。去吧！我要你去了以后寄一张明信片给我，好吗？这对你又算得了什么？……可是我在这里会高兴得什么似的！你把那里现在有些什么动物，什么东西最有意思，写在明信片上，啊？我可以提前一个月知道！你去不去？写不写？据说那里有鳄鱼，有狮子……"

奥列格答应照办。

他走了(需要躺下休息)，而焦姆卡一个人关在斗室里，眼睛望望天花板，看看窗外，独自寻思，隔了好久也没有重新拿起书来。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上面装有光芒花纹的窗栅，而且面向医疗中心的围墙死角。现在墙上连一条直射的阳光也没有，可也不显得阴晦。太阳蒙着薄薄的一层翳，但并没有被云遮住，所以日光不明不暗，曚曚眬眬。这大概是一个比较沉闷的春日，不太热，不太亮。春天正在脚踏实地、不声不响地做她的工作。

焦姆卡一动不动地躺着想愉快的事情：他对截短的腿怎样逐步适应下来；他将学会拄着拐棍走得又快又灵活；五一节前的那一天将同夏天一般无二，焦姆卡从早晨到晚上坐火车离去之前将在动物园里漫步；从今以后他将有充裕

的时间，他要把全部中学课程学完，还要读好多漏读的必读书。今后决不再白白浪费晚上的时间——别的小伙子跳舞去了，而你为自己要不要去而苦恼（去了他也不会跳）。这样的事决不再发生。他一定在灯下用功。

这时有人敲门。

“请进！”焦姆卡说。（“请进”这两个字他说的时候心中很得意。找他的人进来之前先得敲门——他还从来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过。

门被遽然拉开，进来的是阿霞。

阿霞简直是冲进来的，好象后面有人追赶，匆忙得不得了，——但她把门拉上后，却在门框旁立定，一只手握着门把，另一只手揪住晨袍的前襟。

这已经完全不是来“住三天检查一下”的那个阿霞，当时冬季运动场的跑道上还有人等着她不久就回去。她变得憔悴、苍白，甚至不可能变得那样快的一头黄发现在也可怜巴巴地耷拉下来。

而晨袍还是脏得要命、钮扣脱落的那一件，它不知被多少人穿过，也不知在什么锅里煮过。现在这件衣服在她身上看起来倒比原先较为调和。

阿霞望着焦姆卡，她的眉毛微微颤动；是不是跑错地方啦？要不要继续往前跑？

但是，冲着这样一副狼狈相，她比焦姆卡高一年级、多作过三次远途旅行、多懂得不少生活知识这些优越性已不存在；阿霞在焦姆卡眼中同他完全一样了。他高兴地说：

“阿霞！坐下！……你怎么啦？……”

在这以前他们曾闲聊过不止一次，也讨论过腿的问题（阿霞坚决主张不截）；手术后她也来看过他两回，带来了苹果和饼干。虽则他们在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已一见如故，熟不拘礼，但从那以后两人愈来愈熟不拘礼。她也坦率地把自己的病告诉了他（尽管不是一下子就谈出来的）：她的右乳疼痛，经检查发现里边有某种凝块，目前在用爱克斯光治疗，还给她一种药片含在舌头底下。

“坐下，阿霞！坐下！”

她松开握着门把的手，把手放在背后从门上、墙上拖过去，仿佛以此支撑自己或摸索路径，这样慢慢地挨到焦姆卡床的上首旁边一张凳子跟前。

她坐了下来。

坐下后她不是正面看焦姆卡，却把视线从他面前滑过，投在被子上。她并不转脸对准焦姆卡，焦姆卡也不能转身。

“快说，你到底怎么啦？”他竟然一再扮演老大哥的角色！他把枕得高高的头侧向阿霞——光转动脑袋，身体仍朝天仰卧。

她的一片嘴唇开始发颤，眼皮频频翕张。

“阿仙卡！”焦姆卡才叫了一声（实在看她太可怜了，否则是不敢称她阿仙卡的），她立刻扑到他枕上，头挨着头，一小束头发把他的一只耳朵擦得怪痒痒的。

“说呀，阿仙卡！”他敦促着，一边在被子上摸索找她的手，但找不到，也看不见她的手。

而阿霞却对着枕头嚎啕大哭。

“究竟怎么啦？快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他已经料到八九分。

“要——割——掉！……”

她哭着，哭着，后来哭声变成了呻吟：

“哦—哦—哦！”

焦姆卡从来没有听到过象这声可怕的“哦—哦—哦”那样荡气回肠的哀音！

“也许还不一定吧？”他努力安慰她。“也许还能避免？”

但他感觉到，这“哦—哦—哦”所包含的悲痛不是凭他几句话就能平复的。

她把脸埋在他的枕头里啼哭。他已经感到自己头旁湿了一大片。

焦姆卡找到了她的手，开始抚摩，一边说：

“阿仙卡！也许可以不割吧？”

“不……已经准备在星期五动手术……”

她继续拉长了调子发出呻吟，仿佛要把焦姆卡的肝肠都拉出来似的。

焦姆卡看不见她涕泗滂沱的面孔，只是一绺绺的头发往他的眼睛里直钻；那头发软软地擦得他脸上发痒。

焦姆卡想找些话说，但是拼凑不起来，只得把她的一只手握得紧紧的，希望她住哭。他对阿霞的同情超过了对自己的怜悯。

“活——着——还——有——什——么——意——

思？”她抽噎着。“有——什——么——意——思？！……”

对这个问题，焦姆卡从自身模糊的经验中虽然得出了一些看法，但是讲不清楚。即使讲得出来，根据阿霞的呻吟判断，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别的人、别的理由，都无法说服她。从她的经验所能得出的只是：往后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现——在——还——有——谁——会——要——我？……”她伤心得结结巴巴地说。“谁——会——要——我？……”

她又把脸埋在枕头里，眼泪把焦姆卡的一边面颊也沾湿了。

“不能这样说，”焦姆卡竭力劝慰，同时把她的手愈握愈紧。“你不是不知道，结婚主要的条件是……情投意合……性格接近……”

“哪有这样的傻瓜光爱一个人的性格？”她勃然大怒，就象一匹马前蹄腾空直竖起来，把被焦姆卡握着的一只手抽了回去。这时，焦姆卡才看见她湿漉漉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气冲冲而又怪可怜的。“谁要只有一个乳房的姑娘?！谁要？十七岁就被割去！”她冲着焦姆卡大叫大嚷，一切都怪他。

焦姆卡不知道怎样对症下药使她安心定神。

“叫我怎么能上游泳场呢?！”这一刚想到的情况象针刺一般疼得她直喊。“怎么上游泳场！！怎么游泳??！……”她两手捧住脑袋，身体成螺旋状扭曲、抽搦，竟离开焦姆卡向地板上倒下去。

阿霞心痛难忍地想象着各种款式的泳装——带背带的和不带背带的，相连的和两截的，现今的和未来的种种式样，橘黄的和蔚蓝的，深红的和淡青的，素色的和条纹的，镶环形边的，还没有上过身、照过镜子，——可是所有这些游泳衣她永远也不会买，永远也穿不成了！恰恰是她今后再也不可能出现在游泳场这一事实，此时在她想象中是最痛心、最丢脸的！正因为如此，活着已失去任何意义……

而焦姆卡却从高高的枕头上喃喃说着一些傻里傻气、不合时宜的话：

“你知道，万一真的没人要你……当然，我明白，如今我算是个什么人……。否则我随时愿意跟你结婚，这一点你可以相信……”

“听我说，焦姆卡，”一个新的念头螫了她一口，阿霞爬起来面向焦姆卡，睁大一双无泪的眼睛望着他。“注意听我说：你是最后一个！你是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它、还能吻它的人！以后永远不再有任何人吻它了！焦姆卡！至少让你吻吻也好！给你！”

她把晨袍敞开（其实它本来也扣不严实），一边好象又开始啼哭和呻吟，一边把宽松的睡衣领圈往下拉，从里边露出她那厄运已定的右乳。

这象是直接滚到这里来的太阳大放光芒！整个病房顿时灿烂辉煌！嫩红色的乳头（比焦姆卡想象中的大！）浮现在他面前，眼睛简直顶不住这嫩红色的冲击！

阿霞俯身向他的面孔挨得很近很近，就这样托出一只

乳房。

“吻吧！你吻哪！”她等待着，敦促着。

焦姆卡吸着从她怀里给他送来的暖香，怀着感激、狂喜的心情象一头猪崽子用急切的嘴唇拱向这弯溜溜、沉甸甸地悬在他脸上的整个乳房——它保持着固有的轮廓，绘画、雕塑都创造不出比这更柔和、更美的线条。

“你能不能记住？……你能不能记住它曾经有过？能不能记住它是什么样子？……”

阿霞的泪珠扑簌簌落在他头发剪短的脑袋上。

她并不收起来，并不挪开去，于是他重又回到那一片嫩红中去，嘴唇轻柔地做着她未来的孩子已永远不会对这只乳房做的动作。没有人走进来，他吻遍了这悬在他脸上的宝贝。

今天是宝贝，而明天将被扔进垃圾堆。

第二十九章

硬话和软话

尤拉出差刚回来，就到医院来看父亲，一待便是两个小时。事前，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打电话要尤拉把暖鞋、大衣和帽子带来。他对这间可恶的病房以及躺在床上的那些木头脑袋和他们愚蠢的谈话已经腻烦，对穿堂也同样讨厌。尽管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身体非常虚弱，他却向望着呼吸新鲜空气。

于是就这样干了。肿瘤用围巾轻轻地裹起来，虽然头部转动时它还能感觉到，但现在已小得多了。在医疗中心的小径上谁也不会遇见卢萨诺夫，即使遇见了，他穿着混合式的服装人家也认不出来，所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散步不受拘束。尤拉扶着父亲的胳膊。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把大部分重量倚在他身上。在整洁、干燥的沥青路面上一步步挪动腿脚十分舒服，更重要的是从中已经可以感觉到不久即将回去——先回到心爱的家里去休养，然后再回到心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唯被治疗的过程折腾得够呛，还因为在气氛沉闷的医院里无所事事闲得发慌。由于他在一台巨大而重要的机器中停止发挥

十分需要的衔接作用，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力量和意义。他盼望早日回到有人爱他和少不了他的地方去。

这一个星期有寒潮来袭，阴雨连绵，但从今天起又回暖了。建筑物的背阴处还比较冷，地上潮湿；可是在阳光下暖得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连夹大衣也几乎穿不住，以致他把钮扣一颗颗解开。

这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机会可以跟儿子好好谈谈。因为今天星期六算是他出差期的最后一天，他并不急于去上班。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更无需匆忙。而儿子的情况大大不妙，几乎是危险的，这一点做父亲的心里能感觉到。这次公出归来，儿子显然问心有愧，他老是把视线移向一边，不敢正眼看父亲。尤拉小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他一直是个性格爽直的孩子，到了大学时代才出现这种举止，而且单单表现在同父亲接触的时候。这种躲躲闪闪或者羞羞答答的态度使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恼火，有时他干脆对儿子喝道："嗨，把头抬高些！"

不过，今天做父亲的决定克制生硬的态度，一定以体贴的姿态同他谈话。他要尤拉详细讲讲，作为共和国检察监督机构派出的代表，出差到那些遥远的城市去，尤拉从哪些方面表现了自己，崭露了头角。

尤拉开始述说，但比较勉强。他介绍了一两个案例，眼睛始终瞧着旁边。

"你讲下去，再讲讲！"

他们在太阳下一张晒干了的长椅上坐下。尤拉穿着皮

甲克，头戴毛线暖帽（他就是不喜欢戴细毡礼帽），样子似乎严肃而又刚毅。然而内心的虚弱把什么都破坏了。

“还有一个汽车司机的案件……”尤拉眼睛看着地上说。

“汽车司机怎么啦？”

“一个司机冬天运输消费合作社的食品。路程有七十五公里，半道上遇到了暴风雪。路全被雪盖没，轮子转不动，天寒地冻，四野无人。暴风雪刮了一昼夜还不停。他在驾驶室里待不住了，便扔下汽车和一车食品去找地方宿夜。早晨风雪平息，他搞来了一台拖拉机，可是发现短少一箱通心面。”

“那末发货员呢？”

“司机兼发货员，车上就他一个人。”

“制度不严，乱弹琴！”

“当然。”

“所以他就捞了一把。”

“爸爸，他为这一箱东西付的代价可太高了！”尤拉到底举起了眼睛。他脸上出现一种不驯顺的、固执的表情。“为了这箱东西他被判五年徒刑。当时车上还有好多箱伏特加，都完好无损。”

“尤拉，不能这样轻信，这样天真。在狂风暴雪之中，谁还能干这种事？”

“也许有人骑马路过，谁知道？到早晨足迹都盖没了。”

“即使他自己不偷，至少是擅离职守！怎么可以把国家

财产扔下自己走开？”

事情毫无疑问，判决一清二楚，还便宜了他哩！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生气的是儿子不以为然，还得加以开导！在一般情况下，尤拉总是蔫头蔫脑的，可是一旦要证明某一种愚蠢的观点时，却又固执得象头驴子。

“爸爸，你想想：外面在刮暴风雪，气温降到零下十度，叫他怎么在驾驶室里过夜？要知道这样会冻死的！”

“死又怎么样？死又怎么样?！哨兵不是都要站岗吗？”

“放哨站岗，过两个小时会有人来换班。”

“万一不来换呢？要是在前线呢？不管什么天气，哨兵都得站着，即使死在那里也不离开岗位！”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用手指着有人宁死不离岗位的那个方向。“你该想想你在说些什么！如果宽恕了这一个——往后所有的司机都将擅离职守，把国家财产统统偷光，难道你不理解？”

不，尤拉不理解！从他反应迟钝的沉默态度看得出来，他并不理解。

“好吧，这是你的稚气十足的看法，因为你年纪还轻，你可能对什么人讲过。但是，你总不至于在文件上表达这种意见吧？”

儿子干裂的嘴唇牵动了一下，又牵动了一下。

“我……写了一份异议书。已制止判决继续执行。”

“你制止了?！这案件就要复查？哎—呀—呀！哎—呀—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双手捂住半个面孔。这正是他所担心的！尤拉既坏了事，又害了自己，连父亲也脸上无

光。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满腔愤懑无处发泄，想到不能把自己的智慧和能耐灌输给这个不肖，直气得两眼发黑。

他站起来，尤拉也跟着离座。他们一路走去，尤拉又竭力扶住父亲的臂肘，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觉得，即使两只手都用上，也无法使儿子开窍，明白自己错了。

他先向儿子阐释法律、法制及其基础的不可动摇性，如果打算在检察监督机构工作的话，则尤其不能轻率地去动摇这种基础。说到这里，他随即表示，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因此法律管法律，但是也还必须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形势，考虑在某一特定时刻应予考虑的因素。他还特别试图使儿子认识到，国家机器的各级机构和各部门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相互联系；因此，即使受共和国全权委派到某个偏僻地区，他也不应当目中无人，相反应该尊重当地的具体条件，非万不得已不要同当地从事具体工作的干部意见相左，他们对这些条件和要求了解得比你清楚；既然他们判了那司机五年，那就是说，在该地区这样做是必要的。

他们走进房屋的背影处，再从那里走出来；时而沿着笔直的和曲折的小径，时而顺着河岸走一段。尤拉始终默默地听着，仅仅说过这么一句：

"你是不是累了，爸爸？要不要再坐一会？"

你对他磨破了嘴皮子也是白搭！除了驾驶室内冷到零下十度这一点，他从这一案件没有悟出任何道理来。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当然累了，穿着大衣已觉得太热；于是他们在稠密的灌木丛中一张长椅上再次坐下——

灌木只是枝条稠密，本身还是光秃秃的，因为第一批叶耳刚刚从叶芽中伸出来。阳光灿烂。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散步时自始至终不戴眼镜，让面孔和眼睛得到休息。他把眼睛眯缝起来，默默地坐在阳光下。陡岸下江声浩荡，犹如山洪奔流。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听着江声，沐着阳光，心想：重返人间毕竟是极其可喜的，你可以确定无疑地知道，到草木吐绿、万象回春时，你也还活着，而且明年春天亦复如此。

但是必须了解尤拉思想的全豹。必须沉住气，不发怒，以免吓得他把话缩回去。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休息一会后，要儿子继续谈，再讲一些案例。

尤拉尽管反应比较迟钝，但做了什么父亲会夸，做了什么父亲会骂，那毕竟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接下来讲了这样一个案例，估计定能博得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赞赏。但他没有学会说谎，眼睛老是往旁边看；做父亲的意识到儿子必定还把某一个案例瞒着他。

"你把一切都谈出来，都谈出来！要知道，除了明智的忠告，我不会向你提供别的任何东西。我是为你着想。我希望你不要犯错误。"

尤拉叹一口气，讲了如下一件事情。他在检查过程中必须重新翻阅大量过去的司法档案文件，有的甚至已事隔五年之久。他发现，在许多应当粘贴印花的地方（一卢布的、三卢布的），却没有印花。更确切些说，痕迹还留着，说明本来是有的，可是被揭掉了。这些印花哪里去了呢？尤

拉开始寻思、研究，结果在一些最近的文件上发现所贴的印花好象已略有破损。于是他料想到，一定是保管所有这些档案的两个姑娘中的一个——卡嘉或尼娜——把用过的印花贴上去充新的，而钱向当事人照收。

“竟有这等事！”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干咳一声，举起双手拍了一下。“有这么多的漏洞可以偷盗国家财产！这可不是一下子想得出来的！”

但是尤拉悄悄地就此事进行调查，对任何人只字不提。他决定把问题搞一个水落石出，弄清楚两人中究竟谁在舞弊。为了避免启人疑窦，他想出一个办法：先是追求卡嘉，然后又追求尼娜。他带每一个都去看过电影，也上每一个家里去过：要是发现谁家的陈设富丽，地毯豪华——她就是盗窃犯。

“好主意！”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拍手笑道。“很聪明！表面上逢场作戏，同时却在办正经事。真是好样的！”

可是尤拉发现，两个姑娘一个跟父母住在一起，另一个跟一个妹妹同住，生活都很清苦：不仅没有地毯，甚至好多东西按尤拉的观念是万万不可缺少的，她们家里却没有，真不知道这日子是怎么过的。他考虑再三，才把一切都告诉领导她们的法官，但同时要求不就此事依法起诉，只是把两个姑娘惩戒一下了事。法官非常感激尤拉不公开处理此事的主张，因为张扬出去有损法官的威信。他们两人一起先后把两个姑娘叫来训了几个小时。两个姑娘都承认了。据交代，大概每人每月从中捞取百把卢布。

"应当公事公办，应当公事公办！"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表示不胜惋惜，好象是他自己失着了。诚然，也犯不着使法官难堪——这一点尤拉做得很策略。"至少她们应当全部退赔。"

临了，尤拉的语调已变得无精打采。他自己也不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当他去找法官建议不要依法起诉时，他知道并感到自己做得很大度，心中对此决定觉得自豪。他想象那两个姑娘在被迫承认后，准备受处分，不料竟能获得宽恕，她们每一个人都将喜出望外。他和法官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她们指出，她们的行为是何等可耻、何等卑劣。他在自己严厉的声音感染下，从自己二十三年的生活经历中举出他所知道的一些老实人的例子，他们完全有机会进行盗窃，但是他们洁身自好。尤拉用激烈的话鞭挞两个姑娘，心里知道这些话的辣味过后自然会被宽恕所冲淡。两个姑娘获得宽恕后走了，可是在这以后的好些天，她们见了尤拉丝毫没有笑脸相迎，不仅不走近来感激他高尚的举动，反而故作没有看到他。这使他非常惊讶而又大惑不解。如果说她们不懂得自己幸免于什么样的命运，那也说不通，因为她们在法院里工作，对于这一切十分清楚。他忍不住走到尼娜跟前，主动问她高兴不？尼娜对他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现在非换一项工作不可。单靠工资我是没法生活的。"卡嘉长得稍好看些，尤拉请她再去看一次电影。卡嘉回答说："不，跟男人光明正大地出去玩儿我愿意，象这样的事儿我不干！"

出差归来他就带着这样一个疑团，现在他还在想这件事。姑娘的忘恩态度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知道生活比思路笔直的父亲所设想的来得复杂，不料事实上还要复杂得多。尤拉究竟该怎么办？不饶恕她们？还是一声不吭，装做没有发觉印花被重复使用这回事？倘若如此，他的全部工作又有什么必要呢？

父亲没有再问，尤拉也乐得不做声。

这又是一件被笨拙的生手搞糟的事例，父亲据此最后得出结论，一个人小时候要是没有主心骨，将来也不会有。要生自己亲生儿子的气简直不知从何生起，反正非常为他惋惜、懊恼。

他们在户外似乎坐得太久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两腿有点儿冷，很想躺下。他让尤拉吻了他，放儿子走后，自己回病房去。

病房里大伙正谈得热闹。不过，主要发言人的嗓门却没有声音，他就是过去经常来串门的那位仪表堂堂的哲学讲师，从那以后他的喉咙开了刀，日前刚从外科病房转到二楼放射科病房。他喉咙前部最显著的地方插着一个状似少先队红领巾套环的金属玩意儿。这位讲师颇有教养，讨人喜欢，所以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竭力避免伤害他的自尊心，见到喉咙里这个夹子尽量不露出厌恶的怪相。为了使人家多少能听到他的声音，这位哲学家现在说话每次都把一个指头按在夹子上。他素来喜欢讲话，也习惯于发议论，如今动了手术以后，当然要充分发挥失而复得的功能。

他站在病房中央用嘶哑的嗓门(比耳语稍响一些)讲一个故事：

“他把什么都往家里搬！在一间屋子里他煞有介事地摆下一套木头漆成暗金色的家具——靠背、坐位、扶手都包着淡紫色的丝绒。这样的圈椅有四把，还有小沙发。这些古董他是从哪里弄来的？莫非从卢佛宫来的不成？”哲学家由衷地笑了起来。“这间屋子里还有另一套黑漆高背硬座椅子。一架钢琴是从维也纳运来的。一张镶嵌象牙的桌子简直是歌德在魏玛时代的，可是他用垂到地上的绣金蓝色台毯把它盖起来。他在另一张桌上放一座青铜雕像：一个身躯扭曲的裸体女郎手擎好多支火把组成的一个环，只是火把没有点着。这座雕像对那间屋子说来太大了，几乎顶着天花板，它也许应该放在公园里……。他收藏了好多时钟，有挂钟、台钟、竖钟——从基座直耸到天花板；大部分都不走。一只其大无比的玻璃盆大概是博物院的展品，里边却只放一只桔子。我仅在两间屋子里就看到五面镜子，有的镶着栎木雕花框子，有的安在大理石镜架上。还有好多画：海景、山色、意大利街道风光……”

哲学家笑了起来。

“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西布加托夫直纳罕，他跟往常一样两手托住腰部。

“一部分是战利品，一部分是从旧货店里来的。他结识了一个女售货员——他本来到那边去想叫她来给家具估价，结果同她结了婚。从此他俩就合伙经营，凡是到货中值

钱的就把它留下。”

“他本人在哪里工作？”阿赫马章一再问道。

“他哪里也不工作。四十二岁起就退休了。其实他身体棒得很，柴也劈得动！他还有个继女和一个小外孙女和他同住，他跟她们说话动不动就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是一家之主！这房子是我盖的！’手往外套衣襟里一插，走路的神气象陆军元帅。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叶梅里扬，可是不知为什么偏偏家里人管他叫萨希克。你以为他对生活该满意了吧？不，他不满意，总是念念不忘过去他所在的集团军的司令员在基斯洛沃茨克①有一幢十间屋的房子、两部汽车，有自备的烧暖气的锅炉，而萨希克却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大伙都笑了。

不过，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这个故事并不可笑，甚至不合时宜。

舒路宾也不笑。他向所有的人瞪出眼睛，似乎讨厌他们妨碍他睡觉。

“可笑是可笑，”科斯托格洛托夫从倒悬的低处作出反应，“不过……”

“州报上登过一篇讽刺小品。那是什么时候来着？就在前几天，”病房里有人想起一篇文章。“有人用公款盖了一所独幢住宅，后来事发。你们猜结果怎样？他承认了错误，把房子交给儿童福利机构，只给了他警告处分。党籍也

① 北高加索一处休养胜地。——英译者注

没有开除。”

“是的！”西布加托夫也记起来了。“为什么只给他警告？为什么不依法审判？”

哲学家没有读过这篇小品，所以并不打算解释不依法审判的道理，但卢萨诺夫作了解释：

“同志们！既然他悔过了，认识了，还把房子交给幼儿园——何必一定要采取极端措施呢？仁爱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特征……”

“可笑是可笑，”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慢腾腾地说，“不过，请问，这一切——包括有关萨希克和独幢住宅的事情——您从哲学上又如何解释呢？”

讲师摊开一只手（他的另一只手按在喉咙上）。

“很遗憾，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为什么这是资产阶级思想？”

“那还能是什么思想？”瓦吉姆也觉得问得蹊跷。今天他恰恰有看书的情绪，偏偏整个病房开起辩论会来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倒悬状态中抬起头来，脑袋挨到枕头上，以便既看到瓦吉姆，也看到其余的人。

“要问是什么思想，我说这是人类的贪心，而不是资产阶级思想。贪婪的人在资产阶级之前就有，在资产阶级之后还会有！”

卢萨诺夫尚未躺下。他隔着自己的床居高临下用教训的口吻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这类情况如果挖掘一下，总是可以发现资产阶级的社

会根源。”

科斯托格洛托夫摇摇头，不屑地说：

“什么社会根源等等——全是胡说八道。”

“怎么是胡说八道?!”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急忙按住腰部，好象那里被戳了一刀。如此赤裸裸的异端邪说即使出自食骨者之口他也感到意外。

“怎么是胡说八道?”瓦吉姆困惑地扬起两道黑色的眉毛。

“胡说八道就是胡说八道，”科斯托格洛托夫嘟哝着把身子再抬高些，现在已经是半坐半靠了。“而你们的头脑里被塞满了这种货色。”

“塞满什么货色？您对自己的话负不负责任?”卢萨诺夫尖声叫道，一下子劲头也来了。

“‘你们’指的是谁?”瓦吉姆挺直腰板，但一本书仍搁在腿上。

“就是指你们。”

“我们不是机器人!”瓦吉姆摇摇头正色道。“我们并不闭着眼睛接受任何信条。”

“您说的‘我们’是谁?”科斯托格洛托夫龇牙咧嘴地问。一绺额发耷拉在他面前。

“我们！我们这一代!”

“你们为什么要接受所谓社会根源的胡说八道？这压根儿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种族主义。”

“什——么?”卢萨诺夫几乎发出疼痛的吼叫。

“就是这么回事！”科斯托格洛托夫也报以吼叫。

“大家听听！大家听听！”卢萨诺夫甚至打了个趔趄，他舞动双手呼吁全室的人聚拢来。“我要求各位作证！我要求各位作证！这是意识形态破坏活动！！”

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把腿霍地从床上放下，晃着两个肘子向卢萨诺夫做了一个极其粗鄙的手势，还用写在所有围墙上的最下流的话骂道：

“……滚你的蛋，什么意识形态破坏活动！妈的……你们就习惯这一套：只要谁跟你们意见稍不一致，马上就是意识形态破坏活动！”

这种盗匪式的无赖腔、下流的手势和骂人话使卢萨诺夫受到极大的震动和侮辱。他气急败坏，力图戴好滑下来的眼镜。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向着整个病房狂吼，连走廊里都听见了（因为卓娅也探头进来）：

“你们干吗象巫医念咒似地一个劲儿念着‘社会根源’、‘社会根源’？你们可知道在二十年代流行过一句什么话？‘把您手上的老茧伸出来瞧瞧！’为什么你们的手又白又肥？那才是马克思主义？”

“我做过工，我做过工！”卢萨诺夫喊着，但他看不清那个无赖，因为老是不能把眼镜架好。

“我相信！”科斯托格洛托夫瓮声瓮气地说。“我相信！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您甚至亲自抬过一根木头，不过站在中间！而我也许是商人的儿子，属于第三等级，可是我一辈子累死累活地干——瞧，我的手上尽是老茧！——难道

我还是资产阶级？难道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红血球、白血球与众不同？所以我说，您的观点不是阶级观点，而是种族观点。您是种族主义者！”

“什么??我是什么??！”

“您是种族主义者！”科斯托格洛托夫跳起来，把整个高身材挺得笔直，毫不含糊地向他说。

横遭侮辱的卢萨诺夫尖声高叫；瓦吉姆愤慨之余很快地说着什么，但他没有站起来，所以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哲学家也以埋怨的神态摇摇相貌堂堂的大脑袋上梳得光光的头发，可是他那微弱的声音哪里能听得见！

不过，哲学家挨到科斯托格洛托夫紧跟前，趁他换气的当儿向他幽幽地说了一句：

“可是‘世代无产者’这个说法您知道不？”

“哪怕他的十八代祖宗都是无产者，如果他本人不做工，也算不上无产者！”科斯托格洛托夫愈来愈激愤。“他是寄生虫，而不是无产者！他战战兢兢指望的一件事就是领到特种退休金，我听到他这样说过！”奥列格见卢萨诺夫瞠目结舌的样子，决定毫不留情地数落他：“您爱的不是祖国，而是退休金！最好是早日到手，四十五岁就退休！我在沃龙涅什附近负过伤，尽管今天除了一双打补钉的靴子什么也没有，可是我爱祖国！尽管这两个月拿不到一个子儿的病假工资，我还是爱我的祖国！”

他挥动两条长臂，几乎碰到卢萨诺夫。他骤然发起火来参加到这场七嘴八舌的争论中去，一如从前数十次加入

七嘴八舌的狱中争论一样。他现在还记得当初从那里听到的几句话和一些论点，也许说的人已不在世上。他在火头上甚至发生了想象错乱，把这间塞满床位和病人的又窄又闷的病房当作了牢房，因此他口没遮拦地胡乱骂娘，还作好准备在必要时动手打架。

卢萨诺夫感觉到这一点，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这时候慷慨得很，赏几个耳刮子决不吝啬，因此在他的盛怒和压力面前低头吞声。但卢萨诺夫的一双眼睛气得血红，简直要冒出火来。

"我不需要退休金！"科斯托格洛托夫放肆地把胸中的块垒都喊出来。"我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并以此为荣！我什么也不追求！我不要高工资——我蔑视它！"

"嘘！嘘！"哲学家力图制止他。"社会主义规定了报酬有差别的制度。"

"让你们的报酬差别见鬼去吧！"科斯托格洛托夫恣意撒野，固执得象头驴子。"难道在通向共产主义的路上一部分人拥有、另一部分人没有的特权就应该扩大？难道为了使人人平等就应该先使大家不平等？这才是辩证法，是吗？"

他大叫大嚷，但叫嚷使他胃上部作痛，这样就造成他的声音发颤。

瓦吉姆几次企图进行干预，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愈来愈多的论点，象舞动警棍似地乱挥乱抛，速度之快使瓦吉姆招架乏术。

"奥列格！"他尝试叫他刹车。"奥列格！批评一个还刚

刚在形成中的社会是最容易不过的。但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才四十岁，甚至还不到。”

“我年纪也不比它大呀！”科斯托格洛托夫迅速作出反应。“而且将永远比它小！难道说因此我就该一辈子不开口？”

哲学家做一个手势要他稍停，并为自己喉咙有病请求原谅，接着嘶嘶地讲了一些关于医院里刷地板的人和领导整个卫生事业的人对社会贡献不同的道理。

科斯托格洛托夫本来还要吼叫一通邪门歪道的怪论予以回敬，忽然，被大家遗忘了的舒路宾从老远的门旁角落里走过来。他笨拙地挪动腿脚挨近他们，照例是那样仪容不整饬，晨袍拖拖拉拉，象半夜里被突然叫醒似的。大伙见了都一愣。而他站到哲学家面前，举起一个指头，在一片肃静中问：

“《四月提纲》[1]的内容您知道不知道？”

“谁不知道它的内容？”哲学家微笑道。

“您能逐条列举吗？”舒路宾用很重的喉音盘问。

“不一定要列举，尊敬的先生。《四月提纲》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那里有这么一条，”舒路宾牵动了一下两个圆圈——一双病态而疲惫的鼻烟色红眼睛——上面的浓眉，开始背

---

① 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后于1917年4月阐述的革命纲领。——英译者注

诵："'一切官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①！革命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是这样吗？"讲师感到惊讶。"我记不得。"

"回家后好好去查一查。因此，州卫生局长不应当拿得比那个奈丽亚多。"

说着，他在哲学家面前摇摇一个指头作不许可状。然后，他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哈哈！哈哈！"科斯托格洛托夫得到这意外的支持，高兴极了。这个论据对他说来真是雪中送炭，老头儿帮了大忙！"服输了吧？"

哲学家整一整喉头的夹子，一时无言对答。

"奈丽亚本来就挺好嘛，难道不是吗？"

"那末就换戴眼镜的女勤工为例。反正她们都拿一样的工资。"

卢萨诺夫索性坐下来别过头去。他再也看不得科斯托格洛托夫，极度的憎恶使他浑身哆嗦（但是，有鉴于奥列格的胳膊长、拳头硬，他不敢采用行政手段），而对于角落里那只令人反感的猫头鹰，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就讨厌他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家伙再也说不出更中听的话，居然把州卫生局长同刷地板女工扯在一起拉平工资！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顿时大家纷纷散去，科斯托格洛托夫失去了继续抬扛的对象。他也已经把胸中的积郁一齐喊了出来。经过这一

---

① 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 卷第 15 页。——中译者注

番大叫大嚷，他把自己的五脏搅动得很厉害，说话已感到疼痛。

这时，始终未曾起床的瓦吉姆招招手叫他过去坐在床沿上，开始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

“奥列格，您使用的尺度不对头。您的错误在于把现实同未来的理想混为一谈。您应该把今天同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国历史上的脓疮相比。”

“我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不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打了一个呵欠。

“用不着自己生活在其中，这不难了解。只消读一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的作品，不必看其他参考书。或者同装潢门面的西方民主作一个比较；在那里，您永远别想争取到自己的权利、正义，连象一个人过的生活也争取不到。”

科斯托格洛托夫又打了一个倦怠的呵欠。抬杠的犟劲象一团火，点燃得快，灭得也快。肺部的运动使他的胃或肿瘤感到剧痛，这意味着他不能大声说话。

“您在部队服过役没有，瓦吉姆？”

“没有，您问这干吗？”

“怎么会没有的呢？”

“我们在大学里受过高等军事训练。”

“啊—啊……可我在部队里待过七年。当一名军士。当时我们的部队名叫工农红军。一个班长拿二十卢布，一个

---

①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89）——继果戈理之后俄国最杰出的讽刺作家。——中译者注

排长拿六百卢布，您可明白？在前线，军官可领补充军饷——饼干、黄油、罐头；他们吃饭的时候躲开我们，懂吗？因为他们不好意思。我们先得为他们造掩蔽部，然后再给自己造。我当过军士，我再说一遍。”

瓦吉姆皱起眉头。这些事实他并不知道，但是对这一切当然也应该有一种合理的解释。

“您对我讲这些是什么用意？”

“用意是想问：这里头哪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谁有资产阶级思想？”

奥列格今天话已经说得太多，然而他感到一种既沉痛、又轻松的心情，因为他无需担心失去太多的东西。

他又打了个出声的呵欠，然后回到自己床位上去。他又打了个呵欠。接着又是一个。

是累了吗？是病体使他感到倦怠吗？还是由于所有这些辩论、反驳、术语、火气和恶狠狠的目光一下子在他的观念中成了泥淖中嘎吱嘎吱的响声，同他们的病，同他们即将面临死亡的前景相比显得太不足道的缘故？

他想望着接触某种与这一切完全不同的、纯洁的、不可动摇的东西。

可是哪里有这种东西呢？奥列格不知道。

今天上午他收到卡德明夫妇的来信。大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顺便回答了他问起的一句话——“软话折骨”——的出处。还在十五世纪，俄国有一部《经史诠释》，大概是一种手抄本吧。里边讲到基托弗拉斯的事。（关于那些老古

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照例都知道。)基托弗拉斯住在遥远的旷野里，他只会笔直朝前走。所罗门王把基托弗拉斯召去，用计把他拴在链条上，让人把他牵去凿石头。可是他只会笔直朝前走，当他被牵着经过耶路撒冷时，只得把他所到之处的房屋尽行拆毁，为他开路。路上要经过一个寡妇的一所小屋。寡妇哭哭啼啼哀求基托弗拉斯不要拆毁她那简陋的小屋，终于打动了他的心。基托弗拉斯开始扭动身体、挤挤撞撞，结果折断了一根肋骨。寡妇的房子却保全了。当时他说过这样两句话："软话折骨，硬话惹怒。"

现在奥列格寻思着：这位基托弗拉斯和十五世纪的史官如果是真正的人，我们与他们相比只是一群狼。

如今谁听了软话愿意折断自己的肋骨？

但这还是卡德明夫妇的信的开头（奥列格从床头小柜上把信摸到了)。他们写道：

亲爱的奥列格！

我们遭到了大不幸。

茹克被打死了。

镇苏维埃雇了两个猎人用枪打狗。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开枪。托比克被我们藏了起来，可是茹克冲出去向他们狂吠。它素来连照相机的镜头都怕，大概有这种预感！它被枪弹打中了一只眼睛，倒在灌溉渠边上，头垂向渠道。我们走到它跟前时，它还在牵动；它的身体是那么大，牵动的惨象实在不忍卒睹。

您可以想象，屋里变得空荡荡了。我们感到对不起茹克：我们没能把它阻挡住、藏起来。

我们把它埋在花园角落里亭子附近……

奥列格躺在床上想象茹克的模样——不是被打死后一只眼睛淌着血、脑袋垂向沟渠的模样，而是它来到奥列格小土屋前用两只前爪和一颗长着熊耳朵的和善可亲的大脑袋遮住窗子叫他开门的情状。

一条狗就这样被打死了。

为什么呢？

第三十章

老医生

奥列宪科夫医生在世上度过了七十五个年头，给人治了半个世纪的病，未能挣得砖石结构的高大楼房，但总算买下一所带小花园的单层小木屋。那还是二十年代的事，从此他就住在那里。小木屋坐落在一条僻静的街上，不但有广阔的林荫马路，还有宽敞的人行便道，使房屋同街面足足隔开十五米。便道上在十九世纪就栽着一株株粗干大树，到了夏天，树梢连接成蔽日的绿盖。每一棵树下面的土都被翻松，拾掇得干净齐整，用铁篱栅围起来。盛暑中，人们走在路上，不觉得骄阳逼人。便道旁铺瓦的灌溉沟里流动着清凉活泼的渠水。这条穹顶覆盖的街道环绕着本城建筑最牢固、市容最漂亮的一个地区，它本身便是该地区最美的装饰之一。（不过，市苏维埃里也有人嘀咕道，这些平房零落分散，占地太广，装置各种设备费用甚贵，该把它们拆去后另行建造五层楼房。）

公共汽车并不挨近奥列宪科夫家门停靠，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徒步走上一段。这是一个十分暖和、干燥的傍晚，天色尚未昏暗，还看得见或多或少地披着柔嫩绒

毛的树木在准备过夜，而状似蜡烛的白杨还完全不见绽青。但是董佐娃眼睛只瞧着自己脚下，不往上看。这一年的春天并无欢乐可言，一切都在未定之天，谁也不知道：等这些树木长满绿叶、到秋天变黄脱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会怎样。过去她也老是忙得没工夫停下脚步，昂起头来，眯着眼睛端详一番。

奥列宪科夫的小屋并排装有两扇门：一扇是木板边门；旁边就是带铜把的老式正门，镶着金字塔形状的沉重嵌板。在这种房子里，象这种年事已高的正门每每被钉死，必须由边门出入。但这里门前的两磴石阶却没有长出荒草和青苔，而镌着手写斜体"多·吉·奥列宪科夫医生"字样的一块铜牌依然擦得锃亮。碗状的电铃也不是弃置不用的样子。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按动那个电铃。在一阵脚步声后，奥列宪科夫身穿一套当年很体面的褐色旧西装，敞着衬衫领子亲自前来开门。

"啊，柳多琦卡，"他只略微抬起嘴角，但这在他已经意味着最宽广的笑容。"我正在等您，请进。我很高兴，不过又不高兴。您来看我老头儿不会有什么好事。"

董佐娃曾给他打电话求见。她本可以把求他的事在电话中全部讲出来，但这样不大礼貌。现在她怀着歉意向他解释，她来看他不一定有什么坏事。其时奥列宪科夫正忙着帮她脱去大衣，不让她自己动手。

"让我来，让我来，我还不是一堆废墟！"

他把她的大衣挂在为许多来访者或客人备着的深色抛

光长衣帽架上，带领她踩着漆得很光滑的地板往里走。他们沿着走廊经过屋内最好、最亮的一个房间——里边放着一架大钢琴，谱架竖起，乐谱翻开，给人生气勃勃的感觉，那是奥列宪科夫的大孙女儿住的；穿越饭厅——它那向着院子的窗户被现在干瘪的葡萄串所掩，室内有一架很值钱的收音电唱两用机；来到四壁完全围着书橱、里边摆着一张笨重的老式写字台、一张旧沙发和几把圈椅的书房。

"我说，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董佐娃眯着眼睛环顾四壁。"据我看，您的书比以前更多了。"

"没有的事，"奥列宪科夫略微摇摇他那象是金属浇铸的大脑袋——他只是略微摇了摇，因为他所有的动作都控制在最小的幅度之内。"不过，前不久我确实买进了二十来本，您可知道是谁卖出来的？"他略微现出欣喜的神色，但也只是那么一丁点儿，必须对他习惯下来，才能发现这些细小的差别。"是卡兹纳切耶夫。他退休了，年纪刚满六十岁。就在那一天，大家才发现他压根儿不愿当放射科专家，他不愿再跟医学多打一天交道，敢情他素来就喜欢养蜜蜂，今后将把全副精力放在养蜂上。怎么会这样的呢？既然你喜欢养蜜蜂，何必把自己的盛年耗费在旁的事情上？柳多琦卡，您打算坐哪儿？"他问头发花白、已经有了外孙女的董佐娃，口气完全象在问一个小女孩子。他随即代她出了一个主意："您坐在这把圈椅里一定会觉得挺舒服。"

"我并不打算久坐，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一会儿就走，"董佐娃虽如此说，但已经深深地坐进那把柔软的

圈椅，而且立刻感到放心，甚至差不多确信即将在这里作出的决定必定是个上策。经常要负责的重担，作为一个头头的重担，她必须为自己的生命作出抉择的重担——这一切还在走廊里的衣帽架旁就已经从她肩上卸下，等她坐到这把圈椅里，干脆被彻底丢在脑后。她怀着轻松的心情从容不迫地环视这间她所熟悉的书房，看到屋角一只旧的大理石洗手盆——不是新的洋瓷水斗，而是下面放着水桶的洗手盆，但全部都被罩起来，非常清洁——她深受感动。她直接望着奥列宪科夫，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健在，会替她分忧。奥列宪科夫还站着。他站得笔直，丝毫没有龙钟之态，肩膀线条还是那样硬朗，头部轮廓还是那样精神。他的神态永远那样信心十足，仿佛给别人治病自己就绝对不会生病。从他下巴的正中垂下一绺修剪齐整的疏朗银须。他还没有秃顶，须眉也未全白，左右分梳的头发还算光滑，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样。他的脸属于不为任何感情动容的一种类型，五官始终保持平整、安静，不擅离位置。只有向上拱曲的眉毛通过微乎其微的位置变动指示着感情起伏的整个幅度。

"请原谅，柳多琦卡，我就坐在写字台旁边。请不要把这看成一种正式的架势。我无非在那里坐惯了。"

要是他没有坐惯，那才怪呢！当年，经常有病人到他这间书房里来，几乎每天都有；后来人少了些，但直到如今还有。医生和病家往往在这里坐上很久，进行命运攸关的痛苦交谈。在这席迂回曲折的谈话过程中，可以叫你终生铭

记铺在深褐色栎木边框中央的绿色台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纸木刀，或一块镀镍的压舌板(用于检查咽喉)，或一组台历，或一只铜盖墨水缸，或在杯中冷却了的极酽的红茶(颜色深如波尔多葡萄酒)。医生坐在自己的写字台旁，有时需要让病人暂时摆脱他的视线思考一番，就站起来向洗手盆或书橱那边走过去。一般说来，奥列宪科夫医生的一双始终聚精会神的眼睛非必要时决不把视线移开去看看窗外，决不垂向桌上的文件，决不浪费准备用于观察病家或来客的每一分钟。这双眼睛是主要的仪器，奥列宪科夫医生通过这双眼睛摸清病人和学生的情况，向他们传达自己的决心和意志。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一生受过许多迫害：一九〇二年是因为参加革命活动(当时他同其他几个大学生一起坐过一个星期班房)；后来因为他死去的父亲是个神甫；后来又因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当过沙俄军队的旅军医——不仅如此，据证人肯定，在一个团仓皇溃退的时刻，他曾跃上战马，重整军容，把那个团重新拖进这场帝国主义大混战，去屠杀德国的工人。然而，奥列宪科夫遭到持续最久、最难忍受的迫害却是因为他坚持开业行医的权利，偏偏这项职业处处被禁，愈禁愈严，说它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是非劳动行业，无时无处不在滋生着资产阶级。有若干年，他不得不摘下医牌，不管病人如何恳求，不管病情多么严重，一律把他们拒于门外，因为邻近有的是自愿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家本人也难免会说出去——这可

能导致医生丧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偏偏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最珍视私人行医的权利。如果门上缺少这块镌字的铜牌，他就象过着冒名顶替的地下生活。他奉行绝不谋取副博士或博士学位的原则。他说，学位丝毫不能证明日常治病取得成就，如果医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会感到拘束，有时间花在写学位论文上，还是多研究一种学派的理论为宜。单是在本地的医学院里，三十年来奥列宪科夫先后在内科、小儿科、外科、泌尿科乃至眼科病院以及传染病院都工作过，然后才成为放射科和肿瘤病专家。他顶多只通过嘴唇一毫米的扭动来表示他对"功勋科学家"的看法。他说，一个人要是活着就被授以什么家什么家的称号，还要冠以"功勋"之衔，这个人可以休矣；荣誉会妨碍一个医生治病，犹如穿了过于华丽的衣服会妨碍行动一样。"功勋科学家"所到之处，总是跟着一帮子人，好象某个新出现的基督带着一群使徒，从此他就被剥夺犯错误的权利，被剥夺不知道某事某物的权利，甚至被剥夺思考的权利；他可能自满、委靡或落后于时代并力图掩饰这一点，而所有的人却等着非要他创造奇迹不可。

凡此种种，奥列宪科夫一概不要，他只要在门上钉一块小小的铜牌，装一只路人够得着的铃钮。

感谢命运的安排，有一次奥列宪科夫总算救活了当地某主要领导人的一个垂死的儿子。另一次则救了领导人自己，此领导人虽非彼领导人，但也是位大高干。又有几次还救了若干显要家族的成员。这一切都发生在本市，因为他

从来不去外地。就这样，奥列宪科夫医生在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中间确立了声望，在他周围居然出现一圈保护性的光轮。在纯粹的俄罗斯城市里，也许这对他仍然无济于事；但在比较好说话的东方城市里，人们可以对他重新挂牌接受门诊一节视而不见。战后他索性不在任何地方担任固定职务，但给好几所医院当当顾问，并出席各学会的会议。因此，从六十五岁起，他就不受阻碍地过着自己认为一个医生应该过的那种生活。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来求您一件事：您能不能来看一下我的肠胃道？……哪一天对您方便，我们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灰暗，声音虚弱。奥列宪科夫用平稳的目光不转瞬地望着她，折曲成角的双眉并不显露一丝半毫的诧异。

“没有问题，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们就定一个日期。不过，您还是把症状先说给我听听。同时也谈谈您自己的想法。”

“症状我这就可以告诉您，可是我自己的想法该怎么说呢？您要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它！事实上，我对这件事想得太多了，夜里睡不着觉，最好我自己压根儿不知道！这是真心话。您如果作出决定要我住院，我就住院，可是事情的究竟我不愿知道。如果要动手术，最好不要让我知道诊断意见，免得在手术台上胡思乱想：‘他们现在大概在做什么？他们正在把什么东西往外掏？’您明白不？”

不知是圈椅特别大，还是她的肩膀下陷的缘故，此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看上去不象一个身躯高大的女人。她缩小了。

"您的心情我也许能理解，柳多琦卡，但是我不以为然。您干吗一下子就谈到动手术？"

"思想上应当作好一切准备……"

"那您为何不早来？您应该懂得的。"

"唉，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董佐娃喟叹一声。"生活就是这样，一件事没忙完，另一件又接了上来。当然，应当早一点来……不过我也还没有过于耽误，您别这样想！"她象是在自己跟自己争辩，说话又恢复了那种急速切实的一贯作风。"但这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是一个肿瘤病医生，对于个中情形一清二楚，对于各种伴随、预后、并发现象都能想象，为什么肿瘤病偏偏会临到我自己头上？这未免太不公平……"

"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他低沉浑厚、节奏清晰的嗓音很有说服力。"相反，这是极其公平合理的。害上属于自己专业范围的病——这对医生来说是一次最准确的测验。"

（这怎么谈得上公平？这还有什么准确可言？他这样说，无非因为他自己没害上这种病。）

"您记不记得护士巴妮亚·菲奥多罗夫娜？她常常说：'哦，我对病人怎么这样不体贴啊？看来我又该自己去住一阵医院了'……"

"我决没料到自己会这样紧张！"董佐娃把手指互相握

得格格响。

尽管如此，在这几分钟内，她还是比最近一个时期减轻了一些焦虑。

“您觉得自己身上究竟有哪些症状？”

她开始述说，先只是说一个大概，可是奥列宪科夫要她尽量详细介绍。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可完全没有打算占去您整个星期六晚上的时间！既然您反正要来给我作爱克斯光透视……”

“难道您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异教徒？我在使用爱克斯光之前已经工作了二十年，那时照样作出诊断，亲爱的！事情就象使用照相曝光表或时计一样：有了这些玩意儿，你就完全丢了凭目力判断曝光度或凭感觉估计时间的本领。要是手头没有这些玩意儿，你很快就能凑合。”

于是董佐娃把各种症状加以细分和归纳，竭力不让自己漏掉那些可能引出毁灭性诊断的细节。（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希望略去某些微末处，希望听到他说：“您别疑神疑鬼，柳多琦卡，没什么了不起。”）她还谈到血液组成不妙，血沉偏高。奥列宪科夫听完了她的全部自述，另外提了几个问题。有时他点点头，似乎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这是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寻常现象，但终究未说“没什么了不起”。董佐娃心中闪起一个念头：实质上他大概已经作出了诊断，甚至此刻就可以直接问他，不必等到透视那一天。但是，此刻直接问他，从而预先知道答案，且不管正确与否，反正立即知道答

案——这实在可怕。无论如何得拖延一下，无论如何得通过几天的等待减轻这下打击的力量！

他们在一些学术性会议上见面时的交谈是多么亲切啊！可如今她前来象承认罪行一般说出自己的病症，他们之间的平等之弦一下子就断了！不，平等在他们师生之间本来就谈不上，情况比这更为严重：通过这番自述，她把自己从高贵的医生阶层中排除出来，转而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诚然，奥列宪科夫没有提出立刻扪触患处。他继续把她当作客人与之交谈。他仿佛建议她同时在两个阶层中存身，然而她精神上已经垮了，不能再保持原先的自制力。

“说实在的，薇珞琦卡·甘加尔特现在的诊断水平已足够叫我信得过她，”董佐娃说话还是那样急速地一气呵成，这也是排得紧紧的工作日程使然。“不过，既然有您在，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决定……”

“要是我把自己的学生撂手不管，那还象话吗？”奥列宪科夫继续盯着她瞧。此时董佐娃虽看不太清楚，但她已经有两年工夫注意到奥列宪科夫专注的目光中经常闪现出一种超然的神情。这是在他老伴死后出现的。“如果确乎有必要……病休一个时期，让薇珞琦卡顶您的工作，行不行？”

（“病休一个时期”！他使用了最温和的措辞！这就是说，她不是什么也没有？……）

“行。她已经成熟了，她完全可以主持放射科的工作。”

奥列宪科夫点点头，捋捋一绺疏朗的清须，说：

"成熟是成熟了，可是结婚了没有呢？……"

董佐娃摇摇头。

"我的孙女儿也是这样。"奥列宪科夫毫无必要地把嗓门压得很低。"怎么也找不到合意的人。事儿真难办。"

他的双眉通过角度的细微移动反映了内心的不安。

他自己提出抓紧时间星期一就给董佐娃进行透视，不要耽搁拖延。

（他为何如此匆忙？……）

对话出现了冷场，此时也许以离座道谢告辞为宜。董佐娃从圈椅里站起来。但是奥列宪科夫坚持要她喝一杯茶。

"我一点儿也不想喝！"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竭力向他解释。

"可是我想喝！现在正是我喝茶的时候。"

他努力把她从罪恶的病人行列里往无望的健康人行列里拉！

"您那小俩口在家吗？"

其实，所谓"小俩口"的年龄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相上下。

"不在家。孙女儿也不在。只我一个人。"

（他们在书房里这次会见毕竟具有门诊的性质！因为只有在此地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和影响。）

"这么说，还得由您为我张罗？那可不成！"

"我可用不着张罗。保暖瓶里有满满一瓶茶。至于各种糕饼小吃，都在食橱里，您去拿来得了。"

于是他们挪到饭厅里去坐在一张栎木方桌角上喝茶。这张桌子容得下一只大象在上面跳舞，可要是想把桌子从那里搬走，恐怕从任何一扇门里都出不去。墙上的挂钟年纪也不轻了，它告诉人们，时间还不太晚。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开始谈他心爱的孙女儿的事。她前不久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弹得一手好钢琴，资质既聪明（这在音乐家中是不多见的），人品又出众。奥列宪科夫还把她的一张近影给客人看，但他说话不多，不强求以有关他孙女儿的话题吸引住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全部注意力。再说，她已不可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因为她的心思已分散得七零八落，再也集中不起来。同桌的老人已经能设想你所面临的危险的程度，他或许连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也已经预见到了，可是他只字不提，只是把饼干推过来敬客——跟这样一个人坐在一起若无其事地喝茶，你道怪是不怪？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有可谈的题目，但不是关于离婚的女儿（这事提起来太觉伤心），而是关于儿子。儿子读到八年级，忽然心血来潮地宣称，他认为继续念书毫无意思！父母亲都找不到论据说服他，所有的论据对他都不起作用。比方你说：应当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就反问你："为了什么？"文化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子过得快活！"但是不念书你就学不到一技之长！"我才不要呢。"你愿意当个普通工人？"不，要我当牛马我不干。"那你靠什么过活呢？"总有办法的。只要有头脑。"他结交了一些行

迹可疑的人，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相当担心。

奥列宪科夫的表情似乎说明，即使不听她讲，这故事他也早已听说了。

"我们的年轻人需要各种导师，可是他们还失去了一位很重要的导师——家庭医生！"他说。"女孩子到十四岁，男孩子到十六岁，必须让他们同医生谈心。不是在四十个人的教室里（即使这样的谈话现在也不组织），也不是在学校的医务室里，每三分钟放一个人进去。这必须是从小给他们检查咽喉、经常在他们家喝茶的那位医生伯伯。这位没有成见、善良而严厉的医生伯伯可不比父母，孩子撒娇撒痴对他不起作用，要是他忽然同女孩子或男孩子关在房间里举行奇怪的密谈，这种谈话必定是羞人答答而又极有意义的。在那里，对年轻人不必作什么盘诘，医生自会猜透一切，自会回答各种最主要和最难于启齿的问题。说不定他还会把年轻人叫去再这样谈一次心。要是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医生不仅可以告诫他们不要犯错误，防止放纵不良的冲动，免得戕害身体，还有助于澄清和端正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只要他们在最放心不下的问题上，在最主要的探索方面得到谅解，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毫无希望得到谅解。从那一瞬间起，他们也就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其他各种论点。"

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自己提到了儿子，才引出奥列宪科夫这一通议论。由于儿子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此时她正该好好听一听，想一想，如何把这些意见运用到儿

子身上去。奥列宪科夫的话声洪亮悦耳，尚未露出半点苍老的沙音；眼睛奕奕有神，使他的语言更加生动中听。然而，董佐娃注意到，刚才在书房的圈椅里一度使她头脑冷静的内心恬适正在一分钟比一分钟减少，一种浑浊、迷惘的感觉在胸中徐徐升起，她仿佛失去了什么，甚或当她倾听这番真知灼见的时候也正在失去着什么；真想离座起身，匆匆辞去，尽管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为什么缘故或者有什么目的。

"说得对，"董佐娃表示同意。"我们忽视了性知识的教育。"

"我们往往认为孩子象野兽那样，应当一切让他们自己去体验。于是他们就……象野兽那样去体验。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告诫他们提防变态倒错，因为头脑里有一个先入之见，以为在健全的社会里所有的孩子一定都是正常的。于是他们不得不背地里以不正常的方式去互相体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给自己的孩子拨正方向，可就是不管这一个方面，因为这是'见不得人的'。故而有时会遇到一个成年女人，她从来没有领略到所有这些感觉，原因无非是男的不懂得第一夜该如何对待她。"

"喔，是这样，"董佐娃说。

"确实是这样！"奥列宪科夫断然加以肯定。他注意到董佐娃脸上这种动荡的不安、焦躁的惶惑。其实，既然她不愿意知道真相，又何必在星期六晚上再三述说症状？星期一只消站到爱克斯光屏幕后面即可。应该通过闲谈让她散

散心，可是两个医生之间还有什么更合适的话题呢？“总而言之，家庭医生是个最合适不过的角色；少了他，一个家庭在发达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正象做母亲的知道家里每一个人的口味一样，家庭医生应当了解每一个成员的需要。任何小毛小病向家庭医生诉说都不难为情，而为了这点病痛人们是不愿上门诊所去的，因为那里必须挂号等候，那里规定一小时得看九个病人。可是被耽误的病症无不起于小毛小病。比如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正不知有多少成年人象有满腹心事的哑巴在干着急，他们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位大夫，找这样一个人，以便向他倾诉最秘密的心里话，甚至向他吐露最难说出口的忧虑。要知道，找大夫这件事本身即使跟朋友有时也不便商量，更不能在报上刊登启事，其微妙处简直跟找对象差不多！但在我们的时代，要找一个愿意充分关心你的健康而又对你彻底了解的大夫，甚至比找一个如意的对象更难。”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眉头打结。这些都是空泛的议论。而盘旋在她脑海中的却是症状、症状，它们竭力想排成最糟糕的序列。

“话虽不错，可是这就需要多少家庭医生？这跟我国的人民普及免费医疗制度是不相适应的。”

“要说‘普及’、‘人民’——也许可以。要说‘免费’——则不然，”奥列宪科夫浑厚的声音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免费医疗是我国主要的成就。”

“成就真是那么了不起吗？什么叫‘免费’？医生们又

不是免费工作的。只不过不是由病人，而是由国家预算付给他们报酬；至于预算，还不是从病人那里来的？这种医疗不是免费的，只是与本人不直接发生关系罢了。倘若钱由病人保管，一张十卢布的钞票还会在他手中倒几个过儿。如果确有必要，他会自己去看五次医生。"

"这叫他怎么负担得起呢？"

"要是身体垮了，他即使买了新窗帘、添了新皮鞋又有什么用？难道象现在这样的局面更好些？倘若医生能真心诚意地看一次门诊，病人花多少钱也心甘情愿。可是如今你想花也没处花，因为到处都讲定额、指标，没谈上几句话，医生就得叫下一个名字。即使在收费的医院里也是一样，那里病人的流转速度甚至更快。上那里去是为了什么？无非为一纸病假单或伤残证明。医生就得戳穿弄虚作假的病人。结果，病人和医生如同冤家对头——这难道能叫做医学？即以药品为例。在二十年代，我国曾实行药品全部免费。您还记得不？"

"真的吗？好象有过。我已经忘了。"

"难道您已经忘了？当时药品全部免费。可是后来不得不放弃这个办法。您知道为什么缘故？"

"大概国家开支太大了吧？"董佐娃勉强说，同时接连眏了好一阵子眼睛。

"不完全如此。还因为过于浪费。病人照例什么药都要，因为反正不花一个子儿，后来一半都扔掉。当然，我并不主张全部医疗都应该收费。但是初级医疗一定得收费。等到

确定病人必须住院接受器械治疗，那时免费才合理。不过即使如此，就拿你们医院来说：为什么动手术只有两个外科医生承担，另外三个外科医生在一旁闲着？因为他们反正有工资可拿，又何必担什么心？要是钱在病人手里，保管没有一个病人会去请教他们，那时你们那位哈尔穆哈默德夫或潘焦兴娜的日子可就没那么安稳了！柳多琦卡，不管通过何种方式，总得让医生有赖于他对病人留下的印象，有赖于自己的名望才对。可是在我国就不是这样。”

“求上帝保佑，不要让我们医生依赖所有的病人吧！象那个专事无理取闹的波利娜·扎沃奇科娃，如果我们也得依赖她……”

“对，也得依赖她。”

“这太欺人了！”

“难道依赖院长就好些？难道象一名官吏那样领取薪俸就诚实些？”

“碰到一些象拉宾诺维奇或科斯托格洛托夫那样喜欢刨根究底的病人，老是用一些理论问题跟你纠缠不休，难道每一个问题都得回答？”

奥列宪科夫高峻的额上没有挤出一道皱纹。他对柳德米拉·董佐娃的水平素来了解，那不是一般的水平，她善于独立思考，也善于处理十分困难的病例。她在杂志上发表过并非洋洋洒洒的许多小文章，其中介绍了近二百例诊断学上的疑难杂症。这正是医学上最棘手的问题。难道还要求她做得更多？

“对，每一个问题都得回答，”他安详地点点头说。

“哪来这么多时间呢？”董佐娃感到很气愤，渐渐地已被这次对话所激动。他趿着家常拖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自然可以说风凉话。“您可想象得出来，目前医疗单位的工作紧张到什么程度？您没有亲身经历的体会。如今一个医生要管多少病人哪！”

“在健全的初级医疗体制下，”奥列宪科夫提出不同看法，“病人自会减少，而且没有被耽误的。一个初级医生管的病人人数，应以他的记忆力和个人知识水平对付得了的程度为限。那时他才能把病人作为综合体进行治疗。头痛医头是医士的水平。”

“哦，”董佐娃疲乏地叹道。好象他们的私人谈话能改变或扭转什么大局似的！“把病人作为综合体进行治疗谈何容易啊！”

奥列宪科夫也看出到了该刹车的时候，可是年纪大了，不免喜欢多说几句。

“但是病人的机体并不知道我们的学问分成各种科目！机体是不分科目的！伏尔泰说过：医生对自己开的药并不了解，对于准备把药投入的机体了解得更差。试问：局部解剖医生只解剖尸首，给活人开刀就不是他的专业；放射科医生靠骨折病例名噪一时，肠胃道就不是他的专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谈得上把病人作为综合体来研究？因此病人老是象篮球被一位‘专家’扔给另一位‘专家’，正因为如此，一个医生才会始终保持养蜂的癖好。如果你想要把

病人作为综合体来研究，任何其他爱好在你身上必将再也容纳不下。事情就是这样！甚至医生自己也必须是综合体！甚至医生自己！"

"甚至医生自己！"董佐娃发出的差不多是一声呻吟。在头脑清醒、精神振奋的状态中，她对这类海阔天空的议论当然会感兴趣，可是现在，这些话只能加重她的精神负担。此刻她的思想集中不起来。

"而您正是这样一位医生，柳多琦卡，不要妄自菲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在革命前当地方自治局医生的，都是这样的临床医师，而不是行政官员。可是现在，一所区级医院的院长至少要配备十名专科医生，否则他就不干……"

他已开始收梢，他已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疲惫的脸色和频频眨巴的眼睛看出，这次分散注意力的谈话对她没有收到效果。正好这时阳台门开，从外面进来……来者样子象一条狗，但它是那样庞大、温暖和不可思议，仿佛是一个不知为什么四肢着地的人。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正担心它会不会咬人，但它同一个眼神忧郁的有理性的人一样不可能叫你害怕。

它在屋子里轻软地走动，那神情简直象在沉思，没有料到它走到这里来会引起什么人的惊异。只有一次，它竖起白扫帚也似的一条丰满的尾巴，向空中一甩，然后垂下，算是进门来打一个招呼。除了耷拉着的黑耳朵，它全身毛皮由白和火黄两种颜色组成复杂的图案：它背上好象被盖上一件白色的马衣，肚皮两侧呈火黄色，屁股甚至近乎桔红。

诚然，它曾走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跟前嗅嗅她的两膝，但动作一点也不唐突。在这种场合，任何一条狗都会挨近桌子让桔红色的屁股着地坐下来，但它没有这样做，对于比它的头顶高出不多的桌面上的吃食也不感兴趣，只是四足着地站在那里，用一双圆鼓鼓、水汪汪的咖啡色大眼睛望着桌子上方，完全是看破红尘的神态。

"这狗是什么种?!"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大为诧异，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完全忘却自己和自己的病痛。

"圣贝纳[1]种，"奥列宪科夫用鼓励的目光望着那狗。"一切都挺好，只是耳朵太长了些，玛尼亚每次给它喂食，照例生气地说：'我非用绳子把你的耳朵吊起来不可，否则老是拖到盆子里去!'"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端详着这条狗，愈来愈表示欣赏。这样的狗不会卷入街头的纷扰，这样的狗想必不允许搭乘任何交通工具。正象雪人只能待在喜马拉雅山中一样，这样一条狗也只能生活在带花园的平房里。

奥列宪科夫切了一块蛋糕给狗吃，但不是象出于怜悯或为了逗乐那样一扔，而一般的狗就用后腿支住身体站起来，或者腾空跃起，牙齿咬得格格响。这条狗用后腿支住身体站起来不是为了献媚，而是把前爪搁在人的肩上表示友好。奥列宪科夫以平等相待的态度请它吃蛋糕，而狗也以平等的身份从容不迫地把他的手当作盆子从那里衔下蛋

---

[1] 圣贝纳狗是一种产于阿尔卑斯山区的长毛大狗，能救护在山上遇到暴风雪的旅人。——中译者注

糕；也许它肚子并不饿，但出于礼貌接受下来。

不知什么缘故，这条安详沉静、若有所思的狗来了以后，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平添一种清新、欣悦的感觉，她从桌旁离座起身的时候，心想：她的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哪怕必须动手术也不是不可收拾。想到没有认真听取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的忠告，她抱歉地说：

"我太失礼了！我来向您诉说自己的病痛，竟没有问一声您的身体怎么样。您好吗？"

他站在董佐娃对面，腰板儿硬朗，甚至相当魁伟，眼睛还不淌一滴眼屎，耳朵什么都能听见；简直难以相信他比她长二十五岁。

"暂时还没什么，"他作了一个不十分亲热、但充满善意的微笑。"我反正拿定主意临死时不生病。要死就死，干脆痛快。"

他送董佐娃走后，回到饭厅，在摇椅里坐下。这是一张黑漆弯木摇椅，柳条编就的网状椅背年深月久已被磨黄。他坐下后把椅子轻轻一摇，等它自己停下来，就不再摇动。就在摇椅提供的这种既象失去平衡、又不受牵制的特殊状态中，他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

现在他经常需要作这样的休息。他的身体需要通过这样的休息恢复精力，他的内心状态——特别在老伴去世以后——同样需要沉思默想，不受外界声音、谈话的干扰，摆脱工作上的考虑，甚至摆脱作为一个医生必不可少的种种念头。他的内心状态仿佛需要刷洗、净化。象这样默默地

静坐不动，头脑里空空如也，恰恰能给他这种纯净、圆满的感觉。

在这样的时刻，他觉得生存的全部意义，包括他本人往长来短的一生、他的亡妻的一生、他那年轻的孙女儿以及一切人的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注入全部心力并为他人所知的主要活动，而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每一个人生来就萌芽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犹如平静的池水中一轮银辉皎洁的明月那样。

第三十一章

市 场 偶 像

一种内心的紧张产生后至今犹在，但这不是那种耗人精力的紧张，而是愉快的紧张。他甚至摸得出它的位置在胸腔前部肋骨底下。这种紧张象一团热乎乎的气体轻轻往外挤压，令人在疼痛中感到舒服，而且发出声响，但不是耳朵听得见的尘世音响。

这是另一种感受，不同于前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把他往卓娅那边拉的感受，彼时它并不在胸中。

他怀着这份紧张，珍爱这份紧张，不时谛听它的声音。现在他回忆起青年时代也曾有过此种感受，但后来竟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什么感受？它能持续多久？究竟属实抑或虚妄？它是否完全取决于引起这种感受的那个女人？还是说其中也有她尚未属于你、尚未与你结合这一因素在起作用，否则以后就会渐渐归于平静？

不过，结合这两个字现在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但说不定还是有意义的……。胸中这份感受是仅存的一点希望，所以奥列格如此爱护它。它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主要装饰。薇加的存在使整座癌症楼变得生动、多彩，

这座楼之所以尚未成为一口枯井，全赖他跟她……友好相处；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他也感到奇怪。其实奥列格很少见到薇加，往往只是匆匆一瞥。前几天她还给他输过一回血。他们又谈得很好，尽管稍微有些拘谨，而且有一名护士在场。

他曾日思夜想巴望离开这个地方，可现在出院的日期一天天迫近，他却恋恋不舍。一旦回到乌什-铁列克去，他就再也看不到薇加。那怎么办？

今天是星期日，他没有希望见到薇加。偏偏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春回地暖，奥列格到院子里去散步。他呼吸着愈来愈浓得令人困倦的暖气，试图想象：这个星期日她是怎么过的？在忙些什么？

他现在行动懒散，不比过去；他已不再按既定的直线路径迈开坚定的步伐，走到路的尽头便遽然转身。他步履虚软，小心翼翼，经常在长椅上坐下来歇一会；如果没有旁人坐着，就干脆在上面躺倒。

今天就是这样。他敞开晨袍的衣襟，弯腰曲背，慢腾腾地走着，不时止步仰面看看树木。有些树已经半身披绿，另一些约四分之一绽青，栎树上还看不见一片新叶。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这里那里已在无声无息、不知不觉间钻出不少青草，有的甚至高得可以被错当作隔年留下的草，要不是那么绿油油的话。

在一条没有树荫的小径上，奥列格看见舒路宾在太阳

地里。他坐在一张窄条木板钉就的蹩脚长凳上，重心集中在两股，身子又象前俯，又象后仰；胳膊伸直，十指交叉，夹在两膝之间。他这样耷拉着脑袋坐在一张孤零零的长凳上，光线明暗对比强烈，简直是一座嗒然若丧的塑像。

奥列格此时颇有意坐到舒路宾旁边去：他还没有捞到一次机会同这个人好好谈谈，而心里很想这样做，因为他从劳动营中知道，不声不响的人必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在争论中舒路宾插进来支持他这一行为，也引起奥列格对此人的好感和兴趣。

然而，奥列格还是决定不在他身旁停留，因为劳动营也使他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独处一隅的神圣权利。他不能侵犯人家这份权利。

他打长凳旁边经过，但走得很慢，靴脚在石子路上象划着桨板，便于别人把他叫住。舒路宾果然看见了靴脚。随着视线从靴脚往上移动，他抬起头来漠然看了一下，顶多表示默认："不错，咱们是同一间病房的。"直到奥列格又跨了两步，舒路宾才半问半邀地说了一句：

"不坐一会吗？"

舒路宾脚上穿的也不是一般的病人拖鞋，而是一双高帮的室内便鞋，所以他能在这里散步小坐。头上没戴帽子，只见一圈圈稀稀落落的斑斑白发。

奥列格折向长凳走过来坐下，摆出一副往前走或坐一会都无可无不可的神态，不过还是坐一会好些。

不管话儿从何说起，他随时都可以向舒路宾提一个关

键性的问题。听对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也就可以把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没有施出这一招，只是问：

"这么说，是后天喽，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

即使对方不回答，他也知道是在后天。全病房都知道，给舒路宾动手术的日期定在后天。他这句话的文章是做在"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这个称呼上，因为病房里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沉默寡言的舒路宾。奥列格用的是老军人对老军人说话的口气。

"我在晒最后几回太阳，"舒路宾点头道。

"不见得，"科斯托格洛托夫用深沉的低音说。

他斜眼瞅着舒路宾，心想这也许真是最后几回晒太阳了。舒路宾吃得太少，甚至少于他的胃纳容许的程度，为的是减轻食后的疼痛，但这就使他的体力愈来愈难于支持。舒路宾的病是怎么回事，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知晓，所以现在问道：

"就这样决定了吗？从体侧开排泄孔？"

舒路宾嘟起双唇象是打算咂嘴的样子，同时又点点头。

两人相对默然。

"不管怎样，反正是癌，"舒路宾说，眼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对奥列格看。"癌症中间还有癌症。任何一种糟糕的状况都还有比之更糟的。我的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

"不，无论怎样我的更坏！我的病格外叫人丢脸，格外

有失体面。而且后果也可怕得很。万一我能保住性命（而这还仅仅是‘万一’的事），象您现在这样靠近我站着或坐着可很不好受。任何人都将竭力退后两步。若是有谁靠得近些，我一定会这样想：他明明勉强忍受着，心里在诅咒我。总之，我再也不能同人们相处。”

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一会，一边轻轻吹着口哨——不是用嘴唇吹，而是心不在焉地把空气从牙缝中送出来。

“一般很难说究竟谁的情形更糟。这比互相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度过的是倒霉得少有的一生。可是我怎么知道：也许您的遭遇更加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如何判断呢？”

“还是不要判断的好，否则必错无疑。”舒路宾总算转过头来，用一双眼白充血、表情过于复杂的圆眼睛从近处看了看奥列格。“在大海中沉没、在地底下挖掘、在沙漠里找水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难堪的生活。生活最难堪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出去头老是撞在门楣上的人，因为门楣太低……。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您打过仗，后来吃过官司，是不是？”

“还有，我没能上大学，没有被提升为军官，至今还处于永久流放状态。”奥列格若有所思地逐条列举，但没有牢骚。“此外还生了癌。”

“在生癌这一点上咱俩彼此彼此。至于在其他方面，年轻人……”

"……见鬼，我哪里还是什么年轻人！肩膀上的脑袋是原来的那一颗，身上的皮子是原来的那一张，并没有翻新，这算不算？……"

"……在其他方面，我可以告诉您：您至少比较不那么昧着良心说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委曲求全，这一点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我们便被赶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处死刑，我们就得站着鼓掌拥护法庭的宣判。不光是鼓掌，连枪决也是我们要求的。注意，是要求！您该记得，当时报上往往这样写道：'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般闻所未闻的卑劣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象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象一个人'这几个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各不相同的人，可是忽然间'就象一个人一样'！鼓掌时必须把手举得老高，让邻座和主席团都看得见。谁活得不耐烦啦？谁愿挺身为你们辩护？谁敢唱不同的调子？这样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有一个季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他不是反对，——哪里敢反对！——只是在表决枪毙工业党①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叫他说明理由！叫他说明理由！'他站起来，用枯涩的嗓音说：'我认为，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十二年了，应该找得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帮凶！特务！……到第二天早晨，格别乌②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

说到这里，舒路宾用脖子作了一次奇异的螺旋式扭动，

---

① 见本书第257页注①。——中译者注

② 见本书第78页注①。——中译者注

脑袋转了个圆圈。他在长凳上前俯后仰的姿势好象一只不耐烦安坐的大鸟蹲在栖木上。

科斯托格洛托夫努力克制自己，不现出听得飘飘然的样子。

"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这全看各人抓到什么阄儿。你们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吃苦头；我们处在你们的地位，也会随大流。不过，象您这样很早就看透个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至于信以为真的人倒是轻松愉快的。他们即使手上沾了血也不算血，因为他们不知就里。"

老头热辣辣的目光成斜线向他一扫，问：

"您说谁信以为真？"

"我也曾信以为真。在对芬战争以前。①"

"可是，信以为真的有多少人哪！不知就里的有多少人哪！对一个小青年自然不能苛求。但要我承认，我们的老百姓一下子都成了低能儿——我做不到！我想不通！从前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地主老爷在台阶上胡说八道，庄稼人听着暗暗发笑；老爷明明看见，管事的在一旁也觉察到。到了行礼退去的时候，大伙'就象一个人'那样鞠躬如仪。这难道意味着庄稼人把地主老爷的话信以为真？要是真的相信了，那除非是什么样的人？"舒路宾忽然火气愈来愈大。他的脸属于这样一种类型：在强烈的情感冲动下，整个面部都会变样，五官位置无不移动。"一会儿说，所有的教授、工程

---

① 1939—40年冬季爆发的苏芬战争，暴露了红军内部战备之差到了可怕的程度。其结果是对斯大林统治的幻想有所破灭。——英译者注

师都成了暗害分子，他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内战时期的优秀师长成了德日间谍，他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列宁的整个老班底都是十恶不赦的叛徒，他信以为真！一会儿说，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是人民公敌，他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千百万俄罗斯士兵背叛祖国，他一概信以为真！一会儿说，一大批民族的男女老少都被斩尽杀绝，他统统信以为真！试问，这样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可不是傻瓜吗?!难道全体人民都是傻瓜？请恕我直言！人民是聪明的，人民要活下去。大国的人民有这样一条守则：熬过一切，保存自己！将来历史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样人'的时候，只得用普希金的诗句来回答：

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
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
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以外。"①

奥列格打了个哆嗦。他不知道这几行诗，但诗句的词锋锐不可当，语气斩钉截铁，使作者和真理都显得有血

---

① 普希金于1826年写过一首诗《致维亚节姆斯基》，其中第二节的四行是：

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
莫讴歌与陆地联盟的大海。
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
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以外。

——中译者注

有肉。

舒路宾举起一个粗大的指头冲着他扬了扬，说：

“他在诗里甚至没有给傻瓜留下一席地位。尽管他明明知道，世上也有傻瓜。不，我们只能在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没有坐过牢，并确信自己不是暴君，那就是说……”舒路宾凄然一笑，咳起嗽来，“那就是说……”

他一边咳嗽，一边以两股为重心把身体朝前后摇晃。

“您以为这样的日子难道比你们的好过？我提心吊胆过了一辈子，现在很愿意同您易地以处。”

科斯托格洛托夫跟他一样，也缩着脖子，象栖木上一只羽毛蓬松的鸟坐在狭窄的板凳上，前俯后仰地晃动身子。

他们夹紧的腿脚在他们前面的地上投下清晰的斜影。

“不，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这样的评价过于笼统，也过于苛刻。我认为写信告密、充当证人之辈才是叛徒。这样的人也是数以百万计的。假定囚犯同告密者的比例是二比一，就算三比一吧，他们的人数岂不以百万计？可是把所有的人都算作叛徒，这未免太草率。普希金也是一时说的气话。狂风吹折树木，使草倒伏；难道说是草出卖了树？刚才您自己说过：熬过一切是人民的守则。”

舒路宾整个面部堆起了皱纹，皱得嘴巴剩下一条线，两只眼睛干脆不见了。本来圆鼓鼓的一双大眼睛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无孔的皱皮。

等到皱纹舒展开来，重又现出鼻烟色的虹膜，四周围着微红的眼白，但目光比先前澄净了些。他说：

"好吧，那就用一个比较好听的名称管它叫合群性，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集体之外的心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弗兰西斯·培根早在十六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偶像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偶像。培根把它们称做种族偶像、洞穴偶像……"①

他说到"洞穴偶像"时，奥列格想象中出现一幅穴居时代的情景：洞穴中央点着一堆篝火，洞内烟雾腾腾，野蛮人在烤肉，洞穴深处依稀可辨竖着一座蓝幽幽的偶像。

"……剧场偶像……"

这种偶像放在哪里？穿堂里？台幕上？不，比较体面的位置当然在剧院广场上的花坛中央。

"剧场偶像是什么？"

"剧场偶像是别人的权威性意见。人们在阐发他自己没有亲身体验的事物时喜欢把这类意见奉为圭臬。"

---

①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语)。培根在他未完成的主要著作《伟大的复兴》第二部分《新工具》中把他认为是盘据人心而牢不可破的一些错误观念或看法，称之为偶像。他认为偶像有四种：(1)种族偶像(由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谬误看法，如拟人观即把自然现象人格化或精灵化)；(2)洞穴偶像(个人的主观片面的看法)；(3)市场偶像(由于语言的滥用而引起的谬误)；(4)剧场偶像(迷信权威，如为经院哲学所惑而引起的谬误)。培根强调必须破除这四种撩乱人心的偶像，才能获得真正科学的知识。——中译者注

“哦，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有时明明有过亲身体验，但还是觉得相信别人的意见更省事。”

“这种人我也见过……”

“剧场另一种偶像是无节制地与科学论点合拍。总之是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

“说得好！”奥列格极表赞赏。“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确实如此！”

“最后，还有市场偶像。”

“哦，这是最容易想象的！在人头挤挤的市集上耸立着一座雪花石膏的偶像。”

“市场偶像乃是源由人们互相联系、互相交往的谬误。人们被这种错误束缚住手脚，是因为习惯于沿用强奸理智的提法。例如：人民公敌！异己分子！叛徒！于是人人跟他划清界限。”

舒路宾说到激昂处，神经质地时而举起左手，时而挥动右手——这又象一只被剪伤了翅膀的鸟歪歪斜斜地试图起飞的笨拙动作。

热得不象春天的太阳晒着他们的背部。树枝尚未交接，还只是各自披着新绿，所以遮不住阳光。尚未被南方的烈日烤得发烫的天空，在悠悠浮动的片片白云之间保持着蓝色的背景。但舒路宾由于没看见或者不相信，却挥动着高举过脑袋的一个手指头，说：

“而在一切偶像上方的是恐惧的天，是阴云低垂的恐惧

的天。您总知道，傍晚时分，尽管压根儿没有雷雨，有时低空中也会飘浮着这种很厚的灰黑色阴云。那时天比平时提早转暗变黑，整个世界会显得凄清荒凉，使人直想躲进砖墙瓦顶的房子里去，尽量挨近炉火和亲人。我在这样的天空下生活了二十五年，全靠折腰和沉默才保全自己。我沉默了二十五年，也许达二十八年，反正您自己可以算去。一会儿为了老婆沉默，一会儿为了孩子沉默，一会儿为了自己罪孽深重的皮囊沉默。可是老婆死了。我的皮囊也成了一口袋粪便，还得在旁边开一个窟窿。而孩子们长大了竟变得不可思议地冷酷无情，真叫人莫名其妙！如果女儿突然给我写起信来，甚至两年中寄来了第三封信（信不是寄到此地来，是寄到家里的）——那敢情是因为党组织要她实现同父亲的关系正常化，您明白不？对儿子索性连这样的要求也不提了……”

舒路宾掀动毛茸茸的浓眉把脸转向奥列格，他那蓬蓬松松的模样使奥列格猛然想起《水仙女》中发疯的磨坊主。“我哪儿是什么磨坊主??我是主凶的乌鸦!!”①

“我简直不敢肯定，我那几个孩子究竟是不是梦里的人，也许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孩子……。您倒是说说，人难道是木头?!只有木头才不在乎自己是单独躺着，还是跟另外一些木头放在一起。而我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倘若我失去

① 《水仙女》原是普希金的一部诗剧，俄国作曲家达尔戈梅斯基(1813—69)把它改编成歌剧。剧中磨坊主的女儿因被公爵遗弃而投河自尽，磨坊主悲愤成疯。——中译者注

知觉，昏倒在地，甚至一命呜呼，邻居在几天几夜之内都不会发觉。尽管如此——您听我说，您听我说！”他牢牢地抓住奥列格的肩头，仿佛唯恐他听不见，“我仍然谨小慎微，步步留神！象我在病房里对你们讲的那些话，我在科坎德、在我工作的地方是不敢说的！至于我现在对您讲这样的话，那是因为要送我到手术室去的担架车已经在推来了！即便如此，如果有第三者在场，我也不会这样讲的！一定不会！瞧，我就被挤到这样一个壁角里过日子……。而我是在农业科学院毕业的。我还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级进修班毕业。我曾开课讲授好几门专业——这都是在莫斯科时的事情。但后来一棵棵栎树开始倒下。农业科学院里倒了穆拉洛夫。教授们几十个几十个被抓起来。要我表态承认错误？我就承认错误！要我同被捕者划清界限？我就划清界限！不是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得以幸免吗？我就属于这百分之几！我转而埋头研究生物学，以为找到了一个安静的避风港！……不料那里也开始搞清洗，而且势头特别猛！生物系各教研组都受到全面审查。要我停止授课？好，我就停止授课。我退而充当助教，我愿意做一个小人物！”

在病房里沉默寡言的一个人竟会如此侃侃而谈！他的话滔滔不绝，仿佛当众演说是他的拿手好戏。

“大科学家们写的教科书遭销毁，教学大纲要变更——好，我同意，就按新的书本上课！那时提出解剖学、微生物学、神经病理学得按一个不学无术的农艺师的学说

和园艺家的实践彻底改造①——着哇，我也作如是想，我拥护！不行，还得把助教的位置让出来——行，我没意见，我就搞教学法去。不行，献出的祭礼不合神意，连这份差使也丢了。行，我没意见，我就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到遥远的科坎德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先后不知降了多少级，但我总算活了下来，我的孩子都念完高等学校。可是有秘密的书单下达到图书馆管理员：要把遗传学这门冒牌科学的书销毁！要把某某作者、某某作者的书统统销毁！这对我们说来根本就不是新鲜事！四分之一世纪前，我自己不就曾从教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台上宣布相对论是反革命的蒙昧主义邪说吗？于是由我起草文件，党组织书记和特别科代表在上面签字，我们便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全部付之一炬！……”

他居然还笑，这只疯乌鸦！

“……我们没有在街头焚书。何必搞这一套多余的戏剧性举动？我们在僻静的角落里把书塞进炉子，还可以借此取暖！……瞧，我就背靠炉子被挤到这样的角落里……。但我总算把孩子拉扯大了。我的女儿——一家区报的主编——写过这样的抒情诗：

不，我不愿后退！

① “不学无术的农艺师”指的是特罗菲姆·李森科，他曾统治苏联生物学界直至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通过向保安警察当局告发的手段搞掉许多对手。“园艺家”指专门培育果树新品种的伊万·米丘林，他的名望曾被李森科加以滥用。——英译者注

求饶我可不会。

要打架？那就来吧！

哪怕是亲爹，耳刮子照样给！”

他的晨袍象被剪伤的翅膀松垂着。

“是——啊……”科斯托格洛托夫只能如此应道。“不错，您的日子不见得好过。”

“正是这样。”舒路宾喘一口气，让自己坐稳些，语调也平稳了些。“请问，这一个个历史时期的更迭究竟该如何解释？人民还是这些人民，可是经过十来年工夫，全部政治热情竟衰退殆尽，勇敢的冲动走向反面，变成懦怯的冲动。要知道，我从一九一七年起就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我也曾在坦波夫奋勇驱散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的议会，虽然那时候我们把两个指头塞进嘴里打一声唿哨就算是冲锋号。我参加过国内战争。当时我们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简直把为世界革命献出生命看成幸福！可是后来我们是怎么搞的？我们怎么会低头的？主要向什么低头？向恐惧心？向市场的偶像？向剧院的偶像？就算我是小人物，不在话下；可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① 难道不懂得，不看见？为什么她不大声疾呼？只要她出来讲话，哪怕她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对我们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也许我们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也许能顶住这股潮流，事情也许不会弄到这般地步。就拿奥尔忠尼

① 列宁的遗孀。——英译者注

启则① 来说。当年他不愧为一只雄鹰！施里塞尔堡要塞和苦役都没有能使他屈服，可是究竟什么阻挡住他，使他一次也没有说出反对斯大林的话？他们宁愿神秘地死去或自杀——这难道是勇敢的行为？请您给我解释解释。”

“我哪能给您解释呵，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我不行……。这该由您给我解释才对。”

舒路宾喟叹一声，尝试着变更一下坐在长凳上的姿势。可是他这样坐也疼，那样坐也疼。

“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象您这样的人，是在革命后出生的，可是竟被关进监狱。难道说，您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还是并非如此？”

科斯托格洛托夫作了一个不置可否的微笑。

“我不知道。在那里，有时候会逼得你把心一横，什么都干得出来。”

舒路宾腾出按在长凳上的那只已经瘘软无力的手，把它搁在奥列格肩上，说：

“年轻人！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千万不可从自己经历的苦难和这些残酷的岁月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要不得。不管您怎样想，反正资本主义已被历史永远抛弃了。”

“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常常议论到，私人资本主义有很多好处。生活比较轻松，可不是吗？任何时候要什么有什么。任何时候都知道要什么可以上哪儿去找。”

---

① 三十年代主管苏联工业的老布尔什维克，于1937年自杀。——英译者注

“听着，那是庸人之见！私人企业非常灵活，这是事实，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显示好处。如果不把私人企业用铁钳夹紧，它会产生出禽兽一般的人。这些交易所人物的欲望和贪婪是没有止境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注定灭亡之前，在道德上早已注定灭亡了！”

“可是您知道，”奥列格晃了一下前额，“欲望和贪婪没有止境的人，老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也见到过，而完全不是在持有专利证书的手艺人中间。就以叶梅里扬-萨希克为例……”

“对！”舒路宾的一只手在奥列格肩上愈压愈沉。“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弯子转得很快，我们以为只要改变生产方式，人也就一下子会改变。哪知道完全是鬼迷心窍！人一丁点儿也没有变！人是一种生物类型！不经过千年万代，人是不会变的！”

“那末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呢？”

“是啊，到底是怎样的呢？这岂不是一个谜？有人说是‘民主的’，但这个肤浅的词儿没有指出社会主义的实质，它指的只是入门形式，政体类型。这仅仅是一个宣称以后不再砍头颅的声明，至于社会主义将建筑在什么基础之上，却只字不提。并不是商品充足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人若是变成野牛，会把这些商品统统踩个稀巴烂。社会主义也不是整天唠叨着仇恨的制度，因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筑在仇恨的基础上。凡是身上年复一年地燃烧着仇恨的烈火的人，不可能到某一天突然宣布：‘够了！从今天起，我戒掉

仇恨，往后只爱不恨了。'其实不然，他仍然要仇恨下去。他将找到更接近的人来仇恨。您可知道赫尔维格的这样一首诗？

Wir haben lang genug geliebt…"

奥列格接下去念道：

"Wir wollen endlich hassen! ①"

"当然知道！我们在学校里念过。"

"对，对，你们在学校里念过！不过这实在太可怕！你们在学校里这样念，其实应该颠倒过来：

Wir haben lang genug gehasst,
Wir wollen endlich lieben!

去他妈的仇恨！我们要相爱了！——社会主义就应该是这样的。"

"这么说，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奥列格问。他力图猜透

---

① 格奥尔格·赫尔维格（1817—75）——德国革命诗人，一度是马克思的朋友。此处所引的两行诗意思是：
我们相爱得够长久了，
让我们从此互相仇恨吧！
——英译者注

对方的意思。

“说社会主义是基督教的未免太过分了。以此自称的政党在曾经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的社会里打算靠什么人、同什么人一起着手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我实在难以想象。上世纪末，当托尔斯泰决意在社会上切实培植基督教思想的时候，他的希望未能见容于时代，他的说教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我认为：针对俄国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我们的省悟、忏悔和反叛，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才是正道，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而且这是完全行得通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皱起眉头问：

“这个‘道德社会主义’该如何理解，怎样设想？”

“并不难设想！”舒路宾又兴奋起来了，但并没有刚才那种凶鸦磨坊主的惊恐表情。这一回他处于比较开朗的兴奋状态，显然他很想使科斯托格洛托夫信服。他象上课似地说得字句分明：“我们要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发源于道德，此外别无源泉！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他们该接受何种训练，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一切考虑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只能搞无损于道德——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的项目。在对外政策上也是如此！在有关任何边界的问题上，不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将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者提高威望；而只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在多大程度上合乎

道德。”

“这未必行得通！还得过两百年！不过且慢，”科斯托格洛托夫蹙额说，“有一点我不能领会：您所说的社会主义，它的物质基础在哪里？经济应该……应该先于其他，可不是吗？”

“先于其他？这也有各家之说。例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①]就曾经相当令人信服地阐述，经济可以而且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

“什么？……先道德，后经济？”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一下可真的发了呆。

“是的！俄国人，听着，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著作您想必一行也没有读过吧？”

科斯托格洛托夫努动嘴唇表示承认。

“至少他的名字是听见过的喽？”

“在班房里。”

“那末，克鲁泡特金的书是不是读过几页呢？象《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

科斯托格洛托夫做了个跟刚才一样的动作。

“自然喽，他的观点既然是错误的，又何必去读呢？……那末，米海洛夫斯基[②]呢？哦，不消说，没有读过，因为他的学说已被推翻，此后就被禁读，并从书架上抽掉。”

---

① 俄国一宗教思想家（1853—1900），他的思想对俄国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影响颇大。——英译者注

② 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的一位主要思想家（1840—1904）。——英译者注

“哪有时间读呢?!读谁的书好呢?!”科斯托格洛托夫愤激地说。“我一辈子弯腰卖命，可是到处有人问我：某某的著作读过没有？某一本书读过没有？在部队里，我手不离锹；在劳动营里也是这样；如今在流放地换上了锄头。我哪有时间读书？”

但是，舒路宾圆眼浓眉的脸部表情好象发现了猎取的目标，准备猛扑过去。

“这正是道德社会主义的要旨所在！它并不促使人们去追求幸福，因为‘幸福’也是市场的偶像；道德社会主义促使人们相亲相爱。吞食弱肉的猛兽也能幸福，可是相亲相爱只有人才能做到！这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至高成就！”

“不，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奥列格立即坚持自己的想法。“请您把幸福留给我，哪怕在咽气之前让我受用几个月也是好的！否则岂不早就可以见鬼去啦?……”

“幸福是虚妄的幻象！”舒路宾拚出最后一点精力与之争论。他的脸色惨白。“我在抚养孩子的时候，也曾感到幸福。可是他们竟往我心上啐唾沫。而我为了这点幸福不惜把宣传真理的书在炉中烧毁。至于所谓‘子孙后代的幸福’更加靠不住。谁能领略这样的幸福？谁跟这些子孙后代交谈过？他们还将对哪些偶像顶礼膜拜？几世纪来，关于幸福的观念变得太厉害了，叫人不敢预先布置幸福。将来纵使白面包多得一迈步就被踩在脚下，牛奶够你喝得喘不过气儿来，我们还是不可能得到半点幸福。倘若同不足者分享——那末今天我们就会幸福！如果一味考虑‘幸福’和繁

殖后代，我们只会毫无意义地把地球铺满，造成一个可怕的社会……。哦，我好象觉得不太好受……。我得去躺在床上……”

奥列格没有觉察到，舒路宾本来就憔悴不堪的面容整个儿变得毫无血色，就象临终时那样只见一片死灰。

“让我扶您回去，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我来扶您回去！……”

舒路宾从刚才保持的姿势中站起来都不容易。他们拖着艰难的步子，走得极慢极慢。他们被笼罩在春天轻盈的氛围中，可是他们俩只觉得周身沉重，只觉得自己的骨头和仅剩的肉、衣裳、鞋子乃至倾泻到他们身上的光流——无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和压力。

他们缓缓而行，已经没有力气说话。

到了癌症楼门口台阶前的房屋阴影中，舒路宾这才倚着奥列格的扶持，抬头仰望那几棵白杨和一小块艳阳天，说：

“但愿我不会死在刀下。我害怕……。不管活了多久，不管过的是跟狗差不多的日子——总还是……”

然后他们走进穿堂，顿时觉得空气闷热，有一股臭味。他们一步一级、一步一级慢慢地登上医院的楼梯。

奥列格问道：

“请问，在您低头折腰、背弃信仰的二十五年间，您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思考过了吗？”

“是的。我背弃了信仰，但不断在思考，”舒路宾机械地

回答，没有一点表情，声音愈来愈微弱。“我把书往炉子里塞，也不断在思考。怎么？难道我付出了痛苦、背叛的代价，连一点点思考的权利都换不到？……”

第三十二章

从反面看

董佐娃万万料想不到，自己熟悉到这等程度的事情，可谓彻底了解、倒背如流的事情，居然会走向反面，变成完全新奇和陌生的事情。她给别人治了三十年的病，其中足有二十年坐在爱克斯光屏幕旁，看荧光屏上的映像，看底片上的摄影，看失神、哀告的眼睛里的表情，对照化验报告和文献资料，撰写文章，与同行辩论，跟病人争执。在这段时间内，她的经验和逐步形成的观点对她自己说来愈来愈趋于坚定，医学理论也愈来愈趋于连贯。病原和病理、症状、诊断、病程、治疗、预防和预后是她的主要思想；至于病人的抵抗、疑虑和恐惧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人类弱点，能得到医生的同情，但在衡量各种方法的利弊得失时完全等于零，在逻辑的平方中根本没有它们的地位。

迄今为止，所有的人体结构都完全相同，诚如标准解剖图谱所显示的那样。生命过程的生理学和感觉的生理学也完全相同。凡是正常的和偏离正常的一切，都可从最权威的本本中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忽然，仅仅几天工夫，她自己的身体竟从这个秩序井然

的伟大系统中跌出来，掉在硬邦邦的地上，变成一只失去防卫能力的口袋，里边盛满了每一分钟都可能疼得叫喊起来的器官。

几天之间，一切都倒了个过儿；她那照旧由研究有素的各部分组成的机体，竟变得陌生而又可怕。

当她的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她曾同他一起看图画。一些最常见的家用器具，如茶壶、汤匙、椅子，要是画的角度比较特别，就会认不出来。

她自己的病程和她在治疗中所处的新地位，现在对她正显得这样难以辨认。这一回，她在治疗中再也轮不到充当明智的指导力量，而是一股百般抗拒的反理性阻力。她在承认自己得病的最初一刹那，就象一只青蛙被踩了个稀巴烂。与疾病相处的第一个阶段委实无法忍受：世界脚朝天翻了过来，世间事物的整个序列都颠倒了。人还未死，却已经不得不撇下丈夫、儿子、女儿、外孙和工作，不过正是她工作中使用的那些器械今后将用到她自己身上。她不得不在一天之间放弃构成她生活内容的一切，然后还得象一个惨绿的影子忍受若干时间的折磨，久久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彻底死灭还是重返人寰。

她的一生似乎未曾有过任何值得一提的欢乐和喜庆，只有工作和焦虑，工作和焦虑。然而，回顾起来，这段生活原来是如此美好，如今要同它分离又是何等难以割舍，真想号啕痛哭！

这个星期日对于她已不成其为星期日，她整天都在使

自己的五脏六腑为明天的爱克斯光检查作好准备。

星期一，到了事先约定的时间——九点三刻，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同薇拉·甘加尔特以及另一位住院医师一起在爱克斯光室内熄了灯，让自己在黑暗中先适应一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脱去外衣，走到屏幕后面去。工友把第一杯钡粥递给她时，她没有接稳，洒了一些出来：却原来她那双曾经在这里戴着胶皮手套坚毅有力地按过不知多少病人腹部的手，居然在发颤。

各种惯用的方法——扪触、按压、转侧、举手、呼吸——都用到她自己身上。接着，他们把摄像机放低，叫她躺下，从不同的角度拍了几张片子。然后需要让造影剂沿着食道扩散开去，而爱克斯光设备不应空等，所以住院医师就让她的几名定期照光的病人进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还坐起来想帮她一手，可是思想无法集中，没能帮多大的忙。随后，又轮到她到屏幕后面去，喝钡粥，躺下接受摄影。

所不同者只是检查并不在通常那种静穆的工作气氛中进行，间或由医生发出简短的指示。可以听到奥列宪科夫不断说着笑话，时而跟两个年轻的助手，时而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打趣，时而拿自己开心。他谈到自己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曾因闹事从当时还年轻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被撵走。那天是《黑暗的势力》① 的首次公演，扮阿基姆的演员擤鼻涕，捯裹脚布的动作做得如此逼真，多尔米东特和他的一个朋友竟然嘘声大作。他说，从那时起，每次到莫

① 列夫·托尔斯泰所作描写农民生活的一出话剧。——英译者注

斯科艺术剧院，他总担心被认出来再次撵走。大家都尽量多说话，免得在无声的透视之间的空隙出现难堪的冷场。然而，董佐娃能清楚地听出，甘加尔特说话的声调勉强，喉咙枯涩；她对薇拉有足够的了解！

但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正是希望如此吗？她抹抹喝过含钡酸乳酪的嘴，再次宣称：

“不，病人不应当了解全部真相。这是我的一贯主张，现在也还是这样。到你们需要讨论的时候，我就离开这间屋子。”

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于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出爱克斯光室，试图找一点事做：一会儿给放射科的技术员做做帮手，一会儿整理整理病史。要做的事情很多，可是今天她什么也干不成。里边又叫她了，她怀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走进去，希望他们以好消息来迎接她，希望薇拉·甘加尔特如释重负地同她拥抱，向她祝贺。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只是再次按照指示转动身体接受检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每一项这样的指示无不照办，但她自己不能不加以思考，不能不试图作出解释。

“根据你们采用的方法我能料到，你们在我身上寻找什么，”她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她料到他们怀疑她的肿瘤不是胃肿瘤，也不在幽门，而在贲门——这是最伤脑筋的部位，因为动起手术来需要部分打开胸腔。

“嗳，柳多琦卡，”黑暗中响起了奥列宪科夫浑厚的低

音，"您一向主张早期诊断，现在又挑剔我们的方法不对头！要是您愿意的话，我们就等三个月，那时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把结果告诉您，好不好？"

"谢谢您，等三个月就免了吧！"

主要的爱克斯光大照片下班前已冲洗出来，她也不愿看。平时象男人那样刚毅果断的动作看不见了，她软瘫在椅子上，处在一盏明亮的灯下，等着听奥列宪科夫的总结发言——听他的发言、结论，但不是听诊断！

"好吧，尊敬的同行，您听着，"奥列宪科夫善意地拖长声调说，"几位名医的意见是互相分歧的。"

他自己的一双眼睛从折曲成角的眉毛下面注视着董佐娃惶惑的神情。他原先以为，意志坚定的董佐娃面临这场考验会显示出更大的毅力。不料她的表现却意外地软弱，这又一次证实奥列宪科夫的见解确有道理，他认为：现代人在死亡面前完全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武器去对付死亡。

"谁的意见最悲观？"董佐娃强作笑容问。

（她心中但愿不是他！）

奥列宪科夫张开手指答道：

"悲观的意见属于您的女儿。这就是您培养她们的结果。我对您的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他的嘴角略略扭曲了一下，不过这是洋溢着善意的表情。

甘加尔特坐在那里，面色苍白，仿佛在等候决定她自己命运的结论。

"好吧，那就谢谢了，"董佐娃觉得稍微轻松了些。"那

末，您说该怎么办呢？”

不知有多少次，病人在稍事喘息之后等着听她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始终建立在理智、数据的基础之上，这是按逻辑推断出来、经过反复验证的结论。但是，这片刻的喘息实际上掩藏着多少恐惧呵！

“这样吧，柳多琦卡，”奥列宪科夫深沉的声音使人感到安慰。“世界毕竟是不公平的。假如您不是自己人，我们马上就可以把您连带可供选择的诊断意见转给外科医生去处理，他们会把您身上某个地方切开，顺道带走点儿什么。有那么一些活宝，他们不从腹腔里带走点儿纪念品是不罢休的。切开以后，谁的意见正确就清楚了。但您毕竟是自己人。在莫斯科，在爱克斯线放射学研究所里有我们的莲诺琦卡，还有谢辽查。因此，我们商量决定，建议您到那里去走一遭。您意下如何？……请他们读一读我们向他们提供的书面意见，请他们自己再给您检查一下。这样，就可以集思广益。如果需要开刀，在那里开条件也比较好。总之，各种条件都是那里的好，您说是不是？”

（他说“如果需要开刀”，意思是不是也许不必开刀？……还是相反？……不，看来坏的可能大些……）

“这么说，”董佐娃明白了，“手术难度较大，你们不敢在这里做，是不是？”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奥列宪科夫立刻沉下脸来否认。“请不要从我的话里找言外之意。我们无非想为您……这该怎么说呢？……无非想为您找一下门路。要是您不信，

喏，”他向桌上把脑袋一晃，“拿了底片自己看去。”

是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消一伸手，她就可以自己进行分析。

“不，不，”董佐娃坚持不去接触爱克斯光照片。“我不要看。”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他们向院长作了汇报。董佐娃到共和国卫生部去了一趟，那里居然一点没有拖延时日，就批准她的申请，给了她介绍信。这样一来，在她工作过二十年的城市里，事实上已不再有什么事情拖住她了。

董佐娃在向所有的人隐瞒自己的病痛时，有一点她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向一个人说穿，事情就再也控制不住，一切都将不由自主。日常生活中那些看来如此牢固、如此永久的纽带，甚至不是在几天内，而是在几小时内即告断裂。

在医院和在家里她一直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可是现在她已经要被取代了。

我们跟大地的关系够亲密了吧？可是我们竟完全不能在地上站稳！……

现在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就在那一个星期三，她和即将代理放射科主任职务的甘加尔特一起到各病房作了最后一次巡诊。

她们这次巡诊从早晨开始一直继续到将近午饭时分。董佐娃十分信得过薇珞琦卡·甘加尔特，甘加尔特对所有的住院病人的情况同董佐娃一样熟悉。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开始从一张张病床旁边走过去的时候，尽管意

识到自己在一个月之内不可能回来，说不定再也回不来了，但她的头脑却很清醒，精神也比较好——几天来这还是第一次。她恢复了考虑问题的兴趣和能力。早晨，她本来打算尽快移交工作，尽快签署最后几份文件，然后回家去收拾行装——这个设想不知怎的一下子统统落了空。她那事必躬亲的习惯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今天她要给每一个病人至少作出一个月的预测（估计病程将如何发展；可能需要哪些治疗手段；可能需要采取哪些不寻常的措施），否则她是不会从那个病人床前离开的。她几乎同过去一样地出入病房——自从掉进最近几天的旋涡以来，这是她怀着轻松的心情度过的最初几个小时。

她对临到自己头上的不幸已经习惯。

与此同时，她出入病房的感觉就好象被剥夺了医生权利，好象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被取消资格似的，所幸者事情还没有向病人宣布。她给病人听诊，开药方，发指示，摆出一副冒牌先知的架势观察每一个病人，其实自己只觉得冷透脊髓。她再也没有资格判断别人的生死，因为过几天她也将同样可怜巴巴、傻里傻气地躺在病床上，几乎不顾自己的仪容，等着听资格更老、经验更丰富的专家说些什么，一边又担心疼痛发作，说不定还要懊悔住错了医院，或者怀疑对自己的治疗不对头，心中象企望至高无上的幸福一般向往着脱去病人睡衣、晚上回家去这样一份寻常的权利。

这一切兜上心头，多少妨碍她象平时那样有条不紊地

思考问题。

其时，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正怀着并不高兴的心情接过担子。她实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事实上，她压根儿不想挑起这副担子。

对于薇拉说来，“妈妈”——她们在私下这样称呼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是可有可无的。薇拉是三人中对董佐娃作出最悲观诊断的一个，她预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得不接受一次很伤元气的手术，而被慢性放射病耗竭了体力的董佐娃，可能禁不起这样的手术。今天，薇拉同她并肩而行的时候，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而她——甘加尔特——还得在这些病床之间走上好多年，每天怀着沉痛的心情怀念那个把她培养成为医生的人。

她用一个指头偷偷抹去泪珠。

其实，今天薇拉恰恰应当比任何时候更明确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情况，尽可能不要漏提任何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五十条性命第一次以全部重量压到她的肩膀上，今后将唯她是问。

她们的巡诊就这样在忧心忡忡和注意力分散的状态中足足持续了半天。她们先巡视女病房，随后把楼梯平台上和走廊里的病人一一看遍。不用说，在西布加托夫床边逗留的时间比较长。

她们在这个安分的鞑靼人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啊！可是赢得了什么呢？只是多拖几个月罢了。何况，这几个月也无非是在光线暗淡、空气不好的穿堂角落里苟延残喘。

骶骨已支撑不住西布加托夫，全靠两只强壮的手从后面托住背脊，才得以保持垂直的姿势。他唯一的活动就是到邻近病房里去坐一会，听听人家谈些什么；他呼吸的空气只有从老远的一扇气窗里透进来的那么一点儿；头顶上方的天花板乃是他的全部天空。

他的生活除了接受规定的治疗，听女工友们吵架，吃医院里的伙食和玩多米诺骨牌外，别无其他内容。但是，就因为能过这样的生活，尽管背上还有愈合不起来的伤口，每次接受巡诊时，他那一双饱尝苦辛的眼睛总还是闪耀着感激的目光。

董佐娃心想，如果抛弃自己惯用的尺度，采用西布加托夫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末，她还算得上一个幸福的人。

可是西布加托夫不知从哪儿已经风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了。

他们相顾默然，面对着要被胜利者的鞭子驱散到天南地北的命运，他们犹如两个遭到败绩、但仍然忠于誓约的盟友。

“你瞧，沙拉夫，”董佐娃的眼睛在说，“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是我负了伤，自己也快倒下了。”

“我知道，娘，”鞑靼人的眼睛在回答，“即使生我的人对我的恩情也不比你大。可是我却救不了你。”

对阿赫马章的治疗取得了出色的成功：他的病没有被耽误，一切都严格按照理论办理，结果也同理论完全吻合。经过把他接受照射的剂量作了一个统计，柳德米拉·阿法

纳西耶夫娜正式向他宣布:

"你可以出院了!"

这事应该一早通知他,他可以告诉护士长,他的衣服就来得及从存放处取出来。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已经丢掉拐棍的阿赫马章也急不及待地跑下楼去找米塔。现在要他在此地多留一个晚上他也耐不住——这天晚上朋友们将在老城等他。

瓦吉姆也知道董佐娃正在移交放射科的工作,即将到莫斯科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妈妈发来两份电报:一份发给他;一份发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电报说,胶体金已发往他们医院。瓦吉姆立刻一瘸一拐下楼去。董佐娃到卫生部去了,但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已经看到电报,她向瓦吉姆表示祝贺,并当即介绍他认识放射技师爱拉·拉法伊洛夫娜——今后就由她主持他的疗程,只等胶体金送到放射线治疗室。正在这个当儿,董佐娃神色沮丧地回来,她也看了电报,并勉强打起精神来向瓦吉姆点头致意。

昨天瓦吉姆喜不自胜,兴奋得睡不着觉。可是到今天早晨他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这金子究竟什么时候能送到?如果东西直接交到妈妈手里的话,它今天已经在这里了。东西在运输途中要不要三天时间?还是要一星期?当医生走到他床前时,瓦吉姆一开头就向她们提这个问题。

"要不了几天!肯定要不了几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对他说。

（但她心中明白，这几天两个字可短可长。她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莫斯科肿瘤病研究所要把另一种制剂寄给梁赞肿瘤医院，可是一个小姑娘把地址错写成“喀山”肿瘤医院，而部里——这种事部里不可能不插手——错读成“哈萨克”肿瘤医院，于是把东西发往阿拉木图。）①

好消息可以使一个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同样一双黑眼睛，最近一个时期本来是那么郁悒忧伤，现在却闪现出希望的光芒。同样两片厚嘴唇，本来已经被刻上一道不可磨灭的歪斜皱纹，如今重又展平，并变得年轻了些。瓦吉姆的整个面容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神采奕奕而又彬彬有礼，简直象过命名日那天一清早就收到无数礼物一般喜气洋洋。

他自己也觉得奇怪，最近两个星期他怎么会如此灰心丧气、意志消沉?！他明明懂得，留得意志在，不怕时运坏！现在必须与时间赛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使胶体金走完三千公里路程的速度比癌肿转移三十公分的速度更快！那时胶体金就来得及给他把腹股沟里的癌细胞清除干净，从而保护身体的其余部分。至于一条腿要牺牲也可以。说不定放射性胶体金能发挥乘胜追击的作用，甚至把他那条腿治好亦未可知。归根到底，任何科学都不可能绝对禁止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

老实说，他得以活下来毕竟是公平合理的！向死神屈服，听任这只黑豹把自己吞噬——这个念头才是荒唐、脆

① 俄文“梁赞”与“喀山”、“喀山”与“哈萨克”的拼写法仅差一两个字母。阿拉木图是哈萨克共和国的首府。——中译者注

弱、没出息的。凭着自己灿烂的才华，他愈来愈相信自己能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他因兴奋过度而有半夜不能入睡，老是想象那只盛着胶体金的铅制称量瓶此刻怎样了，是不是在列车的行李车上向他这里运来？还是正在送往机场的途中？也许已经装上了飞机？他的眼睛穿过三千公里黑糊糊、夜沉沉的空间，心里在催促人们快装快运；倘若真有天使的话，他甚至会把天使也叫来帮忙。

但在巡诊的时候，他怀着疑心留神观察医生如何动作。她们没有说一句不好的话，甚至脸上也竭力不动声色，可是作了扪诊。诚然，她们不仅扪触肝脏，而且各处都摸，并互相交换了几句无关紧要的看法。瓦吉姆估量着她们扪触肝脏是否多于其他部位。

（她们注意到这个病人特别细心、警觉，因而在完全不必要的情况下甚至故意扪触了脾脏，但她们训练有素的手指的真正目标是检查肝脏发生变化的程度。）

在卢萨诺夫的床前要很快地走过去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照例等着接受对他的那一份特殊关注。近来他对这几位医生的态度大有好转：虽然她们不是什么功勋科学家，也不是教授、副教授，但她们治好了他的病毕竟是事实。脖子上的肿瘤现在缩小成松软、扁平的一块。想必事实上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危险，那都是被夸大了的。

“同志，”他向医生宣称，“不管怎么说，我对这种针剂可受够了。已经打了二十多针。也许差不多了吧？我可不可以回家去把针打完？”

事实上，他的血液情况非常不妙，尽管先后输过四次血。卢萨诺夫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甚至头上的小圆帽也好象嫌大了。

“总之，谢谢您，医生！最初我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卢萨诺夫向董佐娃坦然宣布说。他乐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您治好了我的病，我表示感谢。”

董佐娃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这不是出于谦虚或困惑，而是因为他对所谈的问题完全不理解。她们估计肿瘤还可能在他的许多腺内发作。病变的速度将决定他究竟能不能再活一年。

其实，她自己的情况也是这样。

她和甘加尔特使劲扪触他的腋窝和锁骨上方。卢萨诺夫甚至缩做一团，因为她们按得很重。

“真的，那里什么也没有！”他竭力要她们相信。现在已很清楚，人们无非借这种病吓唬吓唬他。但他是个性格刚毅的人，照样轻松地顶了过来。他对在自己身上发现的这种刚毅性格感到特别自豪。

“那就更好。但自己必须十分注意，卢萨诺夫同志，”董佐娃叮嘱他。“我们再给您打几针后，大概可以让您出院了。不过您每个月得来作一次检查。如果您自己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就提前到这里来。”

然而，变得乐观起来的卢萨诺夫凭自己的经验认为，规定到医院里来检查纯粹是例行公事，无非为了作一些统计。所以，他马上给家里打电话报告好消息。

巡诊轮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候她们：她们又象是救了他，又象是害了他。蜜糖和柏油各半掺和在一只桶内，从此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来润滑车轮。

每当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一个人走到他床前的时候，她是薇加；不管她为了履行职责问他什么，处什么方，奥列格看着她总感到高兴。最近一个星期，他忽然完全原谅了甘加尔特固执地施加于他的身体的那种破坏作用。奥列格开始承认薇拉似乎有权处置他的身体。想到这里，他心中觉得热乎乎的。巡诊时薇拉走到他床前，他每次都想抚摩一下她的小手，或者象一条狗把自己的嘴鼻在她手上擦一通。

可是现在她们两个人一起走过来，她们是受到规章制度束缚的医生，奥列格便无法摆脱不理解和受委屈的感觉。

“怎么样？”董佐娃问道，一边在他床沿上坐下。

而薇加站在她背后对着奥列格微露笑意。她又恢复这种出于好感或礼貌的表情——每次见面至少对他作一个微笑。然而今天她的笑容却好象隔着一层膜。

“不太妙，”科斯托格洛托夫厌倦地应道，一边把脑袋从倒悬状态中伸到枕头上。“有时候如果动作稍欠谨慎，这儿……纵隔里还觉得夹痛。反正我感到自己被整治得够了。我请求把对我的治疗结束了吧。”

他并不象过去那样强烈要求，而是用冷漠的语调说这番话，似乎说的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事，这件事早已十分明

白，无须各执己见。

偏偏董佐娃也不再固执己见，她也厌倦了：

“主意您自己拿。不过疗程还没有结束。”

她替他察看照射区的皮肤。看来皮肤已经在呼吁停止照射。到疗程结束时，浅部反应也许还会加剧。

“我们现在已不是每天给他照两次了吧？”董佐娃问。

“已经减为一次，”甘加尔特回答。

（她说的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已经减为一次”，同时稍微伸出纤细的颈脖——可是给人的印象却好象说了什么含情脉脉、动人心弦的话。）

奇异的、有灵性的线，象女人的长头发把她同这个病人挂住并死死地缠在一起。当三尺青丝被拉紧和扯断的时候，只有她感到疼痛，对方却不觉得，周围更是谁也看不出来。薇拉在听到他夜间和卓娅鬼混的那一天，她就象被扯去一大把头发。也许当时就此了断倒好。这一扯向她提醒了一条规律：男人需要的不是同他们年纪相仿的女人，而是比他们年轻的女人。她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妙龄已经过去，已经过去。

可是后来他又变着法儿在走廊里和她相遇，不放过任何机会跟她搭腔，而且说的话是那样中听，目光是那样亲切。于是，那千丝万缕的线或头发又一根一根地挣脱出来，重新把他俩缠紧。

这些线究竟是什么？这是无法解释、也无从计较的。如今眼看他即将离去，往后他在那里将被一只铁腕抓住不放。

除非病情严重恶化，除非死神迫使他折腰，否则他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他身体愈好，来的机会就愈少，甚至一去不回。

“我们给他注射了多少人造雌酚？”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问。

“多得超过了需要，”不等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开口，科斯托格洛托夫就说，目光迟钝地望着她们。“够我一辈子受的了。”

如果在别的时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会轻轻放过他这句无理的插话，一定结结实实抢白他一顿。但此刻她身上的意志整个儿发了蔫，这次巡诊正在勉强收场。如果撇开自己做医生的职责（尽管她确实正在办移交），老实说，她也没什么话可以反驳科斯托格洛托夫。应该承认，这种治疗手段是相当野蛮的。

“我奉劝您一句，”她用息事宁人的口气说话，而且不让病房里其余的人听见。“您不要急于追求家庭幸福吧。您还得在没有正常家庭生活的情况下捱好多年。”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低头看着地上。

“原因是您的病被耽误得很厉害，这一点要记住。您到我们医院来已经很晚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也知道事情不妙，但听董佐娃这样直率地说出来，仍不免张口结舌。

“唔——唔，是啊，”他沉吟半晌，但他找到了一种聊以自慰的念头：“可是我想，领导上会考虑这一点的。”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请继续给他 tezan 和

pentaxil①。不过还是得让他休整一下。这样吧，科斯托格洛托夫：我们给您开够用三个月的人造雌酚，目前配药室里有货，您买去后，回到家里一定得按时打针。要是你们那里没有人打针，您可以带片剂去。”

科斯托格洛托夫微微翕动嘴唇想提醒她：第一、他压根儿没有家；第二、他没有钱；第三、他不至于傻到这种程度，会甘愿去从事慢性自杀。

但看到董佐娃面色灰中透绿，疲惫不堪，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说出来。

巡诊到此结束。

阿赫马章跑来说：事情都已经办妥，他的衣物也有人去取了。今天他一定要跟他的好朋友好好喝几杯！有关的证明之类他明天来取。他的情绪是那么激动，话说得又快又响，别人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这个样子。他走动起来是那么稳健有力，仿佛根本没有跟他们一起在这里病了两个月。剪成平头的浓密黑发和两道漆黑的眉毛下，一双眼睛象喝醉了酒似地炯炯发光，由于感到门外的生活此刻正在向他招手，他的整个背部都在发颤。他急忙去收拾行装，扔掉不要的东西，并跑去请求让他和一楼的病人一起吃一餐饭。

科斯托格洛托夫被叫去照爱克斯光。他在那里等了一会，接着躺在器械下面。照完以后，他还走到台阶上去看了一下：为什么天色这样阴沉。

空中飘满一团团移动迅速的灰暗浮云，灰云后面是一

① 刺激白血球生成机能之类的药物。——中译者注

片深紫色的云层，预示着大雨将临。但空气十分暖和，要下也只会下一场春天的豪雨。

散步散不成了，他重又上楼回到病房。在走廊里他就听到亢奋异常的阿赫马章在大声讲述：

“他们吃得比士兵还要好！至少不比士兵差！口粮是每天一千三百克。其实应当给他们吃大粪！干活他们都不带劲！我们才把他们带到工区，他们马上东奔西散，躲起来，整天睡大觉！”

科斯托格洛托夫悄悄走进门去。阿赫马章已把包裹打好，他站在剥去了被单、枕套的床前，挥动胳膊，露出白牙，正抖擞精神在向全病房的人讲完他的最后一则故事。

可是整个病房人事全非——菲德劳已经离开，哲学讲师、舒路宾也不在那里。奥列格好象从未听到阿赫马章当着病房里原来那个班子讲过这个故事。

“他们什么也不建造？”科斯托格洛托夫轻声问道。“工区内什么也没有盖起来？”

“造是造的，”阿赫马章叙述的脉络有点被打乱。“不过，造得太差。”

“你们该帮帮他们才对……”科斯托格洛托夫说得更轻了，好象精力愈来愈不济。

“我们奉命持枪当好警卫；挥锹使铲是他们的事情！”阿赫马章爽朗地回答。

奥列格望着这个同室病友的脸，仿佛是第一回看见。不，这样的脸他曾见过多年，那是裹在羊皮袄翻领里的，手

里拿着自动步枪。阿赫马章的智力不超过玩多米诺骨牌那个水平。他为人诚实，思想单纯。

如果一连几十年不许讲述事实真相，人们的头脑势必不可挽回地陷入迷惘，无怪乎了解同胞的思想比了解火星上的人更难。

“你可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忍不住问。“怎么能给人吃大粪？你只是闹着玩儿说的，对不对？”

“决不是闹着玩儿说的！他们不是人！他们不是人！”阿赫马章面红耳赤地一口咬定。

他希望说服科斯托格洛托夫也象在场的其他听众一样相信他的话。诚然，他知道奥列格是流放者，可是不知道奥列格在劳动营里待过。

科斯托格洛托夫向卢萨诺夫的床那边斜瞅了一眼，心里正纳闷：为什么卢萨诺夫不开腔支持阿赫马章。但卢萨诺夫根本不在病房里。

“过去我还以为你是个当兵的。原来你是在这样的军队里当兵，”科斯托格洛托夫把声调放慢拉长。“这么说，你是为贝利亚服务的喽？”①

“我不知道什么宝利亚、贝利亚！”阿赫马章生了气，脸涨得通红。“上边什么人掌权——我管不着。我宣过誓，我就执行任务。要是强迫你干，你也得干……”

---

① 拉甫连季·贝利亚在斯大林手下主管苏联内政多年，数百万人被强迫劳动应由他负责。——英译者注

第三十三章

顺遂的结局

这一天果然下起大雨来。整整一夜大雨如注，而且刮风。风愈刮愈冷，到星期四早晨，下的已是雨夹雪。医院里预料雨送春归因而把双层窗的内框打开的人——包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内——都不吭声了。不过，从星期四下午起，雪止雨停，风也小了，户外呈现出一派阴沉、清冷、枯寂的景象。

日落时分，西边的天际闪耀起象细长的金链子那样一道灿烂的霞光。

到了卢萨诺夫准备出院的星期五早晨，天上绽开没有一丝云彩的万里晴空，朝阳已开始晒干沥青路上的大水潭和斜贯草地的土径。

大家都感到，这下是真正的春天开始并且不再反复了。人们划破糊住窗缝的纸条，使劲拔起插销，打开双层窗框，干硬的油灰纷纷落到地上让工友扫去。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把自己的衣物交到存放处，也没有领用医院的东西，任何时候要走都可以。上午，刚吃过早饭，家属就来接他。

你猜谁来了？是拉甫利克开了汽车来接父亲！他昨天刚领到驾驶执照！恰巧学校昨天开始放假，拉甫利克又将连日活跃在晚会上，玛依卡又将去郊游，因此这最小的两个孩子特别高兴。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就是同他们俩一起来的，两个大孩子没来。拉甫利克跟母亲说妥，接父亲出院后他将带领大伙去兜风——让他们瞧瞧，即使尤拉不在，他也能把车开好。

就象放映顺序颠倒的一卷胶片，一切正好朝反方向进行，不过气氛比送卢萨诺夫来住院那天愉快得不可同日而语！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睡衣走进护士长的小房间，出来时已换上一套灰色西服。拉甫利克兴致极高，这个具有运动员体魄的漂亮小伙子，身穿一套蓝色新西服，若不是在穿堂里跟玛依卡抬杠嬉戏，已经象一个十足的大人了。他把汽车钥匙的链子绕在一个指头上不停地转来转去，神气得不得了。

“是不是所有的门把全锁了？”玛依卡问。

“全锁了。”

“玻璃窗都摇上啦？”

“你可以去检查。”

玛依卡晃着一头深色的鬈发跑去看了一下，回来说：

“一切都好。”但随即做出大吃一惊的样子。“行李箱锁了没有？”

“你可以去检查。”

她又跑了出去。

门口穿堂里依然有人手捧盛着黄色液体的玻璃罐送往化验室。那里依然坐着衰竭不堪、面目模糊的人们在等候床位，有的人干脆直挺挺躺在长椅上。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抱着一种不计较的超然态度看待这种情景，因为他已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个刚强坚毅的人，没有被客观环境压倒。

拉甫利克拿着爸爸的手提箱。卡芭身穿米色夹大衣，高耸着马鬃似的古铜色头发，因为高兴而显得年轻了些；她向护士长点头作别，挎着丈夫的胳膊往外走。玛依卡挎着父亲的另一只胳膊。

"你瞧她头上那顶小帽！看见没有？那是最新式的，带条纹的！"

"巴沙，巴沙！"后面有人在喊。

他们回过头去。

恰雷正从外科病区走廊里过来。他气色极佳，连黄疸也消失了。他身上仅有的病人迹象就是一件医院的睡衣和一双拖鞋。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愉快地跟他握手，转脸对妻子说：

"卡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医院战场上的英雄！他的胃刚被切除，可是照样笑口常开。"

在跟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见面行礼的时候，恰雷把脚跟一靠，姿势优美，声音清脆；脑袋微微一侧，既表示敬意，又卖弄帅劲。

“电话呢，巴沙？你得留个电话号码给我啊！”恰雷施展着拉关系的本领。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假装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工夫，没有听清他的话。恰雷的为人固然很好，但毕竟谈不上志同道合；跟这样的人交往说不定有损体面。卢萨诺夫想找一个比较得体的借口拒绝他。

他们走到台阶上，拉甫利克已经把“莫斯科人”牌小轿车掉过头来准备起步。恰雷立刻凭眼光估量了一下车的成色，他并不问：“是你的吗？”而是直接问：

“走了多少公里？”

“还不到一万五。”

“那为什么轮胎已磨成这个样子？”

“恐怕我们运气不好……。反正工人造出来就是这么个质量……”

“给你搞一副来怎么样？”

“你有办法吗?！马克西姆！”

“这算得啥?！太容易了！你把我的电话也抄去，你写！”他一个指头点在卢萨诺夫胸前。“等我出了院，一个星期内保证办到。”

这样也就不必想什么借口了！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把单位里和家里的电话都抄给马克西姆。

“行！有事互相挂电话！”马克西姆这才放他走。

玛依卡弯身钻进车内的前座，爸爸妈妈坐在后面。

“咱们算是朋友了!”马克西姆临别还让他们宽心。

车门砰砰地一一关上。

“祝你我大家健康!”马克西姆喊道，并举拳按红色战线[①]的习惯敬了一礼。

“你说现在应该怎样?”拉甫利克想考考玛依卡的驾驶知识。“这就发动?”

“不!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在空档上!”玛依卡一口气回答得十分利索。

他们一行于是出发，轮胎滚过几处还没有晒干的坑洼，只见积水四溅。汽车在矫形科大楼旁拐弯，一个穿灰色晨袍和高统靴的瘦高个儿病人恰好在沥青路面正中不慌不忙地散步。

“嗨，好好向他按几下喇叭!”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看见后说。

拉甫利克按了几声短促而尖厉的喇叭。瘦高个儿猛地转身回过头来。拉甫利克加大油门从那人旁边十公分的地方窜过去。

“我管他叫食骨者。你们想象不到这家伙有多么讨厌，对什么都眼红。卡芭，你不是见过他吗?”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巴西克?”卡芭叹道。“有人幸福，就有人眼红。你想做一个幸福的人，总少不了惹人眼红。”

“这是一个阶级敌人，”卢萨诺夫嘀咕着。“如果在另一

---

① 1924年，德国无产阶级建立名为“红色战士同盟”的自卫组织，领导者为台尔曼。这个组织的机关刊物名为«红色战线»。——中译者注

种环境下……”

“刚才应当把他轧死，你干吗叫我按喇叭？”拉甫利克笑了起来，并回头看了一眨眼的工夫。

“你别把脑袋乱转！”卡碧多里娜·马特维耶夫娜吓了一大跳。

车果然往斜处一偏。

“你别把脑袋乱转！”玛依卡也说了一遍，接着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我可不可以转哪，妈妈？”说着，她一会儿从左边，一会儿从右边把小脑袋转到后面去。

“我决不让他带着姑娘们去兜风，这一点他必须记住！”

汽车刚出医疗中心的大门，卡芭便放下一扇玻璃窗，把一件不知什么小东西往车后扔了出去，并说：

“但愿永远不要再到这鬼地方来！谁也不许回头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却在车后向他们大声骂娘，用了长长一大串脏话，骂得淋漓尽致。

不过他心里想的却是：他出院时也一定要在上午离开。如果按惯例在中午出院，对他极不方便，因为这样他就哪儿也来不及去了。

这里已答应明天让他出院。

晴朗明媚的一天气温愈升愈高。一切都很快被晒热、烤干。在乌什-铁列克，人们想必也已经在翻耕宅旁园地，整修灌溉沟渠。

他一路散步，一路遐想。真幸福：隆冬严寒他离开乌什-铁列克时准备客死异乡，如今回去正是大好春光，可以把他

的一小块园地种上作物。把种子栽入地里，然后看它生长发育——这是极大的乐趣。

只不过人家种园地都是成双配对的，他只有一个人干活。

他走着，走着，给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去找护士长。当初米塔曾把他拒诸门外，说医院里"没有床位"——那已经成了过去的事。现在他们早已互相熟悉。

楼梯下米塔的那间斗室没有窗户，全靠电灯照明(刚从户外到这里来，肺部和眼睛都受不了)。她坐在里边，把一些登记卡片从这一叠搬到那一叠堆砌整理。

科斯托格洛托夫低头钻进矮小的门框，说：

"米塔！我有件事求您。这要您帮个大忙。"

米塔昂起线条并不柔和的长脸。姑娘生就这样寒碜的一张脸，直到四十岁都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吻一吻，摸一摸。凡是能够使面部显得比较生动的温柔表情，始终没有表现出来。米塔已成为一匹驮马。

"什么事？"

"我明天出院。"

"非常为您高兴！"米塔心地相当善良，只是乍看起来好象挺凶的样子。

"问题不在这里。我得利用一天时间在城里办完好多事情，当天晚上离开。可是衣服从存放处拿来总是很晚。我的好米塔，您看能不能这么办：今天就把我的东西取出来，暂时在随便什么地方塞一塞，明天一清早我换了衣服

就走。”

“这事儿可难办，”米塔叹一口气说。“给尼扎穆丁知道了……”

“他不会知道的！我明白，这是违反制度的；但是，亲爱的米塔，人要是不冲破束缚就活不成！”

“万一您明天不出院怎么办？”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已说得明明白白。”

“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接到她的通知。”

“好吧，我马上去找她。”

“您听到新闻了没有？”

“没有哇，什么新闻？”

“据说，到年底可以把我们统统放走！说得十分肯定！”一提起这个风声，她那寒碜的脸立刻变得可爱了。

“您说的我们指谁？你们？”①

“好象你们和我们都在内！您不信？”她提心吊胆地等着听他发表意见。

奥列格抓抓头顶，做了个鬼脸，把一只眼睛完全闭上，说：

“也许是的。反正不排斥这种可能性。不过，象这样的空头诺言我已经听够了，耳朵里再也容纳不下。”

“但这一回说得千真万确，绝对错不了！”她打心眼里愿意相信这消息，实在令人不忍扫她的兴。

---

① 米塔也是流放者，因为她属于日耳曼血统，不过她与因本人的问题被流放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情况不同。——英译者注

奥列格用上唇包住下唇，自思自量。当然，看样子确有什么事情在酝酿之中。最高法院倒了台。只不过步子太慢，一月来没有其他动静，不免又叫人起疑。历史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心说来发展得太慢了。

“但愿如此，”他这样说主要是宽她的心。“那时您打算怎样？离开此地？”

“不知道，”米塔几乎没有说出声来，她张开指甲很阔的手按在卷角的卡片上。这些卡片已经使她腻烦。

“您不是从萨尔斯克一带被遣送来的吗？”

“是的。”

“那里难道好些？”

“自由啊，”她轻轻地说。

不过，她多半还指望在家乡嫁人呢。

奥列格去找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起初没有找到，因为薇拉一会儿在爱克斯光室，一会儿在外科医生那里。后来，他总算看见她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一起在走廊里并肩而行，便追上去。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我想费您几分钟时间，可以吗？”

跟她一个人谈话是很愉快的。他每次都注意到，自己对她说话用的声调同对其他人不一样。

她转过头来。忙碌的惯性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她身躯的倾斜度、两手的姿势和全神贯注的面部表情上。但她照例本着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认真态度停下来。

“什么事？……”

她没有加上“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称呼。只有在向医生和护士以第三人称方式提到他的时候，薇拉才如此称呼他。当面从不直呼其姓。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我想请您帮个大忙……。您能不能通知一下米塔，说我准明天出院。”

“这有什么必要？”

“非常必要。您瞧，我明天晚上就得离开本市，这就是说……”

“列夫，这样吧，你先去！我回头就来。”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走了，一路摇晃着略有些伛偻的身躯，一双手插在白大衣前兜里，背部把系带绷得紧紧的。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对奥列格说：

“到我那儿去吧。”

她走在科斯托格洛托夫头里，体态轻盈，步履轻快。

她把奥列格带到器械室，当初他曾在那里跟董佐娃辩论了半天。薇拉就在那张刨工很差的桌旁坐下，并示意奥列格也坐到那里去。可是他继续站着。

除了他们俩，室内一个人也没有。照到这里来的阳光象一根金色的斜柱，只见尘埃飞舞，此外还有器械的镀镍部分闪出反光。屋里亮得使你睁不开眼睛，给人一种欢快的印象。

“万一明天我来不及让您出院，那怎么办？您要知道，我得写一份 epicrisis。”

他拿不准，薇拉这话纯粹是公事公办，还是故意逗他。

“写 epi——什么？”

“Epicrisis——病案总结。不写好 epicrisis，就不能给病人办出院手续。”

这纤弱的肩上压着多少工作啊！哪儿都在等她，哪儿都叫她去，可是他还要占用她的时间，还要写病案总结。

然而她却容光焕发地坐在那里。不单是她本人，不单是这种善意的、甚至亲切的眼神在熠熠闪光，而且强烈的反光也从她娇小的身躯周围成扇形辐射开来。

“您是不是希望马上离开本市？”

“并不是我希望如此，我心里是很乐意留下的。可是我没有地方住宿。我可再也不愿在火车站过夜。”

“是啊，您又不能去住旅馆，”她点点头，接着又皱眉蹙额说道：“真不凑巧，我们有一个女工友，病人常常在她家借宿，偏偏目前她正在病假中，没来上班。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她沉吟半晌，用下面一排牙齿磨了几下上唇，同时在纸上画了个 8 字形的辫子面包。“其实……我认为……您完全可以住在……我家里。”

什么??难道她真的这样说了？不是他听错吧？能不能请她再说一遍？

她的两颊明显地泛起红晕，但眼睛仍旧回避正面看他。她说得十分大方，仿佛病人到医生家里过夜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明天正好是我上班时间比较特别的一天：我上午在医

院里只待两个小时，然后整个白天在家；下午四点以后再走……。我到熟人家去借宿一宵不成问题……”

这时她终于抬头看他。薇加两颊绯红，目光明净无邪。未知他理解得是否正确？他会不会辜负向他提供的方便？

而奥列格委实不知从何理解起。当女人说这样的话时，难道是能理解的吗？……这可能意味着无限深情，也可能远非如此。但他并不考虑，也没有时间考虑，因为薇加摆出光明磊落的态度等着他回答。

“谢谢，”他迸出这么一句。“这……当然再好也没有。”他把简直远在一百年前的童年时代接受的教诲——如何保持潇洒的风度，如何彬彬有礼地答话——统统忘了。“这太好了……。可是怎能让您自己……我实在过意不去。”

“您不必有什么顾虑，”薇加带着令人宽慰的笑容说。“如果您需要待两三天，也可以想办法。您不是对这个城市有些留恋吗？”

“当然留恋……。对了！不过，这样的话，证明上的出院日期就不能写明天，得写后天！否则，监督处可以找我的岔子：为什么我当天不走？弄得不好，还可以再把我关进班房。”

“好吧，好吧，要作弊就作到底。我得今天去通知米塔，明天让您出院，证明上写后天的日期，对不对？您这个人的花样真多！”

然而，她的眼睛并没有被复杂的花样所迷乱；相反，她的眼睛在笑。

“不能怪我花样多，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是制度太复杂！给我的证明还跟别人的不一样：别人只要一张，我要两张。”

“做什么？”

“一张要交给监督处存档，另一张给我带走。”

（对监督处也许他能想办法搪塞过去，他可以大声赌咒，说证明只有这一张。他自己多留一张总是有备无患。以前他为了一纸证明吃那么多苦头，难道就白吃了不成？……）

“索性再给你第三张应付火车站。”她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这是我的住址。要不要告诉您怎么走？”

“我能找到，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

（且慢，她不是开玩笑吧？……她是当真邀请他去，还是怎么的？）

“还有……”她把几张长方形的现成处方附在地址一起。“这就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所说的那种药。给您几张同样的药方，这样剂量不致显得太大。”

那种药！那种！

她的口气好象提到一桩无足轻重的事情，仅仅是地址的小小附件。她给他治了两个月的病，居然只字不提这事，修养真好！

这想必就是所谓得体。

她已经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工作在等她。列夫在等她……

忽然，在充溢全室、成扇形辐射开来的反光映照下，奥列格仿佛这时才第一次见到她。她是如此洁白、轻盈、苗条，如此体贴、热心而又……必不可少！仿佛这时才第一次见到她！

他顿时喜不自胜，极想一吐心曲。他问道：

“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上次您为什么缘故生我那么大的气？”

她从周围的光圈中望着他，脸上的微笑别有一种聪慧的韵致。她说：

“难道您就没有一点儿不对的地方？”

“没有。”

“一点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

“您好好想想。”

“我想不起来。您能不能提醒我一下？”

“我得走了。”

钥匙在她手里。她得把门打开，走出房间。

可是跟她待在一起实在太好了！哪怕这样站上一天一夜也无所谓。

她离开器械室沿着走廊而去，奥列格站在后面，望着她娇小的背影渐渐去远。

他随即又出去散步。户外春意盎然。他漫无目的地走了两个小时，贪婪地猛吸空气，摄取热量。他已经舍不得离开这个自己曾被幽囚在此的小花园。想到自己不能眼看这

些日本槐树开花，不能眼看栎树迟绽的叶芽吐青，不禁有些黯然。

今天他好象连恶心的感觉也没有，也不象往日那样虚软。这时他十分乐意翻翻土、种种地。他很想干点儿什么，但到底想干什么——自己也说不上来。他发现大拇指在食指上面下意识地空捻，想摸支烟抽。不，哪怕做梦想抽烟也不行。戒了就是戒了，决不反复！

第二次散够了步，他再去找米塔。米塔果然够朋友：奥列格的一只背包已经领来藏在浴室里，而浴室的钥匙将交给晚上来接班的一个工友老妈妈。下班前他必须到门诊部去领取各项证明。

他出院这件事正在一步步变成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实。

他登上扶梯——这即使不是最后一次，至少也是剩下不多的几次中的一次。

到了楼上，他遇见卓娅。

“近来觉得怎么样，奥列格？”卓娅挺自然地问。

她的态度大方得出奇，绝无勉强的痕迹。仿佛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没有互相使用亲昵的称呼，没有唱着《流浪者》中的插曲跳舞，没有氧气筒旁的那一幕。

也许她做得对。难道应该时刻提醒过去的事？应该念念不忘？噘嘴赌气？

从某一天卓娅值夜班的晚上开始，奥列格不再到她身边去鬼混，而是上床睡觉。从某一天晚上开始，卓娅也摆出若无其事的架势拿着注射器走到他床前，他就侧过身去让

她打针。他们之间逐渐形成的关系犹如曾经被提在两人当中的那只鼓鼓囊囊的氧气袋，从那时起突然慢慢地松弛下来，直至完全消失，唯余一句友好的问候：

“近来觉得怎么样，奥列格？”

他用两条长胳膊撑住身子靠在一把椅子上，让一绺乱蓬蓬的黑发耷拉在额前。

“白血球两千八百。爱克斯光从昨天起已经停照。我明天要出院了。”

“明天就要出院？”她把金色的睫毛往上一扬。“那就祝您一路顺风！恭喜您！”

“难道我还有什么可祝贺的？”

“您太不知足了！”卓娅摇摇头说。“不妨好好回想一下，您第一天到这里是怎么个模样！当时您大概以为顶多只能再活一个星期吧？”

这也是事实。

应该说，卓娅是个不坏的姑娘：她爽朗、勤快、诚恳，想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撇开他们之间似乎相互欺骗了对方这一层难以为情的感觉，一切从零开始，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友好相处呢？

“没想到，”他笑了笑。

“没想到，”她也笑了笑。

卓娅没有再提买绣花线的事。

事情便到此为止。她将继续每星期到医院来值班四次，继续背教科书，偶尔绣绣花，在城里参加晚会，跳完了舞跟

某个男人站在暗处……

毕竟不能因为她才二十二岁，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都健康正常而生她的气。

“祝您幸福！”他摆脱了一切委屈情绪说。

接着便走开去。忽然，卓娅同样光明磊落、大大方方地叫住了他：

“奥列格！”

他回过头去。

“您恐怕没地方住宿吧？这是我家的地址。”

（怎么？她也？……）

奥列格望着她，茫然不知所措。这实在超出了他的悟性所能理解的限度。

“我那儿很方便，就在电车站附近。家里只有我和奶奶，我们有两间小屋子。”

“十分感谢，”他困惑地接过一张小纸片。“不过，我恐怕不一定……。反正到时候再说……”

“说不定会有用的，谁料得到呢？”她笑眯眯地说。

总之，他觉得在泰加森林里辨别方向也比了解女人的心思来得容易些。

他又走了两步，看见西布加托夫冷冷清清地仰卧在气闷的穿堂角落里一张硬板床上。即便象今天这样明媚辉煌的晴日，此地也只有间接而又间接的一点点反光透进来。

西布加托夫两眼望着天花板。

这两个月以来，他消瘦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他的硬板床沿上坐下。

“沙拉夫！到处都在沸沸扬扬地传说：所有的流放者都可以恢复自由，包括特种流放和行政流放。”

沙拉夫没有向奥列格转过头来，只移动视线。除了说话的声音，好象什么也没有触动他的感官。

“你听见没有？包括你们和我们。我不是瞎说一气。”

可是他毫不动容。

“你不信？……你不想回到家乡去？”

西布加托夫重又把视线移到天花板上。他分开嘴唇，以无动于衷的语气说：

“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奥列格把一只手搁在西布加托夫胸前的一只手上，那只手就同死人的差不多。

奈丽亚从他们身旁一跃而过，向病房里冲进去。

“你们这儿还有没有盆子留下？”接着她回过头来。“喂，蓬头鬼！你干吗不吃饭？快把盆子腾出来，要我等你不成？”

哎哟！科斯托格洛托夫错过了吃饭时间也没有发觉。真是昏了头！不过，有一点他不明白。

“这关你什么事？”他问。

“怎么不关我的事？如今我是配膳员了！”奈丽亚挺神气地宣布。“瞧，多干净的罩衫！”

奥列格站起来去吃最后一顿医院的午餐。无形无声的爱克斯光在不知不觉中已把他的食欲摧毁殆尽。但是，按照囚犯的不成文法典，盘子里是不应剩下食物的。

"快，快，快点吃下去！"奈丽亚在一旁发号施令。

不光罩衫是新的，连她的头发也卷成一种新的款式。

"嘿！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大为诧异。

"本来嘛！我也太傻了，为了三百五十个卢布整天在地板上爬！连一口饱饭也吃不上……"

第三十四章

比较悲惨的结局

“是时候了，我也该走了，”——如同一个比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老人会感到寂寞和空虚一样，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经觉得待不住，虽然没有一个床位空着，虽然人还是那些人，虽然老问题仍被当作新问题摆到他们的面前：是癌不是癌？能治不能治？有什么别的办法治疗？

傍晚，瓦吉姆走了——他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离开这间病房的人。胶体金已经送到，他被转到放射病室去了。

于是便留下奥列格把一张张床位反复看遍，回想着每一张床最初住的是谁，先后死了多少人。屈指数来，死去的人似乎不算多。

病房里闷得厉害，外边又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下前把一扇窗稍微打开些。春天的空气隔着窗台向他滚滚袭来。在医疗中心的另一边，紧挨着它的围墙，坐落着一些又老又矮的房子，从那儿的小院落里也传来一阵阵春天的声息。由于隔着医疗中心的砖墙，这些小院落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见的，但此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声响：一会儿是

门声，一会儿是孩子的喊声；有醉后的喧哗，有唱片的尖叫；熄灯后，已经很晚了，还可以听到一个深沉有力的女低音拉着长调在唱，不知是伤心还是得意：

> 她把一个矿工小伙子，
> 带回到家里来——来……

所有的歌都是唱的这个。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这个。可是奥列格必须想点儿别的。

明儿一大早就得起床，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这一夜奥列格怎么也睡不着。有意思的和无聊的事情象未经剪辑的影片胶卷都在他头脑里拉开：与卢萨诺夫的辩论还没有结束，舒路宾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自己也还有些论点要向瓦吉姆阐述。眼前又出现被枪杀的茹克的脑袋，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着卡德明夫妇栩栩如生的面容。他要向他们缕述千万件城里的见闻印象；他们则要告诉他，镇上出了哪些新闻，这一时期他们收听到哪些音乐节目。那时，矮小的土屋在他们三人心目中将包罗整个宇宙。他想象着十八岁的英娜·施特律姆脸上不经意的傲慢表情，奥列格往后连走近她也不敢了。还有这两份邀请——两个女人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叫他伤透脑筋：究竟该怎样理解她们的意思才对？

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为自己打算的好心”这样的现象或这样的观念。奥列格

干脆已经把它给忘了。现在，他思来想去，觉得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解释成纯粹的好心。

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如何对付？——这些他都不得其解。

他辗转反侧，手指不停地空捻无形的烟卷……

奥列格索性从床上起来，出去走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紧靠病房的门，西布加托夫照例在地上一只盆里坐浴，还想保卫他的骶骨——但已不象先前那样耐心地抱着希望，而是笼罩在绝望的迷惘之中。

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布加托夫，有一个肩膀狭窄、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罩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是那几名护士中的一个。今夜是图尔贡值班，他八成已经在医生会议室里睡觉。这是那位出类拔萃、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工友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做完，此时正坐在那里看书。

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内，这位勤谨的、脸上悟性洋溢的工友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得很深的靴子，从未骂过一声；她还用抹布揩拭壁上的嵌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净锃亮；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给拿来或取走。

她愈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她在癌症楼里就愈不为人所注意。有句古话说了已经两千年：长着眼睛不一定看得见。

然而，艰辛的生活却能磨炼人的视觉。在这一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能互相认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仿佛额上有什么发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打着什么烙印似的。（其实这方面的迹象多得数不胜数，例如：脱口而出的某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字句之间嘴唇的翕动；别人表情严肃的时候，某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某人却绷着脸。）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不费一点力气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同样，只要曾经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之中的人也有这种本领。

科斯托格洛托夫和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招呼。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

现在奥列格走到她坐的小桌旁边，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响声，免得她受惊。

“晚上好，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

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单是她转过头来这一动作本身，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应召动作就不一样，其间的区别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晚上好，”她微笑作答，俨然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自己家里接待嘉宾的身份礼仪。

他们满怀善意、不慌不忙地互相看着对方。这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互相提供帮助，然而事实上却是爱莫能助。

奥列格歪着头发蓬松的脑袋，想看看那是本什么书。

“又是法文？是什么书？”

这位奇怪的工友回答时把“l”这个音发得比较软。

“克劳德·法雷尔[①]。”

“您这些法文书都是哪儿来的？”

“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个老妇人那里借来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犹如一条狗斜瞅着一只鸟的标本，问道：

“为什么您尽读法文书？”

她眼角和嘴角外侧成放射状的皱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历经的磨折，也刻着智慧。

“读起来不那么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语调素来温和。

“又何必怕痛呢？”

他站久了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到他身边。

“我们俄国人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怕有两百年了吧？聒噪得人们的耳膜都胀破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哝道。“即使没有到过巴黎的人，大概对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咖啡馆也都了如指掌。可是我偏偏不凑趣：我对巴黎一点也不向往！”

---

① 克劳德·法雷尔（1876－1957）——法国作家，写过一些以异国情调和惊险情节为中心的小说。——中译者注

“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跟着也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监督?”

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象是刚刚开始，可是随即就继续不下去了。

“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牢骚颇盛。“他们整天嘁嘁喳喳，感情特别容易冲动，无谓的口舌也多。真想给他们泼一瓢冷水，问一问：嗨，朋友！要你们干重活，行不行?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热汤，可受得了？啊?”

“这没有道理。人家甩掉黑面包是花了力气的。”

“也许如此。也许我是出于妒忌。不管怎么样，反正很想扫扫他们的兴。”

科斯托格洛托夫坐在椅子上左右摇晃，似乎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十分自然地开门见山问道：

“您是因丈夫的关系连坐呢，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

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一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捕的。闹不清究竟谁为谁连坐。”

“目前都在一起吗?”

“哪里?！女儿死在流放地。战后我们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关到营里去了。”

“现在只有您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儿子。八岁。”

奥列格看她的脸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

是啊，他们进行的是事务性谈话。

“第二次在四九年?”

“对。”

“意料中事。在哪个营？”

“最近的车站叫泰舍特。”

奥列格又点了点头，说：

“明白了。那是湖区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过那里？？”她到底不能遏制心中的希望！

“没有。只不过知道罢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纵横交叉的。”

“一个姓杜扎尔斯基的，您遇见过没有？……哪儿也没有？……”

她还抱着希望！也许碰到过……。马上就可以谈他的情况……

“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两封信！”她抱怨道。

奥列格点点头。一切正常。

“可是去年只寄来一封信。在五月份。以后就一直没有……”

她已经只剩下一线希望。只有一根线。女人哪！

“这算不了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满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两封信——您可知道一共要几千几万封？可是检查当局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基营里，有一个当炉匠的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他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

封没有寄出的信。那是他们忘记烧掉的。”

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言劝慰，尽管她好象早就应该习惯于任何情况，此刻她还是瞪出一双惊恐异常的眼睛望着科斯托格洛托夫。

人难道永远摆脱不了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的喽？”

她点点头。

“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想找待遇好一点的工作到处碰壁？到处遭人指责？想必你们母子住在很小的窝棚里吧？”

他用的是提问的口气，但这些问题一个也无须乎回答。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甚至令人牙床发酸。

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的一双小手，由于经常洗被服、擦地板和泡在热水中皮肤已受尽折磨，另外还有不少淤斑和伤疤。她把这双手放在一本软面平装、开本小巧玲珑的厚书上，书的用纸与国产纸张显然不一样，页边由于裁切日久有些不太光洁。

“如果仅仅是窝棚小点儿，问题还不大！”她说。“麻烦的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把全部真相压到他身上去吗？这会把大人也压沉，把肋骨也压碎的！要是隐瞒真相，促使他和生活妥协——这样做对不对？他父亲会怎么说呢？再者，究竟是否瞒得住呢？孩子自己有眼睛，他也看得出来。”

“把真相压上去！”奥列格毫不犹豫地把一只手掌压在

台玻璃上。他说这话的口气好象自己曾亲手把几十个孩子抚养成人，而且无不灵验。

她曲着两只手支住头巾下的太阳穴，眼睛忧虑地望着奥列格。是不是触着了她的神经？

“父亲不在家里，教育儿子可真难哪！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固定的生活轴心和指针，可是哪有这样的条件？我老是摸不准方向，不是往那里偏，就是朝这里斜……”

奥列格不做声。象这样的说法他过去也听到过，但不明白道理何在。

“因此，我就读一些法国旧小说，不过也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否故意避而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是否也存在这样残酷的生活——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

“作为麻醉剂？”

“善哉善哉，”她略略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象个出家人。“在我们身边，几乎没有什么书不叫人读着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作傻瓜。有的书倒是不说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煞有介事地研究某某大诗人于一八××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女士是谁。也许他作这番考证花了不少功夫，可是这太安稳了！他们选择了一条绝无风险的坦途！只不过今天在受苦受难的活人跟他们全不相干。”

她年轻时可能叫丽丽亚。当年这条鼻梁上还丝毫看不出架眼镜的凹痕。她何尝没有过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妙

龄期？她的一生中又何尝缺少紫丁香、花边裙衫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卜赛女人决不可能预言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

“在我看来，书本里、舞台上的一切悲剧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坚称。“阿伊达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1]……可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到湖区营去……”

“不用去！去了也是白搭！”

“……孩子们在学校里写作文的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什么什么的一生。但是，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人，骄傲的人！可要是和平时期有穿军大衣、戴尖顶帽的人闯进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让带你的一双纤弱的手所能带的东西……”

这双眼睛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从那里再也流不出什么来了。不过，里边也许还会燃起一团炽烈的火，那时她将对这个世界发出最后的诅咒。

---

[1] 阿伊达是意大利同名歌剧（威尔地作曲）中的埃塞俄比亚公主。她被俘往埃及当奴隶。埃及将军拉达梅斯爱上了阿伊达，准备和她一起逃出埃及。事发后，拉达梅斯和阿伊达双双被活埋在地牢内。——中译者注

"……你要是开门招呼路上的行人，问他们是不是愿意从你家里买点儿什么，或者说，扔几个铜板给你买面包；那时，一些嗅觉灵敏的生意人——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好意思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的钢琴；那时，你的小女儿头上扎着蝴蝶结，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终于放声大哭，跑开了；试问，我还有什么必要再读《安娜·卡列尼娜》？难道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什么书里能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直要过一百年不成？"

虽然她差不多已经在大声疾呼，然而多年恐怖的训练毕竟没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没有呼号，这不是呼号。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见她的声音。

此外也许还有在盆里坐浴的西布加托夫。

从她这番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宁格勒？"奥列格问。"一九三五年？"①

"您认出来了？"

"您住在哪一条街？"

"富尔什塔德街，"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回答时比较缓慢，声调悲切，但又略带欢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

---

① 1934年12月，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这里指随后开始的"大清洗"。——中译者注

“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

“十四岁。”

“什么也记不得吗？”

“很少。”

“记不得了？那时就象发生了地震——住宅的门户洞开，人们进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全城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记不得吗？……”

“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这没有成为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

象一匹缰绳被勒紧的母马，这位行将进入老年期的工友把脑袋上下移动，她说：

“关于列宁格勒被围困的时期，任何人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有人写长篇史诗！这是允许的。可是围困以前，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是啊，是啊。记得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娅坐在此刻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坐的地方，他——奥列格——也坐在这里，他们就在这张小桌旁、这盏台灯下闲谈。那时谈什么来着？不也是谈围困吗?!

至于在围困时期以前，那座城市里确实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奥列格叹息一声，弯着臂肘斜托脑袋，沮丧地望着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

“惭愧，”他轻声说道。“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

自己或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不当它一回事。人类的性格为什么是这样的？”

在这以前，他把自己付出的代价看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认为女人所要求于一个男人的不能比这更少了，仿佛生活的意义完全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以外在他的祖国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现在他感到惭愧。

心中固然惭愧，但也感到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象一股潮水，在退潮时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这以前若干年，”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十万人。当时我们难道很有感触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些什么贵族呵！不是老，就是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看着无动于中，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

“你们也买了他们的钢琴？”

“可能也买了。当然买了。”

奥列格这才看清楚，这个女人还不到五十岁。可是单看表面，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绺头发也同一般老人的头发那样平直，再也卷曲不起来。

“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的？为了什么？根据什么罪名？”

“什么罪名？无非是社害。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是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什么人？”

“老百姓。乐团里的长笛手。喝醉了酒爱发议论。”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她也是这样早老，也是这样谨小慎微的知识妇女，因为没有丈夫而束手无策。

如果住在同一个城市，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些帮助，把她的儿子带上正路。

但是，就象被用针钉在一格格框子里的昆虫那样，各人有各人的定位。

"和我们相熟的一户人家，"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便滔滔不绝地讲着，讲着，"有一男一女两个大孩子，都是富于热情的共青团员。忽然他们全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要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即日起不再把我看作某某人、某某人的儿子或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弓起背脊，耸出瘦削的肩膀，耷拉着脑袋。

"很多人写了……"

"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整理行装去放逐地。"

西布加托夫的角落里有了动静。他攀住床架子，正在从盆里站起来。

叶丽扎薇塔·阿纳托里耶夫娜赶紧为他端起那盆水拿出去倒掉。

奥列格也站起身来，在上床之前下楼去走一遭。

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子门前经

过。原来和焦姆卡同住的一个手术后病人在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给了刚开过刀的舒路宾。

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半开着，里边黑洞洞的。黑暗中可以听到费力的嗞嗞声。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或者在其他病人那里，或者在睡觉。

奥列格把门开大些，探头进去。

焦姆卡睡着。嗞嗞声是舒路宾在呻吟。

奥列格跨进去。走廊里的灯光从半开的门外透进一点儿来。

“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

嗞嗞声停了下来。

“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

“啊？”迸出的这一声也象是呻吟。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点儿什么？……要开灯不？”

“是谁？”先是惊恐引起一阵咳嗽，接着又是一连串呻吟，因为咳嗽把他震痛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他已经走到床前弯下腰来，开始辨认枕头上舒路宾的大脑袋。“您要什么东西吗？要不要叫护士？”

“不——要——紧，”舒路宾好不容易说出这么句话。

他没有再咳嗽，也不呻吟。奥列格对黑暗愈来愈适应，甚至能分辨枕头上一绺绺的鬈发。

“我不会整个儿死灭，”舒路宾喃喃地轻声说。“我不会

整个儿死灭。”①

看来他在说胡话。

科斯托格洛托夫摸到被子上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把它按住……

“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您还要活下去！顶住，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

“一小块碎片，可不是吗？……一小块碎片？……”病人继续喃喃低语。

奥列格这才领悟到，舒路宾非但没有说胡话，而且认出了他，并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我十分清楚地感到，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象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非常崇高的东西在！可能是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

① 普希金于1836年所写的一首诗《我为自己树了一座非手造的丰碑》中有这样两句：

> 不，我不会整个儿死灭——灵魂在诗歌中
> 将比我的躯壳寿命更长，得免朽败。

——中译者注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

大清早，别人都还睡着，奥列格已悄悄地起来，按要求铺好了床——把被里子折起四只角，穿上沉重的皮靴，踮着脚走出病房。

图尔贡两手交叉叠在一本翻开的教科书上，他把黑发浓密的脑袋搁在胳臂上，坐在护士桌旁睡觉。

楼下的一个老年女工友为奥列格开了浴室门，他在那里换上了自己那一身两个月没穿已变得很陌生的衣服：一条腿部肥大的旧军裤、一件棉毛混纺的军服上衣、一件军大衣。奥列格在劳动营里的时候，这些衣服也一直存放着不穿，所以还没有完全磨破。他的冬季便帽是到了乌什-铁列克以后才买的，由于尺寸太小，脑袋被箍得很紧。这一天估计比较暖和。奥列格决定干脆不戴帽子，因为戴上它实在象个稻草人。他的皮带也不是束在军大衣外边，而是束住大衣里边的军服上衣。这样走在街上，人家还以为他是个复员军人或者从禁闭室逃出来的士兵。帽子塞在行李袋里——这只前线带回来的帆布长袋已经很旧了，上面沾满油污，一处曾被篝火烧穿，另一处是弹片窟窿的补钉，当初

奥列格的姑妈就把它送到监狱里来，因为他要求不把任何好东西带到营里去。

但是，比起刚脱下的病人服来，就连这样的打扮，也显得体面、精神，甚至健康。

科斯托格洛托夫急于尽早离去，免得被什么事情耽搁。女工友拔去插入外门门把的闩，放他出去。

他踏上台阶，站住了吸一口气。这是还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尚未被搅浑的清新的空气！他望出去，眼前是一片生气蓬勃、绿意渐浓的世界！他略略抬起头来，只见已经升起、但被什么东西挡住的太阳把天空映成玫瑰色。他把头昂得再高些，见满天的纺锤形卷层云一条条都是千百年苦心琢磨成就的工艺品，可是总共只有几分钟工夫就要飘散，仅供少数昂首仰视的人——也许全市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一个人——欣赏。

而一只线条优美的银舟正在漂越泛着碎锦、花边、羽毛、泡沫的云海，那是还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弯残月。

这是创世的早晨！仅仅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世界正在重新创造。走吧！活下去吧！

只有镜子一般澄澈的月亮不是映照恋人的新月。

奥列格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他不是笑对任何人，而是笑对天空和树木，并且满怀即使是老人、病人也无例外地沉浸其间的那种早春清晨的欢乐，顺着熟悉的路径走去，除了一个扫院子的老勤工外，没遇见任何人。

他回首反顾癌症楼。这座一半被几株修长的美国白杨

遮住、由浅灰色的砖头一块块垒起来的建筑物，七十年来丝毫未曾见老。

他一路走，一路向医疗中心的树木告别。械树上已挂起一串串耳环似的柔荑花序。樱桃李已经开出第一批白花，但樱桃李的叶子使花看起来象是淡绿色的。

可是这里杏树却一棵也没有。据说，杏树已经开花了。到老城可以看个痛快。

在创世的第一个早晨，谁能不干出点儿傻事来？奥列格把原先的计划统统推翻，换上一个荒乎其唐的念头：趁大清早立刻赶奔老城去看杏花。

他走出病人不得逾越的大门，看到电车掉头处一片几乎无人的广场。两个月以前，被正月的寒雨淋得浑身湿透的他，走进这座大门时垂头丧气，万念俱灰，准备死在这里了。

这次走出医院的大门又何异于走出牢门？

在奥列格争取住院的一月份，噪音刺耳、振动剧烈、挤得要命的电车曾使他吃够了苦头。此时，他舒舒服服地靠窗坐着，甚至车身格唧唧晃荡的声音他也不讨厌。乘电车是一种生活，是一种自由。

电车从桥上渡过一条河。桥下根脚虚软的柳树弯着腰，垂向黄褐色急流的柳条已放胆吐青。

便道旁的树木也披上了新绿，但还没有遮住由不慌不忙的人们不慌不忙地建造得挺结实的单层砖房。奥列格看着相当羡慕：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多幸福啊！电车经过的

一些街区也奇妙得很：人行便道很阔，林荫马路宽敞。其实，在一个玫瑰色的清晨，每一个城市都能叫人悦目赏心！

街区的面貌渐渐开始变换：林荫马路不见了，街道两旁互相靠拢，车窗外掠过一些不讲求美观和坚固的急就章式房屋，想必是战前不久盖的。在这一带，奥列格看到一条街道的名称似曾相识。

对了：卓娅就住在这条街上！

他掏出纸质毛糙的小记事本，找到了卓娅家的门牌号码。他重又向窗外观望，趁电车放慢速度的当儿看到了那所房子：两层楼，窗户式样不一，大门经常洞开或已彻底毁坏，院子里还有几间厢房。

他可以在这里附近下车。

他在这个城市里决非丧家之犬。他应邀来到此地，邀请他的是一位姑娘！

但他继续坐着，几乎怀着快乐的心情承受车身的颠簸和轰响。车上仍旧没有挤满乘客。奥列格对面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乌兹别克老者，看样子不大寻常，象是博学宿儒。他从女售票员手中接过车票后，把它卷起来插在耳朵里。他就这样坐着乘车，一张淡红色的小纸卷露出耳外。在进入老城的时刻看到这样一个质朴的细节，奥列格益发感到心情舒畅。

街道愈趋狭窄，一些矮小的房子肩挨着肩挤做一团。再过去，房屋连窗户也没有了，但见一堵堵滑秸泥砌的无窗高墙；即便有房子高出土墙，也只是用粘土抹得光溜溜的无窗

背面。土墙上只有小门或很矮的月洞——得猫着腰才进得去。从电车的踏脚磴到人行便道只须一跳，而这里的便道宽仅一步。电车经过时把马路都填满了。

这大概就是奥列格前往探杏的老城。只不过光秃秃的街上什么树也没有，更谈不上开花的杏树。

不能再继续空待。奥列格下了车。

现在他也能看到跟刚才一样的景致，所不同者步行的速度慢些。离开了格啷啷晃荡的电车，可以听见一种象是敲铁的声音。不久，奥列格看见一个头戴黑白小圆帽、身穿黑布棉袍、腰束粉红围巾的乌兹别克人。那人蹲在当街，将单线电车道的路轨当铁砧，用锤子在把一柄锄头的锋缘敲圆。

奥列格感慨万千地站住：真不愧为原子时代！直到现在，这里也跟乌什-铁列克一样，钢铁还是那么稀罕，居然找不到比铁轨更合适的砧子。奥列格观察那个乌兹别克人是否来得及在下一辆电车驶近前干完。可是那人一点儿也不着急，慢条斯理细心敲打，当电车轰隆隆地从下面开上来时，他就往一边让开半步，等车过去后再蹲下来。

奥列格望着这个耐心的乌兹别克人的背脊，望着他腰间的粉红色围巾（此时已转为浅蓝的天空把刚才那层玫瑰色全给了这条围巾）。跟这个乌兹别克人他说不上两句话，但在感情上却把他当作一个勤恳的兄弟。

在春天的早晨锤打锄头——这难道不是新生？

“好！……”

他慢慢走着，心中直纳闷儿：怎么看不见窗户？他想朝土墙里边张望一下。但是小门关着，不好意思闯进去。忽然，从一个小小的通道里射出来的光线把他照了个透亮。奥列格弯下腰来，通过一段有点潮气的隧道走进院子。

沉睡的院落尚未醒来，但不难料想此地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树荫下有一张固定在地上的长椅和一张桌子，散扔在那里的儿童玩具颇为时式。自来水龙头滋润着这里的生活，旁边有洗衣服的水槽。院子周围全是窗户，敢情房屋里边窗子很多，但都是朝院子里开的，临街的一扇也没有。

奥列格在街上走了一阵，又通过类似的小隧道走进另一座院落。那里也是同样的格局，还有一个披着紫色肩巾、细长的黑发辫子拖到腰下的乌兹别克少妇在照料孩子。她看见了奥列格，但没有理会。他便走了出来。

这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习俗。在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所有的正屋窗户一定都是临街的；女主人可以象林中的伏兵隔着窗台上的盆花和窗帘看见街上走的陌生人是谁，他要去哪一家，去干什么。但是，奥列格一下子就明白并且接受了这种东方人的想法：你的日子怎么过——我不想知道，你也不要向我屋里张望！

一个在劳动营里待过这么些年头的囚犯，无时不被人看见，无处不被人搜遍，随时都处在监视下——他还能为自己挑选比这更好的生活方式吗？

他对老城的一切愈来愈喜欢。

刚才他已经从房屋之间的空隙中看到一家无人的茶馆和刚刚起身的茶博士。现在他又看到一家，开设在临街的阳台上。他走了上去。茶馆里已经坐着几个戴暗红色、深蓝色和壁毯图案小圆帽的男人，还有一个缠绣花白头巾的老汉。可是女人一个也没有。奥列格于是想起，以前他也没有在任何一家茶馆里见到过女人。虽然门口不挂禁止妇女入内的牌子，但她们照例不是接待对象。

奥列格颇有感触。在这新生的第一天，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的，一切都得重新领会。男人们聚在一起，是不是想以此表明，他们的生活的主要部分与女人无干？

他挑了一个沿栏杆的位子坐下。从这里看街景十分清楚。街上渐趋活跃，但是没有一个人象闹市里那样行色匆匆。过路的走得不紧不慢。坐在茶馆里的悠闲安详。

不妨设想，上士科斯托格洛托夫，或囚犯科斯托格洛托夫，按照人们对他的要求服满了兵役期和刑期，又被疾患所驱吃足了苦头，已经在一月份死去。如今打着趔趄从医院里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象人们在劳动营里所说的那样，“苗条、清脆而透明”。不过，等待着他的已不是完整的一生，而是生命的一个零头——犹如口粮缺秤时用细松枝扦加在面包上的一块零头：份量和大块合在一起，事实上却是单独的一块。

今天，奥列格在动用生命的这一小块零头之际，希望它不要象已经度过了的大部分那样。他希望今后不再犯错误。

可是，在选择壶茶的问题上他又犯了错误：不应当自作聪明，应当老老实实要比较靠得住的红茶。可是他抱着猎奇的目的要了一壶绿茶。这种茶既不酽，又不提神，连茶味都没有，漂在碗里的茶叶他怎么也咽不下去，只想泼掉。

其时天已大亮，太阳渐渐升高，奥列格颇想吃一点东西。但这座茶馆里什么也没有，只卖两种热茶，而且不带糖。

然而，他仿效当地那种悠闲安详的作风，并不离座去找吃的，而是照旧坐着，还把椅子重新挪动了一下。这时，他从茶馆的阳台上看见，被土墙围住的邻家院子上空有一丛粉红、透明、蒲公英似的东西，只是直径几达六米，简直是一个没有份量的粉红色气球。这样大的粉红色植物他从来没有见过。

杏花??……

奥列格心想：幸亏没有匆匆忙忙走开。往后不看清周遭的情形，决不向别处闯。

他走到紧靠栏杆的地方，从这里高处看那一片空濛的粉红色奇迹。

他把这奇迹赠送给自己，作为创世日的礼品。

如同北方的房子室内摆着一盆用蜡烛装饰起来的枞树那样，在这被土墙封闭、仅向天空开放的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杏树正在开花。孩子们在树下爬行，一个裹着黑地绿花头巾的女人在松土。人们生活在院子里就跟在房间里一样。

奥列格定睛望去。粉红色只是总的印象。杏树上有蜡

烛样的红酒色苞蕾，花瓣初展时表面呈粉红色，放开后却象樱花或苹果花那样洁白。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柔嫩得难以想象的粉红色，奥列格力图把这幅美景尽收眼底，将来可以讲给卡德明夫妇听。

他是来寻觅奇迹的，奇迹果然访到了。

今天，在这个新生的世界里，还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欢乐在等着他呢！……

银舟似的月亮已经看不见了。

奥列格下梯磴走到街上。不戴帽子的脑袋开始感到阳光的热力。得买它四百克左右的黑面包干吃下去填饱肚子，然后到市中心去。可能是穿了自己的衣服使他精神抖擞，反正他不觉得恶心，脚步十分轻松。

这时奥列格看见一个吃食摊，它嵌在土墙的凹处，没有破坏街道的齐整。摊子的布篷用两根斜杆支起作遮阳之用。从遮阳下透出一缕青烟。奥列格把脑袋低下许多才得以走到遮阳下去，站在里边脖子也不能伸直。

跟整个柜台平行摆着一只长长的烤炉。其中一处的煤烧得火红，其余的部分满是白灰。炉内火上横搁着十五六根铝制的尖头长扦，上面串挂着一块块的肉。

奥列格明白了：这不是串烤羊肉吗！在他的重新创造的世界里又添了一项发现。在监狱里谈到各种美味的时候，关于串烤羊肉的议论多极了。但奥列格本人活到三十四岁还从未亲眼看见过，因为他既没有到过高加索，也没有上过馆子，而在战前的食堂里吃的无非是煎菜卷和大麦糊。

串烤羊肉！

这种烟和肉混杂在一起的味儿十分诱人。铝扦上的肉非但没有被烧成炭，甚至没有变成暗褐色，而是呈现出刚刚烤熟时那种嫩红浅灰的颜色。卖烤肉的一张圆脸盘胖乎乎的，他把一批肉扦转身，把另一批从火上移到灰那边去。

“多少钱？”科斯托格洛托夫问。

“三个，”卖烤肉的回答时声调还带着睡意。

奥列格不懂："三个"究竟是什么？三戈比太少，三卢布又好象太多。是不是三串一个卢布？他从劳动营出来后，到处会碰上这种尴尬的局面：他怎么也把握不住准确的物价概念。

“三个卢布买多少？”奥列格想出了一个摆脱窘境的办法。

卖烤肉的懒得说话，他捏住一根铝扦的尖端把它拾起来象逗孩子似地向奥列格扬了扬，又放回原处熏烤。

“一串？三个卢布？……”奥列格摇摇头。这是另一种范畴的价格。五个卢布他得过一天。可是又多么想尝一尝啊！他把每一块肉都仔细看遍，想挑一串。每一串都有吸引人的地方。

附近等着三个司机，他们的卡车就停在街上。又有一个女人走过来，但卖烤肉的用乌兹别克语对她说了几句，她就怏怏地走开去。而卖烤肉的开始把所有扦子上的肉都放在一只盘子里，直接用手往上面撒了些葱末，还从瓶里浇了些什么卤汁。奥列格这才明白，司机们把串烤羊肉全部买

了下来，每人五串！

这是无法解释、可是到处实行的双层价格和双层工资制度，但奥列格既无法想象那第二层楼，更爬不上去。这些司机花十五个卢布小吃一顿满不在乎，这也许还不是他们的正式早餐。过这样的生活靠工资是不够的，串烤羊肉也不是卖给单靠工资过活的人的。

“没有了，”卖烤肉的对奥列格说。

“怎么没有了？全卖完了??”奥列格十分懊恼。刚才他居然还犹豫来着！这也许是一生中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机会！

“今天没有送来。”卖烤肉的开始收拾家伙，好象准备放下遮阳收摊。

于是奥列格向司机们恳求：

“弟兄们！让一串给我吧！弟兄们！只要一串！”

司机中一个面孔晒得很黑、但头发却是亚麻色的小伙子点了点头，说：

“行，拿吧。”

他们还没有付钱。奥列格从用别针别住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绿色的钞票。卖烤肉的甚至不用手接钱，只是从柜台上往箱子里一扫，就象掸去粒屑和垃圾一般。

但一串烤肉现在是奥列格的了！他把士兵的行李袋放到尘埃地，用双手接过一根铝扦，数了数上面的肉——共有五块，第六块只有半拉；然后开始用牙从扦子上咬下来，也不是一下子一整块，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咬。他象条狗把

自己所得的一份食物衔到安全的角落里慢条斯理地吃着，一边在思量这样一个问题：刺激人的欲望是多么容易，而满足被激起的欲望又是多么困难。多少年来，一块黑面包对他来说称得上大地最高级的馈赠！刚才他还打算去买些黑面包当早饭来着，可是一缕蓝幽幽的烤肉烟味儿飘来，人家给了奥列格一串让他解解馋，面包已经不在他眼里。

司机们每人吃完四五串烤肉，发动引擎走了，而奥列格还在吮他那一串上的一些残余。他用嘴唇和牙齿品尝着每一小块鲜嫩的肉如何渗出汁水，散发香味，火候到家而又丝毫不焦。想不到每一小块这样的烤肉里头竟还有这么许多天然的魅力蕴藏着未遭破坏。他愈是深入品尝串烤羊肉的滋味，口腹愈是得到满足，就愈是意识到一个冷冰冰的事实：他不可能去找卓娅了。待会儿电车又将在她家门前经过，他却不会下车。正是在吃串烤羊肉的时候，这一点他才彻底明白。

电车按原路把他载往市中心，不过这一回已挤满乘客。奥列格认出了离卓娅家最近的一个站，接着又过了两站。他不知道自己到哪一站下车比较好，忽然有一个女人从外面向车窗里叫卖报纸，奥列格想看一看这情景，因为街头卖报他还是小时候见过以后再也没见到过（最后一次正值马雅可夫斯基自杀①，那天报童奔跑叫卖号外）。但这里是个上了年纪的俄罗斯妇人，一点不麻利，找钱也很迟钝，不过总算给她想出这条谋生之道，每一辆电车到站都有人买她的

①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4月14日开枪自杀。——中译者注

报。奥列格站着看了一回。

"民警不赶吗?"他问。

"他们还没有发觉,"卖报的女人回答。

他没有揽镜自照,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模样。要是民警对他们俩打量一番,一定先检查他的证件,而不会先检查卖报女人的。

街上的电钟才指着九点,可是气温已经升得很高,奥列格开始解开大衣领子上的搭钩。他不慌不忙地走在广场向阳的一边,眯着眼睛朝太阳微笑,任凭行人把他推推搡搡,从后面赶上他。

今天,还有许多欢乐在等着他呢!……

他本来不指望能活到春天,眼前却正是这个春天的太阳。尽管周围没有人欢迎奥列格获得新生,甚至连知道这事的人也没有,可是太阳知道,所以奥列格朝它微笑。哪怕下一个春天永远不会来临,哪怕这是最后一个春天,但要知道这一个春天已经是额外的了!单凭这点,就得谢天谢地!

行人中谁也不因看到奥列格而高兴,可是他看到谁都高兴!他高兴的是自己又回到了他们中间,回到了街上所有的一切中来!在这个新创造的世界里,没有一件事物在他看来是乏味的、庸俗的或丑恶的。几个月、几年的生活也比不上今儿个这登峰造极的一天。

他看到有盛在纸杯里的冰淇淋卖。奥列格已记不起这样的小纸杯还是多久以前见过的。再会吧!——又是一卢布半飞走了。他把曾经被火烧破、被子弹打穿的行李袋挎

在肩后，腾出两只手用小木匙一层一层撇着冰淇淋吃，把脚步放得更慢。

路上经过一家坐落在背阴处的照相馆。奥列格用胳膊肘支在铁栏杆上倚立良久，端详着橱窗里那种经过净化的生活和那些经过美化的面容；当然，对姑娘们看得特别仔细，橱窗里的照片也数她们的最多。她们中的每一个先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然后摄影师把她的头转来转去，十来次移置灯光，然后拍下几张，从中选出最好的一张加以修描，平均要从十个这样的姑娘中选出一个来陈列橱窗。奥列格明明知道，然而他还是乐于观看，乐于相信生活就是由象这样的姑娘组成的。为了补偿逝去的岁月，为了补偿他不能活着见到的一切，为了补偿他如今被剥夺的一切，他贪婪地看着，看着，不怕难为情。

冰淇淋吃完了，该把纸杯扔掉，但它是那么干净、光滑，奥列格想到：路上用它喝水倒不坏。于是就把纸杯塞进行李袋，把小木匙也藏好——也许用得着。

接着他走过一家药房。药房也挺有意思！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即走了进去。里边整洁的长方形柜台一张挨着一张，够你仔细看上一整天。这里陈列的东西在一个劳动营囚犯的眼里样样都是稀奇的珍品，都是在那个世界里数十年未见到的。有些东西过去奥列格即便在失去自由之前见过，现在也说不出它叫什么名称，或者记不起有什么用处。他象个未开化的蛮子诚惶诚恐地端详各种镀镍的、玻璃的和塑料的模型。这里还有草药，包装纸上写着功效说明。奥

列格对草药非常相信，可是哪儿有治他的病的草药呢？……再往前是长长一排片剂柜。这里的新药名多得不可胜数，都是他闻所未闻的。总之，单是这家药房就为奥列格展现了一个够他观察和思考的大千世界。但他叹息着从一张柜台走到另一张柜台，只按卡德明夫妇的要求问了一下有没有水温计、小苏打和灰锰氧。水温计没有，小苏打没有，营业员叫他到收款处付三个戈比，卖了些灰锰氧给他。

后来，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配方部排了二十分钟左右的队。行李袋已从背上卸下，但他还觉得闷热。他毕竟有些动摇：药要不要带走呢？他把昨天薇加交给他的三张同样的处方拿一张出来递进小窗口。他希望这种药没货，问题便不存在了。可是药这里有。小窗里的人算了一下，开给他一张五十八卢布又几个戈比的付款单。

奥列格甚至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从窗口走开。"58"这个数字老是象影子一样追随着他① ——对此他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但要他掏出一百七十五个卢布配三张药方——这太过分了。这笔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伙食费。他本想当即把药方撕碎扔进痰盂，但想到薇加可能问起此事，便又藏了起来。

离开镜子一般整齐光洁的药房真有些舍不得。但是太阳正在迫近中天，充满欢乐的一天在向他召唤。

今天，还有许多欢乐在等着他呢！

他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从一座橱窗走向另一座橱窗，

① 奥列格是根据苏联刑法典第58条被判刑的。——英译者注

象牛蒡草似地碰到什么就挂住。他知道每走一步都会有意外的发现。

果然，经过邮局时，只见橱窗里的广告写着："请打传真电报！"真是惊人！十年前幻想小说里描绘的东西如今已在招徕行人。奥列格走进去。邮局里张贴着三十三个可通传真电报的城市名单。奥列格开始考虑：他可以往哪儿、给什么人打传真电报？但是，在所有这些分布在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大城市里，他能用自己的笔迹送去喜悦的人连一个也想不起来。

尽管如此，为了得到较真切的感受，他走到小窗前，要求让他看一下电文的表格，问字体大致何等大小。

"电报机坏了，"一个女人回答他。"打不出去。"

啊，打不出去！那就见它的鬼吧！这样倒是比较合乎我们的习惯，也比较心安理得。

他继续走去，路上看到一些海报。有杂技，还有几家电影院的广告，每一家都有日场。可是他不能把给他周游大千世界的一天工夫花在这上头。倘若真的留在城里住上几天，那末去看一场杂技也无不可。他不是跟小孩子差不多吗？要知道他还刚刚出生哩。

这时去找薇加大概是比较适当的了。

假如他果真要去的话……

怎么能不去呢？她是朋友。她发出邀请时态度诚恳，甚至有点不好意思。他在全城只有她这么一个亲人，怎能不去？

他自己心坎深处最想望的一件事就是去找她。甚至不看市内这个大千世界也要去找她。

但是总好象有一股力量把他拉住，并且接连抛出种种理由：也许时候还早？也许她还没有回去，或者家里还没有收拾停当？

再晚一些吧……

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总要停下来寻思：究竟往哪儿走好，但愿不要选错了方向。他不向任何人问讯，全凭兴之所至选择街道。

他就这样来到一家酒店门前。这不是卖瓶酒的商店，而是摆着一只只酒桶的铺子：光线半明不暗，地上半干不湿，空气中还有一股独特的酸味。原来是一家古老的小酒店！酒从桶里直接注入杯中。低档酒两个卢布一杯。比起串烤羊肉来，这确实是够便宜的！于是科斯托格洛托夫从衣兜深处掏出又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把它兑开。

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一杯未尽，他那虚弱的脑袋已开始旋转。当他走出酒店继续向前的时候，觉得生活更可爱了，虽然打早晨起生活一直向他表示好感。他的心境变得如此轻松愉快，好象什么也破坏不了他的情绪。因为生活中所有糟糕的事情他都经历过来了，余下的不可能更坏。

今天，他还等待着享受许多欢乐。

要是路上再经过一家酒店的话，大概还可以喝一杯。

但酒店没有再看到。

他看到的却是密密麻麻的一群人把人行便道全堵塞了，以致行人只能从马路上绕过去。奥列格断定街上出了什么事。不，人群都面朝梯阶和大门等着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昂起头来一看，市招上写着“中央百货商店”的字样。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定有什么热门货出售。不过，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先问一个男人，再问一个女人，又问另一个女人，但大家都挤得紧紧的，谁也没有明确回答。奥列格只了解到，现在正好快到开门的时候。既然是机缘使然，好吧。奥列格也挤进这一堆人中间去。

过了几分钟，两个男子把宽阔的大门打开，慌慌张张做着手势，试图遏制第一排的攻势，但接着就象躲避马队一般闪过一旁。等在最前面几排的都是年富力强的男男女女，他们一下子涌入大门，随后顺着扶梯冲向二楼；动作之迅捷，恐怕只有这座大楼起火，他们要从这里逃出去，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其余的人群也挤了进去，每人都按各自的年龄和体力踏着梯级往上奔。人流分出一小股在一楼淌开，但主攻方向是二楼。在这冲锋的浪涛中，不可能从容不迫地走上去，所以黑发蓬松的奥列格背着行李袋也奔跑上楼（拥挤的人堆里有人骂他“丘八”）。

到了楼上，人流立即分叉。人们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奔跑，拐弯时还得提防在拼花地板上滑倒。奥列格必须在一瞬间作出抉择。可是叫他凭什么来判断呢？他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跟在最自信的跑步健将后面奔去。

他发现自己排在针织品部一条迅速延伸的长龙之中。

几个穿浅蓝色工作服的女售货员却在晃来荡去，呵欠连连，仿佛压根儿没看见这派拥挤的景象，准备着捱过又一天空虚无聊的时光。

喘息甫定，奥列格打听到，这里将要出售的大概不是女式羊毛上衣，就是女式运动衫之类。他低声暗暗骂了一句娘，从队伍中退出来。

另外两股人流涌到哪里去了，他找不到。现在每一个方向都有人前往，所有的柜台旁也都有人。在一个柜台前人挤得较多，他估计热门货就在这里。人们在等着买廉价的深汤盆。售货员正在拆箱。这倒要得。乌什-铁列克没有深汤盆卖，卡德明夫妇喝汤的盆子有了裂口。带一打这样的汤盆到乌什-铁列克去倒是不坏！不过，他带到那里想必都成了碎片。

接下来奥列格就在百货公司上下两层信步漫游。他在摄影部看了一下。战前不可能搞到的照相机及其各种附件，如今充斥柜台，逗引顾客掏出钱来。搞摄影——这也是奥列格未能实现的童年幻想之一。

他对一些男式雨衣十分中意。战后他曾希望买一件便装雨衣，他认为男人穿着它最漂亮。但现在他得掏出三百五十卢布——整整一个月的工资，才能买一件雨衣。奥列格继续往前走。

他没有在任何地方买任何东西，可他的心情却好似腰包装得鼓鼓囊囊的，只是什么都不需要。肚子里的酒也在蒸发，使他精神振奋。

有一处在卖合成纤维衬衫。奥列格知道"合成纤维"这个词儿，因为乌什-铁列克的女人一听见这个词儿，会一窝蜂奔向区百货商店。奥列格对这种衬衫看了看，摸了摸，觉得挺不错。一件绿地白条的他已在想象中买下。（可是衬衫价值六十卢布，他买不起。）

正在他对着衬衫思量的时候，一个穿高级大衣的男人走到柜台前。他不是来看这种衬衫，而是看丝织衬衫。这个男子彬彬有礼地问女售货员：

"请问，象这种腰身五十号的衬衫你们有三十七号领子的没有？"

奥列格整个身子猛地一缩！不，他好象被人用锉刀同时在左右两侧狠狠地锉了一刀！他遽然回头看了一下那个男人——刮得很干净的脸上没有一条抓痕，头戴高级细毡帽，白衬衫上系一条领带。奥列格的神态宛如对方打了他一个耳刮子，眼看着两人中必有一个马上要从楼梯上被摔下去。

怎么？？人们在战壕里变酸发霉，人们被扔进阵亡将士公墓合葬，被埋在北极冻土带的小坑里，人们一次、两次、三次被关进劳动营，人们在押解囚犯的敞篷车厢里冻得发僵，人们为了挣钱买一件有补丁的棉背心卖命挥动洋镐，而这个纤尘不染的小子不但记得自己衬衫的腰身尺码，还记得自己领子的尺码？！

正是这个领子的尺码给了奥列格最后的一击！他万万没想到领子还有另外的尺码！他忍住受到伤害的呻吟，离

开了衬衫柜。居然还有领子的尺码！为什么生活要这样讲究？为什么要重返这样的生活？如果要记住领子的尺码，就得忘掉一点别的东西！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

这个领子尺码简直使他瘫软了……

走到家用商品部，奥列格想起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心想买一只轻便蒸汽熨斗，虽然并没有托他捎回去。奥列格希望没有这种熨斗（正象需要的东西照例买不到一样），那末他的良心和肩膀就可以同时摆脱重负。偏偏女售货员把柜台上这样一只熨斗指给他看。

"这是轻便的吗，姑娘？"科斯托格洛托夫不大放心地拿起熨斗来试试重量。

"我骗您做什么？"女售货员把嘴一撇。她的神态颇有点儿莫测高深，象在冥思遐想，仿佛她眼前来来往往的不是有血有肉的顾客，而是他们可有可无的影子在晃动。

"我不是说您骗我，但您会不会弄错？"奥列格提出这样一种设想。

女售货员无可奈何地回到碌碌尘寰，为移动一件实物作出了惊人的努力——把另一只熨斗放在奥列格面前。她再也没有剩余的精力作口头解释。她又飞往超凡脱俗的境界去了。

不怕不识货，只要货比货。轻便熨斗的重量果然少一公斤。他有义务把这熨斗买下来。

尽管姑娘为取熨斗已累得精疲力尽，她还得用瘦软的手给他开取货单，还得有气无力地张合嘴唇说："到核查处

拿东西。”（还要核查什么？核查谁？奥列格完全忘了。天哪，回到这个世界来可真不容易啊！）现在，还得由她移动芳驾把这只轻便熨斗拿到核查处去。奥列格觉得自己搅乱了女售货员的冥思遐想，实在太不应该。

熨斗放进行李袋，肩膀立刻感到份量。他穿着军大衣已经愈来愈闷得受不了，必须尽快离开百货商店。

但这时他从一面上顶天花板的落地大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虽然一个男人停下来顾影自怜不大象话，可是这样的大镜子在整个乌什-铁列克也找不到。他已有十年没有在这样的镜子里照见过自己。于是他不管别人会怎么想，先从远处照了一番，然后走近些照，接着再走近些。

他自以为是个军人，其实他身上连一点儿军人的气概都没有了。只有这件大衣和这双靴子还依稀可辨是士兵的大衣和靴子。而且肩膀早就弯曲，身躯也挺不直了。不戴帽子，不束皮带，他实在不象一个士兵，倒象一个逃亡的囚犯或到城里来买卖东西的乡下人。不过，这需要一股子骠劲，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模样久未整饬，显得憔悴而疲惫。

他还是不看自己的好。在没有看到自己的仪容之前，他觉得自己雄赳赳、气昂昂的，看行人居高临下，看女人不惭形秽。可现在，背着这寒碜透顶、早已不象士兵所用、倒象要饭的行李袋，要是站在街上伸出一只手，准保有人扔戈比给他。

可他还要去见薇加呢……。这副模样怎能见她？

他又走了一阵，来到插戴用品部，又名小型礼品部，反正是卖妇女饰物的一个部门。

一些女人在贼贼喳喳地试这试那，挑挑拣拣，这个腮帮上划着一道疤痕、兵不象兵、丐不象丐的汉子走到她们中间停下，呆立不动，傻乎乎地看着。

女售货员在暗笑——他想买些什么送给乡下的心上人？同时，女售货员注意着别让他顺手牵羊捞走些什么。

但他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拿。他只是站着呆看。

这个闪耀着玻璃、宝石、金属和塑料等各种光泽的部门，象一道涂了磷光粉的拦路杆横在他低垂的额前，犹如挡住一条牛。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前额不能撞断这根拦路杆。

他明白了。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买一件饰物送给女人，替她别在胸前，围在脖子上——这是十分美妙的。在他不知道或不记得的情况下，那还情有可原。但现在他既然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那末，从这一分钟起，他已无法空手去见薇加。

可是奥列格不能、也不敢送任何东西给她。贵重的东西连看也不必看。便宜的吧，他又不善挑选。比方说这种胸针，不，这种带别针的刻花坠子，尤其是这一枚六角形的，上面镶有许多亮晶晶的玻璃珠，不是挺好看吗？

但也许俗气得厉害？……一个有审美观的女人说不定甚至羞于把这样的东西接到手里？……可能这种饰物早已没有人戴，早已过时？……现在有没有人戴，他哪儿知道？

还有，到别人家里去借宿，舌头打结，脸涨得通红，把一

枚胸针递过去——这算什么玩意儿？

别扭的感觉象击柱游戏中的木棒接二连三把他击倒。

这个世界在他眼里显得太复杂了，又得了解女人的时尚，又得善于选购女人的饰物，要在镜前保持体面的仪容，还要记住自己领子的尺码……。而薇加正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这一切她全知道，并且得其所哉。

他产生了一种困窘和沮丧的感受。如果要去找薇加的话，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可是他不能。他失去了势头。他害怕。

他们之间隔着……百货商店。

刚才奥列格遵市场偶像之命冲进这座可诅咒的邪神庙时是那样猴急，此刻他从这里走出去却是那样垂头丧气，力竭精疲，简直象在这里买了几千卢布的东西，象在每一个部门试过式样，然后人家给他把商品包起来，现在他就弓起背脊扛着这小山似的一堆箱子和大包小包。

事实上只买了一只熨斗。

他累得仿佛为购买俗世的种种劳什子已花费了好几个钟点。澄净的、玫瑰色的早晨曾向他许诺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那个早晨到哪里去了？那些千百年琢磨成形的卷层云到哪里去了？在云海中浮沉的月亮银舟又到哪里去了？……

今天早晨他的心灵还是完整的，他在哪里把它兑碎了呢？在百货商店？……不，要早些，是和酒一起喝掉了。不，还要早些，是和串烤羊肉一起吃掉了。

他应该看过开花的杏树后立即赶奔薇加家……

奥列格不仅看橱窗和市招看腻了，甚至对于挤在街上密度愈来愈大的行色匆匆或兴致勃勃的人丛中也倒了胃口。他最好躺在小河旁一个遮阴的地方，荡涤心胸。城里他还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焦姆卡要求他去的动物园。

奥列格觉得还是动物世界比较容易理解，比较接近于他自己的水平。

奥列格感到压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穿着军大衣太热，但又不愿把它脱下来带着走。他开始问人家去动物园该怎么走。通向那里的是一些修造质量很好的街道——宽阔、清静，人行便道铺着石板，树木枝杈伸得很远。这里没有商店，没有照相馆，没有戏院，没有酒店——一家也没有。有轨电车的隆隆声也离得较远。这里有一个明媚、安静的晴天，阳光的热力直透树下。几个小女孩在人行道上跳跳蹦蹦做“造房子”游戏。主妇们在小庭院里栽种什么，或扦插木棒让植物爬藤。

动物园大门口全是儿童的天下——本来嘛，学校正好放假，天气又那么好！

走进动物园，奥列格最先看到的是一只捻角山羊。栅栏里高耸着一堵有陡坡和悬崖的岩壁。山羊的前足恰恰就踩在悬崖边上，它骄傲地站着，一动不动，腿细长有力，角相当奇特：两只长长的弯角象是用骨制的带一圈一圈绕起来的。它没有胡须，但是浓密的鬣毛从颈项两侧直垂到膝前，

犹如人鱼的头发。不过，山羊身上有一种庄严的气质，以致这长长的鬣毛既没有使它女性化，也不显得可笑。

伫立在捻角山羊槛前的人一心想看它用强劲的四蹄在这滑溜的峭壁上行走，但已经感到绝望。它站在那里很久了，活象一座雕塑，活象这巉岩的延伸部分。没有一丝儿风，它的长毛也不飘动，无法断定它究竟是真的，还是捉弄人的把戏。

奥列格站了五分钟，才怀着钦佩的心情走开：山羊始终没有动弹！具备这等性格不愁经不起人生的波折。

奥列格折上另一条园径的起点，看到有一只笼子旁边热闹得很，小孩子特别多。笼子里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地转动，不过总是在老地方打转。原来是一只松鼠落在轱辘里。的确跟俗话说的一样，是松鼠落在轱辘里。① 不过俗话把本来的意义全磨光了，谁也想象不出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松鼠？它为什么在轱辘里？而这里把俗话用实物表现了出来。笼子里为松鼠安排好一棵树干，上面枝杈向各处伸展。但不知哪个促狭鬼还在树旁挂着一个轱辘——那是一面鼓，鼓面向着观众洞开，鼓圈里边架有横档，于是整个鼓圈就变成一架没有尽头的封闭式梯子。松鼠无视为它安排的树和高处细长的枝杈，不知何故落进了轱辘，虽然没有人驱使它或用诱饵骗它到那里去。吸引它的无非是虚假的作为和虚假的运动这样一种幻觉。最初，想必它出于好奇轻

① 俄语中有"象松鼠在轱辘里打转"一句成语，意思是"不停地空忙"。——中译者注

轻地拨动梯档，还不知道这是多么缺德的、欲罢不能的恶作剧。(第一次不知道，以后几千次已经知道了，可还是照样干！)于是，一切就发疯一般旋转起来！松鼠整个赤褐色的纺锤形身体和一条赤褐中夹着灰蓝的尾巴，在飞速狂奔中成一道弧形展开。轮梯的横档晃动得那么快，直至完全看不出来。松鼠把所有的力气都使上了，眼看着心脏快要破裂！可是它的前爪连一级梯阶也没有爬上去。

比奥列格更早站在那里的人看到松鼠一直在奔跑，奥列格站了几分钟，也还是那样。笼内没有外力能使轮子停转或把松鼠从中救出来，也没有理智的声音向它劝说："算了吧！这是白费力气！"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明摆着不可避免的出路——松鼠的死亡。奥列格不愿站着看到那个结局，便往前走。

本地的动物园在入口的左右两边就以这两个意味深长的例子、两种可能性相等的存在方式迎接它的大小游览者。

奥列格一路看了银雉、锦鸡、红羽毛和蓝羽毛的野鸡，欣赏了孔雀的难以形容的青绿色颈脖、开屏时宽达一米的尾巴及其妃色和金色的流苏。经过颜色单调的流放地和医院生活之后，他的眼睛正在饱餐绚丽的色彩。

这里不觉得炎热，因为动物园地面宽敞，而且树木已开始投下阴影。奥列格一边得到愈来愈充分的休息，一边走完整个养禽场(有安达卢西亚鸡、图卢兹鹅、霍尔莫戈雷鹅)，登上养着鹤、隼、鹫的一座山。最后，在凌驾整个动物园的一块岩石上，帐幕似的笼子罩着几只坐山雕；如果不看

说明，还以为是老鹰哩。它们被安置在尽可能高的地方，可是笼顶同岩石的距离只有那么一点儿，所以这些阴郁的大鸟很不受用。它们展开翅膀频频拍打，可是没地方可飞。

奥列格望着坐山雕周身不舒服的情状，自己也扭动一下肩胛骨，舒展舒展身体。（也许是熨斗压着背脊？）

周围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特殊的感触。笼上的说明写着："白鹗对囚居不易适应。"明明懂得这个道理，可还是把它们关起来！

有退化的白鹗乐于囚居的吗？

另一处的说明写着："豪猪习惯于夜间活动。"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晚上九点半把人叫去，到早晨四点才放回来。

再如："獾居住在复杂的深穴内。"这倒是跟我们一个路子！好样儿的，獾啊，有什么办法呢？它的嘴脸也是条纹布式的，活象个苦役犯。

奥列格对这里的一切都作了曲解，大概这个地方同百货商店一样，也不应该进来。

一天已度过了很大一部分，可是许诺的欢乐还不见出现。

奥列格来到熊槛前。一只好象系着白领巾的黑熊竖立着，鼻子从栏杆里伸出来抵在铁丝罩上。后来它骤然一纵身，用前爪攀住栅栏，后爪腾空。它的颈毛与其说象白领巾，毋宁说象神父在胸前挂十字架的链子。它一纵身悬在半空中。它还有什么办法表达心中的绝望呢？

隔壁一栏里坐着它的配偶——一只母熊——和一只

熊仔。

下一格栅栏里幽囚着一只棕熊。它老是焦躁不安地跺足，想在槛内走走，可是只能转来转去，因为从槛壁到槛壁的距离还不足它身高的三倍。

按熊的尺度来衡量，这只能算是隔离室。

看得很上劲的孩子们在交谈：

“喂，咱们来扔几块石子给它，它一定以为是糖果。”

奥列格没有察觉孩子们对他也在仔细观看。他本人在这里就是一只免费展出的动物，不过自己看不见罢了。

小径通到一条河边。这里养着北极白熊，总算让两只待在一起。有几条沟渠流入它们槛内，形成一个冰水库，它们每隔几分钟就要跳下去凉快凉快，然后爬到水泥榭台上，用爪子挤去脸上的水，沿着水榭的边缘走来走去。夏天，在此地四十度的高温下，不知它们的感觉如何？想必同我们在北极圈内差不多。

在囚禁野兽的问题上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于：如果奥列格站在它们一边，即使他有权力，也不能着手拆毁笼槛放它们出来。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观念。倘若突然把它们放出来，也许更可怕。

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思路就是这样反常。他的头脑被扭曲得已经什么也不能按本来面目不带成见来接受了。现在他从生活中不论看到什么，眼前就会浮现灰色的幽灵，心中就会响起地府的噪音。

奥列格从忧郁的鹿（它在此地最苦于被剥夺了奔驰的

空间)、在印度被视为神圣的瘤牛、金色的刺鼠栅前经过，再次上坡——这一回来到了猴山。

大人小孩在笼前给猴子喂食取乐。科斯托格洛托夫脸不带笑从一旁经过。它们都不蓄发，仿佛个个剪的平头，神情郁悒，在板铺上回忆往昔的悲欢，那模样使他不禁想起过去的许多熟人，有几个酷似今天还关在什么地方的人。

一只孤独的黑猩猩眼睛浮肿，两条胳膊垂在两膝之间。奥列格从它若有所思的神态似乎认出了舒路宾——他也往往摆出这样的姿势。

今天天气这样晴朗、炎热，而病床上的舒路宾却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科斯托格洛托夫并不指望在猴山作出什么有趣的发现，只是走马看花匆匆而过，正打算到别处去，忽见较远的一只笼子上挂着什么公告，有几个人在看。

他往那边走去。笼内空空如也，说明牌上写着“猕猴”。而钉在木板上的一份草草写就的公告内容是：

> 由于某游客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致使住在此处的一只猕猴双目失明。那个狠心的人竟将烟末子撒入猕猴的眼睛。

奥列格猛地一震！在这以前，他还摆出无所不知的姿态，面带俯就的微笑信步漫游，这时却想纵声狂叫，发出整个动物园都能听见的咆哮——仿佛烟末子是撒在他的眼

睛里！

究竟为什么？！……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这样做？……毫无意义！究竟为什么？

公告的天真口气特别触动他的心。关于那个无名无姓、早已扬长而去的人没有说他惨无人道，没有说他是美帝特务；只说他是个狠心的人。恰恰是这一点最令人震惊：他为什么平白无故这样狠心？孩子们哪，你们长大了可不要变成狠心的人！孩子们哪，可不要残害无力自卫的弱者！

公告已经一读再读，可是大人和小孩仍站在那里，望着空荡荡的猴笼。

奥列格背着沾过油污、烧破过、打穿过的行李袋以及袋里的熨斗向爬虫类和食肉兽的王国走去。

一些穿山甲互相靠拢躺在沙地上，象是鳞片状的石块。它们在失去自由之前已经失去了行动的灵活性。

一条巨大的中国短吻鳄黑如生铁，嘴鼻扁平，前肢仿佛被扭歪了方向。说明上写着，天气炎热时它并不每天吃肉。

动物园这个秩序井然、食物现成的地方，可能十分投合短吻鳄的心意吧？

一条力大非凡的蟒蛇附在树上，象一根很粗的死枝。它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尖尖的芯子在摇曳晃动。

玻璃罩下盘伏着一条名叫沙蝰的毒蛇。

至于普通的蝰蛇每种有好几条。

他完全无意仔细观看所有这些爬虫。他一心在想象那只瞎眼猕猴的面孔。

他已走在食肉兽槛附近的小径上。这里有猞猁猻、雪豹、灰褐色的美洲狮、黄地黑斑的美洲豹，绚烂的毛色交相辉映。它们是囚徒，它们苦于失去了自由，但奥列格把它们视作劳动营里的刑事犯。世上哪些人明摆着有罪——这毕竟是分得清的。说明上写着，一只美洲豹一昼夜要吃一百四十公斤肉。这简直不可想象！他们整个劳动营一星期也配不到这么多！而一只美洲豹只吃一昼夜！

奥列格想起了囚犯中一些来去免予押送的车把式，他们克扣马料，靠吃它们的燕麦活了下来。

再往前走，他看到了老虎先生。它的凶残本性集中表现在胡须上。而眼睛是黄颜色的……。奥列格的思绪开始变得纷乱，他站在那里，用仇恨的目光瞪着老虎。

一个当年曾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① 的老政治犯，后来在劳动营里跟奥列格相遇，他告诉过科斯托格洛托夫，说那不是一双黑丝绒般的眼睛，而是一双黄眼睛！

奥列格面对虎笼站着，象被仇恨钉在地上了。

平白无故，平白无故，究竟为什么??

他感到头晕。他再也不愿待在这个动物园里。他想从这里跑出去。他不要去看什么非洲狮子。他开始往出口处瞎闯。

一匹斑马在某处闪现，奥列格瞅了一眼，又继续向前。

忽然间，他站住了！他眼前出现……

出现了奇迹！看了那么多嗜血食肉的动物之后，眼前

① 革命前斯大林曾被流放到那个地方。——英译者注

这只印度羚羊岂不是性灵的奇迹吗？这只羚羊毛色浅褐，细腿轻盈，小脑袋相当警觉，但一点也不害怕；它站在离铁丝网很近的地方望着奥列格。它的一双大眼睛流露出信任和——柔情！对，是一双温柔的眼睛！

这太象了，象得叫人受不了！那温柔而略带埋怨的目光直盯着他，仿佛在问："你干吗不来？半天已经过去了，你干吗还不来？"

这是妖魅作祟，这是移灵邪术，因为她清清楚楚站在那里等候奥列格。奥列格刚一走近，她立刻用责备而又原谅的目光问："你不来吗？难道不来了吗？我可在等你呐……"

他为什么不去啊？他到底为什么不去啊？

奥列格抖了抖自己的脑袋，向出口处迈步走去。

他还来得及在家里找到她。

第三十六章

可也是最后一天

现在奥列格不能怀着贪婪或暴躁的心情想她，但要是能象一条狗，一条挨了揍的、可怜巴巴的狗那样去躺在她脚下，那该是一种享受。象一条狗躺在地板上嗅她的脚——这是可能设想的一切幸福中最大的幸福。

但是，他当然不能容许自己表现这种动物的天真——去到她家老老实实伏在她脚下。他得说一些表示歉意的客气话，她也将说一些表示歉意的客气话，因为几千年来事情就是被搞得这样复杂化了。

他现在还仿佛看到昨天她两颊升起的红晕，当时她说："我认为……您完全可以住在我家里，完全可以！"这红晕必须偿还，用笑声阻止它，避开它，不让它再次升起，所以必须想好最初的几句话，既相当合乎礼仪，又相当幽默，以便冲淡那股别扭味儿：一个病人到单身的年轻女医生家里去借宿这件事情毕竟有点异乎寻常。要不然他什么话也不去想，索性在打开的门口一站，看着她，立刻称她薇加，对她说："薇加！我来了！"

但是，跟她一起，不是在病房里，不是在诊疗室里，而是

待在一间作起居之用的寻常屋子里，不拘谈些什么——他仍然不敢相信有这样大的福气。他肯定会犯错误，出洋相，要知道他对人类的生活太荒疏了。但他可以通过眼神向她表示："可怜可怜我吧！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没有你，我实在不好受啊！"

他怎么能浪费这么多时间？他怎么能不去找薇加？他早就该去了！

现在他步子迈得很大，不再犹豫彷徨，只担心一件事——见不到她。在城里逛了半天，他已经大体弄清街道的位置，现在知道该往哪里走。

只要他们互相怀有好感，只要他们在一起互相交谈觉得愉快，只要他能拉住她的双手，搂住她的肩膀，从近处温柔地谛视她的眼睛——这难道还不够吗？甚至超过以上所说的那些，远远超过那些——难道还不够吗？

如果对象是卓娅，当然不够。然而这是薇加，是印度羚羊！……

说真的，只要想到可以把她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胸中的弦就会绷紧，他便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不过到底够不够呢？……

他走近她家的时候，神经愈来愈紧张。这是地地道道的恐惧，然而是幸福的恐惧，是一种能叫人昏厥的喜悦。单凭这种恐惧，他已经感到幸福了！

他一路走，一路只看看街名，对商店、橱窗、电车、行人已一概不注意。在拐角处，由于拥挤他一时没能绕过站在那

里的一个老妇人。他看见老妇人原来在卖一束束紫色的小花，这才猛醒过来。

在他那被磨灭和改造后重新适应的记忆里，即使搜遍最冷僻的角落，也不会发现去见女人必须带花这么一回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这一点已被他彻底忘记干净，就象世上不存在这等事！他一直背着沉甸甸的破旧行李袋满不在乎地走着，没有半点踟蹰不前的样子。

就在此时，他看到一些鲜花。这花是卖的，不知卖给人家做什么？他皱皱眉头。模糊的回忆兜上心头，象溺死的尸体浮出浑浊的水面。对了，对了！在他青春时期那个遥远和近乎虚幻的世界里，有给女人赠送鲜花的惯例！……

"这是什么花？"他怕难为情地问卖花的妇人。

"紫罗兰，那还能假？"她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伤害。"每束一卢布。"

紫罗兰？……这就是诗中所写的紫罗兰？……他好象记得紫罗兰不是这样的。它们的茎杆要挺拔些、高些，花朵也更象铃铛。但可能他忘了。也可能这是本地的品种。反正这里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供选择。既然想起来了，那末非但不带鲜花前去已经不行，而且感到羞惭：刚才他不带鲜花怎能心安理得地走着？

可是他该买多少呢？一束？看起来太少。两束？还是有点寒酸。三束？四束？太费钱了。劳动营中练就的精明劲儿在他头脑中什么地方响起卡嗒一声，象计算器似地转动起来。他心想：只要还还价钱，两束花给一个半卢布，或

者五束花给四个卢布也买得下来。但是，这清晰的卡嗒一声响对奥列格仿佛不起作用。他掏出两个卢布乖乖地给了卖花妇人。

他拿了两束紫罗兰。花儿挺香，但也不是他青春时期的紫罗兰应有的那种香味，不是诗人的紫罗兰香味。

他捧着花束边嗅边走还可以，要是单独拿在手里，模样儿一定十分可笑。一个有病的退伍士兵，帽子也不戴，背着行李袋，手拿紫罗兰，岂不怪哉？这两束花怎么也无法安置，还是塞在袖子里不让人看见的好。

薇加家的门牌号码——对，就是这座房子！……

她说过，先得走进院子。他向院子里走进去，然后向左拐弯。

（他的心在突突地跳！）

一条公用的水泥长廊有顶无墙，栏杆下的斜栅用树枝编就。好些被子、褥垫、枕头都扔在栏杆上“透透空气”，拉在一根根细柱子之间的绳子上还晾着内衣。

从各种迹象来看，这里很不象薇加住的地方。附近的环境太不整洁。当然，这不能怪她。再往前，在所有这些挂得横七竖八的东西后面，将是她的寓所的门户，门内就是她一个人的天地了。

他从张挂的被单下面钻过去，找到了门户。这是一扇很普通的门。浅褐色的油漆有些地方已经剥落。门上有一只绿色的信箱。奥列格从军大衣袖中取出紫罗兰，用手掠一下头发。他心情激动，但激动使他高兴。她不穿医生的

白大衣，在自己家里，不知是什么样儿？

不，他两条腿拖着沉重的靴子从动物园走来所经过的不只是这几个街区！他走的是天南地北漫长的道路，走了两个七年！现在终于复员了，来到这扇门前，那里一个女人默默地等了他十四年。

他弯下中指用指关节触到门上。

然而，他还没有真正敲响，门已经开了。（她是不是从窗子里看见他啦？）从门内冲着奥列格推出一辆漆成猩红色的摩托车，在狭小的门口显得特别庞大。推车走出来的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宽脸盘上长着一个象被踩扁的鼻子。他甚至不问奥列格来干什么或找谁，只顾把摩托车往前推，根本没有让路的习惯。奥列格闪开了。

奥列格一愣，一时摸不着头脑：这个小伙子跟单身独居的薇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从薇加家里出来？尽管经过了这么多年，他毕竟不可能完全忘记，人们一般都不是独家居住，往往是一套公房几户合住。忘固然没有忘掉，但也不一定记牢。在劳动营的棚子里，自由被想象成与营棚截然相反的生活，决不会几户合住一套房。即使在乌什-铁列克，人们也都是独户居住，不合住公房。

“请问，”他向小伙子说。但小伙子把摩托车从晾着的被单下面推过去，已经开始下楼，只听得轮子落在梯级上传来空荡荡的回响。

而门户任其洞开。

奥列格犹豫不决地慢慢往里走。现在他发现，在一条

暗沉沉的过道深处还有一扇、两扇、三扇门——究竟哪一扇门才是呢？幽暗中出现一个女人，她灯也不开，立刻很不客气地问：

“找谁？”

“我找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反常态，怪不好意思地说。

“她不在！”那女人不去敲门，也不看一下，当即以十分自信的生硬口气把他顶了回去。她冲着科斯托格洛托夫走过来，迫使他让路。

“能不能请您敲一下门？”科斯托格洛托夫渐渐定下神来。他是为了盼着见到薇加才这样低首下心的，事实上对这位粗声大气的女邻居他也能以牙还牙。“她今天不上班。”

“知道。她不在。起先在，后来走了。”前额很低、脸颊歪斜的女人把他上下打量。

紫罗兰已被她看见。再藏起来已经太晚。

如果手里不拿这两束紫罗兰，他现在还象个人——他可以自己去敲门，大大方方地谈话，继续问邻居：她走了多久？是不是就要回来？他还可以留一张条子。（说不定薇加也有条子留给他？……）

然而，紫罗兰使他变成了一个有所求者、一个送礼者、一个痴情者……

在歪脸颊女人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他退到长廊上。

而那个女人把他从桥头堡赶走了不算，还跟踪观察。这个流浪汉背上的袋里好象有东西在往外顶，可别让他从

这儿捞走点儿什么。

摩托车在院子里肆无忌惮地发出开枪似的啪啪声，连消音器也不装。啪啪声戛然而止，接着又响起来，随后又戛然而止。

奥列格踌躇徘徊。

女人横眉瞪着他。

薇加怎么会不在家呢？她不是答应的吗？是的，她本来在等他，可是后来出去了。真是不幸！这不是不巧，不是扫兴，是不幸！

奥列格把拿着紫罗兰的一只手缩进军大衣的袖子，就象被砍掉了似的。

“请问，她一会儿就回来还是上班去了？”

“她走了，”女人故意把字眼咬得十分清楚。

她答非所问。

不过，站在她面前就这样等着也相当别扭。

摩托车猛地抽动起来，啪啪唾了几口，放了一阵空枪，接着又熄火了。

栏杆上放着好些份量很重的枕头、褥垫、装在套中的被子。这些都是拿出来晒太阳的。

“那您还等什么，公民？”

这些床上用品堆就的庞大碉堡把奥列格吓得晕头转向，想不出任何对策。

那个歪脸颊的女人则在一旁瞪着他，根本不给他留一点思考的余地。

而那辆该死的摩托车简直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撕成碎片——它就是发动不起来。

奥列格只得从枕头碉堡前撤退下楼，循着来时的原路被撵了回去。

要不是这些枕头(一只角被揉皱，两只角象奶牛的乳房那样松垂，还有一只角象方尖碑那样耸起)，要不是这些枕头，他也许还能想出办法，采取行动。不应该就这样走开。薇加多半还要回来，而且不久就要回来。那时她也会感到遗憾！她一定会感到遗憾！

但是，枕头、褥垫、带套子的盖被、象张挂旗帜一般晾在绳上的被单，标志着一种稳定的、千百年屡试不爽的经验，这是他现在没有力量推翻的。他没有权利这样做。

特别是现在。特别是他。

一个单身汉，只要心中燃烧着信念和抱负，他可以睡柴堆，睡木板。囚犯睡在硬邦邦的板铺上，因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被强制与他分开的女囚犯也是如此。

但要是男人和女人约好了想待在一起，这些饱满肥软的尊容就很自信地等着逞威风。这些尊容知道准没错。

奥列格离开那个他自知攻不破的要塞，背着沉甸甸的熨斗，狼狈而又蹒跚地走出大门。枕头碉堡得意洋洋地用机枪向着他的背影开火。

摩托车还是发动不起来，真该死！

走出大门，劈劈啪啪的响声减轻了些，奥列格站住脚又等了一会儿。

他还有希望等到薇加。她要是回来，不可能不打这里经过。他们就会相顾莞尔，就会高兴地说："您好！……""我告诉您……""您说可笑不可笑？……"

那时他就把挤皱、变蔫了的紫罗兰从袖子里抽出来。

等到了就可以跟她一起重新走进院子。但是，他们又得经过那些肥软而自信的碉堡哇！

碉堡决不会放过他们俩。

即使不是今天，那末总有一天，薇加——步态轻盈、超尘脱俗、眼睛呈淡咖啡色的薇加——也会把她轻柔可爱的被褥(但终究是被褥)搬出来晒在敞廊上。

鸟无巢不居，女人的生活不能离开被褥。

纵然你生就冰肌仙骨，纵然你无限高洁纯正，你总不能不度过夜里的八个小时！

总不能不睡下。

总不能不醒来。

滚出来了！猩红色的摩托车从大门内滚出来了，一路向科斯托格洛托夫作最后的一阵扫射。塌鼻梁小伙子到了街上，俨然是个胜利者。

失败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灰溜溜地走开去。

他从袖中取出紫罗兰。再过几分钟，这两束紫罗兰根本不能送人了。

迎面走来两名乌兹别克女少先队员，她们同样的黑色发辫都用电线扎紧。奥列格两手各拿一束花递给她们。

"拿去吧，小姑娘。"

她们觉得很诧异。两人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看奥列格。她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了几句，认识到他没有喝醉，也不是来跟她们纠缠的。她们甚至认识到，这位士兵叔叔送鲜花给她们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

一个少先队员接过花束，并且点点头。

另一个也接过花束，点点头。

然后快步往前走。她们肩膀相摩，热烈地交换着意见。

他肩后只剩下一只肮脏、汗湿的行李袋。

在哪儿过夜——这还得重新考虑。

旅馆里不行。

找卓娅不行。

找薇加不行。

且住，他可以去，可以去找薇加。她一定感到高兴，但决不会让你看出来。

但这与其说是一个“不能”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不准”的问题。

离开了薇加，整个这座美丽、富饶、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就象肩后那只沉重的行李袋。奇怪的是今天早晨他还那么喜欢这个城市，愿意多留几天。

还有一点也很奇怪：今天早晨他为什么这样高兴？现在，他的痊愈突然不再象是什么特别的喜事。

还没走到十字路口，奥列格就觉得肚子饿了，两腿瘘软，周身疲乏，觉得残余的肿瘤在体内打滚。这时他大概一心想尽快离开这座城市。

然而，重返乌什-铁列克的前景对他也失去了吸引力，尽管到那里去的路现在已畅通无阻。奥列格明白，到了那里，他将陷入更大的苦闷。

他简直想象不出，现在还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件事情能使他高兴。

除非回到薇加身边。

他一定要扑到她脚下，对她说："别把我撵走，别把我撵走！这不能怪我！"

但这与其说是一个"不能"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不准"的问题。

他向一个路人问现在几点钟。已经过了两点。得拿个主意。

他看到一辆电车的路号正是开往流放人员监督处那个方向的，便看它在什么地方靠站。

电车本身象患有重病似地载着他通过一些铺石子的狭隘街道，一路发出钢铁摩擦的刺耳噪音，在拐弯处尤其厉害。奥列格攀住皮环，弯下身来想看看窗外有些什么。但这一带没有草木，没有林荫道，全是石子路和蹩脚的房屋。一张白天在室外放映电影的海报晃了过去。看看那是怎么个放法倒满有意思。可是，不知怎的，他对世上的新奇事物已不大感兴趣。

她骄傲地熬过了十四年孤独的岁月。但她不知道，象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半年就够她受的。

他认出自己要到的那一站，便下了车。从这里得沿着

乏味的工厂区一条宽阔的大街步行一公里半。马路上不断有卡车和拖拉机轰隆隆来来往往，人行道顺着长长的砖墙延伸，然后跨过工厂的铁路轨道，接下来跨过一条煤渣路堤，经过一片挖了好多坑的空地，再次跨过铁轨，往前又是墙，最后是几排单层木棚。这些棚子的正式名称叫做"临时民房"，可是已经保持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现在至少不象一月份科斯托格洛托夫第一次来找监督处的下雨天那样泥浆泛滥，可这终究是一段漫长而令人泄气的路程。很难相信，这条街跟那些环形林荫路、数人合围的麻栎、直插云霄的白杨、堪称奇观的红杏竟在同一个城市里。

无论她怎样说服自己，说必须这样，这样才对，这样才好——事后一切还是会更加猛烈地迸发出来。

主宰全市所有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如此神秘地设立在偏僻的郊区，不知究竟有什么奥妙？反正它就在此地，在这些棚屋、泥泞的通道、玻璃打破后用胶合板钉死的窗户和到处挂满的衫裤中间。

奥列格想起了那位上班时间人也不在的监督官可憎的面部表情，想起上次他在这里接待自己的情形。到了监督处木棚的走廊里，奥列格放慢脚步，让自己也摆出一副满不在乎、莫测高深的面孔。在监狱里，科斯托格洛托夫从来不许自己向看守露出笑脸，即使看守向他微笑也不动容。他认为有责任提醒对方，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敲门后走进去。第一间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两张瘸腿的长凳以及栏杆后面一张桌子——当地的流放人员每

月两次的注册典礼想必就在那里隆重举行。

此时此地一个人也没有，里边牌子上写着“监督官室”的一扇门开得笔直。奥列格走过去向那扇门里张望了一下，问道：

“可以进来吗？”

“请进，请进，”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在欢迎他。

怎么回事？奥列格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过恩克维德① 的官员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走进去。整个房间里只有监督官一个人坐在办公桌旁。但这不是先前那个煞有介事地故弄玄虚的蠢货。现在那里坐着一个亚美尼亚人，面相和善，甚至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他丝毫不摆官架子，也不穿制服；一套讲究的便装西服同棚屋的环境不大相称。这位亚美尼亚人和颜悦色地看看奥列格，仿佛他的工作是摊派戏票，对于来了奥列格这位好主顾极表欢迎。

在劳动营里待了这么几年之后，奥列格不可能对亚美尼亚人抱有太大的好感。在那里，亚美尼亚人为数不多，他们互相包庇得厉害，总是占据存物处、面包房之类的好差使，有些甚至还是肥缺。不过，平心而论，这也怨不得他们：劳动营不是他们发明的，西伯利亚也不是他们创造的，凭什么思想原则要他们不互相庇护，不做交易，一天到晚用洋镐刨土？

此刻，看到办公桌旁这位对他笑容可掬的亚美尼亚人，奥列格想到的正是亚美尼亚人不打官腔、讲究实惠的特点，

① 即“内务人民委员部”。见本书第78页注①。——中译者注

顿时产生一种温暖的感觉。

奥列格报了姓名，并说自己临时登记在册。监督官尽管相当胖，却立刻很利索地站起来，开始在一只柜子里翻查卡片。与此同时，他象是竭力不让奥列格枯待，口中不断发出一些声音：或者是没有意义的感叹词；或者是卡片上的姓名——按纪律这是被严格禁止的。

“嗯……我来看一看……。卡里福梯地……康斯坦丁尼地……。您请坐一会……。库拉耶夫……卡拉努里耶夫……。哦，一只角给撕破了……。卡兹马戈马耶夫……科斯托格洛托夫！”接着，他又公然无视恩克维德的老规矩，没有提问核对来者的名字和父名，而是主动说了出来：“是奥列格·菲立蒙诺维奇吗？”

“是的。”

“嗯……。您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肿瘤医院治病……”这时，他抬起头来，用一双灵活的、富有人情味的眼睛望着奥列格，问：“怎么样？您觉得好一点吗？”

奥列格觉得自己已经被感动了，甚至喉咙里有些哽住。多么容易满足啊！只要让一些通情达理的人坐在这些可憎的桌子旁边，情况就改观了。于是，奥列格自己也不再做作，很自然地回答：

“怎么对您说呢……在某种意义上是好了些，在另一种意义上更坏些……”（更坏？真没良心！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躺在医院的地板上唯求一死时的状态更坏？）“总的来讲是好了些。”

“那就好了!”监督官表示高兴。“您干吗不坐下?”

即使分配戏票毕竟也需要花时间!必须在什么地方盖上印戳,填写日期,往一本厚厚的簿册里注上些什么,从另一本簿册里划去些什么。这位亚美尼亚人办上述种种手续时相当乐意。完了以后,他把奥列格交来的获准外出证明从卷宗里取出来,一边递还给奥列格,一边意味深长地望着对方,并且略略压低嗓门,用纯属非正式的口吻说:

“您……不要烦恼。这一切快结束啦。”

“您指的是什么?”奥列格大为诧异。

“这还用问?当然是指登记、流放、监督官!”他现出无忧无虑的笑容。(显然,他已另有比较愉快的工作可做。)

“什么?已经有……指示下达了吗?”奥列格急于刺探到一些情报。

“指示还没有下达,”监督官叹道,“不过有这样的苗头。我敢肯定对您说:一定会下达的!再坚持一下,把身体养好,还可以出人头地。”

奥列格现出一丝苦笑,说:

“我已经被逐出人间,头撞在地上。”

“您有什么专长?”

“没有。”

“结婚了吗?”

“没有。”

“这样倒好!”监督官很有把握地说。“在流放地结婚的,后来往往闹离婚,这种事情够麻烦的。您恢复自由以后

可以回到家乡去娶个媳妇儿!”

娶媳妇儿……

“好吧,那就谢谢啦,”奥列格离座起身。

监督官善意地向他点头作别,但毕竟没有跟他握手。

奥列格走过两间屋子,一路在想:为什么换了这样一位监督官?他是生来如此,还是得了风气之先?他到这里工作是固定的,还是临时的?还是如今特地派这样的人来任职?弄清楚这一点十分重要,可是又不能回进去打听。

奥列格沿着工厂区的这条长街重又经过棚屋、铁轨、煤渣路堤,走得很带劲,步子比较快,也比较稳,不一会就热得把军大衣脱掉。渐渐地,监督官给他灌下的那一桶快乐,哗喇喇流到他全身。对于这一切,他只能逐步领会。

奥列格之所以不能一下子完全领会,是因为坐在那些办公桌旁的人久已失去他的信任。战后最初几年,一些有大尉、少校头衔的官员曾故意放出空气,说即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这能忘得了吗?当时大家多么相信他们的话!“是大尉亲自对我说的!”其实,他们是奉上级之命给悲观绝望的囚犯打气,要囚犯们咬紧牙关完成定额!让囚犯们至少有一个奔头争取活下去!

但是,如果可以作一些猜测的话,那也不是这位亚美尼亚人担任的职务所能摸底的内情。再说,奥列格自己从报上的只言片语也看到一些迹象,他自己不是也盼着这一天吗?

我的老天爷,实在是时候了!早该这样做了!难道不

是吗？一个人身上长了肿瘤会送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动营和流放地怎么过日子？

奥列格又为自己庆幸。归根结蒂，他总算没有死。不久他就可以拿到去列宁格勒的车票。去列宁格勒！……难道真能走到伊萨基大教堂①前面去摸摸它的圆柱？恐怕心脏也会破裂！……

伊萨基肯定不在话下！现在他与薇加之间的一切也将随之而改观！简直令人头晕目眩！现在，如果真的……如果确实……不，这不再是梦幻！他可以在这里住下，跟她在一起！

跟薇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想象起来，胸膛简直会给幸福撑破！……

要是马上去把这一切告诉她，她将多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去告诉她？为什么不去？要是不告诉她，世上还有什么人更值得相告？还有什么人更关心他的自由？

他已经来到电车站。应该搭奔火车站的车呢，还是去找薇加？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她又要走开。太阳已经不那么高了。

他又激动起来。他的心又飞向薇加！在去监督处的路上想到的种种理由已统统化为烟云。

为什么他象做了不清不白的错事似地见不得薇加？薇加给他治病的时候难道毫无想法吗？当他提出异议，要求

① 俄国后期古典主义建筑艺术的代表作，1819—58年建于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中译者注

停止这种疗法时，她不是曾经保持沉默，退出镜头吗？

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他们不能升到一般水平之上？为什么不能站得高些？难道他们不是人？至少薇加有这个权利！

他已经在往车上挤。站上聚集了许多人，全都往这路车上涌！大家都要到那边去！奥列格一手拿着军大衣，一手拿着行李袋，没法抓住扶手。他被挤得旋转起来，先是给推上车台，然后塞进车厢。

人们从四面拚命往他身上压，他发现自己处在两个姑娘背后。她们的样子象两个大学生，一白一黑。她们同奥列格靠得那么近，大概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手被互相分开，每一只都给夹得牢牢的，因此不仅无法掏钱给火气很大的女售票员，而且无论哪一只手都动弹不得。他拿着军大衣的左手仿佛半搂着皮肤黑黑的那个姑娘，而整个身体被压向白皮肤的那一个，使他从膝盖到下巴颏儿都同她碰在一起，而那个姑娘也不会不感觉到他。最强烈的情欲都不可能象车上这群人那样迫使他们如此贴紧。她的脖子、耳朵、头发圈儿与他靠拢的程度超出了一切可以设想的界限。隔着穿旧的呢子衣服，他承受着她的温暖、柔软和青春。黑黑的那一个继续向她谈着学校里的事情，白的却停止答话。

在乌什-铁列克没有电车。象这样的挤法过去只有在弹坑里的情形还差不离。但那里并不一定同女人杂在一起。这种感受他几十年没有得到印证，因而现在显得益发

陌生、益发强烈！

但这不是幸福。这是悲哀。这种感受有一道他不能跨越的门坎，无论他怎样怂恿自己。

人家不是曾预先告知他吗？里比多还会保留。别的什么也没有！……

如此过了两站。其后虽然还挤，但来自后面的压力已经不是太猛，奥列格可以稍微松动一下。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想脱出身来结束这份需要福气消受的痛苦。此刻他旁的什么都不要，只想这样再待一会，再待一会。哪怕电车现在开回老城！哪怕它发了疯，咣啷啷不靠站来回环行直到深夜！哪怕它下决心要作环球旅行！——反正奥列格不想首先脱出身来！他一边尽量延长这份幸福（现在他不配获得比这更高的享受），一边怀着感激的心情记下脑勺子上的头发圈儿（她的脸奥列格始终没看到）。

白皮肤的姑娘脱出身来，开始往前边移动。

奥列格挺一挺虚软、弯曲的两膝使自己站直，他这才明白自己去找薇加将以痛苦和欺骗而告终。

他所需要的大都将得之于她，而不是得之于自己。

他们曾如此崇高地一致认为，精神上的交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更宝贵。但这座高高的桥由他俩的手搭起来以后，奥列格已经看到他自己的手在发颤。他去找她，见了面嘴上煞有介事地说东，可是心里痛苦难捱地想西。等她一走，他一个人留在她的房间里，势必对着她的衣服、她的每一件零星物品、她的洒了香水的手帕痛哭流涕。

不，不能蠢得象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那样。应当奔火车站。

他没有往前打那两个女学生身旁经过，而是挤到后车台上跳下了车。不知哪个人骂了他一句。

可是电车站附近又有人在卖紫罗兰。

太阳已经快要下山。奥列格穿上军大衣，倒车去火车站。这路电车已不象刚才那样人多。

在车站广场的人群中挤挤挨挨，几次问讯不得要领，最后来到类似带篷菜场那样的一座帐棚前，这里是卖远程火车票的地方。

售票的窗口共有四个，每个窗口外面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在排队，还有人暂时走开去了。

火车站上一连几天几夜排队的景象在奥列格看来还是老样子。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的式样换了，青年人的作风不一样了。但是，卖火车票的情况从他懂事以来依然如故——四六年是这样，三九年是这样，三四年、三〇年也是这样。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得起来，但不排队的火车站售票处他简直无法想象：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份证或专门证明的人。

眼下他倒有一张证明，虽然不太神气，但用得上。

空气闷得很，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冒汗，可他还从行李袋里掏出那顶很紧的皮帽硬戴到头上，就象绷上楦植一般。他把行李袋吊在一只肩上，装出的一副神态好象在手术台上由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给他开过刀以后还不到两个星期。

他带着这种极度虚弱的表情和暗淡无神的目光从长蛇阵之间向窗口那边蹒跚地挨过去。

那里也有这样的一些业余演员，但并不往窗口那边挤，也没有人打架，因为旁边站着一个民警。

在这里，奥列格当着众人的面慢慢腾腾地从襟内的斜兜里摸出一张证明，很信任地把它递给民警同志。

民警是个留小胡子的乌兹别克人，气宇轩昂，象一位青年将军。他一本正经地看了奥列格的证明，向排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宣布。

“对这个人照顾一下。他开刀不久。”

说着，他指定奥列格排在第三个。

奥列格有气无力地看了一下队伍中的新伙伴，甚至不打算挤进去，却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兹别克胖子戴着一顶棕色丝绒盆式宽边帽，因而脸上呈古铜色，他把奥列格往队伍里推了一下。

站在紧靠售票处的地方相当有趣：可以看到女售票员的手把车票扔出来，可以看到旅客从密扣的衣兜或缝口的褡包中取出足够的钱紧紧捏在汗涔涔的手里，可以听到旅客胆怯的请求和女售票员无情的拒绝。看来事情在进展中，而且进展得不慢。

轮到奥列格俯身向窗洞里探头买票了。

“请给我一张硬席普通票到汗陶。”

“到哪里？”女售票员问。

“汗陶。”

“没听见过有这么个地方，”她耸耸肩膀，开始翻查一大本手册。

“亲爱的，你怎么买普通票哇？”排在奥列格后面的一个女人向他表示同情。“才开过刀坐普通车厢行吗？爬上爬下把刀缝进裂了可不得了。你还是买卧铺吧。”

“没钱哪，”奥列格叹一口气。

这是真话。

“没有这么个车站！”女售票员叫道，啪的一声把手册合上。“买到另一个站吧。”

“怎么会没有呢？”奥列格强作笑容说。“这个站设立一年了。我自己就是从那里坐车来的。早知道这样，我会把车票保存下来给您看。”

“这些我都管不着！既然手册上查不到，那就是说，没有这么个车站！”

“可是火车明明在那里靠站！”奥列格开始卷入争端，声调不免比一个开刀不久的病人来得激动一些。“那里还有售票处呢！”

“公民，您不买就走过去！下一个！”

“对，干吗耽搁时间？”后面起了罗唣。“给你到哪儿的票就拿呗！……才开过刀的人还这样挑挑拣拣。”

哦呵，奥列格这时真想据理力争！哦呵，他真想大闹一场，要求旅客服务处负责人和车站站长出来！哦呵，他真想把这些个木头脑袋狠狠敲一顿以伸张正义——尽管是这么一丁点儿可怜巴巴的正义，但毕竟是正义！至少在维护它

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自己不愧为一个人。

然而，供求关系的法则、运输计划的法则是铁的法则！刚才劝奥列格买卧铺票的那个好心肠女人，已经从他背后把钱往窗洞里塞进去。刚才让他插入队伍的民警，已经举起一只手，准备把他拉到一边去。

"从汗陶我还得走三十公里，可是从另一个站我得走七十公里，"奥列格还在向窗洞里诉苦，但这已经是无病呻吟。他自己急忙收场下台："好吧，那就买到秋站。"

这个站是女售票员烂熟于胸的，票价也知道，而且也还有余票，应当高兴还来不及。奥列格不走远，就在附近朝着亮光核对了票上打的小孔，核对了车厢号码，核对了票价，核对了找头——这才走开。

离开那些知道他才开过刀的人愈远，奥列格的腰就挺得愈直。他已经把那顶寒碜的帽子摘下来塞回到行李袋里。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衣兜里揣着车票度过这两个小时是很愉快的。现在可以庆祝一番了：吃一杯在乌什-铁列克再也吃不到的冰淇淋，喝一瓶克瓦斯①（那里也喝不到）。还得买一些黑面包路上吃。食糖可不要忘了。他还得耐心排队灌一瓶开水（自己带着开水是件不可小觑的事情！）。咸鲱鱼无论如何要不得。哦，这可比坐押解犯人的车优越得多了！上车前不必搜身，不关在闷子车里，不让你坐在解差包围的地上，也不让你两天两夜没水喝活受罪！还有，要是能占到第三层的行李架，可以挺直身子躺在那里——管它

① 俄罗斯民族饮料，一般用面包发酵酿制。——英译者注

两人合用，三人合用，反正只他一个人用！躺在那里感觉不到肿瘤的疼痛——这不是幸福吗？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还有，监督官也透露了一点有关大赦的风声……

千呼万唤的幸福来了，终于来了！可是奥列格不知怎的竟认不出来。

归根到底，她不是把外科医生亲昵地称作“列夫”吗？即便不是这个，也还有别人。反正可能性要多大有多大！……如果他闯进去，会在别人的生活中引起爆炸。

今天早晨他看到月亮的时候，曾经怀有信心！然而月亮是亏缺的……

现在必须走到站台上去——必须比他那班车开始上车的时间早得多：等到那一列空车发到站台上，他得看准哪一节车厢，跑过去排在队伍的前头。

奥列格去看了一下行车时刻表。有一班开往另一方向的列车——第七十五次车——已经该上车了。奥列格先装出气急败坏的样子很快地挤到门前，逢人便问，见了站台检票员也问（车票在他手中只露出一点点）：

“七十五次没开走吧？……七十五次没开走吧？……”

他非常害怕赶不上第七十五次列车。检票员也没仔细核对车票，就推着他背上沉甸甸、饱鼓鼓的行李袋放过去了。

到了站台上，奥列格从容地踱了一会，然后站住脚把行李袋放到水泥地上。他回忆起另一次类似的有趣经历：三

九年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奥列格应征入伍前不久的事，当时同里宾特洛甫已经签订了条约，但莫洛托夫还没有发表讲话，对十九岁的青年的动员令尚未颁布。① 那年夏天，他和一个朋友在伏尔加河上划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把船卖了，得坐火车回去上课。可是他们划船旅行带的东西很多，两个人勉勉强强拿得下，而且奥列格的朋友还在一个偏僻小镇的商店里买到一只扬声器——当时在列宁格勒很难买到。那只扬声器是圆锥形的大喇叭，又没有套子，奥列格的朋友担心在上车时会把它挤扁。他们来到斯大林格勒车站，发觉已排在密密麻麻的长队末尾，整个大厅塞满木筐、口袋、箱子。想赶在上车前挤进站台已不可能，眼看着有两宿捞不到地方躺下的危险。当时严禁旅客提前进站。奥列格忽然想出一个主意，便对他的朋友说："你一个人好好歹歹把所有这些东西拖到车厢前行不行？哪怕落在最后也不要紧。"他自己拿着大喇叭，迈着轻松的步子，向不准旅客出入的内部通道走去。他隔着玻璃门煞有介事地向一名女值班员挥挥扬声器，对方开了门。"还有这一只装好以后就完事啦，"奥列格说。那女的点头会意，仿佛看惯了他整天带着喇叭在这里走来走去。列车发进站台，他赶在旅客上车之前第一个跳进车厢，抢先占好两只行李架。

十六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

① 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到莫斯科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同年 9 月 1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全国兵役法》。——中译者注

奥列格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发现这里另有一些象他一样狡猾的人，他们也是混进来的，现在带着东西等候上车。这样的人有不少，但站台上毕竟比车站大厅和站前广场上空得多。这里也有七十五次车上的旅客在悠闲地散步。他们衣着整齐，不慌不忙，因为有对号的座位，不怕任何人抢先。有拿着人家送的花束的女人，有拿着啤酒瓶的男人。有人在照相——这对他是高不可攀的、几乎不能理解的生活。在温暖的春日黄昏，这个长长的带顶站台使他想起童年时代到过的南方某地——也许是矿水城[1]。

这时奥列格发现车站邮政所有一面向着站台开放，甚至就在站台上摆着一张有四个斜面的小桌子供旅客写信。

他一下子意马心猿起来。这是应该做的。趁印象还没有模糊，还没有磨灭，马上就做。

他带着行李袋挤进门去买了一只信封。不，要两只信封和两张纸。不，还要一张明信片。然后又挤出来回到站台上。他把装着熨斗和黑面包的行李袋放到地上，夹在两条腿中间，自己在斜面写字台旁坐好，先写最容易的——明信片：

焦姆卡，你好！

我到动物园去过啦！告诉你：这是值得的！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玩的地方。你一定得去。那里有白熊，你能想象吗？有鳄鱼、老虎、狮子。你花

① 北高加索的矿泉疗养地。——英译者注

一整天时间好好看看，那里还有馅饼卖。别漏看了捻角山羊。你耐着性儿在它旁边站一会，想一想。你要是看到印度羚羊，也这样做……。猴子多得很，准保你哈哈大笑。但少了一种动物：狠心的人往猕猴眼睛里撒了烟末子——平白无故、莫名其妙地把它给弄瞎了。

火车快开了，匆此。

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有出息的人！我相信你！

代我向阿列克塞·菲利波维奇问候！我希望他能好起来。

握你的手！

奥列格

他写时并不太费斟酌，只是笔很不好使，笔尖不是歪的就是裂的，老是戳破纸张，象铁锹插入泥土。墨水缸里积着大量纸张纤维。因此，无论他怎样小心，就书面整洁情况而言，这封信看起来相当可怕：

卓英卡，我的小蜜蜂！

感谢您让我的嘴唇接触到真正的生活。要是没有那几个晚上，我会感到自己象……象一个被偷得精光的人。

您比我明智，才使我现在可以离开而不受良

心的谴责。您邀请我到您家去，可是我没有去。谢谢！不过我想：让我们保持已有的状态吧，不要去破坏它。我将怀着感激的心情永远铭记您的一切。

衷心地、真诚地预祝您的婚姻美满幸福！

奥列格

这有点象在恩克维德拘留所里的情形：在接受申诉的日子里也是给你这种垃圾墨水缸，给你跟这差不多的蘸水笔，纸比明信片还小，墨水漶化得厉害，真是力透纸背。你爱写给谁就写给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奥列格把信读了一遍，折好后打算封口（他从小就记得有一部侦探小说的情节都因信封混淆而起），但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按国家标准规格在信封的斜口上刷有胶水，可是现在那里只有一道较暗淡的痕迹，胶水当然没有。

奥列格把三支笔都试遍，选出笔尖不算最坏的一支，把它擦干净了，考虑写最后一封信。刚才他站得很稳，甚至面露笑容。可现在一切都在眼前晃动起来。他曾拿定主意写“薇拉·科尔尼里耶夫娜”，结果写的是：

亲爱的薇加！

（我一直拚命地想这样称呼您，这一次至少如了愿。）

我可以完全坦率地给您写信，我跟您在交谈

中虽然从未这样坦率，可是在想象中不也是这样坦率吗？这毕竟不光是一个医生向一个病人提供自己的房间和床铺，您说对不对？

今天我曾几次到您那儿去过！有一次真的进去了。我去找您的时候激动得象个十六岁的少年，这对于有着我这样的经历的人来说实在太不象话。我感到激动、拘束、高兴、害怕。要知道，若不是浪迹天涯这么多年，是不可能理解什么叫"天赐机缘"的。

但是，薇加！倘若我去时您在家，一种不稳定、不自然的状态也许会在我们之间发端！后来，我走在路上，却明白了：您不在家倒是件好事。到目前为止您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和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至少有个名堂，至少说得出口！但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端的事，甚至对任何人都无法承认！这怎么能想象：您、我以及我们之间的这个——就象一条灰色的、腐臭的、但是愈来愈膨胀的蛇！

我比您老，我不是从年龄上说，而是从生活经历上说。您可以相信我：您做得对，在各方面，在一切方面都做得对！无论是在您的过去，还是在您的今天。只是您不可能逆料自己的未来。您可以持不同意见，但我敢预言：您无须乎漂游到无动于中的老年，您就会庆幸今天没有分担我的命运。（我不是指流放生涯，现在甚至有风声说它快结束

了。）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象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就饶了自己的后半生吧！

现在，反正我要离开了（即使流放期告终，往后我也不到你们那里接受检查和进一步治疗，所以说，我们将从此分手），我要向您表白：即使在我们谈论最富精神性的事物时，尽管我并不口是心非，而且真诚地相信所说的话，——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吻您的嘴唇！

您去分析吧。

现在我不征求同意在此吻您。

第二只信封也是这样：斜口上一道暗淡的痕迹，可是一点也不粘。奥列格总觉得这不是偶然的。

可是他背后——哎哟！他的深谋远虑和巧计花招一齐落了空。列车已经发进站台，人们纷纷往那儿跑！

他抓起袋子和信封，挤进邮政所，问：

"胶水在哪儿？姑娘！你们这儿有胶水没有？胶水？"

"因为老是有人拿走！"姑娘大声解释。她看看奥列格，不太放心地拿出一罐胶水，说："给，就在我这儿用，粘好了还我！不要走开。"

黑糊糊、粘答答的胶水罐里一柄小学生用的小刷子整个纺锤体都沾满了新的和陈的干硬胶块，简直没法捏住任何部位，只得将刷子柄横过来象拉锯似地在信封斜口上拉。

然后用指头抹去多余的胶水。封好了口，还得用手指抹去被挤出来的胶水。

可是人们在奔跑。

现在：把胶水还给姑娘，把袋子拿起来(它始终被夹在两腿之间，以免被人捞走)，把信投入邮箱，自己赶紧跑步——走！

尽管他象是精疲力尽，站都站不稳，可是说跑就跑！他抄近路绕过从正门里涌进来的人群，拖着沉重的行李从站台上下去跨越铁轨，再爬上另一个站台。奥列格跑到自己的车厢前，大约排在第二十名。就算前面还有自己人加塞儿，至多也在第三十名左右。上层的铺位是捞不到的了，反正他也不要，因为腿太长。① 不过行李架非抢到不可。要是他们把篮子扔了上去，那就把篮子搬开。

旅客们都带着式样相同的篮子，甚至还有带提桶的。莫非都盛着新鲜果蔬？难道是到卡拉干达去象恰雷所说的“纠正供销体制上的错误”？

列车员——一个头发斑白的小老头儿——嚷着叫大家沿着车厢站好，不要争先恐后，人人都有位子。但最后那句话他说得不那么有把握，而队伍在奥列格后面越排越长。奥列格立即发觉有人蠢蠢欲动，企图横穿队伍冲上车去，这正是他所担心的。第一个企图强冲的是个装疯卖傻的家伙。不明真相的人会把他当作精神病患者而听任他不排队

① 苏联的硬席车厢上层的铺位大致与人的高度相齐，因此奥列格的长腿会伸到不分房间的车厢过道里造成不便。——英译者注

上车。但奥列格一眼就认出他是个关过劳动营的坏蛋——他们惯用这一套伎俩吓唬人。而一些本来安分的人也跟在这个带头起哄者后面压过来：他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当然，奥列格也能耍这一手，这样可以稳稳捞到行李架。但是，过去几年已使他对这一切感到腻味，他希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行事，跟小老头儿列车员的愿望一致。

小老头儿毕竟没有放那装疯卖傻的家伙过去，可那家伙已经推着他的胸部，一边满不在乎地骂娘，仿佛这是最稀松平常的语言。队伍里有人发出同情的咕哝：

"放他过去算了！人家有病嘛！"

这时奥列格离开原地，三脚两步走到那家伙跟前，不顾鼓膜可能震破，对准他的耳朵大喊：

"嗨！我也是打那里来的！"

那家伙朝后一仰，揉揉耳朵问道：

"打哪里来？"

奥列格知道自己现在体力消耗殆尽，没有打架的本钱。但万一弄到那个地步，他的两条长胳膊都空着，而装疯卖傻的家伙一只手提着篮子。于是，他居高临下对着那个家伙，换上很轻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那里哭的有九十九，笑的只有一个。"

排队的人不明白是什么治好了他的疯癫，但见他冷静下来，眯眯眼睛，对穿军大衣的高个儿说：

"我没有意见，我不反对，你先上也可以。"

但是奥列格仍站在那家伙和列车员旁边。万不得已时

他从这里也能挤上去。不过，起哄的人开始散开去排队了。

“算了！”那家伙讪讪地说。“那就等吧！”

人们带着篮子、提桶走来。从盖在上面的麻袋底下有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粗壮的浅紫淡红色椭圆形小萝卜。有三分之二的人出示的车票都到卡拉干达。奥列格原来是为这些人维持队伍的秩序！正常的旅客也纷纷上车，其中有一个相当体面的女人，穿一件蓝色上衣。奥列格刚一上车，装疯卖傻的家伙也稳步跟进。

奥列格在车厢里快步走去。他发现有一只不靠边的行李架差不多还空着。

“行啦！”他宣布说。“这篮子我来把它挪一下。”

“往哪儿挪？干什么？”有人紧张起来。这是个瘸子，但似乎很健康。

“不干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答话时已经爬上去了。“人家没地方躺下。”

他很快就在行李架上安顿停当：行李袋权充枕头，熨斗从袋里拿了出来；军大衣脱下来铺在架上，把上装也脱了——这里高高在上，怎么都行。他躺下来定一定神，凉快凉快。他那穿着四十四码靴子的两条腿有半只靴统悬在过道上方，但在这样的高度不妨碍任何人。

下面的旅客也在宽衣定神，互相认识。

那个瘸子颇好交际，他说过去当过助理兽医。

“为什么不干了？”有人表示不解。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每死掉一只羊就得上被告席，与

其这样，我宁可作为残废退休，运运蔬菜！"瘸子大声解释。

"是啊！" 穿蓝色上衣的女人说。"在贝利亚掌权时，贩运蔬菜、水果要被抓起来。如今只有贩卖工业品才抓。"

太阳想必只剩下最后一点余晖，且被车站挡着。下面还有些亮光，上面已经暮色沉沉。有包房的旅客和软卧旅客在站台上散步，而这里的人坐在占到的位子上安置行李。奥列格把全身挺直。舒服哇！在闷子车里蜷着腿待上两天两夜真难受！象这样一间里挤十九个人可不是滋味。挤二十三人更不是滋味。

别人没有活到今天。他活到了。他也没有死于癌症。流放生涯也已经象蛋壳裂了缝。

他想起监督官劝他娶媳妇儿的话。不久，谁都会这样劝他。

躺着真好。真舒服。

只有当列车震了一下起步开动的时候，他才感到心脏那里、灵魂深处、反正是胸中一个主要的地方突然收缩拢来。他翻了个身，俯卧在军大衣上，闭上眼睛，把脸贴着棱角凸起的一袋面包。

火车在行进，科斯托格洛托夫没脱去靴子的脚在过道里悬空晃荡，足尖朝下，象有个死人在那里。

狠心的人把烟末子撒在猕猴眼睛里。

平白无故……

关于索尔仁尼琴

亚历山大·伊赛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他父亲是沙俄军队的炮兵军官，母亲是中学教员。他是个遗腹子，童年时代生活艰苦，五岁时随母亲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在那里求学，后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系，还曾在莫斯科大学函授部攻习文学。苏德战争爆发，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由于他长于数学，被送往炮兵学校学习，于1942年11月作为炮兵侦察连连长赴前线作战，曾因军功，两度受勋，并擢升至大尉。

在前线，索尔仁尼琴经常和他的密友通信，议论各种问题，每提及斯大林时总是使用固定的代号。1945年初，索尔仁尼琴所在的部队已攻入东普鲁士，此时通信事发，索尔仁尼琴被苏军反间谍部门逮捕押往莫斯科。经过四个月的审讯，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八年劳改。1953年2月刑满后，他还在哈萨克斯坦度过三年流放生活，于1956年获释。次年，军事法庭重审他的案件，最后为他恢复了名誉。索尔仁尼琴遂与他妻子复婚，回到俄罗斯，定居梁赞市，在一所中

学里充当数学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

1962年11月，苏联《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由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这部作品一下子轰动了整个苏联，接着在西方也引起巨大反响。

继《一天》之后，索尔仁尼琴还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形势变化，除《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发表。至1965年3月，《一天》受到公开批判。描绘莫斯科附近一座特殊监狱玛甫里诺的小说《第一圈》的手稿，被克格勃没收。《癌病房》虽得到莫斯科作协肯定的评价，但报刊和出版社均拒不发表。后来，这两部小说以及揭露集中营内幕的长篇《古拉格群岛》和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4年8月》，都是在国外出版的。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代表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保障作协会员免受污蔑与非法迫害"等等。帕乌斯托夫斯基、卡维林、田德里亚科夫、特里丰诺夫等许多人联名致函大会，要求讨论索尔仁尼琴的这封信。老作家卡达耶夫、安托科里斯基、安东诺夫等人，也单独写信或发电报给代表大会，表示支持索尔仁尼琴。然而大会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1969年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会籍。这个决定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除国内有一批人为

他奔走呼吁外，让-保罗·萨特、阿瑟·密勒、弗里德里希·迪伦玛特、海因里希·伯尔等欧美著名作家也纷纷提出抗议。索尔仁尼琴从此成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首领。就在这个时候，瑞典皇家学院于1970年10月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金。奖状中说，授奖给他是"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而苏联报刊则认为，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金是"冷战性的政治挑衅"。在这种情况下，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3年9月，他写了《致苏联领袖们的公开信》，提出了他的政治纲领，并曾两次拒绝最高检察院的审讯。苏共政治局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公民资格，把他驱逐出境。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捕，秘密警察把他带上一架飞机，押送到西德。他先在瑞士的苏黎世定居，后决定移居美国。

西方不少知识分子对于索尔仁尼琴的哲学和宗教观点，例如他仇视社会主义，坚持宗教复兴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宗教能医治现代文明的痼疾等等，并不完全赞同。他们中间也有人认为索尔仁尼琴的盛名完全是政治形势造成的，把他看作为一个以暴露"共产主义罪恶"为能事的作家、一个地下俄国的精神领袖。但是也有人认为，他是文学上的杰出人物，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因此必须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评论他。他们指出索尔仁尼琴的社会观和道德观是保守主义、宗教热忱以及对待日常生活的现实态度的混合物，他的创作与俄国古典文学——特别是陀斯妥耶夫斯

基和托尔斯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语言上则明显地受到俄国十九世纪民粹派作家的影响。

长篇小说《癌病房》写于 1963 年至 1969 年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产物。索尔仁尼琴本人在流放地患过癌症，可是他申请到外地就医的报告隔了好几个月才获批准。当他勉强来到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时，几乎已经奄奄一息。经过三个月的激素与深度爱克斯光治疗后，他才病愈出院。这次住院积累了《癌病房》的素材。小说主人公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作者的自我写照。现在我们将这部小说翻译出版，以供我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了解。

本书是根据 1970 年巴黎出版的俄文本翻译的。译者并参考了《企鹅丛书》版的英译本。凡遇俄文本与英译本有比较重要的不同之处，均由译者加注说明。英译本中的注释凡有助于理解本书者，也尽量译出备考。

本书按俄文原名应译作《癌症楼》，但由于从英译本 *Cancer Ward* 转译过来的书名《癌病房》，已为相当多的人熟知，所以这个译本就从俗沿用了。

编　者